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 自贡商人

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美」曾小萍 著

董建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 自贡商人

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美」曾小萍 著  
董建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美)曾小萍  
著;董建中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7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The Merchants of Zigong

ISBN 978-7-214-13295-6

I. ①自… II. ①曾… ②董… III. ①盐业史—研究  
—自贡市 IV. ①F42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2626 号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by Madeleine Zelin

Copyright © 2005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7-318

书 名 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

---

著 者 [美]曾小萍

译 者 董建中

责任编辑 张晓薇

装帧设计 黄 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插页 4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3295-6

定 价 48.00 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 编 刘 东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王保顶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 目录

## 序言 1

中国历史上的自贡 1

自贡与企业史 4

资料 10

致谢 12

## 第一章 盐政与盐业技术 15

川盐与帝制晚期国家 18

富荣盐场的地理位置 27

清初富荣盐场的盐业生产技术 30

富荣盐场的崛起 39

## 第二章 晚清富荣的投资结构 42

清初的凿井契约 45

井基和矿基的简单租佃 47

富荣土地与资本的结合 51

盐井合伙制的发展 59

## 第三章 分裂:一种商业策略 74

盐井生产中的合伙制 76

生产资料的分配与再分配	85
卤、气利益相关者分享利润	97
结论	101
第四章 清代富荣的组织与企业家	104
盐业上发财致富	104
大盐业帝国的经营	115
分裂与纵向一体化	127
卤窰	140
组织创新与资本积累	149
第五章 城市劳动力的增长	152
移民与工业化	153
盐业劳动力的规模	156
现代自由劳力的增长	159
劳力的专业分工与技术的专门化	161
雇用条件	164
劳工组织与劳工斗争	169
结论	176
第六章 官运商销	178
“济楚”市场	180
争夺湖广市场	183
官运商销改革	186
官运商销对富荣食盐生产商的冲击	196
第七章 技术和组织的变革,1894—1930年	200
李伯斋与盐岩层的发现	201
蒸汽机车的引入	208
生产关系的重组	216
大灰子井与盐井生产力的提高	219

富荣盐场机推大灰子井的影响	222
第八章 富荣盐场守卫的变换	228
老牌盐场精英的衰落	230
新盐业精英的崛起	248
第九章 政治、赋税与市场:20 世纪初自贡的命运	274
1911 年与自贡自治	276
军阀时期的盐政	281
军阀统治与自贡盐业命运	289
自贡商会	305
产业战与盐场的衰落	309
1928 年大罢工	316
抗战前夕的自贡	322
第十章 自贡:产业中心还是手工业“飞地”?	324
辅助产业和行业	326
信贷与金融业	337
内陆产业城市	347
结语:富荣盐场与中国工业发展	349
参考文献	359
索引	380
译后记	403

## 中国历史上的自贡

本书记述的是中国最早的私人高资本、高生产能力工业企业——食盐制造企业的百年兴衰。这些企业清朝中期时出现在今天的四川省自贡市。这是一部商业史的著作，也是一部与外界互不关联的商人圈的社会史——他们调配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向我们呈现了帝国边缘地带的中国城市精英的形成。这些商人本身从事多种产业，但以生产食盐著称。19世纪时，食盐从卤水中提炼，而卤水则从当地群山中开凿的深井中汲取，然后通过笕送至盐灶，这些笕随地形上下起伏，像巨大的竹制过山车，最后，卤水在盐锅中煎烧，许多盐锅由当地开采的天然气供热。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鼎盛时期，组成自贡的两个镇——自流井和贡井——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横跨两镇的富荣盐场的盐产量占四川盐业生产的60%。它的工人，是最早的一批离开村镇来工厂做工的男人（因为这是只有男性参与的产业），这些人做工，不只是在一些年份或是农闲季节，而是从早到晚且终老一生。它的企业家们，不论大小，

xiv 是创建产业资本并发展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先驱。最成功之处在于建立了大规模的横向、纵向一体化企业，它们主导着四川南部的经济，也使得它们的股东们跻身中国最富有之人的行列。

我讨论自贡的食盐生产商，有两个目的：更好地理解建构中国内生型经济发展的制度，以及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更宏观的企业史框架内，重新解读中国商业史。凡是了解这些中国工业家的人都明白，他们的经历只有部分是后人可以体验的。他们的成功，部分是拜大自然恩赐的储量丰富的卤水和天然气，这些直到今天仍然构成了自贡工业发展的基础。然而，自贡商人筹集资本、发展和利用新技术、占据市场以及组建和维持合作商业组织的能力，表明他们对于极幸运的地质条件的依赖是很有限的。同任何地方的企业家一样，他们是在塑造了他们商业行为的文化资源和政治现实的综合体中奋斗，而在他们追求利润时，这一综合体也被他们所利用。

自贡人组建他们的商号时所利用的文化资源，在整个说中文的世界里，在建构产权和安排各种形式的合作实体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即便是外商在华扩张以及海外华人日益为中国的工业提供了新的模式之后，它们的地位依然重要。因为盐场的主要增长时期是在西方影响中国商业之前，所以自贡商人，为在纯粹内生的“大企业”脉络中考察中国制度提供了一个极难得的机会。自贡也使得我们可以跟踪内生商业组织随时间的变化，对于工业组织的种种力量、与区域和全国经济的互动，以及在一个不由西方和日本主导的城市环境中的商业精英的种种行动做出细致入微的评价。

商业从不是在政治真空中运作的。自贡百年繁荣的历史，横跨了中国近代史上三个重要的政治转型——早期的满族统治，镇压太平天国后帝国政治的重新调整，以及清王朝结束后的军阀和国民党的民国时期。对于中国统治者来说，长久以来食盐一直是收入的一个来源，但清初朝廷致力于王朝的统一，无力关注从边远的四川盐业最大限度地攫取收入。直到 19

世纪中叶,在盐业管理体制之下,富荣盐商的商业运作方式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与中国东部和北部的盐商相比,在市场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太平天国(1851—1864)期间,中国中部与东部沿海食盐出产地之间的贸易中断,富荣盐商的市场范围骤然且急速地扩张,这一形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可以说,四川食盐生产商大多数方面是在无外部限制的情况下运作的,即便是在1870年代末,官府对于食盐销售实施更强有力的控制,自贡盐业生产依然能从日益扩张、鼓励新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市场中获利。

在自贡富荣盐场的历史中,很难找到中国历史叙事中那种“封建”国家扼杀式的影响。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主张的,清朝经济的政策相对宽仁,既没有限制资本和工人的流动,也没有限制批发商和制造商的企业家活力。<sup>①</sup> 自贡投资者成功地将他们的产业从手工作坊转型为大规模的工业企业,这也证明了长久以来人们所坚持的信念是错误的,即社会结构、现代金融业的缺位,以及排斥商业的文化偏见阻挠了中国的产业投资和发展。正如提姆·赖特在研究19世纪末中国采煤业时所指出的,在中国凡有利润的地方就有投资。<sup>②</sup>

① 曾小萍:《清代中国经济的结构:鸦片战争150周年的思考》,载李侃如等编《对于近代中国的观察》,纽约州阿芒克:夏普出版社,1991年。

② 我希望有人解释,20世纪之前,为什么其他产业没有表现出利润至上,而是一直嵌身于农村经济之中。对于这一现象的大多数解释,都说受制于小农经济的节省开支。关于家庭手工业,尤其是纺织和茶叶,可参见保罗·加德拉《福建及中国的茶叶贸易,1757—1937》(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李明珠《中国的丝绸贸易》(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赵冈《中国棉纺生产的发展》,哈佛亚洲研究丛刊第74种(剑桥: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1977年)。伊懋可关注一些因素,包括——正如菲利普·理查森概括的——“低劳动成本与吸收低层次近代技术的结合”,“这有助于加强前近代经济制度的竞争力并巩固强大的领地”。菲利普·理查森《1800年前后至1950年中国经济的变迁:经济和社会史的新研究》(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11页,对于伊懋可《中国历史的模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一书评语。最近对这一问题新的讨论,尤其是其中农民经济所起的作用,是发生在黄宗智与彭慕兰之间的激烈争论。黄宗智视中国农村为农业内卷化的例证,而彭慕兰认为存在着一个不遵循英格兰模式的工业革命,因为中国得到能源资源和海外贸易的情况不同。见黄宗智《十八世纪英国和中国是发展还是内卷?:评彭慕兰〈大分岔〉》,载《亚洲研究杂志》第61卷第2期,2002年;彭慕兰《超越东西方二分法:重新确立十八世纪世界的发展道路》,载《亚洲研究杂志》第61卷第2期,2002年。

就经济而言,清政府在产业上的不作为,比它对产业的作为更值得注意。为了保持中央与地方各省的联系,清政府维持着一个密集的道路和河道网络,这有利于长途贸易。然而,在18世纪之前,这一网络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生产商,尤其是那些远离沿海贸易中心的地区生产商的需求。19世纪,已衰落的清政府继续着国内经济上自由放任的传统做法,未能及时承担起发展基础设施和推动产业进步的责任。

指责最后一个帝制政府在迎接西方和日本的挑战中缺乏远见卓识,这是很容易的事。然而,在重要的领域,它的表现要比继任者们好得多。富荣盐场的早期发展,发生在政治相对稳定的条件之下(除了太平天国那些年)。国家认可产权和契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家直到19、20世纪之交才颁行商业法的缺位。尽管食盐生产商激烈抨击19世纪中叶对食盐征收的厘金,但总体上,清朝的税制对于制造业和商业利润的征收相对来说是仁慈的。尽管四川的竞争对手不断提出要求,但国家并没有令四川食盐市场退至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地界。

*xvi* 清朝覆亡后的诸政府,并没有如此善待自贡商人。基础设施建设——本有助于自贡商人的产品多样化,并参与中国东部和东北部正在形成中的更为繁荣的贸易和制造业——并未实施。政治动荡不安,这对于他们进入已有的市场以及得到并不高昂的资本来说是个挑战。相互冲突的军阀为了收入,提高了实际的赋税负担,远远超过了过去清朝的加征。20世纪对于自贡商业的逼拶没有摧毁盐场,但确实驱逐了不重要的生产商,并且改变了幸存商人的生意方式。

## 自贡与企业史

自贡对于理解中国的工业史很重要,它对于世界范围内早期工业发展及组织的一般性考察来说,也同样具有价值。自贡商人所面临的问题和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将会被经济史家所熟悉。19世纪之前,世界上的



大多数商人、匠人都是在一个低固定成本经济内部运作的，诚如朗格卢瓦所指出的，“营利不依赖于有形资产的占有权，而在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及运用的能力”<sup>③</sup>。产品在小作坊中加工，由携带各种各样产品并穿梭往来于极其分散的市场间的商人售卖。在 19 世纪，西欧和美国的部分地区市场发展，这反过来使得大规模制造工艺的引入成为可能。在美国，产业的这种发展，导致了国内市场的扩张。另外，它也是海外贸易扩张的结果。无论原因是什么，市场规模的这一变化，使得向资本更集约的生产以及生产过程一体化转变成为可能。工厂生产的引进，意味着更高成本的机器以及更大规模的工资和原料的安排，这要求金融业务要有新的办法。

19 世纪初自贡引人注目的扩张，以及它在 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代初同样急速的衰落，首先是市场扩张及后来萎缩的产物。就此而言，正是国家管理盐业市场的地区分配政策，使得投资开凿深井技术成为可能，并刺激这些技术的改进，大幅度地提高卤水和天然气的供应。这一市场的膨胀，不是运输或其他有利于市场整合和信息流动的因素得以改进所造成的，这一点在后来变得很重要。然而，在 19 世纪初，自贡食盐生产商发现他们所面对的形势，与世界各地纺织、酿酒、矿山等制造商所面对的一样，都看到了不断扩张的市场所带来的机会以及利用规模经济的可能性。

xvii

这些新的工业企业如何筹措资金，这要视各地的情况而定。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若固定资本的支出很低，企业家就可以依靠个人的和联合起来的所有人集资，并保留利润以求产业的发展。商人借款也在提供短期和长期信贷方面发挥着作用。<sup>④</sup> 在银行起着重要的资本积累作用

<sup>③</sup> 理查德·朗格卢瓦：《消失不见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多变的动力》，357 页，载《产业与公司变迁》第 12 卷第 2 期，2003 年。

<sup>④</sup> 悉尼·波拉德：《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固定资本》，载《经济史杂志》第 24 卷第 3 期，1964 年；理查德·朗格卢瓦：《消失不见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多变的动力》；乔尔·莫基尔：《十九世纪上半叶低地国家的工业革命：比较研究》，载《经济史杂志》第 34 卷第 2 期，1974 年。377 页说：“十九世纪欧洲的资本市场极不完善，大多数的工业家无以从其他产业部门的储蓄中得到长期信贷。”波拉德指出，短期银行贷款在提供流动资本方面确实起着重要作用。

的事例中,最常见的,不是银行作为一个不近人情的出借人,而是作为一个或多个因亲属关系而结成的金融—产业网络的参与者。内奥米·拉莫罗斯已论证了银行作为“内部出借人”,对于新英格兰早期纺织制造商的重要性。在19世纪,由著名的新英格兰家族成员创建的银行,成为银行主管们及其亲属商业风险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与此同时,通过向普通大众公开银行股份的购买,这些金融—产业网络扩大了用于产业发展的金钱募集。<sup>⑤</sup>

在自贡,我们将会看到两种模式都在起作用。在四川,最富有的商人是那些控制着食盐批发市场者。因此,自贡一些最早凿办深井的人,吸收来自主导着食盐批发市场的陕西大商户的资金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企业家们利用其他已有的种种做法以取得前所未有的资本投资水平。第二章细致考察了利用亲属组织以及自贡当地股份市场的发展,将众多地方和区域的、未充分利用的家族资金联合起来。在新英格兰的事例中,银行在资金的联合中起着媒介作用,而在自贡,亲属关系网络直接充当了资金的募集者,同时,专门的中间人促成了不归亲属所有或管理的资金的联合。在这两种情况下,资金积累的基本形式,是以契约为基础的无限责任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在自贡的形成,在基本做法上,与由19世纪初西方工业家创建企业的股份公司相比,既类似也有不同。与后者一样,他们开始是签约的合伙关系,其中投资人以所贡献的资本基金比例,分享利润,承担损失。自贡个案中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股份的商品化,允许井、灶开发商进行股份交易以延长企业的寿命——超出了最初投资者的财务或生命的持续时间。购买和出售股份,也赋予了企业对于生产性投入的控制,这与直接购买生产性资产相比,更具灵活性。

---

<sup>⑤</sup> 内奥米·拉莫罗斯:《银行、亲属关系和经济发展:新英格兰的个案研究》,647、663页,载《经济史杂志》第46卷第3期,1986年。

在中国自贡等地，政府没有为商业组织制定游戏规则，这一点令人惊讶。自贡商人不得不在赋税和市场问题上与国家进行斗争，但他们享有一个无管制的环境，可以利用契约来打造他们的生意，并通过一套简单的自我约束规则来管理他们的行为，而这在法庭上是予以承认的。这里与新英格兰不同，在合伙制规模或资本化问题上没有限制，国家也不干涉劳资间的关系，股权完全通过契约进行管束。当出现规模经济以及合作机会时，自贡商人利用扩大了亲属集团自然拥有合并而来的资产，以组织生产单位，并确保它们在缔造者这一代人之后还能长久存在。

清朝时，国家对于管理经济没有什么兴趣，这被证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商业，包括自贡在内，任由其自我管理。尽管对于类似活动的描述，有着大量不同的术语，但中华文化的相对同质性和高度流动的商人和官僚阶层，似乎造成了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都有着相似的商业活动。另一方面，缺少解决商业活动争执的司法机关以及更好地为商业活动服务的法律文件，因此商业活动上升不到法律的层面，所有商人共同面对的种种问题也从未通过政府行动得以解决。结果，直到1904年，中国商业的运作，都是在没有有限责任的法律或通过破产法作为一种解决商业债务手段的情况下进行的。

高固定资本不是现代工业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唯一特点。在19世纪后半叶，许多生产商开始向下游发展，与营销一体化；而在一些事例中则向上游发展，与原材料供应一体化。学者们对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意见不一。威廉森赞同科斯的看法，认为这种一体化的发生是为了克服由不完全且常常是不对称信息所带来的交易成本。<sup>⑥</sup> 而由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所描述的美孚石油等场景，对自贡企业的演进提供了最有用的分

---

<sup>⑥</sup> 奥利佛·E. 威廉森：《比较经济组织：离散结构替代方案的分析》，载《管理科学季刊》第36卷，1991年6月。

xix 析框架。钱德勒强调新技术的发展,这反过来使高生产能力成为可能。<sup>⑦</sup>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在运输和制造业上的创新造就了新的商业环境。正如朗格卢瓦提醒我们的,事实上最早的是市场革命,“扫除了地理上的障碍并促成了国内市场的一体化”<sup>⑧</sup>。在美国等地,正是市场的膨胀,鼓励了在新技术上投资,因此可能实现前所未有的产量水平。当高生产能力的生产商寻求控制供应和营销,以求最好地利用他们的资金投资时,这就导致了一体化的形成。

在自贡,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不久,高产盐卤井的开发以及与此同时认识到了当地潜在的天然气储量,为川盐开辟了市场。拥有足够资金的投资者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典型的高生产能力生产商,他们拥有的市场潜力无限。当时没有储存天然气的技术,这刺激了人们将卤水源源不断地输往盐灶。企业首先将卤井、气井和煎盐的盐灶合并在一起。拥有卤水、但天然气不够用的企业利用市场,通过长期的合约及购买气井的股份,确保天然气的供应。一些企业通过投资土地饲养推卤的牛只,并通过发展网络,以确保得到关键性的投入物质,如竹、木和篾索,进一步拓展了它们的上游产业。最大的企业也拓展它们的下游产业,创设自己的营销部门,后来还投资建造卤笕,这二者都赋予了它们对于小生产的优势地位。因各方面条件具备,许多自贡的盐灶昼夜开工。

一体化要求管理上要有变化。不是所有企业都经历了钱德勒所认为的美国工业巨头能够成功的那种管理专业化,一体化企业内部处处要协调被纳入的不同功能,导致了企业内部各部门的专业化和组织上的层级制。一体化也造成了要引进管理人员队伍,这些人既不是股东也不是

---

⑦ 这些看法是钱德勒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提出的:阿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的管理革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77年),以及他与引野隆志合写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90年)。

⑧ 理查德·朗格卢瓦:《消失不见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多变的动力》,358页。

股东的亲属。<sup>⑨</sup> 在自贡,我们可以从以家族为基础的大企业所采用的层级管理结构,以及在非家族合伙关系(我们有零碎的材料)内管理实践的类似转型的种种表现中,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管理培训的专业化滞后于管理组织的发展。管理技能继续通过学徒(在一个人最终工作的企业则不一定需要)和在工作中获得,许多管理人员在一家企业内部不断晋级。然而,合伙协议和账簿表明,人们日益认识到了对于那些不是企业活动积极参与者的股东的管理的责任。

xix

尽管一体化解释了利用深井技术优势的第一代食盐生产商的成功,但自贡商人的故事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就这点而论,它可以回答 20 世纪末大的一体化工业企业衰落所引发的种种问题。由内奥米·R. 拉莫罗斯、丹尼尔·M. G. 拉夫、彼得·特曼所提供的企业批评理论在这方面是有用的。<sup>⑩</sup> 他们并不将工业一体化视为一种必然,而是开列了沿着从以市场为导向的合作到以层级为导向(也就是一体化的)合作的连续统一体中,各种组织形式各自的优势与弊端。这几位学者主张,这一连续统一体中某一企业结构的选择,要视因时而变的许多因素而定。他们认为,大的一体化企业并不再拥有曾经有过的高效。朗格卢瓦虽然依然坚持着钱德勒的基本框架,但他有着与上述类似的主张,认为一体化的结果之一,是发展了以后可以从事多种经营的能力,而这最终导致了 20 世纪末许多企业的分崩离析。<sup>⑪</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自贡盐场的历史,强调了企业多价理论(multivalent theory)的重要。如果我们假定所选择的企业组织,主要是建立在努力降低风险的基础上,那么一体化大型盐业联合企业为生产

<sup>⑨</sup> 英国的企业在提升经理人时,继续看重个人的联系,超过了对专业管理技能的重视,钱德勒对此予以批评。钱德勒、引野隆志:《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

<sup>⑩</sup> 内奥米·拉莫罗斯、丹尼尔·M. G. 拉夫、彼得·特曼:《超越市场和层级:迈向美国商业史的一个新综合》,404—432 页,载《美国历史评论》第 108 卷第 2 期,2003 年 4 月。

<sup>⑪</sup> 理查德·朗格卢瓦:《消失不见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多变的动力》,358—371 页。

商提供了缓冲,防止供应的突然中断,以妨碍全天、整月不间断的自贡燃气盐灶的生产计划。只要他们能生产,批发商就能够在北至湖广南到云贵、不断扩张的川盐销售地界中找到市场。即便提高了盐税、政府接管了营销,在 19 世纪结束之前也没有造成产业组织的结构性变化。

20 世纪初,应用溶解开采方法,开掘新近发现的盐岩储藏,这创造了新的规模经济,改变了卤与气的所有人之间的均势。随着卤水创记录的低价,低产卤井纷纷关张,上游供应产业的重要性下降。同时,盐场引入蒸汽机车,允许新的投资者——这些盐井开发领域的后来者们,挺进该产业,因为他们控制资本,熟悉机械工程,并与汉口和上海的机车制造商有联系。

xxi 对商业组织影响最大的,可能是 20 世纪不断变动的政治环境。清朝覆亡及继之而起的一系列不稳定的军事政权,增添了在其间运作的自贡盐业的不确定性。盐业管理变动频繁,更是雪上加霜。到 1920 年代,军阀间夺争盐业收入造成了自贡盐业法定市场的急速萎缩,而盐税却迅猛增加。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自贡盐业企业的瓦解,造成了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并凸显了商业行为中网络的日益重要。

## 资料

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必须面对定量分析的数据(既涉及整体经济,也涉及各部门经济和企业)不足所带来的困境。对于自贡而言,材料能保存下来,主要是因为这座城市作为税收的一个来源地,对于国家特别重要。我们所使用的关于商业和贸易整体表现、产量、税收以及生产成本的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由政府组织编纂的出版物——盐法志、盐政史、有关盐政的文章汇编和地方志(省与地方)。除此之外,我们很幸运,有数种私人对于盐场的调查,包括 19、20 世纪之交以及 1928 年

分别进行调查而形成的大部头著述。<sup>⑫</sup> 1990年代,地方发起的编纂地方志的工作涵盖了自贡城市史尤其是20世纪的各个方面,这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诸如企业的创建、钱庄的设立,以及自贡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sup>⑬</sup>

尽管研究的一些论点是定量分析得出的,但是那些有助于展现这一商业共同体内部的制度、交往和实践活动画卷的材料则更为重要。我很幸运能在自贡市档案馆进行研究,这里收藏了大量川南盐务和自贡市商会的档案。后者包括自贡商人反对政府以及商人相互间数以百计的诉讼案件卷宗。该档案馆还有少量的食盐企业账簿和令人兴奋的1949年之前的盐业企业文件。档案中有大量的契约等协议,许多都已编入《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一书,<sup>⑭</sup>这些对于理解富荣盐场如何聚集资本、合伙关系如何组成以及商业组织如何随时间发生改变,尤其重要。本研究在引用收录在上述书中的自贡市档案馆材料时,用的是该书所给出的每份契约的编号。另外还有中国学者关于各专题所收集的材料。<sup>⑮</sup> 我在自贡市档案馆找到许多其他的材料,引用的是它们的档案目录号。

xxii

若没有第三类材料,本书也是无法完成的,这一类材料在中国史学家的著述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因为这类材料存在着特别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特别提出。自1950年代起,自贡,如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极力收

⑫ 李榕:《自流井记》,见《十三峰书屋全集》,卷1,龙安书院,1892年;樵甫:《自流井(第一集)》,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张树植:《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调查》,载萧铮编《民国二十年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38年。

⑬ 其中许多列入“自贡市地方志丛书”已经出版。

⑭ 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编辑者为该选辑所写的“引论”对于了解自贡盐商圈的专用词汇极有帮助。

⑮ 对本研究极重要的是:自贡市档案馆《自贡盐业诉讼档案专题选编(一)自流井王三畏堂与渝沙债团债务纠纷案》,载《盐业史研究》,1993年1—2期;彭泽益编《自贡市志——商会志资料长编》,自贡:自贡市工商业联合会,1989年;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303

集那些亲历重要事件或活动的人的口述(有时是书面)回忆录。就自贡而言,建设成工业中心被认为是这类值得做的一个题目,即便是共产党解散了它的企业,将人员并入国营部门。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记录下了数以百计的回忆录,其中许多刊登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自贡文史资料选辑》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这一口述史工作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中止,在1980年代重新开始,直到现在。我很幸运,从自贡市盐业博物馆和地方志办公室的同仁那里,得到了数份未删节的原稿抄件,已发表的口述史中有几篇就是以这些原件为基础的。我在使用它们及许多已出版(经过编辑)的稿件时很谨慎。

这类材料需小心使用,正如同所有我们用以建构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画卷的材料一样。因为这些回忆录的主题主要是以前的盐商(包括一些是革命前的最后一批最有权势的人),我们应该知道,在新的环境下,他们会感到压抑,渴望着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无辜。也很显然的是,这些回忆录作者中的一些人也有一己私念。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他们的生意会成功和失败,哪些政府参与者对于该产业起着推动或阻碍作用,在特别的冲突和争论中谁有理。对于每种情况,我尽量避免接受作者的主观结论,同时从他的故事中抽绎出起作用的制度性结构的线索,他和其他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他们做出的选择。我有机会将口述史中包含的信息与契约、官方出版物、非官方的调查、法律案件卷宗以及商会文件进行核查比对,这使得我利用它们时满怀信心,当然仍然小心翼翼。

## 致谢

多年来本研究受益于许多中国同仁的友谊、意见和睿智建议。冉光荣(四川大学)、鲁子健(四川社会科学院)和高王凌(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对于我研究计划最初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吴天颖(北京经济学院)



帮助安排了我访问自贡市档案馆,在那里陪同我,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让我分享他对盐业技术和术语的见解。冉光荣、高王凌和吴天颖在访问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期间,与我和我的同事进行了学术交流。

在自贡,自贡市档案馆和自贡市盐业博物馆的研究及工作人员,慷慨赋予了我他们的时间和学识,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不是这几行文字所能表达的。我要特别感谢宋良曦,在我离开自贡后一直与我保持通信联系,这么多年来确保我能收到自贡各历史研究单位的出版物。我也特别感谢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那里找到了清代四川的粮价数据。

中国之外的朋友和同仁也对此研究贡献很多。Hans Ulrich Vogel 送给我剑桥史科技部分的早期文稿的复印件,还有《自贡文史资料选辑》早期版本的复印件。我也感谢 Emily Luo、Li Chen、Khee Heong Koh 所提供的研究上的帮助,感谢 Janice Duffin、Elizabeth Lacouture 和 Jason Petruilis,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Anne McCoy 和 Irene Pavitt 在编辑方面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在绘制本书中地图时,与 Douglas Miller 和 Christian Brest 一起工作十分愉快。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 Anne Routon 是我这部著作的编辑,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是无价的。Jon Ocko、David Weiman、Robert Gardella、Elizabeth Köll、Tim Brook、Brett Sheehan 和 Georgia Mickey 阅读了本书的各稿,帮助我梳理了本书的观点,并迫使我了解一个极复杂产业的有时是深奥难解的细节。我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史研讨班(Seminar on Economic History)成员睿智的建言。我感谢以上每一位为本书付出的辛苦,希望这本书不负大家所望。

家人对于我的学术事业有着特殊的作用,他们的亲切言语催我奋进,他们生活幸福就是为我铺平道路。首先感谢我的父母,Murry 和 Rita,虽不在一起生活,但他们永远与我相伴。所有辛勤劳作的单身母亲们都该被赋予一个可爱、相伴有益且有成就感的孩子——如同我的儿子

xxiv

Iain 那样。我开始撰写此书时,他还是一个咿呀学语、不知疲倦、初学走路的孩子,而当我将这本书献给他时,他已是有着无限美好未来的青年人。Joey,我的继子,我感谢他的甜美,他总是逗得我开怀大笑。最后,我感谢我的丈夫 David Weiman——一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真正的朋友。他是我极具眼光且严厉的批评者,是我的最长久和心仪的支持者,能与这样一位学者和高尚的人结合是一种莫大的恩典。

在四川南部的自贡市，也就是富荣盐场的所在地，人们常常说起王朗云的故事，他是富裕的食盐生产商，抵制清廷（1644—1912）向川盐征税、控制川盐销售市场。一种说法是，作为该地区最有实力的商人之一，王朗云和一位地位相当的颜姓同伴，设法挫败了1863年向盐卤生产商和食盐煎烧商征收厘金的计划。<sup>①</sup>王朗云和颜氏的雇工们冲向一个新建的税收点，在深夜将它拆除。与此同时，颜氏急忙赶往省城去说服省里的官员，也可能是摆脱自己与此有干系的嫌疑。该故事有一引人的曲折情节：这些雇工中有一人酩酊大醉，在事发现场睡着了，这人身边有一根扁担，上面刻有颜姓盐灶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进行破坏的雇工们就会逃之夭夭。颜氏在成都极尽所能劝说官员的时候，王朗云被抓，但很快获释。根据有些说法，尽管王朗云对地方官员们不敬，但知县并不愿意关押他，因为他在太平天国时期捐助了大量金钱并在防卫地方

---

<sup>①</sup> 厘金是对过境货物征收的一种赋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不久在华中地区开始征收，以资助地方和各省军事开支。这一新的加征本要扩大征收范围，将商业和制造业包括在内，这在1863年争论得尤其激烈，当时对于太平天国及有关起义的镇压正接近尾声。

上起过领导作用。<sup>②</sup>

2 这一故事中,作为抗议对象的赋税从未征收过,这里所说的赋税及对它的反抗只是传奇素材而已。但是,自贡商人精英英勇行为的种种传说自有它的价值。对于王朗云故事的另一种解读是,它反映的是晚清盐业税收真实、剧烈的变动。1877年清廷打算建立一套盐业特许和官方运输即官运商销的制度,限制清初以来相对自由的川盐市场。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楨的设想是,官运商销的改革,将四川所产全部食盐的一半以上卖给官府承运人,然后他们再将食盐卖给得到许可的销售商,这些人被准许购买川盐地界内的食盐。<sup>③</sup>

对于像王朗云这样的商人,这一改革意味着,他们将损失整个生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批发,还有就是在运输食盐时不能逃税。对于大的生产商来说,运输他们的自产食盐既可以打上自己的品牌,还可以培植与地方商贩的关系,控制零售市场。在上面所讲的故事中,据说,王朗云先行游说反对这些改革,最后才采取了暴力反抗。该故事还有一个生动曲折的说法,在下令众人打劫他家乡自流井官运局的同时,王朗云飞速前往成都。他日夜兼程,每十里就一换轿夫,<sup>④</sup>两天两夜走了六天的路程,造成了事发当天他不在现场的假象。王朗云一开始就成功地转移了调查人员对于自己的注意,他向南逃到了贵州。四年后,在向朝廷输纳重金后,王朗云才返回四川,重新过上了国家最富有商人的生活。<sup>⑤</sup>

这些莽撞的四川盐商的故事,可以在很多层面上予以解读。这首先

---

② 1989年我在自贡期间,多次听人讲起这一故事。这里有用的版本是由王三畏堂的高层管理人员罗筱元所记,见《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71—173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③ 实行官运商销的原因及意义的详细探讨见第七章。

④ 一里相当于约1/3英里。

⑤ 王朗云故事的这一版本源于罗筱元记述以及王朗云的曾孙王余杞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见曼因(笔名)《自流井》(成都,1944年),18—19页。

是一个发生在以商业传统著称的地方的故事，这一商业传统使得一个中等的制盐市镇发展成为中国一个了不起的、拥有人口和财富的非行政中心。王朗云和颜氏利用财富、狡黠以及政治影响逃脱了罪责，问心无愧，之后又以同样的手段恢复了名誉。然而，他们求诸暴力，这说明他们对国家模棱两可的感情，说明了他们通过合法手段以影响国家行动的能力是有限的。颜、王所雇进行抢劫的人员既是工人也是私人跟帮，这就提出了精英权力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还有工人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英勇行为——如果它们发生的话，是在中国最重要的近代早期制造业城镇之一的命运转折点上发生的。从清初到 1870 年代晚期，政治和地理的因素，共同给王朗云和他的富荣同乡们提供了一个对于企业家创业来说相对自由、免于国家严格管制的舞台。自贡地处偏远，经济事务少受官僚的干预，商人们能够利用中国东部省份的动荡不安。然而，在这一抢劫事件发生之时，国家日益强化了对于四川盐业的干预，这一情况将改变这些精英的原本状态和他们的财富基础。当中国政府的财政压力日益增大时，自贡的盐业变成了国家取得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本书结束之际，我们会看到，对于国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没有带来国家加大对于自贡基础设施的投入，自贡居民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没有增加。到了 1930 年代，地处偏远是自贡最大的不利条件，也是它的产业急速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3

我们在本章中，将考察晚清之前四川盐商生存的环境，这与别处盐商有着根本的不同，是自贡在早期工业企业比较研究中成为一个重要个案的原因所在。接着我们将转向在这一相对自由的市场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当营销机会增多时，自贡商人开拓创新，常常进行风险投资，并利用丰富的商业的和亲属关系的传统习惯，去挖掘尚待开发的资源并组建合作商业组织。这一制度建设的过程将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题。

## 川盐与帝制晚期国家

帝制晚期中国政府的历史是政府对于私营经济管制日益衰弱的历史。<sup>⑥</sup> 中国历朝历代对于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这反映在中国的税收体系上,因为它基本上依赖对土地进行课税。国家对商业模式干预意义非凡的一个特例,是征收盐课。对于食盐的需求无处不在,它可以作防腐剂、疗病药物和食物添加剂,很早就是交易品,很容易成为课税对象。<sup>⑦</sup> 在中国,汉朝(公元前 206—公元 220)时食盐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极为密切,正如阿谢德所主张的,这种关系确立了政府在经济中的应有作用,而公元前 81 年的盐铁之议(后成书《盐铁论》)所讨论的国家是否对于食盐进行专营,成为判别中国官场中通才与专家见识的最有名的表述。<sup>⑧</sup> 尽管这一争论是由盐政机构提出的,但盐税在中国的经世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sup>⑨</sup>

4 川盐,在帝国的早期对于政权收入贡献很小,更不必说自贡出产的食盐。考古材料显示,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四川有着天然咸水泉。到了秦朝(公元前 897—公元前 221),在今天的四川境内有三个产盐县,到

⑥ 更为完整地探讨帝制晚期中国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见曾小萍《清代中国经济的结构:鸦片战争 150 周年的思考》,载李侃如等编《对于近代中国的观察》(纽约州阿芒克:夏普出版社,1991 年)。

⑦ 两部著作探究了食盐在整个历史中的作用:阿谢德《盐和文明》(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2 年)和马克·科兰斯基《盐:一部世界史》(纽约:沃克出版社,2002 年)。

⑧ 阿谢德:《盐和文明》,44 页。

⑨ 傅汉思指出,元末 80% 的国家税收来自食盐。傅汉思:《中国伟大的井》,载《科学美国人》,1993 年 6 月。食盐税收的重要性在后来的王朝中锐降,这归因于国家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尤其是耕地课税能力的提高。据王业键的研究,1753 年盐课占全部税收的 11.9%。这一数字在 1908 年升至 15.4%,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收征田赋的能力的下降。见《清朝的田赋(1750—1911 年)》(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 年),80 页。当然,所有这些数字都没有考虑地方和各省官员向食盐运商和生产商的法外征收。关于盐课作为地方收入的一个来源,见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 世纪的中国合理化财政改革》(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62—65、119、142—146、154、198、201、204—208、218—219 页。

了隋(605—618)唐(618—907)时期这一数字增至数十个。四川盐井的生产技术一直很原始,属于劳动密集型,唐政权满足于仅仅向自己所掌握的私人盐井进行固定税收的征税。<sup>⑩</sup>直到宋朝(960—1279),随着新生产技术的出现以及盐政改革,川盐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11世纪,新的凿井技术促成了四川盐井的高产和稳产。卓筒井深达400英尺,可以出产更多的咸卤。<sup>⑪</sup>与此同时,宋朝建立了一套政府负责的分配体系,这一体系——有着各种变化,到帝制时代结束,一直是中国盐业管理的主要形式。这一盐引制度,由三部分组成。国家继续拥有一些自己的食盐制造设施,但这一体系的基础却是私人生产。中国主要的产盐区被划分为一些食盐管理的区域,即所谓的“引地”。1900年,这些引地(及它们主要的覆盖地区)包括:河东(山西和河南西部)、奉天、长芦(河北和河南东部)、山东、淮北(安徽和江苏北部)、两淮(湖南大部、湖北和江西北部)、两浙(浙江和江苏南部)、福建、两广(广西、广东、江西南部部分地区、湖南和云南东部)以及四川、云南和西北(甘肃和新疆)。<sup>⑫</sup>每一引地的食盐只能在一定的销售地界即“引岸”出售。官府的稽核点缉拿走私,走私就是售卖未缴税的食盐和在指定引岸以外地区进行销售的食盐。<sup>⑬</sup>然而,盐业管理从未统一。在产盐区之间,甚至是一个盐区之内,盐政机构也各不相同,我们将看到以自贡为中心的川盐生产也是如此。

尽管实行了盐引制度,但在四川,在明朝(1368—1644)之前的许多

⑩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⑪ 傅汉思:《中国伟大的井》,119页。

⑫ 阿谢德:《中国盐政的现代化:1900—1920》(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11页。在帝制晚期的中国,这些引地鲜有变动。

⑬ 阿谢德已指出,政府投入相当多人力、物力防止走私,但基本上是食盐成本与品质间的均衡维持了对于每个引地的食盐垄断。国家通过不同的税收以改变这种平衡的努力通常是徒劳的。

5 时期,政府是通过占有盐井和控制食盐的运输和销售获利的。<sup>⑭</sup> 明朝时川盐管理依然支离破碎,从西部边境以盐易马,到人们所熟知的开中法,做法多样。开中法,首先要求愿意卖盐的商人,运送米谷到边远的军台。在那里,他们得到盐引,凭此可以在指定的盐场买盐,并在指定引岸卖盐。国家主要目的是以最小的代价供应军事边地。<sup>⑮</sup> 尽管维持着家长式管理原则,但由于增加了食盐成本,开中法损害了消费者,同时又在食盐销售中加入了不必要、累赘的交易,也损害了商人。受日益商业化经济影响,明朝统治者最终被迫在 17 世纪初放弃了开中法。

在整个明朝盐课中,四川不算重要。明中期,十二个盐区中四川占第七位,四川整个盐税还不到整个帝国平均水平的一半。<sup>⑯</sup> 造成四川盐业收入所占比例很低的一个原因是,对分散在全省各处、数以百计的小盐井进行管理十分困难。<sup>⑰</sup> 清朝(1644—1912)初期人口和食盐产量锐减,进一步使四川盐业地位边缘化。在 1620 年代反明起义到 1660 年代满族政权巩固期间,据信多达一半的四川人口逃散或死于饥荒、疾病和战争。<sup>⑱</sup> 重现和平之前,相当多的盐井遭到破坏或废弃。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期间,四川再遭破坏。富顺知县钱少隆在视察富荣盐场后,于 1680 年代写道:

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盖五月

<sup>⑭</sup>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3 页。

<sup>⑮</sup> 阿谢德:《盐和文明》,74 页;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9—25 页。

<sup>⑯</sup> 弘治年间(1488—1506)的全部食盐收入,将盐引和盐票换算为斤,达 500 780 395 斤。其中,四川的份额只有 20 666 850 斤。此时最繁荣的产盐区是江苏的两淮,每年的盐额为 141 030 500 斤。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 28,盐课;引自唐仁粤等编《中国盐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48—649 页。

<sup>⑰</sup> 冉光荣和张学君估计,明末四川的实际盐产量是各产盐地区向国家供应食盐定额的 10 倍。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0 页。

<sup>⑱</sup> 鄢华阳:《四川与清朝的移民政策》,载《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4 期,1980 年。



余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sup>①⑨</sup>

清初，四川采取多种措施以恢复经济，并逐步重建长效的各种征税形式。恢复到以前人口和地亩水平的措施，包括奖励拓荒，对个人移民和土地垦殖者予以津贴，新登记造册的土地，六至十年后方才升科。<sup>②⑩</sup>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鼓励恢复盐业生产，对盐场的盐井、煎锅或盐灶适度征收赋税。<sup>③⑪</sup>但是，四川和陕西并没有重建盐业销售的盐引制度，而是允许资本充裕的商人购买盐票，持票人每张可以购买并运销 40 斤食盐。<sup>④⑫</sup>小商贩只要携带食盐不超过 40 斤，就无需持票或是上税。<sup>⑤⑬</sup>1667 年有人请求恢复引盐制度，户部的答复则是提醒上疏之人，盐课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创收。户部以犍为——这是明朝四川产量最高的盐场之一——为例，指出，多年来只有小商贩在销售食盐。一些人向他人借用所需资金，而一些人则进行集资。但他们每个人才运载数百斤，走陆路以避免租船和支付船工的支出。户部担心，若实行引盐制度，不仅难以找到有能力售卖大宗引盐的商人，而且也会对票盐销售带来负面影响。上疏之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认识到盐税征收需因时因地制宜，既要利于商业也要满足百姓的需求。<sup>⑥⑭</sup>

1686 年，北京户部开始要四川重新发放盐引，允许商人比过去运输更多的食盐。水引，每引 50 包。陆引，人挑或畜驮，每引仅 4 包。<sup>⑦⑮</sup>然

<sup>①⑨</sup>《富顺县志》，卷 3，1777 年版，光绪朝重印本。

<sup>②⑩</sup>鄢华阳：《四川与清朝的移民政策》；曾小萍：《清雍正朝垦荒和隐地的政府政策》（未刊稿，1986 年）。

<sup>③⑪</sup>鲁学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泉》，56 页，载《盐业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彭泽益：《清代四川井盐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27—28 页，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02—103 页。

<sup>④⑫</sup>1 斤等于 16 两，约合 1.3 磅。

<sup>⑤⑬</sup>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16，引票 1，颁行，页 2b—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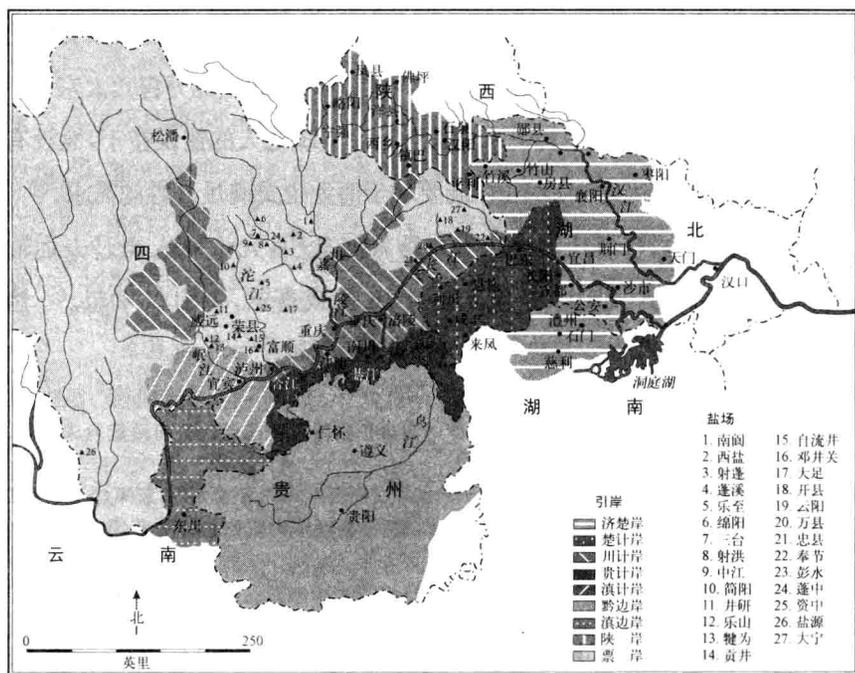
<sup>⑥⑭</sup>同上书，页 3b—4a。也见张德地《四川盐课疏》，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 50，户政·盐课下，70 页，1826 年版，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 年重印本。

<sup>⑦⑮</sup>一包的重量各时期不等。一包盐基准重 100 斤。在食盐运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有损失，还有外包装和捆扎草绳的重量，因此时常外加额度不等的食盐。如此一来，一张盐引允许商人运输 5 000 斤以上，远多于早期的盐票。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03 页。

而,在清初,国家并没有限制川盐的销售引岸。直到雍正朝(1722—1735)中期,四川盐业有了很大的恢复,为国家进一步控制盐业、增加税收提供了条件。1729年,四川总督黄廷桂和巡抚宪德向雍正皇帝上奏一方方案,要重新制定盐引制度,以适应当时四川的情况。划分了消费四川各指定盐场食盐的销售地界——“岸”。每岸食盐销售数量是由当地人口多少决定的,因此,这一做法叫“计口授盐”。从理论上讲,这一新的盐税管理办法,在利于保证食盐生产商和消费者利益的这种国家的家长式管理的同时,也利于国家财政。

划分了四个可以购买川盐的主要的岸(见地图1)。本省计岸:四川引盐所供应的四川各县;票岸:通过陆路由持票小贩出售川盐所供应的四川各县;湖北济岸:通过长江由持引商人出售川盐所供应的湖北各县;

7



地图1 川盐行销区域图(约1919年)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正文前地图。

边岸：四川引盐供应的云南和贵州各县。<sup>②6</sup> 时代不同，每一类的州县会有变化，但引岸的大致范围到清朝结束一直保持不变。每一个盐场负责生产定量的引盐，超额部分可以卖给持有盐票、不上税的小贩。每一种情况下，商人和小贩都可以继续直接到盐场购盐。政府在沿途的水路和陆路建立稽核点，防止走私。在每个稽核点，要检查盐包，要求商人出示他们的盐引或盐票，证明他们已合法取得食盐并正在运往指定市场。食盐的生产完全掌握在私人手里，市场决定盐场及最终销售地的食盐价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川盐的市场和税收管理日益复杂。最初没有专门的盐政机构，四川的盐务委任给四川督粮道。在雍正初，按察使负责盐、茶及驿站，但不久，就被解除了这些职任，而是任命了驿盐道。<sup>②7</sup> 1778年，盐茶道及其属员取而代之，处理茶、盐事务。<sup>②8</sup> 此外，拥有盐场的每个府州县都派有低级官员负责盐务。大的盐场设有县丞和巡检，作为政府盐政管理的调解人。然而，阻止走私和不停地估算、调整食盐供需，这对于事事过问、人数有限且已是职责繁重的地方官僚来说，实在难堪重负。<sup>②9</sup>

对于负责监管四川盐税的政府官员来说，18世纪出现了巨大的挑战。四川在清初生灵涂炭，而当和平重现时，它成了国内人口迁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由于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长，1713—1813年间人口增长

8

<sup>②6</sup> 阿谢德：《中国盐政的现代化：1900—1920》，21页。边岸作为官府营销的组成部分，特别重要。贵州自身不产盐，被认为是依靠一个委托市场，以鼓励商人历经漫长艰辛的跋涉，向它供应食盐。

<sup>②7</sup>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5辑，雍正五年八月十九日，陕西总督岳钟琪。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年。

<sup>②8</sup> 鲁子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泉》，57页。

<sup>②9</sup> 早在1729年，四川布政使高维新就指出，各府官员监督不力导致私盐泛滥。尽管每一个售盐地区都有引额，但没有人系统地追查四川山区深处数以百计的小井生产。《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5辑，雍正八年三月初七日，四川布政使高维新，823页。

了约四倍。<sup>⑩</sup> 改土归流的实施,势必要求行政管理的变化,也包括了盐课的一体化。技术上的巨大改进以及数个产盐区的产量显著增长,动摇了过去食盐生产商之间通过最初“计口授盐”定额建立起来的市场分配方法。

四川盐业管理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要弄清楚 18 世纪急速变化的盐业生产。引额——从一个盐场运载固定数目食盐并在指定引岸销售的盐引数目——在整个雍正朝和乾隆朝定期修订,不断上升。<sup>⑪</sup> 当然,《四川盐法志》显示,为满足上述引额的生产也同样稳步增长,尤其是在四川南部的富荣和犍为盐场。<sup>⑫</sup> 如同已垦殖的田亩情形一样,要隐匿所增加的盐产量,这样做是为了生产商的利益——他们可以逃税,也是为了当地官员的利益——他们可以不必扩大征收的额税。一眼井可能是昙花一现,因此出于双方利益的考虑,经若干年后,该井才入册上税。

官员也不将增产的食盐入册,为的是增加他们自己辖区内可支配的赋税收入。在雍正朝,富荣一位知县想了个办法,通过向未登记入册的新盐井发行他自己的售盐执照,以增加他所在县的收入。巡抚宪德发觉了这一做法,该知县被纠劾。实际上,此前宪德本人也已设计了一种地方盐票,将新井的产量纳入该省的税收。这些特别的盐道引票所征赋税高于法定的盐引,因此鲜有愿意认领者,也就无足为奇了。最后,没有商人认领这些盐道引票,未登记入册的出产食盐继续售卖,不向国家缴纳

---

<sup>⑩</sup> 施坚雅认为 1713 年四川人口约 4.5 百万,1813 年约 1.77 千万。施坚雅:《十九世纪四川的人口:对残缺不全资料的解读》,载《帝制晚期中国》,第 7 卷第 2 期,1986 年。我们将看到,许多移民在四川迅速发展的盐业中找到了工作。的确,保罗·史密斯认为盐业生产是四川盆地转变成为该省人口中心的最重要因素。保罗·史密斯:《长江上游的商业、农业和核心区的形成:公元 2—1948 年》(980—1980 年中国经济史上的时空趋势与周期研讨会论文,意大利贝拉蕉,1984 年),60 页。

<sup>⑪</sup> 《四川盐法志》记载,在雍正乾隆两朝的 73 年间,四川增加的水引超过 25 000 张,陆引超过 116 000 张。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17,引票 2,页 22b—27。

<sup>⑫</sup> 同上书,卷 19,引票 4,页 1a—4b。

盐课。<sup>③③</sup>

引额数不断改变,甚至是在实施“计口授盐”的初期,这是盐课不能有效地调剂供应与需求的又一个确切的标志。新盐税制度实施仅四年后,四川巡抚宪德就抱怨,一些州县得不到足够的食盐而其他一些盐场却完成不了引额,因为商人拒绝购买它们的食盐。<sup>③④</sup> 低效率的盐场,位置偏远,产量低下,或是生产成本高昂,在食盐销售上很难与高效的盐场竞争,它们请求将自己的引额转给别的盐场,这种做法叫做“改配”。<sup>③⑤</sup> 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富荣和犍为盐场从盐井不再产盐的四川北部许多盐场接手了整个引额。<sup>③⑥</sup> 犍为,在18世纪后期经历了更为长足的发展,已接手的在边岸售盐的小规模盐场的引额数,达2000多张水引。<sup>③⑦</sup>

与此同时,边远山区食盐州县常常发现,商人并不购买足够的引盐供应当地人。地方官关注他们境内的百姓被迫“淡食”问题,向政府请求允许他们的州县购买不缴盐课的食盐。国家本应通过向这些州县出售盐引所获得的税收,那时被摊入当地的地丁钱粮之中,由较富有的居民缴纳。这些得到许可消费食盐的州县——食盐的税收是以上述方法征收的——称为“归丁”州县,在1850年有31个。供给这些州县食盐的商人不用缴纳这一赋税,可以自由地在公开的市场上购盐,大概是让他们购买由更有效率的盐场所生产的低成本的富余食盐。<sup>③⑧</sup>

归丁和盐引的改配实际上承认了,国家的盐税体系不能够保证所有的食盐生产商享有同一个市场,或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够享受到国家许可

<sup>③③</sup> 鲁子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泉》,59—60页。

<sup>③④</sup> 驿盐道试图将一个地方的引额转归其相邻地方,但有关的公文混乱不堪,难以把握。《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1辑,雍正十一年八月初二日,881—884页。

<sup>③⑤</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8,引票3,页1a—1b。

<sup>③⑥</sup> 鲁子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泉》,50页;严如煜:《论川盐》,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50,户政·盐课下。

<sup>③⑦</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7,引票2,页1a—17a。

<sup>③⑧</sup>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11—113页,引《清盐法志》。到清末,另有37个归丁的州县。

10 的食盐。然而，食盐走私是政府未能在微观层面处理好食盐供需的最生动的证据。要弄清官府盐政控制之外的精确盐量是不可能的。然而，四川人口数是以前的五倍，而陆路引额，也就在四川省内出售的引盐部分，仅增长了约 170%，<sup>③</sup>这一事实显示出市场上未纳税的盐量相当可观。民国初年四川盐业概述性著作《川盐纪要》关于走私的部分，开头就说：“盐之有私，犹苗之有莠，粟之有秕。”<sup>④</sup>

走私无可避免，但又必须要根除。然而四川官员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超过了其他盐区。《川盐纪要》成书于 20 世纪初，其编纂者，仿效先辈，大声呼吁缉私，特别指出在四川打击私盐处处受阻：盐业生产地点星罗棋布，市场广大——从云南、贵州的边地到湖北、湖南的山区，盐业运输的水陆交通工具多样，而国家要查清这一切又困难重重。然而，问题还不止此。食盐从生产商到消费者这一过程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逃避官府稽查人员的可能，而人们也处心积虑地利用所有这些机会：食盐煎烧者多生产几斤盐而不上报；包盐的工人们每引偷偷地多加几斤；船工们每引多带几包；穷苦人总是从盐场多带些盐或向他们的同伙购买些私盐，以少缴些赋税。<sup>⑤</sup>

的确，从官方报告可以看出，在整个清初，官府从微观层面管理盐业市场，对不断变动的产量进行估算和分配，以满足急速变化的需要，但这种种努力造成了混乱，刺激了腐败以及对于盐政规章制度的规避。简而言之，尽管负责川盐的官员和吏役人数有所增加，但是国家对于食盐，生产多少，出售多少，以及售卖至哪些市场从未完全掌控。有人可能会提出，尽管国家努力使税收最大化并保护效率低下的生产商，但市场的力量还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在这种官府管理却又无章法可言的市

<sup>③</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17，引票 2，页 21a—29b。

<sup>④</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年），410 页。为凸显这最后一点，林振翰使用了中国过度分散的地方官僚都熟悉的老生常谈之语——“耳目难周”。

<sup>⑤</sup> 同上书，410—11 页。

场环境中,富顺和荣县的盐场完成了技术进步,并成功地占有了整个西南以及华中的部分食盐市场。

## 富荣盐场的地理位置

11

今天的自贡,是富顺县盐场(即自流井)和荣县盐场(即贡井)的所在地,是一座建立在食盐之上的城市。这是“自贡”字面上的解释。自贡坐落在曾是一个远古广阔内陆海的边缘。气候的变化和四川盆地的抬升,导致了内陆海逐渐缩小,留下了大量的卤水和盐岩等含盐物质,以及天然气。根据中国地理学家的研究,自贡地下的含盐物质极为丰富,依目前的技术水平,还可以再采 2 000 年。<sup>④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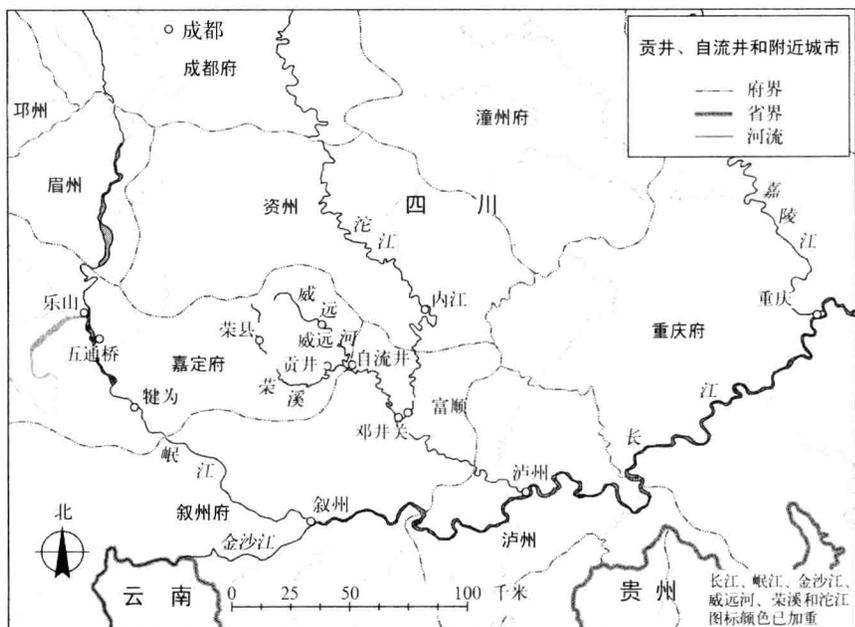
这一地区最早见诸记载的盐业生产,可以追溯到 6 世纪,四川其他地方盐业生产有的早在公元前 3 世纪就已开始。<sup>④③</sup>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这一地区有着不同的名字并隶属于许多地方管辖。然而,似乎直到元朝(1271—1368)初年,今天的自流井和贡井盐场才被视作一个产盐区,由荣县的前辈们管辖着。元朝时,自流井成为富顺县的一部分,尽管自流井与贡井两个盐场仅相距十里。清初,这两个盐场被一并管理,隶属富顺县。1730 年,它们再次分别划归富顺县和荣县(见地图 2)。<sup>④④</sup>这一划分持续了将近 200 年,长期保持这样的状态,至少部分是因为清政府希望此地政治与经济领域间保持分裂状态,以消解经济精英的政治力量。<sup>④⑤</sup>在清朝,尽管两个盐场分属两地,但两个盐场人员和经济活动日益跨越分界线。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两个盐场建立的首个商会是一个统

④②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17页。

④③ 吴天颖:《因利聚人,因人成邑:从盐都自流井看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及其特点》(未刊稿), 306 3页。

④④ 林振翰:《川盐纪要》,202页。

④⑤ 关于清廷划分政治边界,以切断跨边界的经济圈,见林振翰《川盐纪要》,274—345页。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



地图 2 贡井、自流井和附近城市

制图: Douglas Smith.

一的组织,其名字取自两个盐场名称的首个汉字,这是两个盐场精英们有着共同目标的表现。清朝覆亡后,当地精英成立了地方政府,再次使用了自贡这一名称。尽管这一商人自治努力很快被镇压,但建立一个统一的自贡市的想法一直沿续下来,两地最终在 1939 年合并,正式成立了自贡市。

12 在帝制晚期,盐业造就了中国的许多巨富。数世纪以来,经济心脏地带的最重要商人凭借出售引盐的特权大发其财。然而,尽管他们的历史对于理解帝制晚期的商人文化至关重要,但他们毕竟植根于一个经济力量源自世袭特权和政治关系的社会。盐引政治同中国沿海地区地势平坦、海水丰富的地理条件一样,构成了清初绝大多数盐商成功的基础。自贡商人的成功有着全然不同的环境。首先,地处帝国西部偏远、多山地区,地理位置就是一个障碍。更为重要的,自贡商人开始是制造商,只



是后来才从运输和批发营销他们自有的品牌产品中获利。

直到 18 世纪中叶,不论是生产川盐还是销售川盐的商人,都不是特别富有。17 世纪后期实施的盐引制度不是明朝盐税管理的延续。随着引盐销售制度的建立,重新招募四川当地人,购买盐引并营销食盐。这些当地人,有坐商、本商、引商等不同的名字,一般来自中等殷实家庭。大部分四川人是明清易代战争的孑遗,许多人购买很少的引盐,或是与别人一起购买,即所谓的“朋领”。这些新的四川引商,其中一些,或缺乏商业精明或缺乏资本,将他们的盐引出赁于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来自陕西的富裕商人,这些人被当地人称为“行商”,与本地商人不同,意指从事贸易的商人。<sup>④⑥</sup>

13

清朝初年,四川盐引制度并没有提供多少轻易发财的机会。四川官员抱怨,因无力预测供应以及盐场多变的盐价,从而促使了盐引承租人营销食盐时追求最大利益。由此导致的高昂食盐消费价格,是迫使一些州县请求将它们的食盐供应网络免除盐课的又一原因。<sup>④⑦</sup> 对于在四川北部经营的商人来说,这里山路艰险且少有可通航的水道,运输成本成为长途贸易的一个主要障碍。卤水和燃料日益减少,也降低了射洪和蓬溪等北部盐场的重要性。<sup>④⑧</sup> 大多数至 19 世纪仍存在的北部盐场,仅仅供给它们所在的州县而已。<sup>④⑨</sup> 南部的盐场有着水路运输的先天优势,因此多数水引引盐交易始于此并不为奇。依靠南部的生产商以供应四川省内以及外销定额,这一转变是自贡商人精英兴起的一个原因。然而运输费用,甚至是对于日益发展的南部盐场来说,依然是一项主要的支出。四川的盐引课税低于中国东部盐区,这是为了补偿这一高昂的运输成本。<sup>⑤⑩</sup>

<sup>④⑥</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22,征榷 3,页 7a。

<sup>④⑦</sup> 同上书,页 7ab。

<sup>④⑧</sup> 傅汉思:《中国伟大的井》,120 页。

<sup>④⑨</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17,引票 2,页 1a—17a。

<sup>⑤⑩</sup> 姜道章:《清代的盐业历史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夏威夷大学,1975 年),64 页。

釜溪河(也叫盐井河),是一条浅而弯曲的水道,只有小船可以通行,将食盐从自贡运往邓井关。在邓井关,食盐改装大船,驶向泸州——四川南部的盐政中心。食盐从泸州向南运往云南和贵州,或是换装更大的船只运往重庆。抵重庆后,食盐顺长江而下,到达湖南和湖北的西部边界州县。<sup>①</sup> 运输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釜溪河枯水季节可以徒步蹚涉,而在汛期时常泛滥成灾。为保持货物长年稳定通行,修建了堤堰以提升水位,有专门的堤堰维护机构,经费来源是堤堰使用费。“馱”是标准的食盐船运单位,一馱盐平均重75—78吨,在20世纪时要少些。每馱盐不得不在自流井分装五艘船,到泸州后,再重装上三艘船,到了重庆还要再卸装,每一行程都要雇用装包人员、苦力、船只和船工,费时费钱。<sup>②</sup> 从外面输入供应盐场、盐业工人、做工用的牲口以及辅助产业的物资,由骡或肩扛的人夫经由陆路,或是通过注入沱江的浅窄河道运入,运输成本也很高。<sup>③</sup>

清政府极少干预四川盐业市场,同时也几乎不予扶持。自贡远离政治中心,在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上无法吸引很多。事实上直到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接连自流井和贡井、自流井和泸州的道路,才由土路升级为由泥结碎石、上铺煤渣的马路。<sup>④</sup> 市场的扩大刺激了自贡产业进步,但交通运输的突破性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并没有发挥作用。

## 清初富荣盐场的盐业生产技术

四川盐业生产技术及赋税制度,都不同于中国其他盐区。中国食盐生产依来源分为六种:海盐、池盐、膏盐、土盐、井盐和岩盐。只有四川、云南和甘肃有井盐,并且只有四川和云南生产岩盐,这是19世纪末的一

<sup>①</sup>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113页。

<sup>②</sup> 姜道章:《清代盐业的历史地理研究》,22页。

<sup>③</sup> 同上书,7页。

<sup>④</sup>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志编纂委员会:《自流井区志》(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207页。

项革新,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清初,17世纪战争结束后盐场生产得以恢复,后来深井凿办技术有了提高,保持盐井生产年限的技术有了发展,富荣盐场的生产因此快速增长。凿办深井提高了所汲卤水的咸度和开采量。此外,一种重要的副产品——天然气的产量提高,卤水煎盐的燃料成本因而锐降。正是通过投资凿办深井,自流井和贡井的富荣盐场能够在19世纪利用呈现在它们面前的市场机遇。

## 凿井

盐业生产的第一步是凿井。关于那些本能地知道在哪里凿井的企业家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与讲述美国西部成功的石油人的神话没有什么不同。颜昌英——富有的商人世家颜桂馨堂的缔造者之一,他的财运就基于他能够找到好的井址。据颜昌英的墓志记述,他最初与盐业没有关系。他住在城里,但周边乡村众多的盐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留意哪些盐井打到了卤水而哪些没有,决定和兄弟一起在山上凿井,碰碰运气。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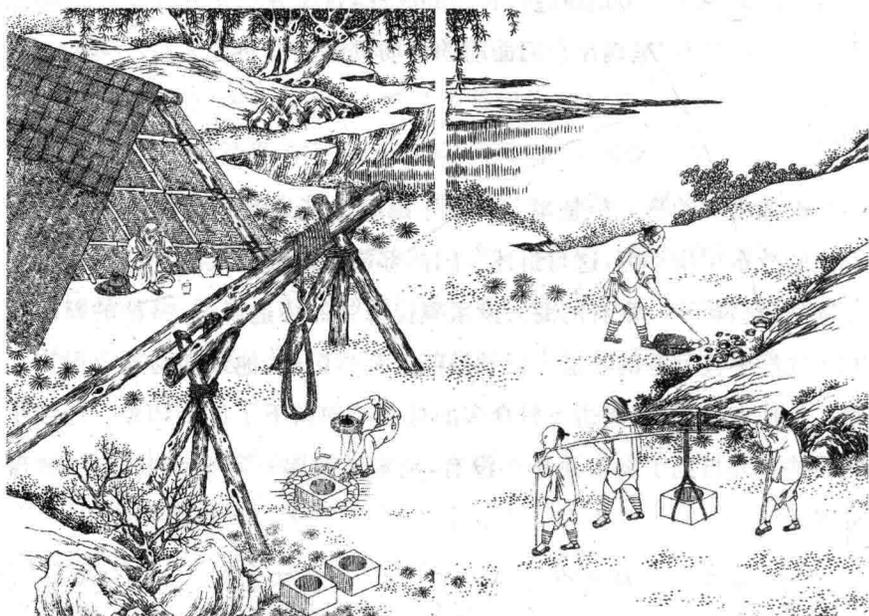
弟兄二人就选择一处极不显眼、人们不取的地方正式铤永兴井。铤了几年,井深200余丈不见功,又遇硬岩(后来地质学上称为嘉陵江石灰岩)很难进尺。人皆劝其放弃,他们笑而不言,因为心中有数,有此硬岩必有浓卤旺火,于是加重铤头,突破硬岩,咸泉骤涌。<sup>⑤</sup>

毫不奇怪,一眼井的成功往往引发在附近土地上凿井,结果,自流井和贡井的某些地区渐以它们集中了特定类型和深度的盐井而为人所知。

一旦选中并得到井址,被称为山匠的技术工人——他们常常也帮助拣选井址,就承担了捣凿盐井的任务。清初盐井开口很小,平均直径仅

<sup>⑤</sup> 宋良曦:《试论清代四川盐商的发轫》,36—37页,载《井盐史通讯》,1984年第1期。

有3英寸。<sup>56</sup> 在凿井之前,要采取措施稳固松土并防止淡水渗流至井中。在破土后,“斲石为臼,穴其底,积臼以相衔,深可十丈。再下,合木为柱,刳其中,积柱以相衔,深可三十丈”<sup>57</sup>。16世纪卓筒井之外的这一新方法是帮助清朝开凿更深盐井的一个因素。(见图片1.1)



图片 1.1 捣凿井口

资料来源:丁宝桢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2,井厂2,页5b—6a。

完成钻眼后,树立一平台,上设杠杆。用一根与杠杆相连的绳索系住铁铤,悬至井眼上方。十多人轮流上下脚踏杠杆,沉重的铁铤随之下落,打穿下面的岩石。有一个工人负责系铤的绳索,保证钻头落下时所

<sup>56</sup> 对于研究中国的史家来说,度量衡是个麻烦问题。本研究中的所有英尺和英寸都由中国的度量衡单位转换为美制单位。赖明钦认为,富荣盐场使用的度量衡,即便从地方的标准来看,也不统一。赖明钦估计,富荣盐场的尺要比富荣县市场的长2—3英寸,约相当于现在的1.2英尺。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sup>57</sup> 李榕:《自流井记》,230页,ISIS第39卷,1948年。英译者所依据的《自流井记》版本是1890年板刻的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东亚图书馆藏有原刻本。在编写盐业技术这部分时,我参考了中英文两种版本。

打凿的洞既圆又直。<sup>⑤⑧</sup>

凿井是劳动密集型工作,有可能花费许多年才能完成。李榕于 19 世纪末记载,依据土壤与岩石的不同,一支队伍所凿每日多则一英尺,少则仅一英寸。<sup>⑤⑨</sup> 依这样的速度,汲卤的盐井要花费五到十年才能够出产足够多的卤水,人们才开始汲取。达到了这一条件,当地称之为“见功”。见功后要祭祀土地神,为他建一个神祠。自贡老盐井工人介绍说,如果该井真的很高产,还要给土地神娶房太太,甚至几个妾室。<sup>⑥⑩</sup> 16

只出产卤水还不是真正成功的标志。见功,最好理解为捣凿盐井已打到了卤水。井深与卤水咸度直接相关,因此那些打到卤水的井要钻得更深。从 2000—2300 英尺深处汲取的卤水称为黄卤,平均咸度依重量计算达 13%,低于此的被认为没有开采价值。1830 年代,贡井生产商开始在将近 3000 英尺的地方钻探出黑卤,平均咸度 18%。<sup>⑥⑪</sup> 我们将在第八章探讨 19 世纪末盐岩的发现以及溶解开采技术。

黑卤井得以广泛发展,有赖于数项凿井技术的改进。除了锉的力量和多样性的改进,以及在井口处使用石圈外,有技艺的凿井匠人娴熟地将松、柏圆木剥开,挖空后,再合而束之,在井的上部进行加衬。为了将锉提升到足够的高度,捣凿更深的井就需要建一个碓房,里面是一套转轮等传动设备,这样,锉一旦撞击井内的岩石就可以马上被提起。<sup>⑥⑫</sup> 在深井且极窄的开口内作业,凿井的工人和手艺人也开发了独创的打捞碎石或失落工具以及修补损坏的井圈的系列工具。 17

与黄卤井相比,黑卤井可以出产咸度更高、产量更高的卤水,生产效

⑤⑧ 李榕:《自流井记》,230 页;傅汉思:《中国伟大的井》,119 页。

⑤⑨ 李榕:《自流井记》,230 页。

⑥⑩ 1989 年 5 月我与退休盐井工人的谈话。

⑥⑪ 姜道章:《清代盐业的历史地理研究》,109 页。自贡盐业研究的著名专家陈然,将锉办黑卤井的起始时间定在 1835 年。陈然:《自流井的崛起及其发展》,141 页,载《盐业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⑥⑫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55 页。

率极大提高。1930年代的统计显示,在黑卤资源最为丰富的贡井,黑卤井的平均产量,最低产者每月800—900担,<sup>③</sup>而最产者每月达10000担。而咸度较低的黄卤,平均月生产800—6000担。<sup>④</sup>一些黑卤井,比如双福井,见功时一天生产就高达1000担。

## 汲卤

就最简单的形式而言,汲卤过程是通过一系列转轮,控制一支卤筒在井中升降。用从四川东部输入的特别的竹子,制成这些汲卤的竹筒。通常是数节竹子连接起来形成竹筒,在它的底端拴了一个单向的皮制阀门。当卤筒置入井中,阀门被卤水的压力推开,卤水就充满了卤筒。汲卤工人们操纵系在卤筒上的绳索,晃动卤筒使它保持垂直方向,加速汲卤进程。当卤水充满卤筒,它被提升出井,卤水向下压制着阀门,防止卤水泄露。然后,卤筒被置于一个大桶之上,一个工人利用另一根竹竿顶端的钩子打开阀门,这样卤水就流入桶中。<sup>⑤</sup>

井场的大多数传动装置就是为了汲井之用。提升卤水所用的卤筒被系在一根用竹篾所做的绳索即篾索之上,吊在一个竹制的名叫“天车”的塔架之上。天车的高度视井深而定,随着盐井不断加深,可以高达60英尺,日益成为富荣盐场许多地方的天际标志物。篾索穿过天车顶端的一个称为“天滚子”的轮子,接着穿过地面上称为“地滚子”的第二个轮子。通过地面上的一个滚筒的引导,篾索系在被为“地车”的轮子上。<sup>⑥</sup>当地车转动时——通常由一排水牛推动,篾索通过这一传动系统,从井中提升卤筒。一旦卤筒中的卤水倒空,松开篾索的制动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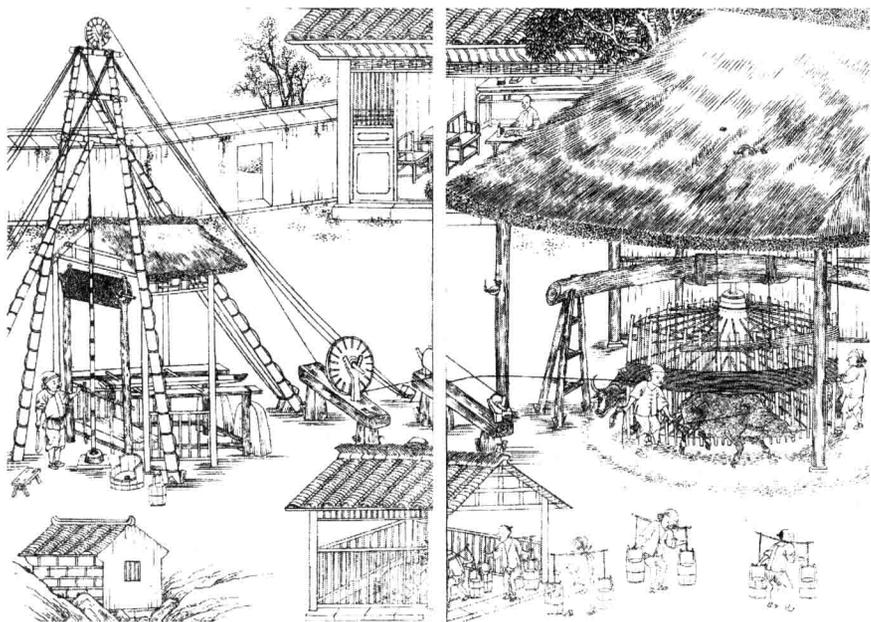
307 ③ 一担等于100斤,约合133磅。

④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年),卷2,篇2,章4,节1,页50b。

⑤ 傅汉思:《中国伟大的井》,120页;华莱士·克劳福德:《自流井的盐业》,226页,载《中国科学和艺术学刊》第4卷,1926年。

⑥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43页。

置,卤筒就再一次落入井中(见图片 1.2)。1920 年代科学家华莱士·克劳福德参观过自流井,据他记载,升降卤筒的整个过程能在 25 分钟内完成。<sup>⑤7</sup>



图片 1.2 汲卤图

资料来源: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2,井厂 2,页 20b—21a。

改进汲卤程序,是为了适应更深的富荣黑卤井和更高的生产率。其中许多是为了增加汲卤装置的拉力。增加轮子的周长,使用水牛取代人力推动地车成为通行的做法。有的深井需要两排水牛轮流推汲。与此同时,天车架得更高,卤筒的容量增加,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以增强盐井设备能力。<sup>⑤8</sup>

<sup>⑤7</sup> 克劳福德:《自流井的盐业》,227 页。

<sup>⑤8</sup> 对于这些改进的简述,可见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61—64 页。

## 气井

19 天然气离开了带来利益的实用开发技术,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尽管四川有地下天然气自古就为人所知,但因缺少输送手段,它们的价值依然被封存在地表下面。一些材料显示,从宋代开始,煎盐就利用了天然气。然而直到 19 世纪之前,天然气煎盐技术并没有对盐业生产、营销或是投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sup>⑥9</sup>《富荣县志》记载,在 18 世纪中叶,该县有 11 眼气井。<sup>⑦0</sup>当地称天然气为草皮火,显示出这是令人讨厌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燃料资源。

19 世纪之前,富荣大多数卤水是用木柴、木炭或荣县和邻近威远县的煤炭煎烧。<sup>⑦1</sup>同样是这些资源,提供了大多数做饭和取热的燃料。将近 3 000 英尺的岩层断裂处不仅出产黑卤水,而且还有超乎想象的大量天然气储藏,尤其是在自流井下面的石灰岩层。<sup>⑦2</sup>随着煎烧的卤水量剧增,以及将卤水运至气井这一技术含量较低的问题的解决,井户和灶户突然取得了过去只能是梦想的高效率。

气井或只出产天然气或同时出产气和卤水。不论哪种情况,第一步是要分离出天然气,然后引至煎锅:

火井之发也,覆以木盆,其盆高一丈、径一丈、围三丈,上锐而下丰以束其气。盆上环置竹柶,引其气以达于盐灶。盆中央仍开一孔,径三寸,环以石圈,附以土围,结为井口,井有水,筒取之如

---

<sup>⑥9</sup> 林元雄、宋良曦、钟长永:《中国井盐科技史》(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385—388页。

<sup>⑦0</sup> 《富顺县志》,卷2,山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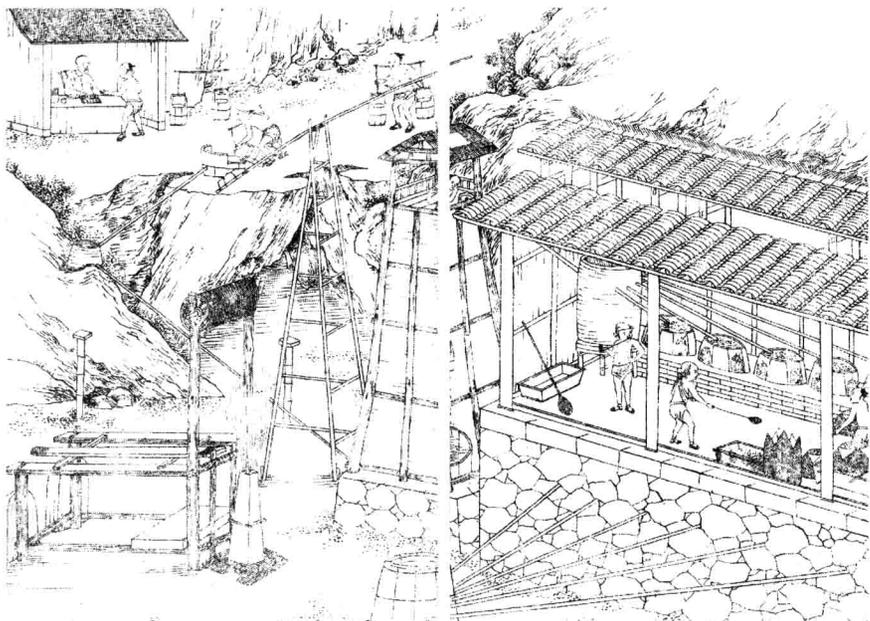
<sup>⑦1</sup> 乾隆《威远县志》记载,威远煤矿业的发展大部分归因于明代自流井盐场的第一次扩张。引自陈然《自流井的崛起及其发展》,138页。

<sup>⑦2</sup> 李榕记载,19世纪最高产的海顺井,同时可烧700口锅。李榕:《自流井记》,载《十三峰书屋全集》(龙安书院,1892年)卷1,页3b。



故也。<sup>⑦</sup>

一旦井被盖上,天然气被点燃,就要到它燃尽为止。(见图片 1.3)



图片 1.3 气井和井火灶

注意:在图的下部中间位置,气井开口被一个木桶盖上,从中有六根管道通向煎盐灶房及成排的盐锅。

资料来源: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2,井厂 2,页 39b—40a。

气井的天然气产量不一,每眼井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效率也不相同。最早的计算天然气产量的方法,是将井中天然气用管道引至一个或多个灶,测算它能烧开的煎锅数目。当时记录天然气是用多少“火圈”,计量单位是“口”。在交易中,盐场的契约要写明口数。20 世纪初,人们通过显示一口火圈能够出产多少食盐,来进一步精确测算方法。<sup>⑧</sup>

20

<sup>⑦</sup> 李榕:《自流井记》,231—232 页。

<sup>⑧</sup> 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151—153 页。

置有盐锅并用管道将天然气引入的建筑,称为“灶”。灶与天车、地车等全套设备,还有办公用房即“柜房”一起,构成了井场完整的运行设施,称为“廊厂”。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更高产的井的构成更为复杂,它不仅生产卤水或卤水和气,而且也常常将它们的部分产量租给通过合伙关系所建造的盐灶,而这些盐灶也可能拥有其他盐井的产量份额。盐灶不论大小,基本运行方式相同。如克劳福德所指出的,甚至是在1920年代,富荣食盐生产商还没有设法抽取天然气至灶,而是利用了这一轻于空气的燃气要上升的特性。灶建在出产气井的上方,灶内有锅,每个都比前面的一个位置高,分列两排,每一排都有天然气的输入管道。<sup>⑦</sup>

21 天然气煎烧盐锅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火每天不间断燃烧。气火灶的产品,是纯净的白色结晶物质即花盐。制造花盐要求煎烧人员有相当的专门技术,这些人员是盐场劳动力中的精英。煎烧人员的一项技能,是能够在提炼过程中视时采取相应的步骤。在煎烧之初的某个时刻,要稍减火势,估计煎烧状况。若稍加一点卤水,就溶解了早先结晶的食盐颗粒的话,那就要继续煎烧。这一煎烧和添卤的过程重复多次,直至颗粒不再溶解。此时,将浸泡并压榨黄豆所形成的豆汁加入卤水中,对卤水进行澄清。经过煎烧,卤水中的杂质开始升至表面,人们用勺舀出。重复进行多次后,卤水才算相对干净。要将两勺豆渣撇掉,注意不能除去太多,以防盐粒过细。接着煎烧,直到全部变成盐。这些颗粒状产物起的是结晶过程中催化剂的作用。添加豆汁,继续煎烧,除去其中的杂质。一旦弄干净后,将火调至微火状态,最后盐就像细小的雪花片,开始出现在表面。当大锅中的卤水很稠且很干净时,舀入另外的催化剂,锅内的混和物开始结出颗粒状的盐,花盐因此而得名。一口锅可以生产100斤(约133.3磅)或更多的盐。如果烧锅的气火力很旺,可以每

---

<sup>⑦</sup> 克劳福德:《自流井的盐业》,284页。

昼夜煮两锅。若火力弱,那就要用两三个昼夜出产一锅盐。<sup>⑦</sup>

煤煎盐远比气煎盐低效,出产盐的品种也不一样,供应不同的市场。煤煎的盐即巴盐,如此命名是因为这种盐像大米过度蒸煮后所留下的锅巴。它的纯度远不及花盐,因为盐在封闭的屋内煎烧,当它凝结时,煤烟与盐混在了一起,没有记载说要要进行上述花盐提纯的过程。最终的成品,不是捆成包的颗粒状食盐,而是如克劳福德所描述的,是一大块饼,因掺杂着“煤灰、脏东西和碎渣”而呈现为黑色。<sup>⑧</sup> 大多数花盐在四川境内和湖广销售,而巴盐在四川南部等边岸地区尤其受欢迎,那里食盐奇缺,一家购买一块盐饼,用绳拴住,将它在汤中蘸蘸以增添味道。<sup>⑨</sup>

## 富荣盐场的崛起

直到 18 世纪中叶,作为四川南部两个盐场所在的自流井和贡井,同其他数个盐场,一起供应它们所在的人口稀疏的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以及 22 云南、贵州、湖北的小部分市场。在总产量上,它们不及北部的射洪、蓬溪以及乐山、井研等盐场,也远远落后于南部的竞争对手犍为。<sup>⑩</sup>

到 19 世纪中叶,数种因素改变了自流井和贡井食盐生产商的生产条件。四川人口不断增加,边岸扩展,其他盐场尤其是四川北部盐场的盐井日见枯竭,这些刺激了富顺和荣县盐井的开凿。不仅 18 世纪四川人口增长了四倍,而且本来出产一些食盐的云南,也遇到了满足本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困难。清初,靠近四川的云南两个府——昭通和镇雄,被划归为“食川盐”。1738 年之前,又有数个云南地区设定了川盐的额数,包括东川以及边境县份南宁、沾益和平彝。犍为、富荣盐场供应云南

<sup>⑦</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222—223 页。

<sup>⑧</sup> 克劳福德:《自流井的盐业》,284 页。

<sup>⑨</sup> 李榕:《自流井记》,234 页。

<sup>⑩</sup> 王守基:《盐法议略》(北京:1877 年),卷下。

边岸几乎所有的食盐。<sup>⑩</sup> 贵州自身不产盐,明朝时基本依赖中国东部的淮盐,<sup>⑪</sup>到清中期,几乎完全由四川供给。开始时,因为高昂的运输成本,贵州消费者买不起川盐。然而,贵州更靠近富顺和荣县,可以利用现存的和修复的水路运输通道,这使得它转向富(顺)荣(县),将其作为新的食盐供应来源地。<sup>⑫</sup> 同时,允许一个盐场接管另一个盐场市场的改配做法,对富荣来说大有裨益。到 1870 年代,富荣负责 1 300 多张水引,约合 650 万斤盐,而这些最初属于三台、射洪、蓬溪、中江、盐亭、犍为和兴文县。

请求富荣运送新的食盐的贵州官员谈到了富荣正在开凿的新井。<sup>⑬</sup> 富荣官方的统计数字,1720 年代有 298 眼井、755 口锅,后升至 19 世纪末的 405 眼井、1 055 口锅。<sup>⑭</sup> 然而,这些数字对于衡量产业的扩张没有多大意义。私人契约和其他非官方的材料显示,在这 150 年间,盐井有的多次转手,产量低下或是资源枯竭的盐井遭弃置,而新的盐井正在开凿。而且,我们已指出,与清初记载的盐井相比,从 19 世纪初开始,新井的开凿更深、更高产。尽管犍为在总产量上继续是富荣的对手,且有着更多的盐井,但在 19 世纪末,自流井和贡井每眼井的产量则是犍为的近两倍。<sup>⑮</sup> 盐产量应比官方数字所揭示的还要高,因为后者不包括所有进

<sup>⑩</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9,转运 4,页 2a—2b。尽管我们不知道 18 世纪四川各盐场的云南引额,但 1870 年代以前,犍为供应 4 381 张水引和 83 张陆引。荣县引额是 2 086 张水引,富顺是 3 986 张水引。另外,富顺接手了内江和资州的 222 张水引和 56 张陆引。这还不包括走私进入云南的不知数目的川盐,最晚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私盐就成为了云南官员的一个难题,见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9,转运 4,页 6b。

<sup>⑪</sup> 同上书,卷 10,转运 5,页 1b。

<sup>⑫</sup> 同上书,卷 10,转运 5,页 20b、38b—39a。

<sup>⑬</sup> 同上书,卷 10,转运 5,页 39a。

<sup>⑭</sup> 同上书,卷 5,井厂 5,页 1a—18b。

<sup>⑮</sup> 《四川盐法志》记载,犍为在 1880 年代的引额数,水引 11 858 张,陆引 51 608 张。换算成斤,犍为每年至少生产食盐 79 933 200 斤。据记载,犍为有盐井 1 195 眼,经折算,每眼井平均年产盐 66 889 斤。这一时期富荣每眼井年产食盐 118 642 斤,见《四川盐法志》,卷 17,引票 2,配引表,以及卷 5,井厂 5,沿革下,页 1a—18b。

入湖广的私盐或在盐引制度之外上税的食盐。<sup>⑤</sup>

此外,在凿办深井的过程中,富荣的生产商不仅碰到了更多的黑卤,而且因自流井丰富的天然气储藏的发现,该盐场也摆脱了煤炭进口依赖,并在富荣两盐场之间创设了一种共生的关系:贡井供应黑卤,而自流井在它的井火灶上煎盐。这一联合产生了效率,自流井和贡井的巴盐主导云南和贵州盐业市场的同时,富荣口味极佳的花盐也渗透进了四川其他产盐县所控制的市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切断了中国东部和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这些以前基本供应的是淮盐——的贸易路线,富荣生产商适时而进,占领了这一市场。

可以说,技术和政治共同为富荣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潜在的巨大利润是富荣企业家积极投资的原因。然而,投资者,尤其在盐井发展的初期,是在一种有限的家庭财富——相对于萌芽状态的盐业要求而言——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富荣最初兴盛的历史,是组织也是技术创新的历史,旨在降低风险、合并资源、保护资产、抓住市场机遇并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这也是在中国帝制晚期的政治和法制环境中进行商业制度建设的商业史。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自贡商人的成败利钝,我们可以了解许多近代早期中国的经济史,以及它在近代早期商业共同体比较史中的应有位置。

---

<sup>⑤</sup> 我们将要看到,由于对在湖广出售的川盐征收厘金,部分造就了这一市场,这可上溯至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这种食盐大多来自富荣。

多种新技术促成了高产黑卤井的凿办,自流井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的发现,以及太平天国初期川盐销售突然向湖广地区扩张,这些同时发生,构成了富荣井盐业迅速起飞的背景。盐产量,以整个四川课税的引盐计算,从1850年的约1.12亿磅升至光绪(1875—1908)后期的近3.90亿磅。<sup>①</sup>若加上私盐和通过盐票所售之盐,1890年代整个四川盐产量差不多是上述数字的两倍。<sup>②</sup>与此同时,19世纪初西南地区的盐业资本和市场占有份额集中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即便是调整、均衡盐课影响也无法阻止。到19世纪末,四川食盐总产量的一半以上都出自富顺和荣县的自流井和贡井这对姊妹盐场。<sup>③</sup>

自流井和贡井的商人们是如何取得产量和市场占有份额快速扩张的呢?凿办深井的潜在回报很高,但需要高投入且伴随着相当大的风

---

①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1882年),卷11,转运6,页1a—34b;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36页,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数据计算。

② 谢立山估算的整个产量,包括私盐和票盐,达5.6亿斤,合近7.3亿磅。见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上海:别发洋行,1922年),181—182页。

③ 同上书。谢立山的各县盐产量数字来自四川官方。富荣和荣县产量加起来占全省产量的58%。

险。19世纪中叶,通常一眼深井的成本高达10 000两白银;许多井的成本更是这一数字的数倍。<sup>④</sup>与传统的事业不同,凿办深井不会立刻带来回报。李榕的记载以及数十份凿井契约证实:一眼井见功。“常程可四、五年,或十余年。有数十年更数姓而见功者。”<sup>⑤</sup>投下巨资,耗时有年,但盐井在深达3 000英尺的地方未能出产足够多的卤水而遭放弃的事例并不鲜见。数百万两的白银打了水漂,留下的是一眼眼空空的狭窄深洞而已,甚至是成功的盐井也要遭受诸如渗漏、坍塌以及下落工具和杂物碎片堵塞等险情。

四川几乎没有家庭拥有独立打井的资财。<sup>\*</sup>清初,四川还很贫困,只能依赖寄寓的商人以及移民输入专门技术和资本——这是历经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劫后余生的当地人“失去”的东西。<sup>⑥</sup>在恢复时期——对于四川而言,这至少延续到乾隆(1736—1795)中期,可以说四川只有两种人拥有雄厚的财力:从新兴的港口重庆进行外运的粮食商人,以及在政府盐业垄断的束缚之下做生意的食盐批发商。<sup>⑦</sup>在盐业市场,来自陕西的商人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经常购买或租佃最初给予当地四川人的盐引,而后者在清初缺乏财力或从事长途贸易的经验。<sup>⑧</sup>

1736年,处于兴盛时期的陕西商人共同在自流井建成了一座西秦会

④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2,井厂2,井盐图说,页19b。

⑤ 李榕:《自流井记》,230页,ISIS第23卷,1948年。

\* 读者要知道,在中国财产归属家庭,而不是个人。1929年之前的法定条件一直如此。这是许多中国人的作法,20世纪的很长时期内还是如此。这里我们提及的个人投资者,除特别说明外,是指个体家庭。这种法制环境对于投资可能的影响在第八章和第九章讨论。(此注释为正文脚注,无编号。——译者)

⑥ 这一时期四川遭各厮杀军队蹂躏破坏的概述,见詹姆士·B.帕森《中国农民起义的一个高峰: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载《亚洲研究杂志》第16卷,1957年;以及鄢华阳《四川与清朝的移民政策》,载《清史问题》第4卷第4期,1980年。

⑦ 见第一章。

⑧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9,引票4,页12a;严如煜:《论川盐》,载贺长龄编《皇清经世文编》(1826年版,台北:国风出版社),卷50,户政·盐课下,页73。西秦会馆一通18世纪中叶的石碑记载,陕西商人使用10 000艘船向云南和贵州运卖食盐。

馆,费银达1万余两,<sup>⑨</sup>到19世纪初,陕西批发商号是自流井商业中心的主要供应者之一。<sup>⑩</sup>山西、广东、江西和福建商人很快加入到陕西商人在四川的长途贸易的行列,但似乎未能跻身盐业市场。他们中间,只有山西商人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但这也是19世纪他们进入票号业时的事了。尽管外省资本在富荣盐场的发展中起了一些作用,但大多数长途贩运商人的利润回到或再投资于商业。至少到19世纪初,这些利润还不是富荣盐业生产性投资的来源。<sup>⑪</sup>

26 如果大量的私人财富不是自贡资本积累的来源,那么借贷机构扮演着什么角色呢?银行金融的长期缺位,常常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sup>⑫</sup>然而,对于近代早期欧洲和美国的学术研究表明,在欧洲和美国极少有早期的工业家依靠银行获得他们的创办固定资本。事实上,即便是银行业比中国发达的地区,银行也常常要求企业家承担固定资本投资的风险,它们提供的是短期营运资本贷款。<sup>⑬</sup>自贡的金融部门遵循的是这一人们熟悉的模式。

⑨ 见自贡西秦会馆乾隆十七年(1752)碑。

⑩ 宋良曦:《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13—22页,载《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⑪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陕西资本对于自贡深卤井的开发起着关键作用。但罗成基强烈反对早期陕西商人对于盐业生产的投资,指出在19世纪自贡发现天然气之前,食盐销售的获利远远超过生产的利润,这限制了外来者投资风险大的凿井业。罗成基也引述1752年西秦会馆碑刻,其中没有提到盐业中生产的一面。极为重要的是,他对现存的契约进行考察,认为自贡第一份陕西商人参与的与盐井有关的契约是在1839年。我们将会看到,可以找到数个更早的投资史料,但没有早于1827年的。见罗成基《陕商在自贡盐厂的起落》,载彭泽益、王仁远、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编《自贡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⑫ 现代银行业的缺位,在费维恺撰写所写《剑桥中国史》的晚清部分一开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费维恺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费维恺、崔瑞德、费正清:《剑桥中国史,1800—1911》(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14页。

⑬ 兰斯·戴维斯:《新英格兰纺织厂和资本市场:1840—1860年工业借款研究》,载《经济史杂志》第20卷第1期,1960年;L. S. 普雷斯内尔:《工业革命中的农村银行业》(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6年);内奥米·拉莫罗斯:《信息问题和银行短期商业贷款的专门化: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载彼得·特明编《商业企业内部:信息利用的历史考察》,经济研究全国委员会研讨会报告(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161—195页。



18世纪之前,在四川有一些当铺和钱庄这样的贷款机构。私人放债者和当铺是家庭信贷的主流。专门从事货币兑换和短期商业信贷的钱庄数量极少,直到20世纪,这些地方金融机构融资有限,有时是独资经营。<sup>⑭</sup>直到19世纪末,钱庄最重要的作用是将卖盐所得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以及清理当地商号间的账目结算。19世纪后半叶,四川出现了一种新的金融机构,常常被称作山西票号,说明其创建者是山西人,这些票号主要从事大城市间的资金流通业务。票号开始时仅建在较大的城镇。1879年自流井才有了第一家票号。<sup>⑮</sup>钱庄、票号以及它们的前辈——私人放债者和当铺,都不提供低息的长期信贷。尽管每一种机构都对盐业的日常运作做出了贡献,但它们在盐场廊厂的创建上没有起到作用。

尽管缺乏专注于投资的私人财富和产业金融业,但富荣盐场在生产能力上的投资却是巨大的,这是由潜在的利润和市场膨胀驱动的。自流井和贡井的企业家们在18世纪通过种种办法雇用劳力,获取凿井权,购买设备,并度过从破土到发现财源这一漫长时期。富荣盐业经历着增长和技术改进,而不是处于停滞状态。在盐场发展初期,在大功告成之前,一些制度成为融资的替代工具,将众多殷实家庭的资源联合在一起,共同承担风险,同时也使得盐业自身拥有相当的灵活性,以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

## 清初的凿井契约

27

凿井是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活动。在四川的许多盐场,不复杂的浅井是由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凿的,这还是一种对

<sup>⑭</sup>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D50。直到1939年,自贡每家钱庄的资本总额平均仅有11666元,资本总额最多的钱庄也只有20000元。同上书,D46。

<sup>⑮</sup> 同上书,D50。田茂德认为,直到1907年自贡才开设了第一家钱庄。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5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4年。

于农业的附带性使用。<sup>①⑥</sup> 在技术发达的盐场,凿井早已不再是一种家庭手工业。正如同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卓筒井的开凿要求相当高的专门技术,包括确定井位及建造。富荣盐场盐井的高级形式,包含着复杂的商业合伙关系,它将亲属及非亲属的、当地和外来的资本聚拢在一起,经营呈现出许多近代工业企业的特点。专业技术、资本和土地以复杂的商业合伙关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种机制须精心实施,尤其是在这些商业合伙关系的发展得不到清朝法律具体条文的帮助之时。

清代协议的式样和法律对它的认可,在简单的地契中就可以看到。使用正式的契约来析分家产、缔结婚姻关系以及转让土地权利,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清朝,田契被认为是土地纠纷中最具效力的证明材料,由此扩展到对于书面契约作为创建产权的一种工具的合法认可。<sup>①⑦</sup>

在盐井发展的初期,企业家通过租佃契约等方法得到在其上进行凿井的土地,契约的格式和用语大部分都与农业用地的租约相同。然而,采用租佃的形式,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或是法律反对土地的转让。当时,富顺和荣县土地市场活跃,这样做是因为,井基的租佃将没有资金的地主与在凿井地区没有土地的投资者的资财结合了起来。如果凿井成功,地主能够扩展产权,享有盐井产量的一定份额。从承租人(也就是投资者)的角度看,通过租佃可以用最少的创办费用对土地进行开发,这在资本匮乏的环境下十分重要。而且,在盐场发展的初期,这使得开发商能够在出现需求,以及当生产提供了必要资金时,可以得到另外的土地,

<sup>①⑥</sup> 对于井、灶运行以及地主—佃户关系的一般性描述,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年),卷3,篇2,节1,地主,与节2,井户、灶户。在乐山、绵阳、乐至、简阳,地主办井似乎很普遍。射蓬、南阆、乐至、三台、蓬中、射洪、南盐、西盐及中江盐场的灶户,也可能至少购买一部分必需的用地。甚至是在富荣,出于凿井目的而购买土地的例子也能找到。例子见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契约第9号、60号、86号、102号、103号。

<sup>①⑦</sup> 曾小萍:《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产权问题》,载曾小萍、欧中坦、罗伯特·加德拉编《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17—36页。

用于建设盐灶、柜房、卤笕、水塘和存放卤水的棹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井基土地租佃初期,力量的天平向地下藏有丰富卤水资源、运气好的那些地主一边倾斜。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川盐市场的扩展,力量的天平发生了改变,在最发达的盐场——富荣,地主与承租人间再也不像是一种租佃关系了。

28

## 井基和矿基的简单租佃

现存富荣最早的井基租佃协议是乾隆朝的,其中交易条件的表述已很完备。然而,来自四川巴县煤田的矿基租佃契约,还有来自较低资本要求的产盐地区的租佃契约,可以帮助我们窥识采掘业资本投资最初阶段之一斑。此二者中,矿基租佃契约源于有着悠久传统的农业土地租佃,这是很清楚的。<sup>⑬</sup>如同商业发达地区可耕地的情况一样,这两种情形的租佃也多用固定租金制。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的租金都很普遍,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求承租人缴付押租。例如,1905年雷恒泰向潘长寿租佃后者乐山县的土地,开凿了一眼盐井。潘长寿得到了五串铜钱<sup>⑭</sup>作为押租,每月的租金是一斤食盐,租期为20年。<sup>⑮</sup>那些表面上是土地买卖的契约实际上常常也是租佃契约。1915年,一位名叫袁树芳的犍为地主同意出卖一块地,实际上是袁联久计划在其上凿井建灶。凿井建灶的租金分别订立条款:井基的押租是500两,每年的租金是一包半食盐;灶基的押租是100两,租金是每年4包盐。<sup>⑯</sup>也有收取现金租金的情况,现存的一份稀见的井仁盐场契约就是如此。<sup>⑰</sup>

<sup>⑬</sup> 对于四川一个地区农业租佃权的详细讨论,见曾小萍《清中期四川的租佃权:巴县田土诉讼研究》,载《亚洲研究杂志》第45卷第3期,1986年。

<sup>⑭</sup> 铜钱是中国市场通行的货币。白银用于大宗交易,纳税也主要用白银。银钱的理想比价是一两白银换1000文铜钱,后者常常穿在绳子上以便使用。一串铜钱就是1000文。

<sup>⑮</sup> 乐山地区档案馆69-7-7502-93,引自《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35页。

<sup>⑯</sup> 乐山地区档案馆69-7-7494-4,引自《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36页。

<sup>⑰</sup> 乐山地区档案馆69-7-7502-189,引自《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36页。

310

相同的趋势在巴县煤矿开采的土地租佃中也可以找到。这里的材料显示,以现金作为租金更为普遍——这是由于绝大多数煤矿地处偏远,运输和出售困难重重。<sup>②③</sup>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该县诉讼案件涉及的43座煤矿中,只有9座有外来的投资者——他们租地开矿——这其中,又有一多半以现金或以煤的方式向地主缴纳固定租金。<sup>②④</sup> 与四川的土地承租人一样,他们大多数以现金支付一笔押租,而这笔钱在违约或是契约期满时退还。<sup>②⑤</sup> 食盐容易出售,且许多井基靠近河道,四川南部更是如此,这可能激励了许多地主继续以实物的形式收取租金。这一趋势在1940年代由于极端通货膨胀的压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事实上,直到1947年,在四川仍可以找到以实物支付固定租金的盐井。<sup>②⑥</sup> 国民政府以实物收取土地税的做法,无疑对这一趋势推波助澜。<sup>②⑦</sup>

租金的支付形式和押租的存在,突出了农业租佃与采掘业土地租佃间的密切联系,但19世纪的一些发展,显示出与这些早期的乡村根源的日益偏离。首先,煤矿和盐井与土地本身日益分离。这种区分与农业租佃中发展出田面权和田底权有几分类似,但这对于盐井和煤矿别具重要意义。煤矿和盐井与土地的分离对于采掘业在租期内确保无虞起着重要作用,激励了创办煤矿和盐井所需的巨大固定资本的投资。到19世

②③ 曾小萍:《经济发展的障碍:帝制晚期四川的采掘业》,4-5页,美国历史协会年会论文,纽约,1985年。

②④ 事例见巴县档案馆6.6.38886和6.3.17218。

②⑤ 巴县档案馆6.2.642,6.3.17168,6.5.14437,6.5.14456,6.5.14453,6.3.17218,6.3.17162,6.6.38859,6.5.14437。

②⑥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35,37-38页。

②⑦ 1940年代国民政府对于四川的赋税政策,见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的编者指出,1940年代政府控制着井基的租金。例如,1944年乐山的井基地主被迫向政府请愿,请求改回收取实物租,以对付通货膨胀以及所加征实物税的不断升值。《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37-38页。

纪,许多契约规定,承租人直到投产,证明开采已获成功后才需支付租金。<sup>②⑧</sup>同一时期的煤矿契约还规定,租佃一直延续到藏煤采完为止。<sup>②⑨</sup>同样,井基租约常常包括如下条款,如曾光成签订的契约中所写,租期一直到“井老水枯”。<sup>③⑩</sup>这样,只有当盐井或是煤矿完全告废时,土地才回归地主手中。另一方面,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造成停产,地主都可以收回资产,另找他人继续生产,或是恢复作为农业用地。

与此同时,煤矿和盐井等所占土地的地主,逐渐失去了农村传统意义上地主对于农业用地的责任和权利。煤矿用地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源自地主力图避免承担不法矿工滋事的罪责。巴县档案中数份煤矿租约特别声明,如果工人有酗酒、赌博或其他惹是生非的举动,责任全归承租人。<sup>③⑪</sup>在采矿和盐井地区,地主与土地分离的做法也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巴县地主就被明确禁止干预采矿事务,也禁止在相邻的土地上开矿,以防止他们企图接近承租人的矿脉。<sup>③⑫</sup>1800年,刘玉江承租周家的土地开了三个煤矿。承租契约不仅规定了周家不能干涉采矿活动,而且,还规定如果他们的行为造成刘玉江的煤矿停产,那么他们要支付一笔罚金或赔付刘玉江的所有支出。<sup>③⑬</sup>《四川盐政史》记述了犍为地主收取他们土地的租买金即押租以及每年的固定租金,但条件是地主不得对盐井指手画脚。<sup>③⑭</sup>三台和蓬州的契约,也规定地主除了收取租金外没有什

30

<sup>②⑧</sup> 采掘业的例子,可见巴县档案馆 6. 6. 38886, 6. 3. 17223, 6. 5. 14468, 6. 6. 38874。食盐的例子,可见乐山地区档案馆 69-7-7502-223。也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38、86、87 号。尽管极少见到盐业的事例,但盐井见功后地主才能分享利润的规定显示出,在较早的分成租契约中,这必定是个很普遍的条件。《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37—38 页。

<sup>②⑨</sup> 曾小萍:《经济发展的障碍:帝制晚期四川的采掘业》,6 页。

<sup>③⑩</sup> 乐山地区档案馆 69-7-7502-189,引自《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36 页。也见乐山地区档案馆 69-7-7494-4 和 69-7-7502-223。

<sup>③⑪</sup> 事例见巴县档案馆 6. 3. 2952 和 6. 3. 17028。类似的规定可以在少数凿井契约中找到。例子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76、80 号。

<sup>③⑫</sup> 事例见巴县档案馆 6. 5. 14437 和 6. 6. 38886。

<sup>③⑬</sup> 同上 6. 2. 642。

<sup>③⑭</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10,节 1,页 70a。

么权利。<sup>⑤</sup> 甚至有个地主因为承租人拖欠租金,要撤销契约,但他要补偿承租人建造矿井的投资。<sup>⑥</sup> 这些新的保护措施对四川煤矿和井盐业增添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当富荣盐井的土地租佃关系在清中期转变为合伙关系时,土地与其上的产盐业就彻底分离了。

## 回到分成租

19 世纪初,人口增长和社会稳定构成了四川经济繁荣期的基础,这一繁荣期至少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之交。煤和盐这两种基本的消费品,得益于不断扩大的市场,以及商人在四川境内更为安全的贸易环境。就食盐而言,1820 年代黑卤和天然气的发现,是四川南部特别是富荣制盐业的一个转折点。当个别成功开凿的盐井产量突飞猛增时,地主们开始后悔事先就订立固定租金,并将自己排除在开采事业实际经营之外。这样一来,除最落后的地区外,我们开始看到试图回到分租制,这将给地主更大的产量份额。

在采煤业,分成租普遍采取两种形式。一些情况下,地主要求以现金支付固定的数目,或是每百挑煤提取多少挑。<sup>⑦</sup> 由于很难查证生产能力,因此有的地主就对采煤工作面的每一个工人确定了一个固定缴付金额,这称为论镐付钱。<sup>⑧</sup> 上面两种情况,地主都可以从煤的增产中获益,因此愿意维持有利于煤矿平稳生产的条款。在更为发达的盐场,也发生了类似于地主与煤矿关系的转变。1886 年,戴同德在乐山一块租佃的土地上凿办了四眼井,他向该地地主仅支付了十两的押租,并承诺地主拥

---

<sup>⑤</sup> 同上书,卷 3,篇 2,章 10,节 1,页 70b。

<sup>⑥</sup> 一个例子见巴县档案馆 6.2.7099,这份契约签订于 1799 年,包含这样的条款。

<sup>⑦</sup> 例如,汤长发租用一块地,每开采一挑煤,要缴铜钱 6 文。巴县档案馆 6.5.14419。吴吉川的佃户每 100 挑煤要向他交 16 挑。巴县档案馆 6.5.14472。也见巴县档案馆 6.5.17223 和 6.5.4454。

<sup>⑧</sup> 例如,许成秀向他的地主每镐每月支付 1.2 两。巴县档案馆 6.2.2099。也见巴县档案馆 6.3.17223 和 6.5.13651。

有盐井产量的1%。<sup>③</sup>四位投资者缔结合伙关系,在井仁盐场凿井,他们为四眼井的每眼支付了六串铜钱的押租,并在租佃的土地上建了柜房。31  
他们的租约要求,盐井一旦投产,每生产1000斤盐,要缴付地主铜钱500文,另外,每眼井每年要缴付50斤盐。<sup>④</sup>

对于租佃的开采土地实行分成租,这只是更高产的盐井和煤矿发展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在盐业中,分成租很快就演进成为一种更高级的合伙制。对于土地、资本和凿钻设备、专门技术,以及管理才能的拥有者来说,进入20世纪时,才可能依据他们各自的特别贡献,依比例对盐井共享权利。

## 富荣土地与资本的结合

### 简单的凿井合伙制

1779年,自流井的地主王静庵与蔡烂若立约。他们协议的目标是开凿一眼名为同盛井的盐井。依据合约,王静庵得到盐井股份中的7.5股,蔡烂若得到22.5股。凿井的最初经费由蔡烂若承担,他将出售开始阶段的所有卤水,以补偿这些费用。一旦生产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此事例是达到20—40担),地主王静庵将加入,共同承担盐井达到可以全面生产即大水的成本支出。盐井建成后,地主和投资者将根据他们在盐井合约中所占的份额,享有利润和承担一切赋税及开支。该租约期限是11年,期满后盐井将归地主所有。<sup>⑤</sup>

同盛井契约是现存富荣最早的合约,反映出了1949年之前凿井投资的基本结构。地主贡献出创业之初就需要的土地,通常称为“一井三

<sup>③</sup> 乐山地区档案馆 69-7-7494-135,引自《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39页。

<sup>④</sup> 乐山地区档案馆 69-7-7502-223,引自《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39—40页。

<sup>⑤</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1号。

基”，这包括开凿盐井的土地、树立天车和天地滚子所需的最基本用地，以及大多数情况下，还有煎烧卤水的灶房用地。地主不负责凿井的任何费用，这是承租人的任务。在现存契约中，指称他们的用词是“客伙”，揭示出未来的事业中，这些承租人将构成一个稳定的投资者集团。

32 富荣的井基租佃条款中，有关各方得到了他们希望开工的盐井的股份。每眼井的股份数目是由习俗而不是由投资者的多少决定的。地主的股份称为地脉股。那些投资者的股份名称多样，最常见的是工本股、客股和开锅股。在自流井盐场，大多数契约将盐井分为 30 股，而在贡井盐场大多数契约则是投资者和地主分配 24 股。<sup>④②</sup> 股份通常有数种叫法。在贡井使用的是口锅和水分，极可能是源于生产的方式；在自流井，用班、天和日分，可能是源于某个时期，股东们每月轮流负责固定的天数而从中获益，这一问题我们很快会再予以讨论。<sup>④③</sup> 一旦大量的投资者在该地区的盐井开始缔结合伙关系，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只占有盐井每月生产的几“分”或是几“秒”。

地主和投资者拥有的股份数依习俗设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当土地和资本的相对作用发生变化时，他们所占股份也会发生改变。在同盛盐井的 30 股中，地主得到 7.5 股，投资者得到 22.5 股。到了 19 世纪初，股份分配似乎向利于投资者的一边发生了轻微的倾斜，大多数 30 股是在 5 : 25—7 : 23 之间分配（给予地主 20%—30% 的股份），24 股的分配是 6 : 18（给予地主 33% 的股份）。然而，到 19 世纪末，开凿黑卤井以及后来的盐岩井<sup>④④</sup>的高昂成本都激励了对地主股份的蚕食，许多契约将地主的股份降至 15% 以下。伴随着这一股份损失的，是地主对盐井开发贡献的相应增加。尽管所有的契约都规定，地主不支付凿井的费用，但除最

<sup>④②</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节 2，页 17b。

<sup>④③</sup> 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和明清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557 页。

<sup>④④</sup> 对于盐岩井的讨论，见第七章。



初的开凿外,地主的资助还是在许多方面可以找到。同时,盐井见功的时候将决定有多少利润会依据盐井开凿中的实际贡献进行分配,以及多长时间后,地主开始得到盐井中属于他的股息。

在达到最理想的深度之前,大多数盐井出产少量的卤水和天然气,即微水和微火。它们出售所获利润,普遍都作为进一步开凿的费用。<sup>④5</sup>这样一来,因推迟地主参与利润的分红,实际上是在支付凿井的部分费用。在一些契约中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以防地主任何在早期分配利润的企图。<sup>④6</sup> 1820年代以后的多数契约中常常也规定了微水和微火的标准:从所产气满足一口煎锅,到卤水或气能满足2—3口煎锅不等。<sup>④7</sup>

33

微水和微火的出现,是盐井大功即将告成的好兆头,常常标志着投资者开始建造廊厂的汲卤设备等设施。正是在建造这些设施所引发的投资期望中,我们看到了凿井合伙关系对于地主地位最早侵蚀的迹象。许多早期凿井契约明确规定,建造天车、天地滚子等设施是投资者的独有职责。<sup>④8</sup> 一些契约,尽管没有明确规定,但缔约方彼此心照不宣。然而,到19世纪中叶,推迟利润分红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样做,使投资者能够利用盐井自身的收益以支付日益昂贵的设备以及补偿凿井已发生的巨额开支。

一旦盐井见功,地主或地主股份的拥有者就算正式入伙。此时,地主正式缔结合伙关系,叫做分班、起班或进班,除非另有规定,他的权利和责任同任何其他合伙人一样。大多数契约没有明确规定,盐井在建期间必须克服什么障碍,因为这将会引起地主与投资股份持有人之间的冲

<sup>④5</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84份凿井契约中,有43份明确提到利用微水或微火以支付凿井的最后告成。时间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不包括这一条款的常常是重新淘办旧井的契约,但在原井更早的契约中应该可以找见这样的规定。可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8、13、21、22、35、68号。一些事例的表述为,所有的股东将分割凿井成本之外的一切利润。例子见1860年代的契约第66、75号,以及民国时期的契约第84号。

<sup>④6</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68、69、72号。

<sup>④7</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20、21、22、24、27、34、63、66、74号。

<sup>④8</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4、14、18、19、20、21、22、23、24、26、28、60、63、66、72、74号。

突。地主常常急于开始分享利润,特别是盐井开凿要花五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另一方面,投资者只要能利用盐井出产的气、卤以资助盐井的发展,他们就乐于延长在建期。<sup>④9</sup> 在清末,一些契约订下了地主入伙的标准是在盐井开始汲卤之时,<sup>⑤0</sup>而有的则规定是要见大水或大火。<sup>⑤1</sup> 还有一些契约,凿井合伙人设定了见功的特别标准。<sup>⑤2</sup> 同治《富顺县志》给出了惯常标准:可供应4口锅的卤水,约合80担。达到这标准后,有租佃限期的盐井将进行分红。到了民国时期,见功的标准已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这是由于盐井生产能力和凿井成本的提高,以及盐场地主权势的普遍下降。<sup>⑤3</sup>

34 一旦地主入伙,凿井的任何支出都由所有24或30股平均分担。这包括盐井可能需要另行租用土地,盐井和设备的修缮费用,以及如果盐井干枯,需要向下凿淘发生的费用。<sup>⑤4</sup> 运行支出、赋税、建牛棚、购买牛只以及为感谢见到水和气的好运而进行的酬神、演戏,所有这些都列在开支项目之列,都要从收入中扣除,然后再分配利润。到19世纪中叶,这一共同支出的长长名单中,越来越多的是建造设施的开支,这就将最初由投资者单独承担的一项主要支出,添加到了构成合伙关系的众人头上。<sup>⑤5</sup>

<sup>④9</sup> 同上书,128—137页。

<sup>⑤0</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6、20、21、25号。甚至在民国时期一些契约还继续沿用这种方式,可见契约第31和48号。与此类似,民国时期的一些契约指定的时间是打到盐岩层,可见契约第53号。

<sup>⑤1</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19、68、69、74号。

<sup>⑤2</sup> 如前所述,同盛井契约规定,在盐井日产卤水足以供应一两口锅之后,地主将入伙,开始承担运行支出费用。在始于19世纪上半叶的数个契约中,类似的要求是在日产能满足四口锅后入伙。同上书,契约第22、23、24、44号。

<sup>⑤3</sup> 现存契约中,产量从月产30担卤水和日供烧火圈10口的天然气,到8000担和火圈100口的天然气。同上书,契约第7、8、9、13、14、15、16、38、49、59、60、82、83、87号。民国时期对于进班的最低产量的规定极为明确。契约第83号要求气的产量至少能烧火圈24口,每口能烧卤水咸度为2两的卤水3.5担。对于地主进班的条件,该契约规定:“每月牛推二千四百担,火车推六千担。”

<sup>⑤4</sup> 许多契约包括了这些条款,这里仅举开列一些,同上书,契约第7、14、17、20、26、32、38、40、53、65、79、85号。

<sup>⑤5</sup> 事例同上契约。

甚至是否重新开凿一眼废弃或曾遭损坏的盐井的决定权也属于投资者，这样，入伙凿井的地主，就要提前进行支出，而这些支出是他所不能控制的。<sup>⑤⑥</sup>

的确，到地主入伙之时，他已经放弃了几乎所有自己土地使用的决定权。早在 1850 年代，就出现了李邹氏及子李文华所签订的这种契约。契约不仅提醒李邹氏：“此井不论见功与否，均归客人办理”，而且也告诫她，不要派人到现场插手管理事务，“致使有乱井事”。<sup>⑤⑦</sup> 在现存 1860 年以后的四份契约中有两份规定，租佃的土地可以自由利用，赋予了盐井管理人决定所需的最后地界的全权。<sup>⑤⑧</sup> 可能是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一些契约特别规定，井基的界限立石作为标志，任何额外的土地必须单独向地主租佃。<sup>⑤⑨</sup> 甚至有凿井契约规定，即便是另有其他用地的需要，该井也无权处置土地。<sup>⑥⑩</sup>

地主所拥有的微弱影响，要看他们在与投资者签订的契约规定之外收取土地使用费的能力。邻近犍为县的五通桥盐场的地主就使用这种特权，在他们的土地上堆积煤炭，经由他们的土地从盐井将卤水运至灶房等统统收费。<sup>⑥⑪</sup> 然而在富荣，开凿盐井需要更高昂的成本，消解了自流井和贡井地主讨价还价的力量。到 1850 年代，他们的租约出现了额外收费的规定，同样的措词，枯燥冗长，包括使用土地上公共用地运输煤、锅、牲口及人员往来，铺设管道或建造储存卤水的榱桶。也要请求地主同意建造任何必需的建筑或其他设施，以及为牛只提供淡水或灌注盐岩井的水塘。他们不能禁止投资者开钻土地的土层和岩石，或是在现场堆

<sup>⑤⑥</sup> 同上书，契约第 9 号。一些契约确实要求在重新淘办旧井之前要与地主商量。见契约第 68、69 号。

<sup>⑤⑦</sup> 同上书，契约第 64 号。也见契约第 58、68、69 号。

<sup>⑤⑧</sup> 同上书，契约第 66、74 号。

<sup>⑤⑨</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71、73、75、78 号。

<sup>⑥⑩</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52 号。地主同意，若有外人建卤窰经过其土地，所有 30 股共同分享这一租金。

<sup>⑥⑪</sup> 高明安：《五通桥盐场的封建陋规》，载《五通桥盐业史料选辑》第二辑（油印本），1965 年。

35 积矿渣或煤炭。事实上,一些契约囊括了一切,责令地主同意随意使用土地,只要这块地足够大。<sup>⑫</sup>有一份契约甚至写道,如果地主不论出于任何目的阻挠土地的使用,从而需要租用别处的土地,那么他要承担此租金。<sup>⑬</sup>这些协议说明,人们明白,井基只是一种生产性投入,它除了有助于凿井外,别无价值。

从租佃权到股权的生产关系的转变,势力天平从地主向投资者的倾斜,这些代表了朝着更为高效、统一管理方向的变化,确保资本投入在开始利润分红之前尽可能达到最高水平。在地主和投资者享有他们股份方式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早期契约使用“分班”一词,显示地主已开始享有盐井的利润,就是按照“分班”一词字面的意思进行管理。这种最初级的安排,规定地主和每位投资者每月在一定天数中推汲卤水。<sup>⑭</sup>这种做法后来有一定的改进,即统一推汲并分配卤水。到19世纪中叶使用“起班”和“进班”的时候,大多数合伙人是在用合伙经营的盐井的经费所建的灶上煎盐,这叫“合推合煎”。<sup>⑮</sup>

凿井协议在许多方面与合伙契约类似,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凿井协议的签订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租佃开采权。在初期,大部分租约很可能有着固定的条款。有期限的租佃井基上的盐井被称为“客井”,同治《富顺县志》记载,期限一般是12—20年。只有当凿井的资本相对很低时,才可能存在这种安排。在盐井发展的初期,当时生产力水平一般,井深常常不超过1000英尺,成本最多数千两白银,这种情况下,承诺有限的使用期限,还是可能吸引到必需的资本的。一六井的投资者每人出银

⑫ 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6、9、13、14、15、17、26、28、30、31、38、39、40、49、51、55、60、64、65、67、68、69、70、71、73、75、76、78、79、80、81、82、83、85、86号。

⑬ 同上书,契约第52号。

⑭ 王三畏堂大事记的作者回忆说,或共同或每月按指定日子汲卤,这已写进王家早期的土地租约。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6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83年。

⑮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97号。编者指出时间为1942年的第17号契约,明确规定禁止地主与早先的投资股伙分班。

144 两，参股凿井。共有 18 位投资者，这意味着创办经费只有 2 052 两。德厚井成本多些，约 4 904 两，若凿井成功，这笔钱很容易在数年内赚回来。<sup>⑥</sup>

限期租佃协议，鼓励地主将农业或林业用地变成开采用地，地主无需什么资本就可以以商人身份进入盐业。地主不仅能收获其土地上成功开凿盐井的利润分红，而且，当租约到期，盐井、盐井所有股份，还有绝大多数设施也归地主所有。这通常包括天车、地车、天地滚子，也常常包括灶房、柜房等设施。投资者拥有动产，如牛只、工具，有时包括盐锅，这些能够在新的凿井投资中使用。<sup>⑦</sup> 晚清数个富裕的盐业生产家族，开始时是以小的食盐经营者和地主身份出现在自流井和贡井的。王三畏堂财富的创造者王朗云，在 1840 年代通过重新淘办一眼旧有的黄卤井，以及向当地和陕西商人出租家族土地开凿新井，开始了他的“帝国”发家史。<sup>⑧</sup> 李四友堂兴起史，必定要从李维基与一位高姓陕西盐茶商的一次见面开始，后者对李家相当低产的浅井投资了 3 000 两。<sup>⑨</sup> 在 1840 和 1850 年代，肖致和、张三和，由于吸引投资者在他们的土地上凿井而远近闻名，两人也因此暴富，还与胡元和一道，被称为“贡井三条河”。<sup>⑩</sup>

36

晚清的土地限期租佃契约极少保存下来。到 1850 年代，投资者再不愿接受资本支出不断增长却仅有短期收益的条件。这时黑卤井得到

<sup>⑥</sup> 同上书，契约第 94 号、以及 91 和 92 号。编者指出这些盐井是在 19 世纪末开凿的，但成本不应该少于数十年前类似的盐井。

<sup>⑦</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1、4、9、15、17、38、39、86 号。双兴井的投资者与地主方一同分割了能搬动的东西及牛只。然而，这是一份对在开凿过程中的盐井继续进行凿铤的契约，最初的开发商已有所投入。见契约第 7 号。至于 20 世纪初才引进的蒸汽动力机车，基本上是谁购买归属谁，见契约第 13、83 号。

<sup>⑧</sup>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5—166 页。这份与陕西商人签订的租约期限是 18 年，期满后王三畏堂将拥有除牛只和煎锅外的所有一切。

<sup>⑨</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47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1962—1963 年。

<sup>⑩</sup> 宋良曦：《试论清代四川盐商的发轫》，38 页，载《井盐史通讯》1984 年第 1 期。这一称呼的最后一个字与他们每人名字的最后一个是异义同音字。

了进一步开发,这些井深差不多有 3 000 英尺,预示着生产力的急速增长以及凿井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川盐纪要》估计,即便一口深约 2 500 英尺的盐井,创办投资也至少四五万两。<sup>⑦</sup> 结果,越来越多的盐井是在土地永久租佃的条件下开凿的。这些所谓的子孙井的股份可以永久传之后人,这表明了地主与他的土地彻底分离。<sup>⑧</sup>

并非所有写进协议的保护性条款都是为了维护盐井投资者的利益。作为租佃协议,大多数契约继续要求缴纳押租。许多没有提到押租的契约,是关于原先凿井的资本结构调整,以便在先前的井基上再次凿淘,或是吸收另外的投资者贡献凿井的费用。在清朝,押租平均约 100 两,当然,到清朝末年,三四百甚至五百两也不少见。<sup>⑨</sup> 这些增长无疑反映出了随着黑卤井及后来的盐岩井日益普遍,盐井的盈利更多。民国初期,富荣盐场兴盛,一些凿井契约中的押租高达 1 000 两到 2 400 两。<sup>⑩</sup> 这些数字在 1930 和 1940 年代再次被超越,当时盐场再度繁荣,民国通货膨胀处于初始阶段,一些盐井的押租达 10 000 元甚至更多。<sup>⑪</sup> 这一通货膨胀趋势给盐井开发商造成了严重问题,特别是因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绝大多数盐岩井签订的是有着押租退还的固定期限租约。契约到期时押租早已贬值,这导致一些契约的起草人规定,退还的押租要随通货膨胀进行调整。<sup>⑫</sup> 巨额押租的收取,与我们找到的四川处置农业用地的模式一样。<sup>⑬</sup> 因为大多数的押租是不退还的,因此这种做法的起源,

⑦ 林振翰:《川盐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47—248页。

⑧ 20世纪由于盐岩井回归长期租约,完全改变了这一趋势。

⑨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7、30、45、49号。契约样本太少,我们对于私人盐井的历史所知甚少,因此对于押租数目变化的原因还不清楚。

⑩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51、53、54、60号。

⑪ 通货膨胀对于押租影响的例子同上书,契约第17、86、87号。银两与银元间的比价是造成差异的一个原因,但对于像契约第17号(是1943年的)这样一个要收100 000元押租且不退还的盐井来说,比价只是押租上升的一个很小的因素了。

⑫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87、113号。契约第113号的押租以大米的形式缴纳,以应对通货膨胀。

⑬ 曾小萍:《清中期四川的租佃权:巴县田土诉讼研究》,499—526页。

可能是对地主的让步,因为他们本可以将土地用于农业或林业,而他们现在认识到,在未来的许多年,他们将不会从这一财产中得到收益。然而,一些契约要求,一旦盐井见功就要退还押租。<sup>⑧</sup>有些地主,尤其是人们已知道他们土地附近成功地开凿出了盐井——这会极大刺激投资者迅速着手凿井,因此也就更加具有影响力。

对于地主利益进一步的让步,是规定凿井的任何拖延,都将导致盐井和全部股份归地主所有。如果在地主采取行动之前还不恢复凿井,那么投资者将白白失去他们已经在此投入的一切。从早期的契约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依所签署契约着手开凿,地主常常要立即实施上述行动。<sup>⑨</sup>资本筹集会遇到种种困难,尤其是凿井的成本上升,致使在1850年代之前就修订了上述条款,宽限期从两三个月不断升至18个月。<sup>⑩</sup>民国时期,这一条款有时会规定一种例外情况,就是因战争而造成的凿井暂停。<sup>⑪</sup>

这些条款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对于地主权益的保护,而是它们在盐业整体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如同那些鼓励投资者对于盐业合伙制充满信心的条款一样,这些以地主为中心的条款有助于富顺盐场将更多的土地用于盐业。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通过及时处罚那些不能迅速跟上盐井开凿技术的人,反对无效率或破产了的合伙关系,保护了盐井自身的发展。

## 盐井合伙制的发展

不论凿井契约设定的条件,对于地主与投资者合作关系的形成多么的有利,仍然鲜有投资者自身能够负担得起凿井高昂的成本。19世纪中

<sup>⑧</sup>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4、49、53、64、70、86号。

<sup>⑨</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4、6、8、20、21、25、29、44、51、52、55、64号。

<sup>⑩</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23、24、66、76、78、79、83页。

<sup>⑪</sup> 同上书,契约第53、84、86号。停止凿铤又不将盐井归还,会引起诉讼,可见契约第2号。

叶,当黑卤井和气井开始主导盐井的发展之后,这一点尤为显著。确实,即使是在晚明,在技术远为发达的四川地区,合伙制似乎已成为普遍的盐井经营形式。潘鉴 1536 年的一道奏疏写道,在四川建造一眼井须“合众家之力,攒百两之金,经年累月而成”<sup>②</sup>。《四川盐政史》记述,合伙制作为盐井经营主要形式,除了在富荣的两个盐场,还有云阳、大宁、忠县、万县、盐源等地。<sup>③</sup> 合伙制还可以在犍为、南部和盐亭等地找到。<sup>④</sup> 在富荣,合伙的制度发展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借以考察投资者通过哪些途径来弥补相对于盐业资本需求来说是有限的家庭资源。这里,许多合伙关系聚拢十家乃至更多投资者的财源,包括经营了盐灶、零售或批发商号的投资股伙等。<sup>⑤</sup> 家族堂对于聚集四川南部产盐地区的资本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是盐场合伙制中最积极的投资者之一。这些家族堂,其组织形式源于中国同一祖先的后人所设立的祖产,这些祖产是为了创收以祭祀祖先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家族堂以一种分家不得染指或不得进行其他蚕食的形式,成为了商人间筹集商业股份、土地等资产的一种机制。<sup>⑥</sup>

到 20 世纪,几乎所有的盐井都是合伙制的。众多家庭和家族堂所拥有的盐灶,此时成为盐井占支配地位的投资者,尽管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股东的结合形式。天龙井,是位于郭家坳的一眼盐岩井,是由以下合伙开凿的:一个家庭与一个家族堂合伙拥有的一个商号、其他四个家庭、一个商号以及另外四个家族堂。<sup>⑦</sup> 像这样复杂的合伙关系并不罕见。这一情况,可能部分是由于开凿盐井时遇到困难所致——在天龙井投产

② 嘉靖《四川总志》,卷 16,盐法,引自《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45 页。

③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10,节 2,页 71a—72b。

④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5—46 页。犍乐盐场的一条,见张端甫:《犍乐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场商:吴景让堂》,50 页,载《井盐史通讯》,第 6 期,1979—1980 年。

⑤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46、47、48、49、50 号。

⑥ 见第四章。

⑦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58 号。



之前两度筹措资金,但它也反映了自贡地区投资者——家庭的和合作的——成倍地增加。

### 承首人与管理凿井事业

筹措财源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同一祖先的后人创建共有财产的做法,历史悠久。在因土地爷、寺庙、葬礼等而形成的交往中,农村家庭担捐其中的份额,以得到各种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回报,这是农村生活的一种常见情形。<sup>⑧</sup> 白思奇对北京会馆做过详细探讨,他指出,也可以将同乡或同职业所组成的城市团体(前者为会馆,后者即我们通常所称的行会)理解为股份团体。<sup>⑨</sup> 在自贡,投资者通过友谊或是亲属关系走到一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些最重要的合作集团是以家族财产体系内发展出来的组织为基础的。然而在自贡,我们也看到了资本持有者(合作的和家庭的)与事先没有关系的个人之间合伙关系的发展。将大量无关的人聚拢到一起,并且在许多年间一直资助像卤井这样复杂和面临重重困难的事业的发展,这必须要有新的组织和管理技巧。在富荣盐场发展中最重要组织创新之一就是承首人。在我们拥有的 84 份凿井契约中,37 份提到了最初形成盐井合伙关系时存在一个或多个承首人。<sup>⑩</sup> 有 32 份,差不多占这些契约的三分之二,始于清朝。

39

承首人在凿井阶段,起着数种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大多数事例中,在选取井基时,他是中间人和掮客。尽管一些卤井的投资者,是应地主的凿井要求或是他们自己找到地主并提出凿井的建议,但并非个个如此。更为

<sup>⑧</sup> 孔迈隆:《帝制中国晚期的日用品生产:一个乡村中的公司、股份和契约》,载戴维·纽金特编《确定资本主义的时间和空间:全球的重建、政治与身份》,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年。

<sup>⑨</sup> 白思奇:《北京会馆的社会和政治演进》,博士学位论文,哈佛大学,1997年。

<sup>⑩</sup> 各个时期都能找到有着两个、三个甚至四个承首人的盐井事例。20世纪契约中开列的作为承首人的一方,有时是一个家族资产或股伙本身。在此情况下,该家族堂资产和股伙可能会有一个部门,积极地为自己的凿井事业聚拢投资。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57、79、81号。

常见的是,地主寻找掮客,或掮客寻找地主,而去找投资者来凿井是掮客的职责。的确,我们所见到的 19 世纪许多凿井契约,不是地主与他的“佃户”之间,而是地主与承首人之间的协议。我们不知道这些投资者是谁,因为签订协议时他们没有得到“邀请”。是承首人支付押租,这刺激他尽快找到投资者,以偿还他这笔钱。<sup>⑪</sup> 在一些契约中,出现了投资者的名字,而没有承首人。这可能是投资者和地主走到了一起,寻找一位承首人管理盐井,这说明了承首人既作为中间人又作为管理者的重要地位。<sup>⑫</sup>

承首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了解盐务但没有资本。我们马上会看到,这是一种没有提供土地或自己的资本而入伙盐井的一种方式。有些承首人通过这一方法挣到足够的金钱,凭自身的实力成为了投资者,并且以后在其他凿井事业中成为井或灶契约合伙人。第二类是在盐场已立稳脚跟,有着很好的人际关系,有着凿井成功记录的商人。张乐三就是这样的人。在 20 世纪初,他至少是贡井两眼极赚钱的盐井的主要合伙人。1919 年洪川井的投资者首先是请张乐三管理他们的凿井事业,并最终移交给他,而且他招集起来的一个新的投资集团给盐井再次筹资。<sup>⑬</sup> 承首人可能在地方有着相当影响,就像黄玉书的例子所反映的那样。尽管黄玉书的名字在契约中被称为德燊井的承首人,但他至少也是另一眼井的一个主要投资者,同时他还是四川荣县支持反满革命运动的精英中的一员。

身为掮客,承首人不投入资本,却可以得到盐井的股份。名为“团首日分”、“干日分”或“浮锅日分”,这些股份通常从地主所得股份中拨给。<sup>⑭</sup> 随着

<sup>⑪</sup> 地主与承首人之间契约的例子同上书,契约第 20、21、23、27、29、35、64、68、69、72、73、74、75、77、78、79 号。

<sup>⑫</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22、25、28、36 号。

<sup>⑬</sup> 同上书,契约第 57 号。张乐三投资盐井的情况,在吉润卿文章中曾提及,见《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97—201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1964 年。

<sup>⑭</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55 号。明确提到承首人的股份从地主股份中分配,见契约第 22、23、27、66、72、74、80、81 号。冉光荣和张学君的研究表明,这些股份有时来自投资者股份,或是投资者和地主的股份。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01 页。现存两份契约中有承首人的股份被投资者和地主分割,见契约第 34 和 35 号。

盐井凿办日益困难,捐客股份的数目似乎也在增加。整个清朝,大多数承首人所得在半股至一股之间,但数位承首人从 1860 年代开始,得到三股甚至四股。<sup>⑤</sup>如同地主一样,承首人直到盐井见功才能从他的股份中受益。此后,他是一个完全的盐井合伙人,如果盐井必须再次凿办的话,甚至希望他也能投入资本。<sup>⑥</sup>当有限期的盐井归还地主,承首人就与地主分享投资者的股份。<sup>⑦</sup>对于永久租佃的盐井,承首人的股份与其他合伙人一样,可以代代相传。<sup>⑧</sup>而且,有材料显示,当盐井还在凿办时,因承首人负有监管职责,会支付他一小笔薪水。<sup>⑨</sup>

许多承首人有着相当高超的技能,他们在实际盐井凿办中的地位,可以视作建筑工地的建筑师或工程师。一些承首人自己拥有“家伙滚子”,即盐井凿办和其他建造方面所需的一套工具,因此常常将承首人的股份称为“家伙滚子股”,这说明人们考虑到了这些工具在盐井投资中的重要地位。<sup>⑩</sup>承首人的任务是,保证盐井适时开凿,从此不能停止,一直到见功为止。一些契约包含的条款,强调了承首人在这方面的责任。刘坤伦和张仕琰承担寻找天元井的投资者的职责,契约中有一条规定,如果盐井凿办停止的话,他们要双倍赔偿投资者的资本。<sup>⑪</sup>在天顺井的例子中,契约中数处都提醒承首人,他一个人单独负责该井的成功开凿,如果凿井中止,他就必须交回自己的两股。<sup>⑫</sup>

41

保证凿井按计划进行、避免经费短缺的关键,在于投资集团高超的

<sup>⑤</sup>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37、72、73、79、80、81 号。

<sup>⑥</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35 号。

<sup>⑦</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6 号,在租户或投资者退还盐井后,地主拥有 20 股,承首人拥有 10 股。

<sup>⑧</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24 号。

<sup>⑨</sup> 同上书,契约第 54 号。选辑的编者提醒我们注意第 89 号契约,该契约的附件规定,王世兴得到半股,并每月领辛力钱 1 200 文。这只不过相当于效益好的盐井的一个熟练工人所得,因此这只应该看作是对于大多数承担这种工作的人的象征性补偿。

<sup>⑩</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18、19、20、21 号。

<sup>⑪</sup> 同上书,契约第 18 号。

<sup>⑫</sup> 同上书,契约第 22 号。

314

财务管理。这也是承首人的任务。初期的高昂成本，常常出现的意料之外的开支，以及盐井见功所需时间漫长，这意味着极少有合伙人可以担负凿井开始后的所有必需资本。因此，确保资金源源注入该合伙的机制，就变得必不可少。很早就确立了利润应再投资于盐井的凿办准则，在统一格式的契约条款中就要求，微水和微火的收入要重新投到凿井中去。投资者继续定期对于盐井的开凿和汲卤煎盐所需的设备进行投资，这也极其重要。在盐井开发初期，对财务进行严格控制意义重大，这产生出了一套管理技巧，这种做法在富荣盐场已很常见。

投资者承担两种经费。许多盐场要求一笔“底钱”，用于盐井最初阶段的开凿，以及建设盐井井壁最上端拦护疏松土层的石圈。<sup>⑩</sup>绝大多数用于凿井的资本，都是投资者每月分期支付，称为月费或使费钱。在一些事例中，最初的凿井契约就规定了这一数目。<sup>⑪</sup>更常见的是，契约只是简单地要求由投资股份的每位拥有者按月支付。<sup>⑫</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的编者，对自贡市档案馆现藏的账簿进行考察后，认为对此的征收建立在上个月开销的基础之上。<sup>⑬</sup>该书所收录的投资者每月所缴的票据即结票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结票刻板印刷，大量印制。承首人每个月向每位在盐井发挥作用的投资者送达结票。结票上承首人需填写：该月盐井的总支出，从开凿日直到该月底的支出，该投资者应缴月额，该投资者截至现在已缴付的数额，该投资者总的拖欠额，以及此前两个月的凿钻深度。<sup>⑭</sup>结票不仅是作为一种

⑩ 这一过程称为“做下石安圈”。我们有三个关于“底钱”的契约，都是19世纪头20年的。一个例子是每半股出底钱6000文，另有一个例子是盐井投资者似乎每半股仅筹到3000文。同上书，契约第18、19、34号。

⑪ 例如，天元井的投资者同意，他们每半股每月拿出铜钱800文。同上书，契约第18号。

⑫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22、34、35、36号。有的契约包括“各伙即照占定日份逗银”（第56号）以及对合伙人“无力逗本”进行惩罚。

⑬ 同上书，契约第50号。

⑭ 同上书，第43号“月结票”。

机制以催促投资者每月缴纳经费,而且它也起到了股东月报的作用,使所有相关人员了解凿井的财务状况,知道离见到气或卤还有多远。

这些结票与政府赋税收据类似,考虑到政府与盐业间的密切关系,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的确,结票以政府赋税收据的样式,上面印有处置未能缴付每月经费的投资者的盐场惯常规章。在一个月的宽限期后,承首人将负责剥夺有拖欠的投资者股份,并寻找能够担负该资金的人,并将该股份进行转交。只有在盐井见功时,有拖欠的股东才可以取回他投在盐井上的资本,但没有利息。<sup>⑩</sup>

实际上,盐井合伙契约似乎特别严厉地对待有问题的成员。一些契约授权承首人寻找一位新的合伙人,以接手这些人的股份,并严格规定永不退还已支付的经费。<sup>⑪</sup> 还有一些情况,最早的全体合伙人通过一种名为“抬做”的股份再分配制度,以防止他们的全部资本有损:如果有一位或多位投资者确实无法继续支付凿井开支应付的份额,那么其余的合伙人将接手予以支付;当盐井见功后,会计算每一位股东实际缴付的资本,在此基础上再依比例分配运营盐井的股份。<sup>⑫</sup> 最后的情况是,股东可以彻底出售盐井股份。在盐井见功之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今天还是可以见到数个这样的事例。<sup>⑬</sup> 如果一部分投资者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所有以上这些方法保护了盐井免于废弃。而且,许多凿井的契约预见到了这样的困难,规定在出售股份,寻求外来的投资者之前,这些股份应先由合伙人购买。这些条款使用的术语——“不得私顶外人”——说明了合伙关系不应简单地视为一种租金缴纳者的聚集,而是有着集体权

<sup>⑩</sup> 同上书,契约第 53、54 号。

<sup>⑪</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18、22 号。

<sup>⑫</sup> 同上书,契约第 35 号。数份契约提到选用这种方式,包括契约第 36、37 号。

<sup>⑬</sup> 事例同上书,文件第 725 号,契约第 26、27 号。这种情况使用的术语是“绝顶”,会让我们感到迷惑。《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的编者认为,在自贡盐场“顶”字常常作“卖”的意思。然而,许多契约的“顶”字,用的是它更惯常的转租之意,如契约第 44 号所载,股份被转租给投资者,期满时归还。同上书,72 页。

利的合作实体。<sup>⑩</sup>

## 上下节转让

43 处置一小部分投资者拖欠的办法,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已不能解决许多盐井合伙中出现的问题。盐井的开凿需要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甚至是在见微水和微火之前就已用去了成千上万两白银,在见功之前整个合伙用尽了经费的情况并不少见。不可能知道在富荣盐场经历过这种问题的盐井所占的比例。然而,就我们所见现存的凿井契约中,整个合伙转手他人的有 29 个,合三分之一强。从设计专门处置这种意外事件的做法上,我们再次领略了富荣资本市场的适应力,以及鼓励在资本积累薄弱的条件下投资的制度发展。许多盐井由于管理乏术、技术困难、破产而遭遗弃,但演进而成的上下节转让的做法却保证了,至少在盐场繁荣期,大多数有生产潜力的盐井能够筹到经费。

早在 19 世纪中叶,上下节转让就是富荣盐场惯常规章即厂规的一部分。同治《富顺县志》记述了这种做法:<sup>⑪</sup>

或井久不见功,抑或仅见微功,尚须往下捣锉……井成时,中节者亦有归工本若干者,或共分红息者。

一些因素迫使盐井土地最初的开发商,将他们的资产转让给新的合伙人,即所谓的“丢下节”。五福井的投资者重新淘办一眼 1904 年报废的盐井,到 1907 年,他们已到达约 1 800 英尺,能够汲取一些卤水,显示

---

<sup>⑩</sup> 同上书,契约第 22、32、34、37、48、58、68、69 号。对于那些想出卖他们股份的地主也做出了类似的限制,可见契约第 82 号。出卖土地首先要卖给邻居或是家属的习惯做法,可能是这种条款的原型。尽管与一个远房族人相比,家属可能被认为有获得土地的一些优先权,但清朝以前,邻居或家属对于一个特殊地块拥有优先获得权利,这种认识是薄弱的。实际上,对此习惯的重申,在买主不是邻居或家属的售卖契约中一般都能找到。不论人们将“不得私顶外人”中的“私”字解释为私自出卖还是非法出卖,这一表达有着强烈的蕴意:向股伙之外的人出卖,必须是集体的决定。

<sup>⑪</sup> 《富顺县志》,卷 30,盐政新增,1872 年版。

该井有可能见功。然而，正当大功即将告成之时，他们的经费告罄。为了保住已投入的资本，他们将盐井一半股份转让给卢子寿，以便完成该井的凿办。<sup>⑭</sup> 黄玉书，前面我们已碰到过的一位承首人，从李如莲会（极有可能一个信贷团体）租佃土地，用于凿井。在找到投资者后，合伙打了十年井，花费超过 30 000 两。尽管基本设施已建成，该井也出产一些卤水，还有可烧五口火圈的天然气，但最早的开发商已无力继续向下凿办，达到一个使该井在 1920 年代溶解开采时期具有竞争力的深度。结果，他们被迫将股份丢下节以便完成凿井，在见功时可以分享利润。<sup>⑮</sup> 在其他事例中，发生未曾预料事故，如井壁坍塌或一些东西掉到井里，使得合伙关系无法维持，但通过丢下节，凿井仍然能够继续。<sup>⑯</sup> 最后，1920 年代川盐市场的急速衰退，以及军阀统治之下市场的破坏，造成了许多合伙凿井的延迟，他们不得不寻求下节以完成凿井。<sup>⑰</sup>

“上下节”契约数量众多，一个原因是，尽管大多数凿井协议条款规定，如果凿井停止，投资者将放弃他们的股份，但股东常常要维持他们在因未能打出卤水而被抛弃的盐井中的利益。<sup>⑱</sup> 多次的“上下节”转让，这是投资者努力找回他们已有的支出，为了将来的收益而设法将盐井投产，这导致了许多富荣盐井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合伙关系。找下节的做法，极大地改变了股份的分配和盐井的管理。

### 盐井股份的重新分配

正如我们前面所引述的盐场厂规，凿井职责转让给下节的最直接结

<sup>⑭</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50 号。

<sup>⑮</sup> 同上书，契约第 54 号。

<sup>⑯</sup> 云蒸井的所有者就是此命运，同上书，契约第 60 号。

<sup>⑰</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 16、57、83 号。1930 年代市场需求急速下降，国民政府不得不叫停所有新井的建设，引起许多未完成的盐井暂时关闭。川盐市场的萎缩对于自贡盐业的影响在第九章和第十章详细讨论。

<sup>⑱</sup> 同上书，契约第 2 号提供了这一现象的极好例证，这造成了数十年盐井所有权的争执。

果是盐井股份的重新分配。这些股份在最初的地主和投资者以及新的投资集团间如何分配,取决于该井基的特定条件。对于各种可能的转让类型的考察证实了,人们会尽一切努力以保证每人所持股份反映出他在盐井的资本投资。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的编者认为,转让最常见的形式是盐井全部股份在新旧投资团体间平均分配。<sup>①⑨</sup>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上下节协议都如此简单。如果上节已凿办了一段时间,或是已钻到相当45 的深度,那么上节常常持有一半以上的盐井股份。见到微水和微火,或是有其他理由相信盐井马上就要见功,但最初的投资者已用尽了资本的盐井,常常是这种情况。<sup>②⑩</sup>另一方面,若盐井在凿钻过程中历经了相当大的困难,或坐落在特别坚硬的岩石上,或必须另外选址,这样的井在打到卤水或是盐岩之前,都将耗费下节很多资本。这种情况下,下节会得到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盐井股份。<sup>②⑪</sup>

上节是否要求下节事先缴付现金(常常称为“顶价”),也会影响股份的重新分配。尽管契约没有说明个中原因,这样做可能是上节为了偿付供应商或盐井工人的欠款。丰来井的股东放弃了他们三分之二的股份,因此得到了1400两的顶价。盐岩井潜在的高额利润,对于增加下节股份来说,是一个额外的刺激。甚至转让给下节,也不能保证盐井就可以得到见到气和卤水的充足经费。当进程比预期慢时,为了鼓励下节增加他们的投资,在最初协议规定之外,上节可以出让更多的股份。1934年,王三畏堂与两位负责找到投资者的承首人签订契约,再次淘办德龙井。到第二年,下节已打了2800多英尺,投入很大,但并没有增产的迹象。

<sup>①⑨</sup> 同上书,74页。契约第49、50、55、56、60、62、98、130、138号都是平均分配股份的例子。

<sup>②⑩</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54号,及第9、48号。类似的情况可以在一些与凿井不直接相关的材料中看到。例子见文件第220、372、413、482、486、518号。

<sup>②⑪</sup> 普遍是要求约按2:1(同上书,契约第5、16、56号)和3:2(同上书,契约第51、52、53、54、59号)进行分割的契约。有一个事例,下节买了地主的股份以及投资者大部分的股份。同上书,契约第58号。



因此两位承首人与王三畏堂的经理人开会,请求另外出让两股以激励继续打井。他们因此又得到 300 元现金回报。1938 年他们报告说支出超过了 40 000 元,井深超过了 3 600 英尺。该井仍未能见功,这时,上节又出让了两股,这时上下节间的股份分配是 8 : 22。<sup>⑫</sup>

并非所有的协议都如此简单。当起实际作用的合伙人日益从他们最初所打的盐井离去,股份的分配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清朝时,毛志远堂和高经畲堂,以德合号的名义,买下了莲海井并改名为天龙井。<sup>⑬</sup> 他们拥有盐井的 20 股,而地主——寡妇袁罗氏及儿子们,似乎得到 10 股。1910 年,德和号将股份转让给了他们的下节李五美堂——这是一个涉身盐井交易的家族堂,有数份契约保存至今。上节保留了 4 股,而下节拥有 16 股。1927 年,他们又将所保留 4 股中的 1 股转让给了李伯权。李五美堂也从袁家手里买了 5 份地主股,这样股份总数达到 21 股。1927 年,李五美堂将 8 股转让给了廖忠厚堂,自己还剩 13 股。1928 年,李五美堂将另外的 8 股转让给了似乎是秀洋灶的合伙人:李思九、李笙九、李靖侯、李五美堂、李自兴堂、颜念陶、颜崇福永(一个商号)、陈伯群。至此李五美堂有 5 下节股。表 2.1 开列了 1933 年该井见功时的股东。 46

盐井的进度不只是影响到股份的分配。新的投资集团实现盐井投产的能力,无疑也有赖于转让中的盐井的信息准确。下节几乎总是拒绝以前任何的债务、有归属争议的土地等等。<sup>⑭</sup> 所有以前与地主签订的道路通行权和建设权的契约也必须重新确认。<sup>⑮</sup> 许多重新淘办的契约也写明了该盐井已有的深度和转手中盐井的施备状况。<sup>⑯</sup> 长期报废的盐

<sup>⑫</sup> 同上书,契约第 59 号。

<sup>⑬</sup> 同上书,契约第 58 号。

<sup>⑭</sup> 例子同上书,契约第 7、45、47、51、52、53、54、55、59、60、61 号。类似的条款也可以在最初的地主与投资者间的契约中找到。

<sup>⑮</sup> 同上书,81 页。

<sup>⑯</sup> 同上书,契约第 8、9、14、17、45、51、52、53、54、55、60、61、83 号。

井,地面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而上节新近陷入困境的盐井,可能有天车、天地滚子、灶房、柜房以及必要的工具。至少在 20 世纪以前,每个盐井的开发商似乎都保留有每天凿钻的记录:所到达的深度和盐井的状况。

表 2.1 1933 年天龙井的股份

股东	股份	股东	股份
德合号	2	李靖侯	1
高经畲堂	1	颜念陶	0.5
李五美堂	6	颜崇福永	1
李伯权	1	陈伯群	0.5
李四友堂	5	颜宪阳	1
廖忠厚堂	8	李自兴堂	1
李思久	1	李笙九	1
		总股份	30

资料来源: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58 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47 这些岩口簿可能提供了填写在前面提到的结票上的数据,并为未来的投资者提供了盐井进度以及是否可以见功的数据。至少有份契约规定,这些岩口簿在合同签订后应交给投资者。一旦缔结新的合伙关系,打井得以继续,投资者在每年年终将岩口簿交给地主,让他们知道盐井的进度。<sup>①⑦</sup>与此同时,新的投资者有时在转让契约中包括了这样的条款,即只要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无论盐井生产能力大小,都允许他们停止凿铤,可以汲卤。这通常设定为 3 000 英尺——在此深度之下,没听说过有井打到卤水。<sup>①⑧</sup>

所有这些条款保护了下节,鼓励他们在过去有问题的盐井上进行投

<sup>①⑦</sup> 同上书,197 页。事例见契约第 83 号。

<sup>①⑧</sup> 这大概是为了防止在投资者不继续凿铤的情况下,地主或上节要收回盐井,寄希望于有惊人的发现。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15、59、60 号。

资。考虑到股份转让交易一旦结束,会引发职责的划分,这种保护是很重要的。事实上,以前的股东都扮演了地主的角色,我们说过的关于地主股份的几乎一切,现在也都适用于他们的股份。他们不再进行资本的投入,在决定令地主“进班”之前,也不享受利润分成。同时,他们对于盐井的管理也失去了一切说话的资格,包括凿铤和盐井投产之后。<sup>⑫</sup> 现在轮到下节,单独使用他们的资金和管理技能,以使盐井投产并确保所有的股东最后享有利润。将管理彻底转让给一个投资集团,这样做是反对常常有着利益竞争关系的数个集团在管理上的争执。当然,如果所找下节不合适,这会将以前的投资者置于十分被动的境地。海生一泰生井的例子可能最好地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1872年,自贡著名的食盐生产商之一的颜桂馨堂和一群投资者,最早开凿海生井。到1880年代,他们用尽了资金,将井转让给了著名的盐商颜积厚。作为下节,颜积厚将盐井名改为泰生。在接手盐井不久颜积厚去世,他的儿子停止了铤办。依据最初的合约,上节给了颜家三个月的宽限期后,就收回了该井。因无资金继续凿铤,上节废置该井三年。然而,在1911年,颜积厚的儿子想要恢复权利,自己作为中节,招揽一个新的下节投资入股。最终,最初的开发商即上节否决他们昔日合作者的方案,该盐井的天然气平均产量足够烧火圈280口。<sup>⑬</sup>

富荣盐场的盐井开发商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是中国商业环境所独有的。可以与19世纪美国铁路的困境作一有趣的比较。美国铁路许多都是沉重债务缠身的股份制实体,就像富荣盐井开发商一样,如果他们不能筹集到新的资本就要被清算。就如同彼得·塔法诺所指出的,“债务高悬”的企业很难筹集到任何新的资本,因为新资本所能带来的增值,被

48

<sup>⑫</sup> 同上书,81页。见契约第59、64、63号。

<sup>⑬</sup> 同上书,83—86页。这一串事件是通过文件第45、46、91、220和486号,以及未收入本选辑的档案馆所藏文件中得出的。

有优先权的债主拿走了。<sup>⑬</sup> 在美国铁路的事例中,将铁路从财务灾难中拯救出来,并为企业的重组设定新的合法框架,两种制度发挥了作用:法院和投资银行尤其是摩根银行。在富荣盐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强制实施框架,以确保盐井开凿中持续性的资本注入。上下节股份的重建,通过给予新投资者与其所承担风险和债务相称的收益地位,以及通过在契约上就规定此前债务的责任归属,解决了大部分由于债务高悬所引起的种种问题。通过股份的内部重组,也化解了内部投资者不肯让步的僵局,减少了不情愿的内部人的股份。塔法诺也指出了信息不对称以及投资者重组的高额交易成本,成为新资本注入的障碍。富荣盐场与铁路相比,没有那么分散,也没有那么复杂,故而,新的投资者,最多的就是当地人,通过翻阅岩口簿和盘问凿井人员,可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领域,在当时,承首人所起的作用,与摩根这样扮演见多识广的“诚实掮客”角色的投资银行差不多。

富荣盐井的发展不可能没有问题。甚至像上下节这样的机制也可以阻碍盐井的见功。到清末民初,一些盐井有着众多的合伙人,经历了太多次所有权的倒手,以致并不是总能知道股东是谁。富顺县长手中的一些诉讼案件就是关于盐井股份纠纷和权利之争的。<sup>⑭</sup> 19世纪中叶,个别盐井股份成倍增加的问题,已在《富顺县志》中有所记载。<sup>⑮</sup> 尽管如此,承首人和上下节这样的制度对于富荣盐井的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两种制度依赖于中国农村和城市发达的订立契约文化。我们上面已考察的协议各方,能够依靠非正式的和正式的裁定以支持他们自愿做

<sup>⑬</sup> 彼得·塔法诺:《商业失败、司法干预和财务创新:十九世纪美国铁路的重组》,载《商业历史评论》,第71卷第1期,1997年。

<sup>⑭</sup> 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16和58号。也见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载黄宗智、白凯编《清朝与民国时期的民法》(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268页。

<sup>⑮</sup> 《富顺县志》,卷30,盐政新增。

出的承诺。契约建立的合伙关系,对于风险、投资以及债务的重新分配起着关键性作用。通过 1850 年代盐业繁荣之前盐井发展初期所出现的请愿活动,它们得以被广泛接受。可以说,契约、法庭和习惯,共同支持着中国 20 世纪之前少见的大规模资本投资。 49

成功凿铤一眼气井或卤井，只是井盐制造生意的第一步。许多为凿井而形成的合伙关系继续存在，成为汲卤和产品销售的单位。一少部分盐井建造自己的盐灶煎盐。然而，晚清富荣盐场所生产的一半卤、气，基本上是通过外租和转租的形式，重新分配给那些仅为经营已告成的盐井而形成的合伙关系，以及独立的盐灶。<sup>①</sup>

在富荣，为生产食盐而形成的合伙关系，将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组织起来，为解决煎烧富荣数百眼盐井所出产的卤水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这些包括：租用整个盐井及出产卤水的合伙关系；租用盐井一定比例卤水的合伙关系；建灶并租用卤或气，或卤和气的合伙关系；灶户与井户间的合伙关系；以及由两个或多个灶为提升更有效的经营而形成的合伙关系。食盐生产合伙关系的形成，与投资凿井而形成的合伙关系一道，部分是为了解决相对于食盐产业高资本需求来说有限的家庭财富问题。将生产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因素，归口互不相属的企业，也是为了将采掘业在政治、经

---

<sup>①</sup> 吉润卿从1909年开始，在贡井盐场工作40余年，他回忆说：盐井的所有人极少经办他们自己的资产。的确，大多数盐井的经营者都是租用盐井。见《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89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64年。

济和技术压力面前的风险降至最低，甚至是最成功的盐业企业家也加入了这一合伙关系，就证明了此点。<sup>②</sup> 最后，组织的分裂也有利于克服有着大量投资者的产业所固有的一些监管问题。这在1904年——那时中国第一次立法，企业可以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之前尤其重要。从1920年代开始，随着盐岩井的开发，汲卤机车的使用以及军阀势力的统一，刺激了在一个新的盐业工业家集团之下的集中，这样，组织的分裂就部分发生了逆转。可以看出，技术、法律和政治的因素，都对塑就食盐产业起着作用。

51

生产性资产的出租，起初极可能部分是由于富荣盐井的巨大生产能力所推动的。在乐山和犍为盐场，灶房几乎都是由盐井的经营者所建。因为灶房所用燃料——煤炭，市场供应充足。因此对于灶房规模的唯一限制，是相关盐井出产卤水的数量。<sup>③</sup> 任一灶房，即便是规模最大的经营者也仅有两三口锅。<sup>④</sup> 相比较而言，富荣盐场一眼黄卤井平均日产一二百担。中等的气井可以至少供应五十口锅，有的甚至多至数百口。<sup>⑤</sup> 最高产的气井不产卤水，盐业的组织结构特别受此影响。<sup>⑥</sup> 更重要的是，天

② 见第四章关于富荣食盐制造精英的讨论。

③ 尽管盐井开凿在先，但普遍的作法，是以煎烧该井的盐灶为名进行生产经营的。《四川盐政史》开列了如下盐井与其相关的盐灶联合经营的盐场：犍为、乐山、井研、彭水、开县、邓井关、奉节、大足、射蓬、简阳、南部、乐至、阆中、三台、蓬中、遂宁、绵阳、射洪。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节2，页73b，页75a—78a。

316

④ 五通桥知名的吴家的财富最早是在油井坡的林家井和灶以及龙太井及相关盐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灶煎烧两锅，林家井每月能生产90担卤水，而龙太井通常生产100担。见张端甫《犍乐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场商——吴景让堂》，48页，载《井盐史通讯》第6期，1979—1980年。

⑤ 在1989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退休盐井工人一致认为，这些井有的所产的气够煎烧五六百锅。第一章已指出，李榕《自流井记》记载，一眼极高产的气井能供应七百口锅。更咸的黑卤水意味着每担卤水更高的盐产量。见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3页，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4辑，1982年。在机车汲卤（在第七章进行讨论）之前，盐岩井的月产量不会多于此，但盐岩井33%的卤水咸度几乎是黑卤井的两倍。见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

⑥ 纯气井只能在自流井找到。一眼这样的井每天可供火圈70—400口。一眼既产气又产卤水的卤火井，低产的仅可供火圈一口，最高产的可达火圈300口。大多数出产仅够数十口火圈的气。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1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然气集中在自流井地区,直到 19 世纪末盐岩层发现之前,贡井地区一直在卤水生产中占据优势地位。

对于生产关系的形成同样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本的短缺,这鼓励了小的生产单位,甚至较大的盐业生产集团采取规避风险的行动。租金创造性地允许食盐生产商应付多变的市场需求,并允许少有资本储备的集团设灶煎盐,而不必在开凿的过程中投资。与此同时,分裂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长远看,它阻碍了资本的积累,使规模小和效率不高的生产单位长久存在。<sup>⑦</sup>最后,对于盐井和盐灶的多样需求,有益于习惯法的改进和细化,这些习惯法旨在保护 19 世纪下半叶逐渐发展而成、日益复杂的合伙关系。

## 盐井生产中的合伙制

### 盐业生产合伙契约

52 在 1904 年和 1929 年颁布公司法之前,中国商业的管理完全依赖于“行业习惯”相互作用,以及一个高度发达的书面契约传统。合伙协议建构了富荣盐业,掌控着资源分配、维护、建设和井、灶的生产管理。合伙协议得到了州县地方官和四川盐务管理者等的认可,这解释了富荣商业环境的稳定性和灵活性。<sup>⑧</sup>

合伙协议的主要功能是记录合伙人是谁以及他们对于企业最初的

---

⑦ 分裂作为近代早期中国经济中的一个普遍被总结出的现象,见曾小萍《清中期四川的租佃权:巴县田土诉讼研究》,载《亚洲研究杂志》第 45 卷第 3 期,1986 年;曾小萍《经济发展的障碍:帝制晚期四川的采掘业》,4—5 页,美国历史协会年会论文,纽约,1985 年;曾小萍《清代中国经济的结构:纪念鸦片战争 150 周年的思考》,载李侃如等编《对近代中国的观察》,纽约州阿芒克:夏普出版社,1991 年。

⑧ 国家和各种准政治机构在强化契约中的作用,见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载黄宗智、白凯编《清朝与民国时期的民法》,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 年;以及曾小萍《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产权问题》,载曾小萍、欧中坦、罗伯特·加德勒编《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17—36 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资金投入。大多数合伙协议格式，开头开列合伙人名单以及每个股东的确切股份数。对此认真考察可以看出，在许多情况下，合伙人不是单个家庭——这是中国首要的财产归属单位，而是合作集团，也就是家族以及灶和井本身。<sup>⑨</sup> 在少数契约中，对于每个合伙人的创办资本投资的描述取代了对于股份的表述，这种做法是受日益增长的内部合伙信贷重要性（后面予以论述）的影响。原始契约在企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企业身份、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规定。契约一开始就描述了该交易及其所有物，并常常还要描述现在合伙人是如何得到可以处置的生产设施的——是通过购买还是租用。若设施是租用的，那么说明租期则十分重要，这经常与合伙契约的期限相同。<sup>⑩</sup> 部分是因为合伙契约里面信息翔实，因此合伙结构上的变化、股份转让以及其他重要的新信息常常是通过原始契约附件的形式予以注明，而不是起草补充协议。<sup>⑪</sup>

几乎所有合伙协议都包括了管理的部分。管理职责的划分常常在原始合伙契约中就予以规定。有的是由一个小规模的合伙集团联合管理。<sup>⑫</sup> 有的情况是，任命被选出的一个合伙人为经理人，全面负责。<sup>⑬</sup> 然而，甚至是在 1940 年代，许多合伙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全面负责制定战略和规划。<sup>⑭</sup> 而有的只是简单地保留着替换经理人的权利——如果股东们对他表现不满意的话。<sup>⑮</sup>

管理层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处理账目。除了任命一位办公人员负

⑨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279、281 号。

⑩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269、270 号。

⑪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83、85、88、152、168、172、179 号。这些契约的时限之长可以通过下面两个附件很清楚地看出。契约第 185 是在 1896 年签约，有一个附件的时间为 1924 年。契约第 194 号，签字是在 1901 年，于 1948 年进行了修改。

⑫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269、295 号。

⑬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270、282、283 号。

⑭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278、302 号。

⑮ 同上书，契约 278 号是这类协议的典型。

53 责现金出纳账目,一位负责会计账目外,合伙契约常常详细规定了应记录的各种账目。<sup>⑮</sup> 契约强调了财务透明的重要性,要求账目每年至少要清理一次,常常是数月就清账一次。根据合伙协议的规定,送每一合伙人年度(即年结)、季度和月度(即月结)的财务报告。<sup>⑯</sup> 有些合伙契约规定拿出固定数目或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管理等运行开支。<sup>⑰</sup>

### 大关:管理组织

我们看到,在 20 世纪初出现了一种统称为“大关”的更高级的管理组织。<sup>⑱</sup> 大关是为了解决两个不相干的结构性问题。第一个是盐井见功之后凿井合伙关系要解散的这种趋势。在 20 世纪下半叶真空制盐引进之前,巨额资本要求和规模经济仅限于凿井和推卤。相比较而言,制盐过程可以小规模、高效地进行。正因如此,在盐井合伙关系中,每个合伙人或合伙人小集团都拿到该井出产的属于自己的卤或气的份额,用于煎烧自己的盐锅。随着凿井的成功,许多凿井合伙关系开始分裂,有的是与最初将投资人聚拢在一起的承首人冲突的结果,<sup>⑲</sup> 有的是因为该投资集团自身,现在成为了复杂的、多个投资单位的集合体,有着各种各样的

---

<sup>⑮</sup> 关于自贡盐井记账方法,近来一项研究指出,“这些企业使用三脚账记录商业交易,他们的现款结算使用的是四柱法。他们定期计算利润,使用先进、自创的六柱法和龙门账。他们的账目不仅显示出了基本的复式记账的簿记特点,而且提供了折旧计算的证据以及对于累积增长概念的某种认可”。见傅雷(音)等《自贡井盐账目研究》。(http://www.deakin.edu.au/wcah/papers/Fu.pdf)这些簿记方法的特点及其在中国会计史上地位的讨论,可见罗伯特·加德拉《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商业记簿方法和资本的合理化》,载《亚洲研究杂志》第 51 卷第 2 期,1992 年。

<sup>⑯</sup>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277、280、284 号。

<sup>⑰</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277、280、848 号。

<sup>⑱</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275、276、284 号。

<sup>⑲</sup> 据罗从修说,许多承首人经营他们自己的店铺和钱庄。他们的许多收入来自供给他们所经营盐井的物资和借款的浮报。这引起了一些股东的不满,一旦盐井完工,这些人常常闹“分班”,亲自管理自己的业务。见罗从修《贡井盐场的井、灶大关》,123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1990 年。

投资组合，它们对于盐井出产的使用目标并不总是一致。<sup>①</sup> 在这种情况下，大关就作为全面的管理机构，负责盐井自身的运行，监督每日生产、重要维修，照顾与饲养牛只，有关工人事宜，防火防水等安全问题。大关也起草盐井出产的卤、气分配章程，以一名常设人员维持自己的柜房运作，并作为盐井与外界的联系人。<sup>②</sup>

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合伙投资组合而出现的大关，与上面所说的大关有些不同。继源长是这种形式的大关的极好例证。它成立于1930年，负管监管双洪源所有的10眼盐井。双洪源是由陕西商人与1923年从一个更大的集团剥离出来的数家族堂所组成的合伙。在这一事例中，该大关在各个盐井的大关与双洪源的合伙人之间起协调作用，要让双洪源的每一合伙人相信得到了自己的利润份额，并防止滥用合伙的资源以谋求个人私利。

从这些简要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关的最重要作用，是对于竞争和有交叉的利益关系给予公正的裁判；有助于生产，是它进行决断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此而论，它是人们设立以应付富荣盐场由于持股合伙制增强、出现复杂监管问题的主要组织之一。的确，据一种资料记载，大关这一用词源于这样的理解：这一组织所起的作用像许多道路汇集的一个关口。<sup>③</sup> 许多大关拥有许多股东自己选出的“经理人”，他们基本上起着主管理事会的作用。大关的日常管理由给付薪水的经理及属员承担，他们或是从过去监管凿井的技术人员中，或是从有管理和技术专长的外来人员中选出。<sup>④</sup> 大关的如下职责，都强调了大关人选的技术和会计技能的重要：协调属于不同持股团体的卤和气出租给不同的盐灶；计算随着

54

① 蒲月生：《自贡瓦斯井、灶的大关》，11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90年。

② 王怀周：《自流井场大关及其职能》，113—11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90年；以及1989年5月我与王怀周的谈话。

③ 林泽渊：《我所知道的自贡井、灶大关》，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90年。

④ 王怀周：《自流井场大关及其职能》，113页；《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799号。

时间变化每股享有气和卤的数量；当盐井产量变化时调整卤气和卤气租佃数额；以及负责盐井口径的大小，输送气的设备，盐井内部结构不断变化的情况，还有盐井安全。<sup>25</sup>

大关最重要的特点，可能是它们各不相同的活动所得到资助的途径。两种方式特别流行，每一种都代表了中国企业史上的进步。一种是，设立大关的契约，为大关专门留出一些股份或一定量的气，从中所得收入用于管理开支。<sup>26</sup>另一种是，由大关管理的盐井所供应的盐灶，要每月拿出一笔钱，以支付大关的支出，作为管理的费用。<sup>27</sup>两种情况下，大关的职责是确保股东不干涉大关所负责设备的运行，特别是股东不能利用大关的资源谋取私利。与此同时，大关对股东负责，提交季度、半年度和年度财务报告；如果股东要对大关管理之下的单位做出重大决定，大关也要不定期会见股东。<sup>28</sup>大关在一个盐业企业长期存在，而企业的股份可能会频繁转手，因为大关控制着经营技术，因此它有利于那些在盐业生产鲜有经验的人，将新资金注入食盐产业。故而，大关既是盐业生产股份商业化的结果，也是股份市场成长的推动者。

## 重构合伙的契约

直到1904年中国实施第一部公司法，中国的企业才可以选择组建  
55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在1929年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然而，仅有一小部分中国企业利用了这一新的法规。<sup>29</sup>自贡企业几乎没有利用这一时机组建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在原始契约里依然保留无限的责任及分配责

<sup>25</sup> 林泽渊：《我所知道的自贡井、灶大关》，110页。

<sup>26</sup> 王怀周：《自流井场大关及其职能》，115页；罗从修：《贡井盐场的井、灶大关》，122页。

<sup>27</sup> 王怀周：《自流井场大关及其职能》，113页。

<sup>28</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284、799号；林泽渊：《我所知道的自贡井、灶大关》，110—111页。

<sup>29</sup>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理解缓慢原因的探讨，见柯伟林《没有股份制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的公司法和商业企业》，载《亚洲研究杂志》第54卷第1期，1995年。

任,最常见的是依据持股的数量。<sup>⑳</sup> 契约清楚地规定,由合伙协议所引起的金钱上的责任,包括了盐井建设创办投资以外的支出、资产的获取等等。

无限责任和商业环境的不稳定——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这一问题,促使人们密切关注保持原始投资集团的统一。一些契约规定,禁止外来人员接手企业,任何想要处理股份的合伙人必须首先将这些股份提供给他股伙。<sup>㉑</sup> 在合伙人数很少的情况下,防止合伙人从企业中随意撤出也至关重要。至少有一份现存的契约要求,合伙人只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能离开,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保甲<sup>㉒</sup>头人还必须具结,以证明该合伙人声明的真实性。<sup>㉓</sup> 一些契约努力避免将一个合伙人逐出的情况发生,特别规定,只有创办资本切实不足的情况下,才允许签约借款。<sup>㉔</sup>

到 20 世纪,钱庄业和各类私人贷款机构的发展,拓宽了食盐制造企业贷款的选择。<sup>㉕</sup> 然而,诉讼案件显示,即便是在 1920 年代,大的合伙还是倾向于从一些小的贷款人那里借钱。前面提到过的陕西商人双洪源合伙关系由于激烈争吵而散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了盐场信贷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许多管理层即便在财务吃紧的情况下还是不愿意走出合伙关系的原因。<sup>㉖</sup>

双洪源合伙关系现存最早契约是 1869 年签订的,考虑到陕西商人

⑳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273、277 号。

㉑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272、277 号。

㉒ 一种每十个家庭组织在一起相互监督的地方社会控制制度。

㉓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295 号。

㉔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282、848 号。

㉕ 见第十章。

㉖ 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798—830 号,以及罗成基《陕商在自贡盐厂的起落》,载彭泽益、王仁远、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编《自贡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503 页。从代表各家族堂各房签名的当事人的名字来看,合伙人不仅是陕西商人,而且都是同一刘姓的后人。

在自流井的情况,这种合伙关系的存在可能更早。1911年之前,这一合伙关系举债重重,为了偿还他们的债权人,它的六个家族堂重新组合为三个子合伙关系。它们总的债务,包括欠账和借贷,约41803两,略高于凿一眼盐岩井的平均支出。然而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数字是由94笔借贷款项组成的,最大的一笔5642两,最小的一笔只有6两。债权人是由个人、家族、其他企业,甚至还有火神会这样的当地结拜组织等组成的;建立火神会起初是为了祭祀保护气井和盐灶的火神。

56 借贷不难得到。的确,各股伙发现以企业作抵押借贷小额资金是件极容易的事。然而,当该偿付这一大笔债务时,在缺乏公共信贷制度的情况下,企业被迫只能依靠股东私人弄钱。还有一种办法,是在一个私人债团的帮助下,求助于债务的合并,这的确在20世纪初帮助较大规模的盐业企业摆脱了困境。<sup>⑦</sup> 我们还没有任何记载这些债团成立的契约,但它们似乎主要是由走到一起的商人和银行家组成,为了向小工业家们提供私人的中期信贷而结成合伙关系。向债团借款,意味着放弃自己企业的部分或全部管理权,尤其是当企业不能偿还约定的债务时。在通过解散原始合伙关系、成功避免破产后,双洪源的各组成部分,将全部资产交付给一个大关,其章程明确禁止各合伙人以企业资产作为抵押从外面借款。<sup>⑧</sup>

双洪源所实施的合伙分裂的替代办法,是在合伙关系内部进行资本重组。这事实上等同于合伙关系的重组,在承认资本贡献的变化基础之上,重新分配权利和责任。虽然如此,但由于避免了企业破产,有形资产得以保留不动,与供应商的联系、管理技能、信誉和市场地位都得以保持。

合伙关系的重建似乎遵循着两种模式。我们拥有早至1860年代有人正式出钱使其他合伙人出让部分股份的实例,因为这些人拿不出成功

---

<sup>⑦</sup> 见第八章。

<sup>⑧</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799号,时间是1930年。

开凿一眼盐井所要求的追加资本。例如，1864年六位投资者形成合伙，在属于王余桔的地间凿铤金海井，1889年凿井告停，合伙人之一的周翔记，出钱买下其他股伙的三分之二股份从而继续凿井。<sup>③</sup> 这里所提到的安排与第二章所考察的事例类似，在那里，合伙作为整体担负了有拖欠的股东的资金，并在盐井见功后，依据实际投资重新分配股份。事实上，周翔记所拿出的资金是用盐井股份作担保所得到的一笔借款。其他合伙人可以通过偿还周翔记投入盐井的资金，购回被剥夺的股份。

我们看到，到20世纪，合伙内部信贷体系的多样性，造成了某些成员的离去，而企业的管理层独立着，保持合伙整体不变。1944年，六年前建立大发灶的原始合伙中的六位，与他人分道扬镳，以德记大发灶为名，开始了他们自己的食盐煎烧生意。他们离开的目的，似乎意在增加他们控制的那部分生意的资本。然而，掌控盐灶的管理机构大关依然运作，新近组建的这一更大盐灶分支继续遵循着原有的合伙规定。<sup>④</sup> 同盛富同盐灶的三位合伙人之间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用了三年时间，这些人从不同气井承租或是购买了10股，可烧火圈七口。1945年他们决定形成两个分离的股东集团，每个管理原有合伙中的一半股份。然而，两个集团间的合作依然紧密。大关还继续发挥作用，两边都同意若有一边火力不均，可以调配燃气。<sup>⑤</sup>

我们仅能猜测这种安排的原因。最可能是合伙中的一个或更多成员，希望扩大生意或改进设施，而其他入却不能拿出对他们股份所核定的现金。股东们没有将生意分裂或是支持所提议的投资计划，而是设计出前此所描述的一些学者称之为“转顶”的做法。<sup>⑥</sup> 他们的目的，不是破坏合伙，而是要在合伙人的财力不均、弱势的合伙人或不愿意出售股份

<sup>③</sup> 同上书，契约第730号。

<sup>④</sup> 同上书，契约第277、292号。也同上书，256页。

<sup>⑤</sup> 同上书，契约第297号。

<sup>⑥</sup> 同上书，契约第256号。

或不能找到买家一次性购买他们股份的情况下保留它。分裂就这样容许了生产的扩张,防止管理层解散。

58 在产的盐井和盐灶资本重组问题的另一种常见解决方法是,在一定的期限内引入外来的投资者。在划定清楚这些合伙关系的情况下,原所有人仍然是管理和利润分红层中起积极作用的成员。这种安排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是李子章与李玉华所签订的契约。李子章需要资金拓展业务,因此邀请李玉华入伙,草签两年期限。李玉华拿出了一笔押金即“信用钱”100 000 元。接下来,两位合伙人平等地承担建设和其他开支,利润和损失也如此分配。另外,只要契约有效,原所有人和投资者就共同管理生意的各个方面。一旦期满,李子章要返还李玉华的信用钱,不用付息,他们的关系也宣告结束。然而,如果双方愿意,签订新的协议,就可以重新开始他们的合伙关系。<sup>④③</sup>

张星华、张静中和崔雨脂之间也有类似的安排。张氏兄弟拥有一眼气井的三分之二股份,该气井可烧火圈七口。过去,这些气都是租给他人,但 1942 年他们决定经营自己的盐灶。他们邀请崔雨脂加盟,初始投资 50 000 元,张氏兄弟则出天然气。在三年契约期间,崔雨脂将得到全部利润的 40%。然而,张氏兄弟要从他们的利润中偿还崔雨脂的资本投资,也要偿还先前的债务。管理也基本上交给了崔雨脂所任命的人员,尽管张氏兄弟掌管着盐灶账目,并有权派人监管盐灶的活动。<sup>④④</sup>《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282 号中也可找到类似的做法,燃煤的灶户没有经费购买开工所需的卤水和煤,因此才引入投资者。同样的,大部分经费由投资者担负,他们负责盐灶的经营。但这一事例中,则是双方均分利润。

在上述每个事例中,生产资料的所有人得到了一笔资金的注入,或

---

<sup>④③</sup> 同上书,契约第 295 号。

<sup>④④</sup> 同上书,契约第 848 号。



为拓展业务或是偿付以前的债务。作为回报，投资者得到了企业的部分利润并可以影响企业的运营。这种契约的签订是应对短期财务的需求，与求助于高利贷和钱庄相比，这可以使盐业生产单位的原始合伙人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更长的借贷期限。投资者中许多人此前没有涉足盐业，因此这是一种扩大经费来源领域的方法，<sup>④</sup>而且，以利润分层的方式获得利息，可以视作一种防止通货膨胀的方法，因为利润将与市场挂钩，而利息仍然与初始贷款数目挂钩。

## 生产资料的分配与再分配

### 四川次要盐场中以盐灶为基础的管理

食盐生产合伙关系一旦形成，就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为他们的盐灶寻找卤和气。尽管当地的习惯对于食盐生产体制的确立起着重要作用，但比较整个四川的农业、采矿和食盐生产，可以证实技术对于近代早期的产权关系演进的重要性。在发达的制盐中心自流井和贡井，股份的商业化，这一在晚清中国许多地区都有记载的现象，在组织生产以及应对资本缺乏问题上起着主导作用。盐井股份的交易与成熟的卤、气租佃制度一道，保证了人们可以灵活地得到卤、气。同时，它也激励产业内部的分裂，常常抑制了资本的扩大。

59

四川食盐生产通过四种方式可以得到卤和气：凿井或是购买整个盐井；直接购买卤水；购买盐井的股份；以及租佃一眼井所产的部分卤或气。大部分四川盐井生产力低下，这鼓励了以个体盐灶为中心的组织生产。为了保证有充足可靠的卤水来源，每个灶都努力控制的盐井数目，从10眼到可能多达100眼。而燃料则是直接从附近的煤矿购买，因为天然气作为燃料，在自贡以外的四川地区不甚重要。主要的投资单位是

---

<sup>④</sup> 同上书，253页。

盐灶,这反过来控制着盐井,这种生产体系在业内叫做“异灶同井”。<sup>④⑤</sup>这在地方上有多种变化形式,尤其是在小的盐场。其中最有趣的形式是奉节所流行的:盐井中的卤水是公共产品,投资的目标是盐灶。那里产量低下且随季节变化,抑制了产业的大量资本投资。

从现存富荣以外盐场的少量契约中,还不可能断言契约关系的长期走向。然而,有一些情况是清楚的。首先,在次要的盐场,一揽子出售盐井、盐灶、土地和设备的情况似乎很普遍。<sup>④⑦</sup>对于井基的处置与巴县山区对于煤矿的基址处置大致相同。<sup>④⑧</sup>盐井与土地自身常常被分开处置。购买者只是得到田面权。一些买卖契约规定,在盐井枯竭后,要返还土地,而有的土地出售有一定的时限,通常是一代人的时间,例如乐山的一份契约有效期是40年。地主与土地保持着某种联系,这进一步使这些土地有别于绝卖。一些契约中,地主要求用食盐偿付租金。有一些则规定,如果另行凿井,就要支付额外的费用。<sup>④⑨</sup>在那些天然盐泉的盐场比如云阳和大宁,盐井极少,并且盐井也从不买卖。如果地主不想自己煎盐,就会彻底出售卤水或出租汲卤权。

在川北和川东,甚至包括高度发达的乐山和犍为盐场的一些井户,租佃盐井很常见。从现存的租佃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是租佃整个盐井,租期短的一年,长的可达20年。许多契约提供了家庭一揽子租佃数眼盐井和设备的事例,这揭示出,在这些地区凿井容易、盐井的低产量并且使用期限有限。大多数契约要求一笔押租,以及用盐和现金偿付的年租金,当然也可以找到各种变化形式。可以看出,用盐支付租金在民国时期日渐减少,尽管到1940年代,异常飚升的通货膨胀致使许多契约回到了实物租金或至少用盐以及以市场的换算率折成现金作为租金。

<sup>④⑤</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2,页73b。

<sup>④⑦</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23—225页。

<sup>④⑧</sup> 讨论巴县采掘业,见曾小萍《经济发展的障碍:帝制晚期四川的采掘业》。

<sup>④⑨</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22—223页。

地主也继续要求拥有食盐生产的许多副产品，特别是一定比例的煎盐后留下的煤灰和推卤的牛只粪便。两样都是极有价值的肥料，这也部分证实了我们的印象：富荣以外的大多数卤水井地主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农业。一篇广被征引的关于五通桥盐场腐败的文章记述，1943年犍为有推卤的牛只6000多条，牛粪等产生的价值超过了10万元，70%以上归出租井基的地主所有。<sup>⑤</sup>

由所有人来经营是首选，但当有些井户遇到财务困难无法生产食盐，或盐井产量不足，无法确保建造自己的盐灶时，还是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租佃。也可能有大生产商强迫小生产商出售或出租盐井的竞争，这也促成了我们看到的云阳和大宁等地区卤水的日益集中。<sup>⑥</sup>然而，大多数租佃的盐井可能落入“帮井”的境地，为那些自己盐井不能出产所需的足够卤水的灶户所拥有。因此，它们在盐场中起着辅助的作用。

### 富荣与盐业股份的出售

富荣盐场的环境与四川其他盐场迥异。在富荣，盐井有非凡的生产能力，一眼井能够供应多个盐灶。富荣普遍被人说成是依据“以井统灶”的体系进行运作的，与四川其他地方有别，但事实上，卤和气的管理和分配极其分散，这要求有十分复杂的买卖和租佃制度。

61

富荣盐场与上述盐场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盐井几乎从不租佃或是整体出售。合伙制度使得盐井开发商能够聚拢足够的凿井资本，这也决定了卤和气可以输送给那些不拥有自己盐井的盐灶经营者。撇开有时特殊的气租佃，我们可以说，通过租佃或是购买盐井股份几乎总是可以得到盐井的出产。因为大多数盐井股份是由小集团掌握着，故而租佃或购买卤水的数量也总是很小。因此，对于召集组成合伙关系以煎盐的

<sup>⑤</sup> 引自前揭书，123—124页。原文见高明安《五通桥盐场的封建陋规》，载《五通桥盐业史料选辑》第2辑（油印本）。

<sup>⑥</sup> 刘贞安纂：《云阳县志》，卷10，盐法，1935年。

人来说,他们的职责之一,常常是从各种各样的所有人那里取得盐井股份,这是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sup>⑤2</sup>

购买股份,是将煎卤和制盐所需的生产性资源集中在一起的最简便方法。购买股份契约的用词,与那些出售土地的没有什么不同。最重要的,是说明股份出售数目和盐井的配套设施。<sup>⑤3</sup> 股份的新所有人将拥有并仅对股份赋予他的那部分设施负责,比如汲卤设备、槎桶、出入道路、牛棚及柜房。因为缺乏可靠的所有权登记制度,所以契约不仅极其细致地规定了正在转让的财产权利,而且也确定随后的所有权或有争议的地界的责任,以及声明“卖主”对于交易中正在转让的财产,已无任何权利。<sup>⑤4</sup> 这些条款,常常采用的是购买者免责声明的形式,它历来得到清朝和民国法庭的承认。

62 股份契约是从人们熟悉的土地买卖契约中派生出来的,这可以通过股份绝卖各签约方的关切所在,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四川,如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土地买卖合同很常见,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出卖即“活契”,<sup>⑤5</sup>也就是长期租佃。<sup>⑤6</sup> 然而,到晚清,富荣的盐井股份购买协议无一例外都是绝卖。购买者尽其所能,要确保从前的股东以后不会提出要求。在开列盐井所有的设备和建筑之后,加上诸如“发无提留”、“寸土寸木寸竹寸石片瓦并无提留”这类形象的用语,就是为了在以后的诉讼中向法官证

⑤2 许多现存的合伙契约的开头部分是划分他们已经设法租佃的盐井股份,他们的生产就建立在此之上。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269、289、297、838、848 号。合伙人出租整个盐井的例子很少见,但我们确实有几个这样的事例。可见契约第 270、283、300 号。契约 159 和 604 号是更少见的一揽子出售一眼井的全部股份。

⑤3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145、150、162、180、191 号。

⑤4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151、152、164、167、178、182、184、192、197 号。

⑤5 罗友枝认为,这种契约给予原始所有人以赎回土地或是日后要求额外补偿的权利。见罗友枝《明清土地产权》(未刊稿),24—25 页,1985 年。也见井仁田陞《中国法制史:土地与交易法》,381—382 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0 年。

⑤6 关于四川其他地区盐井的长篇讨论,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19—230 页,这是依据稀见地方档案的研究。

明，所有人不再拥有任何东西。<sup>⑤7</sup> 在这方面，同等重要的是，包含放弃任何“挂红”的权利，挂红即日后对于放弃自己股份一方的追加补偿。<sup>⑤8</sup> 在农业领域，其中的“活契”，因土地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值，从而要对原来的地主进行补偿。若土地的卖主不行使赎回的权利，会要求额外的支付。<sup>⑤9</sup> 同样的，从前的所有人在盐井增产后，有时会提出“挂红”的要求，作为他们当初出售时未能以该井全部生产能力进行索要的补偿。最终，为了进一步表述这是绝卖的事实，一些契约增添了这样的条款：当盐井利润开始增加时，卖主永远不得赎回他的股份——尽管毋庸置疑一些人希望能够赎回。<sup>⑥0</sup>

在像富荣这样的地区，盐业生产对于当地经济来说特别重要。盐业股份对于它们的所有人的意义，差不多如同在中国其他地区拥有土地财产一样。<sup>⑥1</sup> 的确，在家庭和家族的投资组合中股份所起的作用，推翻了认为土地作为最安全财富存储形式的中国人“文化偏好”的诸种理论。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家族针对债权人对于盐业财产的索求而出卖农业用地的情况并不罕见。不过，盐井和其他盐场资产的股份，要遵循同样的习惯：努力将财产留在亲属集团内部。许多契约规定，在允许公开交易之前，股份应首先提供给卖主的族人。<sup>⑥2</sup> 事实上，这同那些认可在盐井中要优先提供其他合伙人购买的规定一样的普遍。<sup>⑥3</sup>

<sup>⑤7</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147、150、152、167、182、185、191 号。

<sup>⑤8</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145、148、150、152、181、187、196 号。

<sup>⑤9</sup> 清政府试图通过对赎回土地的期限做出限定，以及通过要求土地的卖主在他们的契约中清楚地开列这一出售是绝卖，来控制“活契”及这种出售经常引起的争执。关于实施“活契”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的讨论，见步德茂《诉讼、合法性和致命暴力》，载曾小萍、欧中坦、罗伯特·加德拉编《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 年），94—95、104—106 页。

<sup>⑥0</sup>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171、189、190 号。

<sup>⑥1</sup> 整个四川都可以找到对于井基类此的态度。1935 年版的《云阳县志》记载：“购卤股者胜于买田，以责息速且厚也。”该县志指出，盐井的租用和购买，依据的是盐井财产的数量、规模，这使井基成为一种类似于农业用地的稳定的财产投资。见刘贞安纂《云阳县志》，卷 10，盐法。

<sup>⑥2</sup>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168、181、186、189、197 号。

<sup>⑥3</sup> 这些记载几乎总是提到优先提供给亲戚与合伙人。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169、191、192 号。我们手中仅有一份契约只提到了合伙人，见契约第 188 号。

对于出售盐业股份原因的考察也揭示出,人们视它为有价值的资产,极不情愿出售。卖主常常在契约中解释他们出售的决定,提醒感兴趣的各方,他们实在别无选择。在 56 份现有的售卖契约中,有 17 份是为还债而出售股份,3 份说股东是因资金用尽,无法完成盐井的最后凿锉,7 份是说尽管股东不负债,却急需钱用。这样一来,所有买卖中超过 48% 都是因为“非卖不可”的原因。若去除那些没有列出股份出售原因的契约,这一比例会更高,达到了 56%。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2 份契约中股东称意欲别图,还有一份是股东感到盐井离他家太远无法照料,另有 3 份是利润微薄和市场不景气迫使投资者出售股份。

尽管我们在四川能找到与此类似的出售土地的做法,但盐井合伙不同寻常的本质,确实造成了盐井股份交易中的复杂情况。首先是源自投资者与地主股份的产权不同,这取决于原始凿井协议是固定期限还是永久租佃。前一种情况下,投资者的股份最终将转到地主手中,股份的价值极大地受租佃所剩年份的影响。同样地,少数固定期限盐井的地主股份将有一天会比现在增值一两倍。另一方面,不论哪种盐井,投资者股份会受到盐井上下节交易的极大影响。在这种交易中,地主股份并不总是贬值,但买主确实要确认分家不会导致他正在商谈的股权削弱。这是地主股份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该地区的许多原始地主都是合作团体。

许多在产的盐井已租佃给了从事盐业生产的集团或个人。盐业租户在租期内似乎享有绝对的安全,而不必像购买谈判中农业用地上的佃户一样常常会被人从土地上赶走。毫无疑问,经营和维护井或灶的巨大投资,可以解释盐场这种租户权利的改进。涉及已经租佃给他人的盐井的买卖契约,必须等到租户租佃期满。<sup>⑥4</sup> 然而,新的所有人将拥有他的股

---

<sup>⑥4</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187 号。当股份被转租时,要对承租人予以保护,这是盐场厂规的一部分,《四川盐政史》对气井出租的讨论也证实了这一点,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10,节 3,页 74a。

份应得的租金。

当然，我们的契约样本太少，对亲属集团之外的股份出售频繁程度，还不得出任何的结论。同样的，对于有多少股份反复出卖，我们也一无所知。不过，人们对于土地的态度与对于盐井股份态度的相似性，意味着购买股份作为一种机制，从未能完全满足那些实际食盐制造中的生产要素之间再分配的需要。这也是我们看到盐井产品的租佃和盐井股份交易如此活跃的部分原因。

### 卤水的租佃

直接购买和租佃盐井股份，都在卤水的再分配中发挥着作用。直接购买或是通过中间人购买的做法，在贡井的黄卤、黑卤井和自流井的气灶间的卤水交易中居主导地位。<sup>65</sup> 然而，对于那些靠近卤水资源的经营盐灶之人，特别是不要求占有大量、独立的盐井资产的中小规模的生产商来说，他们更愿意选择某种形式的盐井租佃协议。

64

就卤水而言，最常见的方法是租佃定期盐井股份。<sup>66</sup> 富荣以外的绝大多数租佃都要求押租，有的要求支付实物。在富荣，我们看到一种新的适应盐卤井高利润和高需求的特别生意交易制度。除了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极高通货膨胀的很短时期外，总是以现金支付租金。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租期为6—12年。与此同时，由于有了不同寻常的要求，押租的做法也废除了：要提前支付整个租金或在签订契约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支付租金。<sup>67</sup>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做法的产生，是因为股东希望得到资金，以购买土地，但很显然，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20世

<sup>65</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3，页74a。第四章我们考察卤业时还会再谈此问题。

<sup>66</sup> 租佃契约，像买卖契约一样，要写明正在转让的股份数目以及这些股份部分拥有的所有设备的确切状况。这对于地主尤为重要，因为他希望得到某种保证：盐井厂要以出租时的原状交还给他。

<sup>67</sup>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323、325、363号。

纪初,数个大的富荣食盐生产家族就利用这种做法,出租他们相当庞大的设施,作为偿付他们不断增多的债务的一种手段。<sup>65</sup>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租佃允许资本有限的人们进入盐业生产领域,而不用承担凿井的风险与开支。许多盐井股份租佃的当事人都是批发商或商号,以及商业领域的所有人,而非在富荣和四川其他地方的食盐生产领域的所有人。租佃可以立即为股东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如同我们在后面章节看到的,一些股东利用这些手法,使自己的财产多样化,扩展进入相关商业领域,增加盐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管理。<sup>66</sup>

卤水股份租佃带来的最大问题,来自维持盐井生产的职责分配及租期内盐井的产量变化。大多数契约规定,不论产量升与降,双方都不得对另一方有任何的要求。<sup>67</sup> 然而,《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的编者已指出,许多地主都在他们的租佃契约中包括了如果盐井产量下降,鼓励承租人再行淘办的条款。这些激励包括:租佃期延长且免收租金,将租期内所提高的产量让与承租人。<sup>68</sup> 盐井设备和盐井自身的修护一般都由地主承担,他们会在不长的时间内收回对这些财产的控制权。但实际上,地主极少为此拿出现金,而是由承租人进行必要的维修,这会从租金扣除或是以延长租期的形式予以补偿。<sup>69</sup> 尽管这一做法有利于承租人的利益,但对于新设备建设来说,此种做法可能不利于盐井经营的资本的提升。因为,租佃到期后,除了蒸汽动力机车等开销极

<sup>65</sup> 见第八章。

<sup>66</sup> 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四大产盐家族的历史,它们的早期历史在第四章讨论。

<sup>67</sup>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35、88、112、385 号。

<sup>68</sup> 应对此不同方法的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415、443、446、449、468、474 号。这些情况不适用于气井,气井生产火圈数的增加通常伴有租金的提高。

<sup>69</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392、443、454 号。各种变化形式也能见到,例如契约 451 号记载,地主和承租人要商量所进行的任何维修,剥夺了承租人单方面决定应支出多少费用的权利。还有一些契约,地主同意负责棚崩即盐井溃塌的维修,而承租人完全负责木竹浸漏。同上书,136 页。



大的机械外，大多数设备、设施都要交给地主。<sup>⑦</sup>

当有很多人对于盐井的产量有着各种不同的要求，并且分别承担盐井的维修责任时，盐井股份的租佃契约显示不出盐井是如何运作和维修的。在任何一眼盐井，都有地主股份和投资者股份的持有者，以及短期租佃其中任一种股份之人。不大可能每一种人都依据自己的股份进行汲卤，特别是有一些人每月之中才占有了数分钟的汲卤时间。事实上，每眼井都势必要有某种统一的管理形式。这一管理机构——在 20 世纪表现为“大关”（前面已探讨过）这一形式——依据它们各自的契约条款，在各股份中间——租佃的或自有的——分配卤水以及估算盐井所发生的各种费用。

### 气的租佃

富荣的一些盐灶用煤作燃料，但到 20 世纪初，此种炭火灶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食盐生产商中的影响力都在下降。我们将会看到，在 1920 年代中期和 1930 年代初所谓的食盐供应过剩时期，关闭了许多炭火盐灶，政府法令严格限制它们的数量。故而，对于气的掌控在富荣盐场成为一种主要的收入和权势来源，对于它们的分配的做法要远比卤水买卖和租佃复杂。

与卤水不同，气从不直接销售给煎盐的灶房，而必须从气井租用。在富荣，气的基本单位是“火圈”。这一使用不当的词汇也扩展到了气的来源，一般称为“火井”。一口火圈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煎烧一锅卤水，生成精制食盐所需的气的数量（见图片 3.1）。然而，这一定义所包含的气井生产的统一性，在现实的盐业生产中是找不到的。一眼井所出产的气的火圈数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在租佃期内气的火力减弱的风险总是存在。结果，在四川，租佃气的方法不断改进和变化，一直持续至中华人民

<sup>⑦</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343、474、477 号。在最后一个契约中，地主承诺，若设备、设施是在租期结束前两年之内添加的，可以援手协助。

民国成立。

66



图片 3.1 自贡某盐灶的煎锅

摄影：曾小萍。

现存契约中所见最早、最简单的租气方法，是在一定期限内租佃一定的火圈数。《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375 号，时间是 1791 年，就是一份以总租金 1200 两白银租气四口火圈、为期五年的契约。同卤水租佃一样，一般情况下，气的租金一部分须提前支付，其余的在租佃开始后一年内支付。<sup>⑦④</sup> 这种形式契约的一个变形，是租佃气井的一些股份。这种契约有一些规定了股份应得的火圈数，而有的只是指出承租人将依据所租佃股份得到火圈数。后一种形式的契约更具灵活性，很好地满足了气井生产的升降变化，而无需各有关当事人进一步的协商。<sup>⑦⑤</sup> 不过，到清末，富荣盐场的习惯做法之一，是每口火圈每月收取五两白银。<sup>⑦⑥</sup>

<sup>⑦④</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377、380、385 号。这类契约似乎没有包括押租。

<sup>⑦⑤</sup> 同上书，契约第 341 号。

<sup>⑦⑥</sup> 同上书，151 页。

所有这些方法都未能将火力差异考虑在内。简单地说，一眼井一口火圈的气可能要用 24 小时煎烧一锅卤水，而另一井的只用 12 小时就煎烧同样的一锅卤水，这与今天燃气灶火力或大或小的情况差不多。为了弥补这一点，许多气的租佃在民国时期开始以火圈的生产能力测算为基础。一些事例中，我们看到是以 24 小时之内一口火圈气所能煎烧的卤水量为基础。<sup>⑦</sup> 因为卤水自身咸度不同，因此这种生产能力的测算也有缺点。一些盐灶发明了更为精确的测算方法，以从既定气井租佃的气所实际生产的精制食盐数量为基础。<sup>⑧</sup> 极少数契约甚至开始对测算生产能力的卤水种类进行规定。<sup>⑨</sup> 租金的多变，意味着不能够一次性地提前付清。到 1940 年代，引入了一种更为先进的租金形式：承租人为每口火圈的气支付押租，而每月租金则是以所用气出产盐的官方定价的 15% 支付。<sup>⑩</sup> 这种方式考虑到了气的质量、生产能力以及通货膨胀，平衡了气井股东和租佃气的灶户的利益。<sup>⑪</sup>

如同卤水租约一样，在开发气井与那些租佃它们产品的人之间，力量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气的租佃契约中详列所有的设备名目，承租人所做的任何维修或是为廊厂添置设备，都会得到延长租佃期的补偿。<sup>⑫</sup> 然而对于气井资源的处置，气井的开发商保留有相当大的权力。此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地皮火”的做法，也就是建造灶房用地的租金。地皮火可以付给土地的原始主人，或是地主所属的气井股份的所有人集

<sup>⑦</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482 号。荣和灶使用泰生井的气煎卤，同意每担卤水支付 125 文。

<sup>⑧</sup> 可以向灶房所使用的每担卤水或生产出的每包食盐征收固定的租金，或租金的征收以每月生产的盐斤数为基础上浮浮动。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486、497、518、520 号。

<sup>⑨</sup> 同上书，165 页。在民国时期建立了官方的卤水咸度标准，情况变得简单多了。

<sup>⑩</sup> 建立了一个政府食盐采购机构后，才实施了这一做法。该机构固定盐价，分配在抗战期间生产的全部食盐。

<sup>⑪</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156 页。该选辑收录了一份这种形式的契约，见契约第 518 号，其他的是编者在自贡市档案馆查阅的。

<sup>⑫</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 366、379、412 号。

团。地皮火非常高,达到盐灶所用气的10%—20%。<sup>⑤⑥</sup> 以上的任一种情况,在气井枯竭时,建造容纳盐灶和储藏盐卤的所有设施都归地主所有。

小部分的气井是整体出租,但大多数,像卤井一样分成若干部分出租给数目众多的不同的盐灶合伙人。海生—泰生—兴隆井的股东所签订的契约提供了一个例证:该井将气出租给许多不同的盐灶,有着不同的租期。该井从开凿到投产花费了25年的时间,上述名字的变化,反映的是该井需求新的资本注入的结果。然而,据1916年编纂的一部盐场社会地理学作品记载,到民国初期,该井生产火圈260口,都被它的众多股东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外租。<sup>⑤⑦</sup>

1941年李雪樵和李云桥租佃了一眼气井的4股,能生产12口火圈的气,他们为每口火圈支付了4万元租金,共计16万元。3年后该井的生产能力提高,他们的股份使得他们增加了6口火圈,但他们不必付任何额外的租金。<sup>⑤⑧</sup>

蔡普权和胡英士在1938年有着类似的做法。两人租佃了一股,得到了8口火圈。租期是13年半,租金是7500元。<sup>⑤⑨</sup> 1939年,蔡普权和李续白所经营的晋丰灶,租佃了该井的另外一股时,他们的租金依据每月所能煎制的食盐包数计算。<sup>⑤⑩</sup> 该灶所签订的更早一份契约,时间是1920年,规定了支付一笔1300两的押租,租金是煎制卤水每担交铜钱135文。还是这眼井,开辟了从最后销售盐价的利润中给予地主一定百分比这样契约的先河,这在前面已经提及。当气井原始承租

<sup>⑤③</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1,页70a,给地皮火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一些气的承租人也从地主那里得到他们的全部或一些盐锅。锅租是与租气费用分别计算的;地主为了保护他自己在盐锅的投资,就要精确测量盐锅的规格,以保证在租约期满后归还地主时与租约开始时一样。

<sup>⑤④</sup>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51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

<sup>⑤⑤</sup> 自贡档案馆8-1-728-103,引自《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154页。

<sup>⑤⑥</sup> 同上书,契约第413号。

<sup>⑤⑦</sup> 同上书,契约第486号。

人将火圈进行转租，以及一个灶房使用数家气井的气时，情况会更加复杂。

盐场厂规规定，不论火力增与减，双方都不能对另一方提出任何的要求。<sup>⑧</sup>但实际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随着开采时间的推移，气井中的气的火力会减弱，因此对承租人的利益要做些迁让。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增加一些不收租金的火圈数，使盐灶恢复到最初的生产能力。<sup>⑨</sup>有的气井开发商和他们的承租人同意减少租金，或是通过延期租佃时间作为补偿。<sup>⑩</sup>更为重要的是有些事例：气井的开发商采取措施，通过进一步凿铍气井，或是激励承租人予以实施，以达到原来的生产能力。激励的措施多种多样，包括承租人的投资所带来的增产部分免除租金，或是规定可以提高租金，但租期结束时，承租人保留他对气井所做的额外的投入。<sup>⑪</sup>

## 卤、气利益相关者分享利润

凿井和分配出产的卤和气，只是食盐生产的第一步。自贡的大多数居民，常常以小数量股份的形式投资于这一生产阶段。也是在此生产阶段，给盐场带来了最初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我们在第四章将看到，允许少数自贡精英利用未分配的利润，开发高利润的煎卤盐灶，以及在整

69

个西南和华中的大多数地区营销食盐的批发商号。也正是较早进入这一生产阶段，允许最富有的投资者，发展出纵向与横向一体化的企业，将食盐生意的所有方面聚合于一个管理机构之下。

现存的契约，仅仅是用来决定股权出售或是租佃所带能来的收益的。考虑到在单个交易中可能的变化形式，从契约规定的时间长度到有

<sup>⑧</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章10，节3，页73b—29a。

<sup>⑨</sup>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366、380号。

<sup>⑩</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377号。

<sup>⑪</sup> 事例同上书，契约第415、429、430、485号。

关股份的数目、盐井的生产能力,以及卤水咸度或是气的火力,因此,要比较每股的收益是很困难的,这不足为怪。税收、生产条件、市场准入以及盐卤和气的相对供应条件,这些随着时间变化,也影响井的股份价值。遗憾的是,现存的少数账簿和岩口簿等并没有提供计算股份可能的平均收益这样的信息。因此任何凿井和股权的获利分析都只能是粗略估算。

这种估算最直接的数据来自上面提到的 1916 年樵甫所写的有关自流井的社会地理学著作。它提供了辛亥革命后自流井各个方面的概况。我们在第十章将看到,这是一段市场开放的时期,与 1825—1875 年间第一次繁荣发展的情况类似。表 3.1 概括了樵甫所记载的每天生产超过 100 担卤水的盐井的平均生产成本。

表 3.1 1916 年前后自流井一眼日产百担卤水盐井的主要月均支出

投入	铜钱(串)*
牛只喂养	1 903
绳	302
竹	1 224
麻	1 536
劳力	320
牛只看病	30
杂费	66
总计	5 381

\* 竹和麻的价格由银转换为钱,是根据樵甫所记载的 1916 年自流井 1 : 0.42 的钱(串)与银的比率。

资料来源: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44 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 年。

樵甫记载,当时一担未处理的高咸度的黑卤平均价格是 0.47 两。在 1900 年代初,赢利的盐井每天要生产卤水 100—300 担。依照每串钱合 0.42 两白银的换算率,可得到一眼黑卤井每月的大致净收入。(见表 3.2)

表 3.2 自流井卤井每月净收益

每担卤水均价 <sup>a</sup>	0.47 两
月均产量 <sup>b*</sup>	4 050 担
月均收入(a * b)	1 903 两
月均生产支出 <sup>c†</sup>	1 294 两
月均净收入(b-c)	609 两
年均净收入	7 308 两

\* 假设每月生产 27 天,每天 150 担。

† 根据表 3.1 总数转换成白银。

资料来源:樵甫:《自流井(第一集)》,79 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 年;和表 3.1。

1919 年出版的官方材料汇编《川盐纪要》,估计当时的凿井费用,中等深度的需三万两,最深的黑卤井需四五万两。<sup>②</sup> 以此计算,仅一眼成功生产卤水的盐井,要花费四到七年的时间才可以收回开凿成本。从那时起,要看该井是分 24 股还是 30 股(樵甫在他的计算中没有做此区分),每股净收益可以高达每年 240 两。当然,这样的计算没有考虑同一股东可能在其他一些没有成功的盐井投资的损失。我们没有关于个体投资者充分的连续性数据,不清楚有多少未成功开凿的盐井和多少盐井在开凿后很快就停产,这些都会是盐井开发中的实在开支。樵甫指出,在自流井和贡井盐场有数以千计的井架,在他写作时至少有 1 250 座正在凿铤。<sup>③</sup> 19 世纪末,盐井股份的交易特别抢手,甚至没有完工的盐井的股份每股价格高达 50 两。<sup>④</sup>

70

如果足够幸运,在气井或卤和气井进行了股份投资,那么获利甚至可能比卤井还要多。大多数的气井坐落在贡井盐场。樵甫记载,这样的气井出产的每口火圈气将以一年约 100 两出租给灶房。自流井的气较

② 林振翰:《川盐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年),247 页。还不清楚这是否包括建设盐井、天车、柜房等设施的开支。它不包括建设灶房的开支,因为灶房通常是独立的企业。

③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43 页。

④ 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144—164 号。值得注意的是,要为那些永久持有而不是与地主签约短期持有的盐井股份支付更高的价格。

321

71 弱,每口火圈气每年租金约五六两。<sup>⑤</sup> 据 1916 年的官方记载,富荣正在煎盐的有 9 416 口大锅、913 口小锅。<sup>⑥</sup> 因为每口锅都由一口火圈气煎烧,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到 20 世纪初,约有 1 万口火圈,其中包括被租佃的,产生的利润每年约 100 万两白银。气井股份的收益率变化极大。在年生产火圈 600—700 口的气井,除去生产成本,一股的年回报可高达 2000 两甚至更多。就是只有数十口火圈的较弱的气井一年也有数千两的收入。吉润卿 1909 年至 1936 年在贡井盐场工作,他在口述材料中回忆说,既产卤又产气的气井,每年有 2—5 万两的利润,而在高产的天龙井则高达 8 万两,天龙井在 19 世纪开凿时称为莲海井,直到 1930 年代还在生产。<sup>⑦</sup>

潜在的丰厚利润,很显然弥补了盐井开发中的风险。相比较而言,煎盐的风险要小得多,而且开办煎盐灶房的成本十分低廉。《川盐纪要》估计井火灶房每“排”锅的平均成本约 280—350 两。那些还没有解决送气到锅和将气分配到每口锅的技术问题的炭火灶房,每“排”锅成本至多 150 两。<sup>⑧</sup>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灶房建设的土地租佃支出。

井火和炭火灶的利润也难以概括,这是由于它们依赖的卤和气的成本和供应、灶房基址的租佃成本,以及盐场售盐的价格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20 世纪初是盐灶兴盛时期。樵甫记载,生产每引花盐,也就是 11 000 斤,支出 172.6 两。依此计算,每斤的生产成本是 0.016 两。一

<sup>⑤</sup>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49 页。这些数字可以很好地与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气的租约中看到的租金相印证。事例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377、378、379、380、381 号。

<sup>⑥</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214—215 页。

<sup>⑦</sup> 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77—78 页。《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58 号,记述天龙井在 1932 年重建,当时它仍能生产 160 口火圈的气,拿出 10 口火圈的收入作为该井营运开支。如果余下的每口火圈年出租银 100 两,则该井投资者很容易一年净收益 80 000 两。

<sup>⑧</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248 页。这些数字的单位是元,我已将它们转换为两,以与我所开列的其他数字保持一致。



口燃气盐锅年均出产食盐 11 760—23 520 斤，支出是 188—376 两。1916 年一斤花盐在自流井卖 79 文铜钱，贡井卖 74 文，这一差别最有可能是由于贡井离运送富荣食盐的主要河运码头较远所致。以较高的自流井数字为例，依当时的换算率，灶房出售每斤盐的价格约为 0.044 两，假设它天天开工，自流井每口锅年均利润约 517—1 034 两，净利润每口锅每年是 329—658 两。<sup>⑨</sup> 这是基于税前的计算。我们将会看到，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税收制度数次变化，但极少有对盐灶的征税。

利润如此之高而风险如此之低，我们好奇，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投资盐灶？最简单的答案是卤水供应有限，卤水所有人就在建设盐灶和食盐营销上占有优势地位。在 19 世纪，当时自贡盐业开始起飞，大量天然气储藏的发现，造成了燃料供应与卤水供应上的不平衡。到 20 世纪初，自流井盐岩层的开发暂时恢复了气与卤间的平衡。然而，我们将会看到，新的卤水开采技术将再一次改变盐灶的生产条件。即便如此，只要川盐的销售市场保持开放，凡在富荣两个盐场继续投资于凿井、煎盐的大小生产者的生产条件，都会有丰厚的回报。

72

## 结论

富荣盐场提供了研究经济发展中技术与制度互动关系的一个极好个案。相对于盐业开发所需资本来说，家庭资本很有限，但它与农业和采矿业中强大的契约文化相结合，提供了理解 19 世纪末富荣盐业非凡增长的背景。盐井股份的商业化，是这一进程的直接产物。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大小资本所有人，都愿意将他们的钱财绑定在长期的预期利润上面。这一长期投资的做法，挑战了长久以来关于中国人喜欢通过高利贷或典当获得即刻回报的认识——该说法过去常常解释 19 世纪晚期寻

<sup>⑨</sup> 源于樵甫《自流井（第一集）》提供的数字，81、89、165—166 页。

求在洋务上投资的“自强者们”所遇到的困难。<sup>⑩</sup>而且,尽管许多学者声称,中国的不发达可以部分追溯到商业法典的缺位,但是,应用于实际且高度依规定办事的厂规——与官方对于盐课的关注没有关系——始终存在,这意味着我们过去忽视了有着地域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商业习惯法。商人依靠政府,甚至在军阀混战时期支持这一习惯法的能力,都证实了它历来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提示我们,需要探讨中国经济史和法制史的这一方面在其他高度商业化地区的表现。

73 另外,19世纪在富荣盐场出现的投资和资源分配模式,是一个鼓励分裂的模式,也清楚地反映出了中国其他地方小规模企业的发展。不情愿出卖先人财产的传统做法限制了盐井股份的买卖,但一些积极的因素促进卤、气租佃交易的活跃。尤其是,这一交易使灶户灵活地应对市场对于食盐的需求,他们得到盐井股份的方式,是通过相对短期的租佃,而非永久购买盐井股份。可能的转租及盐灶之间重新组合,更加强了这一灵活性。通过延期租佃契约和预先再租的方式,承租人甚至在他们的原始租约到期之前,就进行续约,卤气供应因此得到了保障。<sup>⑪</sup>而且,尽管承租势必阻碍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因为一旦租期结束这些投资的获利将归地主所有,但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也给予了卤和气的承租人相当大的激励,以保持和提高生产水平。而这些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因为续约是件相当轻松的事,且条款常常与原始租约一样。

透过富荣也可以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尽管富荣盐场显示出明显的所有权分裂的趋势,但我们可以觉察出在管理和组织上的重要的一体化趋势。生意合伙关系的演进,以及使用大关这种管理机构监管灶和井的各种利益,从中可以窥见这种进程之一斑。同样重要的是,以大家族为基础的商号的成长,它们既利用了很早进入盐场掌握大量盐井资

<sup>⑩</sup> 近期持这种看法的例子,见费正清、默尔·戈德曼《中国新史》,180页,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92年。

<sup>⑪</sup> 提前续约和租约延续的例子,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567—572号。

源的优势，也从太平天国之后川盐市场迅速发展及销售地界扩大中获利。他们跻身最重要投资者行列，从盐井见功中获得了的丰厚利润，又能将这些获利在辅助产业、营销以及卤和气资源的一体化上进行投资，使它们进一步增值。

对于大多数在富顺和荣县产盐地区将钱投入凿井、推卤及煎盐的投资者来说，盐股的购买、租佃和再分配就构成了盐业生意。尽管他们的资本对于该地区盐业生产发展总的影 响是巨大的，但是他们的投资本质上说是分裂的。这意味着，作为个体而言，他们对于盐业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只是做出了很少的贡献。在富荣盐场，商业组织新的、过渡形式的演进，与复杂的股权和合伙制的改进同等重要。像在自贡这样的采掘业，正是运气和敢于冒险，成就了一些早期进入者，积累了财富，成为帝制晚期历史中的传奇人物。这些早期盐业巨富们，引起我们关注他们故事的地方，是他们利用这些财富做了些什么。除了为自己和子孙们，花钱享受一种以前未敢奢想的精英生活方式之外，19 世纪自流井和贡井的一小群大盐业制造商，在企业结构上经历了两次极其重要的进步。部分是由于前面讨论过的投资构成，部分是由于对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要求以及抓住占领市场机会的驱动，这些企业家成为了盐业生产的横向和纵向一体化发展和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先锋。

#### 75 盐业上发财致富

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时，四大家族已是富荣盐区的领袖了。紧跟其

后的是其他数百家大食盐开发商,无疑是想追求四大家族在战争期间获得的巨大财富和影响力。<sup>①</sup>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财富超过了盐场其他任何商人,但他们致富的策略都类似。清朝时四川流行的一句俗语道出了人们对这些商家中德高望重者所持的一种敬畏:“你不姓王不姓李,老子就不怕你。”<sup>②</sup>

这些权势家族的历史,是四川作为东部和南部邻近地区过剩人口的长久接收地的历史的代表。王三畏堂这一盐业帝国的设计师是王朗云,他的先人是明亡后第一批入川移民。<sup>③</sup>1660年代他们离开湖北老家,在富顺定居,生活殷实,耕读传家。<sup>④</sup>王朗云的曾祖父王端笏,是低级武职官员,祖父王玉川,官至候补州同。父亲王楷,在布政使衙门做理问。在清前期,王家以农业和盐卤用地的形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后者大多数很显然是被遗弃或是相对不出产的卤井。

李四友堂也有着类似的历史,尽管他们的祖先据说在元朝(1279—1368)后期就已来到四川。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进入盐业生产领域。李九霞在所写祖父的传记中说:1628年祖父李果育10岁时,就已攀爬天车,撤换汲卤用的篾索。<sup>⑤</sup>在1660和1670年代,吴三桂统治四川时,<sup>⑥</sup>李果育常常是盐业利益圈的代言人,至少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递交呼吁裁减盐税请愿书的活动。直到19世纪初,李家采取的是同样不变的

① 李榕《自流井记》记载,数百个家庭主导着晚清的食盐生意。李榕:《自流井记》,ISIS第39卷,1948年。

② 李子琳:《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展到衰亡》,147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

③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4—165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④ 讨论科举制度及其对帝制晚期中国精英的建构作用,见张仲礼《中国的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以及艾尔曼《明清科举文化史》,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⑤ 李子琳:《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展到衰亡》,145—146页。

⑥ 吴三桂是“三藩”之一,曾是明朝的将领,他帮助新的满洲帝国征服中国,西南部分地区事实上成了他的领地,他统治了二十多年。

策略,这也是帝制晚期中国大多数积极向上、有抱负的家族所遵循的:将钱财投资农业,同时保证后代子孙受到良好教育,取得一定功名。李果

76 育的一个侄子就曾中举,做过数个地方的州县官。下一辈人中出了一个生员、一个举人,还有一个在镶白旗任教习,后来也做了知县。有一个侄子,捐了一个经历,但从未实授,而这种捐纳则是晚清盐业工业家很普遍的做法。

颜昌英是颜桂馨堂的创建者,其先人直到 1730 年代才移民四川,加入广东的移民行列,以开发四川依旧丰富的土地。颜家,最初在威远县落脚。尽管家族传说,来四川的第一代是位教书先生,但直到 1830 年代颜家还是农民。此时,这一代的老大颜昌训才进入盐业,据说也曾求取功名,但名落孙山。颜家致富的背后,是他们的运气加上对于食盐生产技术上的兴趣。他们地里发现了一口天然盐泉井,颜昌训和颜昌英拿出积蓄开凿永兴井,该井在 1825 年见功,出产气、卤 100 多年。<sup>⑦</sup>

王家、李家和颜家的财富植根于耕读传家,而自贡胡家则代表了其他移民的类型——商人,商人对于四川早期经济发展特别重要。<sup>⑧</sup> 胡礼纬出生在江西庐陵县一个没落的农村大家族。他和族人胡仕云在嘉庆(1796—1820)中期来到自流井,那里江西商人与四川边远产盐区已有的密切联系吸引了他。胡礼纬在四川成家,但不久去世,妻与子因贫困被迫返回江西。儿子胡元海长大后,从一个亲戚处借钱返回他父亲魂牵梦萦的地方。在那里,他加入了一卖布的江西商帮。胡云海积攒了一些钱在自流井开了一家店,不久这位新的元和店老板就娶了一位王姓同乡的女儿。

胡元海和妻子一起将生意做大,用的是他卖布挣来的钱,最早跟别人合伙开凿卤水井。开采告成,他利用所得 8000 多串铜钱,买了块年

<sup>⑦</sup> 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64 页,载《盐业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

322 <sup>⑧</sup>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49—51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2 辑,1981 年。

收租谷 80 石的田地。更为重要的是,此中还包括了与这块地相邻的荒地和河滩地。正是在这里,胡元海开凿了他最早的气井和卤井,他将家搬到寨子岭下的河岸上,并建盖了他管理盐业的总柜房。

19 世纪中叶,这些家族还都没有积累可观的财富。胡元海仰仗着繁荣的卖布生意,是早期盐业巨头中在生意上还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唯一一个。有了最初合伙的成功经验,他倾向于在自家地里开凿自己的盐井,所使用的方法在当地称为“以井创井”。然而,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这是用未分配利润来建造企业的策略之一。<sup>⑨</sup> 在自贡,一旦投资者成功地开凿了一眼井,他仅使用从第一眼井所得的利润,就很容易凿铍下一眼。即便新的事业失败了,投资者原始资本还是平安无事。除非第一眼井枯竭了,否则他总有一天会有足够的利润再进行尝试。正是这一方式保护了另一位盐业资本家黄植青免于破产,他在一眼井投资了近七万两,在开凿了八年之后最终弃置。<sup>⑩</sup> 罗筱元,20 世纪初自贡的头面商人,也使用这一方法发展盐灶。对胡元海来说,这一方法不仅能确保利润,也将保护他和子孙摆脱合伙制所带来的复杂局面。然而,这种方法确实也限制了他事业的经营范畴。与同时代其他巨富不同,胡元海的大部分井所产的是黄卤水,当然品质很好。它们很浅,开凿所花的时间和金钱相对要少。胡元海去世时,他已积累五眼卤井和可供 30 口火圈的气,年产 2000 石租谷的土地,流动资产达数万两。<sup>⑪</sup>

对于在威远、富顺和荣县有着分房、更庞大的颜家来说,这一投资策略也具吸引力。<sup>⑫</sup> 颜昌英使用永兴井的获利,来铍北海井,接着又使用从北海井的获利开凿来龙井。到了这时,家族堂的收益足以在家族每一房中进行相当数量的分配,他们都投资进行自己的盐井和盐灶开发。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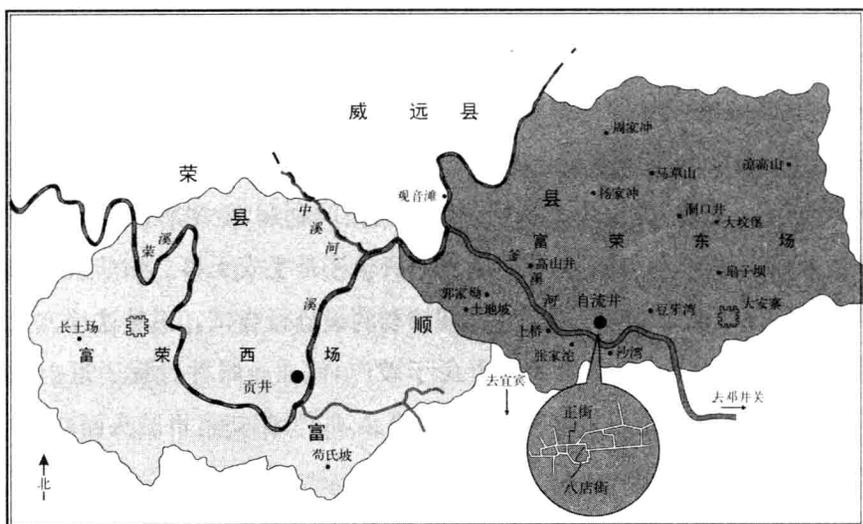
<sup>⑨</sup> 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87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1964 年。

<sup>⑩</sup>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9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6—10 辑,1982 年。

<sup>⑪</sup> 胡少权:《贡井胡元海的兴起与衰落》,50 页。

<sup>⑫</sup> 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64—66 页。

他们事业扩张的主要是土地，自流井资产有限，同时颜家不愿意与族外之人进行联合风险投资，因此他们在富荣盐场较不发达的贡井买进土地。这一地区没有气井，颜家能够在获利丰厚的黑卤市场扩张事业。只是随着盐岩层的发现，他们才能失去了竞争的优势地位。



地图3 1919年的富荣盐场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正文前图版。

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夕，李家和王家如同胡家和颜家一样，没有财力“单干”。这两个家族，以及数以百计的、在事业上逊色于他们的家庭和家族一开始所执行的策略，是与资本的所有人缔结地主—佃户关系。<sup>⑬</sup> 78 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是在西南的四川及邻省从事跨省贸易之人所挣得的商业资本。他们大多数是来自陕西、广东、湖广和江西的商人，<sup>⑭</sup>胡家就是这些流寓者中的一个。来自广东、湖广和江西的商人似乎从事一般

<sup>⑬</sup> 其他重要的通过出租井基挣钱的地主，包括张三和、肖致和、王荣华祠、张、卢、陈、王等姓、梁传经堂。见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0页；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8页。

<sup>⑭</sup>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5，1910年版，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重印本。



性的商品贸易,<sup>15</sup>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在富荣盐场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要小于陕西商人。我们已经看到,陕西商人主导着清初四川的食盐贸易,而这一高利润的生意,也使陕西商人与贡井和自流井有潜力的合伙人有了早期的交往。陕西商人在四川全省的茶叶贸易和当铺设立上占据突出的地位。<sup>16</sup>也正是他们,在19世纪发起了对食盐定额的修订,这使得食盐供应转向西南更具效率的盐场。<sup>17</sup>以此为基础,他们也进入了当地金融业。<sup>18</sup>八家陕西商人的主要店面构成了自流井主干道的基础,该街道自身也以八家店面命名——八店街(见地图3)。直到19世纪末,随着四川票号业的发展,山西商人也开始在四川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sup>19</sup>

1830年代之前,极少有陕西商人涉足制盐业。我们不知道陕西商人投资策略何以发生变化,以及何时发生了变化。罗成基认为,这是由于陕西商人在其大本营云南和贵州生意艰难,加上新的食盐制造技术所带来的机会共同造成的。同时,陕西商人对于食盐船运批发市场的控制,不断遭到来自进入该行业、生产日增的富荣地区和四川经济中心重庆的商人的挑战。<sup>20</sup>

79

正是这种陕西资本与当地土地的结合,促成了富荣盐业第一阶段的起飞。食盐资本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人估计,陕西商人所占四川食盐生产的总资本,从1830年的无份额可言,上升至1870年代的百分之

<sup>15</sup> 罗成基已看到,来自江西的商人从事一般商品、陶瓷器皿和干果生意。见罗成基《陕商在自贡盐厂的起落》,载彭泽益、王仁远、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编《自贡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490—50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我本人对巴县(位于重庆周边)档案中有关商人的材料做了考察,发现19世纪广东商人从事布匹、小件日用品等杂货生意。

<sup>16</sup> 欧阳樾牟等:《自贡地方的典当业》,147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1925—1935年间欧阳樾牟任自贡一家当铺的经理。1937年版的《三台县志》指出,该县两家当铺由陕西商人于康熙三十五年(1697)开业。见《三台县志》,卷12,1937年。

<sup>17</sup>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0,山货,页13,1822年版,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1年重印本。

<sup>18</sup> 罗成基:《陕商在自贡盐厂的起落》,500页。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50,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

<sup>19</sup>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57—5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4年。

<sup>20</sup> 罗成基:《陕商在自贡盐厂的起落》,501页。

七八十。<sup>②①</sup>这可能有些夸张,但很明显,外来者投资的巨额增长确实存在。烧盐工人进行的第一次重要罢工主要是反对陕帮商人,据说它在富荣盐场的盐灶份额上占据优势地位。<sup>②②</sup>尽管不知道盐业契约所开列的大多数投资者是谁人,但我们切实知道,许多可以鉴别的晚清富荣盐井,是在陕西商人的资助下凿铤的。<sup>②③</sup>的确,陕帮成员拥有的一眼盐井,成为了第一眼盐岩井。<sup>②④</sup>也是陕西商人的经费,帮助王三畏堂和李四友堂从拥有土地资产转变为盐业帝国。

1830年代,王玉川后人的财富在减少。<sup>②⑤</sup>他们几乎不经营盐井,仅拥有一些土地。1838年,他们中的一员,锐意进取和身怀抱负的王朗云,提议现有的王家三房的资产应该分开,保留一小部分资产以祭祖。王朗云接手这部分资产的管理,开始了决定家族命运的两项工程。

由于家族自身资财单薄,王朗云决定重新淘办王家已经在高山井附近经营的一眼井。这眼天一井已经凿铤到了一定的深度,再凿到下面更为丰富的黑卤水,要远远少于凿铤一眼新井所需费用。与此同时,王朗云与一位陕西商人签订一份有限期的租约,在王家土地上开凿另一眼黑卤井。协议的条款,与在第二章所考察的那些有限期契约一样,给了王

②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征榷9,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②舒文成等:《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宫》,39—4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没有给出这次罢工的时间,但从资料中可以看出它必定发生在1850年代。

②③在探索富荣盐场各地区的历史时,黄植青和聂无放已鉴别出了一些陕西商人投资的盐井,包括大部分1850年代开凿的高产黄卤井;盘蟹沟开凿各深浅井,包括德咸井,日产卤水超过100担;在尚义瀾周边有1000多眼井。陕西商人在郭家坳地区尤其幸运,这里,刘子康的洪源井日产量超过1000担以及600口火圈,他的同省老乡拥有双龙井,超过400口火圈,以及洪富井、实洪井,每眼超过200口火圈。黄植青、聂无放《自贡盐场发展片段》,253—25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其他早期的例子包括,王烂若在1778年开凿如海井;另一位王姓陕西商人,投资1450两在1808年开凿兴海井;李天锡和蒋吉人在第二年开凿双福井。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1页,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4辑,1982年。

②④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

②⑤对此的讨论主要是依据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提供的信息。

朗云地主股 12 股,陕西投资者占 18 股。若该井失败,王朗云和他的亲戚将倾家荡产。如果该井见功,王朗云将享有该井出产的五分之二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在 18 年后,该井并所有不可移动的设备都将归他们家族所有。

正是通过以上这些租约,王家开始了大规模食盐生产。他们的投资者中许多显然是在富荣盐场寻找时机的跨省商人,以打出黑卤井或气井,求得暴富。但王家凿井事业中至少有一些合伙人是当地的商人,如颜永兴,据说是王朗云抵制清朝赋税政策时的同伴。我们也必须指出,与王朗云促成这些交易的商业精明相伴随的,是十足的好运气。一些传奇故事反映出了人们所普遍承认的运气的重要,但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却令人怀疑。例如有一则关于上面提到的天一井的故事。当时该井正在凿铤,债主急于催款,王朗云承受的压力太大,决定直接卖掉他们在扇子坝的土地。与陕帮商人的谈判已在进行中,就要在八店街的陕帮商号的一家店面签订合同。对此早已斟酌再三的王朗云,暂时离开了商谈现场,想再好好考虑这件事。正在此时,天一井的管事跑来,宣告他们刚刚打到了卤水。与陕帮商人的交易取消了,扇子坝后来成了开发黑卤井最多的地方之一。

天一井非同一般,最高产时一月汲卤两三千担。该井凿成时,卤水喷出超过 10 英尺高。井户不得不用一个竹木盘子置于井口,卤水就沿盘子边缘流进储存卤水的榲桶。食盐市场日益扩大,井火灶得以发展,对卤水的需求大增,这意味着这些井所出产卤水的价格会很高。凭借从天一井和其他仅拥有地主股份的盐井的获利,王家开始自己投资,重新淘办在扇子坝承袭的废弃盐井。

王三畏堂与非亲投资者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暂时性的,它有助于增强王家多种投资组合,但这仅是他们日益增长的盐业财富的一个方面。李四友堂早期的发展,更多的建立在与富有陕西商人的商业关系之上,在开始阶段发展很缓慢。直到 1820 年,李四友堂仅有四眼中等产量

81 的盐卤井。<sup>②⑥</sup> 这些井的利润在李世缙的四个儿子间分配,为促进家族产业进行的投资已所剩无几。在 19 世纪初,李四友堂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不是很活跃。在 1827—1828 年,李维基前去成都参加乡试。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位涉足四川盐茶贸易的高姓陕西商人。高氏对李家的资产感兴趣,决定投资 3 000 两以支持它的发展。他们的第一项事业是租佃珍珠寺后面的联珠井。好运又向李家伸手,助其成功:因为附近德成井的开凿,导致了联珠井增产,从每天 30 担升至 100 多担。因为租约中有一款规定,即便租期内产量提高,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变化,承租人享有这一意外之财的所有收益。

李四友堂与高姓商人形成了合伙关系,各自拥有该井 50% 的资产。在他们共同开发的盐井中,这意味着双方各 15 股。然而,他们中的一些风险投资是与别的投资者合作的,比如水丰井,他们各拥有 7.5 股,再如发隆井,股份中仅有三分之一归他们所有。总之,李—高合伙关系开发了七眼卤水井,产量加在一起,每天 200 多担。还有三眼气井,达到 600 口火圈。<sup>②⑦</sup> 随着其他气井的开发,李—高的合伙关系从卤水的净卖方,转变成了净买方,这一因素激励他们进一步开发盐井。<sup>②⑧</sup>

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李、王、胡、颜等家族已经成为四川计岸和边岸食盐生意的重要生产商。但是这些食盐的实际营销,主要还是掌握在大的陕帮盐号手中。随着南京的陷落,湖广市场的开放,这一垄断被打破。以前顺江而下运盐有种种危险,这时也得以合法化,湖广(湖北和湖南)对食盐的惊人需求,使得那些有益在手、有魄力的商人通过投机,买

<sup>②⑥</sup> 据记述该家族历史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讲,这些井每眼每日不超过数百担。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47 页。

<sup>②⑦</sup> 海顺和海旺井一共生产五百多口火圈的气,而赢利少些的大深井也给他们足够多的气以供应数十口锅。同上文,148 页。

<sup>②⑧</sup> 这一时期,陕西商人也在其他的盐场投资。早在 18 世纪晚期就有一位陕西商人为彭水盐场的技术改进做出了贡献。见《四川通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份文件,引自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关于清代富荣盐场井盐企业的初步分析》,39 页,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5 辑,1980 年。

卖川盐,在很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白银。在四川盐场每斤盐只需数文,而在湖广可以卖到90—200文。<sup>⑳</sup>据说有人在湖北卖一斤盐,可以带回一斤棉花。<sup>㉑</sup>确实,许多盐商最初是以这种方式从事棉花贸易的。在当时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作为对那些具有冒险精神和一心只想发财的人的一种激励。最著名的——无疑也是极不可信的——是关于刘昆池的故事,他只身带了一驮盐到湖北,贿赂了清朝驻防长江浮桥的兵卒,在到达目的地后,一斤盐成功地换得一斤白银。<sup>㉒</sup>若是这样,这就是私盐,超出了盐引制度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跻身于此,正是通过这种非法贸易,李家、胡家、颜家和王家,以及其他食盐生产商积极地从事生产,也进行营销。

82

表 4.1 1830 年代李一高合伙生产的卤水

盐井名称	产量(约):担/天
联珠	100
水丰	30—40
丰泰	40—50
中兴	10
对溪	10
发隆	30
(位于五星店的一眼井)	无数字

资料来源: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47—148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

李四友堂进入营销,要归功于名叫张五麻子的忠诚家人,他料理李家在重庆的资产。据说,向东面禁运的消息一抵四川,张五麻子就购买了他在这一盐业中心交易地所找到的所有食盐。当湖广盐价上涨,他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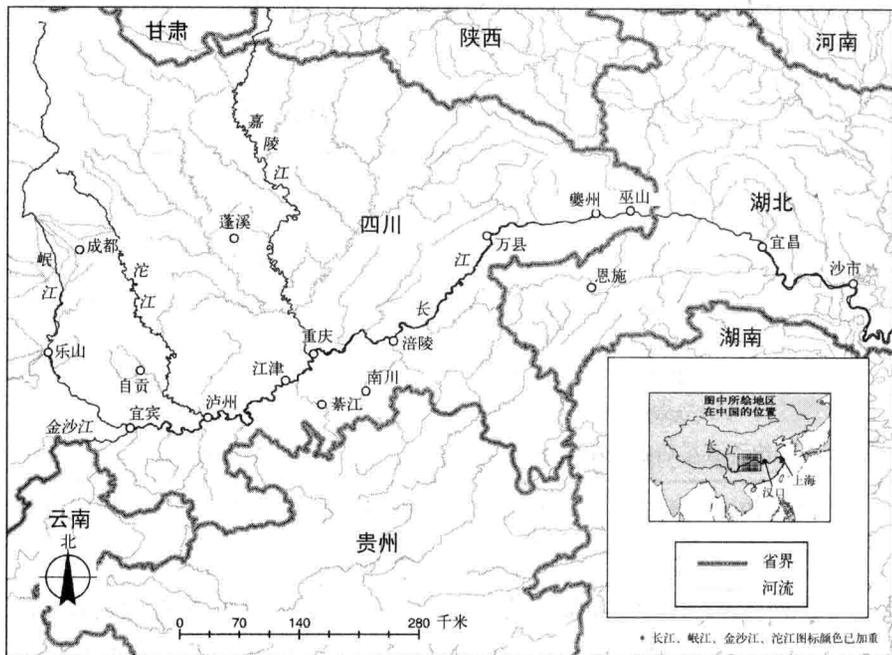
<sup>⑳</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引自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39页,载《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2期。

<sup>㉑</sup>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7页。

<sup>㉒</sup> 同上文复述的故事。

出售这些食盐,为他的雇主,毋庸置疑也为他自己获取了巨大利润。<sup>32</sup> 当时,李祥庵是李四友堂的总办,李家与王三畏堂间的姻亲关系便于两家在湖广营销食盐事业上联手。另一位大的盐场商人陈辉廷也加入进来。然而,一段时间后,合伙人之间的争执导致商号解体,李祥庵建立了自己的祥兴泰商号。<sup>33</sup> 当时王朗云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商号——广生同盐号,最后在四川的邓井关、泸州和重庆以及湖北的宜昌、沙市和洋溪建立了分号。它营销的大部分是自己家族盐井生产的食盐,这带来了极丰厚的利润。<sup>34</sup>

83



地图4 自贡和长江上游诸城市

制图: Dougals Miller.

<sup>32</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49页。

<sup>33</sup> 同上文,157页。

<sup>34</sup>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7页。

胡家的生产能力远低于自流井的同行,无法仅仅依靠自己的盐井建立起营销帝国。但是,他们也利用了战争所带来的机遇。他们在八店街的天后宫设立聚义长盐号,作为总号。沿长江,处处可见它的分号和堆栈,在重庆、宜昌和沙市有大的分号。后来它的名字改为福临怡盐号,但经商策略保持不变。尤其是,聚义长的掌柜们以利用盐场与引岸即销售地界间的差价,以及改变营销策略以满足季节性产业而闻名。这些季节性产业如咸菜加工是在农历二三月,酿造酱油是在五六月,熏制腊肉主要是在冬天。因为没有自己的充足食盐供应,胡家也很敏锐地判断食盐买卖的时间和地点,从不将他们的购买局限在盐场或是固执地按照引盐销售规定的最终地点出售食盐。聚义长的掌柜们有一个广泛的网络以收集市场信息,胡勉斋在这方面的本事为他赢得了盐业中的“诸葛亮”这一绰号——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战略家。<sup>⑤</sup>

太平天国结束时,陕帮商号的垄断,不仅在新的湖广市场,也在计岸和边岸被打破。从那时起,两个营销集团即重庆帮和井帮,主宰着这一贸易。重庆帮基本上是跨省的,控制着四川经济资本的财政资源。井帮的竞争能力建立在他们自己自流井和贡井的巨大生产能力之上,以及他们买下许多自己不能营销食盐的小生产商的食盐的能力之上。<sup>⑥</sup>以这种方式,大的食盐生产商开始在一个有组织的框架之内,共同凿井、煎盐和营销食盐。正是这种商业上的一体化,确保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盐业中的主导地位。

84

## 大盐业帝国的经营

### 作为公司的家族

学者们长期以来视中国的传统家族制度是保持精英地位的重要因

<sup>⑤</sup>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3—54页。

<sup>⑥</sup> 《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卷34,页21,北京:财政部盐务署,1902年。

素之一。然而，它们的“家庭主义”，还有对于土地财富和科举功名的不断聚积，已经被认为限制了它们作为推动增长引擎的效用。<sup>⑳</sup> 在富荣的大家族中，很明确，是祠堂巩固了早期经济的成功和现代管理技术的发展。祠堂及其附属资产的作用，相当于当时西方正在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公司组织。至少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家族堂是集结商业资产，进行多种经营，反对收税人、债主和家族成员攘夺的组织形式。通过这种组织，早期的有限责任和纵向一体化得以完美实施，这使它成为帝制晚期中国最先进的商业组织之一。

李四友堂的建立，在时间上早于李家作为伟大盐业王朝的崛起。<sup>㉑</sup> 然而，到 1850 年代，它基本上已转变成了一个保存李家商业财富的组织。在李维基下一代的两位继承人时期，所有的家族资源都进行再投资，以增加该堂的集体财产。甚至家族成员的潜在争执——而这不久就沉重打击了王家——一开始就得以避免：给家族每房一笔固定的 800 石的粮食津贴，还有每年不超过 1 200 两盐业利润的现金津贴。家族企业的其他一切收入都投回到生产和销售。<sup>㉒</sup>

85 胡慎怡堂也可能在 1830 年前已形成。然而，随着家族资产的壮大，它的结构发生了改变，专门为了满足大型盐业联合企业的需求。在胡慎怡堂的早期，所有重要的位置全由家族成员担任。我们对于与家族堂有

324 <sup>⑳</sup> 关于家族在控制共有财产上所起作用的著作，见希拉里·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家族：明清安徽桐城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 年）；科大卫《作为商业公司的家族：中国商业发展中的赞助与法律》（“中央研究院经济所”第二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讨会会议论文，台北，1989 年）；莫里斯·弗里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伦敦：阿斯隆出版社，1958 年）；杰克·波特《资本主义和中国农民：香港乡村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 年）。伊丽莎白·薛尔、高家龙在研究荣家和张家纺织帝国时，证明了以家族堂为基础的近代早期中国企业进行了相当可观的革新，扩展到它们所在地之外，并发展出了纵向一体化管理结构。见高家龙《遇到中国网络：在华的西方、日本和中国企业，1880—1937》，117—146 页，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 年；伊丽莎白·薛尔《从纺织厂到商业企业：近代中国区域性企业的出现》，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 年。

<sup>㉑</sup> 见《李家年谱》，清初抄本。

<sup>㉒</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93 页。



关的族规一无所知,但家族堂的结构很简单:柜房掌管盐业财产,一个分立的部门掌管农业财产,一个部门掌管家族与外面打交道的所有事务。后者被赋予培植家族的业务及与盐业有关官员间的关系的责任,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公关机构和说客。三个部门分别由胡元和的三个女婿雷小松、钟春泉、王笔田负责。<sup>⑩</sup>直到1890年代,胡元和的长子胡勉斋去世,次子胡汝修继任,这时胡慎怡堂的结构和负责人员,都基本保持不变。在胡汝修的时代,重新修改族规,包括了家族永不分家和财产永远归集体所有的条款。然而,在分家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又增加了一款,根据当时家族的房数,而不是最早组成胡慎怡堂的三支,平均分配财富。<sup>⑪</sup>这将使胡家避免王三畏堂和李四友堂最后解体时给家族带来重创的许多痛苦和内讧。

同时,一套管理办法也写入了家族堂规,建立了复杂的合作结构,这将继续控制着胡慎怡堂的生意和人事安排。除了一个账房管事负责出纳外,还有多位管事,专门负责农田、家塾、祭祖、买办、修缮、牛只等喂养、仓储等等——总计20项。这一层级体系向下又分数个层次,完全是为了满足家族成员的私人需要。另一个分立的层级体系专注于生意。而且,到了光绪朝(1871—1908),大多数的部门都由雇用的管事而不是亲戚掌管着。<sup>⑫</sup>

王三畏堂似乎是四大家族堂中唯一专门为满足日益壮大的盐业帝国的需要而成立的。鉴于家族的传统,王朗云担心他的家族会将他呕心沥血积累起的财产虚掷。因此,他将盐井与由祖产发展而来、划出作为祠堂用地以永久保留的农业财产合在一起。新的家族组织的核心,是一座新近建造、坐落在板仓坝的祖祠——玉川祠。正是在这里,三房发誓

86

<sup>⑩</sup>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1页。

<sup>⑪</sup> 同上文,56—57页。

<sup>⑫</sup> 同上文,56页。

仿效范文正公,设立了一块义田。<sup>④</sup> 1877年,王朗云向皇帝奏请在玉川祠镌刻、竖立一通石碑,这样王家后世子孙都可以看到并遵守祠堂的堂规。



图片 4.1 王家祠堂

摄影:曾小萍。

王家总共拿出 20 眼井和 600 亩地作为家族堂资产。<sup>④</sup> 这一财产用于祭祀祖先、维修祖先坟茔、资助族中老人、族人参加科举的开销,以及饥荒时资助亲友。为了实现家族的财富和影响力的目标,家族制定了特别的条款以资助科考中第者。设立一所学校,男性子孙都可入学,同时也向有前途的非亲人员开放。王家子孙每人给 20 两作为参加乡试的费用。如果他们参加县、府、院试则给两串钱。那些中试者将奖赏 100 两。若有幸参加会试,则给予 400 两作为赴京的盘费。如果有人点翰林在京师为官者,家族将提供每年 400 两的津贴。

王三畏堂也向租种该祠堂土地的 60 岁以上老人,提供每年一石大

<sup>④</sup> 关于范文正作为建立家族堂楷模的意义,见崔瑞德《范氏义庄,1050—1760》,载倪德卫、芮沃寿编《儒家在行动》,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年。

<sup>④</sup> 上呈皇帝的奏疏中所开列的祠堂堂规条文,可在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中找到。

米的养老金,每年拿出 240 串钱支付给各房选出的管理祖先祭祀的人员。该堂答应为族内贞节女性竖立牌坊,凡是获准修建的,该堂出银 50 两。然而最重要的条款,也使王三畏堂堂规不同于典型家族族规的是,对于王三畏堂最后所创造的巨额剩余利润的处置。家族将每年碰面以解决该堂的账目问题。将开支和家族财产保值之外的一半钱财用于再投资,以保持家族的财产。另一半将根据每房在家族共有资产中的股份额,为每房添置更多的财产。如此,净收入的一半被再投入家族生意,而另一半可由每一房进行处置或是投资。

在其他盐场,家族堂也是经营产业资源并保证商业财产一体化和连续性的极重要工具。犍为的吴景让堂,是经历了 20 世纪初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变动而生存下来的极少数盐业企业之一,成为中国西南一个主要的产业巨头。另外,更为传统的家族组织也服务于产业发展。袁和乐堂是犍为盐场最大的地主之一。他们的族规专门有一部分是关于盐业资源管理的,规定了各种形式租佃的费用,规定家族成员的任何土地出卖契约都必须与土地上建造的盐井和盐灶相分离。<sup>④5</sup> 转让不动产可以接受,但家族的盐业财产必须保持不动。

### 祠堂的商业组织

王家、李家、胡家非凡商业成功的关键,是发展出了高效的管理组织,它提升了专门技能,集中控制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并将最初的盐井生意扩展成为纵向一体化的大型盐业联合企业。<sup>④6</sup> 这些做法,在最大的

<sup>④5</sup>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32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

<sup>④6</sup> 颜桂馨堂早期财运的低迷,部分是因为它未能建立对于家族资产日常运营的职业化管理。1860 年代晚期,该盐业帝国的创建人沉痾在身,该家族数年间无心于盐业。颜桂馨堂在贵州食盐批发商落后的管理,导致其 1870 年代初的破产,其后,巨额债务和家族各房间的争执,令这一大家族堂无法恢复它在盐场的往昔地位。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73—74 页。

88 盐业家族中发挥到了极致,而各种企业的集中管理、划分层级,对于当时涉身盐业的许多家族来说是很常见的。<sup>④7</sup> 富荣这些大的家族堂的经济利益建立在一个两层管理体系之上。最顶端是一个对于下属每种事务都有着全面监管控制的总的部门。在胡家,这一功能是由成立于 1867 年的慎怡堂来执行的。总柜房通常以一个家族成员为首,他的头衔是总掌柜。其下有五个部门:(1) 由一名总账和两名帮账掌管的柜房,全面负责家族盐井和盐灶的运行;(2) 货物股:负责购买盐井和盐灶日常运行所需的物品;(3) 交际股:负责购置家族盐灶所需的盐卤并在家族拥有的零售店铺销售食盐。(4) 农庄股:负责收租和出售粮食。(5) 现金股:负责日常现金支出和银钱兑换业务。<sup>④8</sup>

王三畏堂在缔造者王朗云的带领下,历经三十多年的统一管理,却在 19 世纪的分裂时期几乎被摧毁。互不信任的家族成员们,接管了井、灶和其他家族事务。尽管王家从未违背维持家族财产作为不可分割资产的堂规,但生意不景气、浪费、挪用以及井灶与批发商号间合作优势的丧失,致使王三畏堂欠债近 70 万两。<sup>④9</sup> 1880 和 1890 年代的教训,导致了对于集中管理的重新审视,在它最鼎盛时期金丰井柜房掌管所有的收支、制定计划,为王三畏堂的田房地产、井、灶、批发商号和卤筭分配物资。<sup>⑤0</sup> 潘仲三掌管大柜房多年,在盐场他的权力之大,几等同于王家的继承人。他死后,在大柜房与各部门之间加入了第二层的管理领导。在当地他们被称为“四大朝臣”,这些新的管理人员分别负责田房地产、大的卤筭、扇子坝盐井及广生同批发商号。此后不久,设立了类似的机构以

④7 李榕在 19 世纪晚期记载,在盐场有数种管理机构的类型。最重要的是管事,这些人包括负责凿井的监管人,负责灶房卤、气的监管人,负责通过筭运卤的监管人,以及负责批发的监管人。其他管理层的人员包括经纪——负责食盐的买与卖,外厂——他的工作是与外来者打交道及处理与外界的关系。李榕《自流井记》,见《十三峰书屋全集》,卷 1,龙安书院,1892 年版。

④8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6 页。

④9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5—186 页。

325 ⑤0 同上文,19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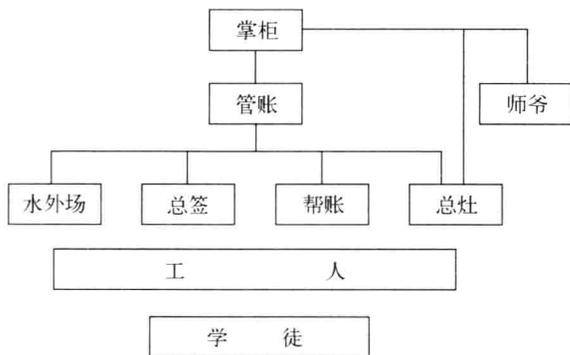
监管在郭家坳和贡井盐场的井和灶。<sup>⑤①</sup>

大柜房与其下属专门机构以及各个生产单位活动的协调,是通过一个典型的 M 型(多部门的)结构达到的。<sup>⑤②</sup>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富荣食盐生产商选择了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下的分权形式,尤其是家族堂自身倾向于采用更统一的管理结构,每个掌柜负责一个专门经营领域。可能是因为,在快速增长和事业扩张进入一个新领域时,分权管理被视作更为灵活。而且,至少一些在分权过程中本已失去的规模经济,似乎通过集中购置井和灶的供应物资,以及盐灶食盐的集中营销得以恢复。

每个家族堂的主要监管机构之下,是每个灶、井、批发商号和笕的分立的管理机构。有关李四友堂的资料给出了这些管理层级是如何运作的完整描述。<sup>⑤③</sup> 以盐灶的组织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领导层(见图 4.1)。各盐灶都处于一个柜房的全面监管之下,它的掌柜直接听命于

89

90



图表 4.1 李四友堂盐灶人员等级结构

资料来源: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展到衰亡》,170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1962—1963 年。

<sup>⑤①</sup> 同上文。李四友堂也是如此运作的,总办加上分别负责井、笕、灶和批发的掌柜。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0 页。

<sup>⑤②</sup> 关于多部门结构,见奥利佛·E. 威廉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和市场签约》,279—285 页,纽约:自由出版社,1985 年。阿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引野隆志:《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43—44 页,尤其是 44 页图表 2,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90 年。

<sup>⑤③</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2—154 页。

家族的总办。事实上，在一名管账和两名帮账的协助下，掌柜在掌管盐灶上有着相当的自由。除了处理盐灶的账目，管账也是掌柜的助手，当掌柜不在时负全责。这三人一起组成了盐灶的主要决策集团，负责所有的购买、销售和规划。

在掌柜等人之下是一些监管人员，在盐灶各有专责。其中有些人与监工的作用相同，地位处于管理层与工人之间。最重要的是总灶，他负责煎盐、捆盐和称重。其下有数名直接监督烧盐工人的坐灶，保卫食盐仓库的人，还有桶子匠，他们的工作包括浸泡锅边被卤水泡过的泥土，以提取额外的盐卤供煎煮之用。坐灶的人数依盐灶的规模而各异，大多数是三四十口火圈配备一人。总签也起着类似的监管作用，他与助手散签，监管将卤水搬运至煎烧之前的特制大缸中，并确认缸中盐卤的咸度相同。每一个灶都有一名水外场，他的职责是在盐灶购置盐卤时进行商谈。还有一名跑街，负责购买其他物品，包括盐灶所需的伙食。

此外，大多数盐灶也雇有师爷，他有些学问，了解官场之道。他的工作是处理管理层的外部关系。社会关系在食盐制造和销售高度竞争的环境中起着重要作用，选中这些人很可能是他们能给盐业生意带来的种种关系。然而，他们也有着其他作用。大多数师爷也是家族最高决策部门的高级顾问，不受所在部门的辖制。他们可能也是安插的耳目，监督生产，并在问题出现时建言献策。同时，他们也承担着训练学徒的任务。这些学徒在学习经商之道、使用算盘和记账知识时，要侍候师爷，为他打杂。

训练学徒仅是家族堂重视挑选管理人员的一个表现。犍为吴景让堂盐灶的中层管理人员都是从送往盐灶柜房学习经营之道的年轻人中  
91 选出的。在被选中出任这些职位之前，他们要经过严格的考查，在数年内表现突出的就有可能升任掌柜。<sup>⑤</sup> 王三畏堂和胡慎怡堂常常将他们自

---

<sup>⑤</sup> 张端甫：《犍乐地区首屈一批的大场商——吴景让堂》，53页，载《井盐史通讯》第6期，1979—1980年。

己的学徒升为掌柜。罗筱元,是20世纪中期的头面盐商,他父亲是南溪县的盐商,他将罗筱元送给王达之做学徒,从此开始了他的盐业生涯。罗筱元以前跟随父亲接受过传统教育和经商之道的训练,不到三个月就转到王三畏堂柜房,当了管现钱。后来他升至管账,开始了长期作为高层管理者——经理的生涯。<sup>⑤⑥</sup>

表 4.2 1880 年前后李四友堂管理人员的薪水(铜钱:串/月)

掌柜	20—30
管账	10 以上
帮账	5—6
总灶	20
坐灶	6—7
总签	16
散签	3—8
师爷	7—8(总柜房 10)
跑街	6—7
水外场	10 以上
学徒	掌柜打牌收入的 1% 作为学徒的抽头

资料来源: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4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1962—1963 年。

李家也有一套严格的训练和挑选制度,在提升至永久性的管理职位之前有一个见习期。<sup>⑤⑦</sup>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们自己的白领人员被他们的竞争企业多方招揽。<sup>⑤⑧</sup> 我们将会看到,管理大家族财产的这些人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高超的专业技能。20 世纪崭露头角的大多数盐业巨富们开始盐业生涯时,都拥有此等才能。鼓励优秀的经理人,在高薪和

<sup>⑤⑥</sup>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70 页。黎雷:《罗筱元旧事》,40—41 页,载《自流井》1983 年第 1 期。

<sup>⑤⑦</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2 页。

<sup>⑤⑧</sup> 可以江子鹤为例,他被挖走去掌管胡慎怡堂最高产的盐井。正是江子鹤率先说服胡家将推卤的牛只换为机车的。见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70—71 页。当罗筱元从事他自己的商业活动时,他的最高层经理人大多数都是他从王三畏堂带过来的。见宋潮澜《我所了解的罗筱元》,38 页,载《自流井》1984 年第 4 期。

物质激励的机制下,发挥才能,投身企业,努力提高生产力。<sup>⑤⑧</sup>表 4.2 和表 4.3 是李家和王家井、灶付给管理人员的平均薪水。如果拿陕帮盐号的标准——这是各堂所仿效的——作为参照的话,批发商号掌柜薪水可能更高。

92 表 4.3 1880 年前后王三畏堂灶房管理人员的薪水(铜钱:串/月)

大掌柜	30
大总账	20
帮账	7—8
坐灶等中层人员	5—6
管现钱	3
学徒	0.6—1

资料来源: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7—8 辑,1963 年。

这里一个能干的掌柜每月至少得到 100 两,还有招待、制装及支付轿夫的费用,他们的坐轿在帝制晚期相当于现在的公司用车。以此计算,他的报酬与省里大员的法定薪水相当,是盐场工人工资的 100 倍。<sup>⑤⑨</sup>

管理人员也在他们办公的地方用餐,掌柜们常常滥用此种做法,频繁为自己和手下大摆宴席。<sup>⑥⑩</sup>另外,李家建立了一套物质激励机制,这也是效仿陕西商人。在协兴隆批发商号——李家是股东之一,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交给总柜房,每三年对此进行分配。掌柜们从中得到红

<sup>⑤⑧</sup> 使用高薪酬的内行经理人也 是盐场其他产业的常见作法。木厂雇用专门的人才作为庄客,进入森林地区挑选木材。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6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6—10 辑,1982 年。富荣竹厂的经理 人一年可以挣约 200 串,而待遇最高的,王聚金和苟坪三据说可以拿到 360 串,这一数目是王三畏堂总掌柜以外的任何成员都拿不到的。见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8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1963 年。

<sup>⑤⑨</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8—159 页。自贡的一个流行笑话说,陕西商帮掌柜从东家那里唯一得不到的东西是鞋,结果呢,他们总是身穿漂亮的衣服但鞋子全是补丁。

<sup>⑥⑩</sup> 在帝制晚期的中国,供给手下饭食的做法很常见。官府书吏也享受这一待遇。在王三畏堂,除了平常的早晚饭,历来每五天还会让手下人打牙祭。这些宴请也欢迎手下人的亲戚朋友。新年时举办许多宴会。见宋潮澜《我所了解的罗筱元》,38 页。



利。在晚清盐场最兴盛的时候,其他管理人员和工人也能得到红利。<sup>①</sup>李四友堂也有资助家庭困难管理人员的做法,并资助婚丧等开销。<sup>②</sup>胡慎怡堂也许诺给不同企业的掌柜和属下一定比例的利润,<sup>③</sup>在王三畏堂,红利有时相当于半年到一年的薪水。<sup>④</sup>

掌柜与家族堂领导层之间以及掌柜们之间都以诚相待。在繁荣时期,全面协调林林总总的商业利益集团是家族领袖自身的工作。罗筱元回忆,在王达之负责王三畏堂的时候,每天早饭前都要到大柜房,听取最高层掌柜们的汇报并给予他们当天的指示。饭后,他前往镇上家族的批发店铺并照料其他的家族事务。订立长期的计划,集中在端午节、中秋节和年关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参加的会议上。这些会议之前,每个业务单位的全部白领人员碰面数周,讨论问题,准备报告。在这些基础之上,最后由王达之拍板。<sup>⑤</sup>

93

在李四友堂,新年后不久,以一年的情况为基础,召开管理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负责井、灶、笕、号四个部门的掌柜,还有家族的领袖。事前,各部门掌柜要与下属单位的管理人员进行商议。这些会议,不仅是同其他家族堂一样,清算各项账目和分配利润,而且也是商讨计划的一个论坛,为成员提供了促进生意和提升技术设备建言献策的机会。<sup>⑥</sup>家族领袖李祥庵等不定期前来了解情况,表明管理之事还是他们说了算,是对玩忽职守的制约,同时这些会议也向领导层提供了生意上出现

<sup>①</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9页。

<sup>②</sup> 同上文,161页。这一做法有时会对良好的管理起到负面作用,这从张五麻子的例子可以看出。因他对李家忠心耿耿,作为回报,李家在他死后就雇用了他的一个亲戚,这个人没有本事且吸食鸦片,在李家就食多年。

<sup>③</sup>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2页。

<sup>④</sup> 宋潮澜:《我所了解的罗筱元》,39页。

<sup>⑤</sup>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1页。

<sup>⑥</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0页。盐号与总办距离遥远,就要求为这些盐号特别予以安排。在云贵市场的主要批发商号所在地,每三年召开一次股东会议,这也可能是盐号的掌柜盛情款待这些来访要人们的大好时机。同上书,158页。

326

的种种问题的第一手信息。<sup>⑥7</sup>

胡慎怡堂的资产少于同行，地理分布上不像同行那样分散，它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集中管理。每天早晨，各个业务单位都要汇报头一天的生产情况。一份送往慎怡堂，一份送往家族的总柜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慎怡堂的总掌柜主持各单位掌柜和家族领袖参加的会议，可以讨论任何生产问题，并决定解决方案。在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召开讨论所有最高管理问题的年会，<sup>⑥8</sup>决定整个下一年的计划。<sup>⑥9</sup>

大盐业家族赞同的协同行动，要求有一个成熟精细的通信体系，对于经营分布广泛的批发点的行动而言更是如此。帝制时期不存在一个政府掌管的邮政系统，这已被视为信息交流的主要妨碍。然而，在四川，为了满足盐业等贸易利益集团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发展出了许多高效的私人信息服务机构即大帮，以及民信局。到1880年代，由来自重庆和湖南的投资者所建的七个大的民信局，服务区域由四川中部拓展至甘肃、云南和贵州。<sup>⑦0</sup>李四友堂，还有其他类似的大多数家族堂，在他们的薪水簿上有一些“快脚”之类的名目，他们在总号与分布西南的各分号间传递紧急信息。这些人三昼夜可以在成都和重庆间走个来回，看似不快，但考虑到四川盆地起伏不平的地形，这个速度已是很快了。<sup>⑦1</sup>下属产业，尤其是位于边远地区的批发商号，也可以成为获得市场情况和竞争对手活动信息的基地。<sup>⑦2</sup>

---

<sup>⑥7</sup> 同上文，161页。

<sup>⑥8</sup> 这是一个标志着新年结束的节日，通常是在2月。

<sup>⑥9</sup>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7页。

<sup>⑦0</sup>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64页。

<sup>⑦1</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1页；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64页。

<sup>⑦2</sup> 这是胡慎怡堂购买嘉定府一个白蜡行背后的动机之一，嘉定府是第二大盐场犍为县的所在地。见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3页。

## 分裂与纵向一体化

### 分裂与小规模生产

富荣盐场盐业的大多数投资者从事小规模生产,通过仅购买各个井、灶的一部分股份,来分散他们的风险。尽管我们没有每眼井的所有人身份材料,但可能仅有一半是在上面描述的一体化管理机构控制之下的。许多是独立的,不能够享有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体化管理所带来的利润。确实,部分是由于小生产商的弱点,成就了大规模生产的食盐工业家们的兴盛。在发展初期,盐业家族财富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他们取得了对于营销的垄断,尤其是对于边岸和湖广地区的垄断。长途运输食盐的高成本以及需要保有大量的储备,等待有利价格的到来,这就将小规模制造商排除在外,允许极少数大的生产商掌控批发领域。<sup>⑦③</sup>

对于自贡一些投资者来说,分裂不仅仅意味着井与灶所有权的分离,以及无法抗拒由大的笕和大的食盐批发商号所有人所设定的价格体系;而且,许多井和灶的经营被分成若干部分,在许多单位间进行分割。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眼井是如何为许多少于10口煎锅的灶房供气的。有一些稀见事例,盐卤也由合伙人轮流推汲,这带来了无人维护和生产效率低下等种种风险。

更为常见的,是旨在为小的井户节省汲取盐井卤水成本的做法。通常,一眼井每天汲取一担卤水要用一头牛。<sup>⑦④</sup>因此,中等产量的盐井就要购买、喂养40—100头牛。除雇用实际操作和维护汲卤装置的人员外,一眼井也必须喂养牛只并为其治病,还要支付驱赶牛只、转动地滚子之

<sup>⑦③</sup> 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78页。

<sup>⑦④</sup>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0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95 人以及负责牛只日常所需的牛牌子的工资。<sup>⑦</sup>许多小经营者与专业汲卤者签订合同,而不是直接支出这些费用。这些“牛推户”以数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在大多数全面汲卤契约中,牛推户提供牛只和赶牛人,以及盐井之上箴索、卤筒等所有的可移动设备,还支付工人的工资,而这些人我们通常会认为是该井的雇工。井户实际上已将他自己与生产过程相分离,只是派一个人去监管他的利益。牛推户则得到该井一定比例的出产卤水。如果盐井发生事故,牛推户负责头三天的打捞。此后,他可能继续此项工作,但井户可能必须支付他额外的一笔费用。

也很常见的做法是,牛推户提供牛只和赶牛人,而井户继续从事生产,维护所有的设备、支付工人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汲取盐卤的筒数来支付牛推户报酬。四头牛组成一组,每次卤筒从升至最顶端后再放至井底,支付三钱银子。如果任何东西坠落井中,井户负责打捞。最后,当有问题出现时,雇用牛推户也并不少见。这种情况下,是以使用牛只数量进行支付的。对于那些不需整组牛只的情况,租金可以以每天使用牛只的数量进行计算。所有这些费用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比如转动一个地车同时为两眼井推卤。<sup>⑧</sup>

在富荣盐场约有 200 牛推户。他们总共有约 3000 头牛,在清末这些牛折合白银约 20 万两。这些约占盐场使用牛只的 10%。大多数牛推户自身就是小规模的经营,能够同时在一两眼井上工作。然而,一些有抱负的人,像李松山、黄四,有 300 多头牛,周荣泰和余三有 200 多头牛,依当时的标准看,他们也是富有之人。他们的获利最终使他们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投资他们自己的井和灶,并最终全然摒弃了契约推卤即

<sup>⑦</sup> 同上文,209 页。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25 页。每使用五头牛,就要雇一个牛牌子。

<sup>⑧</sup>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09—110 页。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25—226 页。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176—178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包推。<sup>⑦</sup> 就其本身而论,签约雇用牛只的做法很好地适应了分裂模式,这种模式在帝制晚期许多产业中都很常见。<sup>⑧</sup> 对于利用牛推户服务的井户来说,包推意味着更少的创办资本支出,但同时对于控制来说则是相当大的分散。即便如此,在更小的生产商看来,因盐井经营转包所带来的利润流失很少,故而值得这样做。<sup>⑨</sup>

另一种离李家、颜家和胡家盐井大规模工厂体系更远的是班房车制度。这也是为了削减拥有牛只的成本。这种情况下,井户不是租用牛只使用畜力,而是使用人力推卤汲井。人力成本很低时,小生产商就有了使用人力的灵活性。一旦购买牛只,就必须照料喂养,不管你能卖出的卤水如何少得可怜。在一些事例中,雇来推动地车的人力也要签合同,对工人工资负责的人力老板,仅雇用能完成井户所设定的生产额度所需的人数。<sup>⑩</sup>

96

## 大盐业家族的纵向一体化

小生产商与我们确定为盐业巨头的那些人经营之间的区别,不仅仅表现在他们的生产规模上,而且也在于他们在一个公司内部将生产和销售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上。对于食盐等产业来说,在资本发展初期所拥有的纵向一体化优势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就重要性而言,它们可

<sup>⑦</sup>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10页,1981年。

<sup>⑧</sup> 见第三章。有一些材料显示,牛推户比小井户饲养牛只更有效率。据《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引用的一份材料,与井户相比,牛推户拥有的牛只有时喂得更少,看病开支更少,这可以解释大的牛推户的利润来源。然而,盐井租用牛只仍然比他们拥有自己的牛只开销要多。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176页。

<sup>⑨</sup> 如果我们假设一卤筒能提升一至二担卤水,一担卤水可以为井户赚得0.47两,那么支付用卤筒汲卤的盐井要向推户支付他卤水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从表3.1和3.2可以看到,生产中最大固定支出的部分是购买和照料牛只。所以,产量越低的盐井签约汲卤,它的开支就越少。自我运营的盐井,产量越高,其收入就越丰厚。

<sup>⑩</sup>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72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20页。据张学君研究,班房车于1930年代再度出现,当时该地区的失业率极高。见张学君《辛亥革命与自贡盐业》,16页,载《井盐史通讯》第11期,1983年。

以与工业革命形成阶段美国大的石油和钢铁公司在组织结构上的突破性发展相比肩。他们通过将井与灶的所有权结合在一起,几乎始终能确保制盐中主要原料——卤水和气的供给。通过控制在四川的主要食盐批发商号,保证他们的食盐在四川的主要盐市率先出售。随着食盐生产的财富积累,他们扩展进入卤窆开发领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使他们可以彻底地控制大部分贡井卤水的营销,可以抵制不相隶属的自流井盐灶对他们生产需求的要挟。他们控制了巨额的资本储备,可以囤积煤炭等具有季节性的物资或商品——冬天时煤矿处于生产高峰,价格较低。最后一点,他们继续保持资产形式多样化,进入为食盐生产商服务的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包括信贷业。结果,到清朝末年,在产量几乎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实际上他们无需从外人那里采购东西,就可以做食盐生意。

### 王三畏堂的资产

1890年代处于巅峰的王三畏堂,可能是四川农业和工业财产最富有的单个私人业主,也有一些学者说,是中国之最。从扇子坝一些废弃的盐井来看,它控制着一个由井、灶、批发零售以及农业用地所构成的一体化帝国。除了资产的非凡价值外,王三畏堂的不动产是自贡商业活动的一个模板。各种资产相对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企业生命中的作用,也揭示出大的统一家族堂作为自贡盐业生产和分配的中流砥柱的兴衰变迁。

农业用地。王朗云一生都致力于谋求王三畏堂财富的增长。在去世前,他已经将家族的农业财产扩大至一年收租 17 000 多石。这些财产不仅分布在富顺和荣县,也散布在邻近的威远和宜宾,<sup>⑧</sup>王家成为川西最大的在外地主。在王朗云的侄子王惠堂掌事期间,这些都消散殆尽。在

---

<sup>⑧</sup>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8页。

上面提到的分裂管理时期,王家的债务上升高达 70 万两。因为他们都卷入了强势的渝(重庆)沙(沙市)债团向王三畏堂的贷款之事,该债团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重庆地方官起诉王家。直到重庆官运局的负责人插手,王家的债务才最终得以解决。在官运局的建议下,王朗云的下一代中最有能力的王达之,被任命为家族堂的总经理。为了还债以及筹集资本以挽救摇摇欲坠的盐业生意,王达之卖掉了王家手中年收租 3000 多石的土地,这极大地削减了农业资产在整个资产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但王家仍然是他们时代最大的地主之一。<sup>②</sup>

卤井和气井。在王达之接管堂务时,王三畏堂所经营的大部分卤水井都是由王家独自控制的。在他们最初发家的地方扇子坝,王家仍拥有 21 眼中等产量的盐井。平均每天生产 1000 担卤水,咸度依重量计约是 18%。在 19 世纪末,其中的 4 眼井枯竭了。然而,王家既有资本,又有良好的判断力,他们迅速向盐岩井投资,保持了他们从卤水生产中获得的高利润。到世纪之交,王三畏堂拥有至少 3 眼极高产的盐井,还有位于大坟堡中心的其昌井的 25 股。

98

王三畏堂的卤水资产并不引人注目,这并不奇怪,因为其根据地在自流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灶房生产。在扇子坝地区,王家拥有清疆、天生、金海、宝三等气井,最好状态下,每井能煎火圈七八十口。远为高产的是位于高山井地方的裕兴井、竹林湾的同兴和同旺井,以及上桥的洒海井,各煎火圈 100 多口,裕兴井可煎火圈 240 口,同兴井 175 口。

除了用自己的井生产的气煎盐外,王三畏堂也是自流井重要的天然气出租者。在 19 世纪末,它出租了 7 个灶房,每个约有 10 口锅。据任职过王三畏堂的一位经理的记述,王家自己总共仅有约 700 口盐锅在生产,此种情形下,他们出产的一些气必须外租。然而,即便是以这种生产

<sup>②</sup> 同上文,187 页。

水平计算,一天也应有约 400 包的产量,一年就是 14.4 万包。当时富荣的引盐额将近 3000 俄。以 450 包为一俄计算,王家一年将生产约 320 俄,占每年四川主要产盐地区引盐额的约 11%。<sup>③</sup>

商业企业。王三畏堂商业帝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广生同食盐商号。这一商号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进入湖广市场的食盐生产商创建的,并一直是王三畏堂这一大型盐业联合企业最赚钱的部门。我们对广生同商号的运作所知甚少,尤其是在与湖广贸易没有规章约束的时期。随着政府重新厘定了这一市场的额度,独自扩张食盐销售被叫停。尽管反对王三畏堂负责人进入新的官运商销体系,但大的商家如广生同商号仍可以从官府控制中收获一些利润。在新的分配体制下,食盐的销售被分成两部分,引盐和相对没有规章约束的票盐。销售引盐利润更为丰厚,但只有凭盐引才能在四川以外的地区销售。这样,事实上重建了大批批发商家的垄断,其中自贡当地重要的食盐生产商号占有一席之地。随时间而变化的引额,在运商、场商以及扎根盐场的盐商间平均分配,其中运商是早期跨省批发商号的继承人。每组分得运往湖广最初的 600 俄食盐额数的一半。在分给场商的 300 俄中,王三畏堂得到 72 俄,<sup>④</sup>占湖广整个批发市场的 12%。王相荣也负责仲兴祥商号,这是在仁怀边岸的两大批发商号之一。<sup>⑤</sup>

除了营销食盐,在 19 世纪后期,王三畏堂继续扩张,进入其他商业领域,他们现有的经营基础使扩展经济活动范围成为可能。<sup>⑥</sup> 他们的福昌生商号是大米、胡豆、黄豆、菜油以及其他基本物资的供应商。这些物资在泸州、江津购进,它们不只是储存在王三畏堂各井、灶等的厨房和牛棚中,也成为供应整个盐场的一个来源。为了确保他们自己的煤炭储

<sup>③</sup> 同上文,188 页。

<sup>④</sup> 随后的两个收受者是李四友堂和宝兴隆,后者是一个营销商号,在井和灶也拥有大量资产。

<sup>⑤</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7 页。仁怀市场,即仁岸,供给贵州省的仁怀直隶厅和遵义府、大定府、贵阳府。

<sup>⑥</sup>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0—191 页。



备,王家在高碛建立了便利煤场,这是富荣的主要煤炭分发点。同时,建立了天心堂药铺以购销草药,尤其是那些治疗水牛使用的草药。<sup>⑧</sup> 王三畏堂的负责人和李四友堂的成员,还有贡井的杰出盐商黄敦三、刘焕斋一同控制着富荣仅有的硝皮厂,垄断了处理盐场每年死亡的数以千计水牛的牛皮。<sup>⑨</sup> 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一些年份里,王家通过投资数家木厂,又向着统一供应和生产的方向推进了一步。<sup>⑩</sup>

王三畏堂的批发食盐贸易也使他们跻身数种与食盐仅有间接关系的生意。盐场直到1907年才建立了第一家票号。<sup>⑪</sup> 此前,食盐生产商从官方盐运局在重庆经营的官府仓库中拿到的白银,不得不运回自流井。为了增加利润,许多盐商开始使用白银购买外国棉纱运回老家,创立了一个可远达英国的三角贸易。王三畏堂为自己开辟了一个赚钱的棉花市场,在威远和荣县批发棉纱,并通过它们在自流井正街的广生公纱店零售。与此同时,他们瞅准盐场借贷和兑换设施不完备,在大坟堡街开

100

### 李四友堂资产

我们对李四友堂资产的详情了解甚少。它的鼎盛期要在王家之前,一般人们认为到了1890年代李家的财运开始滑坡。在1870年代,当时李祥庵的影响还可以感觉得到,李家在各个生产领域继续扩张。李祥庵的一生,据说开凿和出租了100多眼新井,只有17眼井的名字保留了下来。<sup>⑫</sup> 尽管李四友堂拥有的极少数气井产量很高,

<sup>⑧</sup> 清朝末年有30000头牛,照料水牛成了大生意。大多数盐井依靠私人药铺,常常由给牛看病的牛太医开办,这些与一家或一组盐井签约,为他们的牛只看病并提供药品。

<sup>⑨</sup> 同上文,121页。

<sup>⑩</sup> 王德谦和王子衡是长发祥竹厂的合伙人,王三畏堂则开办了广益公竹厂。见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9页。

<sup>⑪</sup>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59页。

<sup>⑫</sup> 17眼盐井中,恒通井1957年仍在生产。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1页。

但大多数都是卤水井，只可以煎烧 80 口盐锅。李祥庵的后继者继续着家族的凿井事业，包括投资双福井的 5 股，双福井是轰动一时的盐井。<sup>⑫</sup>

李四友堂的批发企业也分布广泛。大生厚盐号，总号在重庆，在宜昌和沙市有主要的分号，是四川计岸和湖广食盐市场第二重要盐号。<sup>⑬</sup>李四友堂的商号在边岸表现活跃，李家、田家和刘家联合营运的协兴隆盐号，是仁怀市场最大的盐号。盐号总部位于仁怀县城，70 多家分号分布于怀仁至贵州省会贵阳间的各州县。每一分号都有办公房屋、储盐的食仓以及职员的住所。李家在该地区拥有大量田产，所产租谷足以支付该批发商号及各分号的所有经营支出。另外，该商号培训和补充自己的反走私警力——盐警，他们护送自己的商人运输以及为商号股东做保镖。<sup>⑭</sup>綦江市场的情况也类似，李四友堂是那里大生美盐号唯一的所有人。<sup>⑮</sup>李家也从事许多的零售业务，包括拥有两家药铺和他们自己的木厂，供给建造盐井、天车、地车、天地滚子以及盐场建设所需的物资。<sup>⑯</sup>

### 胡慎怡堂与颜桂馨堂的资产

胡慎怡堂规模小于李家和王家的盐业联合企业，但它遵循了同样的纵向一体化以及在支柱产业投资的模式。表 4.4 说明了胡慎怡堂在主要生产方面的持续性扩张。

---

<sup>⑫</sup> 双福井见功时，是眼自喷井，每天生产 1 000 多担卤水，是盐场卤咸最高的黑卤井。共产党革命期间，它仍在生产。同上文，151—152 页。

<sup>⑬</sup> 同上文，160—161 页；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0 页。

<sup>⑭</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8 页。

<sup>⑮</sup> 同上文，160 页。綦江市场包括四川的綦江县和南川县，以及贵州的平原直隶州和贵阳府、遵义府、都匀府。大生美盐号售卖量一定十分巨大，它们的主货栈能容纳 30 馱盐。

<sup>⑯</sup>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4 页。

表 4.4 胡家三代的盐井开发

井名	井的类型	出产气(火圈口数)
1 胡元和(1830年代至1860年代早期)经营时所办盐井		
见龙井	黄卤	10
元龙井	黄卤	5
临江井	黄卤	无
双龙井	黄卤	无
知坛井	黄卤	15
2 胡承钧(1860年代早期至1892年)经营时所办盐井		
丰域井	黄卤	15
正龙井	黄卤	5
恩成井	黄卤	3
封成井	黑卤	不详
域川井	黑卤	15
德余井	黑卤	20
3 胡念祖(1892—1911)经营时所办盐井		
独自经营的盐井		
继成井	黑卤	202
宜春井	黑卤	102
至川井	黄卤	40
福源井	黄卤	无
元亨井	黑卤	10
成缘井	黑卤	无
元熙井	黄卤	无
义成井	黑卤	无
咸熙井	黑卤	4
天龙井	黄卤	2
作为下节所办盐井		
天成井	黑卤	4
福元井	黑卤	2
恒福井	黑卤	无
江源井	黑卤	无
大生井	黑卤	无

资料来源: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78—7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102 胡家几乎所有的盐井都是独立开凿的,除了在清朝最末数年有一批井买的是下节,这为他们完成开凿省了一半投资。

我们对胡家盐业之外的商业活动知之甚少。除了在嘉定府开办了一个商号做白蜡生意外,胡家还在成都开了家当铺。<sup>①7</sup>然而,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如同其他家族一样,还是食盐的批发营销。胡慎怡堂的福临怡号只出售胡家自己灶房所产的食盐,这保证了胡家在湖广市场的销售。<sup>①8</sup>1892年胡承钧去世时,胡家运盐资金及现银达30万两。<sup>①9</sup>随着在贡井土地上打出数眼高产气井,胡家也成为了使用气火灶代替传统的用燃煤方法生产巴盐的先行者。他们出产的块状食盐成色,要好于其他贡井商人普遍出售的食盐,这样,他们在巴盐占主导的边岸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地位。<sup>②0</sup>

颜桂馨堂遵循的商业策略,在许多方面与胡家类似。他们的盐井分布在自流井和贡井,这样可以利用两个盐场不同的生产能力。利润重新投资于食盐生产,而不是土地,颜家能够在19世纪晚期扩展他们的生产,而不用寻求外来的合伙人及借贷。<sup>②1</sup>颜家通过在伍家坡的总柜房,将在井、灶、笕的投资,协同成了一个巨大的盐业帝国。两个批发商号使颜家在湖广市场和四川计岸声名显赫。太和贞盐号在湖广做生意,在宜昌、沙市和汉口有分号;恒兴隆号在四川做生意,在江津、涪陵和重庆有分号。<sup>②2</sup>在太平天国结束后的一些年中,颜昌英的第四子颜觉吾,为云南和贵州的边岸建立了一个批发商号。

我们从现存的账簿中看不出这些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中哪些部门最赚钱。对于生产各个阶段都至为重要的资源的掌控,使得这几家及其他的大

<sup>①7</sup>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3页。

<sup>①8</sup> 同上文,58页。

<sup>①9</sup> 同上文,54页。

<sup>②0</sup> 同上文,59页。

<sup>②1</sup> 一个特例是,在颜昌英与他的姻亲李集庵间发展而来的重要投资合伙关系,李集庵不是兴盛的李四堂的成员。见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66—67页。

<sup>②2</sup> 同上文,68页。

商号成为了规模生产和范围生产的经济体,小的生产商无法与之竞争。由自己的牛只推卤以及用自己的气煎盐,免除了所需中间人的成本费用,确保了原材料的供应,尤其是在诸生产要素失衡的时期,这种煎烧自己盐卤的能力,对于企业的生产能力来说至关重要。在生产所有阶段进行投资,也使得较大的企业,在气和卤两者的市价发生相对变化时有了一道保护屏障。

零售市场的食盐运输和出售,可能不是盐业最赚钱的阶段。表 4.5 开列了川盐各主要销售地界即引岸的获利情况。由此可知,在 20 世纪初,湖广是川盐最有利可图的市场。从 1850—1870 年代,当时大家族堂好运当头,食盐运输上的赋税份额远低于清末民初。的确,在 1830 和 1840 年代,可能根本不用缴税,此后,只需缴地方征收用以抵御太平天国盟军的厘金。因为向湖北售盐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盐业管理范围,可能大多数进入湖北的食盐仍旧根本不用缴税。正如同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的,从 1878 年开始,清政府以及一些盐课在财政中占重要地位的省份,开始瞄准运往湖广的川盐。结果,盐税的上涨和湖北合法市场的续续断断地缩小,给四川生产商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商业策略已将湖北济岸作为生产和销售基地的生产商,其中最有名的是这些大家族堂。它们通过削减运输别人生产的食盐,能保护对自己产量的需求于一时。然而,这种贸易管束最终将受到它们的打击对象以及政府的攻击。

表 4.5 川盐引岸销售利润(两)(约 1916 年)

	湖北济岸(湖广) (花盐)	计岸(四川) (巴盐)	边岸(云贵) (巴盐)
主要的转运点	沙市	重庆	泸县/合江
一俄盐在盐场的价格	1 512	1 800	1 800
税和运费	2 938	1 445	1 911
目的地价格	6 010	4 304	4 968
每俄盐的利润	1 560	1 059	1 257
每斤*盐的利润	0.07	—	0.01

\* 每俄盐的斤数因时间及市场不同而不等。这里的估数是以樵甫的观察为基础。资料来源:樵甫,《自流井(第一集)》的数据,117—119 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 年。

## 104 防御性商业策略

富荣盐场的商业活动是随技术变化和市场机遇孕育而生的。如同大多数 19 世纪末的企业一样,它们的金融活动反映了它们对所存留的收入或利润以及当地可得到的信贷的依赖。然而,与受益于这一时期运输革命的西方企业不同,中国不发达的通信和运输体系产生了瓶颈,这对富荣企业的演进之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对胡慎怡堂和李四友堂的记述中,我们都看到了严格遵行保持相当数量现金储备的做法。这些家族所经营的每个盐号和盐仓,都要持有一大笔现金资产。在最兴盛时,李四友堂的柜房手头上总有 30 万两白银以备急需,它所管理的盐号要求持有的现金是该数目的三分之一左右。<sup>⑬</sup> 甚至是单个的井和灶柜房都有一笔应急经费,若这笔钱财花出去了,就会常常听到家族领导层对生意岌岌可危的哀叹。<sup>⑭</sup> 这种坚持拥有大笔流动资本的做法,应该在帝制晚期更大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之下加以理解。无力对抗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以及不断变动的市场情况,因此,即便是最成功的商人也产生了一种防御心理。18 世纪初雍正财政改革之后,政府机构留有经费以应付紧急事件。<sup>⑮</sup> 清朝最后数十年,政府的掠夺性税收政策极大地加重了制造商和运商对于现金短缺的恐惧。结果,在清朝,很大比例、本可以用于产业发展的现成资本闲置,这不是为了夸耀性的消费,而是出于谨小慎微。清朝覆亡后的动荡只能加剧人们的恐惧,导致了上述做法,甚至造成民国初年最大的食盐开发商们债务水平陡增,令人骇异,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

<sup>⑬</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0 页。

<sup>⑭</sup> 据说泰来灶的掌柜李粹山命人打制两个特别设计的木柜,每个藏有 40 000 两白银。胡慎怡堂的做法,见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59 页。除了保存在私人盐号的现金外,胡家的慎怡堂持有 200 000 两的储备金。

<sup>⑮</sup>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 世纪的中国合理化财政改革》(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136—190 页。

相比之下,增加大规模农业资产的做法,不应仅视为传统意义上家族的保守投资策略。到世纪之交,王家、李家和胡家分别年收租约17 000石、5 000石和7 600石,他们名列四川最大的地主行列。<sup>⑩</sup> 尽管投资在农业用地上确实是安全的,但农业用地也发挥着作为大型盐业联合企业一体化商业财产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我们已经看到了耕地可以105 可以作为有保障的现金的替代物。当王三畏堂在1880年代背负债务时,它没有出售盐业资产而是处置了农业用地,为的是保留它的产业财产。在土地上投资,商业资本的回报令人放心。它以田租的形式,可以在晚清高度流动性的土地市场上很快转化为现金。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用地的产品对于商业投资者的贡献。我们已经看到,使用出自农业生产的收入来维持李四友堂的边岸盐号。有相当多的材料表明了,商人用部分土地财产支持他们商业网点雇员的支出。王三畏堂收租机构所收的全部17 000石田租并不尽用于此,但盐业工人和管理人员从中得到他们的伙食,这是他们工资的一部分,对于雇员可达数千人的大生产商来说有着相当大的压力。<sup>⑪</sup> 每个家族的工地需要喂养600—1 300头水牛,也有着同样的压力。<sup>⑫</sup> 大的井户出租他们邻近村庄的部分土地给佃户,用于种草。在包牛工租佃制度之下,佃户必须同意以约定的数量每天向一些盐井供应草料。在扣除了租金后,地主会定期向佃户支付草料钱。地主接收草料,并要佃户缴纳租金。佃户的作物被固定给了买主,被迫低价出售。<sup>⑬</sup> 在胡豆种植者间也实行几乎相同的做法,胡豆是水牛的重要饲料,也是盐井的重要支出项目。可以看出,甚至是农业用地也为盐

<sup>⑩</sup> 只有颜家似乎有意识地不在土地上过多投资。例外的情形,是他们在创建三多寨商人休闲之地中所发挥的作用。见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67—68页。

<sup>⑪</sup> 富荣盐场工人数量的讨论,见第五章。

<sup>⑫</sup> 最兴盛时,王三畏堂拥有一千二百多头牛。即使是在衰败时期,它的盐井至少也有六七百头牛。见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7页。

<sup>⑬</sup>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19页。即便大的井户不直接控制农民对草料的处理,但因他们消费着相当大比例的草料,因此还是可以规定价格。每个盐场都有一些草市,那些未与特定食盐生产商签有协议的农民在那里出售他们的草料。

业服务,可以视作富荣盐场的供应、生产以及销售的纵向一体化策略的组成部分。

## 卤筧

与食盐批发商号一道,经营卤筧是大盐业企业为争夺盐业市场优势地位所使用的最强有力武器,因为它们向贡井高产黑卤井和自流井气井的较大生产商提供了一个运输连接通道。此外,在近三十年间内,筧户控制了两个盐场较小生产商所经营井和灶的供应来源。在晚清的盐业中,筧户的权力超过了其他任何部门,这在与盐业机构的关系中得到体现。这些权威机构决定谁的食盐可以在四川境外最有利可图的市场销售。

### 建设大规模卤筧

尽管通过竹筧运输卤水所必需的技术,早在乾隆时期就为人所知,但它的发展成为富荣盐场极其重要的问题,则是在 1850 年代以后。<sup>⑩</sup>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川盐市场的极速扩张和自流井(一般称为东场)气井的同时崛起,产生了对于贡井(西场)高产黑卤井卤水前所未有的需求。两场距离有 20 多里,约合 6.6 英里,在最早的竹筧铺设之前,供应东场大的灶房仅有的方法,是挑夫用扁担挑卤。以这种方法

---

<sup>⑩</sup> 传说建造卤筧的技艺最早由一位名叫林启公的福建移民在清初传入四川的。见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4 页;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视商》,135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3 辑,1983 年。也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2,章 4,节 10,页 87a,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 年。卤筧也在其他盐场用以传输卤水,尤其是犍为和乐山。然而,这些地方的卤筧很短,不论是开支还是技术都比不上富荣的。大多数是在井户自己的土地使用,当然一些大的卤筧确实也有某种租佃协议。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2,章 4,节 10,页 88b;《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3 页。



每天运输约 3 000 担卤水,仅相当于一條即将建设的竹笕的运量。<sup>⑩</sup>

在使用竹笕的高峰,从 1880 年代到民国初年,两个盐场间建有 18 条大竹笕。还有一些现已不为人所知的小竹笕,为偏僻的气井或是个体井户的需求服务。在贡井和自流井郭家坳之间的大通、裕和、大生、大川、同富、济通、大昌、源运、元昌和元通笕,就是常常被人说起的“十大笕”。连接大坟堡和气井的是达生、全福、一福、卿云、同新和恩流笕。它们与两处盐井运卤的大通、源昌笕一道,被称为“八大笕”。<sup>⑪</sup> 卤笕是了不起的工程,它们过山车似的外形出现在富荣多山的乡村天际线,盐场因此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游乐园。

卤笕本身是用中间被凿空的竹子,一根根相连所建成。连接处和竹子外表用细麻油灰缠绕。由竹篾作成的加固环件,包着整个卤笕以防爆裂,一年更换两次。卤笕随地势上下起伏。在平地,它们埋于地下。然而,河流和山川是极大的挑战。遇到河流时,卤笕直接铺在河床上,用倒置的石槽压盖以防止渗水和卤笕断裂。低浅洼地通过搭架来解决,就像

107

图片 4.2 表现的那样。然而,通过崎岖不平的乡村时需要相当高的技巧。令人极感兴趣的是通过高山的技术。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将卤水提升至一个楼架上,这是通过使用一系列相连接的木桶,由一个类似于灌溉农田所使用的提水装置驱动得以实现的。在地势很高的地区,会使用两三套甚至多达十套提升装置,沿着山表而建,基本上由骡子作动力,将卤水运至最高处。

<sup>⑩</sup>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4 页;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6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2 辑,1981 年。

<sup>⑪</sup> 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90 页;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9 页;《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4 页。我们会看到,恩流笕建造的时间比较晚。造成混乱的原因,是由于这些笕在使用时,随着时间而多次更名。例如,从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同笕于 1876 年由李四友堂建造时最初叫大生笕。1913 年它被拆卸运到贡井,此后它的名称改作卿云笕、大同笕。源昌笕没有移动过,然而它改名源新,后与同新笕合并。这些变化大多数发生在 1920 和 1930 年代,此时卤笕的顶峰期已过。见《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5 页。



图片 4.2 自流井盐水过笕图(约 1919 年)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正文前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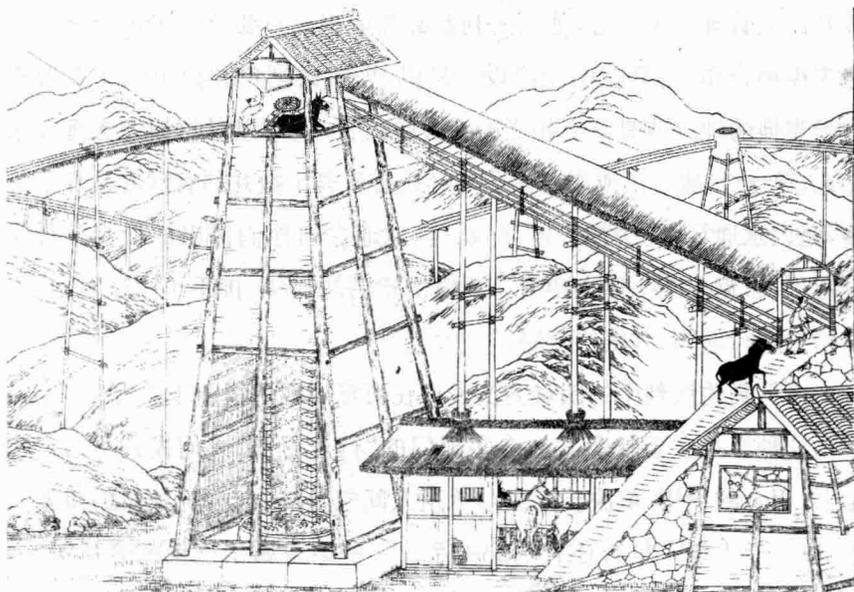
(见图片 4.3)<sup>⑩</sup>竹子柔韧性好,但不能弯折,因此也必须能够变换卤笕的走向以便适应地形。在卤笕转角处建一个大桶,称为笕窝。流过来的卤水流入桶中,以合适的角度,从另一端的一个新的竹笕流出。<sup>⑪</sup>

### 笕商权势的发展

在决定谁建造卤笕的问题上,政治和经济都起着作用。将多变的地形考虑进去,一条主要的卤笕长度可达 10—40 里。根据长度不同,建设费用从数千两到 10 万两以上,这对于进入卤笕市场来说是一个相当高

<sup>⑩</sup> 据李约瑟和罗荣邦的说法,有时要凿穿低山建隧道,这样卤笕可以继续向低处走,卤水在重力作用下到达灶房。见李约瑟、罗荣邦《盐业》(《中国科学技术史》一章的初稿),66 页,1972 年。我可以看到这一未刊稿,要感谢傅汉思的慷慨。

<sup>⑪</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第 2 篇,第 5 章,221—222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594 页。《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3 页。



图片 4.3 骡子推卤

资料来源：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2，井厂 2，页 30b—31a。

的资本门槛。<sup>⑮</sup> 结果，只有最富有的食盐生产商才有能力投资晚清工程上的这些庞然大物。的确，甚至此时，至少有一半的大卤窰是合伙制而不是独资的产物。王三畏的达生窰最初也是与其他股东一同建设的。然而，王达之早期将赢利投回企业的做法带来了足够的收入，他可以全部收购其他合伙人的股权，最终王三畏堂独享该窰的所有权。<sup>⑯</sup>

不单是成本限制了大窰户的数目。卤窰的开发商面临地主的敲诈，这是在建造卤窰时一个常见的瓶颈。在早期盐井和盐灶的发展过程中，外部资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卤窰开发商几乎无一例外是当地企业。为了凿井，一个人需要从地主手中租佃一块地，常常渴望投资资本，以进入盐业工业家的行列。而卤窰的情形是，一个人必须得到卤窰所经过土地的数十或数百个地主的配合。许多人是农业用地的地主，若卤水泄漏

<sup>⑮</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248 页。

<sup>⑯</sup>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4 页。

以及卤筭管理人员粗心,他们的利益必然受损。只要有一个关键地段的地主拒绝合作,卤筭就不能建设。是以,大多数筭户和卤筭的主要股东都是当地的地主或是具有相当的地方政治资本、可以对付地主无理要求的人。<sup>⑪</sup> 泸州盐商王成之在民国初年通过从若干盐井的管理人员那里筹资,建设永通筭,设法打入该领域。当地地主向他们提出的谈判条件十分苛刻:卤筭要在一年内建成。胡慎怡堂的胡铁华,接手了永通筭,再次就租约进行谈判,并很快就赚了一大笔。<sup>⑫</sup>

卤筭契约谈判中的困难突出表现在卤筭用地的租金千差万别。<sup>⑬</sup> 看不出这种也存在于盐业其他许多部门的“行业习惯”有何模式可言。实际上,租金的费用,取决于地主与承租人间权势的强与弱、地段的重要与否,以及各当事人是否还有别的关系。一些地段属于连锁的合伙关系,比如分享一个卤筭所有权的井和灶。有时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井户和灶户自身在卤筭没有投资,但同意对卤筭开发商来说有利的租佃条件,作为回报,则要优先运送他们自己的卤水。例如,达生筭的地主之一是王六房,他是数眼盐井的所有人。他们的契约规定,该筭号只能从他们的井中购买卤水。这些安排有任何变化,都要求重开租约的谈判。<sup>⑭</sup>

租佃期限也影响着卤筭的生存。永久租佃在盐井投资者中已极为普遍,但卤筭的租期继续限定在平均七年的时间。<sup>⑮</sup> 一旦租约到期,不能

⑪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7页;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页6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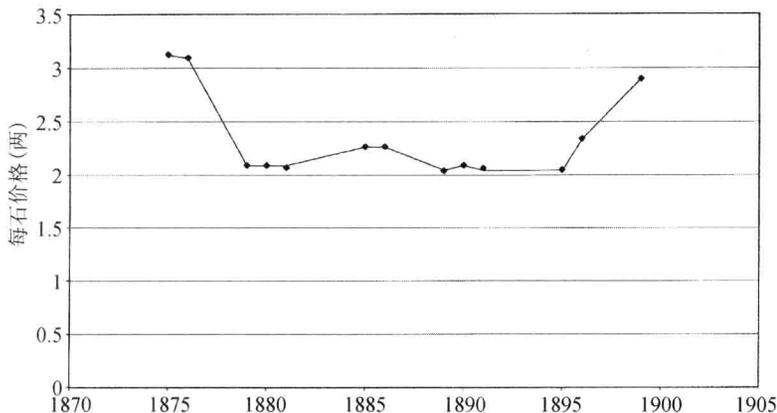
⑫ 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视商》,137页。胡绍章(与胡慎怡堂没有关系)的例子同样有说服力。胡绍章是20世纪初贡井的一个大的井、灶户。尽管他管理500多口火圈的气和数眼盐井,并有自己的售盐商号,但由于没有地方上的关系,他不可能租用土地建造卤筭。直到他雇用当地名人余述怀出面为商号安排建筑的土地租约,他的目标才得以实现。见崔雨脂、颜绍渊《贡井盐商余述怀》,173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

⑬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84—285页。租金的悬殊,见契约第547—572号。大多数契约规定了筭的杆数,必要的话,还规定橐桶等设备的位置。

⑭ 同上书,298—299页。

⑮ 《四川盐政史》指出卤筭的土地租约10年到20年不等。然而,富荣契约中的期限是6年到10年。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页69b。

保证笕号可以再续约。而以家族为基础的卤笕,像王家的达生笕可续约超过 30 年,这证实了他们的实力。达生笕所签订的契约证明,王家能够就他们大量的租约在到期之前就通过重新谈判达成预佃,即提前租佃契约。与此同时,尽管不同地主的租佃条款各种各样,但在 19 世纪以前,对于卤笕用地的个人租金部分鲜有变化。然而,从 1890 年代开始,租金上涨高达 100%,这远不是同一时期米价的变动所能解释的(见图表 4.2)。<sup>⑭</sup>



图表 4.2 叙州府平均米价(1875—1899)

资料来源: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农业类·雨雪粮价”,第 75、79、88、92、95、105、112、117、121、125、137、140、142、146 包。

大家族动用建设大卤笕所需的经济和政治资本的能力,确立了他们在卤笕领域的优势地位。直到民国初年,李家、王家和胡家资本,控制着大坟堡的主要卤笕中的六条,还以合伙形式管理着另外两条。<sup>⑮</sup> 这不仅

110

<sup>⑭</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96—297 页。有关达生笕有 65 份文件保存至今,时间是 1889—1920 年。见契约第 732—797 号。清初上报米价,一般要上报帝国的每个府的高价与低价。1850 年自流井所在地叙州府的平均米价是每石白银 2.1 两。我们将此与清末数十年的米价相比,可以清楚看到,米价保持相对的稳定,除极端的水旱灾害时期外,与 1850 年的相比没有什么涨幅(图表 4.2)。

<sup>⑮</sup>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6 页。在另一篇文章中,罗筱元认为在 1890 年代,现有 70% 的卤笕由王家和李家直接或是合伙拥有。见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视商》,135 页。

营销中的霸权地位。

大多数卤窰开始是由大的井户和灶户建造,以满足他们生产上的需求。但19世纪末,卤水井和盐灶的大量结合,是在供给他们的卤窰的名义之下组织起来的。当销售食盐时,用的商标正是窰的名字。<sup>⑭</sup>较大规模的窰户也开始与其他盐卤生产商建立联系,也运输他们的卤水。属于其他井户和灶户的卤水以两种方式通过卤窰运输。一些窰户买断盐卤,视自己的成本和卤水最终出产食盐的市场价格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卤水咸度越低,产盐越少,运输时就越贵。这种情况下,灶户为这种卤水支付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这种卤水运输费用很贵,而售价特别低,因此井户运输时实际上每担多付了一笔钱。<sup>⑮</sup>

111 不论窰号是如何得到卤水的,总之它们控制着气火盐锅煎盐购置的大部分卤水,也享有窰中所储存的卤水的利润。<sup>⑯</sup>没有卤窰的盐灶,可以通过相当于今天的现货市场得到卤水,优点是他们可以调整订单,以适应食盐市场以及向他们所供气的强度变化。然而,卤窰有固定不变的运输能力,上述做法和与一条卤窰签约、每年得到一定量的卤水相比,是风险更大的供给模式。卤窰权势大小的一个标志,是盐灶提前依契约付款,而盐井差不多每四个月从卤窰处拿到支付他们卤水的款项。<sup>⑰</sup>除了他们的利润外,这事实上给了窰户每年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无息贷款。

当然,不是所有的卤水销售都通过卤窰。一些生产卤水的合伙人拥有灶房,可以供应他们自己的原料。有的直接从贡井的盐井购买卤水。这些情形下,他们可能仍然通过卤窰运输,直接支付一笔运输费用——

<sup>⑭</sup> 同上文,137页。

<sup>⑮</sup>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9页;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视商》,139页。

<sup>⑯</sup> 美孚石油公司开始建造长距离输油管道时,也赢得了类似的有利条件。正如钱德勒指出的,管道输送原油,比铁路更便宜。“管道运输比起铁路运输,更可能规划一个更大规模和更稳定的炼油厂。”管道给美孚石油带来了额外的石油储备。美孚石油为自己的炼油厂而夺取运输原油的能力,依赖于它使当地的企业都参与进来从而左右司法制度。

<sup>⑰</sup> 崔雨脂、颜绍渊:《贡井盐商余述怀》,173页。

“过价”。<sup>⑳</sup>简单运输所获之利，比不上处于卤水生产商与卤水煎烧商之间的卤笕所得。那么，笕户遭人起诉，被告试图增加他们的所得，阻挠盐井直接卖卤给盐灶，就毫不奇怪了。笕户收取大量的过子水即流折，因为当卤水在这种竹子迷宫中流动时，不可避免要有流失。名声更坏的卤笕经理人稀释或是在井户将卤水输入卤笕和接收卤水的盐灶用车拉走的时候，使用大小不同的量器。<sup>㉑</sup>

卤笕所有权的吸引力，不只是在于购买盐卤时可以有折扣，还在于盐卤出售时有加价。当大盐业家族建立他们的卤笕时，富荣井火灶对于卤水的需求，持续超过了卤笕的运输能力。我们假定全部 4 895 口燃气锅昼夜生产，每口锅出产约 32 斤盐，使用的卤水黑卤占 75%、黄卤占 25%，那么两处主要的井火灶每天消费可能超过 38 万担盐卤（见表 4.6）。用卤笕运输的卤水不会超过这一数目的十分之一。因此，卤笕实际上是为他们的卤水提供了有保障的来源与市场。而且，除了少数检查卤笕泄漏，操作几处提升装置以及监管盐卤的引入点和输出点的人员外，卤笕的雇工人数极少，劳力成本很低。然而，正是卤笕所有权对于盐卤的控制，成为卤笕发展中主要的有利条件。在开发盐岩层之前，在自流井，井火灶的供应持续处于短缺的状态。如果有设备的话，盐卤可以储存，但天然气不论是否利用都将逸出。闲置的盐锅意味着丢失利润，许多盐灶因无法得到持续供应而被迫关张。在 1920 年以前，当时天然气供应充足，而盐卤仍难获取，笕户总是在签订外面的契约之前，先供应自己的盐灶。同样，在 1890 年代中期和 1920 年代及 1930 年代初，盐卤供应过剩的短暂时期，他们也可以优先运输自己盐井的卤水。<sup>㉒</sup>

112

<sup>⑳</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3 页。

<sup>㉑</sup> 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90 页；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7 页；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视商》，140 页。

<sup>㉒</sup> 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视商》，139—140 页。

表 4.6 主要的井火灶房卤水需要估计量(约 1916 年)

	郭家坳	大坟堡	总计
大锅数目	4 311	584	4 895
每口锅日产盐斤数	32	32	
日产盐总斤数	137 952	18 688	156 640
每斤盐所煎卤水担数			
黑卤	2.31	2.31	
黄卤	3	3	
日均煎卤水担数	342 467	46 393	388 860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14、218页;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年),卷2,篇2,场产,页56;卷3,篇2,场产,页1。

因为大的井、笕和灶户是仅有的能够保证生产水平的生产商,所以他们就联合在一起,发展与四川食盐批发商之间的特别关系。一般来说,食盐依预签合同卖给大的盐号,一年交易三次:端午节、中秋节和新年。能够签订这些寄售食盐合同的商人数很少,笕户是其中之一。随着官方运输、商人销售的官运制度的建立——这将在第六章进行讨论,一年三次交易时,引盐要在官府进行登记,笕商逐渐控制了向湖北济岸和边岸的食盐供应。除此之外,仅有笕商能够与政府就价格问题进行谈判。根据富荣一位卤笕管理专家的记述,笕商每季与官运局谈判时,被给予开盘价。小生产商得到更低的跟盘价,而且,如果市场不景气,就要削减他们的份额。<sup>⑬</sup>

### 大卤笕的管理活动

大卤笕的管理与井、灶的差不多。李四友堂的大生笕,一名掌柜全

<sup>⑬</sup>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5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梘商》,137—139页。据罗筱元说,强势的笕商可以从官运局多买引盐。见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0页。



面负责经营。其下有管账一人,帮账一人,还有管现钱一人。卤笕柜房以外还有一名水外场,职责是在购买销售盐卤时进行谈判。还有一名写水账,负责记录卤水运输。此外,还有两种监工级别的岗位,可以认为是管理的最底层:一名总签和属下四名散签,职责是监管盐卤在笕的进与出。一条卤笕所需劳力要少于一眼盐井。雇用 10 人操作提升盐卤流过高山的装置,一人负责照料推动提升装置的骡子,两人检验井户所要运输的盐卤浓度,还要雇用一名有经验的工人修理卤笕。另外,一些人役作为轿夫、厨子和打杂。<sup>⑬</sup>

王三畏堂经营的大昌笕柜房也有着类似结构。由两个总理和两个帮办负责,有权雇用和解雇所有的管理人员。合伙人在大昌笕的生意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每 20 天碰面讨论问题,检查账目,并提出促进卤笕生产的建议。然而,笕号的最终经营大权还是在管理人员手中,甚至由合伙人经管的井或灶在与卤笕打交道时,在价格和使用的量器上也不会有优待。我们对于大昌笕生意的进展知之甚少。然而,到 1918 年大昌笕已有火圈 163 口,积本 35 525 两。<sup>⑭</sup>

## 组织创新与资本积累

盐商对于史学家而言,一直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在中国的非土地资产还处在发展初始阶段时,就拥有巨额的财富。然而,在大多数分析者看来,盐商因得到了政府垄断特权,才有了积累资本的能力。他们财富的来源,事实上是依附于与官僚的关系,这有助于解释盐商在生活方式和投资实践上效仿拥有土地的精英。同样的,购买政府引盐的权利也常世袭的事实,强化了他们的家庭主义,可以作

<sup>⑬</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55 页。

<sup>⑭</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76 页。

为他们财富的封建实质的明证。没有人认为在这里有组织变化的基础。<sup>139</sup>

114 富荣商人从事的是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但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近代商业活动的极为不同的窗口。如果看到的仅仅是他们与盐课的密切联系以及许多生意中亲属关系的根源,那么将会错过他们所取得成就的真正意义。没有长时期的账簿可资利用,我们不能轻易总结出他们生意成功之所在,但是我们所拥有的零星材料,让我们可以对于近代早期中国的资本积累和企业合并进行重新评价。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记述的商业成功中,家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有的重要盐业企业都有家族堂作为它们的组织基础。对于现存的数百份富荣场契约的考察证明了,井、灶和窰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家族堂。在最成功的盐业企业家的事例中,发展纵向一体化资产,在一个家族堂之下进行管理以及使用最少的外来投资,是商业组织的理想方式。家族堂起到了近代商业环境中的公司的作用,通过世袭或是继承,防止家族堂资产的分割;通过家族堂内部的规章,管理收入的再分配。家族堂,将许多亲属的资产聚拢在一起,是投资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家族堂在组织上潜能巨大。管理各种不同财产的经验,转化为推动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的企业的发展,这反过来,为实现规模效益提供了种种重要的时机,并支持了这些企业捕获更多市场份额。

家庭情感及更为重要的、可以指挥家族成员的家庭等级,对于富荣盐场的发展很重要,但人们不应该过分强调自贡盐业企业所采取的是中国人在投资和管理策略上的特有品格。他们不依赖外面的资本市场,这一点与西方的同行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不愿意将其企业的所有权保留在家庭和亲友的狭窄圈子内。正如史密斯和西拉在谈到美国时所说

---

330 <sup>139</sup> 何炳棣:《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研究》,载《亚洲研究杂志》第7卷,1954年;关文斌:《天津盐商:帝制晚期中国的国家形成和市民社会》,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1年。

的：“1890年之前，整个商业发展十分简单。除铁路外，没什么大的企业要求长期的外部融资。”<sup>⑬</sup>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开创性著作已经表明，那些在美国开发大众市场的卷烟、火柴、面粉、肥皂，甚至胶卷等的大多数制造商，在1880年代，基本上是在内部找到他们早期事业所获的利润，作为他们的流动资金和经费，以发展他们的工厂和设备的。尽管他们为了长期和短期贷款，的确有赖于当地商人和商业银行，但他们不必依赖外面的资本市场，这意味着当他们发展时，不必放弃对于他们企业的控制。“如此一来，尽管日常的经营不得不交给全职、领取薪水的经理人，但长期投资、经费分配和管理人员招聘等，依然集中在少数的所有人手中。”<sup>⑭</sup>

115

在自贡，一些投资者选择只与他们自己的亲属集团做生意。但契约材料证明，最高产的资源是由不同姓氏的投资者团体所开发的。王三畏堂，在它的后期是一个巨大的统一的家族企业，但开始时是通过寻找无关的投资者组成合伙关系以积累财富，那些人常常甚至不是四川本地人，而是与王家先前有着生意往来的人。在19世纪中期，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内战，这是极巧合的历史事件。然而，战争带来的振荡，在两个大陆都开启了新的市场，给许多羽翼初丰的工业家们带来了利润，他们以后的财富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绝不是巧合。如同美国的商人一样，自贡商人抓住了这些市场机遇，积累资本。时移世易，技术的进步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动，都促成了盐业持续不断的结构性变化。富荣商人培植政治和社会资本，作为保存他们个人财富和市场份额的一种手段。为此目的，他们担负起了传统的士绅职责，作为正在出现的中国近代商业精英的一部分，推动了近代商业和法律制度的发展。我们将在第九章探讨这一转变。

<sup>⑬</sup> 乔治·戴维·史密斯、理查德·西拉：《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论美国资本市场历史》，18页，载《金融市场、制度与工具》第2卷第2期，1993年。

<sup>⑭</sup>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看得见的手》，298页。

在近代早期的四川,除农业外,盐业是劳工的最大雇主。一支人口大军在盐灶上劳作,凿井,汲卤,照料牛只,供应建设物资和食物,运输卤水、淡水和煤炭,从盐灶向销售点以及从码头到码头运盐。早在 19 世纪就有学者估计,仅在富荣就有十几万人。如前所述,在 19 世纪,四川盐业生产整体上增加了至少 350%,不保守的估计更高达 650%。这一过快的增长,集中于四川西南部的盐场,最有名的是犍为、富顺和荣县的盐场。盐产量激增,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而这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时常被忽略。

极为重要的是相对自由的劳动力的流动。一直到明末——也可能更早些,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地以及职业间的变动,不受任何法律和社会的束缚。我们已考察了许多盐业企业家经由一个或多个中间地点移民四川并沿路尝试多种方法以求发家致富的历史。在盐场做工的十几万工人,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们大多数来自异乡。即便是来自农村(他们大多数是乡下人),他们也已有靠工资为生,做零工,以及当小贩、运输工人和矿工的<sup>117</sup>经历。盐井和盐灶的雇用条件恶劣,但许多自贡工人在他们的新居住地,采取与他们的雇主相同的做

法,通过建立同乡会、宗教团体、帮会和各种秘密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 移民与工业化

中国人口史的一些重要研究是以四川为对象的。<sup>①</sup> 大多数研究关注它人口总的增长,而保罗·史密斯的论文,描述了四川的人口中心在 7—20 世纪有一个从东北移向西南的长期过程。<sup>②</sup> 这些人口运动可能反映出了盐业生产在四川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四川经济从上述时段的中期开始就日益集中在西南部。就我们所研究的时段而言,盐业日益增长对此的拉动确切无疑。藏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四川布政使上报的民户男妇丁口数目,使我们能够将四川人口与那些重要产盐区人口的总增长进行比较。这些统计数字是四川布政使在各州县报告之上汇总而成,每年上缴北京户部。它们显示,在 1822—1887 年间,四川总人口增长了 66%,年增长率约 0.78%。然而,三个最重要的盐场所在县,年均人口增长率是 1.02%—1.37%。<sup>③</sup>

清初,四川人口增长最重要的来源是移民,直至晚清,这还是四川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正如施坚雅等人已指出的,到清末,四川自身业已“填满”,这里丰富、未垦殖农田对移民的拉动作用已经消失,并

① 最重要著述包括鄢华阳《四川的移民和定居:1644—1796》,博士学位论文,哈佛大学,1982 年;吕实强《近代四川人口密度与人口压力的分析》,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5 期,1977 年;施坚雅《十九世纪的四川人口》,载《帝制晚期中国》第 7 卷第 2 期,1986 年;以及王笛《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

② 保罗·史密斯:《长江上游的商业、农业和核心区的形成:公元 2—1948 年》,980—1980 年中国经济史时空趋势与周期研讨会论文,10、57—61 页,意大利贝拉蕉,1984 年。史密斯利用了 5 个基准年份,其中只有一个在我们所讨论的历史时段之外。

③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四川省道光二年民户男妇丁口数目》,档案 6697 号;《四川省光绪十三年民户男妇丁口数目》,档案 7529 号。这些数字无疑有些错误,但我们能认定整个四川的错报程度相当的一致,因此它们可以用于人口增长的比较(而不是绝对)分析。三个主要盐场总人口增长数:富顺(自流井)94%,荣县(贡井)144%,犍为(五通桥)111%。

且太平天国对长江下游和赣江流域造成了极大破坏,从而这里对于中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和东南部省份的农民来说,提供了新的、更近的移民目的地。<sup>④</sup> 在讨论某些专门类别的盐业工人来源地的研究中,可以找到富荣劳工市场中移民所起作用的定性分析。<sup>⑤</sup> 乐山的烧盐工人主要来自湖北和广东;严如煜发现,犍为的凿井匠来自贵州。<sup>⑥</sup> 频繁往来于富荣和四川东部重庆长江码头贸易路线的商人和运输工人,为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带去了就业机会的消息。这一时期,富荣的烧盐工人多从重庆府江津和南川县移民而来。<sup>⑦</sup> 江津县自身的经济,部分有赖于为富荣市场制造盐锅和向富荣盐场输出农产品。<sup>⑧</sup> 事实上,到18世纪初,富荣正在吸纳第三次的移民潮,他们基本上来自四川省内,其中沿长江上游这一大区域边缘地带的农业低产地区的农民占大多数。到乾隆末,这些曾经在向边远和丘陵地区的第二次移民潮中是极其重要的地区,也正被“填满”。因此,当1830和1840年代西南部的这些盐场生产需求急速扩大,许多人移民这里,就无足为奇了。南川县是这方面的典型。这是个贫穷的山区县,主要依靠煤、铁的采掘,到20世纪,它的农业用地利用率下降到只有13%。

中国学者也认为,气候条件也是驱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盐场的原因。在1864年、1873年和1884—1885年洪水之后,四川又经历了大面

④ 施坚雅:《十九世纪的四川人口》,65页。

⑤ 中国学者对于这一现象的一般性讨论,见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和明清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552—5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⑥ 《乐山县志》,卷7,经制,1934年。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0,页11,1822年版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重印本。

⑦ 舒文成等:《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宫》,3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⑧ 查尔斯·胡:《四川盆地的农业和森林业的土地使用》,126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6年。

积的干旱。<sup>⑨</sup> 19世纪晚期的粮价数据证实,以上时期都存在着一系列的粮食危机。<sup>⑩</sup> 在上述时期,四川地处边缘的山区各府粮价的回落,与环重庆和成都的核心区域相比,要慢许多。

我们对于工人是如何来到富荣的知之甚少。<sup>⑪</sup> 可能有两种主要的形式。第一,如同烧盐工人的情况一样,凭借在富荣市场做生意以及与富荣井、灶投资商人的同乡关系,四川与贵州交界州县的一些人,常常成群地移民盐场。清初,许多人作为纤夫,从湖北西部进入四川,拉船逆流而上,通过三峡抵达重庆。回航时所需船夫比逆水而上、通过汉口和夔关之间急流的少许多。数以千计的人滞留四川,许多人进入沿四川与湖北、陕西边界的贫瘠农业地区,从那里再进入富荣和犍为的盐场。<sup>⑫</sup>

第二,工人可能是由在周围各县村庄活动的把头招募来的。我们知道,富顺木厂许多工人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从宜宾以及富顺县的双石铺、邓井关和毛头铺被带到盐场的。<sup>⑬</sup> 把头们进入边远地区,将人们吸引到盐井来,这也见于史料记载。以这种方式被带来的人,常常要立据画押,是因为他们向土豪借了钱,而这些土豪是立约要招募劳力的。这种做法在1820年代末的乐山是违法的,但在盐井发展初期劳力相对缺乏时可能更为常见。<sup>⑭</sup>

119

⑨ 《四川近百年大事提纲》,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载彭久松、陈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四川井盐史论丛》,248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⑩ 重庆的米价从1863年1.2—2.06两/石跃至1865年的2.72—3.78两/石。1874年、1880年代中期也发生了类似的飙升。见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农业类》雨雪粮价,第45、49、53、92、105包。

⑪ 移民的机制,见鄢华阳《四川和清代移民政策》,载《清史问题》第4卷第4期,1980年。曾小萍:《雍正朝政府对于垦荒和隐地的政策》,未刊稿,1986年。

⑫ 严如煜算得每天在重庆停靠10只船,每只载七八十人。这些人仅有一半乘船回航,结果,甚至是在19世纪中期,在贸易季节的高峰,每月至少有一万人滞留在四川。见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0,页15。

⑬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⑭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页24a,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21—622页。

如此一大群形形色色、无所隶属的人的出现，自然为官府所关注。如同矿工、烧炭工和迁移的农业劳力一样，盐业工人也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对秘密社会和匪帮的招募来说是天然的人员储备库。就盐业而言，盐井坐落在人口稠密、经河流极易到达的农业地区，故而对于迁移而来的农业劳力进行剥削，就没有什么风险。然而，也有材料显示，在19世纪初，大多数盐业工人的移民身份是官员极为焦虑的事情。但这种关注仅是在东面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时才凸显出来。1853年的一通石碑记载，令犍为部分灶户调查他们雇用的每位盐业工人的背景，为的是避免土匪渗透进盐场。<sup>⑮</sup> 类似的命令也可能在富荣颁布过。即便这样做了，当李永和、蓝朝顺的起义队伍于1859年占领富荣盐场时，还是未能扼制盐业工人大规模地倒向敌对的起义队伍。<sup>⑯</sup> 19世纪初年，是这些快速发展中的产盐地区的动荡年代，这也是工人们自己积极组织起来的年代。清朝大部分时期，这两种力量交汇，提供了一个异常稳定的劳动环境，这有利于固定工的利益，同样也有利于雇主的利益，这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盐业转型之时。

## 盐业劳动力的规模

正如很难追踪考察进入盐场的人的确切移动一样，几乎不可能计算富荣盐业在黄金时期究竟直接雇用了多少人。当时观察者的估计，生计依赖盐场的总人口在数十万到100万之间。1880年代，四川总督丁宝楨估计至少有100万人在井、灶工作，另外数十万人作为船工运输食盐。<sup>⑰</sup> 120 在19世纪晚期从事写作的李榕，对此的估计偏低：有三四十万人，包括供应盐场的小商贩和在附属产业工作的石匠、锻造工人等。<sup>⑱</sup> 20世纪初

<sup>⑮</sup> 碑文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21页。

<sup>⑯</sup> 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55页。

<sup>⑰</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2，转运7，页32b，光绪三年丁宝楨奏折，1882版。

<sup>⑱</sup> 李榕：《自流井记》，载蒋德钧编《十三峰书屋全集》，卷1，页5b，龙安书院，1892年版。



编纂的富顺和荣县地方志,记载了两县总人口的官方估计数字,在清末分别是 898 356 人和 482 513 人。这些数字不包括未成年人,但可以认为,如同大多数清末人口数字一样,这少算了至少 10%。<sup>①</sup> 因此,当时盐场每年有差不多 100 万常住和流动人口,并非不可思议。

富荣的劳动力仅有一小部分从事汲卤、煎盐和管理卤窰的卤水运输。冉光荣和张学君这两位四川盐业研究的著名专家估计,在富荣每眼井平均雇用 50—70 人,每个灶 14—23 人,每条窰 28 人。如果依据樵甫于 1916 年编纂的民国初年自流井概览中所记录井、灶、窰的总数计算,我们得出富荣盐场中自流井部分的基本劳动力总数是 7—10 万。<sup>②</sup> 假定贡井盐场的劳动力要少些,那么该盐场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雇于盐业生产。余下的或是具有依赖性的妇女、儿童、老人,或是从事农业、辅助产业,或是在各种商业和金融企业的人,这将在第十章予以讨论。到 1930 年代,机械化水平更高了,所有生产部门所雇用的人数都有减少(见表 5.1)。我们将看到,由于高产盐岩井的发展以及在战争期间需求的总量减少,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在民国中期也有所减少。由此造成的盐场失业改变了 19 世纪在劳资间所建立的脆弱平衡,这为各现代政党动员劳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sup>①</sup> 李永成纂:《富顺县志》卷 5,页 3a(宣统元年[1909]的统计数字),1931 年版。赵熙纂:《民国荣县志》,卷 7,页 2a(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统计数字)。

<sup>②</sup> 樵甫的数字比《四川盐法志》的更精确。后者只是开列了晚清登记纳税的井和灶,总数是 405 眼井,1 055 口锅。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5,井厂 5,页 4b,页 9b。樵甫开列了 1 098 眼井,雇用的人数 54 900—76 860。根据樵甫的估计,东场有灶房 571 处,西场有灶房 345 处,分别雇用 3 026 和 1 404 名烧盐工人。然而,他指出这一数字不是灶房的所有工人。见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53—160、167 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 年。如果我们将冉光荣和张学君的数字作为计算的基础,那么,当时灶房的人数在 12 824—21 068 之间。最后,考虑到只有 18 条大窰,我们再加上 504 人卤窰工人。因此主要生产上所雇用的工人总数约在 68 228—98 432 人。凌耀伦对于井、灶工人人数的估计,对于灶则高些,并要低些。使用他每眼井四五十工人,每灶三四十工人的数字,我们仍能得到盐井工人数 71 400—91 540。见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5 页,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14 辑,1982 年。这些数字都对《川盐纪要》的估计作了很好的修订,引自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47 页。

表 5.1 富荣的井、灶、筑雇员类型和平均人数

井	
工种	雇员人数
经理	1
管账	3
帮账	2
管事	2
山匠	2
井口管事	1
牛牌子	1
拭箴匠	3
生火工	3
开车工	3
大帮车	2
捣碓匠	20+
大杂工	3
杂工	3
学徒	6+
总数	55+
灶 *	
工种	雇员人数
经理	1
管账	3
帮账	2
管事	2
灶头	1
桶子匠	1
烧盐工	10
大杂工	2
学徒	6+
总数	28+

\* 假设一个灶有约 50 口锅。

(续表)

工种	雇员人数
大笮	
经理	1
管账	5
煎卤工	1
坐码头	2
坐棹桶	2
笮匠	6
巡笮管事	1
挑卤水	8
马夫	3
白水工	4
学徒	6+
总数	39+

资料来源: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页82a—85b,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年。

## 现代自由劳力的增长

从规模、密集程度及组织的角度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鲜有地方能比得上富荣的劳工条件。直到1933年(可能还要到1950年代),现代工业的工人——限定在工厂、采矿业和公用事业单位的工人,不超过约2亿中国总劳动力的1%。如果我们加上所有的手工业工人,以及现代和传统的运输工人、从事买卖和服务业的工人和职员,那么,所有的非农业劳动力仅仅占全部劳动力的25%,整个中国总人口的13%。<sup>①</sup> 相比之下,1930年代初富顺和荣县农业与非农业的家庭之比是49%。<sup>②</sup> 19世纪下半叶,富荣盐场正经历着最快速的增长,而当时收入主要来自非

<sup>①</sup> 引自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69页,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

<sup>②</sup>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B22,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富顺(自流井的所在地,是整个盐场最大的组成部分)非农家庭的比例是48%。

123 农业劳工的家庭所占的比例应该更低。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即使能挣得工资也要继续与非产业性的工作相结合。这对于大多数中国的盐业工人来说也是正确的。在大宁、开县、奉节、彭水的盐场,卤水咸度太低,用以烧盐,不可能养活全职的工人,因此这里的盐业工人还兼职务农。在偏僻的川北盐场,食盐生产大半是农闲时的一种职业,这与中国各地其他采掘业的劳工情形一样。<sup>②</sup>北京西部大规模的门头沟煤矿只在每年农历八月到来年五月开工。天气暖和时,因通风技术落后,不得不停工,大多数工人返回老家,帮助家庭在地里干活。<sup>③</sup>这种工业和农业劳力的循环使得招募工人的来源地受限,但在劳力雇用上,比起富荣所发展起来的办法,却有着更大的灵活性。

与四川其他大多数盐场不同,富荣的井和灶除了新年之外,每天都昼夜开工。凿井的高投入,天然气不论使用与否都要逸出的现实,以及延误汲卤盐井就有崩塌的危险,这些都意味着不得不设计出新的劳工使用形式。几乎所有前来富荣盐场的工人都断绝了他们与土地的联系。那些身为移民来此的人,也摒绝了定期回老家的想法。富荣盐业工人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sup>④</sup>

在当时的中国,能与富荣盐场产业环境相比肩的只有清初的半官方、大规模的景德镇瓷器和皇家丝绸工场。这些地方,劳动力最初的集中靠的是国家直接投资和皇帝的谕令。富荣盐场的发展与皇家丝绸和瓷器工场的商业活动,都代表了帝制晚期的一种私有化运动。然而,在富荣,私人市场的扩张引发了商业统一的进程,而大规模的织绸和瓷器

<sup>②</sup> 事例见魏远猷纂《大宁县志》,卷1,风俗,1886年版。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55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sup>③</sup> 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231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提姆·赖特发现,在中国整个帝制时代,煤炭开采具有季节性和间歇性的特点。见提姆·赖特《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煤炭开采,1895—1937》,163—164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

<sup>④</sup> 直到19世纪晚期西方和日本的投资者引入新的资本和技术,才使得中国的缫丝、面粉加工和火柴制造、军工制造及棉纺等加工产业的工厂生产和劳动力集中向中国其他地方真正散布开来。

工场却经历了分裂,原因是政府经费的撤回,以及劳工的管理是在私人转包和小作坊的制度下进行的。<sup>②6</sup>

## 劳力的专业分工与技术的专门化

富荣数量众多、拿工资的全职劳动者并不必然造成工人的团结。任何一个食盐生产商所雇用的工人数目都相当可观。据说李四友堂在1830年代之前有至少2 000名雇工,而王三畏堂至少有1 200名劳动力。<sup>②7</sup>然而,这些人大多数都分为小团伙在各井、灶、筑工作。工人各种团体的力量,工人们通过同乡会以及特定工作工人所从属的团体保护他们职位的能力,阻碍了个人在工种间的流动。尽管如此,有能力调动各工种间所需工人,仍是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之一。通常,正是负责某种特定工作的管事人员雇用了他所在工作部门的人手。在井上,这归山匠负责;在盐灶,最常见的是灶头雇用长期的烧盐劳力。<sup>②8</sup>作为劳力的招募者,把头在盐场很有权势。自贡市商会于1929年所写的一封信显示,直到20世纪初,把头还占有工人的一部分工资,这揭示出在近代早期中国的工厂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工人与把头之间的依附关系。<sup>②9</sup>当然,最终的生产职责还是

124

<sup>②6</sup> 事例见李明珠《中国丝绸贸易》对于制丝业的讨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46—57页,1981年。景德镇的讨论,见迈克尔·狄龙《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业发展过程中的运输与营销》,载《东方经济与社会史学刊》,第35卷,第3期,1992年。方卓芬、胡铁文、简锐、方行:《景德镇的制瓷业(清朝前中期)》,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的资本主义,1522—1840》,308—326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0年。

<sup>②7</sup>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2页,1963年。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关于清代富荣盐场井盐企业的初步分析》,40页,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1980年。

<sup>②8</sup>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71页。两人将负责锉井、有技艺的工匠称为山匠。这一词见《四川盐政史》,卷3,页82a。《四川盐法志》将这些人称为夙匠。见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2,井厂2,井盐图说,页2b。

<sup>②9</sup>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8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这是一份自贡市商会要求车水工人复工的布告),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见韩启澜对于上海纺织厂“拿摩温”(工头)作用的讨论。韩启澜:《姐妹与陌生人:1919—1949年上海棉纺厂中的妇女》,84—87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

333

归家族或是商号总柜房所聘用的各部门的掌柜,他们决定人员配备的多少。推测起来,若有需要的话,应该也可以调换工人工作部门。

表 5.2 晚清王三畏堂的工资(铜钱:串/月)

工种	工资
职员	
大掌柜	30
大管账	20
坐灶、放卤	5—6
管现钱	3
学徒	0.6—1
工人	
山匠	2.4
熟练烧盐工	4
拭箴匠、碓工	0.8—1.2
桶子匠	1.8
牛牌子	1.2
白水工	1

资料来源: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2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在18世纪,工人间的专业分工已然明显,清前期温瑞柏关于四川盐业组织的奏疏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开列工人可以做的至少有12个不同的专业工种。<sup>⑩</sup>表5.1、5.2和5.3显示了富荣在19世纪末井、灶、笕所演化出的劳动力分工。掌柜、管账、帮账、管事是盐井管理团队的全部成员,这已在第四章讨论过。山匠是盐井最重要的工人。其中最受尊重的人,据说通过嗅一个地方的草和土就能够选择一个好的基址。盐井建好后,山匠继续发挥作用。在由井户汲卤的盐井,他负责一般性的维护工作和捞井。<sup>⑪</sup>大帮车和生火工所承担的任务不甚清楚。然而,前者可能

<sup>⑩</sup> 温瑞柏:《盐井记》,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50,户政·盐课下,页68,1826年版,台北:国风出版社1863年重印本。

<sup>⑪</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2,井厂2,井盐图说,页2b;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66页。

与开车工一同在推卤时负责天车和绞盘车,后者则专门在气井负责气笕。拭笕匠可能是负责将井盐打扫开净的工人,而牛牌子则是驱役水牛推卤之人。一眼井正在凿铤,或是废井重新淘办,或是进一步深凿以增加产量时,一支新的熟练工人队伍就要带至井基。井口管事移动钻头以确保一个完美的圆形开口,在他的监管下,需要 20 名甚至更多的捣碓匠进行捣凿。

表 5.3 晚清李四友堂的工资(铜钱:串/月)

灶上人员	工资
掌柜	30
总灶	21
管账	16
总签	13
水外场	13
师爷	8
跑街	7
坐灶	7
帮帐	6
学徒	2
熟练工人	2—4
非熟练工人	0.5—1.5
笕上人员	工资
掌柜	24
水外场	16
管账	10
师爷	7
跑街	6
帮账	5
总签	5
低层书记人员	3—4
学徒	1
熟练工人	4—5
非熟练工人	0.5—1

资料来源: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展到衰亡》,169—170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第 4 辑,1962—1963 年。

盐灶上专业工种更少,主要划分为两种:处理卤水和维护盐灶。盐灶管事不仅监督煎盐过程,而且也负责建造盐灶。<sup>③②</sup> 在他之下有两类工人:烧盐工和受总签及助手监管的挑卤水的挑水匠。另外,雇用桶子匠用淡水浸湿垫支盐锅周边的土坯,将溶于其中的盐化为卤水,可以再用于烧盐。

卤笕上的人员很少,但他们之间同样分工细致。煎卤工似乎是负责从井户那里接收卤水,这一工作在判定卤水的浓度时要有一些技术,卤水的浓度是设定运输价格的一个因素。坐码头负责卤水在笕中的输入和输出,而坐槎桶则管理沿笕的卤桶。笕上的一般工人称为笕匠,人员数目随着笕的长度不同而变化。至少有一人是巡笕管事,沿笕巡寻泄露等问题。而其他工人,有的操作沿笕的卤水提升装置,有的作为打杂随时待命,也有为人畜运送淡水,或在槎桶劳作,将来自不同盐井的卤水在桶中混合,使之达到一个标准咸度。

## 雇用条件

那些占据上面所描述职位的是固定雇员。刑科题本中有关键为县的一个案件说明,盐业工人的雇用是通过契约,而契约规定了工资等雇用条件。<sup>③③</sup> 127 清朝时,在人们能感受到军阀操纵盐场货币之前,这里工资水平稳定,实际收入相对来说很高,尤其是管理和监督层(见表 5.2 和 5.3)。<sup>③④</sup>

<sup>③②</sup> 吴鼎立:《自流井风物名实说》,页 2,1871 年版。

<sup>③③</sup>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20 页,引用了同治十一年(1872)一位地方官的报告:“杨开禄在刘泽洪盐井包揽推水,转雇谭中义帮工,每日四十五文工钱,按日支给。大家同桌共食,平等称呼。”最后的一句包含了清朝法律对于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的法律规定。黄宗智:《清代民事审判的表达与实践》,74 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 年。槎为盐场某些制度上的变化可以用来帮助理解富荣的状况。这两个盐场距离很近。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槎为盐场在自流井和贡井崛起之前的年代在盐业上居优势地位。到 19 世纪初,槎为和富荣被认为是四川最发达的盐场。

<sup>③④</sup> 工资稳定是米价稳定的反映,如图表 4.2 所示那样,同时也是银钱比价稳定的反映。除了自然灾害的年份,叙州府的米价平均为 2—2.5 两/石。至少在民国初年之前,四川的银钱比价一直保持稳定。一串铜钱约等于一两白银。大多数固定工和管理人员在工作时有伙食供应,所以工资基本上用于个人和家庭。假设成人粮食消费年均约 2.2 石,一名非熟练工人可以养活一个小家庭,只要能保住工作,身体别太虚弱、受伤。熟练工人和掌柜所希望得到的要远远超过挑水工人和锉井工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工人和监管人员工作时都有伙食供应。<sup>⑤</sup> 富荣盐场的工人与全国采掘业的同仁相比,条件优越。门头沟的煤矿工人实行计件工资。邓拓计算出一个挖煤工每月平均挣白银 1.5 两,而一个运煤工挣 0.6—0.8 两。<sup>⑥</sup> 四川巴县煤矿工人的工资收入与此类似。<sup>⑦</sup> 由上可知,收入最低的富荣工人少于矿工的收入,但富荣盐场熟练和半熟练工人收入很丰厚。<sup>⑧</sup>

在富荣,对于技能和经验的要求、雇用的稳定性,以及工人动员的更高水平,这些将劳工分成三个层次。熟练的井、灶监工,就帝制晚期的标准衡量,报酬极高,在生产组织上被赋予了很多职责。在生产力和利润上升时期,他们也是除管理层外红利的主要受惠者。根据一位上岁数的锉井工人记述,像他们这样的熟练匠人可以将他们的专业工具和技能视为保障工作和优待的有利条件。他们极珍视行业秘密,一些匠人制造自己专用的工具,使用它们时不许旁观。少数的监工之下是大量的工人,他们的技能以及可以得到帮会的支持,为他们赢得了工作的保障和相对高额的工资。烧盐工人是这些人中最优越者,下面会讨论到他们的帮会。他们的收入是煤矿工人和非熟练盐业工人的 2.5 倍。各工种中最底层的是体力工人、打杂人员及大量临时工,他们实行计件工资,也没有伙食供应,一年到头仅做雇工无法维持生活。在 20 世纪初的一张照片中,没有技能的锉井工人和有技能的监管者站在钻井设备前面,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地位和工资待遇的不同(见图片 5.1)。

相比之下,为盐业生产提供服务的附属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与盐场最底层工人的工资差不多。生产用于盐井升降卤筒的箴索的工厂工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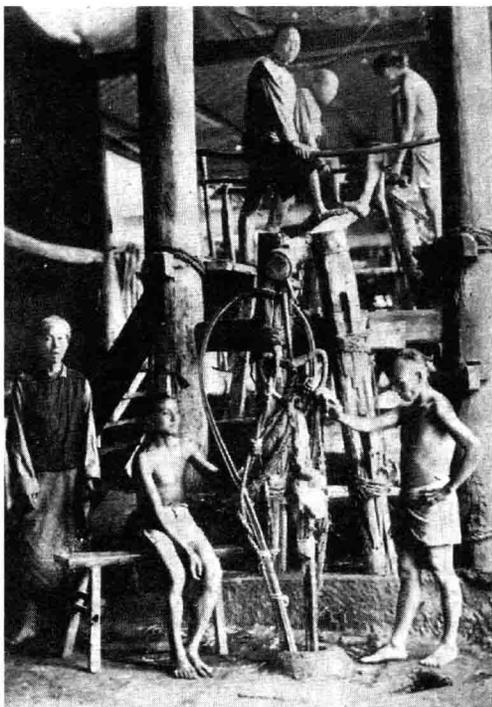
<sup>⑤</sup> 张树植:《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调查》,载萧铮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29056 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38 年。指出这种做法延续至 20 世纪。

<sup>⑥</sup> 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221 页。

<sup>⑦</sup> 巴县档案馆 6.2.7134。

<sup>⑧</sup> 这使得富荣工人的收入远远高于无地的农业雇工。见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对于江南无地的劳动力的消费模式所作的一个初步的估计,91—98 页,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11 卷,第 3 期,1996 年。

334



图片 5.1 自流井铰井图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正文前图版。

人实行计件工资，但他们工资的确切数字已无从知晓。<sup>③</sup> 木厂大多数是临时工，他们堆木头、搭脚手架、建造仓库等简易房屋，这不需要富有经验的木匠的技术。他们按所完成工作计酬，每天所挣不超过铜钱 129 24—32 文，要少于一些盐井上收入最少的汲卤工人。那些有幸向盐井运送木头的，可以得到两三倍的报酬，但要向给他们介绍工作的把头缴纳 10%。<sup>④</sup>

我们不能从这一讨论中得出结论说，盐业工人生活得很舒适。盐场本身的环境日益恶化，卤井散发的臭气混杂着逸出的天然气。李榕称，

<sup>③</sup>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7 页。

<sup>④</sup>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9 页。

若人靠得太近就会窒息。<sup>④①</sup> 这一地区流行霍乱、疟疾、痢疾。<sup>④②</sup> 为了躲避肮脏的盐场环境,以及保护家族免遭叛军和土匪侵扰,有钱的盐商在盐场周边的山上高处建造房屋。<sup>④③</sup> 大多数记载劳工条件的中文资料都说到,工人们像一同干活的牛一样,住牛棚,睡草窝,吃糙米。<sup>④④</sup>

待遇最差的是拿计件工资的临时工。盐灶运卤工人每天背负重达300斤的卤水,从橐桶运至盐锅。一个极壮实的人平均一月才挣一串钱,即便如此,对他的雇用很可能时有时无,且雇主不提供伙食。<sup>④⑤</sup> 体弱的人会得到老婆孩子的帮助,这种做法称为“挑面子水”。要求捣碓匠每分钟蹬踩杠杆多达40次,钻头借此凿进井口岩石。<sup>④⑥</sup> 更不走运的是干“人搬车”的工作,即用人力代替牛只转动地车,提升井中的卤筒。这种做法在1830年代遭禁,但清朝最末数年在富荣、犍为、彭水又有恢复。中国学者将这种使用人力的出现,归因于自然灾害驱使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同样重要的原因是,1890年代和20世纪头十年食盐市场的不稳定,以及发生了一连串的牛瘟,在这一时期末导致了一次严重的流行病。根据民国时期富顺县志记载,“牛食料多用蚕豆,刍牧鞭策又复需人费不貲,盐价贵贱恒因之黄牛稍省。贫者傭力挽筒水,只给数钱,以此食力者颇伙”。<sup>④⑦</sup>

在需求波动的情况下,购买和喂养一大群牛对于许多小的井户来说实无可能。一头健壮水牛平均市价80两。无论盐井是否使用它们,都

130

④① 李榕:《自流井记》,卷1,页4a。据严如煜记载,盐场闻起来有硫磺味。见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页12。

④②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2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④③ 林振翰:《川盐纪要》,59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④④ 事例见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53页。

④⑤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挑水工具展览。据展览说明,一对卤水桶,盛约155公斤卤水,置于挑卤水之人扁担两头。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展到衰亡》,154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李榕《自流井记》,卷1,页5b。

④⑥ 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50页。

④⑦ 李永成纂:《富顺县志》,卷5。

必须要喂养,同时每 25 头就要配备一个发工资的照料人员。那些转向利用人力的盐户,可以依据市场的需要雇用或解雇工人。一些直接雇用工人,而有的与把头签约,约定要推汲固定卤水量。以这种方法受雇的人,依据提升卤筒的次数计酬。每次公布数字,晚上兑现现钱。19 世纪末,一人一天以这种方法可以挣得约 30—50 文铜钱。<sup>④⑧</sup>

当然,说工作有保障也是相对的。长年高水平的生产以及对于劳工的大量需求,意味着受雇于固定职位的工人有望保住他们的工作,只要他们表现良好,且要避免发生工伤事故。我们没有关于这种倒霉事发生频率的材料。然而,有人在跳下井架时失去一条腿,或在盐灶烧伤并不罕见。井户、灶户等不对事故负责,工人若死去,盐场的做法是东家拿出八串铜钱作为烧埋费。<sup>④⑨</sup> 因此,并不奇怪,丢掉工作更为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年复一年、不得间歇的重体力劳动之下的健康恶化。那些依赖盐业生存的人,当年老之时,都极担心丢掉工作。这种担心从他们在井、灶工作时所哼的曲子中就可以找到,比如下面的唱词:“跑丁不收手,老来要讨口!”“不要两头(老、少)要中间,害病跑死喊黄天!”<sup>⑤⑩</sup>

许多固定工属于盐场雇用工人家代的后代。<sup>⑤⑪</sup> 生产不断发展,需要雇用大量的以天或月为基础计酬的临时工,这些也促成了富荣固定劳动力市场的增长。到 1820 和 1830 年代,在四个地方有劳动力市场,我们对它们在清朝时的运作情况没有什么了解。然而老一辈盐业工人在 1963 年一次聚会上的陈述,说出了民国时期劳动力剩余的一些情况:<sup>⑤⑫</sup>

<sup>④⑧</sup>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72 页。

<sup>④⑨</sup> 《川盐纪要》,引自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53 页。

<sup>⑤⑩</sup> 引自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554 页。

<sup>⑤⑪</sup> 据民国时期四川省盐业工会筹委会印行的小册子《四川盐工概况》记载:“川省盐工有世代相传为专业者,如自贡、犍为、乐山等场……”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74 页。

<sup>⑤⑫</sup> 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所藏的退休盐业工人的座谈会发言,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619—620 页。

(愿)赶水、倒碓的工人,每天天不亮就得把(拿)一个火笼,披一件烂衫,跑到人市坝上去站着,等井上外场管事来喊人。由于人市坝上人太多,外场管事不喊人而喊黑话:“有人打谷子没得(有)?”或“有人掏水案板没得(有)?”能听懂黑话的人就可找他去,可能得到工作。听不懂黑话的,只好白站着,找不到工作。

为挑选非熟练的劳力,临海井负责雇用的人使用了一种同样奇特的方法。他去劳动力市场时带一包竹签子,每根代表一个他要雇用的人。他在市场上撒这些签子,谁抢得签子,就上井干活。<sup>⑤③</sup>

这是在作贱工人,但同时也暗示这些做法具有继承性,即工人们要依赖那些把持着工作机会的人。清朝最末年间,他们也信任在劳动力市场上有着影响的秘密社会。使用只有秘密社会的成员才听得懂的暗语,这解释了上述老工人们为什么称之为怪异的“黑话”。工人们中有一部分可能是通过与该地区军阀有关系的把头才得以被雇用的。<sup>⑤④</sup> 1920—1940年代,把头在控制盐业运输上地位显赫,这方面的业务清朝时是由船户联合管理的,到这时他们予以接手。<sup>⑤⑤</sup>

## 劳工组织与劳工斗争

关于清朝时工人帮会活动的资料极少。大部分情况,我们都是通过距今较近的工人们的回忆和口头传说,以及记述工人行动中的请愿内容和他们为自己组织所制定规章的少数碑刻得知的。

我们知道,明朝时四川西北部大宁盐场烧盐工人的集体行动,是全

<sup>⑤③</sup> 同上书。

<sup>⑤④</sup> 关于把头的背景和所起作用几乎没有资料。他们可能是1911年以后出现的现象。对于这样一种劳工头子的控诉,见袁伯龄《封建把头对盐业运输工人的压榨》,61页,载《井盐史通讯》,第2期,1977年。

<sup>⑤⑤</sup> 据罗筱元的记载,20世纪初,11家槽船船户组成富同兴号从富荣向邓井关运盐。见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6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

132 国范围的身在匠籍的工匠们反抗的一部分。<sup>⑤⑥</sup> 大宁罢工自身更像是对于政府政策的自发性反抗,主要是由独立的匠人们进行的,煎盐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家庭产业。直到清朝中期,当时盐业生产膨胀,开始将大量的工人聚在一起,尤其是在四川西南的盐场,我们才看到致力于盐场工人利益的帮会的形成。

富荣的劳动力有着悠久的结会传统。在清朝,以保护神为名并为它们筹集钱财进行祭拜的各种帮会,可以在城乡各地和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中找到。<sup>⑤⑦</sup> 帮会在富荣盐业工人中的发展反映出盐场的一些特点:大规模的移民人口,劳工不断分化,熟练与非熟练工人间的区别日益扩大。

据近年编纂完成的《自贡市盐业志》记载,到18世纪末,富荣的工人们已经参加了许多以专门工种来划分的帮会。尽管还不能肯定这些帮会何时建立,但到19世纪中叶,除烧盐工人组成的炎帝会外,还有挑卤工人的华祝会、锉井工人的四圣会、汲卤工人的孟兰会、篾索工人的巧圣会、铜工和木工的鲁祖会、铁匠的老君会、山匠的普贤会,为同业工人提供帮助。<sup>⑤⑧</sup> 每个帮会都以保护神的名字命名,这些神常常由该会成员虚构,使之与他们的行业产生共鸣,加强他们间的联系。牛牌子们的帮会——牛王会,是以牛王命名,令人惊奇。<sup>⑤⑨</sup>

⑤⑥ 对于大宁罢工的讨论,见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第二章;唐光沛《明正德年间四川大宁灶夫领导的起义》,见彭久松、陈然编《四川井盐史论丛》,191—215页。

335 ⑤⑦ 许多人都写到了中国的“会”。该词可以指各种各样的团体,包括那些英文文献通常所称的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ies)。这里讨论的“会”常常等同于西方的“行会”(guilds),二者有许多相似性,包括依赖于一个保护神作为组织原则。商人、学者和工人都可建“会”。在四川,来自一个特定地方的寄居者所组成的大多数这样的组织,被称为“帮”,但是它们的组织结构与“会”类似。关于“会”的一般性讨论,见彼得·戈拉斯《清初的行会》,载施坚雅编《帝制晚期中国的城市》,555—580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布赖纳·古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区网络和认同,1853—1937》,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⑤⑧ 自贡市盐业志编辑委员会编:《自贡市盐业志》,568页,自贡,1992年。该志也提到一个叫做十成会的全体盐业工人的帮会。不清楚该组织在清朝时为谁服务。

⑤⑨ 黄健:《自贡盐场帮会浅析》,2页,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自贡,1990年。

## 大蜡会

从我们掌握的材料看,清代四川南部第一次重要的盐业工人罢工不是发生在富荣,而是在犍为的五通桥盐场。原因部分在于该盐场发展较早,以及来自富荣盐场的日益增大的竞争给该盐场商人造成的经济压力。五通桥工人的行动,由大蜡会领导,这是该盐场工人的主要组织。与富荣以后所演进出的多种组织不同,该会面向所有盐业工人,开始时是作为在盐场周边一座山上的观音庙集会祭拜的工人间的宗教性组织。1820年初,有一群工人汇集在一起,正式从各主要工种的工人中收取献金,为观香庙购买油、香。这一活动,后来发展成为在观音庙所在山的山脚、山腰和山顶树立20英尺高的大蜡。这些大蜡每天拂晓点燃,该会因此得名。到1840年代,该会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鬼节举办一次特殊的仪式。这一场合的大部分内容只具有民间宗教的意义,尤其是燃香和诵经。

133

五通桥盐业工人的罢工,就发生在1850年庆祝鬼节的时候。大蜡会的两位领袖,利用大批工人集会燃香之机,鼓动工人停止盐业生产。这次罢工主要是要求改善悲惨的经济待遇。工人仅有的要求,是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有数百名工人响应号召,停止了煎盐,而井户、灶户则通过他们自己的盐总会,要求与工人代表举行会谈。熊四伦和吕汶中向井户和灶户们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并警告说,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他们将放飞观音庙里所养的100多只鸽子,作为信号,号召整个盐场工人罢工。最后他们的要求被拒绝,约有2000名工人加入到了反对井户和灶户的行动中。

官府对于大蜡会的处理,遵循了处置被视作威胁帝国秩序的私人结社的通行做法。地方官府第一个举措是召开罢工者参加的会议,会上地方官提出警告,劝他们复工。黄昏时分,乐山知县和嘉定知府邀请工人领袖熊四伦回县衙进一步商谈。路上,以煽动叛逆为由将他逮捕,据说

他在狱中被打死。吕汶中很快也被抓并处死。官府勒令工人返回工作岗位,既往不咎。

逮捕领袖而宽免追随者,这是清朝对待骚乱所广泛采用的办法,也是一种成功的办法。当得知官府要派兵介入时,停工几乎立即结束。同一群人在 1852 年试图第二次罢工。然而,行动之前他们的计划泄露,领袖宋老八被抓、遇害。<sup>⑥0</sup>

## 134 炎帝会

富荣盐场工人组织中最有势力的是炎帝会。我们对它的起源、组织和对付雇主的大多数情况的了解,都来自工人们的回忆和一通纪念它创建的石碑。炎帝会似乎始于 18、19 世纪之交由烧盐工人组成的互助会。富荣大多数烧盐工人来自四川的江津和南川县,其中许多人已经加入了一个同乡会——江津帮。正是这种联系,促成了在一小群烧盐工人间于 18 世纪末组织一个放堆金会。将会费投入该会的柜中,以一定利息放贷给其他工人。相关的款额一定很小,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才积累了 100 两,工人们才能够建造一个小庙,供他们的组织使用。<sup>⑥1</sup> 这庙是土地庙。土地庙通常由井基的投资者在一眼井见功时建造,在此大摆宴席并举行其他感恩仪式。位于自流井八店街的这座特别的庙宇,正是烧盐工人在 19 世纪初的聚会场所。对于每 24 小时一换班、在盐灶仅能睡草垫的人来说,土地庙是他们的栖身之处。每个成员要缴纳会费,这够买三斤木炭。随着成员的增多,该会决定扩大他们的活动,建造一个更大的庙,并以他们已选好的保护神的名字命名。

<sup>⑥0</sup> 我们所了解的这次起义,大多数情况来自柯愈文和一通 1852 年树立在牛花溪、对以后这种行为予以警告的石碑。该碑文全文见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12—214 页。其他信息包括在名为《大蜡会与工人运动》的文件中,这是省盐志办公室的一份文件,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556 页对此多有引用。

<sup>⑥1</sup> 舒文成等:《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宫》,35—48 页。舒文成和烧盐工人同事的发言是在 1960 年记录的。



工人们在盐灶干活,对于火的热量的依赖,自然会激发他们祈求火神的帮助,并将其作为他们正在扩充的组织的保护神。在中国传统的宗教诸神中没有火神,与工人们鲜有干系。在传说中,这让一位与工人友善、名叫邓可玉的当地人花费了一番心思。他是该帮会的书写,拥有低级功名。他建议帮会改名为炎帝会。炎帝是神农的别名,是中国传说中的帝王,他向人民传授的就包括农业。他与烧盐工人仅有的联系是“炎”字,意思是大火,“火”字之上再加一个“火”字。

邓可玉还建议,工人们学习家族组织的做法,使用他们节省的钱购置一块地,可以收租,供奉他们的庙宇。他们利用年收 30 石稻谷的一块地,开始建造炎帝宫。第一部分在 19 世纪初的十多年间完成,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其余的部分分别在 1825 年、1854 年和 1855 年完成。成员提供所有的人工,这样整个建设开支不超过 10 000 两。有一种说法是,炎帝会自身是在 1842 年正式组建的。<sup>⑫</sup> 135

炎帝会,当它在 1850 年代最终形成时,与帝制晚期中国的任何行会组织一样复杂。张学君关于四川南部盐业工人帮会活动、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中,抄录了 19 世纪初刻在石碑上的炎帝会章程。<sup>⑬</sup> 该会有总首六人,任期三年。其下有襄首十人,任期一年。总首分为三班,分别负责财经、寺庙本身事务以及帮会与外界的联系。襄首也分班,赋予特别职责:外部事务、计账、帮会厨房、采买和杂务。新的总首由原任总首从那些担当过襄首的人中选出,需得到全体成员批准。

不清楚一个人是怎样当选成为襄首的。要成为该会的一员,必须有保人介绍,并征得大多数成员和总首的同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该会的成员资格,成为在富荣盐场得到高薪报酬的高级烧盐工人职位的根本性条件。当这些职位变得越来越少时,帮会只设定极短的人会期,以限

<sup>⑫</sup> 张学君:《清代川南地区的盐工帮会活动》,载四川史学会编《四川省史学会史学论文集》,242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sup>⑬</sup> 同上书,242—244 页。

制会员的人数。入会的过程在炎帝会称作“开簿”。“开簿”在清朝最后一些年份中可能每年举办一次。到民国中期,它限制在16天,视对新工人的需求,数年举行一次,时间间隔不定。

136 新工人加入炎帝会,首先要交入会费。炎帝会最初成立时,入会费是铜钱约2.8串,到清朝末年升至6.8串,民国大部分时间一直保持在8.8串。相当于熟练烧盐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另外,每年的会费,以香钱的名义,向每位烧盐工人收取。因能优先谋得工作,上手即帮会成员所缴付的钱是下手即非成员的一半。<sup>④</sup>

炎帝会对于烧盐工人行为的约束能力,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值得注意的帝制时期劳工斗争的结果之一。在炎帝会成立后,就对盐灶工作制定了一套规章。其中包括如下条款:

火花盐,上手(会众)每人烧火圈五口,下手(准会众)每人烧三四口。上手烧二人共烧十口、下手一人烧三四口为一排。上手烧一天要一天,一月上工十五天,称十五班。下手则每天烧盐,一月上工三十天,称三十班。

炎帝会也有约束个人行为的章程。禁止赌博、抽大烟、嫖妓、抽洋烟、吵骂、酗酒。<sup>⑤</sup>有以上行为的会员若被抓住,要受处罚,或罚钱以演戏若干本,或罚若干点神灯灯油钱。偷窃或是从事其他严重犯罪,要被清除出会。后者是极其严重的处罚,因为失去会员资格就意味着丢掉了工作。该会成员似乎有互带责任,这使得领导层除了处罚犯事之人外,还要处罚任何对此知情不报的人。

---

<sup>④</sup> 据舒文成的记述,清朝时,成员缴铜钱280文,非成员缴560文。见舒文成等《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宫》,38页。

<sup>⑤</sup> 清朝时,民间教派和秘密社会为成员设立个人行动的规范并不罕见。这一做法可能是工人帮会类似章程的效仿对象。可见卡尔顿·刘易斯《晚清的哥老会》,载谢诺编《中国的民众运动和秘密社会,1840—1950》,104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韩书瑞《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47页,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

该会也建立了成员间纠纷调解的制度。每当出现严重的争吵,就要求挑起这一“诉讼”之人拿出3200文,这差不多够摆两桌宴席,所有争吵的当事人、证人和调解人出席。饭后,调解人将听取各方的陈述,他对于此事的决定各方必须遵守。帮会规章中也开列了处理案件的严格程序。要举行仪式向保护神致敬。要宣读与案件有关的帮会规章,调解过程中任何人捣乱都要被罚款。如果发现“原告”有错,除了赔偿所有的损失外,还要偿还将案件带到宴会上之人所拿出的钱。

从这些规定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炎帝会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继续作为一个“家庭替代”机构,强化纪律和调解纠纷,这与家族保护集团利益的做法接近。另一方面,它作为手艺人的帮会,为工人们制定工作规章,并确保成员工作和工资而斗争。除约束自己成员的规章以外,炎帝会寻求为盐灶上的熟练工人建立酬劳等级,除了每月一斗五升大米、一斤菜油、每日定量四文钱购买蔬菜外,每口盐锅每月补贴一两。<sup>⑥⑥</sup>这与19世纪末王家和李家灶上二至四串铜钱的工资标准相比,已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还不清楚何时炎帝会将这些要求呈交给灶户管理层。一些材料认为,这发生在它成立之后不久。然而,更可能是在纪念炎帝宫这一庙宇建成的石碑竖立之时。这是在1859年。炎帝会正是通过八大号,寻求与盐场数以百计的盐灶掌柜达成一致的。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陕西盐商八大号,可能是当时盐业开发的最大投资者。商人们根本无视工人们的要求,谈判达数月之久。谈判最终破裂时,陕帮八大号请求知县惩处炎帝会非法造雇主的反。<sup>⑥⑦</sup>与预料的相反,烧盐工人没有罢工,而是通过诉讼争取他们的利益。他们请求老朋友邓可玉为他们辩护。没有发生暴

<sup>⑥⑥</sup> 有材料说,工人们也要求肉食,雇主历来要不定期请熟练匠人们打牙祭。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216页。

<sup>⑥⑦</sup> 清朝官僚处理雇工与雇主间的纠纷并不少见。巴县档案中有许多匠人请求官府支持他们“固有”的权利,例如重庆一家丝绸作坊的织工,就请求地方官防止他们的雇主取消他们每周的食肉定量。巴县档案馆6.3.17179,时间是1843年。

力,尽管经过数年才等到最后的裁决。此时,案件已经上呈到省里,邓可玉被迫前往,将他的女儿留给炎帝会照看。最后陕西商人同意了工人们的要求,他们将这些规定光明正大地刻进石碑,成为富荣每个盐灶劳动关系的基础。正是通过这通石碑我们才了解这一事件的大部分情况。

这次烧盐工人的胜利,是我们掌握的既制定工作规章,同时事实上也垄断某工种的工人帮会的唯一例证。煎盐过程要求高超的技艺,井、灶户等的利润最终依赖于此,气井产量近来的突飞猛涨,要求增加盐灶烧盐工人数目,以及由工人组建的有势力的组织,以上都无疑决定了雇主和知县的决定要屈从于炎帝会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炎帝会在约束劳工以及为盐场提供高生产能力的煎盐业所需的可靠熟练劳动力方面的作用。地方官有意扶持地方产业,既可作为一种赋税来源,也为日益增多(以及潜在扰乱性)的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炎帝会和富荣正在出现的工业家间的这种工作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确,直到20世纪,大规模的工人行动极其少见。<sup>⑤</sup>直到清朝覆亡,可靠文献所记载的仅有的罢工发生在1884年。这是由富荣锉井工人的四圣会领导的,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参加,持续了大约一个月。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由一名锉井工人与一名盐井掌柜间的争斗所引发。<sup>⑥</sup>由于赋税的提高,以及两淮盐商要恢复在太平天国及以后的战争中丢给富荣的湖北市场所感受到政治压力日益增长,造成了工人工资的削减,这极可能是上述罢工的直接原因。

## 结论

富荣盐业生产创建了一个与中国传统制造业极为不同的劳工环境。

---

<sup>⑤</sup> 陈然指出了1873年、1884年、1886年和1908年的工人行动,但不清楚它们范围有多广。见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255页。

<sup>⑥</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4—165页。张学君:《清代川南地区的盐工帮会活动》,246页。

我们看到,在井、灶、笕出现了许多可以与现代工业相关联的情况:固定、全职的劳动力,劳工的分工以及对于劳工实质性的层级管理。同时,工人利用中国人所拥有的丰富组织资源,以舒缓产业和城市生活对其的冲击。对于整个中国的工人来说,同乡一直是成立组织的强大理由,对于熟练工人来说更是如此。<sup>⑦</sup>来自四川特定地区的工人,通过当地的招募网络以及对得到技能进行保护的行规,近乎垄断了烧盐工人、锉井工人、山匠等熟练工种。非熟练劳力来源地远为复杂,但是固定工的集中,有利于在民间宗教和传统行会的基础上形成各种帮会。这反过来又巩固了内部的团结,甚至非熟练工人也偶尔可以为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抗争。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四川盐业内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政府努力从四川食盐销售上增加税收,并进一步控制四川进入新得到的市场,这造成了井、灶、笕户等和工人的不安全感。然而,同一时期新的汲卤和凿井技术的引进,极大地增加了四川盐井的产量,将新的卤水资源带给了富荣的盐灶。到清朝覆亡时,很显然,政府无法控制富荣盐业,而新技术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不过,生产的转型和政府政策还是对商业组织和劳工组织有着影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变化。

139

<sup>⑦</sup> 可见盖尔·赫尔沙特尔《1900—1949年的天津工人》,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劳工政治》,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

19 世纪下半叶,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以及反对满人统治的其他一些挑战者的平定,促成了整个中国在各个政治层面上的改革和重建。在北方动乱中中断的商业生意模式,只是部分恢复到战前状态。尤其在被反清的暴力打击最为严重的地区,政治和物质的重建,为精英的参与行动提供了机会,也对税收提出了新的要求。努力跻身“自强”运动以图“中兴”的种种努力,注定了中央与各省地方政府间为控制税收,以及在战后很长时间为保留并苦心经营战时的赋税而进行斗争。

对于四川的食盐生产商、运商和那些消费他们产品的人来说,这两个重要的结果。首先是两淮盐政官员试图将四川商人驱逐出先前属于两淮的市场。追求这一目标,其重要性关系到销售两淮食盐收入所得,以及向这些食盐的征税所得。厘金,是向过境商品征收的一种赋税,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对于所有商品强征的赋税,后来一直成为中央和地方的一种重要收入来源。战争期间,对于运往湖北和湖南部分地区所构成的湖广市场(见第一章的地图 1)的川盐,厘金已是对它们予以税课的主要收入来源。谁将得益于运往湖广市场食盐的收入,现在成为了极重要的问题,不论对于四川、湖北和湖南当局,还是对于战前供应湖广市

场的食盐生产地的浙江、江苏当局,这一问题都很关键。对于后者来说,川盐在这一市场的地位,涉及他们能否完成引盐额数,以及能否大量征收源于厘金的种种新形式的收入。对于四川,该问题也同样事关重大:四川是否能够供应这一新的市场,四川地方政府是否能够继续收获从这一有利可图的贸易上所征收的厘金。消费者和生产商,都迫切想知道,具有弹性的厘金税要增长到什么程度。如果定得太高,即便是中国东部的盐业利益集团未能成功将井盐阻挡在旧有的海盐引岸即销售地界之外,厘金等新的非正税也将使价高的川盐退出湖广市场。

对于四川盐业来说,新的赋税不是太平天国运动后重建过程中所遇到的唯一凶兆。为了弥补中央政府收入短缺而蓄意进行的新的制度安排,也改变了四川食盐生产商所参与的游戏规则。面对太平天国的屠戮,许多省停止向北京中央政府解送足额的地丁钱粮。战后,各省官员寻求重建经济基础,恢复农业,沿着后来称之为“自强”的方向,采取了最初的一些措施,但极少有急于恢复到战前的收入分成水平的。面对维持安全、外债支出的日益增长,以及中央课税基础的削弱,北京中央政府尽力不让自己掌握的任何收入来源流失。因此,政府废除了相对宽松的四川盐业管理,引入了一种名为“官运商销”的激进的政府控制型商业形式。

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学者,已对食盐厘金的征收和官运商销的实施做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的大部分材料,来自数种官修的盐法志以及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部分省份和盐政官员上报的少量清册。因为这些学者都是利用同一套主要解决食盐税收对于政府收入影响的问题的材料,所以,看到所有这些研究对于清朝最后数十年盐业政策的基本评价是一致的,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税率的提高和官运商销所带来的政府对于食盐更严厉的控制,意味着当食盐税收关系清朝的存亡时,政府是受益于所增加的食盐税收的。也很显然的是,对于四川以及在云南、贵州的川盐销售地界的消费者来说,盐更贵了。现在

不清楚的是,官运商销、厘金还有市场限制是如何影响四川食盐生产商的,尤其是那些最先进盐场的生产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的冲击整个是负面的,或者说人们对它们效应的感觉完全一样,然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晚清四川盐业管理被改造的主要内容。接着我们会评价这一新的游戏规则对于产量、市场准入及商业结构的影响,然后在第七章,探讨新的生产技术在晚清自贡盐业生产进一步转型中的作用。

## “济楚”市场

1850年代川盐进入湖北和湖南食盐市场时,政府并没有对川盐在中国其他市场的销售作出限制。尽管盐业仍是一种特许行业,但政府主要关心的是税收,因此没有设定外销的川盐额数。的确,正如同最初所构想的,开放湖广市场将吸纳四川最大盐场富荣和犍为的一些已经大量剩余的生产能力,因此也缓解了四川官员因积压大量未售出的引盐所承受的压力。输往湖广市场的食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无管制的“余盐”,第一章已讲过,商人无需凭盐引就可在盐场购买,可以在四川计岸销售。第二类是本已作为引盐销售但未售出的食盐,即积引。<sup>①</sup> 尽管销售余盐已经引起了一个无管制(即走私)的贸易,这与建立在盐课之下的指定营销体系并存,但“济楚”市场的开放,预示着也要取消特定的引盐销售地界。湖广的官员仅是奉命建立税收点,而来自四川的商人只需缴纳一种费用,标准是食盐市价的10%—20%,就可以得到盐引,凭此他们可以在“济楚”地区的任何地方出售他们的食盐。<sup>②</sup>

从1854年开始,政府也向运往湖广的川盐征收厘金。对四川食盐征收过境税的第一座厘金局在宜昌设立(见第四章的地图4),宜昌位于

① 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77页,载《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2期。

②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1,转运6,济楚上,页1a—1b,1882年版。



四川迤东,是湖北省沿长江的主要码头。经过宜昌税口的食盐,每斤征收白银 0.0015 两,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征收了 2 万多两。清政府对这一收入水平并不满意,又在沙市建立了一个厘金分局,沙市位于宜昌下游,是不设行政机构的繁荣市镇,与四川有陆路和水路的联系。随着第二个税口的建立,到达湖广的每斤食盐首先在宜昌要课税铜钱 2.5 文,接下来沙市的盐店每斤食盐向消费者收取 4.5 文。1861 年,每斤食盐在沙市另行征收厘金 2 文,在宜昌厘金局增加 1 文,这样每斤食盐收取 10 文。到 1864 年,赋税的进一步增加以及对银钱比价的操纵,运往湖广的川盐每斤征收厘金 18 文。<sup>③</sup>

上述摊征厘金的大多数食盐是积引。1855 年,清政府也制定了向余盐课税的方法。为了在这些食盐离开四川之前就予以征税,官府在夔州附近设立了一个稽核点,外销食盐每百斤征收厘金 0.13 两。又在夔关下游的巫山县空望沱设立另一稽核点,以查获从大宁来的食盐。与此同时,主要盐场也设立厘金局,向在此生产的引盐和余盐课税。<sup>④</sup>较小规模的盐场不值得设立专门的厘金局,而是将这一新的厘金征收留给了地方官。在盐课已经摊入地丁钱粮的地区,要求建立食盐货栈,盐灶要将余盐卖到这里。

到 1860 年,重庆作为省内及对外的盐业贸易中心日益重要,要在那里统一征收省内的食盐厘金。每包巴盐征收铜钱 650 文,每包花盐征收 1350 文。<sup>⑤</sup>向在四川内部销售的食盐征收的税率则要低得多,每引仅白银 2 两。<sup>⑥</sup>尽管厘金的征收在增长——大量该项收入用于补充湖广和两淮地区的军事经费,但进入湖广的川盐还在继续增加。清政府注意到,建立厘金分局的做法造成了大量的食盐逃避税收,因此一些年后合并了

<sup>③④</sup> 王守基:《盐法议略》,北京,1877 年版。

<sup>⑤</sup>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103 页注 9 引用《清盐法志》,指出,在道光十年(1850),一包巴盐的重量是 160 斤,一包花盐的重量是 200 斤。

<sup>⑥</sup> 根据罗士恒的说法,这是走私的一个主要原因,大量运往湖北的食盐被伪装成计岸销售的食盐。见罗士恒《四川的盐政》,载《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报》,新系列 27 卷,20 页,1892—1893 年。

川盐中所有外销食盐的厘金，只在宜昌主要的关口进行征收。<sup>⑦</sup>

144 冉光荣和张学君根据盐政所记载的引额数进行折算，估计每年运至湖广的川盐约有 8 640 万斤。<sup>⑧</sup> 时人将一定比例的非法运输的食盐计算在内，所估总数更高一些。厘金局内部相当腐败，商人们精于如何避开税卡：由河流运盐，过重庆后，经陆路进入湖广边界，以逃避宜昌的收税。在战时，盐价极高，富有进取心的商人很容易消化运输费用。当时的官员推断，每月进入湖广的盐引至少相当于 800 张四川水引。为估计总销量，我们假设运输者出售 1850 年所设定的每引盐的标准重量：巴盐每引 8 000 斤，花盐每引 10 000 斤。因为湖广消费者过去常常食用两淮商人运至的颗粒状海盐，故而喜欢颗粒状的花盐，胜于更黑、“更咸”的巴盐，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一引盐约四分之三用于销售花盐，四分之一销售巴盐，则总计 91 200 斤。<sup>⑨</sup>

“济楚”市场中富荣出产的食盐占多大比例呢？唐炯在 1877 年的一份奏折中说，富荣在秋、冬、春峰产月份，每天生产 100 多万斤。如果将夏天产量下降——这时的地下水位降低——考虑在内，平均日产至少仍有 80 万斤，合一年 2.92 亿斤。<sup>⑩</sup> 如果我们假定大部分经过宜昌的食盐来自富荣，那么富荣食盐产量约有 30% 出口湖广。<sup>⑪</sup> 即便我们认为一些来自犍为，那么至少四分之一的富荣食盐产量运往这一新市场。

湖广市场的开放，不仅是对四川盐业经济中最发达地方的恩赐，小的生产商也繁荣起来，这是对于川盐需求突然大增所带来的结果。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19 世纪上半叶，一些小盐场看到了他们的市场

⑦ 同上文，21 页。

⑧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20 页。

⑨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11，转运 6，济楚上。

⑩ 鲁士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81 页。

⑪ 犍为主要生产巴盐，从湖广贸易中所获利润比不上富荣。甚至是在 1850 年代和 1860 年代，犍为最大的市场继续是所谓的边岸贸易。罗士恒指出，1880 年代，云南的食盐只由犍为供给，而富荣加入犍为向贵州提供食盐。见罗士恒《四川的盐政》，16 页。

被富荣和犍为更高效率的生产商所吞食。作为“改配”和“归丁”的受害者，“夫妻”生产商的引盐额曾被重新分配给他们更高效的竞争对手，但在 1850 年代，他们时来运转了。史料显示，全省的产量有了非同一般的回升。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罗泉出现了百余个新的产盐家庭，这一地区的产盐业在道光（1821—1850）末年已凋零。<sup>⑫</sup> 奉节的整个生产定额被取消，已划定食用滇盐。然而，在 1850 年代，太多的人凿井煮盐，以至于“蒸气成云”<sup>⑬</sup>（第一章的地图 1）。南阆也有类似的现象，而《四川盐法志》记载，蓬溪“自咸丰以后，该县私井日开，近年则无处不有”，“殆不知井之为私井，盐之为私盐矣”。<sup>⑭</sup>

145

## 争夺湖广市场

盐政，如前所述，事关中央政府的立法。但是，作为国家收入第二大宗的食盐业也事关地方的切身利益。盐商一直是地方和省级官员们非正式收入的主要贡献者。然而，到了 19 世纪，尤其是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督抚要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基础，以及进行与西方交往过程中所激发的起死回生的改革，盐课收入自身变成了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的经费的一个来源。因此，不论谁提供湖广百姓的消费需要，中央政府的财政利益要得到满足，而食盐东来还是西来却变成了许多清朝官僚极为关注的问题。有利可图的湖广市场之上的政治斗争能够告诉我们晚清的政治状况，但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可以作为评价富荣产业体系对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市场日益遭受政治扭曲所做反应的背景。

为富荣食盐生产商带来最初繁荣的相对自由的市场，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两江总督曾国藩试图恢复以前两淮地区盐课所带来的丰厚赋

<sup>⑫</sup> 《资中县续修资州志》，卷 3，盐法，页 12—15，引自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80 页。

<sup>⑬</sup> 杨德坤纂：《奉节县志》，卷 16，盐茶，页 1—2，1893 年。

<sup>⑭</sup> 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80 页。

税收入。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以及长江下游与中国中部地区贸易联系的恢复，曾国藩——这位公认的军事胜利的设计师，上奏朝廷，请求恢复湖广人口食用来自东部两淮的食盐。1864年朝廷同意他提高征收川盐的厘金，并采取措施向湖北的店铺大量供应希望是更为便宜的淮盐。五年后，证实这一做法并不能改变湖广百姓的消费习惯，部分是因为太多的走私活动已使质量更好的川盐保持了一个相对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146 1868年，曾国藩发起了新一轮禁止川盐进入湖广市场的运动，这包括了一项提议：强行关闭四川盐井并限制川盐的合法输入，以制止川盐进入该市场。<sup>⑮</sup>对此，四川和湖广都强烈反对。四川总督吴棠反对关闭盐井，他的意见集中在税收以及市场干预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不仅四川会被剥夺厘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这些改变会对食盐产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因为该产业既是该省的一个主要的人员雇用者，也是相当可观的投资的目标。吴棠还旁敲侧击地指出，对于那些开办盐井的人来说，也难以顺从此种政策。<sup>⑯</sup>李鸿章也担忧，出口湖广的禁令会引起大量的失业。他的五点条奏提出，如果实施这样的禁令，走私可能更多。此外，他指出了湖广作为贵州部分地区食盐转输地的重要性，并预测这样的禁令将会影响贵州——长期以来属于川盐市场——的食盐供应。奏折的最后是他以湖广总督的身份所做的评论，认为他辖区的人民更喜欢食川盐，不应强行设定他们不喜欢购买的东西的数量。<sup>⑰</sup>

林地焕认为，湖广官员保护川盐的市场，是因为进入湖广的私盐要向湖广缴纳厘金，而从两淮盐场输入的食盐在到达湖广边境之前已经课税。<sup>⑱</sup>不论保护的动机是什么，四川还是得以保留了湖广市场的份额。

<sup>⑮</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1，转运6，济楚上，页16。

<sup>⑯</sup> 同上书，卷11，转运6，济楚上，页16，页23—24。

<sup>⑰</sup> 同上书，页16—17。

<sup>⑱</sup> 林地焕：《四川盐政的改革（1895—1920）》，26页，硕士学位论文，“国立”台湾大学，1983年。

曾国藩能够赢得支持,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断绝川盐的走私,封掉未登记注册的井和灶。但很显然,这些措施鲜有效果。1869年,李鸿章再次上奏,建议川盐和淮盐的生产者划分湖广市场,结果四川拥有湖广食盐销售额的80%。<sup>①</sup>

事实证明,淮盐甚至不能够控制为它预留的20%份额,1871年曾国藩重新发起了夺回湖广市场的运动。在他的提议中,将淮盐的份额增至60%,限制川盐输入湖广的额数,并重新划定收取盐课的边界,以限制川盐进入湖广东部的州县。最终,后一措施被采纳。1873年伊始,沙市的川盐厘金征收点关闭。要求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只能卖淮盐,包括襄阳、宜昌、津门在内的湖北西部指定作为四川食盐地界,而淮盐也能运抵。淮盐也恢复了它们在湖南岳州和常德的市场。作为直隶州的醴州暂时划归食川盐,因它接近湖北的川盐销售地界。曾国藩还发布了旨在降低盐价的五条规章,取消多余的税局和稽核点,改革反走私的行动,提高淮盐的品质,以加强它在向川盐和淮盐生产商都开放的混合市场中的竞争力。<sup>②</sup>

147

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川盐在湖广市场的合法销售继续被削弱。1876年两江总督沈葆楨成功夺回湖北的安岳、襄阳和醴州,归于他治下的盐政管理。随后御史周声澍在奏折中,请求将整个湖广市场都划归两淮盐区。对此四川总督文格强烈反对。他最有说服力的意见是,边岸引盐的销售日益减少,对四川来说,为了满足省内军事安全需要,以及为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的兵卒提供粮饷,保持湖广盐业销售作为收入来源极其重要。<sup>③</sup>第二年,沈葆楨继续迫切要求恢复淮盐的湖广市场,而四川和湖广的官员坚决反对他所提出的措施。

<sup>①</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1,转运6,济楚上,页26。

<sup>②</sup> 同上书,29—34页。

<sup>③</sup> 同上书,卷12,转运7,济楚下,页11—13。

337

## 官运商销改革

在四川地区,一种新的盐政体制的实施,通常是与上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管束四川食盐出口湖广的努力联系在一起。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国家为保护盐业收入份额所采取的激进干预措施的后果是:战后川盐市场急剧萎缩,造成了需求上的暴跌,生产商再也没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参与盐业一些环节的盐商,因新的政策而大幅度减少,这强化了人们的上述认识。我们将会看到,在19世纪最后年份,对于川盐的需求并没有下降。但是,四川盐课改革的确改变了盐业结构,驱逐了一些小生产商和许多将驮运少量食盐作为副业的人。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商业组织更具意义的是,新的盐政体制,削减了大的纵向一体化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来源。它是否能减少走私——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存有疑问的。

148 官运商销的实施,最初针对的是一个特定问题。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解决,都与湖广无关。官运商销是为了解决商人在四川计岸和云贵边岸销售食盐的积引。到1870年代中期,80多万张盐引未能销售出去,给政府带来的损失达100多万两。丁宝楨是贵州人,有着多年在地方为官的经历,被责成解决该问题。

1877年丁宝楨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在开列四川盐政改革的奏折中,他提醒户部注意真正影响政府通过引盐销售得到收入的不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与太平天国同时发生的秘密结社叛乱所造成的商业普遍性破坏,这是引起在边岸占主导地位的陕西商人撤出的主要因素。另一同样重要的因素是贵州的全面落后。作为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贵州多山,交通落后,地方大员很难管理他们的属下或当地居民。这些地缘政治因素是率先在贵州建立指定市场和盐引制度的原因之一。不建立这种制度,国家担心不可能劝导商人为该省所有偏远地区提供食盐。依据丁宝楨的说法,陕商盐号从贵州市场撤出,而由四川和贵州当地人组成

的一些较小规模的盐号,正接手运输食盐进入边岸。没有势力强大的先行者的网络或资本,他们鲜能应付潜在的损失以及抵制由官府胥吏和地方豪强所强加的繁重厘金等费用。然而,即便经受住了这些“疾风暴雨”者,还必需面对无所顾忌的同省人的激烈竞争,这些人利用丁宝楨称之为犬牙交错的四川、贵州边界难以缉查的特点,将课税更少的四川计岸食盐走私到边岸。<sup>②</sup>因此,不难理解过去四川为何难以售出它在贵州边岸的引盐额了。

丁宝楨解决积引问题的方法是,不许私人大宗运输食盐,而将食盐运输委托给一个新的、集中监管的机构。食盐生产和零售仍如同以前一样掌握在私人手中。然而现在,国家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购买食盐,运往指定市场,卖给原先的商人,由他们直接与消费者打交道。这是盐业和国家关系的一个根本性改变。在太平天国之前盛行的混合管理体制中,商人或商号购买盐引,持盐引从盐灶直接购买固定数量的食盐。他们运输大宗的食盐要课税。盐引持有者能够在特定的地界销售这些食盐。引盐之外的食盐以及卖到那些不用缴纳盐课地区的食盐,可以在缴纳一定费用之后,用“票”少量地购买和销售。这两种情况下,政府对食盐市场所起作用不大,仅仅是因赋税负担转嫁给了消费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食盐的价格。一般说来,利用盐引进行管理,确保了较小的盐场占有一定的份额,并保证这一不可或缺商品的承办商们不会忽略边远地区。实际上,甚至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由于有着在西南效率更高的盐场中营运的大批发商的压力,市场的分配已遭毁坏。

官运商销制度,最初在贵州市场和四川省内靠近边岸的地区获准实行,包括叙永直隶厅和永宁、泸州、南溪、合江、江津、綦江、南川、黔江、彭水等州县(第一章的地图1)。<sup>③</sup>1878年,云南市场和四川靠近边岸的12

149

<sup>②</sup> 同上书,卷13,转运8,官运上,页9—11。

<sup>③</sup> 吴铎:《川盐官运之始末》,载《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论集》,137页,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

个州县一起,被纳入官运商销体系。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通往云南和贵州主要商路的沿途大多数地界,以及属于四川供应食盐的湖广地区,也进入了官运商销体系。<sup>④</sup> 随着这些改革的进行,到 1880 年,官运商销制度已控制了云南、贵州、湖北的整个行销川盐的市场,还有 33 个四川厅州县的市场。现在,总计 19 571 张水引和 56 046 张陆引,通过新的管理体制制进行销售。这约占整个四川合法食盐销售的 58%。<sup>⑤</sup> 通过精心监管在生产地点的食盐销售,国家能够掌控所售食盐的巨大份额中的大部分,进行课税。表 6.1 生动地显示出川盐合法市场的巨大吸纳能力。到 1890 年代中期,新盐引中的积引已经从过去的高达 76% 降至 16%。

150

表 6.1 云贵边岸积引与各年额引的比例(陆引已折合为水引)

年份	A: 额引	B: 积引	B 占 A 的百分比(%)
1878	13 523.88	1 028 4.84	76.00
1879	19 078.80	695 3.24	36.00
1880	20 611.88	7 403.60	35.90
1881	24 022.68	5 094.00	21.20
1882	24 054.68	5 297.32	22.00
1883	24 054.68	5 571.24	23.20
1884	24 054.68	5 904.24	24.50
1885	24 054.68	5 665.12	23.60
1886	24 054.68	5 757.00	24.00
1887	24 054.68	5 906.00	24.60
1888	24 054.68	5 759.20	24.00
1889	24 054.68	5 760.80	24.00
1890	24 054.68	5 906.96	24.60
1891	24 054.68	5 762.40	24.00
1892	24 054.68	5 907.04	24.60
1893	24 054.68	5 760.60	24.00
1894	24 054.68	4 000.00	16.60

资料来源: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档案中的清单,引自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38—139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年。

<sup>④</sup> 四川实行这一新制度的厅州县有:巴县、江北州、忠州直隶州、丰都县、长寿县、石碛直隶厅、巫山县和万县。在湖北,官运商销适用于鹤峰直隶州和长乐、恩施、宣恩、利川、建始、咸丰、来凤等县。

<sup>⑤</sup>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27—128 页。



当然,这些官方数字并没有说到极可能继续走私进入合法却未得到批准的引岸的数量。<sup>⑥</sup>

我们考察在丁宝楨领导之下所建立的新管理体制时,有一点应该注意。官运商销制度不仅清除了川盐大宗运输中私商的作用,而且它也承认了18世纪中期以来生产的日益集中。它规定今后不允许私商直接从生产商那里购买食盐,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官府的代理人要从最具生产力的盐场购买引盐,从而将在整个生产中不占多少份额的不发达地区留给“夫妻”生产商,这些人可以像从前一样供应当地的消费者。建立了六个官运分局;最重要的在自流井——因为要在富荣盐场和犍为盐灶最为集中的五通桥购盐。其他的分局负责在射洪、云阳、大宁和彭水的煎盐者。<sup>⑦</sup> 允许一些超定额的生产,私人在支付厘金后,可以少量购买此种以及来自边缘生产地区的食盐。<sup>⑧</sup>

151

实际上,官府并不打算亲自负责购买和运输的所有阶段。官府的人员也不想永远待在盐场。分局的代表一年三次前往盐场,与地方商号就食盐装包并将它运往各引岸进行签约。就富荣而言,私人运输的承包商处置在自流井以及远至邓井关所购买的食盐,在邓井关换成更大的、适于长江航行的船只。<sup>⑨</sup> 为了防止这些私人船主走私,丁宝楨制定了监管船工帮会成员的详尽章程。船只必须登记,执照上写明承载量,以便沿运输路线的反走私官员进行核查。为承载的盐斤设定运输费用,也考虑到了运输途中食盐损失以及在长江支流等枯水期难以航运的困难。<sup>⑩</sup> 在引岸食盐分配的主要地点即岸局,除现在由官府代表向当地商人售盐这一点外,其他的与旧体制之下的做法一样。进入贵州的食盐由在仁岸、涪岸、綦岸和永岸的分局进行分配。在张窝和南广分局,对进入云南的

<sup>⑥</sup> 表 6.1 只是列出已在云南和贵州边岸出售的食盐,这受旧盐引制度衰落影响最大。

<sup>⑦</sup> 罗士恒:《四川的盐政》,16 页。

<sup>⑧</sup> 同上文,17 页。

<sup>⑨</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15,转运 10,页 5。

<sup>⑩</sup> 同上书,页 5—6。

食盐进行分配。所有进入湖北的食盐都要经过在万县的一个中心集散点。这些分配点之外，乡村遍布的子口继续执行检查食盐、监督内河运输和缉查走私的任务。除了掌控食盐在生产地与销售地间的实际流动外，官运局努力恢复严格的指定营销地界的引岸制度。允许较小的盐场供应它所在的地区。然而，较大的生产地区再一次与特定的分配中心联系在了一起。

一旦食盐抵达与岸局有联系的官府仓库，这些食盐就出售给那些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商人。在过去盐引制度下，此时要进一步划分引岸，而现在，商人们可以将引岸所购的食盐自由地卖给引岸辖区内的任何一地。然而，价格不再完全由市场来决定。边岸的多山地区，食盐运输困难，造成云南和贵州成为一个内部无章可循的市场。这些地区的商人，向盐局付钱拿盐后，可以设定自己的零售价格。在四川省内所售食盐的价格控制要远为严厉。在这一市场，允许商人售盐的价格由官方制定：考虑食盐生产成本、运输到分销点的费用、所有赋税和加征，还有一个公式计算在指定的销售地界内的运输成本，因为各个地方的运输成本不同。在那些靠近云南和贵州的边界地区，允许每引食盐的利润：巴盐 20 两，花盐 22 两。其他地区，利润通常是在如下基础上计算的：每斤盐第一个 40 里增加 1 文，以后每 50 里增加 2 文。<sup>①</sup>

官运总局设在泸州，这里靠近富荣、乐山和犍为盐场，是西南食盐的中心分配点，是重要的经济中心。以拥有候补道员衔的总办为首，监管着整个四川盐务，受北京户部直接管辖。这一新的专门财政机构，取代了总督和盐茶道对于盐务的共同管理，这一做法显然在于减少省里对于盐业收入的控制。四个部门协助总办：文案所、收支所、引目所、票据所。后两个尤其重要，因为它们处理售盐的引、票事务，使用过的引和票要返

<sup>①</sup>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66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辑，1984 年；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30 页。

给这两个所,作为记录,以核对收入、设制定额,并每年向中央户部奏销。<sup>②</sup> 尽管在接下来的70年间盐政体制的细节频繁变动,但由丁宝桢所建立的大致框架一直作为四川盐政体制的基础。

官运商销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将食盐赋税合理化,以增加政府收入,减少商人逃税。达到此目的的最有效手段,是将从前的所有赋税合并为一个总数。不是将此作为一种赋税加征,而是对在引岸销售的食盐加价,由批发商支付。此外,只有盐井税继续由盐场地方官员征收。通过这种方法,没有什么赋税可以逃避,新的赋税很容易加派到商人和消费者头上。的确,这一新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在19世纪末期有经费需求的官员对于盐课重要性的日益重视。

153

雍正朝开始施行以人口为基础的盐引分配制度,当时对食盐征收两种赋税:盐引税和羨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50年代,当时需要收入以与叛军作战,导致了引入厘金和其他一些已合法化的收费。经过丁宝桢的巨大努力,滥收费用和贪污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控制。效仿差不多150年前雍正皇帝的改革措施,所有的陋规被视为非法,食盐成本之外,额外固定征收盐引费用的15%,以支付官运局、分局和有关机构工作人员的薪水。1880和1883年,分别递解了其中的部分费用,以弥补云贵官员的行政支出。<sup>③</sup>

在清朝的最后数十年,需要新的收入以偿付外国赔款、资助新军、支付边防开支、招募乡勇,这导致许多新的赋税添加到了引岸商人所支付的盐价中。<sup>④</sup> 官运商销制度下向食盐所征收的新赋税,超过一半最初是在1895年出现的,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签订了《马关条约》,

<sup>②</sup>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29页。

<sup>③</sup> 贵州对于运到该省的食盐每引给银14两,云南则一年固定拨出1400两。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34—135页。关于雍正皇帝处置陋规,见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

<sup>④</sup> 对于清季盐税增长和四川政治关系的探讨,见阿谢德《清末的省与政治:1898—1911年的四川总督》,29—30、45、60页等,伦敦:柯曾出版社,1984年。

向日本赔偿2亿两白银。20世纪初的改革辨识出了向川盐征收的25种收费和附加税。<sup>⑤</sup>这些加派对于在不同市场的富荣盐价的影响可见表6.2。

并非所有的费用都向在各个市场出售的食盐征收,并且每种税和费的收费标准也各不相同。但在晚清,费和附加税远远超过正常的法定盐税。正常的税收相对保持不变,而新的税种日益增多。甚至在1860和1870年代,作为盐商苦难之源的厘金,也保持了相对稳定,但为了特别目的而征收的新的、日益增加的费用加在了向商人出售的盐价上。最重要的是“加价”迅速增多,这一主要类别的特别税收是为了支付外国赔款、添练新军和晚清地方政府改革。<sup>⑥</sup>到清朝末年,富荣食盐的杂税占到了向四川这一最高产盐场生产食盐所有征收税赋的95%—98%(见表6.2)。根据樵甫的记载,1916年购买、运输一引花盐需约140两。杂税对各食盐销售地的影响大小不一,计岸和边岸的盐价因此增长了一倍多,而湖广市场的盐价增长了50%强。<sup>⑦</sup>

154

表 6.2 富荣每引食盐在各市场出售时应缴的赋税(约 1911 年)

赋税	云贵边岸		四川计岸	湖北济岸	
	富荣巴盐	富荣花盐	富荣花盐	富荣官运	富荣商运
正税	3.405	3.405	3.405	3.405	3.405
羨	4.495	4.495	5.595	4.323	4.323
截	并入上项	并入上项	0.600	1.000	1.000
厂厘	19.5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三次盐斤加价	35.000	43.750	43.750	0.000	0.000
黔税厘	10.400	10.400	0.000	0.000	0.000
黔省盐厘加价	9.000	9.000	0.000	0.000	0.000
添练新军	10.000	12.500	12.500	12.500	12.500

<sup>⑤</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第1编,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sup>⑥</sup> 类似的盐税政策也在其他省份实行。关于19世纪末湖北和湖南的新政,见周锡瑞《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13—116页,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

<sup>⑦</sup>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82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

(续表)

赋税	云贵边岸		四川计岸	湖北济岸	
	富荣巴盐	富荣花盐	富荣花盐	富荣官运	富荣商运
抵药加厘	20.000	25.000	18.750	6.250	6.250
滇税厘	0.600	0.600	0.000	0.000	0.000
滇省团费	1.087	1.087	0.000	0.000	0.000
渝厘	2.000	2.000	2.000	25.000	25.000
局费	5.000	5.000	5.000	0.000	0.000
办公经费	0.000	0.000	3.000	0.000	0.000
改代公费	0.000	0.000	0.000	0.000	3.000
预捐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勇饷	0.000	0.000	30.000	0.000	0.000
边防经费	5.000	5.000	0.000	0.000	0.000
护本	1.000	1.000	2.000	1.000	0.000
加摊护本	1.000	1.000	0.000	1.000	0.000
引底	1.000	1.000	1.000	0.000	0.000
炮船经费	0.500	0.500	0.000	0.000	0.000
施济康济	0.500	0.500	8.000	0.000	0.000
签验	0.600	0.600	0.600	0.750	0.000
生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总计	130.087	144.837	153.600	72.228	73.478
杂税占整个赋税的百分比	97.663	97.649	97.783	95.285	95.365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5—6页。这些数据似乎直接抄自更早的张辑录的《四川盐务报告书》，该书1912年出版。

以所带来的收入和税盐数量衡量，官运商销的改革十分成功。早在 1878 年，丁宝桢不无得意地宣布，这是多年来四川盐引第一次全部售出，积引销售也创下新高。到 19 世纪末，四川盐政至少创造了 300 万两的税收，仅四川销往云南和贵州的引盐额就增长了几乎一倍（见表 6.1）。官运商销的创收给中央和地方都带来了好处：缴送中央户部一个定额，剩下的在四川和云南、贵州间分割，而后者的大多数用于军事支出。官运局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向不同地方重新分配盐引的能力，部分解释了引盐销售的急速恢复。然而，同样重要的原因是，边岸重见和平，以及官员

采取严厉措施肃清改革前管理中的腐败行为。销售积引的做法一直持续到 1894 年,处理完了官运商销建立之前所有的引额。在这一年,官运局开始授权销售已有定额以外的食盐。这些所谓的余引,使得销售水平继续依 1894 年以前的增长速度增加(即定额的 125%)(见表 6.1 和表 6.3)。

表 6.3 云贵边岸所售余引与各年额引的比例(陆引已折合为水引)

年份	A:额引	B:所售余引	B占A的比例(%)
1894	24 054.68	4 000.00	16.62
1895	24 054.68	1 960.00	8.14
1896	24 054.68	5 194.00	21.59
1897	——	——	——
1898	23 641.88	5 906.90	24.98
1899	23 641.88	5 715.80	24.17
1900	23 641.88	5 726.80	24.22
1901	23 641.88	5 717.80	24.18
1902	23 641.88	5 720.80	24.19
1903	23 641.88	5 723.80	24.21
1904	23 641.88	5 729.80	24.23
1905	23 641.88	5 741.80	24.28
1906	23 641.88	5 918.80	25.03
1907	23 641.88	5 744.80	24.29
1908	23 641.88	5 744.80	24.29
1909	23 641.88	5 823.80	24.63

资料来源: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档案中的清单,引自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14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一些材料表明,20世纪初官运局开始在完成盐额上遇到了困难。在《川盐纪要》的编者看来,这一问题在1906—1908年已很严重。盐价日益上升,部分是由于银钱比价上扬、煤炭等生产物质成本增加。<sup>⑧</sup>然而,

⑧ 国家赋税制度规定的铜钱与白银的“正常”比价是1 000:1。根据四川《南溪县志》(它含有最接近这一时期的银钱比价)的记载是,1905年铜钱1 600文换一两白银。清朝覆亡时,这一数字上升至2 500:1。见李凌霄等纂《南溪县志》,卷2,食货,33—34页,1937年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重印本。

日益增加的赋税是更重要的原因。高赋税对于消费者——该书编者对他们表示了同情——意味着高价格，他们被迫减少食盐的消费。<sup>39</sup> 这些消费者大多数在云南和贵州的市场，那里官运商销的措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需要指出的是，日益下降的盐政效率并不意味着制盐业的萎缩，这对于了解食盐生产商对于官运商销的反应很重要。

156

除了销售引盐外，四川食盐生产商，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允许向小的私商销售票盐，这些商人仅需向国家缴纳很少的厘金。而且，1877年以降，在湖广销售的部分川盐继续由私商运输，因此不可能弄清楚销售量。最终在1894年，清政府彻底改变了整个四川市场相对统一对待的做法，取消了官运商销对于四川计岸运输食盐的管辖。食盐销售的一个指标，也是生产的一个指标，是在宜昌缴纳的食盐厘金数目——宜昌是川盐进入湖广的贸易中心。在这些数字的基础上，在世纪之交供职于英国驻成都总领事的谢立山，计算出运输至这一市场的川盐每年约8600万斤。我们将谢立山的估数与本章前面所引太平天国运动后销往湖广川盐的数字比较，可以看出“济楚”市场在该世纪的最后数十年很稳定，尽管在那里四川指定销售的区域被大量削减。而且，谢立山揭示，1906年宜昌海关奏报说，销往湖广的川盐将近9700万斤，前面的那个数字可能被低估了，运往湖广的数量实际上在增加。<sup>40</sup> 为谢立山提供材料的人坚持认为，走私使得消费者得到了更多的川盐，高达官府所控制市场的食盐量的50%，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说法。<sup>41</sup>

157

<sup>39</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19页。

<sup>40</sup> 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80页，上海：别发洋行，1922年。谢立山在四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调查农业和工业资源。

<sup>41</sup> 同上书，182页。

## 官运商销对富荣食盐生产商的冲击

如果日益严厉的市场管理并没有造成四川盐业销量减少,那么我们怎么评价官运商销对于生产商的冲击呢?

“济楚”市场的萎缩与同时实施的官运商销,几乎一举摧毁了四川小规模盐场,它们只剩下为所在地的居民提供食盐。在民国元年刊印的张习的《四川盐政报告书》中,开列了川盐供应四川、云南、贵州及湖广的所有州县。其中,绝大多数州县由来自富荣和犍为的食盐满足它们的定额,而射洪、乐山、南部、资州、三台、蓬溪、夔州、井研、剑州仅供给一些地方的零星定额。<sup>④②</sup> 谢立山对于四川盐业生产的调查,揭示了 20 世纪初一些盐场食盐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的惊人变化。居该名单首位的富荣,拥有该省总产量的 58%,而前四位盐场的产盐占到了四川总产量的 92% (见表 6.4)。<sup>④③</sup>

表 6.4 四川各县盐场估计产量(约 1900 年)

盐场	产量(斤)	占四川总产量(%)
富顺/荣县	274 400 000	58.46
犍为	83 872 320	17.87
乐山	51 100 000	10.89
云阳	25 427 250	5.42
中等规模盐场(7 家)	27 515 750	5.86
小规模盐场(14 家)	6 592 500	1.40
极小规模盐场(13 家)	479 400	0.10

资料来源: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81—182 页,上海:别发洋行,1922 年。

<sup>④②</sup> 张习辑:《四川盐务报告书》,页 5a—16b,1912 年。

<sup>④③</sup> 食盐生产集中到少数大盐场的社会成本难以正确估计。阿谢德指出数个欠发达的食盐生产地区成了义和团运动在四川扩展的垫脚石。见阿谢德《清末的省与政治:1898—1911 年的四川总督》,36 页。



“济楚”市场和盐课管理的变化,对于富荣盐场的商人来说利弊参半。本书一开始所讲述的富荣商人反抗政府的盐业政策也是始于这一时期。罗筱元曾是王三畏堂的经理,他讲到了1908年反对官运局的长期罢工。<sup>④</sup>这些商人和工人联合起来反对官府的故事,可能有编造的成分,且肯定包括了许多反抗满人政权的家族所精选出的传闻,但很显然,对于从相对的自由贸易和低赋税向1877年以后制度的转变,富荣食盐生产商绝对有理由表示愤慨。然而,并非所有该产业的参与者,或盐业生产和营销过程的所有方面,所受到的这种国家与社会间新的关系的影响都是负面的。 158

考察清朝即将覆亡时的富荣盐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作为西南食盐营销主导势力的陕西商人的消亡。这一有势力的商业力量的淡出,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当时战争切断了陕西商人所主导的云南和贵州的食盐营销地区的贸易。到1860年代,高额赋税、腐败和走私已扼杀了引盐销售市场,这也是官方掌控长途运输这一政策即实行官运的首要原因。<sup>⑤</sup>曾经是陕西商人垄断市场的利润的失去,加之他们西北老家的回民起义所造成的损失,使陕西商人开始转向新的投资方向,包括四川等地日益增长的信贷市场。<sup>⑥</sup>1890年代,盐业生产技术的变化(见第七章)使得陕西商人彻底被自流井和贡井的本地商人超越。

带领自流井和贡井进入20世纪的食盐商号,自身就是新的盐政体制的产物。官运商销尤其给小生产者带来了困难。官运分局设定了购买定额,它将决定哪些食盐可以在有利可图的引岸出售。据罗筱元的记

<sup>④</sup>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68—69页。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3—194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sup>⑤</sup>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13,转运8,官运上,页3—4。

<sup>⑥</sup> 陕商留给四川盐业市场最著名的是宝兴隆,它是边岸的一个批发商号。它最后一位东家苏镒,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离开了四川,他将这一商号转交给了老朋友和主顾王向云,后者将商号更名为王宝兴隆。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59 述,较大的生产商在与官运分局谈判时,因为他们能保证交付那些提前数月就已付款订购的食盐,故而受到优待。<sup>④7</sup> 较小的灶户可能必须与比他们更具实力的竞争者谈判,以使他们所产食盐包括在后者的交易之中。

井火灶和炭火灶都生产成品盐,在盐灶是柜房直接与官运局的采购代表打交道。为了简化自己的工作,官运局官员赋予较大的盐灶和更具实力商号的盐灶以永久性的份额或曰“牌子”。拥有牌子的盐灶必须维持生产水平,以免牌子被撤销。实际上已发展出了活跃的品牌租佃市场,使得盐灶临时调整生产,而不会取消可以保障他们占有市场一席之地的宝贵份额。<sup>④8</sup> 这样一来,如同过去盐引是一种商品一样——小的地方商人出租给实力雄厚的陕西商人(见第一章),牌子也成为了一种可租佃的商品,甚至可以像井盐股份一样进行买卖。在定额分配制度下,炭火灶不占优势。只有当井火灶的产量不能完成定额时,官运局才购买炭火灶所煎食盐。<sup>④9</sup> 炭火灶易于建造与投产,这给制盐业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但在改革初期,一些炭火灶关张,给贡井盐卤生产商带来了不利影响。只有自流井的天然气生产暂时下降,才可以拯救贡井的永久性衰落。

官运商销有利于较大的生产商,但它同时也侵蚀了这些企业的利润,破坏了这些商人投入巨资的纵向一体化的优势。在过去,汲卤、煎盐、批发、零售的联合,使得大企业利用这种机会,销售品牌产品。王家、李家、颜家和胡家,以及规模小于他们的竞争者,包装并营销他们自己的食盐,这些食盐当时通过他们自己的代理人售卖,这些人与遍布引岸的零售商保持着持久性的关系。而现在,政府在向远方运输之前,将购买的所有食盐混在一起,维持零售网络的动力已被消除,通过提高质量、统

<sup>④7</sup>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58页;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9页。

<sup>④8</sup>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59页。

<sup>④9</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页74b,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

一规格、品牌认可来获利的动力也不复存在了。<sup>⑤①</sup>

较大的生产商,也受累于在盐场及分发零售的集散点突然强制规定的盐价。食盐生产商现在不得不接受由官运局为各个销售阶段所设立的固定利润。<sup>⑤②</sup> 大的一体化盐号,也被迫退出了除湖广之外的各处批发市场。但是湖广,以及后来的不设限制的四川市场,保留有达成这种协议的相当大的潜力。价格控制不仅降低了在盐场出售给官运分局的每笔食盐的利润,而且也设定了卖给消费者的涨价幅度。通过持有信息搜集网络和零售市场代理人所获得的任何优势都失去了,随之失去的,是以大家族企业为基础的、有抱负的商人的一个主要的利润来源。我们从现存的账簿还无法评价定价权的丧失所造成的损失,对于现代富荣盐场的先驱们的衰退到底有怎样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到1880年代李四友堂已经彻底关闭了它的批发生意,甚至是在湖广的那些批发生意。<sup>⑤③</sup> 在20世纪,纵向一体化以及生产、营销的联合已不再是富荣企业家的标志。

---

<sup>⑤①</sup> 粮食市场引入粮食装卸机所带来的变化与此类似。这两个事例中,储藏和营销的创新消除了生产商的品牌生产优势。见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纽约:诺顿出版社,1991年。

<sup>⑤②</sup>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68页。

<sup>⑤③</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6—167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李德山将无力偿还票号的大笔汇费作为决定关闭李四友堂湖广零售商号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盐价降低和盐税增加,使得在寄回利润时,更加难以消化高额的汇费。

到 19、20 世纪之交，富荣盐场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尽管地处偏远的内地，但它所缴纳的盐税却是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而盐场也成为了当地和跨省商人的一个重要投资目标。尽管改革盐课强加给了富荣食盐生产商种种税费，但对于那些拥有资本和专门知识并鼓足勇气进入这一多变产业的人来说，生产和营销食盐仍旧蕴涵着巨大的利润。1890 年代初，自贡四大家族如日中天，从他们和不及他们兴盛的同行盐井中所发展出的商业技能，是近代早期中国专业经营一体化潜能的一个例证。自贡在经济上的地位极为重要，它在清王朝覆亡之后，成为数十个四川及跨省军阀炙手可热的争夺对象。然而，在数十年内，经历了一个世纪所形成的经济制度行将崩溃。新中国的拥护者们透过城市瓦砾回头望去，鲜能看到这里曾存在过什么组织。

王余杞是王三畏堂创立人的第四代传人，他在 1940 年代的一部小说中，<sup>①</sup>对自己家族急剧衰落的描述，与大多数中国史学家所说基本相同。家族内讧、封建思想、政府残暴统治，造成了王家的败落，正如同这

---

<sup>①</sup> 曼因(笔名)：《自流井》，成都，1944 年。

些因素造成了中国的败落一样。事实上,就此问题而论,王家等家族乃至中国,并不是像人们重新解释的那样衰败下去的。这种重新解释的着眼点,只是含混地归因于封建思想和贪婪。对于自贡而言,生产技术的变革,以及一直很不发达的金融部门,为它带来了特有的发展机遇。政治先是在清朝的灭亡接着是在新制度的发展中发挥着作用,商业和国家借这些制度为控制自贡的生产而斗争着。最后,战争也发挥起着作用,首先是在日益分裂的四川,将自贡视作“提款机”,接着是战争切断了盐场与市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曾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黑暗岁月中盐场起飞的根基。下面我们转向对上述因素和自贡商人迎接这些挑战的讨论。

162

## 李伯斋与盐岩层的发现

1894年,在富顺盐场有些投资的盐商李伯斋,应熟人之邀,接手淘办一眼陕西商人近期遗弃的盐井。<sup>②</sup>如同大多数在自流井大坟堡地区开凿的卤水井一样,这眼广源井将会是黑卤井。<sup>③</sup>大坟堡是一个相对不发达的食盐产区,年均约向自流井盐灶供应800吨卤水。<sup>④</sup>它也是凿井队伍常常遇到问题的地区,尤其是在2200—3000英尺深时碰到特别易碎的“豆沙岩”层所带来的麻烦。<sup>⑤</sup>早期投资者在大坟堡及附近的杨家冲凿井时,在这一岩层使用桐油和石灰的混和物进行填充,以防止井的内壁坍塌。<sup>⑥</sup>若不是工人们在3000英尺左右深度开凿岩层时,注意到了井中

② 李伯斋在盐场的影响甚小,他最早开凿盐岩井,但未能得到自流井官运局销售引盐的许可。据记载,只是经他与官运局有关系的属下的斡旋,才给予了他的盐灶优先售盐的权利。见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59—6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

③ 黄植青、聂无放:《自贡盐场发展片断》,256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4辑,1982年;杨筱舫:《自贡盐岩的发现》,15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④ 马宗瑶、聂成勋:《自流井大坟堡岩盐体开发状态及开采历史解析》,37页,载《井盐史通讯》1983年第1期。

⑤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⑥ 黄植青、聂无放:《自贡盐场发展片断》,255—256页。

339

所淘出的泥和石头中混杂有白色颗粒状物质的话，广源井——现在新主人叫它发源井，也会进行上述类似的处理办法。一开始，人们没有在意这些食盐颗粒，但是随着凿铍日深，它们的量在增大。<sup>⑦</sup> 大多数关于发现盐岩层的记述说，李伯斋开始怀疑定期注水以协助捞出碎石杂物这一凿井程序出现了问题，造成了靠近井底的某个盐层的溶化。建造黑卤井，开凿到 3 000 英尺乃至更深的做法，无疑很难想象在数百英尺以上有一更为集中的食盐来源地。然而，李伯斋试验了各种溶解这一食盐集中储藏地的技术，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来源不是在下面，而是在因井壁坍塌所造成原有开发商中止凿钻的“豆沙岩”层。这一存储层大约 93% 是纯氯化钠。仅在大坟堡，它就超过了 1 平方英里，有 13—20 英尺厚，总储量近 1 000 万吨盐卤。<sup>⑧</sup>

李伯斋最初是通过将沸水灌注入井，溶化盐岩层并汲卤。<sup>⑨</sup> 为增加水的咸度，他还同时使用一种“搨水”的做法。第二章已描述过，推卤的基本设施是由天车、地车和天地滚子组成。在天车的顶端是天滚子，用升降卤筒的箴索连着天滚子。箴索从井中出来，先到天滚子，再到地面的地滚子，接着再到地车。搨水就是，为了搅动井底的泥浆，雇用两个工人轮流压紧并松开“过江”，也就是地滚子与天车之间的箴索。卤筒因之在井中上下运动。当它向上运动，底端的活塞被压力挤开，卤水进入筒中。当它向下时，先前注入井中的淡水从卤筒顶端被挤出，更咸的卤水被挤入。很快，人们发现凉水和热水有同样的效果，这样就最早开始了有着经济效益的盐岩层的开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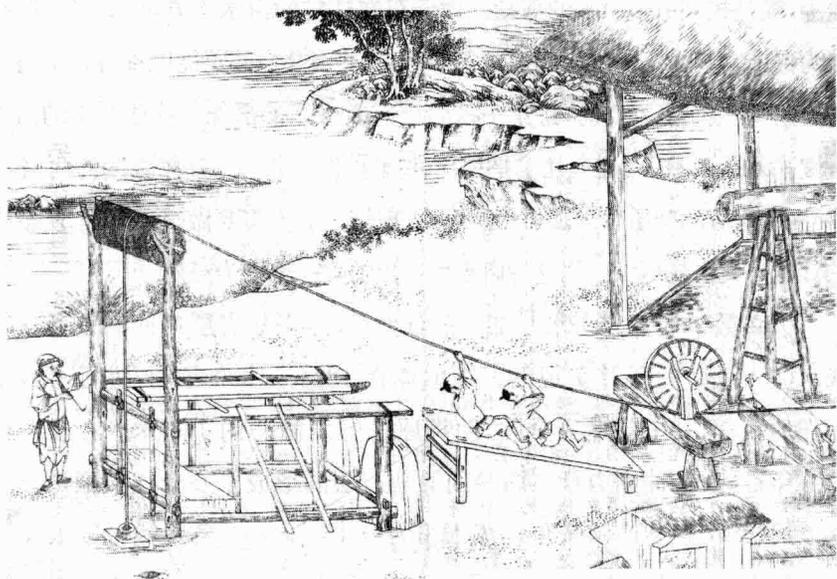
发源井不大不小的成功试验，鼓励李伯斋和其他盐场商人重新淘办一些废弃的曾有“豆沙岩”层问题的黑卤井，其中包括杨家冲的天全井，

⑦ 马宗瑶、聂成勋：《自流井大坟堡岩盐体开发状态及开采历史解析》，37 页。

⑧ 同上文，36 页。

⑨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 页。

大坟堡的万福、济咸、恒升井。1900—1901年这一地区又铤办了六眼井。<sup>⑩</sup> 这些井的生产力低下,属于高度的劳动密集型。每眼井各自注水;那些远离淡水资源的井雇用数百人,从最近的河和水塘中运水。自己土地上没有水源的井不得不租佃用水权,以用水的多少缴纳年费;或者是购水,费用达每挑四五百文铜钱。<sup>⑪</sup> 然而,大多数盐岩井由废弃的黑卤井或进一步挖掘黄卤井而来,启动成本相对要低。通过几乎都是清末投资者所保存的岩口簿<sup>⑫</sup>来看,这些盐井的铤办基本上都成功了。工程上最困难的任务,是在向下凿铤时,要将桐油和石灰做的密封剂从岩盐层拿掉,且防止它崩塌。<sup>⑬</sup> 164



图片 7.1 掬水

资料来源: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卷 2,井厂 2,页 14b—15a。

<sup>⑩</sup> 同上文,6页。

<sup>⑪</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10,节 1,页 69b,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

<sup>⑫</sup> 见第二章。

<sup>⑬</sup> 黄植青、聂无放:《自贡盐场发展片断》,256页。

王子衡、邓炳宣等人在盐岩井发展的早期，能够以极少的资本进行投资，从事食盐生产。<sup>⑭</sup>所需要的就是雇用工人、购买牛只，以及如果有需要的话，重建天车和天地滚子等设施的资金。万福井原管理职员牛集成记述说，1903年这种井投产的最大单笔投资是购买牛只。80头牛花销达1万两，盐井每月可以汲取约2000担卤水。后来，骡子代替了牛，一头120两，产量提高至月产三四千担。<sup>⑮</sup>

165 这些早期盐岩井的产量并不突出。它们之所以吸引后来者加入，部分是因为在清末气卤之间生产的严重失衡。前文已指出，不论是否煎盐，自流井气井中的天然气都要逸出。因为气不能存储或运输，井户们就必须或是将井盖上，或是找到更多卤水的煎盐。由于存在这样的卤水卖方市场，当一些盐灶为保证它们的卤水供应而进行争夺时，一些卤井户甚至能够签订提前付款的契约。<sup>⑯</sup>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盐岩层有效开采的潜能。这些井中的卤水咸度平均达25%—33%，几乎是黑卤井卤水平均17%—18%咸度的两倍。<sup>⑰</sup>另外，盐岩卤的杂质少于黄卤和黑卤，在煎烧之前不需要做很多处理，所造成的食盐损失也就更少。用这种卤水生产出的食盐也更为经济。

大多数早期盐岩卤水井都是独自生产，对于盐岩层的冲刷是通过将淡水注入汲卤的盐井实现的。李伯斋在1894—1900年间，进行了数个这样的工程，其中包括天全井，距离原来的发源井约140米。在投产后约一年，淡水的冲刷力量在两井间的盐岩层间形成了一个连接通道。从这以后，水可以从产量较低的发源井注入，而只从天泉井就可以汲取两个井的卤水。对于位于杨家冲、大坟堡、周家冲、扇子坝地区下面大面积盐岩层而言，这一偶然的事件，标志着高利润开发的真正开始，这一地区在盐场延伸数英里（见第四章的地图4）。到20世纪初，大多数盐岩井都

<sup>⑭</sup> 同上文；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3—34页。

<sup>⑮⑯</sup>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4页。

<sup>⑰</sup>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



是从连通着的井中汲卤。1902年,怀丰井成为了冲刷20多眼的渡水点,这些井形成了杨家冲—周家冲产区。1913年,投资者开始从王和甫所拥有的积荣井渡水,冲刷22眼井,它们形成了盐坝—马草山—新店产区。1916年,从五福井渡水,可以从5眼井中高效汲卤,形成了钓鱼台—扇子坝产区。<sup>⑬</sup>

盐岩层开采方法的实施,引发了卤水生产管理上的剧烈变革,从而食盐生产有更高的机械化水平,生产更富效率。通过考察所采纳的革新以及所失去的机会,我们可以了解20世纪初自贡不断演进的商业环境的许多情况。

首要的变化是,从构成的现实情况看,诸多盐岩井不再被视作完全分离的个体。盐井通过地下通道连在一起,井户们发现,为了联合冲刷他们的盐井而进行合作很是经济。合作协议也避免了为合法拥有地下财富而进行竞争的潜在噩梦,这些地下财富,人们不再轻易地将其与地面的土地权利联系在一起。在这些最初的合作协议的制定过程中,水的供应和运输起着作用。在盐场发展初期,能得到大量的水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值得关心的问题。大多数不靠近淡水的盐井都有水塘,供冲洗牛只并向它们提供饮用水,仅此而已。在发现盐岩层后不久,企业家成立了专门供应冲刷盐井用水的商号。若盐井附近没有水资源,井户就要向这样的商号支付从远处的水库或水塘供水的费用,或根据挑数<sup>⑭</sup>或是根据每年的合同付费。<sup>⑮</sup>

166

许多盐井由井户推卤,但一些渡水商号发挥了更为广泛的作用,既灌注盐井也推汲卤水。王三畏堂的一个远房亲戚王和甫,是盐岩汲卤生意的开拓者。他是和福公盐岩渡水处最大的股东,专门从事将相邻盐井置于一处,签订合约,负责供水,冲刷盐井。渡水处的利润来自各井户以他们年盐卤产量为基础所缴纳的费用。<sup>⑯</sup>王和甫对于盐坝—马草山—新

<sup>⑬</sup>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

<sup>⑭</sup> 挑是水、米等物的一种标准计量单位,指搬运者肩上扁担两端的桶、筐内商品的容积。

<sup>⑮</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10,节1,页69b。

<sup>⑯</sup> 马宗瑶、聂成勋:《自流井大坎堡岩盐体开发状态及开采历史解析》,37页;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店产区一些盐井用水的掌控,是他发家致富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提升了他的地位,成为盐场圈的领袖人物。<sup>②</sup>

从一开始,盐岩卤水的推汲远比见功的黑卤和黄卤井起伏多变。当更多的盐岩井投产,渡水和推汲的过程本身就改变了盐场的地质状况。第一个受到这种影响的地方是大坟堡。在盐岩井发展的开始阶段,这一地方的地下水位很深,提升卤水必须经过相当长的距离,因此汲卤设备、工资和牛只需要大量投入。这一地区的盐井远不比那些杨家冲井户们的赚钱。然而,一些年后,这两个地区盐井间的屏障消失了,杨家冲地下水位下降,两个地区间有了一条灌注通道。根据当时的报道,这两个地区的屏障最后毁掉时,人们感觉就像是地下的一次巨大爆炸,最贴切的比喻是地下一个巨大火山在喷发。<sup>③</sup> 这一水道一旦形成,沿许多支流分布的盐井,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该井能够获取多大的利润。离渡水点最近的井或是冲刷一组井时水直接经过的盐井,产量必定很低。<sup>④</sup> 一些盐井所受负面影响太大,井户们不得不从灌注合作中退出,重新凿井以汲取黑卤。

167

赖明钦及同仁记述了盐岩井卤水事业中财富变化最剧烈的一个例子。大正海井,最早在清末开凿,开始时是一个独立的盐井。通过附近的来龙井渡水,水压将盐卤水位提升至约 1 200 英尺。结果,大正海成为了盐场最高产井之一。然而,在投产之后不久,它的盐岩层溶化,将它与一个巨大的连通盐井系统的主要渡水通道直接连接。这不仅使它的水位下降,而且连接冲刷的结果是,将它的大部分盐冲向了水道下游,卤水浓度也降低了。与此同时,已溶解的盐层导致了井壁不断坍塌,数年后,该井就倒闭了。<sup>⑤</sup>

<sup>②</sup> 到 1910 年代,从位于金龟山的积荣、神涌井渡水,可供 37 眼井汲卤。见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7 页。

<sup>③</sup> 黄植青、聂无放:《自贡盐场发展片断》,256—257 页。

<sup>④</sup> 同上文,257 页。

<sup>⑤</sup>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7 页。

时移世易,盐岩井在盐场整个生产中日益重要。比较官方的总产量可知,1914—1919年间自贡年均产盐3 193 832担,<sup>⑥</sup>到1930年代初,这一数字升至约4 120 000担。<sup>⑦</sup>而自贡在1930年代初的盐产量是为数极少的盐井生产的,当时总产量的大多数出自盐岩卤井。我们没有较早时期投产的盐岩井数字。然而,依据《川盐纪要》的记载,当时有1 004眼卤水井和199眼气井。<sup>⑧</sup>后面我们将看到,盐岩层的开发带来了机械化汲卤。《川盐纪要》明确告诉我们,1919年所做的调查中,仅有38眼用蒸汽机车汲卤,其中32眼是盐岩井。<sup>⑨</sup>因此我们可以认为32很接近这一时期正在汲卤的盐岩卤井数。同时还要记住的是,许多盐岩层通道相连的盐井是在一起灌注的,并通过最末端的一眼井进行汲卤。这可以与1932年《四川盐政史》所载的倒闭盐井进行比较(见表7.1)。

表 7.1 富荣盐场井的各种类型(约 1931 年)

盐井类型	数量	占总数的百分比(%)
盐岩	76	10
黑卤	94	13
黄卤	91	13
黑卤/气	207	28
黄卤/气	117	16
干气	143	20
井总数	728	100

资料来源: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2,页72a—73a,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年。

<sup>⑥</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24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sup>⑦</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9,节1,页59b。这一数字被称为平均产额。同书另一处给出平均产额的数字要低些,该数字与这里给出的数字及别处纳税的数字不相吻合。同上书,卷2,篇2,章3,节3,页44b—45a。

<sup>⑧</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208页。

<sup>⑨</sup> 同上书,226—228页。当机车汲卤早在1905年就被引入并且特别适用于盐岩井时,许多盐岩井不大可能仍由牛或骡推汲,见后面的讨论。

168 到 1930 年代,盐井数目变得更少,此时盐岩卤井生产的食盐占富荣盐场的约 57%(见表 7.2)。尽管从黑卤到盐岩生产的转变不是 19 世纪精英势力衰落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发挥着作用。大多数早期盐岩井的参与者都在黑卤井上有着极大的投资。如前所述,在盐岩井发现之前,一直是卤水的卖方市场。到 1920 年代,盐岩层生产的扩张,完全改变了天然气与卤水生产商间的交易条款。而且,如下面将要讨论的,盐岩层的发现导致了技术以及生产关系其他方面的变化,令在太平天国及以后时期发展起来的资产拥有者难以应对。

表 7.2 1932 年前后各类型盐井估计的产量(担)

	盐井总数 <sup>a</sup>	(井/天) <sup>b</sup>	平均卤水产量		食盐产量/年 <sup>c</sup>	所占食盐总产量百分比
			卤水总产量/天	卤水总产量/年		
盐岩	76	300	22 800	6 840 000	1 778 400	57%
黑卤	94	150	14 100	4 230 000	761 400	25%
黑卤/气	207	50	10 350	3 105 000	558 900	18%
总计 <sup>d</sup>					3 098 700	100%

a 表 7.1。

b 林振翰:《川盐纪要》,228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年。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载《四川文史资料》第 11 期,193—196 页,1963 年。

c 将每单位卤水出产的盐量,乘以年产卤水量计算而得。关于卤水咸度,见许涤新、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59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林振翰:《川盐纪要》,238 页。

d 认为其余的产量可以归为那些卤水咸度在 4%—13% 间以及日产量从 40 到 200 多担间的黄卤井所出产。

## 蒸汽机车的引入

169 富荣盐场生产采用蒸汽动力的史话,不仅揭示了影响着商业圈的新生力量,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对中国现代化主流叙述进行评价的有趣个案。在讨论 19 世纪盐商身为企业家的活动时,我们已用更为宽厚亲切的形式对他们的失败作了叙述。在这一个案中,市场规模的突然变化以

及未曾充分利用的技术唾手可得,激发了产业投资和生产的起飞。普遍认为的发展障碍——帝国统治制度、商业法的缺位、资本积累的低水平等等,所有这些,在能够长期获取足够多的利润面前,都容易克服。当对于失败的叙述,应用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时,它变成了一个机会遭到拒绝的传奇。在中国,西方的技术俯拾皆是,但几乎没有具有远见、明了其潜能的官员,能说服中央政府或是私人去资助它们的发展,因此才会有了各省零星地建造铁路,漫无目标地投资军工厂、矿山、纺织厂和轮船这一现象。<sup>③</sup> 我们又一次可以透过富荣食盐生产商们的经历,看到更为复杂的图景,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在形塑近代早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中起作用的因素。

1890年代之前,外面的世界能够为食盐生产商提供的甚少。在此前的40年,作为企业家的他们既推动了四川经济的发展,又为该地区的官府提供了财政收入。富荣所使用的冲击凿井技术,以及建造和维护盐井的工艺,可以与19世纪西方世界所拥有的相媲美。<sup>④</sup> 随着盐岩层的开发,中国成为了最早大规模运用溶解技术开采食盐的国家之一。然而,富荣在技术上的隔绝状态在19世纪末期时才发生改变。1890年代初,由于外国长期施压,结果,外国船运可溯长江而上,最远到达可通航的地点重庆,那里新近被划归为通商口岸(见第一章的地图2)。此事发生在富荣发现盐岩层后不久。当轮船上溯进入湖北和四川,盐场商人似乎立刻就注意到了蒸汽动力的存在。<sup>⑤</sup> 将蒸汽应用于从深井汲卤的试验,也

<sup>③</sup> 此种叙事的撮要,见费维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私人对于新的和创新性的投资缺乏回应,对此的解释包括:不愿冒险,有其他出借金钱的途径,缺少长期投资的传统,担心官员盘剥,限制性的行会,以及对非亲或非本地人的不信任。

<sup>④</sup> 确实,科兰斯基在关于世界盐业史的通俗讲述中指出,18、19世纪之交,在现在西弗吉尼亚卡诺瓦的食盐工厂,一家食盐开采者发明了一种冲击凿井方法,并且使用底部带有活塞的汲桶,这与中国中古时期发明的方法类似。见马克·科兰斯基《盐:一部世界史》,250页,纽约:沃克出版社,2002年。

<sup>⑤</sup> 霍柏森:《重庆海关1891年调查报告》,192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年。

几乎立即着手进行。制盐业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理区域,便于这种新技术的传播。如同 19 世纪中期的情形一样,为了产业投资,内部和外部的资本都被集中了起来。

煎盐和盐井渡水迈向机械化,是技术和需要同时发生的结果。黄卤井和黑卤井的生产能力受限于所开采的卤水的丰富程度,而人们很快就看出,盐岩井仅有的限制,在于注入井中的水量大小以及推汲卤水的速度快慢。如果蒸汽锅炉推卤比牛和骡更快、更多,那么它们将给这种新的卤水来源的开发商带来难以计算的潜在好处。到 1932 年,大多数富荣的盐岩井和数眼特高产的黑卤井装备了机车。然而,普遍使用蒸汽动力的道路并不平坦,生产过程的外部因素继续阻挠着机械化,直到 1930 年代末。<sup>③</sup>

就我们所知,第一个尝试将蒸汽技术应用于汲卤的,从职业上看,不是食盐生产商,而是位棉花商人——欧阳显荣,来自自贡东北的铜梁县。<sup>④</sup> 他为在重庆和商业市镇内江(位于长江的一条主要支流沱江之上,而釜溪河在富顺注入沱江)设有分号的商号效力。如前所述,棉纱是自贡与湖广间贸易体系中的主要商品,可能是通过这种商品,欧阳显荣与富荣的食盐生产商建立了联系。我们确实知道,与其他拥有资本者一样,他在自贡盐井上有一些投资。

欧阳显荣身为棉花商人,为了生意常到汉口。汉口,在重庆开埠为

<sup>③</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2,篇 2,章 5,节 3,页 90b—91a。

<sup>④</sup> 《川盐纪要》提到了首次且不成功地尝试机械汲卤这一令人心酸的往事。尽管没有提到欧阳显荣的名字,但该倡导人与重庆有关系。由于机车动力不足导致失败,以及随后井户的犹豫这一事实既与欧阳显荣开创性的活动也与其他材料的记述相符。林振翰:《川盐纪要》,235 页。欧阳显荣在 1941 年写给川康盐务管理局的信中记述了他在引进蒸汽动力机车中的作用。当时欧阳显荣已 80 多岁,身体虚弱,请求政府承认他对于盐场技术的贡献,向他提供帮助。书信得到采信,给了他 2 000 元,他作为富荣使用蒸汽动力的先锋得到了国家的认可。自贡档案馆 3-5-745,44—48。也见周启圣《对〈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一文的探讨》,265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6—10 辑,1982 年。杨笃行:《自贡盐岩层的发现》,137 页。杨笃行本人是富荣盐场蒸汽机车的投资者。

通商口岸之前,是华中地区的主要商业中心,是四川可以得到外国产品的最近港口。<sup>⑤</sup> 欧阳显荣多次前往汉口及其姊妹产业城市——汉阳,他见识了蒸汽动力,1894 年开始在富荣盐场琢磨机械化汲卤。在返回重庆后,他与一位有海外经历、懂得一些机械动力知识的名叫张培村的熟人签订合同。<sup>⑥</sup> 他们一同来到自流井,探求在盐场使用蒸汽作动力的起重机推卤的可行性。两人对使用它的可能效果很满意,就返回重庆,寻找到日生洋行重庆分行的一名日本雇员石井刚雄,他好像有一些机械学的技能,被欧阳显荣和张培村聘用,绘制用于盐井的蒸汽锅炉图纸。欧阳显荣和张培村在等待最后计划完成的同时,成立了新蜀公司。总共售出了 50 股,每股 60 两,这家新公司的创业资本只有 3 000 两。

股份的分配情况并不清楚,欧阳显荣和张培村可能拥有大部分的股份。其他投资者基本上来自重庆商界,包括曾雨青等新成立的商会的成员。<sup>⑦</sup> 在新公司的支持下,欧阳显荣和张培村将图纸拿到汉阳——它与其他两座城市组成了湖北的武汉,这里已有了小型机械制造业。在这里,这两个合伙人来到周恒顺翻砂厂,制造一个蒸汽驱动可以用来推卤的提升装置。样机可能是在 1902 年完成的。<sup>⑧</sup> 最初的试验在豆芽湾石星井进行,这眼井不符合标准,井主钟信之之所以被说服参加实验,是因为他几乎没有什么损失。欧阳显荣在篇幅很短的回忆文章

171

<sup>⑤</sup> 对于汉口作为长江口岸和外贸中心的探讨,见罗威廉《汉口:一座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 1796—1889》,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 年。

<sup>⑥</sup> 自贡档案馆 3-5-745,44—48。欧阳显荣声称,他的公司归一个有着国外博士学位的失业者所有。这个人不大可能拥有博士学位。在 19 世纪末,对于极少数在国外接受技术培训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回国后发现他们的技术用途不大。

<sup>⑦</sup>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37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1982 年。

<sup>⑧</sup> 有些记述认为早在 1897 年就进行了最初的实验。可见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 页。然而,钟长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证据是 1935 年对湖北工业所做的调查,它记载周恒顺厂建于 1900 年,这是在声称制造富荣运作第一台蒸汽机车的 3 年之后。此论断令人信服。见钟长永《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43 页注 7,载《井盐史通讯》第 8 期,1981 年。

341

中承认,他必须向钟信之保证不损害他的盐井。<sup>③</sup>他没有承认的是,他并不是推汲钟信之井中的卤水,而是租用盐井,要报之以一笔数目合理的收益,并保证如果实验失败,要恢复原样。<sup>④</sup>这次实验失败了,部分是因为该井的产量太小,无法证实蒸汽动力的真正作用,部分是因为锅炉自身功效太小。欧阳显荣和张培村认识到,这一机械提升装置要能运于实际,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们回到汉阳,从周恒顺翻砂厂雇用了四名有经验的技工,在自流井与他们一起重新调试和修理锅炉及提升装置。<sup>⑤</sup>第二个样机是在王和甫的注洪井进行实验的,能够汲出卤水,效率超过了使用牛只,这令欧阳显荣和张培村的努力没有白费。然而,引擎一直与卤水接触所造成的腐蚀很快就令这里的生产停工。<sup>⑥</sup>

尽管有早期的这些挫折,但欧阳显荣继续在盐井进行蒸汽动力的试验。1904年,他出售自己棉花生意的股份,用所得的20000两成立了华兴公司,全力制造提升机械装置。他在为自己的机器于新成立的商部注册专利后不久,就派张培村去汉阳购买零件和设备,这样华兴公司就可以修理自己的机车。据欧阳显荣的记述,张培村在这次行程中去世,欧阳显荣同其他两位投资者一起,继续开发蒸汽技术,最终用钢丝绳绳取代普遍使用的不耐用的竹子,改变了他们的蒸汽锅炉的设计,以适应钢丝绳更为粗重和更大的提升能力。<sup>⑦</sup>

欧阳显荣的故事很曲折。商业网络利于技术的传播,既提供了专门知识,也提供了新的蒸汽事业所需的很多资本。一个潜在的卤水市场也

<sup>③</sup> 自贡档案馆 3-5-745;44-48。

<sup>④</sup>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38页。

<sup>⑤</sup> 自贡档案馆 3-5-745;44-48。

<sup>⑥</sup> 同上资料。钟长永:《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39页。

<sup>⑦</sup> 自贡档案馆 3-5-745;44-48。周启圣:《对〈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一文的探讨》,267页。



有助于欧阳显荣及其继承者的“创造性”行为。<sup>④</sup> 国家不是创新的障碍,甚至提供了机遇,承认欧阳显荣的设计专利,尽管还不清楚商部是否有经济基础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然而,盐岩井开发的缓慢发展,从威远和荣县运输煤炭的高额成本,辛亥革命前的社会动荡不定,锅炉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以及对于机车效率和机车对于盐井完整性影响的疑虑等等,这些继续阻碍着欧阳显荣及其投资同伴将这一新技术推向广大井户。

直到清朝覆亡后,机械化才在富荣站稳了脚跟。1913年,以重庆为基地的商人董镜莹聚集了一群投资者,运送数台蒸汽动力提升装置至自流井,组建协成公司,推汲卤水。<sup>⑤</sup> 到1915年,董镜莹的公司准备汲采第一眼井——丰旺盐岩井,该井有着14匹马力蒸汽机车驱动的天车,机车购自早年为欧阳显荣提供设备的同一家汉阳公司。据《四川盐政史》的记载,协成公司斥资两三千元购买的这台机车,是以与井户利润分成的方式进行生产的,协成公司和盐户各拥有该井总产量的一半。<sup>⑥</sup>

董镜莹并非唯一投资这一新技术的非本地人。盐井数目日益减少,盐岩层的盐卤生产的统一使得新来者难以进入盐业,这时,机械化汲卤为外来的资本提供了一个机会。董镜莹的合伙人中,有来自汉阳周恒顺

<sup>④</sup> 经济史家依然在争论市场需求对发明的刺激作用。支持需求驱动理论的经典研究包括:戴维·S. 兰第斯:《摆脱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西欧自1750年迄今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雅各布·施莫克尔:《发明与经济成长》,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肯尼思·L. 索科洛夫:《美国工业革命初的发明创造:来自1790—1846年的专利记录的证据》,载《经济史学刊》,第48卷第4期(1988年),813—850页。富荣场引进机车汲卤似乎既有市场需求又有内森·罗林贝格所说的相互依存的原因。首先,我们可以在发展机车汲卤以利用溶解开采更大的生产潜能看出这一点。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看到在发展大仄子井以及同时设计更强劲的机车,以利用它们的更大输出功率时,同样的过程在起作用。见内森·罗林贝格《技术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内森·罗林贝格《1840—1910年机械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载《经济史学刊》,第23卷第4期(1963年),414—443页。

<sup>⑤</sup> 《川盐纪要》出版于1919年,将董镜莹的购置时间定为1913年。见林振翰《川盐纪要》,225页。《四川盐政史》出版于1932年,它给出的时间是1915年。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这一时间上的分歧可能在于机车购买和投入生产的时间不同。

<sup>⑥</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

翻砂厂的周仲宣、蜀川电灯公司的工程师黄福基、杰出的功名拥有者四川人王子湘，还有曾雨青，他曾经在欧阳显荣的新蜀公司投过资。他们一起筹措了 10 000 两，利用这笔钱，他们向周恒顺翻砂厂预付订金，购买 5 台机车。<sup>④7</sup>

与此同时，自贡食盐生产商也开始争抢机械化汲卤市场的份额。1915 年，范容光组织了福昌公司，资本总额 30 000 两，任命邓鸿儒为经理，在汉阳和上海购置了至少 5 台机车。范容光所推汲的大多数都是自己拥有股份的盐井。然而，他也推汲两眼位于在凉高山和杨家冲的属于余家的两眼井。赖明钦和熊佐周合伙推汲丰旺井。杨笃行、王子湘是董镜莹的投资者，组建了合丰厂、正谊厂，它们的投资者中，有黄福基和万丰钱庄的韩友仁。经黄福基的安排，从上海购置了第一台机车，价格只有汉阳的一半。<sup>④8</sup> 仲兴祥、王和甫成立了“仲兴祥”，并在汉阳和上海购置了 8 台机车，许多用于推汲他们自己的盐井。1917 年王子湘成立了另一家公司——福隆厂，拥有 4 台上海产机车。而有些人的生产规模较小，像颜心畲和李子惠合伙才推汲一两眼井。<sup>④9</sup>

投资者主要关注的是利润，而当地的市民领袖对这一新技术还另有兴趣。正如《川盐纪要》的编者所指出的，自贡是一个拥挤的城镇，工人超过 10 万，推卤牲口不下数万。骡牛的粪便恶臭，令人不堪忍受。机车使用越多，用于劳作的牲口就越少，街道就越干净。<sup>⑤0</sup> 1916 年一场牛瘟<sup>⑤1</sup> 的爆发加速了这一变化进程，井户选择使用蒸汽机车而不是花钱补充价

<sup>④7</sup> 杨笃行等：《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38 页；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8—9 页。

<sup>④8</sup>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9 页；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钟长永：《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40 页。

<sup>④9</sup>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9 页；杨筱舫：《自贡盐岩的发现》，139 页。

342 <sup>⑤0</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225—226 页。

<sup>⑤1</sup> Reinderpest，即牛瘟，是“一种影响牛的高度传染性疾病，特点是首发症状为眼、鼻和口、肺感染，此后发热，接着停止反刍、便秘、腹泄、肺气肿，直至死亡”。《简明牛津词典》，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格昂贵的牲口。<sup>⑫</sup>然而,1917年和1918年三场剧烈的锅炉爆炸也打击了井户在他们的盐井冒险使用这一新技术。<sup>⑬</sup>

到1919年,有32眼井——大都位于大坟堡,由机车推汲,这些机车属于15个不同的公司或个人。它们大多数推汲一眼井,许多只有一台蒸汽驱动的起重装置。最大的是仲兴祥与王和甫所有的仲兴祥,1919年时在9眼井作业。接下来是董镜莹的协成公司、范容光的福昌公司,每个推汲6眼井。<sup>⑭</sup>这些数字都不算大。但到1910年代中期,对于盐卤的需求及盐价的日益上涨,开始刺激并促成所有的盐岩井在下一个十年全部改用蒸汽机车。<sup>⑮</sup>作为食盐生产商与汉阳、上海翻砂厂中间人的商人们在自贡开设了分理处。一些投资机械化推卤的投资者开办了自己的翻砂厂和机器店铺以供应零件、修理锅炉和起重机。<sup>⑯</sup>熟练机器操作的人员中许多来自江苏、浙江,在自流井和贡井居住,这里也建立了学校以培训当地工人。<sup>⑰</sup>1926年,成立了一个机车工人组织,有300多名成员。<sup>⑱</sup>而且,随着机车得以改进,盐井也利用蒸汽机所创造的优势,产量

<sup>⑫</sup>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0页。很难计算机车和畜力的相对成本,因为我们不知道一台机车的使用寿命(牛只一般在盐井劳作不超过10年)或是饲料和煤的相对成本。各井间产量不同,但《川盐纪要》估计一台蒸汽机车可抵约200头牛或骡。林振翰:《川盐纪要》,229页。

<sup>⑬</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229页。这些事故,每起都死伤数人,似乎由于工人错误操作——很显然是在初期——或维护机器没有经验造成的。

<sup>⑭</sup> 同上书,226页。

<sup>⑮</sup> 1916年至1917年,每担卤水售价0.6两。依此计算,一眼日产130担卤水的盐井(大多数盐岩井出产超过此数)一月得银约2340两。据赖明钦等的记述,除去煤、伙食和工资,一月净利润仍有2000两。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4页。据《四川盐政史》,1932年所有盐岩井都是机车汲卤,只有黄卤井和低产井仍使用畜力。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

<sup>⑯</sup> 例如仲兴祥拥有自己的翻砂厂和机械修理厂。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7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钟长永在《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42页指出,1915年范容光建了一个翻砂厂,褚雅三在大坟堡建起一个修配厂。钟长永痛惜未能将自流井和贡井发展成为中国的钢铁产业中心。不过,到1945年,该盐场确实有了一座小型的钢铁厂和20家翻砂厂,制造机器配件。

<sup>⑰</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

<sup>⑱</sup> 钟长永:《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42页。

达到了在世纪交替之前难以想象的水平。

## 生产关系的重组

174 欧阳显荣最早提出机械化汲卤想法时，意图是向盐井出租机车，让井户自己操作这一新技术。而事实上，欧阳显荣被迫租佃盐井，进行他的蒸汽动力实验。在他最早的契约中，我们已看到了盐井推卤方与井户间的分离，这是民国时期盐岩井的特点。根据欧阳显荣与石星井间的契约，新蜀公司向井户每月支付 40 两的使用费。一旦支付了租金，出售盐卤的所有利润就只属于承租人。如果盐井发生事故，承租人负责打捞或维修。如此一来，欧阳显荣承担了所有与推卤和营销有关的风险。<sup>⑤9</sup>

由于蒸汽动力是一种新的未经验证的技术，因此欧阳显荣被迫租佃他要推汲的盐井。但也有其他许多可能的蒸汽汲卤方式应用于富荣卤井。一个是井户自己购买机车。一些人确实这样做了，常常是建立汲卤公司，在属于自己的以及并不是他们自己投资组合的井中使用。<sup>⑥0</sup> 盐井也可以租佃机车，自己进行生产。然而，这种做法极少。尽管现存的契约满篇都是租佃的用语，称汲卤设备的所有者为“客”，井户为“主”，事实上，大多数井户和机车所有人并不遵循地主和佃客的标准模式。而且，它很复杂，反映了财务和专门技术上的强弱关系，这体现在交易各方的资产之上。

到 1920 年代，在富荣盐场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机械卤水推汲的做法，被称之为“包推”。<sup>⑥1</sup> 欧阳显荣在与石星井签订的租约中，要向井户支付固定租金，以拥有他所推汲的所有卤水。而包推的做法是，井户以押金形式向机车所有人即推方支付一笔固定费用，同时同意出让一定份额的

---

<sup>⑤9</sup>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38 页。

<sup>⑥0</sup> 这种安排类型最有名的事例，是与王和甫和范容光有联系的投资者所拥有的盐井。

<sup>⑥1</sup> 我对于包推的讨论，源自《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一书编者所提供的未出版材料，以及他们收集刊印的契约。

盐井产量。作为交换,推方负责盐井的生产,装备天车,支付工人工资,进行生产期间的必要修护。尽管我们拥有的1920和1930年代的盐井推卤契约不多,但盐场老人的回忆都指出了从1920年代早期开始,包推占据了主导地位。<sup>⑫</sup>

一开始,安装机车的花费,以及为防止机车损坏、丢失或是不支付推卤费用的押金,都由井户支付。一旦开始生产,盐井将所产卤水按每担的一定比例支付给推方。不只是计算卤水,提升卤筒的次数也要计算,并且每筒按固定的比例折算为卤水。这些是协成公司开始汲取丰旺井时的条款,也是其他1910和1920年代大多数包推合约的内容。<sup>⑬</sup> 175

事实上,推方和井户缔结的是有期限的合伙关系。井户掌握最重要的资产——卤水,这反映在他们所占有产量的份额上。推方因有技术专长,能够联系上外地的机车制造商以及雇用精通机车维修工人的机器修理店铺而得到回报。1916年,樵甫从井户的角度比较了两种生产形式(见表7.3)。

表 7.3 包推中井户所享的益处

畜力	机械动力
购置100—120头牛	使用一台汲卤公司的机器
喂养牛只	由汲卤公司购买煤炭
给照料牛只人员开工资	所有工人工资由汲卤公司支付
牛粪便污染水	无相应情况
持续性地维持牛只及发放驱赶牛只人员工资,甚至是生产中断之时	无相应情况
使用箴索,极易损坏	使用钢绳,极少损坏
日均产量100筒	日均产量100筒或更多
天气或牛只气力耗尽时要停产	任何天气情况下都可以汲卤

资料来源: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47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

<sup>⑫</sup> 蒲月生:《自贡盐商熊佐舟事略》,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7年;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77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5年;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9—151页。

<sup>⑬</sup>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50页;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17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尽管樵甫没有提及,但井户却因此不必再购买和照料牛或骡,他们也不必承担修理和更换机器的费用。如果产量能增加 50% 或更多,而且除了相对很少的押金外,井户可以省却全部的生产成本,那么与亲自汲卤相比,即便是拿出一半的盐卤,他获得的利润也是相同甚至更多。而且,对于正经受现金流转问题的井户而言——20 世纪初的许多井户面临此问题,有了包推,就无需在得到他人购买卤水的付款前,就拿出工资和原料的经费。<sup>⑤4</sup>

176 据盐场老人回忆,早期的合同将所产卤水在井户与汲卤公司间进行相当平均的分配,但到 1930 年代,对于盐井生产和盐井产出的控制,已经急速地朝着为购置和使用机车而组成合伙制转变。现存最早的此种契约,是由天海井的合伙人与同兴灶的所有人所缔结的,由同兴灶负责汲卤。协议是在 1930 年 6 月签订的,要求同兴灶在天海井安置一台蒸汽动力机车,承担该设备的所有成本、工人工资等。它将所汲卤水总量的 16% 分配给井户,此处保留了租约的用语“租水”,其余 84% 归推井的盐灶合伙所有。每一方都有出售自己所得卤水份额的自由,对方不得干涉,这极可能是对盐井合伙人的让步,因为他们不希望被迫出售给特定的盐灶。<sup>⑤5</sup> 如果产量下降,除非推方有明显的过失,井户将得不到盐卤。而且,如果盐井遭损坏,推方作为现场的管理者将负责修理,当他们提交所有票据时,井户将要向他们付款。

在接下来的 20 年间,井户与推方间的交易条款没有什么改进,从现存 1940 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契约都证实了这一点。尽管这已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但它们反映的是,二者关系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虽然在

<sup>⑤4</sup> 厂房建设及所有权与实际使用该厂进行生产的企业的分离,对于中国商业管理并非前所未闻。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纺织业,一个投资集团会建造一座缫丝厂,而另一个集团则租用它生产棉纱。见林达·贝尔《从买办到县大亨:吴锡县丝绸县的中产阶级实践》(《中国地方精英与统治模式研讨会论文,班夫,1987 年》,30 页;罗伯特·恩格《中国的经济资本主义:丝绸生产与出口,1861—1932》(伯克莱:中国研究中心,1986 年),71 页。

<sup>⑤5</sup>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 483 号。

日战争期间对于四川食盐的需求不断上升,因为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被切断了与沿东北和东南海岸分布的食盐生产地区的联系。一些契约中,比如签订推汲元丰井的协议,双方卤水的划分,视盐卤产量和卤水咸度,按比例增减。在所有契约中,井户得到卤水的一小部分,从6%到14%不等,现存仅有一份契约分配给井户30%。大部分契约也要求向机车所有人支付一笔押金,要在契约中止时返还。<sup>⑥</sup>

所有权与卤井经营在20世纪的这种分离,是新技术带来的结果,这种新技术与最初从外面进入盐场的井、灶技术不同。首先,是外来的资本推动机械化汲卤在盐场的起步。盐场最早使用的机车,许多是由外面的商人集团购置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这一时期在重庆出现的银行业和制造业商人圈。这些人组建的汲卤公司不拥有盐井,而是利用了他们了解位于下游的汉阳和上海出现的机器产业,以及重庆与自贡间的悠久贸易历史的优势。中国的银行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才十多年的历史。而位于东部本应该向自贡企业家们提供借贷的众多银行,也仅仅才开始在重庆以外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见第十章)。在数年内,当地井户和灶户也开始了购买蒸汽机车,利用自贡发展出的机器制造和修理时机,用盐业中所获利润进行投资。在现有的仅有部分投资者能够注入新的大规模资本的盐井中,合伙人内部组建了各自的公司对该盐井汲卤,偶尔也拓展他们的业务,与其他盐井签约。有的盐井,盐井合伙人与专业汲卤公司签约,后者逐渐侵夺井户的卤水产量份额,并最终控制了盐井自身的生产。

177

## 大灰子井与盐井生产力的提高

盐岩层的发现,大灰子井的发展,机械化汲卤的引入和改进,这为内

<sup>⑥</sup> 同上书,契约第509号。也见契约第482—518号。

森·罗林贝格所说的技术相互依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技术相互依存是指一种技术的进步经常引发生产中多个环节的进步。<sup>⑥7</sup>一眼盐井的卤水产量与溶解开采技术的引入没有了关系。现在对于产量的仅有限制,是注入盐井的淡水量、卤水咸度、卤筒的容积和每天提升卤筒的次数。几乎所有的早期盐岩井的直径都很小,为2.8—3.2英寸,因为它们是在更早的黑卤井和黄卤井的井筒基础之上淘办的。井口直径完全由建造提升盐卤所用卤筒的竹子的宽度决定。只要天车的动力来源还是牛、骡,那么使用更宽、更重的卤筒就行不通。

蒸汽锅炉所增加的汲卤动力,鼓励了一些投资者试验凿铍开口达3.6英寸的盐井。然而,这种方式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有限。1917年至1918年间,张筱坡加入了当地一群投资者,在杨家冲凿铍一眼新的盐岩井。<sup>⑥8</sup>泽厚井似乎是目前已知第一眼大灰子井,开口达4.8英寸。<sup>⑥9</sup>泽厚井这一大于过去的宽度的价值在于,否定了以前认为更宽和更大的卤筒不适用富荣盐场的怀疑论调。几乎与此同时,张筱坡的大灰子井成为了试验新的更大马力锅炉的催化剂。气缸的尺寸和马力有了提高,气缸加大、加厚,牙轮齿数比例也得以改变,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增加引擎马力和天车的提升能力。<sup>⑦0</sup>面对更大的提升能力,人们引进了钢丝绳,这一新商品的销路为有事业心的新来者提供了进入盐业的额外机会。<sup>⑦1</sup>

<sup>⑥7</sup> 内森·罗林贝格:《技术论》;内森·罗林贝格:《1840—1910年机械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sup>⑥8</sup> 对于这些事件发生时间的记载颇有歧异。罗筱元将它们置于1917年,赖明钦是1918年,杨笃行则是1916年。见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84页,1981年;赖明钦《盐岩井发展概况》,11页;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0页。这三个人都是在所讨论的这段时期内受雇于富荣盐场的。

<sup>⑥9</sup> 这些盐井现在归类为中口井,因1950年以后盐井口的直径是过去小灰子井口的三倍。清朝时的大灰子井约3.9—4.5英寸。1920年至1957年平均开口是6.8—7.8英寸。现在一些井开口宽达11.6英寸。马宗瑶、聂成勋:《自流井大坟堡岩盐体开发状态及开采历史解析》,40页。

<sup>⑦0</sup>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2页。

<sup>⑦1</sup> 熊佐舟,20世纪初成为了商人圈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早期部分是通过从上海进口钢绳发财致富的。见蒲月生《自贡盐商熊佐舟事略》,4页。



随着机车和汲卤设备的改进,盐井全套汲卤装备的成本,很快超过了凿井的成本。牛集成在1919—1921年间开凿江流井,设备、廊厂及开凿的总成本超过35 000两,其中仅有15 000两用于凿井。<sup>⑦</sup>同时,允许使用更大卤筒的大灰子井筒与250马力锅炉驱动的引擎相结合,引发了盐卤生产的革命。江流井1922年投产时,月产卤水14 000—15 000担,而机械化最初年份月产为2 000—3 000担。像这样的例子,引发了对于大灰子井和卧炉机车的广泛投资。

与此同时,成立了新的公司,从汉阳和上海的工厂引入经过改进的汲卤技术。1919年,此前一直为正谊厂做事的杨笃行,组建了一个主要由重庆商人组成的新的合伙。这个谦诚公司投资上海包纯富厂,这是他们机车的主要供应商,并且也购置了17台卧炉机车,在自贡销售。<sup>⑧</sup>周恒顺公司也开始将新的机车运至自流井,主要供应大坟堡的老主顾。颜心奋和李敬才等个体盐井开发商,也开始直接从汉阳和上海的工厂购置机车。杨笃行记述说,到1920年代,大多数自流井使用的老式机车卖给了贡井盐场生产能力较低的盐井,最终它们也被大马力的卧炉机车所取代。一些在大坟堡最早使用的锅炉,卖给了五通桥的盐井和威远县的一些煤矿。<sup>⑨</sup>

投资大灰子井的许多人也是以前推广机械化汲卤的。范容光、王和甫、颜心奋、王问陶和熊佐周都早在1910年代中期就投资蒸汽锅炉。在人们所知道的另一些人中,黄植青是盐商,他也投资当铺生意,黄纯武来自竹商世家,张少标是裕商银行的经理,李云湘是强势的李氏家族一支的后人。除李云湘外,所有这些人都是在20世纪致富的,大部分是由于参与了盐场早期蒸汽动力的发展。

179

<sup>⑦</sup>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11—12页。

<sup>⑧</sup>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0页。

<sup>⑨</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b)记载,到1931年,犍为有四台卧炉机车和一台站炉机车。也见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0—141页。

## 富荣盐场机推大灰子井的影响

开凿大灰子井使用卧炉机车,提升了自流井盐岩井生产力,平均月产约1500担。到1931年,自流井共有48眼、贡井共有46眼井使用蒸汽动力汲卤。<sup>⑥</sup>1920—1925年间,仅在大坟堡,盐卤产量升至年均156333吨,1925年达到峰值202000吨。那些年汲卤总量达到可观的983000吨,占到总储量的9.61%。随着连接通道的增多,汲卤成本也下降了。到1920年只有两大系统。从来龙井注入的水可以汲采5眼井,从积荣井、新发井和神涌井注入的水冲刷93眼井,仅在其中71眼汲卤。<sup>⑦</sup>

富荣盐场盐岩井产量激增,在多个方面影响着盐场经济。最为深远也是不可避免的影响,是促进了四川机械工业的增长。<sup>⑧</sup>大量安置蒸汽机车刺激了盐场的机器修理和制造生意。早在1914年,王和甫在自流井的周家冲附近建立了一家机车修配厂。这是自流井的第一家机器工厂,从上海引入一些熟练的铁匠和五金工人在此做工。《自贡市机械工业志》记载,王和甫的工厂很快就雇用了40多个工人,装备了皮带驱动车床2台、立式钻床1台,牛头刨床1台,翻砂设备化铁炉4座,配风箱4架。王和甫在技术上得到了王大洪的支持,他是上海同济医工学堂的工科毕业生。1915年,范容光也雇用了来自上海的技工,建立了翻砂厂并附设修理房,为自己和其他公司的机车提供服务。与此同时,褚雅三在大坟堡建厂,吴茂常在洞口井开办了一家修配厂。<sup>⑨</sup>到1930年代,自贡

<sup>⑥</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b。

<sup>⑦</sup> 马宗瑶、聂成勋:《自流井大坟堡岩盐体开发状态及开采历史解析》,37—38页。

<sup>⑧</sup> 一个有意思的比较是,美国南部的纺织业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开始扩张,在很长时间内依赖于北方工厂的技术和技工。见贝丝·贝亚蒂《南方的洛厄尔:北方对于十九世纪北卡罗来纳纺织业的影响》,37—62页,载《南方史学刊》,第53卷第1期,1987年。

<sup>⑨</sup> 自贡市机械电子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市机械工业志》,63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二十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杨筱航:《自贡盐岩的发现》,145页。同济建于1907年,是一所医校,1912年添设了工科。

已有数家大大小小的五金店和机器修配厂,还有约 28 家铸造厂,盐场可以为自己的绝大多数设备提供服务。<sup>⑭</sup> 这一时期获得的技能为当时自贡机械制造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新技术增加了自贡对于国内和外国市场的依赖。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由于日本的占领,阻碍了自贡与东部沿海的联系,此前自贡的蒸汽锅炉一直从上海和汉阳进口。大灰子井的出现也令钢丝绳和镗铁卤筒分别取代了以前从井中提升卤水的竹篾绳索和竹卤筒。<sup>⑮</sup> 铁桶似乎是国内生产的,利用了荣县丰富的铁矿资源,但钢丝绳则从国外进口。这些物资的最早供应商是聚兴诚银行的外国贸易部。1915 年前后,周恒顺——它的汉阳工厂提供了大多数早期自贡使用的机车,在自流井成立了一个营业部门销售配件,钢丝绳和金属工具。1919 年,杨笃行开办了他的康五金号经营同样的业务,随后又有了李敬才的述善公司、颜心奋的佛缘成号。<sup>⑯</sup> 安装钢丝绳令自贡第一次对外国市场有了依赖。聚兴诚银行最早出售的钢丝绳来自德国,而后来的公司则从英国和美国进口。对于坐落在上海的外贸公司的依赖,制约了本土公司对于设备质量和数量的控制能力。这也加深了自贡制造商应对四川货币与东部通商口岸货币间多变的汇率的脆弱性。

机械化技术的引入也极大改变了自贡与其腹地间的关系。我们将在第十章中看到,盐场使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从以自贡为中心、半径数百英里的范围内购买的。附近州县供应井、灶所需的竹、木、桐油和牲口。四川的农村和横跨贵州的边界地区,专门饲养供盐井使用的牛只。在四川农村及周围省份的未充分就业的人,许多受雇于盐场或是在为盐业服务的运输和手工业中就业。盐场对周围经济的嵌入,渗透效应以及

<sup>⑭</sup> 钟长永:《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42 页。

<sup>⑮</sup>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7 页。

<sup>⑯</sup> 杨笃行等:《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5—146 页;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8 页。

它给旧式盐场精英带来的种种有利条件,在 20 世纪都消失了。

钢丝绳和镔铁卤筒的引入,对于服务于盐井的竹业是一个沉重打击。<sup>②</sup>有人估计,在 1920 年代,一年购买的竹子数目比以前减少了一万多根。<sup>③</sup>尽管没有在镔铁卤筒使用之前盐场使用竹子数目的材料,但我們知道,一个竹卤筒一般需要 10 根斑竹和 20 根楠竹。如果假定 1916 年每眼在产的盐井每年更换竹卤筒,那么自贡一年仅为制造竹卤筒就要购买 15 000 根竹子。事实上,事故和竹卤筒破裂意味着每年更换不止一次。《四川盐政史》记载,1932 年自贡仅输入楠竹 4 368 根,且没有提到斑竹。我们可以将此与同时代的犍为用竹进行比较,那里仍然购买了 11 000 根斑竹、11 000 根楠竹,用于制造竹笕和竹箴。<sup>④</sup>竹子继续在富荣盐场起着一定的作用,用于建造和维修竹笕,还有少量竹子用于汲卤。<sup>⑤</sup>而且,一些自贡的竹商,最有名的是王德三和黄纯武,都已经开始在大灰子井及盐业其他方面进行多样性投资。对于竹林的种植者、将竹子运往自贡的运输者、在盐场制作卤筒和箴索的熟练工人,以及利用不能在盐井使用的竹子边角料制作手工艺品的小手艺人来说,他们找到其他工作的机会微乎其微。

那些在大灰子井、机车和盐灶投资巨大的有钱商人所获利润上升,但机械化给那些从前依盐业为生的大部分人,带来的却是失业和津贴收入的丧失。遭受最沉重打击的,是那些投资或受雇于黄卤井、黑卤井的人,尤其是在贡井。1890 年代,为满足自流井井火灶的需要,人们巨额投资铍办黑卤井。而在 20 世纪初,当盐岩井的供应超出盐灶的煎盐能力时,这些盐井纷纷倒闭。<sup>⑥</sup>世纪之交在贡井所开凿的 87 眼盐井中,至少

<sup>②</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10,节 6,页 81a。

<sup>③④</sup>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9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1963 年。

<sup>⑤</sup> 即便是镔铁卤桶也要安三节楠竹。同上文。

<sup>⑥</sup> 黄植青:《自贡盐场发展片断》,244 页;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89—190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1 辑,1964 年。吉润卿 1909—1936 年在贡井盐场工作。

有46眼在1910—1930年关张,大部分是由对于贡井卤水需求减少所致。<sup>⑧</sup> 据林耀伦记述,1940年代仍然生产的黑卤井已降至不超过20眼,黄卤井几乎没有了。<sup>⑨</sup> 1914年的《富顺县志》也显示出了与1911年相比盐井总数上的减少。<sup>⑩</sup>

到世纪之交,19世纪大的盐商家族业已开始从食盐营销中抽身,这是清末对在岸边和湖北济岸销售食盐加征新的赋税和附加税的结果。自流井丰富盐卤资源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贡井盐卤需求的下降,对于竹筧业也是沉重的打击。从贡井到自流井的十大筧中,六个彻底遭到毁坏,四个被拆除,移至自流井,以向天然气产量高的地区运输盐岩卤水。为应对日益下降的生产效率,一些筧商试图将以前他们高度竞争的生意进行合并。第一个尝试竹筧合并的是王和甫,他的源昌新筧与胡铁华的同新筧以源新筧的名字进行合并。不久李允之效仿他们的做法,他的一福筧与高云从和范容光拥有的全福筧合并。<sup>⑪</sup>

182

在以上这些事例中,筧本身不是合并的主要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它的名义下进行生产的卤井和盐灶。大多数合并为的是确保煎锅。李四友堂的卿云筧是最明显的例子。到1920年代,该筧自身拥有的火圈较少。通过将筧移至自流井,利用盐岩市场的有利条件,它能够吸引一些无筧的盐灶在大生筧的名义下进行合并。尽管有这些措施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大多数筧户在1920和1930年代越发难以应对盐卤供应的过剩,以及独立的盐灶合伙日益壮大的势力。到1920年代中期,在自流井仅有六条竹筧,大多数属于新来富荣盐场的投资者。许多依赖旧有竹筧的盐井,也发现它们的市场遭切断而被迫关张。这对于老牌盐业巨富

<sup>⑧</sup> 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92—207页。这些井中至少有八眼是李四友堂的财产,其他的可能属于李家的一些家庭所有。所开列的盐井据说只有一眼属于王三畏堂,它在贡井的投资要远远少于李四友堂。这些井有四眼与胡慎怡堂有关系。

<sup>⑨</sup>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8页。

<sup>⑩</sup>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1840—1949)》第3卷,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sup>⑪</sup> 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视商》,14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

的影响,将在第九章做进一步的考察。

在机械化汲卤为新一代投资者——他们中许多都是新来富荣盐场的——提供了一个进入盐场的途径的同时,它也为所有的当地人带来了好处。机械化汲卤使得自贡牛只数量锐减,自贡长期遭受污染的水供应即刻有了改善。它也为盐场带来了稳定的生产机制,因为机车不受天气变化,也不受疾病的影响。然而,机械动力取代了畜力,对于那些不直接从事盐业生产的人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向盐场供应牛只的山区遭受的打击最为沉重。此外,对于身为牛贩子的农民来说,也失去了一种补贴性收入,尽管其中许多人可以受雇成为运输工人或是推销其他物品。专门生产喂牛主粮胡豆的四川南部地区,其市场也在萎缩,那些部分收入依赖向盐井提供草料的当地农民的情况也是如此。

盐场雇用也受这些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低产盐井的关闭,管理和照料牛只工作的取消,改变了自贡雇用结构。据1930年自流井土地使用情况的调查,仅有6%的人口直接受雇于盐业生产,大多数工人从事盐业的服务行业。尽管盐岩卤导致了盐井数目的减少,但盐岩井的雇用人数众多,每井多达60人,而每眼黑岩井最多只有30名工人。<sup>①</sup>许多以前在井上汲卤的非熟练工人,现在都被技工和能够操作蒸汽机车的熟练工人取代,后两种人许多来自外省。<sup>②</sup>一些非熟练工人负责新的任务——向盐井渡水,这种工作的唯一要求就是有蛮力。一位上了年岁的原久大公司——这是中日战争期间在自贡建立的一家大型盐业联合企业——的挑水工人讲述,这些大的盐岩井对非熟练工人需求的唯一条件是:一手老茧,能负重300斤而气不大喘、脸不变色。<sup>③</sup>随着盐岩井的生产力上升,极少量的盐井就可以满足对于川盐的需求,因此甚至是技术极精湛

<sup>①</sup> 张树植:《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调查》,载萧铮编《民国二十年成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28 927—28 94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38年。

<sup>②</sup> 同上书,29 056页。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盐井多数的熟练修理工来自江苏和浙江。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2,篇2,章5,节3,页90a。

<sup>③</sup> 张学君:《辛亥革命与自贡盐业》,16页,载《井盐史通讯》第11期,1983年。

者也不能保证就业。然而,机械化对于笕和灶的就业结构鲜有影响,它们的生产技术 19 世纪中期以来就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自贡众多劳动力因技术进步而付出的代价,在政治处处干预、川盐市场崩溃的 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代感受最为强烈。传统的劳工联合组织和现代的政治团体,在一个日益不稳定的经济中为工人申张权益,而食盐生产商也为了争夺所剩余市场的一席之地而互相倾轧。清朝的覆亡,民国初期的衰弱,一系列军阀掌控四川,这些都重新建构了自贡商人与国家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商会、同业公会、短期存在的地方议事会等新的组织,为地方权力创建了新的舞台,为商业利益的表达创建了新的平台。它们与我们刚刚考察过的生产上的转型汇流,预示着富荣盐场所进行的另一种商业方式的变革。

以家族为基础的老牌盐业巨富的子孙，在 20 世纪初自贡盐井的经济和政治中依然发挥着作用。然而，到 1920 年代，他们逐渐被新的一群盐场商人超越，其中的一些我们已经见识过，是大灰子井的开凿者和包推企业的投资者。在许多方面，老牌守卫与他们的后继者相比，是更伟大的革新者。在凿井乃商业成功之关键的年代，地方关系与土地所有权的结合，令拥有中等财富的老一辈人的资产增值，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产业和商业帝国。契约作为一种重新分配农业资源权益的手段，被转变为一种积累产业投资资本的手段。主要是为祭祀祖先从而捐献土地形成的家族堂，变成了法律和管理的框架，资产借此得以联合并能防止对资产的多重攘夺。日益扩张的市场，鼓励旧有技术的革新并发展新的技术。他们通过自己的商号，为自己的食盐开拓新的市场，这些商号成为新的渠道，通过它，新的产品——机纺棉纱和后来的蒸汽机车——被引进了四川南部。

新商业精英的背景和兴趣更加多样，他们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舞台上活动。随着地方议事会、商会、同业公会、另一套盐业管理体制以及一个新的且仍处于演变中的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他们



活动于其中的制度性舞台也拓宽了。为此,他们的投资更加多样、分散,政治具有了在帝制晚期从未有过的重要性。尽管网络在盐场早期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但在20世纪,作为通向生意成功的主导路径,纵向一体化企业让位予主要依赖于网络——不单是商业关系的网络,而且也是政治关系网络——的企业。

中国学者经常将19世纪盐场精英的衰落与封建传统不可避免的腐朽联系在一起。这里不予详论这类著述中封建概念的误用,重要的是要指出,不论是从这些家族只是短时期存在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最后岁月来看,还是从为了经济目的而利用现有的家庭制度来看,我们都无法将王家、李家、颜家、胡家与封建画上等号,即便是将封建在最广义上视作“落后”的同义词。很显然,他们情愿冒险,进行长期投资并在寻求新的市场、资本的新来源、新的技术以及新的商业组织形式中发挥企业家作用,19世纪的自贡精英是中国现代商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我们不要期盼能看到19—20世纪商业实践的线性进步。民国时期经济和政治的挑战,令民国后期的商人从一些人可能认为的更“现代”的活动中退出。然而,纵向和横向的一体化,这是19世纪大型盐业联合企业的特征,也是对市场疲软所做的回应,这些极其出色的商业组织模式,为的是确保对于投入的控制,以及对于引岸的半垄断。随着生产技术的变化,这一优势丧失了,新的进入者能够掌握生产中利润最丰厚的环节。这些新企业家的商业计划,是对一个迥异的商业环境所做出的反应:一方面是市场拓展远达上海乃至更远;另一面,日益衰落的川盐市场鼓励的不是纵向一体化而是组成企业联盟。

本章不欲对20世纪商业做多脉落的综合研究,而是考察两次重大的商业环境变动之下的自贡老牌守卫的衰落和新商业精英的崛起。首先,我们将在现存的四大家族盐堂账簿中找到商业衰落的标志,并对此衰落提出一种有效的解释。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自贡的个案委实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发生在中国远离外国政治和贸易深刻影响的地方。即便

如此,如前所述,甚至是在自贡,西方——以新技术的形式,还是能感觉得到。第二,为了识别商业行为上他们不同于前人的地方,我们将考察新商人的一个代表性集团。为了展示影响中国近代早期商业组织和商业表现的各种力量的精细画卷,我们将在第九章转向影响帝制与“后帝制”时代自贡商人的政治和制度因素。

## 老牌盐场精英的衰落

仅仅依据现存零星的企业账簿和股东报告,是很难描绘出 19 世纪的主角如何变成 20 世纪“剪息票的人”(coupon clipper)的过程的。口述历史、契约,还有由盐政衙署和地方政府保存的往来公文,向我们提供了了解导致李家、王家、胡家和颜家衰落的各种力量的最好线索。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无法回答,但它们的确指出了老牌盐业精英间的一个共同模式。多年的高额利润和利息,创造了一个弃绝积累资本储备并认定生意会长此以往的商业文化。尽管在自己的地盘内有开拓精神,但 19 世纪自贡的商人并没有从新市场或新产品的角度思考问题,当技术和市场份额的变化向现状发起挑战时,他们措手不及。虽然每家企业的具体结局各不相同,但各个都是负债日多、兄弟阋墙、共管财产分裂的结局。

### 衰落的标志

给予这些大型盐业联合企业的第一个打击是 1880 年代确立的官运商销制度(见第六章)。在官运商销制度建立后不久,李家很快就从湖广的直接营销中撤出。<sup>①</sup> 对李四友堂股东们的冲击,是这个家族堂第一次被迫与债务作斗争。为了维持西南批发商号营业,据说李家从正在形成

---

<sup>①</sup> 见第六章。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7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1962—1963 年。对于这一时期李四友堂产业的记述,主要依据李子琳等的这篇长文。尽管不可能验证所有的细节,但企业债务、规模减小以及重组的整体情况得到了记述李四友堂和其他企业的文章和文献的证实。

中的西南财政资本中心重庆的票号借了大笔资金。到世纪之交,李四友堂的债务可能高达 90 万两。这些不是生产性贷款,而是为了抵偿损失的食盐库存、缴纳赋税及购买食盐现货。

清朝末季,颜桂馨堂也被迫缩小规模。和所有盐井开发的早期进入者一样,他们的一些黄卤井和黑卤井的产量在下降,汲卤在减少。如同李家一样,他们的批发生意也出现了问题,尤其是乾丰泰商号。记述颜桂馨堂的作者,将乾丰泰的衰亡归结为代理商出现了问题,原因在于位于四川边界丰都的总部与负责运输和在贵州边岸销售颜家食盐的人(基本上是贵州当地人)之间通信的落后。在这一事例中,衰落的原因不是新技术或政治,而是西南地区落后的通信基础设施。一种记载说,总柜房正在考虑决定要关闭它在贵州的生意的消息一传到贵州,当地人员就携带现有食盐存货一走了之,总柜房不得不缴纳赋税并承担销售的损失。<sup>②</sup> 颜家深感债务沉重,通过出售他们仓库中的食盐,筹措了所欠政府 30 万两白银中的一部分。他们也从有密切关系的商业同仁,比如颜桂馨堂创办人的合伙人李集庵的后人所创办的李陶淑堂,以及以自身名义已进入盐业的家族各房那里借钱。<sup>③</sup>

李家和颜家不得不借巨款以弥补他们批发业的不足,这一事实说明,到 19 世纪末,其他的营利部门也不好做。在 19 世纪最后十年,李四友堂被迫关闭了二三十眼黄卤井和九眼黑卤井。为了偿债,它也被迫卖掉了大部气井,只留下了三眼,而此时盐岩层的刚刚发现使这些气井成为了比以前更值钱的生产性资产。颜家柜房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在最初成功地吸引对他们在自流井的为数不多的盐井进行投资之后,颜家集中开发贡井的黑卤井。到 19 世纪末,许多井都到达了报废的年限。在 19 世纪最后几年,我们知道颜桂馨堂除了盐井,没有别的什么资产。海生井最初由颜桂馨堂创立人之子颜觉吾开凿。作为一眼高产气井,它后

<sup>②③</sup> 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73 页,载《盐业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

来的名字叫星龙,似乎是20世纪初颜家所拥有的最后的盐业资产。<sup>④</sup>

188 1899—1911年间李四友堂在李星桥的经营下,经历了短暂的中兴。李星桥接手总办的位置时,是20岁的年轻人。他采取了积极的债务合并做法,向两家最大借贷人——位于重庆的票号大德恒和大德通——分期付款,最终将家族的债务从96万两降至约20万两。在这几年中,该堂至少开凿了一眼新井正龙井,据说峰产时可有供390口火圈的气。在义和团运动(1900—1901)后,为重新进入湖广市场,李星桥大胆开办了一家新的批发商号——定通长。一度强大的李四友堂的井、灶产量已下降,李星桥被迫依赖其他生产商以供应他的湖广销售点。<sup>⑤</sup>

除应对借贷人及稍微扩展了家族堂的业务外,李星桥试图解决制约着中国商业的法律框架的一个薄弱点。家族堂事实上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但它的资产与那些分享股东利润的家族成员的资产有着区别,因此保护集体资产就要求有严格的管理上的监督。李星桥之下,家族各房一年仅允许有1200两宴请和祭祀费用,除此之外,不能从家族堂账目上支取任何现金。最为重要的是,从李四友堂盐井买卤或是租气时,禁止家族成员在供应自己的盐灶时进行折价。正是这些禁令,似乎造成了他与家族其他各房掌门间的紧张关系。1911年,李四友堂的高层管理人黄植青,在李星桥及其堂兄弟间进行调解,李星桥下台,总办的位置第一次由非家族成员担任。

杜鼎珊掌管李四友堂总共三年。在盐业制造上没有什么经验——他以前似乎负责一家盐锅厂,之所以能够成为引人注目、各方妥协的李四友堂总办人选,原因在于他与盐场金融集团有关系。<sup>⑥</sup>在短暂任期内,杜鼎珊从当地钱庄和自贡新成立的银行借巨款以解决李四友堂的现金

④ 星龙井于1910年投产。

345 ⑤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201页,说到李四友堂没有经费购盐在湖广市场销售,因此向其他商人借盐。情况更可能是,该堂自己食盐的生产不足,又无现金储备买盐,因此被迫以寄售方式出售其他商人的食盐。

⑥ 同上文,203页。

流转问题,并重建了该堂的两家批发商号。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与家族领导层发生了冲突,他被指责盗取所借款项用于自己的生意。

1914—1927年,李四友堂一直由家族成员掌管,但似乎没有一个人拥有必需的经验或兴趣,在清朝覆亡及四川军事统治带来种种困难的情势之下,能够维持赢利。人员的忠诚,据说在杜鼎珊任职时由于随意的解雇,已经动摇。由于没有资本储备投资新井,卤和气的供应开始枯竭。<sup>⑦</sup>到1927年,家族已无法控制所有的营销集团,他们的竹筧也全部瘫痪。如前所述,从贡井运气到自流井郭家坳的大生筧,在1918年被拆除。重建的卿云筧,为的是在大安街到郭家坳间运输盐岩卤,一段时间生意很好,1919年时每天运2000担卤水。然而到1927年,每天仅有数百担通过,几乎不足以维持竹筧的经营。

189

李四友堂的盐井资产也在锐减。在自流井,李四友堂仅有的卤井是盛海井和鸿海井,每眼日均产量仅仅八九十担,而此时盐岩井日均产量为15000担。与李家没有关系的李世泰,拥有盛海井一半的股份,李家则独自拥有鸿海井。在贡井,李家也拥有齐生井三分之一的股份,这眼井机器汲卤,产量要高得多,日产1000多担。李家涉足筧业并拥有数眼高产气井,可以维持一个令人满意的气火盐灶的投资组合。李四友堂利用来自李星桥等人开凿的正龙井的天然气,在1927年煎盐超过了470口锅。

李家和颜家在20世纪初年一直债务缠身,这也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商业组织解体。颜桂馨堂所欠李陶淑堂的债务成为两家持续不断的官司主题,尽管它们有长期联姻及共同投资的历史。最终是出售颜桂馨堂大多数剩余的生产性盐井,解决了与李陶淑堂间的债务。数年后,颜桂

<sup>⑦</sup>一眼井的平均寿命只有数十年。王守基:《盐法议略》,19页,北京,1877年版。然而,一些井经过重新淘办可以获得新生,如许多重新淘办的盐井契约显示的那样,见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馨堂瓦解,家族各房得到了数目不大的农业用地和一些基本上报废的盐井以维持生计。<sup>⑧</sup>

李四友堂凭借更为雄厚的资产,苦苦支撑。在盐卤过剩的时期,他们的天然气产量相当高,本可以使他们挺过 1920 和 1930 年代的政治风暴。然而到此时,他们债台高筑,每年的利润不足以支付他们所欠浚川银行等银行机构和他们多年打交道的一些钱庄借款的全部利息。1927 年,李德文和李思诚将整个家族的全部农业资产委托给浚川银行,以保住所有的盐业资产。即便如此,每年李四友堂也无法偿付它的全部利息,利息随之转化为本金,家族的集体欠债急速扩大。

190 1931 年,李家决定处理剩余财产以清偿债务,并向家族成员提供一小笔津贴。然而划分财产成了家族内部争吵的一个主要原因。李德潜等人也是家族堂的借贷人,他们从未考虑将资产出卖,而是赞成抵押。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一笔钱,还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赎回财产。其他人,比如李德文,他的利益不止在于盐场,赞成外租,这样虽说收益不大,但可以多年一直有收入。最后签订了一份契约,新创立了一个商号集蓉祥,出租 108 口锅,期限 14 年,成交价仅 172 000 元。这样一个很低的整体性出租,为的是事先拿到大部分租金,家族堂能够用此偿付债务,从而不必多还利息。<sup>⑨</sup> 这一新高号的投资者中有老牌家族精英的两位后人,李德潜和来往密切的生意合伙人颜宪阳,有地位上升的食盐开发商罗筱元,还有李德文——他被拉入此交易,为的是得到他的赞同。这样,协议的主要受惠者中有为自己考虑的该家族成员。

等到将拥有的在产气井转给集蓉祥,李四友堂就只剩下了躯壳。它的农业资产现在只出产租谷 160 石,随着将它的竹笕股份卖给李靖侯,它拥有的仅是最后运营中的竹笕——大同笕四分之一的股份。这样的

<sup>⑧</sup> 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73 页。

<sup>⑨</sup> 自贡档案馆 17-1-193-34-35。

状态一直持续到1948年,这时,来自家族成员内部的压力最后分掉了李四友堂。

李四友堂缓慢而痛苦地消亡了,它的家族成员依旧为家族的未来忧愁烦闷,而这时距离共产党胜利、宣告一切决定都无效的时间不足一年。胡慎怡堂的解散要干脆、迅速得多。1913年,由于对家族领导层不信任,胡家决定分割家族农业财产,变成了数房的资产。拿出2000石租谷的土地作为祭祀之用,并为每个子孙留出2石租谷的土地。拨出年收入600石租谷的土地以供家族开销,为胡家每房留出每年租谷1000石的土地。<sup>⑩</sup>

有意义的是,资产中的盐业财产这时并没有分割。胡慎怡堂依然运营的财产中,有高产的继成井,富藏黑卤的德余井、域川井,它们出产丰富卤水,但浓度要低于新的盐岩井;有出产卤和气的宜春、怡丰、元亨和洪熹井;还有数眼产量相对较低的盐井,名字没有能流传下来。每眼井都由一位心腹雇员管理,当时对于盐井的集中控制似乎已被放弃。与此同时,胡慎怡堂在贡井、重庆、宜昌、沙市依然有运输商号。在职业盐井经理人江子鹤——他曾在李四友堂接受过培训——的强有力领导下,域川井改为机推,改进了继成井的气笕,气流畅通,确保了每口火圈的火力一致。

191

尽管在民国初期胡慎怡堂很有活力,但1917年分割了1913年曾经保留不动的部分农业用地。1919年,又分割了盐业资产。每井分成24份,家族各房拥有4份,保留4份以地主股份的形式作为共同财产。一旦分家,胡家的财运迅速衰败。追逐一己利益导致了糟糕的商业行为。增加继成井天然气当下产量的提议,造成该井数年后产量锐减。在盐灶拥有股份家族各房的成员,并不支付他们从家族井中汲取的盐卤。盐卤井被迫借钱维持推汲,胡慎怡堂剩余的集体资产很快就债务缠身。

<sup>⑩</sup>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7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1920年代中期,曾有过短暂努力以弥补家族资产的分裂所带来的问题,当时地位正冉冉上升的食盐开发商侯策名,曾被介绍来管理盐井。然而,两年以后情况更加恶化,胡慎怡堂成员的债务继续增多。家族义田中有差不多年产200石租谷的土地被出卖,重庆和荣县的家族房产也被抵押,以偿还侯策名个人在他们盐井上的投资。最后胡慎怡堂像李四友堂一样,选择出租了所有的财产。从那时起,家族的各房都从盐业中取得利益,但极少有人涉足盐业的日常管理。<sup>①①</sup>

王三畏堂的经历,包含了它三个竞争对手的所有方面。该堂进入民国时已经债务缠身,家族内部冲突不断。1890年代黑卤井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家族资产的管理落后,造成了近70万两的债务,大多数是向渝沙债团的贷款。到1910年,家族堂仍欠债团十七八万两,<sup>①②</sup>在接下来的19212年,王家在重庆民事审厅、富顺县衙、自贡民事审厅、自流井民事审厅、成都的高等审厅以及北京的大理院提出诉讼,试图能以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条款清偿债务,但均未成功。<sup>①③</sup>与此同时,各房和家族成员追逐一己利益,对分割家族资产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对于许多家族成员来说,家族堂是经皇帝谕准建立的,清朝覆亡就标志着此制度的终结;制度的存在有赖于传统,而这传统在民国时期不适用了。若家族能够制定一个正式的分家方案,那么王三畏堂可能在1911年就完结了。<sup>①④</sup>王家没有这样做,而是对各组成部分进行重组,这是对家族堂管理的不信任的表现。王三畏堂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农业资产、卤井、竹筴、盐灶、营销商号及对外事务——都独自经营,王素峰作为整个家族堂的总经理。

家族生意中第一个从一体化企业中分离出来的是营销。与李四友堂不同,王三畏堂在20世纪初继续是湖广的重要出口商。甚至是在

①① 同上文,71页。

①② 黎雷:《罗筱元旧事》,41页,载《自流井》第1期,1983年。

①③ 自贡档案馆42-3-381-1。

①④ 长房和三房赞成在三房间平分财产。然而,二房人口较多,欲依各房的人口数进行分配。见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6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1911年之后,每年经由重庆运至湖广市场仍有10 馱盐。据在这些年间为王三畏堂做事的罗筱元的记述,他们的广生同盐号遭遇现金流转问题,迫使缩减运往东部食盐市场的规模。<sup>⑮</sup>造成现金流转问题的原因并不清楚,但许多与盐课管理上的变化有关,它要求食盐在运输之前就先期缴纳税款。食盐制造与运输的分离也造成在先前有关系的企业间现金交易的增加。

通过向长江上游的信贷机构借贷,家族堂自身背负的巨大债务,将它所派生出的企业置于脆弱的境地。1929年以前,中国的法律赋予家庭享有全部产权。尽管1904年清朝修订法律以及1914年《中华民国公司条例》提供了一个划定股东债务责任的机制,但自贡的企业与中国别处企业一样,在被处置时没有能够利用这一有利的法律。<sup>⑯</sup>结果,即便是王三畏堂的企业四分五裂,也不能保护他们摆脱借贷人的追究,只要任一家企业的股东仍然是家族各房成员或成员家属。如此一来,大柜房(作用相当于家族堂的总柜房)的共有债务,将继续成为所有家族资产的负担。

对于在整个长江上游拥有业务的广生同来说,这尤其是一个打击。担心湖广市场的获利会被重庆借贷人扣押,这导致王三畏堂的营销势力193缩至四川的附近州县。在1910年代,有段时间将广生同改头换面,另设荣集祥商号,通过万县营销王三畏堂的食盐,以避开重庆财团的势力。然而,通过这一口岸卖不出多少食盐,生意很快停歇。到1920年代,该家族食盐营销部门倒闭,只保留了处理相关产品的商号。然而,甚至是在王三畏堂遭受这些资产分裂之前很久,它就已经不再像从前企业统一时期那样,确保对某些产品的垄断性掌控。<sup>⑰</sup>

<sup>⑮</sup> 同上文。

<sup>⑯</sup> 柯伟林:《中国的非股份制:二十世纪中国的公司法与商业企业》,47—48页,载《亚洲研究杂志》第54卷第1期,1995年。

<sup>⑰</sup> 家族堂控制各种商品市场日益衰落的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它们失去了对于牛皮出售的权力,而在1911年之前,它们和其他大型盐业联合企业实际上是对此垄断的。见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20—12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王三畏堂的井和灶,在民国初期的境遇也不见好。王素峰死后,王作甘接手做总经理,他尝试通过低价出售一些生产性资产以偿还本金,从而减轻王三畏堂的债务利息。大多数购买者都是由王氏家族自己各房所建立的独立盐业开发商号或家族堂。生财井卖给了王作甘的达生堂。清疆井卖给了王德敷,他是王达之的侄子。天生、地成、宝三井卖给了王素封的堂兄弟王伐琴。裕兴井、双发灶的 20 多口火圈,还有其他井的股份,被二房的子侄买去。另外,年租约 1 000 石的农业用地也被抵押给了在盐业股份上没有投资的家族成员。<sup>⑮</sup> 即便如此,早在 1914 年王三畏堂就遭到了它最大债权人渝沙债团的起诉。

尽管有资金上的问题,在这一时期该堂至少凿铤了两眼盐岩井。王家也是最早试验新引进、由欧阳显荣和董镜莹带到自贡的机车的先行者之一。<sup>⑯</sup> 1910 年代中期凿铤其他井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1916 年双海井见功,王家因此新增 257 口火圈,另有地主股得到另外 20 口火圈。双龙井有 140 口火圈,在滢盛和龙旺井的股份可以另煎 107 口锅。然而,卤水的短缺迫使王家出租许多火圈,减少了从这些新开发资源中所得的利润。<sup>⑰</sup>

194 由于身在盐井的债权人代表对王三畏堂的控制,该家族堂进一步扩大资本投资的努力遭到阻挠。王如东借款八万两重新在家族堂的黑卤井喂养水牛的努力就遭搁置,当时王三畏堂欠款的财团命令这笔钱要用于减少王三畏堂的债务。的确,应对债权人成为王家管理者在整个 1920 年代的心力所在。

1921 年下半年,盐场的食盐生意有了起色。1922 年渝沙债团与王三畏堂签订协议,旨在解决债务问题。管理职责交给了王家任命的一位

<sup>⑮</sup>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8 页。

<sup>⑯</sup> 最初,下一兴井是由一家机车公司包推的。后来该家族购买机车,在新的盐岩井之一的初生井使用。同上文,198—199 页。

<sup>⑰</sup> 同上文,198 页。

营业主任和渝沙债团派往盐场的一位营业监督。<sup>①</sup> 允许每年家族堂将收入的一定份额用以弥补业务的运行支出。剩余的分配,80%归债团,20%归王家。<sup>②</sup> 1922年签订借贷协议时,王三畏堂欠债约649544两。它在扇子坝——1830年代王家在此开凿了第一眼井——减至只有四眼井。水牛规模仍然很小,仍需依赖推户汲卤。所开凿的两眼盐岩井——初生井和生生井,卤水咸度开始下降,很快就关闭了。王三畏堂卤水生产全面下降,迫使王家出租了它大部分的气,同时租约同意减少以前它从外面租佃的气。<sup>③</sup> 曾经是盐井开发最重要投资人的王三畏堂,现在地位下降,要出租土地,供别人在土地上铨办新井,满足于地主股份应得、但要少得多的份额。

1928年,通过李敬才、王和甫等数位盐场新的名流的调解,王家与渝沙债团进行了最后的谈判。<sup>④</sup> 为达成协议,家族堂的领袖与300多股东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因为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否则谈判不能继续。最后的协议将家族堂财产划分为:出卖的部分(主要是盐锅)、租佃14年的部分、租佃21年的部分以及那些由家族和债团联合管理直到收益偿清整个债务为止的部分。表8.1开列了这一协议处理的资产。王三畏堂资产的产权多样性,同一资产有的已与债团达成协议,存在着协议内未能包括的其他债权人,这些情况都造成了协议的复杂。

除了对产权进行分配外,协议的23个条款包括了租佃时期内发生亏损的责任、管理问题、对于那些参与生产的人予以补偿、债团进行的改进不予补偿、日常磨损折旧的职责等等。为了避免日后的纠纷,各方及

195

<sup>①</sup> 自贡档案馆42-3381-11。

<sup>②</sup> 这一协议不适用于农业用地以及将来可以凿井的井基,因为这些地的大部分已在1910年代的抵押协议中处置过了。自贡档案馆42-3-381-1和42-3-381-11。

<sup>③</sup>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201—203页。

<sup>④</sup> 自贡档案馆17-1-558-8。

调解人都签了字,盐场的主要政府部门也都存有抄件。<sup>⑤</sup>最后,王家仅剩下 50 多口火圈的气,分散给家族各房或是租佃给家族以外的盐灶。剩余财产的大多数是报废的盐井和有潜力的井基,但在 1949 年前,几乎没有与他人共同进行开发。

表 8.1 1928 年王三畏债务清偿协议所包括的资产

资产	数目	价值(两)
所拥有全部的气	300 口火圈	460 500
外租的气	31 口火圈	21 700
大通笕	6 股	18 000
盐锅	331 口	99 000
盐岩井	15 股	9 000
黑卤井	30 股	6 000
		560 500

资料来源:自贡市档案馆:《自贡盐业诉讼档案专题选编(一)自流井王三畏堂与渝沙债权团债务纠纷案》,78 页,载《盐业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

## 信贷和衰落

在 19 世纪大部时间内称雄的商业集团何以迅速衰败,到了 20 世纪就湮灭不见了?原因是市场和生产技术的转变,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债务。

1880 年代以前,从事盐业制造和销售的合伙制,没有背负什么沉重的外债。如前所述,家庭和企业通过当铺和钱庄得到短期商业借款。大部分大型盐业联合企业也开办自己的钱庄,定位是满足内部企业的需要。企业保持资金储备以用于修理和维护。在特定的投资项目中,通过签约认购股份以筹集产业资本,而资本的改进则是通过向股东追加,或是在有的股东力不从心时,将股份分解,允许合伙内部的股伙增加他们

<sup>⑤</sup> 关于向地方政府机构将契约登记的做法,见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载黄宗智、白凯编《清朝与民国时期的民法》,253—254 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 年。

的投资。结果上,当拥有更充裕资本的投资者加入,以购买蒸汽机车并建立公司以推汲他们和别人的盐井时,还是继续使用这一模式。

如前所述,老牌大型盐业联合企业所遭遇的首个问题,是利润空间日益缩小,这是由于新的赋税、官府营销以及新一代盐井的开发所造成的。新的盐井,与他们巨额投资的盐井相比,汲卤更廉价,煎盐更便宜(因为卤水咸度更高)。甚至是在发现了盐岩层后,黑卤和黄卤井所生产的卤水,在富荣煎烧的卤水中继续占有相当大比例。1910年代,富荣仍拥有900多眼正在生产的黑卤和黄卤井。<sup>②⑥</sup>对于富荣食盐的强劲需求,以及富荣巨大的天然气煎烧能力超出了卤水的供应水平,这些意味着,1920年代之前,这些卤水仍都可以找到市场,当然它们的价格要比盐岩卤低很多。同时,蒸汽技术改变了盐场的交易条件,有利于那些用机车汲卤,并与开凿盐井分离的人。<sup>②⑦</sup>这也意味着,黑卤和黄卤井井户的利润将会更少。到20世纪,这些井户已成为了微不足道的生产者。

老牌盐业巨富可以进入盐岩和蒸汽机车领域,王家就是这样做的。然而,随着利润下降、维护设备、发放人员工资,以及政府控制营销新制度的建立,过去的增长策略不可能在当下继续发挥作用。利用一眼井所获利润去开凿另一眼井,占据批发市场出售自家品牌食盐以确保高额利润,控制大规模农业资产以饲养自家牛只,使用自家的卤窰以保证优先向自家的井灶供应卤水——所有这些通过横向和纵向一体化得以实现的做法,在官运商销、盐岩和蒸汽动力的世界里不再发挥作用。人们也不能依靠出售股份,以弥补暂时的资本缺乏或扛过市场衰败期。新资本的投资者,包括一些老牌家族企业的个体成员,都正将他们的钱投到新井或机车上。

面对前所未有的高税额、利润减少、远方代理人侵吞、高成本维护等

<sup>②⑥</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208、226—22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sup>②⑦</sup> 见第七章。

197 情况,食盐生产商采用了过去资本储备不足时的惯常做法——借钱。他们生意衰败,不是反映在他们求助于短期借贷上。新的情况是,他们难以偿付他们的贷款。老牌自贡食盐生产商所借经费大部分源于外部,这一情况并不标志着衰落,而是意味着长江上游城镇与城市金融市场的日益一体化。到 19 世纪末,自贡已与以重庆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营销集团有着紧密的联系。重庆作为西南最西部的长江主要港口,已在 19 世纪成为了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是其以东地区以及南面的云南、贵州盐业交易的主要结算中心。这里,也如近代早期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支付结算与借贷密切联系。<sup>②⑧</sup> 重庆(以及下游的沙市)的票号和商家,能够得到它们代为偿付款项并经常吸纳存款的企业的信息。到世纪之交,在票号、钱庄以及以重庆为基地的批发商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网。通过票号将湖广的销售利润转账至四川,票号变成了整个地区钱庄或大规模商号的重要短期贷款来源。<sup>②⑨</sup>

如果说渝沙债团的经历有什么揭示作用的话,那就是,即便是拖欠了数十年的这些借款,对于出借人来说它们仍然是一笔可观的利润来源。王三畏堂答应以年息 15% 向渝沙债团签约借了第一笔款项。根据陈本青的记述,王家从来没能还清他们的本金,在这一点上李家也是如此。结果,他们最初借了六七十万两,经过了 27 年,他们偿付的利息超过了 300 万两。<sup>③⑩</sup> 我们不清楚究竟是哪些原因使得难以偿清最初的贷款。然而,到 1914 年达成了一项新协议,用一些井、灶收入偿清渝沙债团的欠债。而且,尽管该堂欠许多商业债权人的钱,但这些资产的收入

<sup>②⑧</sup> 有关欧洲和美国的商业发展、支付清算和借贷的研究,见雷蒙德·德罗佛《中世纪布鲁日的货币、银行业与信贷: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伦巴第族人和货币兑换商》,剑桥:美国中世纪研究院,1948 年;N. S. B. 格拉斯《经济史导论》(纽约:奥古斯塔斯·M. 凯莱出版社,1969 年),243—258 页;以及雅各布·普赖斯《美国港口城镇的经济功能和成长》,123—184 页,载《美国历史观察》第 8 卷,1974 年。

<sup>②⑨</sup>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59—60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2 辑,1984 年。

<sup>③⑩</sup> 陈本青,《渝沙债团与王三畏堂债务始末》,1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22 辑,1992 年。

首先要考虑偿还渝沙债团。

如前所述,盐场的环境就是如此,我们不必因家族堂所遇到的甚至是偿付借款利息上的持续性困难,从而指责家族堂的管理者。签订1914年协议后数年内,许多已划归为偿债的盐井就倒闭了。<sup>①</sup>1922年,该堂重新清理债务,这次与渝沙债团签订了一份联合管理协议。王家的营业主任与代表债团利益的营业监督地位平等。在一份很长的管理协议中,双方签订了井、灶、笕等资产、预算和会计、人事管理、采供等方面的管理协议。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王三畏堂的股东们参与日常业务的那些条款。除了地位平等的管理人外,协议要求指派两位双方都能接受的债团成员,实际上是作为审计人员,协议接下来规定:

198

至债务方面亦应认定堂中一人为营业主任,其调查一人,评认二人应自认。如三畏堂内未有认定并未列名本细则者,出头横加干涉,侵损营业,妨害监督权责,应同王作甘完全负责处制,如制止无效,得由债团监督双方同向所管厅呈请惩办。<sup>②</sup>

此外,两位审计人员可以对那两位地位平等的管理人的作为提出质疑,反之亦然。任何依照协议任命的人员,只要协议双方持股人的大多数同意罢免,他就会被撤职。<sup>③</sup>尽管做了细致努力以确保良好的管理,避免任何一方的不忠行为,但到1928年王三畏堂仍然欠债团90万两以上。

1922年的协议,事实上是将王家的财产委托给了渝沙债团,这只是中国帝制晚期和民国初年债务人与债权人常见关系中的一个极端情况。尽管书面契约的使用以及国家对它的执行在帝制晚期司空见惯,但债务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清朝法律没有宣布高利贷为不合法;事实上,法律允许的月息上限为3%。然而,它又的确禁止利息的收取超过本金,

<sup>①</sup> 自贡档案馆 42-3-381-9。

<sup>②③</sup> 同上资料,42-3-381-11。

这实际上是对期限在数月以上的借款的利息做了上限规定。<sup>⑤④</sup> 国家认可借贷协议，偶尔帮助拟定双方维持现状的偿付计划。然而，作为一条规定，它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对那些继续拖欠的债务人予以强行制裁。债务人无力还债，债权人则会提出再一次的诉讼。<sup>⑤⑤</sup> 这解释了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人在出借时，继续依赖于有形的抵押物和担保人。<sup>⑤⑥</sup> 然而，对于大笔借款的情况，尤其是它们延期了很久，出借人派一个代表监督抵押品的做法很常见。当大德恒票号向李四友堂的出借款项出现拖欠的时候，它就派重庆分号的掌柜居住在李四友堂的大生笕。<sup>⑤⑦</sup> 将某人作为债务人质的做法在富荣盐场也发生过。<sup>⑤⑧</sup>

大的债权人不仅关注企业债务人在偿还他们的债款之前可能携利润潜逃——这是债务人拖欠借款时债权人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且他们也担心股东个人携资产和利润逃跑。家族堂的成员也有这样的顾虑。

## 产权的失败

记述富荣盐场生活和商业的口述史，将大盐业家族成员的奢侈习惯，理解为家族堂衰落的原因。同时，他们也经常将公司的失败归罪

<sup>⑤④</sup> 薛允升：《读例存疑》，卷 16，页 397(149. 1)，载罗伯特·艾瑞克编《研究辅助系列》，第 8 种，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

<sup>⑤⑤</sup> 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255—263 页。

<sup>⑤⑥</sup> 20 世纪以前，债务抵押一直主导着西方信贷市场。可见乔纳森·B. 巴斯金《1600—1914 年英国和美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克服不对称信息的研究》，199—237 页，载《商业历史评论》第 62 卷，1988 年夏。

<sup>⑤⑦</sup>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99 页。一个可笑的故事是关于重庆钱庄老板艾三的。因李家欠他的钱，他就在李家的重庆盐铺居住。李星桥及妻子有次去重庆做生意，知道此事后，他令人将艾三的被褥搬出房间，自己和妻子搬了进去。艾三返回盐铺后，径直上了李星桥妻子的床，后者要控告艾三居心不良，丢人的艾三被迫离开。同上文，200 页。

<sup>⑤⑧</sup> 据记载，李四友堂总办李星桥的父亲李节之，在前往北京就任公职的路上，被重庆的债权人劫持作为债务人质。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200 页。据说，当王子高前往重庆，与王三畏堂的一个债权人商谈解决债务问题时，也被劫持作为债务偿付的人质。见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7 页。



于家族成员，世纪之交，这些人只忙于打理自身的生意。毋庸置疑，一些家族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动用集体资产，或直接据为己有。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家族成员处处声名狼藉，因为他们未能保持创业先辈们努力前行、发展企业的商业精明和坚毅信念。自贡家族堂的故事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史的重要性，不是自贡盐业巨富的后人比别处富人的后人更为贪婪或更加腐败，而是当合伙关系日益庞大并涉及数代人时，它的运作受到产权制度的制约，变得日益不稳定。

家族堂提供了一个聚拢并保存资本的极好组织。在大多数中国人所生活的农业世界，能够创造红利的家族堂（许多仅具有资助家族的功能）主要是依赖出产实物或现金作为租金的耕地，定期（通常是一年）将其中的收益进行分配。族规要求从收入中拿出一个固定数目或一定百分比购买更多的土地。然而，大多数的家族堂、庙会等非家族的类似机构都极为简单。如果一个家族堂经历数代，那么成员总数或股东数以千计，如广东的一些最古老的家族堂那样，这就意味着给每个成员或各房更少的红利。

自贡的家族堂，将各式各样的资产联合起来，并对于大量成员和劳动力、批发和零售商号，以及要求维修、维护 and 发展的生产性资产进行精细的财务管理，因此发展成了复杂的商业组织，它们面临着越来越困难的代理及合作问题。200 这些问题首先出现在远方的批发市场，那些了解当地情况的分号掌柜，是第一批非亲属、受雇于家族堂的高级职位的人。当业务变得更加复杂时，我们也看到对于非亲属的掌柜如罗筱元、罗华垓等人的雇用日多。与此同时，当这些家族堂的投资范围和数目都在增长，以及在时间上涉及了数代人时，它们遇到了中国产权制度固有的种种问题。

当家庭中的个人、家族各房中的家庭、家族堂的家族各房开始以一己身份涉足商业活动时，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共同财产意味着共同的

责任。因为财产属于家庭而不是个人，因此父亲的债务就变成了儿子们的债务，<sup>③</sup>他们为彼此间的坏生意负责。在1929年实施新的民法之前，一些生意人设法通过将自己的商业资产变为他们妻子的嫁妆，从而将他们商业资产的所有权与家庭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然而，对于整个经济制度来说，这不能够替代个人产权。

谁有权力处置包括股份在内的财产，是一个在民国时期从未得到满意解决的问题。它对于商业信心以及合同的实施影响甚大。有一个事例可以很好地说明此问题，它涉及数位盐场最重要的投资者。张筱坡，是盐井商业圈内冉冉兴起的明星，从王三畏堂租佃了两眼井。<sup>④</sup>1924年由于发生事故，两眼井被迫关闭，张筱坡向商会起诉要按合约规定赔偿所损失的收入。张筱坡声称已与王作甘和王守为签订了租佃协议。而王守为向商会提出反诉，声称张筱坡的租约无效。他呈控说，不论是他还是王作甘都没有权力签订这样的租约。这两眼井是整个家族的财产，只能由家族生意部门的总经理进行处置，当时在这一位置上的是王德谦。

与此类似，到1928年，王三畏堂与渝沙债团间继起的纠纷，不再集中于如何偿清日增的家族堂债务。更为重要的是，谁有权处置家族财产，尤其是，合同上应该钤盖何人的印章。<sup>⑤</sup>1928年8月，地方驻军指挥官<sup>⑥</sup>批准了一项协议：柜房的公章，柜房负责人的私章，王三畏堂井、灶、筑及批发商号营业监督办公室的公章，以及拥有这一长串名字的办公室负责人的私章，必须钤盖在任何与王三畏堂财产有关的契约之上，契约方为有效。<sup>⑦</sup>

王家在盐场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彰显了这一纠纷的戏剧性场面及在

<sup>③</sup> 事例见自贡档案馆 17-1-543-2(1920年代)。

<sup>④</sup> 同上资料，17-1-200(1927年)。

<sup>⑤</sup> 同上资料，17-1-240-8-9,17-1-1-20-64-66,1-1-20-59。

<sup>⑥</sup> 见第九章对于民国时期各统治政权的讨论。

<sup>⑦</sup> 自贡档案馆 42-3-381-37。

经济上的意义。但谁有权力签订契约,是20世纪初自贡所裁决的大量法律纠纷的核心问题。1924年廖荣斋当着他的家族成员和其他近亲的面起草了一份遗嘱。遗嘱中,他不是两个儿子,而是在孙子之间分割他的财产。<sup>④</sup>他的理由很充分:小儿子已死,大儿子“花钱如流水”。担心财产很快会挥霍殆尽,廖荣斋任命他小儿媳为家产的管理人,在他死之前,将所有的契约都交给了她。他死后,家族的两房发生争吵,开始是在家族成员的劝导下进行调解。不能够解决问题,廖家向当地的商会寻求两方面的帮助。第一,要剥夺廖陈氏的管理权力,原因是她是个女人。第二,请求商会帮助赶走一个杨姓之人,他以前曾与肆意挥霍的大儿子私下交易,租佃了荣海井,尽管大儿子没有处置该井的权力,但廖陈氏无法令姓杨的离开。<sup>⑤</sup>大儿子的所作所为,是家族内部争夺谁应该继承廖氏财富的征兆。这里更为年轻的一代似乎利用了与家庭财产有关的新法律条文,即儿子们对于乃父的资产在顺序上享有更优先的继承权。对于廖陈氏身为这一资产管理之人的挑战有着更多的传统根基,这些挑战似乎并没有成功。<sup>⑥</sup>

企业形式变得更为复杂,有的已在一家企业有投资的家族堂又投资了别的多家企业,当清理该企业的债务时,因为这些家族堂不是个人,其债务有别于一般的投资者,因此,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当组建同利公司,在重庆购买物品以便在盐场出售时,永和祥对它有很少一笔投资,并作为它在自贡的代理人。1929年永和祥公司破产,它的债权人占有了它仓库中的所有物品,包括同利公司运来、还未售出的物品。因为永和祥

<sup>④</sup> 同上资料,17-1-546。

<sup>⑤</sup> 我们手中另有三个涉及管理家庭商业事务的妇女的案件。两个妇女遭起诉,要她们归还自己以前的借款(同上资料,17-1-549-5[1928年]以及17-1-193-41[1928年]),一个女人被列为有争议的井基所有人(同上资料,3-5-514[1937年])。

<sup>⑥</sup> 争执家族堂财产的一个类似案件是关于范家的,它是许多码头、仓库等服务于盐业的建筑设施的所有者。同上资料17-1-514(1928年)。关于20世纪初商会诉讼领域的此种及其他原因的讨论,见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

是同利的一个合伙方,永和祥在自贡的债权人就认为那些是共同的资产,可以合法出卖以偿付永和祥的债务。同利公司并没有挑战这一原则,反而是费了很大力气,极力证明永和祥欠它很多钱,足以否定两家企业最初达成过任何合伙关系。<sup>④</sup>像这样的案件在自贡的法庭和商业调停机构搁议很多年。我们将在第九章看到,为了管辖商业纠纷,地方行政、司法、准政治以及军事组织的竞争日益激烈,1920和1930年代商业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清朝所没有的。

## 新盐业精英的崛起

清晚盐场商人精英通过拥有并随后开发井基崛起,在经济上居统治地位,而新的精英主要依靠租佃和购买在产的井和灶,他们常常能够得到这些井和灶,是家族堂债务重组方案的结果。大的家族财产通过井、灶、笕和批发业务的纵向一体化得以统一。一些新的精英从投资新的汲卤技术中获利,这一新技术本身创造了巨额利润,并使得他们在卤水生产过剩之时能够控制盐灶业。然而,民国时期自贡盐业生产中大多数重要人物的地位之所以显赫,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关系和精明,令他们在危机之时发挥领导作用,这远远超过了他们在盐场的经济地位。当我们观察1924年至中日战争开始这一盐卤过剩时期围绕着自愿减产问题的斗争时,这一切都显露无遗。在这一时期,四川盐业市场萎缩,由此导致整个利润减少,这引起了罗筱元、侯策名等人的投资策略的变化。我们再也看不到专心致志从事盐业生产和营销的商人和企业了,许多新的企业家在制造和商业上有着多样性的投资组合。许多人也从事金融业务,借此他们与作为本省经济中心重庆的联系更为密切,而且,在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与政府代理人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依附主义模

---

<sup>④</sup> 自贡档案馆 3-5-486-6-17(1927年)。

式,它取代家族成为做生意的组织框架。情况确实如此,即使这些人中间有一些是作为以家族为基础的大型联合企业——我们这本书大部分一直所考察的内容——的管理人员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在 20 世纪,家族堂作为商业关系的一种组织模式的重要性下降了。民国时期很多家族堂继续是井和灶的投资者,但它们常常是在一个多样化的投资集团中作为地主股东或是一般股东出现的。四川的家族堂仍在投资盐井,正如同它们继续投资土地一样,但是我们再也看不到围绕家族资产结构所组织起来的大规模、一体化的盐业帝国。

### 王和甫与大家族堂的继承者们

王和甫是自贡商业史上的一个过渡性人物。王和甫的祖父王向云是 19 世纪著名的王三畏堂创立者王朗云的同辈。尽管王和甫经济上的成就逊色于他的亲戚,但也遵循了家族将井、灶、笕诸企业联合为一个家族企业的模式。同时,王和甫很显然代表了那种个人企业家的精神,而大家族堂子孙怀疑是这种精神断送了他们的集体财富。他的财富是通过革新和身为企业家创造的,并通过士绅政治得以维持。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几乎是他一手创建的纵向一体化企业,遇到了与亲戚王三畏堂相同的命运。

王和甫将盐岩溶解开采方法引入盐场,他的盐业生涯于 1890 年代开始起步。他是 19 世纪末第一位建造竹笕以载运淡水灌注新开发的盐岩井盐卤的食盐生产商。当盐岩井出现时,他将他的井建成一个渡水点,根据每口相连盐井的平均产量确认各个井的渡水费用。然而,王和甫最早并不是作为一位盐井开发商致富的。与仲兴祥一道,王和甫是盐场早期使用蒸汽机车的先行者之一。他的商号——仲兴祥,是与合伙人仲兴祥一起建立并以后者之名命名的合伙企业,仲兴祥一开始可能是投资较多的人。然而不久,仲兴祥这个人就从史料中消失了。1915 年该商号购置了八台机车,成为自贡蒸汽机技术最大的投资者之一(见第七

章),它最初汲卤的许多井都属于仲兴祥。<sup>④⑧</sup>利用从这一事业所获的利润,王和甫开始向盐岩井和黑卤井以及盐灶投资。他也是最早使用蒸汽引擎从附近的河中汲水,然后将水通过竹笕运往他的和其他企业的渡水井的人之一。<sup>④⑨</sup>

204 在对 20 世纪初盐场的回忆中,常常视王和甫为自贡最有权势的商人之一。仲兴祥处于巅峰时,拥有源昌笕、13 眼卤井,并负责约 40 眼气井的生产。它还经营一家运输商号、一个煤矿、一个翻砂厂及数家机械修理厂。尽管我们没有这些企业整合程度的资料,但王和甫很可能遵循了 19 世纪以家族为基础的商业帝国的模式,使用自己的笕和井以保证他的盐灶有稳定的卤水供应,用自己工厂生产的机器和部件装备自己的盐井。在清朝覆亡后短暂的自由贸易期,王和甫甚至进入了食盐批发市场。<sup>⑤①</sup>

然而,仲兴祥辉煌的岁月为时甚短。王和甫去世后的一份资产清单显示,到 1930 年,该企业已失去了下属的大多数部门。除了一些没有名称的“细业”外,仲兴祥现在拥有两个盐灶和生产 100 多口火圈的气的三眼气井。它仍然是价值四万元的源昌笕的唯一所有人。尽管王和甫在盐岩卤井和蒸汽机车的开发使用上起到了先锋作用,但 1930 年他的商号似乎只拥有一眼盐岩井和两眼黑卤井,都由机器汲卤。<sup>⑤②</sup>我们知道这些资产,是因为王和甫去世时,公司负债沉重,资产的出租加上绝卖,加在一起的所得仅够清偿公司 30 多万元的欠债。

与王三畏堂一样,仲兴祥的破产也是整个盐场关注的事件。对仲兴祥提出要求的数百个债权人,包括王家同族人、宝兴隆王氏和外姓人,后

<sup>④⑧</sup>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洗盐概述》,139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1982 年。

<sup>④⑨</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5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sup>⑤①</sup> 同上书,234 页;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75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9 辑,1989 年。

<sup>⑤②</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7 页。

者中的大多数来自重庆和沙市,这一点与王三畏堂的情况相同。<sup>②</sup> 清偿债务的办法在盐场头面精英的主持下,经协商达成。罗华垓——我们后面会讨论到他的个人商业史——代表仲兴祥,而王和甫的侄子王介平,代表宝兴隆王氏。仲兴祥的债权人集团也派出了代表,他与罗华垓、王介平以及商会领袖、著名盐商侯策名、罗筱元、熊佐周组成了仲兴祥抵偿委员会,委员会在商会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见第九章)。他们考虑了各方的意愿和要求,达成了在一个在短时间内偿清公司债务的出租和出售方案,仲兴祥作为一个活跃的自贡企业就此画上了句号。<sup>③</sup> 此外,通过限定 205  
仲兴祥下属各部门偿还仲兴祥债权人的债务责任,委员会使得仲兴祥的股东们可能拥有那些不属于仲兴祥联合体的那部分资产。<sup>④</sup>

尽管建立在更为先进的盐岩溶解开采和机械化汲卤技术的基础之上,仲兴祥和其他企业,还是成为了一体化管理无法驾驭的市场力量的牺牲品。将川盐从以前的许多市场中驱逐是一个政治决定,结果是,1920年代川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产过剩。川盐市场萎缩特别损害了盐卤生产商,他们(处于第七章已讨论的制度之下)包括盐岩井和汲卤公司的所有人,通过将卤水卖给盐灶获利。为了解决这一盐卤过剩,王和甫与颜心畲、颜宪阳一道成立了盐岩井办事处,这是限制生产以稳定价格的盐卤生产者的一个联合体。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成立的

<sup>②</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办:《自贡盐业资本家侯策名》,5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

<sup>③</sup> 处理王三畏堂的债务——该事例我们已探讨过了,1928年仍然在进行中,而商会建立的清偿债务原则,使得该案在一年内得以解决。债权人依偿付的先后顺序分为三组。旧债排在最后,优先考虑那些维持生产有赖于迅速偿还债务的小债权人。自贡档案馆17-1-25。关于商会处理的债务案件,见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255—263页。

<sup>④</sup> 罗筱元认为,这种做法最早是张筱坡在与他的债权人交涉中使用的,它们很快就成为了厂规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有限责任的形式,现在还不清楚其适用的范围。见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7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关于自贡盐场无限责任的讨论,见曾小萍《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产权问题》,载曾小萍、欧中坦、罗伯特·加德拉编《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17—36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

许多生产和营销联合体中的一个。<sup>⑤⑤</sup> 在三年的时间内,该办事处组织成员所属盐井限制产量,并作为一个团体与他人谈判销售盐卤。在盐岩井办事处解体后,李敬才利用他的影响,在军阀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见第九章)。

王和甫的商业策略可能最初是效仿他更富有的王家亲戚,但他投身盐场的政治生活使他稳稳地处于 20 世纪商业精英之列。的确,叙述王和甫公共生活的历史就是在讲述 20 世纪头 30 多年自贡政治的演进史。1911 年,王和甫是自贡第一批加入反清军队、宣布盐场脱离清朝的名人。正是在由王和甫举办的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要在富荣盐场建立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sup>⑤⑥</sup> 只有一条材料认为,王和甫是 1911 年 12 月短暂存在、由自贡民众领导层创立的临时议事会的成员。<sup>⑤⑦</sup> 然而,与王和甫同时代的人都提到了他在新成立的盐场公共机构中的作用。王和甫自己可能为辛亥革命中保卫四川南部的军事行动做出了贡献。太平天国起义结束以后,他和胡慎怡堂的胡铁华成立并指挥着盐场第一个商人的军事组织——商团。<sup>⑤⑧</sup> 王和甫继续在这一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1916 年担任自流井保卫团长,周骏继、周道刚督川时作为商团团练所的经费

<sup>⑤⑤</sup> 中国企业为限制生产并提升价格所组成卡特尔的其他例子,包括久大集团,它是中国东部地区的数家精盐生产商在 1930 年代为解决日益下降的销售价格而组成的;还有中国冰蛋业同业公会,它与欧洲禽蛋批发商组成卡特尔,从 1935 年开始控制卖给欧洲市场的禽蛋的价格。尽管这两家公司面对的是因大萧条所带来的日益萎缩的市场,但它们对于市场做出的反应,与富荣食盐生产商是一样的。见张宁《纵向一体化与经营多样化:上海中国冰蛋业同业公会个案研究(1923—1950)》(《商业史年会论文,马萨诸塞州洛厄尔,2003 年》);关文斌《管理市场、层级和网络:1917—1937 年的久大—永利公司》(《商业史年会论文,马萨诸塞州洛厄尔,2003 年》)。

<sup>⑤⑥</sup> 林建宇:《盐业资产阶级与自贡地方议事会:馆藏民初历史档案浅析》,2 页,第二届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自贡,1990 年。

<sup>⑤⑦</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8 页。也只是在这里看到,任命王和甫为临时议事会财政科的负责人。

<sup>⑤⑧</sup> 陈凯崇等:《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方驻军情况》,124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1982 年;樵甫:《自流井(第一集)》,36 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 年。



筹措人。<sup>⑤⑨</sup>

1920年代,王和甫也积极投身对于盐场商人圈的非正式管理。1926年,他被选为商会的领袖。他也是1927年修建从富顺到自流井间马路的筹款委员会极重要的成员。<sup>⑥⑩</sup>1927年,人们要求王和甫出任国民党自贡市党部的主任委员。1929年,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商会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我们仅能推测,如果1930年63岁时不辞世,他的职业生涯不中止的话,他的政治关系还会需要他。

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的许多同仁一样,与王和甫交往的,既有民政又有军界人物,他与几个人的关系尤其密切。王和甫与胡铁华的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之后组建商团的时期,他们常常在民政活动中合作。<sup>⑥⑪</sup>1920年代李陶淑堂的后人李敬才加入进来。他们友谊的基础可能是都与范容光有关系,范容光是个筑户,是大灰子井的开发商以及福昌蒸汽机车公司的创建人。<sup>⑥⑫</sup>王、胡、李三人一同作为王三畏堂债务纠纷的调停人,也是地方商会的成员。<sup>⑥⑬</sup>王和甫最后的公务活动是在李敬才和胡铁华被军阀王瓚绪抓走之后,设法释放他们。<sup>⑥⑭</sup>这三人的关系极为密切,每人都取了中国家庭常见的祭品作为绰号:猪膀(王和甫)、公鸡(李敬才)和鲤鱼(胡铁华),人们说他们像这三种动物一样,总是在一起。

王、胡和李都是大家族堂的成员,这些家族堂在清季经济地位日益下降,但是它们在政治上的资本投资,使得它们中的一些年轻人在帝制结束以后,作为有权势的个体保存了下来。只要清朝对于四川的盐业市

<sup>⑤⑨</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8页。

<sup>⑥⑩</sup> 自贡档案馆,42-3-381-11;罗筱元:《井富马路的开始修建》,手稿,1964年。

<sup>⑥⑪</sup> 除了在商团中所起作用外,王和甫与胡铁华还一起在商会和自流井道路委员会内供职,有人说他俩经常一起玩牌。

<sup>⑥⑫</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44页。

<sup>⑥⑬</sup> 自贡档案馆42-3-381-11。

<sup>⑥⑭</sup> 有传记作者声称,正是为了完成这一壮举,有病在身的王和甫前往重庆,这造成了他的离世。见陈凯崇等《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方驻军情况》,242页。

场保持着自由放任的政策,自贡的食盐生产商就少有投资以谋求正式的士绅地位。政治影响依然仅局限在当地,并且依赖于以不动产、婚嫁、丧葬、祠堂等形式表现的传统财富。一个主要的例外情况是在太平天国时期,他们资助地方防卫,建立了数个防御工事,后来这些地方成为受自贡富裕商人精英们欢迎的山上休闲之地。开捐是太平天国时期清朝一个重要的经费筹措方法,自贡商人中有数位因资助战争,作为回报,得到了荣衔等赏赐。<sup>⑤</sup>

207 这种模式随着官运商销的实施发生了改变。新的限制自贡市场范围的盐业规章,以及远为严厉的税收制度,影响了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利润,王、胡、李、颜等家族开始对能够跻身官府的身份进行投资。1880和1890年代,清朝身负更加沉重的外国列强债务,势必继续实行开捐,捐官和捐衔更容易获得。<sup>⑥</sup>但这也意味着要做出实质性努力以与有政治影响的人建立关系。王三畏堂在19世纪末参与建立了两座书院。<sup>⑦</sup>尽管四大家族中只有一人获得了高级功名——《富顺县志》记载李新柱于1874年中举,<sup>⑧</sup>但投资教育还是有助于创建政治网络,这对于一些家族成员来说有帮助,这一直延伸至20世纪。

胡铁华的父亲胡汝修创办的族学,不仅培养胡铁华兄弟及堂兄弟们学习经典,而且通过聘请知名学者,在自贡食盐生产商和中国政治精英

<sup>⑤</sup> 曾小萍:《富荣盐商精英的兴亡》,99—101页,载周锡瑞、冉玫烁编《中国的地方精英和统治模式》,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

<sup>⑥</sup> 樵甫开列了1916年自流井的精英名单,指出只有4位通过科考拥有功名,但所有的人至少都有某种头衔,通常是出钱捐的。这份名流名单包括王和甫、李星桥、王文琴、陈梦辅、李敬才、王作甘、黄玉书、李梦林、王华甫、胡铁华、王成之、刘庆堂、王书文、胡孝先、黄敦三、王心儒、范容光、颜少辉、陈际卿、罗万芳、张筱坡、曾子唯、王玉如和王瑞之。实际上只有最后两位在清朝官僚机构中供过职,而曾子唯曾任清朝的武职。见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85—186页。

<sup>⑦</sup> 它们是三台书院和育才书院。见胡少权、罗筱元《清季自贡地方五书院》,189—19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第14辑,1984年。材料显示,其他盐业家族没有为儒家教育的发展做过如此的贡献。这些投资为王三畏堂带来了地方上的声望,但并没有转化为科举上的成功,家族成员中最高功名似乎是生员,是由第三代中的一个人取得的。见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85页。

<sup>⑧</sup> 李永成纂:《富顺县志》,卷12,页53b,1931年。

之间,创建了一个新的联络渠道。最有用的是与赵熙的关系,赵熙是荣县人,在清季擢为翰林院编修、御史。胡汝修是赵熙的赞助人,向他提供经费资助,甚至曾有一段时期在胡家款待赵熙一家。<sup>⑥9</sup> 1909年赵熙将胡铁华和他两个兄弟带至北京,在那里他们捐得功名,与京官建立关系,甚至可能在政府中谋得了低级官职。<sup>⑦0</sup> 即便在返回自贡后,赵熙与改革者的关系,也为胡铁华及同事提供了机会,以调和改革者与士人,尤其是在四川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和重庆的那些人的关系。

李敬才也将他的权势关系与胡铁华、王和甫分享。身为李陶淑堂的成员,李敬才致富的方法与王和甫的相同。作为开发大灰子井和早期进入蒸汽机车生意之人,李敬才也投资供应盐井的钢绳和其他五金制品,并且拥有一些当地的商号,包括提供轿夫雇用服务的富源庆。<sup>⑦1</sup> 李敬才的兄长李桐菱,是李家有学识者,但据说李敬才直到20岁时还不学无术。1900年,26岁的李敬才被派往成都,运送捐谷作为军饷资助官府。由于家族的慷慨捐赠,他被授予了道台衔,结识了四川巡抚,据说后者向户部保举李敬才。在户部时,李敬才在晏安澜手下干了数年,晏安澜后来成为四川盐运使。<sup>⑦2</sup> 这一经历使李敬才发展了自己的有权势的政治关系户,他也在成都的盐运使衙门短暂任职。

208

与官员和有功名者过从甚密,这帮助王、胡、李开始在盐场精英中取得领导权,也解释了他们在盐场出现的市民社会中最先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对于保障他们的生意和影响力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培植了与新的四川军阀领导层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九章看到,几乎是清朝一覆亡,四

<sup>⑥9</sup>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60—61页。

<sup>⑦0</sup> 同上文,60页。胡铁华很显然在族学有所收获,因为1916年樵甫称他是自流井两位著名书法家之一。见樵甫《自流井(第一集)》,209页。以后的传记作者常常称胡铁华为前清的官员,但他所担任的职位似乎最高恰是在清朝覆亡前成立的一个新机构的主事。

349

<sup>⑦1</sup>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洗盐概述》,202页。

<sup>⑦2</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199页。

川就变成了军阀竞相争夺的战场。<sup>⑦③</sup> 自贡,由于有食盐可以课税,富裕的商人可供勒索,因此成了军阀争夺的一块肥肉。在1918或1919年四川与云南军阀军队间的一场战斗中,据说赵熙安排他的这三位朋友与当时控制重庆的军阀见面。<sup>⑦④</sup> 他们与刘湘,尽管不是没有紧张的时候,但关系保持良好,直到进入1930年代,这时刘湘自己早已成为控制整个四川的军阀。1920年,李敬才被任命负责刘湘的提款处,他在这一位置上可以保护商人利益免遭军阀骚扰,从而提高了他在盐场精英中的地位。<sup>⑦⑤</sup> 李敬才在这一位置上干了三年,即便是在去职后仍然是这位强权军阀的顾问。1926年,王和甫接手这一位置。<sup>⑦⑥</sup> 1930年,王和甫死在了前往重庆的路上,他是为了搭救被刘湘叛变的属下王瓚绪抓起来的胡铁华和李敬才,还是刘湘安排武装护送王和甫的遗体回自贡安葬的。<sup>⑦⑦</sup> 因有这种关系在,一些同道在谈到王、胡、李时,都因这些人自身的实力而视他们为地方豪强,我们将在第九章看到,与军阀的关系自然有助于他们自己的一些事业。这也令他们有特权得到与军阀有关系的银行的贷款,这在1920年代井户与灶户间的斗争中对他们帮助极大。<sup>⑦⑧</sup> 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艰难年代,将军阀政治与商业结合在一起的人并不只有他们。

<sup>⑦③</sup> 对于这一时期四川军阀活动的总看法,见罗伯特·A.卡普《四川和中华民国:省区军事行动与中央权力(1911—1938)》,纽黑文:耶鲁大学,1973年。

<sup>⑦④</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9页。

<sup>⑦⑤</sup> 同上书,200页。

<sup>⑦⑥</sup> 同上书,239页。

<sup>⑦⑦</sup> 同上书,242页。

<sup>⑦⑧</sup> 罗筱元的自述称李敬才是土豪。罗筱元:《罗筱元自述》,3页,手稿,自贡市档案馆藏。王柔德、钟朗华指控李敬才是富顺旅长张志芳一党的成员,而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宋良曦则指出,李敬才交结张志芳,是一种手段,是为了确保在与王问陶就李家盐井火灾的特别纠纷中张志芳能支持他。见宋良曦《四川军阀对自贡盐商的劫掠》,328页,载彭久松、陈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四川井盐史论丛》,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5年。不过,倪敬先——二十四军的裕通银行的一位老雇员的说法是,王和甫、胡铁华和李敬才可以立刻拿到多达5000元的借款而无需办手续和支付利息。见倪敬先《我对裕通银行自贡分行的回忆》,29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 张筱坡与恩流笕

清朝覆亡后,自贡食盐生产商面临种种困难,但对于那些与庞大的19世纪家族没有关系的人来说,在制造和营销食盐业中仍有活动空间,这些家族财富日益下降以及盐井股份的市场活跃,甚至像张筱坡这样的相对贫困之人都可以进入。张筱坡绝不是进入食盐制造领域唯一的新人,但他却在各个方面表现出了新的20世纪自贡商人的才能,建立政治关系网并迅速革新技术和组织。

209

1877年,张筱坡出生在横跨釜溪河的富顺县的沿滩,他父亲的生意规模不大,运盐顺流而下至邓井关。1890年代有段时间,他父亲投资一眼正在凿铍中的盐井,后来该井开始出产盐卤和天然气。在这小笔意外之财的支持下,张筱坡接受了传统教育,在他姻亲的支持下长期求学,参加并通过了生员的考试。<sup>⑦</sup>

到世纪之交,一种新型的积极政治参与在中国的城市精英中传播开来。尽管张筱坡追随父亲,涉足盐井投资,但在20世纪初年他真正热衷的似乎是革命事业。张筱坡投身保路运动,该运动在1910—1911年震动了四川,以致激起军队武装反对清朝。<sup>⑧</sup>罗筱元认为张筱坡参加了同盟会,他后来的活动毫无疑问地说明了他与某些革命党成员关系深厚。<sup>⑨</sup>张筱坡是盐场的新手,但他的政治生涯为他赢得了清朝覆亡后即刻组建、统治自流井和贡井的地方议事会60个代表中的一个席位,他是其中交通科的负责人。<sup>⑩</sup>整个1910年代,张筱坡在地方政治中继续起着重要

<sup>⑦</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06页。

<sup>⑧</sup> 同上书,180页。这支军队似乎不曾进行任何的战斗。关于四川铁路收回国有运动研究,见李恩涵《中国寻求铁路自治(1904—1911):中国铁路收回国有运动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77年,以及戴执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史料专刊2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sup>⑨</sup>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78页。

<sup>⑩</sup> 林悦葱:《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16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作用。1915年他参加了策划反对袁世凯的四川代表的活动,后来参加了由这些“造反者”组织的军政府,最后做到了川南清乡司令。在这一位置上,张筱坡的许多做法,尤其是招募从前的土匪头子进入他的部队,导致了他被解职。然而,在整个1920年代,在卢师绅、石青阳等军阀政权内,他继续担任多种中层职务。由于他的权位,重庆和自贡的银行圈吸纳了他,作为川盐势力在湖北和湖南政府的代言人。<sup>③</sup>在当时,张筱坡不是盐场最富有的人,但他的声望很高。他是李四友堂债务诉讼案的首要调停人,也因此得到了大笔酬劳。<sup>④</sup>张筱坡在商界和军阀圈内都影响甚巨,他被挑中代表自贡食盐生产商利益集团,出席1925年由刘湘召集的关于盐业管理的成都会议。<sup>⑤</sup>张筱坡甚至短期涉足国民党政治,1926年负责国民党自流井党部。

在国民党左翼与右翼分裂后,张筱坡退出了政党政治,但他继续在盐场的政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1927年,当刘湘的对手刘文辉派遣部下破坏张筱坡此前帮助制定的盐税协议时,张筱坡在组织一支商人军队赶走军阀税收者的行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张筱坡在与不断变化、控制盐场的政治力量打交道时的确极幸运。仅有一次,在1927年末, he 被抓并关押了相当长的时间。<sup>⑥</sup>1930年,随着刘湘统一全川,张筱坡又一次利用他和军阀的关系赢得了一个有利可图的“专商”位置,他成为几个得到许可的川盐批发商之一。<sup>⑦</sup>

<sup>③</sup>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0—181页。

<sup>④</sup> 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视商》,14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也见自贡档案馆17-1-469(1920年),该材料称当地警察要求张筱坡调解王姓与杨姓食盐生产商之间的纠纷案件。罗筱元认为,张筱坡也是川汉铁路起诉李星桥未付贷款案、李四友和内江行会纠纷案,以及王三畏堂和渝沙债团数起纠纷案的调解人之一。见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7—188页。

<sup>⑤</sup> 自贡档案馆17-1-434;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9页。

<sup>⑥</sup> 这一次,张筱坡遭到自流井驻军指挥官起诉,指控他将钱转给敌对的军阀。见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1—182页。

<sup>⑦</sup> 同上文,190页。

张筱坡在 1901 年开始投资盐井，但直到十多年后，他才进入自贡富商行列。1910 年代中期，他是最早一批投资购买蒸汽机车的井户之一，他在盐元井汲卤，李允之和他是该井的合伙人。<sup>⑧</sup> 罗筱元回忆，通过在这眼井使用改进的更大马力的引擎、镗铁卤筒以及钢绳，张筱坡每月得到 1.3 万多担卤水，这在使用大灰子井之前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sup>⑨</sup> 我们在第七章已指出，张筱坡在大灰子井领域也是先锋，他的泽厚大灰子井在开发盐岩井以及与大灰子井适应的机械化技术上开启了一个新阶段。

不论这些贡献对于自贡盐业多么重要，张筱坡最能让同时代人和后来评论者记住的，是他作为恩流筧的创建者。19 世纪，卤筧令一些食盐生产商控制了稀缺的资源——盐卤，在富荣盐场建设最有效率和最高产的盐灶。筧户拥有的盐锅所产食盐高产、稳产，这使得筧、灶的结合，在签约引盐并确保他们的食盐销售方面，有着巨大优势。灶户通过卤筧运输所需盐卤，节省了资金，而筧户借此可以掌控大多数贡井所供应的卤水。筧户大量买进卤水，然后加价出售给那些与筧没有投资关系的盐灶。而且，通过稀缺资源的囤积居奇，筧户能够保证首先供应自己的盐灶。<sup>⑩</sup>

溶解开采技术兴起后，十条大筧中只剩下了四条。王三畏堂是在自流井予以重建的大同筧的主要投资者。王氏家族的一支拥有元昌筧，这支是王三畏堂创始人兄弟的后人，源昌筧同样也是易地重建的。李四友堂以李星桥为首的一支所拥有的吉通筧，大约在 1919 年破产。最初由李四友堂所建的大生筧，保存了下来，但 1916 年之前就卖给了一群新投资者。同富筧继续在自流井运营，归李梦麟为首的合伙人所有，他似乎

211

<sup>⑧</sup>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洗盐概述》，140 页。

<sup>⑨</sup>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4 页。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杨笃行与罗筱元所说不尽一致。

<sup>⑩</sup> 见第四章。

与李四友堂没有什么关系。

剩余的卤筧继续控制着自流井所产许多卤水的分配。在这一新市场中,筧户控制卤水运输的能力与 19 世纪时一样。他们易地重建卤筧的原因,也与当年他们建造自流井-贡井卤筧的原因别无二致。这不单是个钱的问题。几乎没有投资者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以促成交易,建造一条卤筧必需能够满足苛刻条件,租佃或是购买延绵不断、距离很长的地块。

筧户的权势最终被张筱坡打破。到 1920 年代,王三畏堂及李星桥的吉通筧破产时,张筱坡业以很便宜的价格,租佃数百口火圈的气,这是他对盐岩卤井投资的进一步补充。<sup>①</sup> 即便如此,在 1922 年,当张筱坡的泽厚井见功时,他发现被迫要依靠现有的卤筧将他的卤水运到自己的灶上。因此,他求助李四友堂,他不久前在李四友堂与其债权人谈判时支持过它。李四友堂出租给张筱坡土地,并允许使用他们所拆除的竹筧余料。利用这些,张筱坡建造了恩流筧,这是辛亥革命后建造的唯一一条全新的竹筧。<sup>②</sup>

利用恩流筧,张筱坡能够从泽厚井运输自己的卤水到郭家坳的井火灶。然而,自流井大安区没有其他的卤井客户,张筱坡并不能够从他的卤筧投资中赢利。自流井的大多数盐岩卤,这时都是通过新近从贡井引入而重新建设的卤筧运输的。为了打破老牌筧户的垄断,张筱坡制定了一套新的卤水运输办法,这彻底改变了盐场原有的均势。

恩流筧与其他自流井卤筧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付费方式。过去的做法是,迫使盐卤生产商向筧户出售他们的卤水,然后在卤水出售给灶  
212 时将运输费用作为一种主要加价。而张筱坡效仿了金融界的做法,他称

<sup>①</sup> 张毅甫:《恩流视兑水经过》,91—95 页,载《自流井文史资料选辑》第 19 辑,1989 年;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8 页。值得注意的是,张毅甫乃张筱坡之子。

<sup>②</sup>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8 页;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10,节 4,页 79b,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 年。



他的支付制度为“汇兑卤水”。盐岩井井户可以带卤水到恩流笕，只需为运到郭家坳的卤水付过价费。这一费用是现有笕户所收取实际价格的一半，每担银八分。而且，因为不从井户手中购买卤水，只是运输它，因此张筱坡的做法，不介入井户与灶户间的谈判。汇兑卤水的办法极受欢迎。卤水每天都有以这种方式运送给盐灶或是井户的代理人，但过价费是一月收取两次。而且，因为张筱坡是一个相对小的井火灶灶户，因此井户和灶户都不担心他会试图控制运送中的卤水，即便存在着卤水短缺。<sup>⑬</sup>

在恩流笕建好后很短的时间内，自流井其他的笕户被迫效仿张筱坡所创立的支付制度。激烈的竞争使运送卤水的价格降到了每担六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大盐业家族权势的丧失。回忆人员曾指出，卤水短缺是决定出租李家和王家盐井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部分可以追溯到它们对于卤水运输的垄断被打破。大卤笕的消亡也意味着利润锐减，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保存有精确的利润统计。卤笕曾经是一种高成本的投资，它的收益很大部分在于地方权势和影响力，只有少数人可以经营它们。家族堂商业投资组合中笕的终结，是对它们权势沉重、最后的打击，开启了盐业投资的分裂之路，并为盐场年轻一代的商人开辟了道路。

### 侯、熊、罗、罗

侯策名、熊佐周、罗华垓、罗筱元，是在1920和1930年代盐业走下坡时崛起成为盐场显赫人物的。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市场的扩大，他们才真正地发家致富。然而，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活动，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民国初期的商业环境和商业策略。四个人都是在一座城市里靠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的，他们的经历是在做小生意的世界中熙攘往

<sup>⑬</sup>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188—189页；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视商》，141—142页。

来、追名逐利的人的鲜活代表。他们的家庭背景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而每个人都走着一条通往生意兴隆的类似道路。到 1930 年代，侯策名、熊佐周、罗华垓、罗筱元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一种商业集团，它建立在牢固友谊、连锁投资和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

侯策名的崛起在该集团中最富有戏剧性。<sup>④</sup> 侯策名于 1885 年出生在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早年生活在富荣盐场的周边地区，他父亲在王三畏堂的土地上种植蔬菜，以卖菜为生。侯策名的父亲曾在贡井地区的淮源井短期工作过，侯策名 15 岁时在该井当学徒，那里他有了盐井的实际操作经验，也能识文断字，计数算账。他 18 岁结婚，不久就因不满于盐井所付的低工资，开始赌博，并在山西移民开办的太原轩茶馆做零工。侯策名偶尔得到岳父的资助，转做小买卖，常常到荣县的农村集市购买农产品，拿到井、灶去卖。1916 年，他和岳父与贡井的一位丝绸商人合伙在自流井开了一家杂货店，侯策名再次在乡村集市搜集货物。1922 年，在这一零售生意失败后，侯策名与王吉星、陈仿陶合伙开了家钱庄。如前所述，这种事业要求极少的创业资本，开始时侯策名的钱庄可能不超过 500 元。经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合伙人认为，通过在重庆卖盐把利润汇回，就可以赚大钱，因此重组了他们的商号，将它重新命名为谦信运盐号。

对于摆在侯策名这种人面前的机遇与危险，谦信运盐号提供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实例。运输食盐最大的利润不在食盐本身，而在于汇兑业务。据侯策名传记作者的记述，利用在重庆与自流井间的利息差可以赚很多钱，重庆有一个新兴的货币市场，很容易得到钱，但自流井的资本需求却得不到满足，因而利息率很高。<sup>⑤</sup> 结果，在重庆做大宗现金买卖的盐

<sup>④</sup> 除特别注明外，侯策名的传记材料源自自贡市政协文史办《自贡盐业资本家侯策名》，49—73 页，以及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93—322 页。

<sup>⑤</sup> 张肖梅，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四川经济编年史家，描述了在上海与重庆间的一种类似的汇兑制度。见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E12—14，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 年。

商,常常在两个城市间进行汇兑业务。需要现金在重庆购买布匹、草药等物品的当地商人,会从在自流井的食盐运商那里购买“渝票”(一种汇票),在重庆的银行家或是商栈兑换成现金。这种交易要获得利润,依赖于各方都能得精确的利息率和不断变动着的现金需求情况。谦信号似乎一直做得很好,直到1926年因它在重庆的负责人贪污而被迫关张。

生意再次失败,侯策名第一次向盐业生产上寻找机会。这一次,机会是上面提到的大家族堂衰落所带来的。侯策名迅速偿付谦信号债权人的债务,这引起了胡铁华的注意,他正在为他家族的继成气井寻求一位掌柜。侯策名担任大关(见第三章)两年,其间他和两位合伙人成立了另一家钱庄,通过该钱庄进行大关负责的所有采购。当胡慎怡堂开始放弃自己的气井时,侯策名利用他对于该企业内部情况的了解,赢得了签约租佃胡家的同新笕。当盐价下跌摧毁了卤笕的利润空间时,侯策名及其合伙人试图归还该笕。当胡家无力拿出当初协议规定的巨额押租时,他们被迫将笕卖给了侯策名。

214

从1930年开始,侯策名早期投资所获的利润,发展成为日益壮大的盐业资产组合。许多资产是利用他和合伙人的能力,买下旧有企业,这继续反映出侯策名在判断市场和利用价格差方面的才干。侯策名与熊佐周、罗华垓、罗筱元一起,开办了复楚盐号,在湖广市场与淮盐的承办商竞争。1931年,他接管了王家源昌笕的一半所有权,将此与他自己的笕联合,组成了源新笕。作为调解王和甫的仲兴祥号重大诉讼的回报,王家答应他无偿租用他们会龙井的13口火圈的气。当四川的食盐生产商赢得了反对盐业管理的官司时,他们使用这笔钱开办了裕商银行,侯策名被任命为银行的经理,在他的推荐下,罗筱元成为出纳主任。

我们不知道侯策名的总资产有多少。他的传记作者找出了他有92口火圈气的材料,而侯策名自传中说有120口火圈的气。许多资产是他与熊佐周、罗华垓、罗筱元一起创造的,包括1936年开凿、两年后见功的

葆贞井。日本在 1937 年对中国东部实施封锁，四川成为中国其他地区食盐的主要来源地，这时，甚至自贡的各种资源中生产最不景气者也因民族救亡而被动员了起来。战争期间，侯策名不仅开凿新的盐井，而且再次从事采购盐业生产所需物资的生意，供应威远和泸州出产的煤炭，通过遍布四川的食盐运输市场销售食盐。战争年代繁荣的市场，再次鼓励了 19 世纪老牌家族堂往昔的那种一体化方式。不过，现在是通过连锁投资进行资产联合的一些没有亲戚关系的企业家，构成了 1940 年代自贡有权势的商业集团。

215 像侯策名一样，熊佐周<sup>⑤</sup>也来自贫穷的农民家庭。也像侯策名的情况一样，他父亲熊万全在富荣盐场出卖体力，以补贴微薄的收入。熊万全利用在灶上挑卤和水的一笔储蓄，最终开办了一家出售糍粑的小铺，同时出租楼上的房间。19 世纪末，熊万全加入了天主教，据说教会向他提供经费支持，他搬到了一个最好的商业地段，开办了一家店铺，宰牛并卖牛肉汤。义和团起义后自流井的天主教遭到打击，作为教徒聚会的家庭之一，熊万全的家也被毁。熊万全本人也从向天主教的赔款中得到了一份赔偿，据说他正是利用这些经费，进入了盐业。

熊万全的作为，如同世纪之交自贡数以百计的小投资者一样。他将部分现金投向土地，成为了一眼井的投资者，但那眼井从未见功。1915 年去世时，他仅剩一些土地和一笔不知数目正在生息的现金。<sup>⑦</sup> 他的孩子们应该可以很容易地分割资产，作为小店主和小生意人继续生活。而实际情况是，他的小女儿是天主教修女，因为未嫁，得到了一份资产作为生活费用。五个儿子中，一个夭折，其他两个与熊佐周一道，尝试做食盐

<sup>⑤</sup> 除特别注明外，熊佐舟的传记材料来自蒲月生《自贡盐商人熊佐舟事略》，1—20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7 辑，1980 年。蒲月生所作事略似乎出自自贡市档案所藏原稿：自贡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熊佐舟传》。蒲月生在 1940 年代曾是侯、熊、罗、罗集团的雇员。见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74 页。

<sup>⑦</sup> 熊佐舟的传记作者并没有说出这些经费投资在何处。考虑到当时自贡的金融环境，这些资金可以外贷生息或在当地钱庄存储。

生意,以熊四和堂为名,集中使用他们所继承的财产。

熊佐周似乎是在世纪之交盐场名人黄敦三的盐井做白领雇员,从而获得了他从事盐业的经验。<sup>⑧</sup>熊佐周是早期机械化汲卤的开发商,使用他及兄弟所继承的钱财,与赖明钦一起组建了一家包推企业。<sup>⑨</sup>他也与李敬才、王和甫、范容光、颜心畲等前辈食盐生产商一道,前往上海和汉口购买盐井使用的机器和工具,在盐场销售赚钱。<sup>⑩</sup>1920年代早期,熊佐周是最早跟随张筱坡开凿大灰子盐岩井的一员。<sup>⑪</sup>

我们没有熊佐周所涉足盐井的全部资料。他的生意不是都与侯策名、罗华垓、罗筱元有关联。然而,到了1930年代初,这四个人因一些事业走到了一起,有些是共同投资和管理,有些是分别管理但通过互购卤水、使用侯策名的卤窰联系起来,<sup>⑫</sup>或是有其他的生意联系。除了一些气井外,<sup>⑬</sup>熊佐周等每人都开办了与他人共同经营的食盐批发商号。1936年,熊、侯、罗、罗等人一起,开办了钱福湘盐号,试图打破淮盐在宜昌和沙市的垄断。<sup>⑭</sup>随着1940年代市场条件的改善,熊佐周联合侯策名,和其他人一起,以纵向一体化管理体制巩固他们的投资。同兴和井灶办事处在成立之初,为五眼卤井、三个井火灶(约340口锅)、两个炭火灶、一个食盐批发商号,以及一个新成立的现代化工厂统一提供经费并监督生产。它也为侯、熊、罗、罗的企业进行统一的采购。与此同时,四个人每人都继续从事该集团以外的投资,包括侯策名的钱庄、罗筱元的

216

⑧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28页。黄敦三曾是19世纪末贡井最大的黑卤井开发商之一。崔雨脂、颜绍渊:《贡井盐商余述怀》,17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193—196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64年。

⑨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洗盐概述》,140页。

⑩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⑪ 同上文,11页。

⑫ 王怀周:《自贡井场大关及其职能》,133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90年。

⑬ 1930年代,除葆真井,我们另有材料表明,熊、侯、罗、罗在蕴蒸井、蔚蒸井投资,重淘鸿钧井、成龙井、逢壬井。1940年代,熊也参与了这三个人以及其他人在数个炭火盐灶上的开发。

351

⑭ 这一风险事业一年后失败。

正德井、灶办事处、罗华垓的济华灶办事处。<sup>⑩</sup>

罗筱元最初是王三畏堂的白领雇员。他父亲是乐山附近的食盐批发商,据说在南溪县盐商起诉王三畏堂的一场诉讼中代表王三畏堂进行调解。罗筱元因父亲与王三畏堂间的友谊,在王三畏堂当了学徒,后来在那里做经理,直到1928年。<sup>⑪</sup>

罗筱元在私人企业中的第一个风险投资,是计划向与王三畏堂打交道的商家和个人出借款项。开始时没有什么资本,罗筱元就组织了一个传统的称为“会”的信贷团体。10个月的时间,该会10个成员每人每月拿出10两,共银100两。每个月都有该会的一个成员使用该月筹措的100两。一旦有人借此100两,这个人在接下来该会运作的时间内就要拿出一定数量的利息。如此一来,第一个使用这笔钱的人,就要付最多的利息,而最后一个人根本不用付利息。罗筱元作为该会的创立者,拿到了第一个月所积累的资本,加上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一小笔钱,开始做一些商业项目。这些包括租用一眼气井,与王庚余等人一起开发日蒸灶,投资由余述怀创建的同昌美钱店,以及与王庚余、余述怀、牛继皋一起成立大生祥食盐批发商号。大生祥以及他与另外两个来自乐山的熟人所创办的第二家食盐营销商号存在时间都不长,日蒸灶后来也关张了,这时罗筱元只是一般富裕而已。<sup>⑫</sup>

1916年,随着川盐在湖广市场的恢复,投资食盐批发营销又一次成为通向财富的门径。罗筱元和王庚余借钱,买了10馱盐运往重庆。罗从这笔小买卖中分得利润1600两,利用这笔钱投资宝生荣钱店。与两位商人合伙,他开始将大米和胡豆从产地运往盐场。同一年,在回乐山参加父亲葬礼的路上,罗筱元决定组建另一个营销商号,这有双重目的:一是为重庆—乐山—自贡三角经费汇兑提供一个迫切需要的媒介,二是

<sup>⑩</sup> 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80页。

<sup>⑪</sup> 黎雷:《罗筱元旧事》,40页。

<sup>⑫</sup>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4—5页。

可以利用这三个商业中心进行三角贸易。他与冯树森、曾翰章一起，组建了恒丰豫商号，在乐山、重庆和自流井有分号。商号运输乐山丝绸和白蜡到重庆，将重庆的棉纱运回乐山，并将乐山的丝绸运至自贡。<sup>⑩</sup> 罗筱元自己说，高度投机性的生意本质加上初始资本太少，导致了商号的失败。作为拯救恒丰豫的最后一招，借钱从乐山走私鸦片到重庆也失败了，因为弄湿了外包装，鸦片毁坏。合伙人之一的曾翰章，迫于债务压力自杀，罗筱元自己也逃到乐至，后在五通桥、乐至、土桥沟盐卡当卡员。<sup>⑪</sup>

1917年罗筱元因生意存在问题，被王三畏堂解雇。<sup>⑫</sup> 1920年王如东接手王三畏堂，他邀请罗回来。除了王三畏堂的这份工作，罗也再一次在盐场做个人投资。与王野从（属于王三畏堂）等人合伙，他扩大了拥有的气井，有火圈80多口。与此同时，他和王守为（属于王三畏堂）、潘孝移等人投资15000元，从上海购进两台蒸汽引擎，从而进入了包推业。现金不足的罗筱元再次求助于传统的会来集资，筹集他人股的所需的1000元。<sup>⑬</sup> 1925年他和一些人合伙投资的正雄井发生爆炸，因缺乏重新竖立天车、进行淘办的经费而停歇。另一个凿铤的井也因缺乏经费而开张。1927年合伙运营同新筑及其火圈，因卤气供应下降也告以失败。<sup>⑭</sup>

在整个1910年代和1920年代初，罗筱元以开发新盐业资源声名大噪。在正雄井爆炸后，他决定采取租佃在产的井、灶作为致富之路。在控制麻、竹、木材、油等盐场所需物资的批发生意同时，罗筱元与曾邵伯以及当时王三畏堂的头人王守为合伙，他们一起租佃了15口火圈的气。随着盐价的暂时上涨，他们获得了丰富利润，罗筱元正是以这一笔投资

218

<sup>⑩⑪</sup> 同上资料，5页。

<sup>⑫</sup> 数种回忆文章描述了罗筱元利用他在王三畏堂的地位进行有关王家资产的交易。见黎雷《罗筱元旧事》，40页；宋潮澜《我所了解的罗筱元》，36页，载《自流井》1984年第4期。罗筱元自己在自述手稿中也承认这一点。

<sup>⑬</sup>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9页。

<sup>⑭</sup>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78页。

为基础，最终致富。<sup>⑬</sup>

在离开王三畏堂后，罗筱元出任渝沙债团和王三畏堂共同控制之下的大通宽的经理。<sup>⑭</sup>同时，他和黄子东、谢焕章组建了裕民新灶，从金海井租佃了27口火圈的气。此外，利用来自朋友还有负责王家经营的掌柜同仁的投资，罗筱元在盐场成立了利群钱庄。与将在第十章讨论的钱庄一样，利群钱庄基本上是通过向井、灶提供购买贷款并向它们供应所需的米、油等营利的。利用从钱庄所得利润，罗筱元在自贡四家盐灶中购买了约100新股，扩大了盐业生产资产。<sup>⑮</sup>

到1927年，罗筱元仍不过是许多具有创办企业能力的小投资者中的一员，这些人通过一单单生意的比拼为自己开辟道路，其中许多生意因缺少经费或民国初年四川市场不稳定而以失败告终。他的成功，部分归结为他与王三畏堂的关系——王三畏堂到了1920年代末已是山穷水尽，还在于他能够利用利群钱庄的资源进行其他事业的投资。<sup>⑯</sup>可能是因为身为钱庄老板团体的成员，罗筱元开始结识侯策名。<sup>⑰</sup>他长年在王三畏堂的经历，使他与控制王三畏堂剩余大部分资产的渝沙债团关系密切。

罗华垓是侯熊罗罗集团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出生在简阳县一个贫穷的下层士绅家庭，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sup>⑱</sup>罗华垓在舅父的酱园铺打工，引起了王和甫的一位代理商的注意，该代理商的职责包括在简阳为王和甫的井、灶购买物资。在这个人的推荐下，罗华垓与王和甫见了面，17岁时在王和甫的总号仲兴祥当学徒。

与侯策名和熊佐周不同，罗华垓既不是一位革新者也不是一位冒险

---

<sup>⑬</sup> 同上文。

<sup>⑭</sup> 同上文，79—80页。

<sup>⑮</sup> 宋潮澜：《我所了解的罗筱元》，37页。

<sup>⑯</sup> 宋潮澜——他的父亲是利群银行的投资者，很不满地写下银行的所作所为，这些作为显示出产业银行的一些特色：存款有利息，但严格限制取款，为产业投资积累经费。宋潮澜没有提到如何支付给投资者红利，银行本身是否投资或是作为像罗筱元等股东的出借人。同上文。

<sup>⑰</sup>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18页。

<sup>⑱</sup> 除特别注明外，罗华垓的生平都源自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74—90页。



家。在与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合作之前，他似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投资。出身于士绅家庭，罗华垓比起大多数的学徒，可能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自然也极为勤奋，他在王和甫组织内部的迅速上升可以为证。三年学徒结束之前，罗华垓被提拔为管现钱，他从这一位置升至帮账，接着是管账、总管账，到王和甫去世时，他做到了仲兴祥的总掌柜。<sup>①9</sup> 王和甫去世后，王家亲戚感激罗华垓与王和甫的债权人所做的谈判工作，给予他聚源井6个股份，还有聚生井火灶的超过24口火圈的气。这些资产构成了罗华垓进入自贡商人行列的基础。

#### ※※※※※

在数十年的时间内，这四个人在富荣盐场，是如何从不起眼的商人和学徒一步步到达权势财富顶峰的呢？他们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有关20世纪商业环境的哪些转型？当然，好运气对于他们的成功也起着作用。他们的故事使人明白，自贡处处是机会，从商业小小投资到大的购买产业股份。投资盐井，若见功能使人一夜暴富。然而，这几位直到在盐场的位置确立之后很久都没有铤办一眼盐井。

他们个人以及集体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大家族堂消亡之前，有机会在其中工作。这些人从管理到拥有所有权，代表了19世纪商业结构上的变化，即将职业经理人与日益扩大的大企业资产协同起来。<sup>②0</sup> 作为经理人，他们学习做生意，并与食盐运输商、食盐生产商以及向自贡供应消费和生产物质的人建立联系。而且，当以家族为基础的大企业衰落时，这些人能够利用他们与企业的关系，获得这些企业仍在创造利润的资产作为他们自己商业帝国的基础。罗华垓在他协助拆散王和甫的仲兴祥之前实际上没有商业资产。罗筱元以他在王三畏堂内的地位做买

<sup>①9</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34页。

<sup>②0</sup> 在这一语境中，我小心地避免“professional”（专业的）一词。看不出雇用职业经理人（career managers）会引发专职教育（specialist education），当然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商会和各行各业同业会，存有一个日益增强的设立专职位置的趋势。

220 卖,从供应商那里得到回扣,据说还用他主管下的家族堂的现金向外贷款。还是在受雇于王三畏堂时,罗筱元就与重庆渝沙债团处置王三畏堂债务的代表,就王三畏堂的债务缔结了贸易合伙关系,<sup>⑫</sup>此外,利用他父亲提供的钱与他人在灶上进行合伙,合伙人之一是王三畏堂的王浔九。罗筱元另与王三畏堂成员达成了数个交易,包括与王守为在灶上的合伙。<sup>⑬</sup>利用在王三畏堂的地位,罗筱元与余述怀合伙,为盐井供应物资,后来在市场自由时期运输食盐。当王三畏堂最后出租资产还债时,罗筱元接手了大通笕的经营。<sup>⑭</sup>侯策名作为胡铁华继成气井的大关,为自己的钱庄带来了相当高的声望,并且是钱庄利润的来源,当胡铁华被迫割让自己的财产时,侯策名能够租佃同新笕。只有熊佐周好像没有做过他及合伙人将有一天要取而代之的盐业帝国的内部人。

他们每一个都发展出了各种网络,借助这些网络,他们可以推动商业势力发展,筹措资金并保护他们渡过军阀时期在四川做生意的种种风险。罗筱元是虔诚的佛教徒,在自贡佛学社担任高级职务。他也是金刚学会的成员,该会每月初一、十五轮流在成员家里聚会。<sup>⑮</sup>侯策名早年零售食盐时就加入了哥老会,据说他的拜把兄弟中就有杰出的银行家倪敬先。<sup>⑯</sup>尽管我们没有关于熊佐周宗教信仰的资料,但他父亲信奉天主教,

<sup>⑫</sup>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74页。

<sup>⑬</sup>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20页。

<sup>⑭</sup>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75、79页。

<sup>⑮</sup> 同上文,100页。据王柔德、钟朗华记载,自贡有3000多人虔诚诵经礼佛,其中许多是商人、工业家、官员和地主。

<sup>⑯</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办:《自贡盐业资本家侯策名》,52页。四川人更多地称哥老会为袍哥会。作为一种秘密结社,普遍被认为源于18世纪的中国西部,它在20世纪初的四川拥有大量成员。蔡少卿在他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该会起源的著述中,指出李翰章在1866年、湖南巡抚刘崑在1867年、左宗棠在1896年提及该会。见蔡少卿《论哥老会的起源》,483、485页,载《近代中国》第10卷4期,1984年。曾在四川做过田野调查的施坚雅指出,在1940年代,哥老会在农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包括一般的农村市镇。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37页,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4卷第1期,1964年。罗伯特·卡普,在对1970年代可见的中国西南研究文献评论时,看到这一极其重要的组织鲜被提及,对此他深感惊讶。《二十世纪中国西南历史的诸问题》,载《太平洋事务》第51卷第3期,1978年。

亲属也继续信教,这说明了他也能够利用信仰,抓住营建有助于他做生意的信任关系的机会。

对于那些进入盐场的外部人来说,通过各种团体的活动所建立的信任关系,在他们能够参与并发展自己的生意方面,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天主教会、佛教团体和哥老会,每一个都提供了替代血缘的关系,培育了成员间密切的互助责任和使命。这种互相支持的机制就是轮流信贷会。我们已经指出,罗筱元利用此种“会”筹集资金,以一定利息出借,并投资购买蒸汽机车。当侯策名成为继成井的大关时,他利用这种“会”筹措他所需要的、交给井户的押租。<sup>⑮</sup> 尽管很多有关轮流信贷会的文献,是关于被排除在正式借贷机制之外的第三世界人口的,<sup>⑯</sup>可是这种“会”也能够为像罗筱元和侯策名这样的人提供资本,这些人职业生涯在此一阶段仅有的切实资产就是他们发达的人际关系网络。

除了宗教和象征性的团体外,这些人也深深涉足当时的政界和准政界。他们的前辈在军阀混战中是盲目的追随者,而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则利用军阀关系巩固了他们在商业圈内的权势,通过在商业圈内部进行活动,积累了政治资本。这种策略的一个例外情况是,1926年国民党试图在盐场准备为反对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建立一个立足点时,罗筱元,可能还有侯策名,与国民党左派有过短暂的隶属关系。<sup>⑰</sup> 在国民党的支持下,侯策名和他的拜把兄弟(其中有倪敬先),参加了组建国民党支持的群众组织——商民协会,很显然,它在1927年当蒋介石向国民党左翼发动进攻时解散了。不论这一协会是否有助于营造他们在商人中的

221

<sup>⑮</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301页。轮流信贷会继续是中国非正式金融文化的一部分。见蔡欣怡《后街银行业:中国的私营企业家》,28—29、72—73、77页等,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2年。

<sup>⑯</sup> 蔡欣怡:《后街银行业:中国的私营企业家》,112页、291—295页,极好地将世界范围内的轮流信贷会文献列表、摘要。

<sup>⑰</sup>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2—93页。其中说罗筱元是党员,还有两位是侯策名达记钱庄职员,不清楚当时另两位与国民党是什么关系。

影响,到了20年代末,在正式和非正式地代言商人利益时,他们四个人都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罗筱元在渝沙债团——如同罗筱元一样,它已在井火灶煎锅之上投有重资——力劝下,加入并成为新组建的灶商同业公会的代表之一。在此位置上,他领导灶商抵拒李敬才所组织的盐岩卤公司的成立。<sup>⑫</sup> 他们四人都参加了反对“专商制”的食盐批发营销制度的游说,这是1930年在刘湘所选中的盐运使王瓚绪主持下所建立的制度。他们往返于重庆和成都,游说省里的财政和经济领袖以支持盐商的事业。<sup>⑬</sup>

尽管国民党在四川的影响在1932年底之前一直很微弱,但它有关社会和经济重组的一些政策在这偏远之地还是得到了执行。1930年冬,国民政府颁布了新的《商会法》,以及一部关于工商业同业会成立和管理的法律。<sup>⑭</sup> 侯策名、罗华垓、熊佐周身在负责重组自贡商会的委员会,1931年侯策名和倪敬先当选商会执委。<sup>⑮</sup> 1932年侯策名当选为商会主席。1933年1月,熊佐周被执委任命为商会重要的公断处负责人。<sup>⑯</sup> 大约此时,罗筱元当选为东场(自流井)灶商制盐公司的负责人。他从这一位置退下后,赢得了新成立的东场引盐公会领导权。<sup>⑰</sup> 1937年,在抗日战争前夕,罗筱元又当选进入商会,成为常委。<sup>⑱</sup>

积极投入政治的和准政治的行动对于在盐场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可以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盐场的参与者所面对的种种挑战的历史脉络中得到最充分的理解。王和甫、张筱坡这样的人,通过与军界头目人物的关系以确立自己的影响力,这既反映了在民国头20年后者的更大权势,

<sup>⑫</sup>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22—23页。关于盐岩卤公司,见第九章。

<sup>⑬</sup> 蒲月生:《自贡商人罗华垓》,77页。

<sup>⑭</sup> 彭泽益编:《自贡市志:商会志资料长编》,4页,自贡:自贡市工商业联合,1989年。

<sup>⑮</sup> 自贡档案馆17-1-259和17-1-29。

<sup>⑯</sup> 彭泽益编:《自贡市志:商会志资料长编》,4—5页。

<sup>⑰</sup>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7页。

<sup>⑱</sup> 自贡档案馆17-1-27。

也反映了王和甫他们作为 20 世纪初反清斗争参与者的历史。熊侯罗罗集团,在这些年中,在生意上仅小有成就,基本上被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他们在 1920 年代通过大胆的商业行动以及在不断变化的军阀统治之下保护商人的利益,树立了声望,通过得到国民党在 1930 和 1940 年代创办的各种行业同业公会的领导权,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

在第九章,我们将回到 20 世纪初的富荣盐场,考察一些塑就了两代食盐生产商生意抉择的重要事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重新评价一些在中国经济史上最具有争议的问题:文化、竞争以及商业实践形成中国家的作用。

## 223 第九章 政治、赋税与市场：20 世纪初自贡的命运

在讨论商人在清朝的商业活动时，我们极少提及政治，这绝非偶然。18、19 世纪，自贡商人对于政治资本的培育，仅限于当地并是在制度建设方面。资助商团和地方书院，为巩固当地精英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环境。这些组织也说明了为促进商人集团与盐政的关系所进行的零星或短期的努力。跨省商人有他们的会馆，像西秦会馆，它在自贡老城区依旧最为惹眼（见图片 9.1）。会馆等对提升小集团利益继续起着重要作用，但比不上代表那些在盐场经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当地企业家的类似集体组织。直到 19、20 世纪之交，盐场最重要的组织还是家族堂及其柜房。在自贡，最重要的商讨政治的地点，如同大多数四川城市一样，是茶馆和娱乐场所。

这一与别处没有什么差别的政治图景，在世纪之交发生了急剧变化。变革中的盐业生产技术，是促成新的政治结构出现的一个因素。一体化企业的衰落，为首批灶商、井商、供应盐场的商贩的专门行业协会的出现提供了环境。外部政治是又一个影响盐场各种组织的因素。在清政府的正式要求下，成都和自贡——在时间上要晚许多——都建立了商会。就在此后不久，富荣盐场卷入了辛亥革命的政治风云。盐场商业圈



图片 9.1 西秦会馆——现今是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摄影：Akiko Nakano

对于变动中的政治环境的反应极为迅速，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要独立的政治主动性，这十分了不起。自贡临时地方议事会的成立，是武昌起义\*到1914年中央政府权威巩固——尽管空有其名——这一转变时期，地方市民动员的一个重要例证。然而，商会和议事会的行动和兴趣十分清楚地表明，即便是这些政治表达的重要媒介也表现出了十分狭隘的商业定位。商业圈无力抵制国家政令，这告诉我们，在民国初年市民社会的发展还相当薄弱。

四川很快进入现在我们所称的军阀统治的时期，这给自贡商人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环境。我们现在要转向军阀统治对于商人财富、商业活动、市场和政治的种种影响。第八章已经指出，军阀统治是在19世纪创立的、以家族为基础的大企业衰落的一个因素，但只是许多因素中的一

225

\* 武昌起义始于1911年10月10日，标志着推翻中国帝制政府的革命的开始。（此注释为正文脚注，无编号。——译者）

个而已。在 20 世纪,它对于塑就商业活动方式更为重要,四川地方军事统治者的迅速交替,其结果激励了依附主义,给商业决策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

## 1911 年与自贡自治

到 1911 年初,几乎各个省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都对清朝统治表示不满。该年 10 月发生了一场小规模起义,尽管当时反清情绪还处于初始阶段,且本质上不是一场革命运动,但此种情绪极为强烈,致使断断续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大厦”坍塌。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清朝最终崩溃的最直接原因是反对将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铁路国有化的运动。在四川,保路运动势头强劲,在省会引发大规模骚乱,政府请求调湖北新军来平定成都的动乱。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四川由于国家盐业管理的困境所引发的反政府情绪的高涨程度。被认为是有利于富荣和犍为等更高生产效率盐场的政策,将小规模盐场驱出了市场,这些盐场长期以来成为了煽动反清的中心以及白莲教、义和团招募成员的所在。<sup>①</sup> 清末四川盐税管理和分配政策,也将这种不满扩大到了整个商人圈。1903 年,当官运商销的做法从边岸扩大至四川计岸时,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正如阿谢德所说:“到 1911 年,盐业管理不受欢迎程度仅次于铁路的国有化。”<sup>②</sup>

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发现,要衡量清朝最后一些年份地方精英的政治态度极为困难。地方各界的领袖们,作为一个集团,似乎直到 1911 年的最后日子里才转向,从而反对清政府,当时人们已经很明白,变化发生了,并且要从中找到一条权宜的出路。<sup>③</sup> 自贡的精英们也不例外。尽管

---

① 阿谢德:《清末的省与政治:1898—1911 年的四川总督》,36 页,伦敦:柯曾出版社,1984 年。

② 同上书,94 页。

③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 年。



他们对于政府的盐务政策不满，在川汉铁路被国有化时，一些人在铁路股份上有经济损失，但没有材料表明他们在1911年年底之前参加了革命性的政治活动。仅有一小部分当地人似乎参与了成立保路同志会，或是它的军事组织——同志军。<sup>④</sup> 尽管一些地方拥有功名者同情革命，但张筱坡是唯一有证据表明参加了同盟会的重要商人精英。<sup>⑤</sup> 胡铁华在北京的经历，使他与梁启超等改革者有联系。革命运动成员与哥老会成员间的合作，表明其他与秘密社会有关系的盐场精英们可能也支持过推翻清朝的行动。然而，直到驻扎在荣县的同志军冲向贡井要推翻清朝在此的统治时，盐场才正式地被拉入到革命中来。

荣县的革命者在1911年9月底宣布独立。<sup>⑥</sup> 不久，他们宣布组建自己的军队，在富荣盐场周边的川南各州县表现活跃。据此次革命参加者的记述，该军队与贡井当地精英成员取得了联系，包括至少我们知道的这时已拥有众多黑卤井的黄玉书。<sup>⑦</sup> 然而，直到11月初，他们才向自贡发动第一次进攻。清朝在自流井和贡井驻扎有大量军队，包括团练、州县军队和官运局辖下的治安力量。反清力量与盐场政权的首度交锋，以起义失败告终。<sup>⑧</sup> 然而，随着各省相继宣布独立，清朝控制军队和官僚的能力减退。到了该月底，自贡，像别的许多地方一样，没有了政府和维持治安的军队。愤怒的乌合之众和原先的清朝军人抢劫商铺、钱庄，全省各地抢劫盐政运库、仓库以及运输途中的食盐。所有的权力部门都不复存在，那些留下处理地方事务的人，肆意抢夺政府储备的食盐厘金，而商人也发现他们不用支付所欠的厘金。盐商面对的是打劫者和在他们中

④ 林悦葱：《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1—3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⑤ 同上文。林悦葱将自己描述成同情革命的清朝生员。但其他人并未提到林悦葱是商界的重要成员。

⑥ 一些回忆文章和林建宇利用地方档案资料的研究提到了荣县革命军的早期布告。见林建宇《辛亥自贡地方商人与政府》，13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91年。

⑦ 林悦葱等：《辛亥革命在自贡》，2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⑧ 林建宇：《辛亥自贡地方商人与政府》，13页。

间随时掌握权力的集团的盘剥。<sup>⑨</sup> 甚至是清朝覆亡前革命动荡所产生的重负,也要食盐产业偿付多年。正如张习在 1912 年所说:年老的商人无一日不在盐政官署哭诉他们内心的苦楚。<sup>⑩</sup>

227 对于自贡商业圈来说,清朝的覆亡,显然意味着日益上涨的盐税和严厉营销政策的终结,他们有了自我管理的机会。林悦葱等忆述者所给出的事件发生时间有时不可信,但他们都肯定,待清朝的县丞逃走,地方精英最早的要求之一,就是撤销官运局,成立议事机构。<sup>⑪</sup>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自治机构得到国家承认,旨在通过动员精英参与治理,是加强国家宪政改革过程的一部分。组建议事机构,它的成员基本限制为身有功名的当地人,这样,国家认可的县和省两级的一些精英,在地方事务的集体管理上有了一些历练,尽管严格限制在帝国的官僚统治之内。<sup>⑫</sup> 组建这样机构的特权,还没有扩大到自流井等在清朝的官僚组织内部没有地位的地方。<sup>⑬</sup> 另外,富荣盐场的地界也分属两县管辖。然而,当清朝统治一撤出盐场,一些身拥功名者和商人精英,就参与组建了一个自治机构,他们显然是要恢复作为统一的政治实体的秩序和市民统治。

创建自贡临时议事会的过程中没有争吵,这说明即便是到了民国成立的前夕,人们在谁代表盐场精英利益的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林悦葱等人回忆,率先占领自贡的革命军队的一名参谋,建议召开盐场领导层的会议,以宣布独立。在井神庙召开的这次会议之后,王和甫在他的宝兴隆盐号宴请与会者,席间第一次提出了临时议事会的想法。<sup>⑭</sup> 临时议

353 ⑨ 林悦葱等:《辛亥革命在自贡》,6页;张习辑:《四川盐务报告书》,篇1,页1a—b,1912年。

⑩ 张习辑:《四川盐务报告书》,篇1,页1b。

⑪ 林悦葱等:《辛亥革命在自贡》,6页。

⑫ 自治运动的概述,见罗杰·R. 汤普森《1898—1911年中国立宪运动时期的地方咨议局》,剑桥:哈佛大学东亚委员会,1995年。

⑬ 在富荣盐场设立县丞衙门,表明了盐场在税收上的重要性。清朝时,在一些非行政性的重要城市设立了类似的衙门。

⑭ 这一故事出现在所有辛亥革命的记述中。可见林悦葱等《辛亥革命在自贡》,6页;张学君《辛亥革命与自贡盐业》,12页,载《井盐史通讯》第11期,1983年。

事会于1911年12月30日成立。

议事会由20位贡井议员和40位自流井议员组成，这一构成反映了盐场这两个部分的人口和富裕程度的差异。代表中，我们能确认有19—22人是清朝的生员，至少两人拥有举人以上的功名。另有八人曾在日本或中国的新式学堂学习过。<sup>⑮</sup> 尽管缺少成员的商业和教育情况的完备记录，难以测算商人与士人精英间的权力分配，但像王恩溥、王铁生、王作甘、王文琴、张筱坡、陈湘涛等盐商都在议事会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一新的临时议事会的构成，鲜活地反映了自贡精英们的情况。陈湘涛，议事会的首任议长，来自宜宾，可能是议事会中仅有的中过清朝进士的成员。然而，他的任命书中，包括的不止是他以前做过清朝地方官的经历，他也曾跻身自贡盐业。<sup>⑯</sup> 副议长王恩溥，是有权势的王三畏堂成员，而他的同族，也是议事会成员的王作甘最近才从日本学成回国。至少还有其他两位成员，王余霖和王余淮，也与有权势的王家有关系。<sup>⑰</sup> 1912年3月，临时议事会改为常设机构，王恩溥成为议长，另一位有权势的商人、来自贡井的刘景贤成为副议长。其余的成员基本保持不变。<sup>⑱</sup>

议事会创始人所设立的组织机构，反映出他们意欲将自己建为富荣盐场所覆盖地界的一个综合性政府。12人的驻会委员指导全面工作。日常管理由三股和四科负责。它们与议事会有什么不同还不清楚。三股是审察股、文牍股、庶务股。四科是教育科、财政科、盐政科、交通科。另外，议事会选举产生地方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sup>⑲</sup>

<sup>⑮</sup> 林悦葱：《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168页。

<sup>⑯</sup> 张学君：《辛亥革命与自贡盐业》，12页。

<sup>⑰</sup> 林建宇：《辛亥自贡地方商人与政府》，9页。

<sup>⑱</sup> 林悦葱：《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170页。

<sup>⑲</sup> 林建宇：《盐业资产阶级与自贡地方议事会：馆藏民初历史档案浅析》，4页，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自贡，1990年。林建宇：《辛亥自贡地方商人与政府》，8页。议事会提出的司法机构的建置，反映了在这一世纪头十年经由日本进入中国的德国模式所具有的吸引力。关于这一过程的讨论，见道格拉斯·雷诺兹《1898—1912年的中国：新政与日本》，182—184页，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

仅通过它的组织机构就能清楚地看出，盐业对于议事会工作的重要性，只要看一下各部门的领导层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据曾经接触议事会现存材料的林建宇说，王三畏堂的王文琴是盐政科的负责人，王和甫是财务科的负责人，交通科的副科长是生员、正在崛起的井灶企业家张筱坡。<sup>⑩</sup>

229 自贡地方议事会，在它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布了数百份公告，表明至少在纸面上，他们对于现代政府的作为有着成熟的理解。《川南自贡临时议事会第一月议事录》清楚地表明，议事会主要目标之一，是恢复公共秩序，鼓励继续开展商业活动。为此，它呼吁建立一支真正的民众武装以及一个由议事会领导的军事部门。议事会也呼吁恢复商业活动，认为这不但是促进盐场经济的手段，而且也是走出在革命浪潮中失业所造成的无序状态的一条途径。它降低了赋税，取消了各种陋规。与20世纪初中国许多地方的改革政府一样，自贡议事会也呼吁采取措施对于吸食鸦片、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治理。为博得信任，它誓言公开财务，经费用于为公共谋福祉。<sup>⑪</sup>

尽管自贡地方议事会在自贡公共事务中，代表了非官方声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在它存在的不到两年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各种军事力量走马灯似地进出盐场，以致难以保持公共秩序和文职治理。而且，在议事会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内，它似乎陷入了一场斗争：要通过创建一个以自贡为中心的新县，来表明实质性的政治统一。创建这一“新和县”，存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从中可以透视议事会自身的政治。“新和”要合并相邻的四个县：富顺、荣县、威远、宜宾。这一提案上呈四川省临时议会和1913年初召开的有关各县代表参加的一次会议。5月，自贡议事会选举廖泽宽、刘景贤为议员，参加7月召开的省议会。就该

<sup>⑩</sup> 林建宇：《辛亥自贡地方商人与政府》，16页。

<sup>⑪</sup> 自贡市档案馆196，引自林建宇《盐业资产阶级与自贡地方议事会：馆藏民初历史档案浅析》，399—397页；吴天颖《因利聚人，因人成邑：从盐都自流井看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及其特点》。

问题，支持与反对的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游说。受影响的各县代表们反对失去地盘，尤其是带来高税收的土地。来自自贡以李敬才为首的激进反对建县的一派，反对这一新的行政单位将给王恩溥等商业对手所带来的权力。

最终，政治上谋求统一富荣盐场的计划失败。本来要组成新县的各地界保持原有的行政区划。从地方议事会中选出向省政府负责的一位文职行政长官。1914年年末，该行政长官和议事会被废除，再次在自流井和贡井设立县丞，分别隶属于各县政府。<sup>②</sup>

## 军阀时期的盐政

对于自贡的商业圈而言，清朝的覆亡意味着有机会在摆脱了帝制时代盐课桎梏的自由市场出售食盐。自贡地方议事会代表着自贡有功名者和最有势力商人的联盟。在民国头两年，这两个集团努力去除了他们所认为的、自贡盐业发展中的种种限制。两位有影响的官员，林振翰和邓孝可，在四川盐政中身居高位，最有力地支持了食盐生产商们的利益。他们努力的最大成果是出版了《川盐纪要》，1914年刊行，1919年出了增订版。

230

除统计食盐、食盐制造技术、赋税及市场外，林、邓二人，以支持盐政改革的游说者身份，刊印了一系列的文件，作为《川盐纪要》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邓孝可的《力辞盐政部职书》。<sup>③</sup> 在文中，他抨击近来对于食盐的高税收，提出了他所理解的西方对于消费必需品不征税的“开明”做法。考虑到在中国财政危机四伏，要求对食盐课税的情况，他倡议仅仅旨在为了获得收入的低税收。他特别激烈地抨击了私盐的概念。

<sup>②</sup> 林悦葱：《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169—170页；林建宇：《盐业资产阶级与自贡地方议事会：馆藏民初历史档案浅析》，5—7页；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4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sup>③</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446—45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指出当前情况下，“走私”一词，不仅指盗窃或逃税等违法行为，而且更常指在指定销售地区之外销售食盐，他强烈呼吁为这一必需品开放市场，不要榨取商人并破坏该产业。邓孝可呼吁对商人进行帮扶，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税收。这样的政策将只允许有单一的盐税，在食盐产地收取，而将生产和经销的所有方面留给市场，遵从市场的要求。改革也要求简化食盐管理，取消食盐销售分立的票、引管理制度。

四川食盐生产商的支持者也建议进行投资，以拓宽制造商品的种类以及食盐和食盐副产品的利用。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林振翰的提议，通过开发盐场技术将其应用到化学、制药、军事、农业，以扩大四川卤水市场。其中包括家畜饲料中添加盐及盐的副产品，还有发展四川的钾盐和钾资源。<sup>②④</sup> 军阀统治给四川带来严重不良影响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未能将任何一种建议付诸实施。

231 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政治上分权，加重了此前晚清政府就已面临的严重财政问题。作为中央政府一种稳定收入来源的食盐，成为国家的一个主要目标，因为此时国家对土地和商业税收少有掌控。当邓孝可被新任命为四川盐政的负责人，他能够将一些想法付诸实施。1911年12月之前，他已经取消了划定引岸即指定销售地界，并且用在盐场购盐进行销售的商人所缴纳的单一赋税，代替了旧有盐引和盐票制度。<sup>②⑤</sup> 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税率降低了，但厘金不在此列，因为它对于地方行政举足轻重，加征的各种费和附加税都被废除。此外，对于整个四川生产食盐进行统一征税的做法，赋予了有着更高生产效率的富荣食盐生产商在四川市场又一优势条件。<sup>②⑥</sup>

②④ 《钾盐说明书》，见上书，479—488页；《提倡兽类饲盐议》，见上书，500—506页。

②⑤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1，篇1，章2，节1，页14a—16a，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阿谢德：《中国盐政的现代化：1900—1920》（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81页显示，与四川不同，其他盐区大多数保持着类似于清朝的制度。

②⑥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1，篇1，章2，节1，页14a—15b。

这一制度实施了仅两年。1914年，中国的盐税收入要保证用于偿付总统袁世凯新近商定的从西方财团所借的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和外国联合机构“盐务稽核所”从旁管理中国盐业，它的作用是重新制定盐税征收标准，保证盐税流入管理中国国家借款和利息偿付的外国银行。《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第五款规定，“中国政府在北京设立盐务署，由财政总长管辖盐务，署内设立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主管”。<sup>⑦</sup>这两人，地位平等，负责所有的报告、账目、税收及引与票的分配。依1914年的规定，洋会办的权力扩展至稽核总所的运作。规定他是盐务署的顾问，该署的负责人在所有重要问题上要征求他的意见，包括盐政及其变革，盐业收入、雇用和解雇盐政官员。<sup>⑧</sup>

授权稽核总所在每一个食盐产区建立分所，听从中外共同管理。最初，四川分所设在泸州，后来移至自流井，这样更靠近食盐生产中心。1915年又在绵阳设立一个分所，以处理北部盐场事务，不久移至三台（见第一章的地图1）。其下是许多支所和食盐征收区。在主要的销售地区，还有重要的山区关口，也设立稽核处以防止逃避盐税。欲出售引盐的商人前往得到授权的银行缴纳盐引税，缴税后拿到称为“金库单”的证明。<sup>⑨</sup>他在当地支所出示金库单，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食盐。在成立稽核所的初年，给商人两个月的时间：从购买金库单到筹措经费、抵达买盐的盐场。运输食盐经过税口时，他也得到一纸运盐执照，证明已缴过税。<sup>⑩</sup>随着该领域官员数目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取得了银行的合作，以及引入了现代的会计和监督方法，稽核所极大地减少了逃税，推动了中央对于盐业收入更有力的控制。<sup>⑪</sup>

尽管稽核所多方努力，执行统一的做法，但在盐政的具体问题上各

<sup>⑦</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530页。

<sup>⑧</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10，篇7，章12，节2，页85a—86a。

<sup>⑨</sup> 同上书，卷1，篇1，章2，节2，页16a—19a。

<sup>⑩</sup> 对于这一问题的细致讨论，见阿谢德《中国盐政的现代化：1900—1920》，94—110页。

省继续保留各自特色。在四川,直到1930年代中央政府的权威才得以建立,这之前,课税的层次和方法都是由一连串的军事统治者监管的。正如阿谢德所论述的,稽核所的华洋官员在四川保持他们的管理统一上极为成功,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将所收到的大部分收入交给了每个产盐区的军事长官。<sup>①</sup>因此,稽核所和盐政机构的数据,提供了已经缴纳的官方所制定赋税的相当精确的情况。然而,不论是稽核所还是中央的盐务署,都不能控制食盐征收和运输机构,以及对于食盐的生产商和运输商进行的额外加征。

四川稽核所成立的同时,也重建了四川盐税征收体制。邓孝可所建立的自由市场被废止,恢复了食盐要在指定地区销售的做法。恢复清朝税收原则的理由,在于自由市场和统一税率会危及生产率较低的盐场。新任命的四川盐运使晏安澜,接待了大量来自小盐场的盐商,这些人抱怨他们的市场正被富荣出产的食盐所占领。<sup>②</sup>由自贡一批企业组建的一个盐业公司只能加重人们对于富荣盐场统治地位的畏惧。

除恢复清末官运商销的税收管理体制外,这位盐运使提出统一营销和限制逃税。在四川省内出售的食盐由盐政机构直接从盐灶购买,通过官府的仓库出售给商人和小贩。仅授权了18家盐业公司可以购买盐引,凭此可以到指定盐场购盐,并在特定的区域销售。<sup>③</sup>商人的努力仅局

① 阿谢德:《四川的盐和军阀:1914—1922》,729—739页,载《近代亚洲研究》第24卷第4期,1990年。自贡市档案馆(1-1-164)有一份护国军川北警备司令部正式通告,告知稽核所,因袁世凯不再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他们已宣布独立,现在欲接手四川的盐业收入。他们向稽核所保证,后者将只解缴用于偿还外债的部分,而保留所有的盐税“赢余”。

② 可见来自射蓬、仁寿、乐山、犍为、射洪、三台等13个盐场的请求。自贡市档案馆1-1-91。反对这一自由市场的理由与在清朝提出的一样:(1)小盐场会被挤压,无生意可做,将带来失业和骚乱;(2)不要求商人向边远地区供应食盐,那里的人民将承受食盐短缺之苦;(3)一个公开的市场更难以管理,更易于逃税。

③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1,篇1,章2,节2,页16a—19a。根据宋尚泽的研究,这些公司中的一些,事实上是不止一个投资集团的组合体,这使得公司的总数目达到25个。见宋尚泽《从辛亥至解放四川行盐九易旗帜》,74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1993年。



限于在主要盐场建立评议公所，它的主要目的是向盐政官员报告生产条件。<sup>⑭</sup> 三台盐场的地方官员认为，评议公所的真正目的是进一步推行保甲，调查井、灶逃税，检查实际的生产水平与禁私情况。<sup>⑮</sup>

晏安澜的方案执行了约一年，许多方面都持反对意见。自贡商人反对食盐批发公司的垄断，认为他们所得到食盐的价格受这些公司影响，而且他们受到了以盐引为基础的食盐交易的盘剥。在食盐销售旺季，批发公司要一年三次聚集大量的资本，这说明它们中的许多是由可以得到重庆资本投资的人组成的。<sup>⑯</sup> 人们也担心，四川条件如此恶劣，大公司要比小规模运输的当地商人更具风险。这后一种担心似乎源于晏安澜治下盐税收入的减少。<sup>⑰</sup>

除了特定盐场的食盐必须在特定引岸销售之外，1916年恢复了邓孝可所开创的税收和销售制度。食盐批发公司被废除，市场对所有愿意缴纳赋税、购买和销售食盐的人开放。而且，为减少富裕批发商竞争上的优势条件，新的制度废除了批发商购买大宗食盐需要盐引的这一要求，同意少量的食盐可以凭票运输。尽管引岸仍然存在，但商人可以选择不同的目的地，一条贸易路线受阻，可以在别处找到出路。<sup>⑱</sup>

盐政官员抱怨，有商人缴纳了到低赋税地区卖盐的赋税，接下来却到高赋税地区卖盐，但总体上该制度运行良好。四川盐政所面临的最顽固问题，是战争对于在四川边岸和湖北指定市场的运输的影响。长江常常不能通行，商人们经常运输数月而无法抵达目的地。《四川盐政史》记载，活跃在四川南部的川、滇军队的长官甚至在自流井和贡井设立保护机构，强令商人每馱盐分别缴纳 600 元和 300 元的保护费。想不到的

<sup>⑭</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10，篇 7，页 110a—112a。

<sup>⑮</sup> 自贡市档案馆 1-1-26。

<sup>⑯</sup> 见后面对信用紧缩的讨论。

<sup>⑰</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1，篇 1，章 2，节 2，页 18b。

<sup>⑱</sup> 同上书，卷 1，篇 1，章 2，节 2，页 19a—19b。

是，一旦他们上路，就要再次缴费。<sup>③</sup> 结果，淮盐正一步步进入川盐的远方市场。

234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 1916—1920 年间，四川盐课保持相对稳定，盐税继续以上述方法征收。1918 年，四川各驻军间建立了一种权利共享制度。在稽核所与督军熊克武签署的协议中，除了支付维持盐政官员的支出外，所有的盐业收入要交付给数位驻军长官。<sup>④</sup> 另外，尽管稽核所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四川政府现在任命了盐运使。从 1920 年开始，有关食盐休战协定遭破坏，控制食盐收入成了四川军阀抢夺的战利品之一。到 1921 年，盐政官职本身也成为争夺目标。而且，以前的盐政人员是由中央任命的，尽管收入从未解至北京，而现在每位长官任命自己的人担任地方上的这些职务，为自己的私囊筹钱。<sup>⑤</sup>

盐业管理上这些变化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对于食盐生产商和运输商的要求：要用现金供应军阀。作为一半以上川盐的来源地，自贡成了军阀行动的特定目标。1923—1924 年自贡和重庆的盐业收入部分被征用，而入侵的黔军迫使自贡商人交出金钱，具体数目不详。<sup>⑥</sup> 为从自贡得到收入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四川军事长官们建立了一种包商制度，包商的作用与缴纳赋税的农民相似。1930 年，包商被重新组织的垄断商人所取代，这些人许多是军事长官的朋友或关系户。<sup>⑦</sup> 直到 1934 年国民党在四川确定了统治，自贡食盐生产商的代言人才能够说服新的省政府，废除对于营销食盐商人资格的限制。<sup>⑧</sup>

③ 同上书，卷 1，篇 1，章 2，节 4，页 21b。

④ 同上书，卷 1，篇 2，章 2，节 5，页 23a。

⑤ 阿谢德：《四川的盐和军阀：1914—1922》，734—735 页。

⑥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1，篇 2，章 2，节 5，页 23b—24a。

⑦ 同上书，卷 1，篇 2，章 2，节 5，页 23b—24a；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77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9 辑，1989 年。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78、83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⑧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5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1985 年。代言人包括罗筱元和罗华垓。

计算四川所征收的盐税,对于考察食盐税收给盐业所带来的影响没有什么帮助。1932年出版的《四川盐政史》,提供了1915年规定的富荣每个市场的税额(见表9.1)。每引食盐所设的税率不同;在每个市场,盐引所允许售卖的食盐数量不一样。然而,平均言之,湖广市场每百斤食盐课税0.625两,其他市场的税率每百斤课税1.375—1.50两不等。而且,将全部陆路盐引改为凭票销售,消除了清朝时存在着水引和陆引的不同。<sup>④5</sup>

盐政官员是否能达到盐运使晏安澜1915年所设定的征收数额呢?乍一看,二者确实非常接近。表9.2综括了引盐市场和票盐市场的税收。

表 9.1 富荣各市场的引盐税额(两)

235

市场	税额总数
济楚	618 750
计边	457 995
仁边	463 775
涪边	394 840
永边	200 880
泸南	487 220
涪万	247 670
渠河	386 100
总数	3 257 230

资料来源: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8,篇4,章2,节2,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年。

没有票盐销售的定额,因此我们只能比较引盐市场食盐销售的收入。尽管原始税额是以两为单位,然而历年的税收收入数据是以元计算的,元是民国时期通行的计算单位。<sup>④6</sup>假定1915—1916年间的兑换率保

<sup>④5</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8,篇4,章2,节3,页17a。

<sup>④6</sup> 地方和区域政府都铸造银币,以各种元为面值。银两和银元,两者含银量差别很大。然而,根据经验,两者的兑换率是1:0.72。这与《四川盐政史》给出的1915年1:0.68的兑换率仅有略微差别。使用者这一数值,1915年的税率,对于在湖广市场销售的食盐会是每100斤0.913元,其余的引盐是每100斤2—2.19元。

355

持不变,该年引盐市场的总税收是 4 755 556 元,这应该非常接近原数额。而且,尽管在绝对税收值上波动相当大,但仅有一个年份即 1917 年,税收总额低于 1915 年的标准。

若情况如此,那么,我们如何解释食盐生产商及其代表所感觉到的,在 1916 年与抗日战争开始之间盐场正在日益衰落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征收的总税额数字不简单是一个基本额度,而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基本额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额外的赋税可能已制度化。那么,即便食盐销售下降,总税收也将会保持稳定。这种看法来源于稽核总所 1933 年的出版物《中国盐政实录》的数据。那里以元计算的正税与 1915 年的相比已急剧上升,湖广销售的食盐达 600%,而其他市场的食盐则达 166%—182%。而且,税收中包括正税、财政部同意的附加税,以及准许由地方各军队所征收的附加税(见表 9.3)。

236

表 9.2 1916—1929 年富荣的引盐票和票盐税收(元)

年份	引	票
1916	4 818 064	1 253 992
1917	4 603 348	1 188 647
1918	5 220 118	1 325 303
1919	5 225 122	1 220 181
1920	6 394 120	1 430 460
1921	4 975 600	1 557 012
1922	6 342 250	1 380 892
1923	5 794 300	1 357 101
1924	6 255 650	1 447 912
1925	4 792 600	1 490 140
1926	6 027 800	1 477 974
1927	8 197 700	1 628 872
1928	5 771 550	1 638 054
1929	6 177 000	1 686 646

资料来源: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8,篇 4,章 3,节 7,页 25a—26b,四川盐政使编辑处,1932 年。

表 9.3 1933 年前后批准的富荣税率(元/100 斤)

市场	正税	财政部批准的军事附加税	地方军事附加税	总数
济楚	3.5	0.015	5.11	8.63
渠河	2.5	0.0	1.56	4.06
泸南	2.5	0.0	1.56	4.06
涪万(湖广边界)	2.5	0.0	1.66	4.16
涪万(四川边界)	2.5	0.0	1.66	4.16
綦边	2.5	0.0	1.15	3.65
涪边	2.5	0.0	3.76	6.25
永边	2.5	0.0	1.6	4.1
仁边	2.5	0.0	0.99	3.49
票	2.0	0.0	0.0	2.0

资料来源:财政部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编:《中国盐政实录》下册,89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33年。

最后,已有人指出四川盐运使能够在整个军阀时期完成他们定额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极大地减少了走私出四川的或进入计岸而不缴纳赋税的食盐量。如此一来,较早的食盐收入数字可能漏掉了一大笔在盐场交易并创造了收入和工作岗位的食盐,而两次世纪大战之间的数字可能更接近于食盐的实际销售。这两种情况,可能有助于盐业管理持续平稳地发挥作用,而同时,食盐生产商和更少特权的食盐运输商感受到了军阀统治有害的冲击。

237

## 军阀统治与自贡盐业命运

1914—1936年大部分时间,在自贡盐场乃至整个四川谁说了算,是看枪杆子。如果军阀统治意味着为控制地盘和资源而争斗不休的话,那么四川所经受的军阀统治可能比中国任何其他省份都更为惨烈。从1911年清朝覆亡开始,四川几乎一直处于战争之中,曾有的繁荣经济凋敝了,统一的省级政府几乎彻底不复存在。<sup>④7</sup> 对于自贡而言,军阀统治的

<sup>④7</sup> 罗伯特·A.卡普:《四川和中华民国:省区军事行动与中央权力,1911—1938》,纽黑文:耶鲁大学,1973年。

影响极深。作为四川的重要经济宝地，盐场及其运行所依赖的盐政机构是军阀反复争夺的目标。民国初年，在六个主要的军阀派别划分四川之前，自贡变成了战场，每年不止一次战争（见表 9.4）。樵甫的那部盐业要览，其中的描述触目惊心，反映出 1911—1919 年间战争给自流井造成的后果。革命的风潮中经济发展严重受挫，到 1915 年年中，自贡地区的经济开始复苏。贸易得以恢复，新的银行开张，物资源源不断流入城市，娼妓增加，戏园上演着人们渴求的娱乐项目。接下来，新一轮战争打响了：

停汇者银行，停运者盐商，停煎者灶户，停走者大帮。轿铺畏兵差而闭歇，苦力畏拉夫而远藏。油米因路阻而少至，各货因匪风而停庄。麦面因兵站而飞涨，新年因戒严而凄凉。戏园因兵多而不敢演，娼妓因军扰而假从良。猪肉因困捐而加价，人户因被盖而惊惶。商号则下牌号，富户则上塞忙。<sup>④</sup>

238

表 9.4 1911—1932 年自贡外来的驻军情况

日期	军队	指挥官	隶属
1911 年 11 月	同志军	周鸿勋	当地的革命者
1911 年 12 月	滇军	秦省三	
1912 年 1 月	川军	李彪 龙灼三	成都四川军政府
1913 年	川军 (一师一团二营三营)	贺重熙 钟明三	
1914 年	川军(一师) 京防军(一营)	方斌(同刘存厚、周秩宗) 郑继廷	北京政府
1915—1916 年	川军(一师)	刘庆云、杜少棠	属刘存厚师
4—6 月	滇川军队开战		
6 月	滇军(第五旅)	刘法坤	护国军(反袁世凯)
1917 年	滇军(第五旅)	刘法坤	护国军(反袁世凯)
9 月	滇川军队开战 川军(第三师)	张鹏午	

<sup>④</sup>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4—5 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 年。这些要塞是设防的寨子，最早是在 1850 年代太平天国时期建造的。

(续表)

日期	军队	指挥官	隶属
	滇川军队开战、相持		
1918年	川军	王维纲	
	滇军	金汉鼎	原刘法坤部
1919年	滇军	金汉鼎	原刘法坤部
	川军	赵宗藩	
1920年	川军(第八师)	陈洪范	
年底	滇军退出自贡		
1921年	川军(第三军)	洪幼三	
	自贡商团		
1923年	川军(第九军)	张清平	刘文辉部
1924年	川军(第九军)	张清平	刘文辉部
		费东明	刘文辉部
1925年	川军(第九军)	张清平	刘文辉部
		费东明	刘文辉部
春	杨森和刘文辉军队开战		
	川军	郭汝栋、白驹	杨森部
秋	杨森和刘文辉军队开战		
1927年	川军	罗子久	刘文辉部
1930年	川军	蔡玉龙	刘文辉部
1931年	川军		刘文辉部
冬	川军	黄朝盘	
1932年	川军	刘荣九	刘文辉部
秋末	刘湘进攻自贡刘文辉军队		
	川军	马用权、蔡舜钦	刘湘部

239

资料来源:陈凯崇等:《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方驻军情况》,121—13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形势异常严峻,银行焚烧汇票,不让它们落入军队手中。士绅们也求助于腰间的枪支。军队强迫百姓使用军用券,惩罚使用钱票的百姓。拒绝做苦力的百姓会被枪打死。大户人家的女人遭奸淫,甚至小贩因为听不懂士兵所喊的口令而被刺死。四川省盐政长官来自流井时,也带着贴身护卫。

240



图片 9.2 三多寨入口,1989 年。商人在清中期起义时期建造了数个寨子,作为避难之地,并由他们维护一直保存到了 20 世纪。三多寨是其中的一个。

摄影:曾小萍。

241 樵甫的书中有些地方一直写到该书出版的那一年。他叙述说,在 1915 年年末,陈成武将军派刘杏村作为自流井的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县丞衙门。北洋军第五旅驻扎在百花场。川军驻扎在五家坝。陈成武将



军也派指挥官们建立了川南首个兵站。尽管镇上军队很多，但商业很活跃，一直持续到1916年年初军队停止购买当地物品。5月10日，北洋军的旅长冯王祥，<sup>④</sup>他以前在叙州府驻扎，突然奉命调动，途经自贡上任。他带领大批人马，住满了镇上的寺庙：

十四五日，富顺告急：此地甚危。各官绅电告请兵。闻北军旅长李炳之氏，将由綦江调驻富井。十九日午后，陆军张团长见军心已失，遂失踪。县佐白曾煦氏，警佐高质彬氏，知不能抗，均避去。夜半枪声隆隆，秩序大乱。有一部分军人，自由行动，枪毙团部三人，然并未扰及民家。全井人民，惶恐万分。二十日辰，住井之陆军，谓张庆云氏不合宗旨，乃公举第一营营长向玉麟氏代理团长职务。联合各界，出示宣布独立。实成都独立之前二日也。自此中国银行关闭，兑换无门。纸券无人接收，充满街市，军民交困矣。是夜南军第一师第一梯团长雷时若氏，自叙城移住此地，以陕西庙为司令部。旋将驻井之陆军从新编制。二十九日川军护国军司令刘积之氏亦移兵驻井，以县佐署为总司令部。三十日，又到南军一支队，又杜军部下之两营长亦率队来归。自南军到后，不准军士负枪，市面相安。五月十五日，招讨军司令熊锦凡氏，亦自富顺移驻此间，云南陆军第一军左翼总司令罗佩金氏自叙移军驻此。六月一个月中，刘军开赴嘉眉一带，此地又到南军陆军步兵第五旅刘法坤氏。此为现今时代之自流井。<sup>⑤</sup>

242

樵甫记述了军队行进经过自流井时，居民所经受的令人窒息的焦虑。最初是由滇军占领，接着被川军占领，又被二者的联军占领，后川军内部各派别又争夺不止，自贡的商人经历了军阀的种种劣行，从勒索、绑

<sup>④</sup> 冯玉祥的生平，见詹姆士·E. 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传》，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

<sup>⑤</sup>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6—7页。

票，到强征特别税，到公然抢劫镇上的店铺和会馆。

1925年之后，四川两个最有权势的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休战，这给盐场带来了和平，尽管驻军一点也没有减少。刘湘和刘文辉都在自贡驻军以保护他们在川南盐业的收入。他们都派有代表尽量从食盐生产商和批发商那里榨取更多的金钱。1927年，刘文辉建立裕通银行，作为存储盐税和向成都汇兑的机构，以期能抢到这—丰厚收入来源的更大份额。<sup>⑤</sup> 1932年，两大军阀重开战火，自贡再一次成为军阀混战的中心。刘文辉告败，他在自贡的军队和当地公安大队及民丁大队的头目被整个取代。刘湘的人马控制着盐场，一直到1936年。这时，从1928年就掌握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党，最终能够向中国内陆这一经济中心派出自己的保安部队。

军阀统治对于盐业的影响很难进行量化。我们不指望还保存有遭抢劫的食盐、被袭击的仓库、所征收的附加税以及被敲诈的商人的材料。正如学者难以评价蒋介石上台对于上海资本家的影响一样，<sup>⑥</sup>我们仅努力搜求有关军阀统治时期商业圈运作的环境的记述。

盐课收入对于四川军阀维持军队和稳固地盘，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正如阿谢德令人信服地指出的，仅盐课不足以维持军阀手下迅速增多的军队。<sup>⑦</sup> 无法得到其他形式的正税，军队上下都依靠敲诈勒索、抢劫等胁迫形式，以期得到资源。而且，由于缺乏正常的收入来源，极少得以履行的地方政府职能，经费是由特别的加派予以解决的，而这种加派很快就成为经常性的报捐，当再遇入不敷出时，就以其他的捐献作补充。因为没有地方政府可言，加派就通过商会进行分配，通过下属的各同业公会进行征收。尽管负担的程度和商业圈的承受能力从现存的商会资

<sup>⑤</sup> 陈凯崇等：《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方驻军情况》，121—13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sup>⑥</sup> 可见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哈佛东亚研究丛刊第94种，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1980年。

<sup>⑦</sup> 阿谢德：《四川的盐和军阀：1914—1922》，739—740页。

料看不出来，但实际的加派所带来的困窘则是无可质疑的。

商会与各种地方机关之间就支持自贡警察问题的来往信件，提供了军阀统治之下地方财政如何运作的一个有用例证。到1920年代，一支警察力量已在盐场围边建立，目的是保护主要的通道。10%的售盐加征将用于资助这支警察队伍，协议规定在1922年将此加征降到7%。1922年年底警察局长通知商会，急需为他的手下购置冬季制服，但他的预算有1000元左右的缺口。他没有要求提高加征，回到以前的10%，而是要求一次付清1000元，以帮助度过新年。商会答应了。第二年的11月，局长再次写信，这一次要2000元。<sup>⑤4</sup> 商会再次出钱，然而一个月后收到局长一封信，抱怨说警察局经费不够，需要商会建立一个警务部门以筹集更多的钱。到1926年，商会依然与军阀为警察制服问题上的非常加派作斗争，要求对警察行动中的不规范行为和警察的支付水平进行调查，否则拒绝拿出更多的钱。<sup>⑤5</sup>

对于经费的需求也掩盖在特别费用之中。比如对于日益增多的鸦片种植的定期罚款，对此商会在1931年回复：

井区面积截长补短不过十二、三里之宽，井、灶街房有如鳞次，间有隙地无非废土残基，久遭盐潮卤浸，播种百谷已非土宜，积以烟苗尤难生育。是故人无贫富，直接间接操业于吸卤煎盐，不薅不耕，罔知稼穡。世代生活不外为商、为工，门户课金随业上纳，源源供应，节节输将，正税附加，岁近千万，担负之重，倍于乡间，而乡间良民又大半为井商户。在乡受罚，已苦厥罪，维均再派井区，则是罚而之罚。粮民受罚尚可谓其有田有土，可以偷种烟苗，罚及厂商，则井口灶边安能触犯栽种烟苗之罪？<sup>⑤6</sup>

<sup>⑤4</sup> 商会十年以后的全年预算只有约9800元，注意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请求数目的大小。自贡市档案馆17-1-785。

<sup>⑤5</sup> 同上资料，17-1-440。

<sup>⑤6</sup> 同上资料，17-1-259。

244 这些加派是对商业圈的敲诈勒索。要评价敲诈勒索对于单个的商人家和企业的影响则更为困难。压力有的是以伪装的形式出现的。当方斌的军队 1913 年占领自贡时,他指控王子衡、王逃走藏匿枪支和窝藏土匪。作为惩罚,王氏家族的井、灶被没收,以约 20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范容光。范容光,他早已在自贡食盐批发业中立足,可能在本次交易之后成了食盐生产方面的主要人物。李四友堂的李星桥也被指控吸食鸦片,李家被罚十万元,但当地的说法是他只付了该数目的一半。<sup>⑤7</sup> 1917 年当川军再次占领自贡时,使用类似的手段,指控王作甘通敌。王作甘被抓,仅用十万元的“罚金”就将他从行刑队捡回了一条命。<sup>⑤8</sup>

当滇军反攻占领自贡后,这些家族被指控从三多寨援助川军。三多寨的指挥官逃掉了,但李家为此要拿出 100 俄盐,约合 20 万两。<sup>⑤9</sup> 到 1919 年,自贡商会向中央政府请求支持,反对自贡的军阀统治者,控告他们没收公共财产,驱役市民,偷盗家畜。根据商会的说法,在此前的八年间,价值数百万两的金钱和食盐被偷,百姓被迫拿白银兑换无价值的军用券。井和灶变成了可怜的借来之物,要向这些军队偿还。1927 年秋天,滇川两军开战期间,工厂和市场遭抢、被焚,货物、店铺、财产以及街道被毁,损失至少 200 万两。<sup>⑥0</sup>

清亡后的十多年间,一连串的军阀向自贡商人催讨声称是归属原官运局的经费。严格说来这些经费根本不是一种赋税,它们是向一些商人所征收的费用,这些人先是收到了预付的现金以便向官运局运库运盐,但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动荡中却违背了承运协议。被指控的商人无法证明已兑现了他们的合约,因为推翻清朝前后发生的抢劫已毁坏了官

<sup>⑤7</sup> 陈凯崇等:《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方驻军情况》,123 页。

<sup>⑤8</sup> 宋良曦:《四川军阀对自贡盐商的劫掠》,188—189 页,载彭久松、陈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四川井盐史论丛》,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sup>⑤9</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188—189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sup>⑥0</sup> 自贡市档案馆 17-1-466。

运商销的记录。军阀成立了一个衙署,它唯一目的是收缴这些经费,一位特派员前往自流井以监督征收过程。1921年,稽核所的一份报告称:“众商人因军队需索已告歇业,或以极高利息向军事长官借贷。”<sup>⑤1</sup>1924年初,四川剿匪军独立旅的指挥官王维纲收到上司一份急电,说军队需要经费。命令王维纲联系旧债局(处理官运商销的旧债),让它催缴十万两。一个欠款人员名单送往商会,要求商会负责调查债务并确保年底之前全部缴清。同时送达的还有一份罪犯名单,尽管可能反映了真实的拖欠情况,但更是最佳的追缴目标,它由盐场一些最富有的人组成:王德谦(王三畏堂)、王和甫(王宝兴隆)、胡铁华(胡慎怡堂)、李善成、李德文(李四友堂)、朱善祥(大川笕)、张九成、王子善、王文奎。<sup>⑤2</sup>

军阀也对自贡食盐生产商产生了间接的影响。战争割断了生产与市场的联系,似乎对整个四川的商业经济都有影响。1910年代中国南北政府斗争期间,自贡与获利丰厚的湖北市场的联系被切断。<sup>⑤3</sup>1920年代后期,尽管四川对湖北的市场占有在法律上得以恢复,但对于运到这些地区食盐的高税收,挫伤了商人从自贡购盐的积极性。而且,规定减少了盐商以前拥有的、从购盐到在湖北缴纳赋税的时间,这进一步限制了愿意将川盐输往湖北市场的垄断商人的数量。<sup>⑤4</sup>在军阀持续混战的情况下,公开市场的引入,实则周期性地剥夺了四川许多先前在贵州以及云南部分地区的边岸市场。<sup>⑤5</sup>

清朝时四川和湖北共同努力,维持四川对湖广的市场占有,但到了1920年代,军阀联盟的格局促使湖北支持在它的地界销售更多的淮盐。<sup>⑤6</sup>1922年,一家坐落在沙市的盐号与湖北的盐政负责人达成一致,

<sup>⑤1</sup> 阿谢德:《四川的盐和军阀:1914—1922》,740页。

<sup>⑤2</sup> 自贡市档案馆17-1-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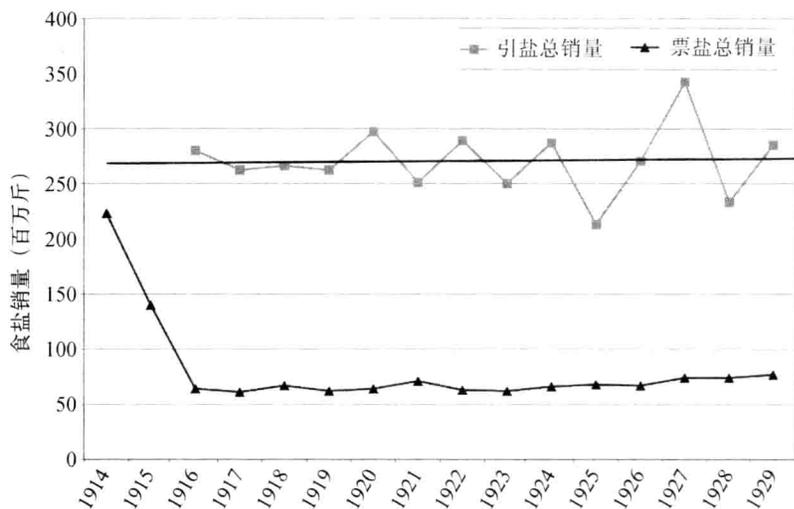
<sup>⑤3</sup> 同上资料,17-1-466。

<sup>⑤4</sup> 同上资料,17-1-175。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8,篇4,章14,节1,页97a—99a。

<sup>⑤5</sup> 张习辑:《四川盐务报告书》,篇3,页1a—1b。

<sup>⑤6</sup> 陈文安:《川盐济楚始末》,46页,载《井盐史通讯》第8期,1981年。

要让长芦食盐进入川盐在湖北的销售地界,这一企图因四川盐政官员向中央提出强烈反对而受阻。<sup>①7</sup> 1923年,当四川的战争阻断了前往湖广的食盐运输,淮商得到了一年特许,运输20万引长芦和20万引济南食盐前往该地区。他们想将这一特许延长一年,但许多电报发向北京,予以阻止。然而,到1924年底,首都的盐务机关已同意4000万斤的济南食盐在川盐的营销地区销售。总税务司担心这一行动将减少来自四川的收入,将此限制为1000万斤,时间是一年。有四川人向北京政府起诉,结果事与愿违,北京政府废除了上述安排,判定湖广对来自四川和两淮地区的食盐开放。



图表 9.1 富荣盐场食盐销售, 1914—1929 年

资料来源: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9,节2,四川盐政史编辑处,1932年。

由于淮南食盐生产处于衰落期,因此淮北的食盐被正式批准进入这些市场。1925年4月的另一项命令,允许淮运公司将长芦1000万斤食

<sup>①7</sup> 长芦盐区由河北以及河南西部地区组成。

盐运到湖广销售。<sup>⑥</sup>到1930年代，损耗津贴、税率等的优势以及沿长江中游开放水域轮船轻松运输，继续将川盐置于不利的地位。<sup>⑦</sup>自贡能够通过向在计岸出售更多的食盐来弥补它所失去市场的一些损失，但这是以牺牲四川低效的小盐场为代价的。<sup>⑧</sup>

图表 9.1 显示出在重新引入盐引后，富荣引盐和票盐的销售趋势。尽管富荣盐场票盐销售几乎没有起伏，但引盐的销售变动却相当大。因为票盐一般来说是由小商小贩在计岸销售的，我们可以推论，食盐销售的这些变动反映出食盐的长途运输受到了阻碍。引盐销售总趋势线也比较平直，这也证实了上述想法。然而，从现金流流转看，这一市场的反复无常，对富荣的影响较其他盐场更为严重，因为四川大部分的外运食盐产自富荣。

食盐销售的盛衰与军阀军队之间关联密切（见表 9.4），这毫不奇怪。富荣的大多数引盐都经由连接四川南部与重庆的主干道路和水路，而这也是四川军阀这些年抢夺的地方。1916—1919年，富荣引盐数量销售相对平稳，在相对和平时期的1920年再次上升，接着在1920年代初期起起落落，1925年达到清朝覆亡以来的低点——当时占领盐场的军阀三易其手——只是在随后刘文辉的稳定统治之下才又再次上升。

247

如前所示，稽核所的材料表明，正在征收的食盐税率与清末大致相当，但官方数字显示出富荣盐场食盐销量显著下降，而且盐场有着相当大的超额生产能力。1914—1919年间，富荣年均产盐 3.19 亿斤。<sup>⑨</sup>1932年，《四川盐政史》的编纂者报告说，1914—1929年富荣盐场年均产

⑥ 陈文安：《川盐济楚始末》，45—46页。

⑦ 自贡市档案馆 17-1-214。

⑧ 1931年，富荣生产一担食盐成本为 2.5—2.8元。在犍为和大宁，成本是 4.2—4.8元，更小的盐场成本高达 7—8元。见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8，节 5，页 47b—50a。

⑨ 林振翰：《川盐纪要》，248页。

量约 4.15 亿斤。<sup>⑦</sup> 然而，同一研究将富荣 1929 年的食盐销售量估测为最多只有 3.62 亿斤。<sup>⑧</sup> 到 1929 年，当时盐税收入上升，但富荣仅能够卖出它所产食盐的 88%。1930 年初情况没有什么改善。根据张肖梅的研究，稽核所报告 1933 年富荣的食盐销售量是清朝覆亡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有 2.81 亿斤。<sup>⑨</sup>

附加税的征收反复无常，也妨碍了其他商品交易。1925 年渝盐帮公所宣布，从此停止与自流井的买卖。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很简单：在自流井缴税的商品在重庆不予承认，反之亦然。这样，商人就要缴双倍的赋税，结果商品太贵卖不出去。该行会指出，执行这种做法根本无视它对食品供应、盐场生产成本，以及商人获取利润能力的影响。在军阀主子的脚下，该行会提出了挑战：

我辈行商营业无所适从，会商全体歇业以待战事解决。如果政府双方觉悟，疏通运道，上下均不阻滞，俾井渝所售之税一律通行，一面扶助厂商复业。有盐供税，行商即可提议捆[捆]运。否则政府居心自杀，商人何苦随同牺牲？<sup>⑩</sup>

1920 年代中期的厮杀，也影响着自贡生产商所需物资的来源。最直接的表现是，对基本物资的征税阻碍了物资输入盐场。对于煤炭的加倍收税限制了自贡的燃料供应，不仅是对于炭火盐灶，而且也包括蒸汽动力机车。<sup>⑪</sup> 更为重要的是，贸易阻断，增添了自贡和东面市场运送物资和资金的危险性，这极大地提高了盐场资金和借贷的成本。

<sup>⑦</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9，节 1，页 59a。

<sup>⑧</sup> 同上书，卷 3，篇 2，章 9，节 2，页 61a—63b。

356 <sup>⑨</sup>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Q83，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 年。

<sup>⑩</sup> 自贡市档案馆 17-1-245。此信是由自贡盐务行商研究会转给商会的，告知它，大多数运输富荣食盐商号的总部都位于重庆。如果它们不送来购买富荣食盐的经费，那么它们在富荣盐场的代理人将无法工作。

<sup>⑪</sup> 事例见自贡市档案馆 17-1-507，时间是 1925 年 10 月，其中说，煤炭运商向商会求助，向它通报，来自威远县的运煤船只被军队所派的检查人员途中拦截，逼迫他们对所载货物付双倍赋税。他们拒绝，因此被迫在上游抛锚，不能驶向自流井和贡井的煤场。



清末官运商销制度下官府运输食盐,以前运盐商人将在省外销售食盐所获利润汇回省内的需求不复存在了,从而也就废除了汇兑的“一条腿”。官府向生产商支付白银,这些白银储存在当地钱庄;当购买井、灶、筑上所需的物资和食品时,则从钱庄取用铜钱。钱庄通过与供应日用品、食品的小贩和商人进行兑换,以及作为周围腹地的这些物品的代销人,获得铜钱。<sup>⑦</sup>

官运商销的终止,再次为自贡商人提供了参与批发生意的机会,并引发了盐场银行业务的暂时繁荣。然而,沿主要水路和陆路的军事行动的增多,造成了四川省内和全国性银行的倒闭,妨碍了自贡与重庆间的货币流动。1915年,中国银行和浚川源银行在自流井开办分支机构,基本上从事汇兑业务。这两家以及其他银行在1916年以前全部关张。战争也造成了许多对于提供短期商业借贷至关重要的钱庄的倒闭。1927年,裕通银行在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的控制下开业,作为赋税的存储机构,并尽可能地从汇兑中获利。<sup>⑧</sup>然而,直到1930年中期,独立的银行业务才开始在盐场恢复,自贡再一次享有了钱票发行机构的良好服务。<sup>⑨</sup>

早在1919年,商会就曾抗议过信贷和货币的紧缩。1920年1月,自流井一位绝望商人的自杀,更加剧了人们对此问题的讨论。商人们报告说,因得不到贷款,“市面恐慌,倒踏之风层见叠出”<sup>⑩</sup>。信贷紧缩,与货币供应的减少有关系。早在1911年,经由盐场的军队就开始强迫人们用金条、银条换成军用券,并禁止在市场使用硬通货或用硬通货缴税。当金条、银条从盐场流失,现有的银行不再兑换它们的钱票,钱票价值锐减。许多银行关张,停止提供商业贷款或汇兑业务。而且,各军队进出

<sup>⑦</sup> 聂无放:《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的金融业》,8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91年。

<sup>⑧</sup> 宋良曦:《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17页,载《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sup>⑨</sup>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43—D44;《自贡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金融志》,47—54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十八,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sup>⑩</sup> 自贡市档案馆 17-1-486。

盐场，他们带来新货币，禁用旧货币，而他们的新货币也将会被取代，不值什么钱。<sup>①</sup>

249 1925年，钱汇帮估计，自贡每月的现金需求有二三十万元。<sup>②</sup>如前所述，在重庆和自贡有分号的票号提供低成本服务，允许在重庆售盐或做生意的商人动用他们的户头进行采购，或是在必要时将现金汇回老家。正常情况下，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易是平衡的，保证一边的票号不会拥有比另一边过多的钱票。这样一来，汇费保持稳定，商人们很容易计算票据结算的费用。

到1920年代，这一平衡在许多方面被打破了。据四川盐务行商研究会1925年的一份报告说，四川道路危险重重，他们自己的成员以及钱汇帮的成员在自贡与重庆间运送现金十分困难。<sup>③</sup>那些需要将所挣利润从重庆汇回自贡的商人，不得不或是以实物的形式运回——但这些东西沿着不安全的生意路线难以前行，或是购买渝票。然而，盐场缺乏硬通货，渝票在自贡只能以很高的折扣兑换，在1920年代末只能拿到面值的三分之一。<sup>④</sup>

中国西部的政治不稳定，也引发了四川与上海间贸易的日益失衡，结果造成了四川与它的主要外贸物资来源地间的汇费不断增加。1911年之前，四川对于上海还有出口盈余。重庆拥有过多上海汇票意味着，1000两的上海汇票在重庆折扣至950两。<sup>⑤</sup>民国初年，持续的动荡导致四川对于上海的出口一步步下降，两地间的贸易平衡发生逆转。根据上海总税务司的报告，高赋税也阻碍了与四川的贸易，造成了云南、陕西和

---

① 同上资料，17-1-466。

② 同上资料，17-1-488。

③ 同上资料。

④ 聂无放：《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的金融业》，83页。张肖梅似乎揭示出，至少到19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下引入统一的货币之前，一直要对渝票支付这种额外费用。

⑤ 将钱票运回上海，将它们重新兑换成白银，以及将白银运回重庆的支出，这些都影响着折扣率，但折扣率也反映出重庆白银稍高些的含银量。

甘肃的出口商绕过重庆经汉江到汉口或是直达上海。<sup>⑤</sup> 结果,上海因拥有渝票过剩,1924年可以以低于票面价值许多进行购买。<sup>⑥</sup> 1929至1931年间,投机上海汇票者增多,随着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四川人几乎不可能在上海现金市场做生意。<sup>⑦</sup> 有关这一新情况对于自贡的影响,我们没有企业方面的数字。然而,由于来自上海的钢绳和机器在自贡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日增,因此,现金的升值以及自贡与上海市场的联系中断,必定会造成利润日降,自贡商人对此叫苦不迭。

表 9.5 1915 年和 1919 年基本商品的价格(铜钱:文)

250

种类	单位	1915 年价格 <sup>c</sup>	1919 年价格 <sup>c</sup>	增加(%)
银元	1 元	1 500	2 300	53
白米	1 斗	1 850	3 000	62
菜油	1 斤	140	280	100
洋油 <sup>a</sup>	1 桶	2.75	4	45
桐油	1 斤	160	320	100
煤炭	100 斤	1 000	2 000	100
猪肉	1 斤	148	340	130
牛肉	1 斤	172	300	74
粗布	1 匹	3 450	6 850	99
棉花	1 斤	645	1 600	148
推盐水牛 <sup>b</sup>	1 头(健壮)	45	75	67
胡豆 <sup>b</sup>	1 石	4	5.85	46
轿夫	工资/站	900	1 500	67
烧盐匠工	工资/月	4 000	5 000	25

a 价格单位是元;b 价格单位是两;c 给出价格区间的,取平均数。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597—60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贸易的中断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关于这一时期,我们仅有自贡零星的价格数据。从表 9.5 中可以感受到基本食品和生产物资的价格飞涨。

⑤ 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922—1931年》第1卷,“北方和长江口岸”,《海关统计系列》第6号,475页,上海,1933年。

⑥ 同上书,474页。

⑦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E22。

这里是用“文”开列出了各物品的单位价格，另注明者除外。我们仅有1932年一些物品的价格数字。根据《四川盐政史》的记载，那一年银元与铜钱的比价是1:2000。然而，米价已上涨至每斗2000文，建造卤筒、竹笕所需的重要物资桐油每斤400文。确实，在1932年，只有煤在价格上似乎是下降了，每百斤约900文，这一价格也反映出了食盐市场的萧条，气、卤生产过剩。<sup>89</sup>

最后一点，信贷紧缩最明显地表现在，制造商难以得到用于短期流转以及提高他们生产能力的资金。日益紧缩的信贷与银行的撤离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们大多数不向当地的产业贷款。如前所述，自贡大多数资本是通过出售投资股份筹集的，另外，当需要注入营运资金时，基本上是通过向股东追加得到的。然而，到1920年代，井、灶等生产性资产的所有人似乎已陷入困境：成本增加，投资资本枯竭，需要现金甚至是运营支出的工业家们，被迫求助于高息短期借款。1925年初，商会宣布延期偿付利息。然而到了6月，它再次收到了18个富荣盐灶的帮助请求：盐业困顿，食盐价格再低也被迫要贱卖，损失巨大，债务日增；借贷利息高昂；短期借贷如同饮鸩止渴，原本希望条件改善，很快能偿清债务，但事与愿违，借贷日多，偿清无望。<sup>90</sup>

没有经费煎盐，无盐可卖，就无法偿还他们的债务。灶户敦促商会向省政府请求救济。商会人员答应尽力而为，但他们回复的语气则很清楚地表明，除此他们已无计可施。

早在1922年，稽核所的一份报告就指出：“现今川盐商人富裕者日少，金钱多已流入军官之手，正可谓军官变成了富裕盐商。”<sup>91</sup>面对赋税日增、市场日益萎缩、成本持续上涨、信贷紧缩，自贡食盐生产商制定了一些生存策略。着力发挥市民作用，加强城市机构建设，这同强化商业和

<sup>89</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7，节2，页5a—5b。

<sup>90</sup> 自贡市档案馆17-1-488。

<sup>91</sup> 阿谢德：《四川的盐和军阀，1914—1922》，741页。

政治网络一样，在维持商业资产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 自贡商会

252

自贡地方议事会解散后，对于自贡商人来说，仅有一个机构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自贡商会起初是四川省商会有一个分支，四川省商会是在辛亥革命前八个月成立的，得到了清政府的同意。与地方议事会不同，它的成员都来自商业圈，因此也就毫不奇怪，井、灶、筑业主的代表在其中占主导地位。<sup>⑫</sup> 自贡商会像议事会一样，也是以东场和西场的名义进行活动，作为一个机构继续代表贡井和自流井。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中，商会的角色并不明确。由同一座城市中的各同业公会选举出的代表组成，从名称上看，它们是精英的机构。商会从来不是自治的，1930 年代，它们日益受控于国民党的“分而治之”方针。<sup>⑬</sup> 然而，作为民国时期唯一的广义上非官方的代表机构，商会在保护商人圈利益时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

自贡市商会的组织结构相对简单。除了各行会的代表外，商会有会长和副会长各一人，一常务委员会，四个处：会计、商务、文牍和公断。<sup>⑭</sup> 在民国成立到国民党在四川确立统治的 20 年间，正是商会在商人圈与军阀赋税征收者的种种要求间尽力斡旋。商会负责当地赈济，通过它们的商团维持社会秩序。也正是商会——尽管只是部分成功——成为自

<sup>⑫</sup> 议事会的成员有些出现在商会早期的名单中，尤其是王家有影响成员，包括王余霖、王余淮、王作甘、王和甫。自贡市档案馆 17-1-196 和 17-1-20。

<sup>⑬</sup> 令人奇怪的是，少有对于 20 世纪初中国城市商会作用的研究，尽管一些城市已开始出版商会资料。对于该问题的概述，见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全大伟是最早用英文写到商会活动的学者之一。见全大伟《北京人力车》，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 年。也见张晓波《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商会的积极活动，1904—1928》，博士学位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95 年。

<sup>⑭</sup> 佚名：《商会的沿革》（抄本）。公断处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部门，有 12 位仲裁人员和两位调查人员。

357

贡食盐生产商的代言人,坚持不懈地向中国的盐业管理机构表达心声。商会的成员没有薪水,它的总预算从未超过 10 000 元。<sup>95</sup> 然而,作为商会的会长或公断处的成员,能以自己的权威影响商人间的谈判或诉讼结果。故而在相当狭窄的自贡政治空间中,在商会内部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具有相当声望以及有时获得实权的一个途径。<sup>96</sup>

253 商会的公断处影响最大。个人和商号可以直接向该处提交案件;也可以通过民事法庭和政府机构将案件转交该处。<sup>97</sup> 一些案件直接涉及合同纠纷比如租约到期未能腾空盐井,而这些案件本应在法庭上处理的。然而,该处在更为复杂的案件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尤其是那些涉及习惯法解释、同业公会间的关系以及有着大量债权人的破产的案件。例如 1912 年,公断处反对一位合伙人在未与其他合伙人商量的情况下处置盐井财产,指出这未能遵守股东间应有的办事程序。<sup>98</sup> 1932 年初,它解决了酒食业同业公会和油麻烟业同业公会两家都有的烟酒执照税缴付的责任分割纠纷。<sup>99</sup>

1932 年提交公断处的约 58 案件中,至少有 12 件涉及债务,它们请求该处协助制定偿付方案。<sup>100</sup> 该处仲裁的最有名的债务人和债权人纠纷案是那些有关王仲甫的仲兴祥公司、李四友堂和王三畏堂的案件。仲兴祥案办理过程中的一份声明,提供了解决这类案件所遵循的详尽办事程序,这肯定是在商人圈间盛行的,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已谙熟此道:

---

<sup>95</sup> 自贡市档案馆 17-1-500。从 1935 年的章程可以看出,当时商会的行政支出是通过各成员行会单位缴纳的固定会费筹措的。为资助特定的项目,商会各成员就是否进行特别费用的加征进行投票。自贡市档案馆 17-1-20。

<sup>96</sup> 占据商会高位的人中包括范容光、李敬才、王和甫、胡铁华、王兴儒、侯策名、熊佐舟。见自贡市档案馆 17-1-22,17-1-234,17-1-19;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87 页。

<sup>97</sup> 对于公断处的细致讨论,见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载黄宗智、白凯编《清朝与民国时期的民法》,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 年。

<sup>98</sup> 自贡市档案馆 17-1-472。

<sup>99</sup> 同上资料,17-1-21。

<sup>100</sup> 同上资料,17-1-27。

查仲兴祥债务，前经召集众债权人公开会议表决，债务应分等差并推举债权人代表参加审查会议，审核分等。随于本月四日九日叠次开会研讨等差，拟定官款与最近之水价盐价并孤苦按月支息以及最近往来薪工等项为甲等，短期借贷与近年往来为乙等，长期借贷与远年来往为丙、丁等各在卷。惟查此项等级，虽经试行拟定分别列表，系按登记表册从事考查，究竟各债之性质、事实是否符合，而债权人中是否有无特殊情况提出异议，似非逐一征求意见不能确定。<sup>⑩</sup>

一旦完成了这一程序，该处宣布它将召开另外两次会议，接下来就编制一个清单，将所有的债务排序。通知所有与仲兴祥有关系的债权人在中午前出席其中的一次会议，以核对清单的准确性和他们在偿付方案中的位置。如果没有异议，他们就在已排序的债务清单中他们的名字旁签字。若不同意这一清单的，可以在名字旁写不同意字样，接下来会讨论他的问题。如果还有任何未决事宜，商会将召开一次公开的会议，解决这些问题。如前所述，在这一案件中，该处的程序运行良好，所有仲兴祥的债务在一年内得以偿清。然而，一些问题，其中就有王三畏堂所欠渝沙债团的债务案，就花费了商会数年时间。

254

有关商会作为国家与商业圈间调解者角色的记录，可以说既始终如一却也内容驳杂。中国各地商会感觉到它们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国家视之为便利机构，运用各种手段通过它们施加要求。我们已经看到了四川军阀利用商会为他们的军队筹集商人的捐献，以及约束商会的成员。<sup>⑪</sup>然而，商会及其成员的地位也得到反对这些要求的强有力支持，如同它们抵制附加税和征收“旧官运局经费”所做的那样。

尽管商会愿意冲锋在前，至少是以口水战去应对四川的统治者，但它们鲜有力量来改变对富荣盐场有影响的条件。1928年新的国民党中央

<sup>⑩</sup> 同上资料，17-1-25。

<sup>⑪</sup> 例如，因熊佐舟价格欺诈，1925年刘文辉的第九军司令部令商会向他征收罚款。同上资料，17-1-434。

中央政府与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联合,下令重组市商会,选举新的成员,从中可以看出其成员屈从外界权力意志的程度。在这一新体制下,商会选举了 25 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从中又选出了一个更小的常务委员会。后者的成员也被任命为商会各新部门的负责人,这些是教育、宣传、组织、公断、会计、总务等处。商会的内部权力结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1929 年,李敬才当选新的自贡市商会会长,在他的常委会中有权势人物王和甫和胡铁华。<sup>⑩</sup>

255 1930 年,国民党颁布了新的《商会法》和《工商业同业公会法》,要求此前所有的行会重组并作为同业公会重新登记。同业公会,还有一些个体商铺,成为了新商会的成员。许多行会在起草规章以及将自己转变为现代的同业公会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事实上推迟了新商会的成立。1930 年新同业公会的名单,包括东场灶商引盐业同业公会、东场井商同业公会、东场垣商同业公会、东场炭盐业同业公会、东场票盐同业公会、西场井商同业公会、西场灶商引盐业同业公会、西场票盐灶商同业公会、西场垣商同业公会、脚当业同业公会、钱业同业公会、苏广丝绸业同业公会、高铜炭业同业公会、油麻烟业同业公会、药材业同业公会、屠业同业公会、酱园山货业同业公会、质当业同业公会,等等。<sup>⑪</sup> 这些组织的新当选代表中有人们熟悉的名字:熊佐周、罗华垓、侯策名、胡铁华、李云湘(后来成为商会的负责人,在公断处占有位置)、诸子言(来自江津县有权势的批发商)、倪敬先(著名的银行家,侯策名的拜把兄弟)、颜宪阳和颜心畲(来自颜桂馨堂)。最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作为银行家、钱庄、票号代表的组织不见了身影,它们全都在 1920 年代被摧毁了。

在 1930 年代的震荡中,世纪交替时期的老牌精英的影响似乎已被打破。李敬才被赶下了台,尽管胡铁华还是商业圈的代表,但影响力削

<sup>⑩</sup> 同上资料,17-1-23 和 17-1-82。

<sup>⑪</sup> 同上资料,17-1-20。



减了许多。1931年初，新就职的商会代表的声明，反思了商会所面对的政治上的混乱，哀叹旧商会无所作为，只是一个纠纷调解机构，是为政府筹集金钱和劳役的代理人而已。商会的成员发誓，要改善城市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以及数十万城市居民的条件，要与国民政府一道，努力消除腐败并剔除那些缺乏真正使命感的成员。<sup>⑩</sup> 尽管他们表现出对国民党的效忠以及与国民党的言论保持一致，但1932年12月他们接到府和省的命令，要在年底之前重新选举一半成员。在新商会中，余述怀等有前途的商人占得席位，侯熊罗罗集团中的侯策名当选为会长。<sup>⑪</sup>

256

## 产业战与盐场的衰落

国民党重组自贡市商会，是南京新政权管理市民社会的组织机构、从各军阀政权手中抢夺对市民事务控制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统治着中国才勉强做到了这一点。这也表达了国民党将劳工和商业各层改革者中共产党的一切势力排挤出去的野心。然而，自贡正日益成为了国民党和它的军阀竞争者的可怜争夺品。萎靡的市场和少数盐岩井在生产上占主导地位，对于生产商及其劳动力都意味着经济上的大灾难。非工人的行会重组成为同业公会，这一过程告诉了我们盐场的环境，在组织形式上标志着自流井与贡井间、生产商与批发商间、井户与灶户间利益的日趋分裂。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制造商和工人都与新的经济环境进行斗争，这表明了自贡经济的急速衰退。

## 盐卤大过剩

食盐井户和灶户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应付1920年代、被后来评论者所称的“盐卤大过剩”。1850年以降，富荣第一次出现了卤水过剩，若

<sup>⑩</sup> 同上资料，17-1-28。

<sup>⑪</sup> 同上资料，17-1-81。

都煎成盐则无利可图。卤水过剩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如前所述,由于使用蒸汽机车,盐岩井的发展所释放出的生产力所带来的巨量增产。这些井生产效率极高,加之较早的黄卤井和黑卤井的枯竭,都使得在产的盐井数量减少。然而,盐井数目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卤水生产能力的降低。1920年代初的破产,是食盐需求日益减少以及通货膨胀和借贷的高支出所带来的成本不断上涨造成的。富荣盐场衰落的真正指示器,是在产的盐锅数目日益减少,而不是在产的盐井数目。据记载,1916年的盐锅是10 329口,而1929年则仅有8 055口。<sup>⑩</sup>

257 生产过剩和需求下降,导致了卤水价格下降,甚至是在基本生产资  
料和食品的价格上涨的时候。工人们感觉到工资跟不上通货膨胀,但大部分工人工作时仍有伙食提供,这意味着上涨的米价也影响了生产成本。卤水价格是由卤水咸度、运输至灶的成本以及煎盐通常所需支出所决定的。1910年代卤水的价格在每担0.6—0.8元之间波动,1922年的第一个销售阶段最高达到0.82两,而在第二个销售阶段降至0.7元。到1923年,用0.624两就可以得到一担卤水。<sup>⑪</sup>在1924年,卤水市场降至最低点。官方引用的价格全年都是0.69两。但陈仲宣的威海井和吴宗汉的盐井出售的卤水每担低至0.33两。两人都被迫停产,因为这一价格不足以抵补生产成本。根据赖明钦等的考察记述,一些井接受的价格低至每担0.2两,是两年前的1/3。到1925年,卤水平均价格稳定在每担0.472两左右。然而,有一些井用他们的卤水交换桐油、麻、大米,甚至是已毁坏的盐锅的铁。<sup>⑫</sup>为了提升他们卤水的咸度,卖出好价,一些井使用黄卤和黑卤灌注他们的盐岩井。<sup>⑬</sup>

在新的政治和市场环境下为生存而斗争,加剧了产业内部的紧张关

<sup>⑩</sup> 林振翰:《川盐纪要》,214—215页。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8,页85a。

<sup>⑪</sup>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35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

<sup>⑫</sup> 同上文,14页。

<sup>⑬</sup> 杨笃行等:《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148—14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系。我们已经看到，机械化汲卤的新技术创造出了盐业中的一种新参与者：机车的所有一操作人。他们中许多人与灶有联系，这样，在卤水生产商与食盐生产商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划分。这一划分表现在：盐场出现新的市民组织，贡井和自流井出现生产者的专门组织，贡井气井很集中，而自流井则有着大量的盐卤井。1926年，新一代的食盐生产商范容光——他是使用蒸汽机车的先行者，尝试将盐岩卤井户聚合在一起，集体出售他们的卤水，以加强他们与富荣灶户讨价还价的能力。他最初的努力并不成功，在发起参与者加入他的同盛和同涌井两个月后，他放弃了。1927年再次实施这种想法，这次颜心奋、颜宪阳兄弟得到王和甫的支持，王和甫是有影响的井、灶户和主要的盐岩井渡水公司的负责人。他们一起建立了盐岩井办事处。加入该组织的盐户同意集体出售他们的卤水。王和甫任经理，颜宪阳予以协助。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安排与灶户的合同，保证他们的卤水有市场以及一个合理的价格。与此同时，他们鼓励自愿减产以抬升价格，盐灶为得到煎盐所需卤水就不得不照数付钱。<sup>⑩</sup>

258

盐岩井办事处存在了近三年。在这期间，加入这一计划的井户可以得到每担七角（合白银五钱）左右的均价。另外，办事处从实力雄厚的重庆信贷机构签约得到借款，然后再将资金贷给那些有财务困难却很难有经费来源的成员井。最后两个互相联系的因素导致了首次盐井合作营销努力的失败。第一，生产能力较弱的井不履行借款责任，从而将还贷推给了整个集体，这使得内部关系相当紧张。第二，高产的以及拥有卤井和灶的企业所有人对限产反感。张筱坡、王和甫等人在整个集体行动期间继续独立销售自己的卤水。

那些生产经不起降价的卤水生产商，求助于盐场另一位新的精英领袖李敬才。前面已提到过，李敬才，同王和甫一样，都是过渡时期的领

<sup>⑩</sup>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14页。

袖人物。李敬才是王和甫、胡铁华的至友,但他的影响多是来自他同军阀的关系。张富安是与他关系最近的军阀,当时控制着富顺县。在张富安的协助下,李敬才能够赢得四川盐政负责人的支持。他们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盐岩井加入新的盐岩井采卤公司。<sup>⑭</sup>

盐岩井采卤公司是作为一个卡特尔开展工作的。各成员井继续独立生产,以采卤公司组建之时的产量为基础,决定在公司内的份额。该公司设立生产上限,建立了一套轮流汲卤制度以限制整个产量。然后由公司汇集卤水进行销售,公司也安排井的合作灌注,以降低生产成本。每眼井依份额分得利润作为红利,同时向那些继续汲卤的井额外支付款项。<sup>⑮</sup>

并非盐场的每个人都满意这种安排。轮流汲卤导致了大量盐井工人失业,这是盐场工人骚乱时间延长的一个原因。<sup>⑯</sup>这一企业联盟的活动也侵蚀了盐户、灶户和通过签约用机车进行汲卤即包推户的利润。渝沙债团在盐场的大多数资产在盐灶上,若盐岩井采卤公司继续控制盐岩  
259 卤水市场的话,它也将损失很大。<sup>⑰</sup>王和甫的财富基本上在气井、灶及机车上,而胡铁华拥有大量气井资产,因此二人也反对该公司。这些强势的盐灶利益相关者支持中小规模灶户——包括罗筱元、杨筱舫(范容光的同德祥号成员)、陈戒于(侯策名的一位掌柜)、王绩良——的联合反对立场。由罗筱元领导的这一阵线,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写信、发电报给

---

<sup>⑭</sup> 同上文;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3页;1989年5月我和王怀周(82岁)等人的谈话。

<sup>⑮</sup>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201页。在大坟堡盐岩井的总体看法上,王怀周将盐井区分了两种,一种是加入该公司、参与轮流汲卤的盐井,另一种是那些参入了但停止汲卤,只是得到分红的盐井。王怀周:《大坟堡盐岩井史料》,126—131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

358 <sup>⑯</sup>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50—51页。

<sup>⑰</sup>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4页;罗筱元:《罗筱元自述》,22页(手稿),自贡市档案馆藏。

地方和中央各级政府以及各级头面人物，进行联系。<sup>①⑥</sup>他们也行动起来，破坏该卡特尔存在的基本前提条件：对卤水供应的控制。以他们新组建的均益团体的名义，各成员盐灶集体与中小规模生产的盐井缔结三年期合约，对于已商定的盐卤，承诺最低每担五角二分的购买价格。

与均益团体签约的盐井有牛集成的江流井、王用之的如海井、王慕陶（王和甫的侄子）的汇源井。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对盐岩采卤公司的市场控制构不成威胁。然而，当有影响的颜桂馨堂的颜伯师——他也是自贡最有影响的包推户之一，决定将他的高产同川井直接卖给均益团体时，李敬才集合了他所有的政治资源予以阻止。颜伯师因违反了所有盐岩井都要加入采卤公司的命令，被投入监狱。发布了一道针对颜伯师汲卤企业的命令，禁止他从事采卤业，免得他的企业从他人井中推汲卤水。对李敬才来说，不走运的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所依靠的军阀派别被那些与盐灶集团有关系的派别击败。李敬才得到了驻防富顺的旅长张志芳的支持，而均益团体则有刘润卿的支持，刘润卿是渝沙债团在王三畏堂的监督，是川南警备司令蔡玉龙的密友。<sup>①⑦</sup>在收到了均益团体的请求后，蔡玉龙下令释放颜伯师，恢复他的汲卤生意；在发电报征得上司的同意后，蔡玉龙解散了盐岩井采卤公司。<sup>①⑧</sup>为了维持盐卤生产商的生计，蔡玉龙也制定了所有卤水购买每担五角二分的底价，达到了由盐灶代表所签订合同的要求。<sup>①⑨</sup>

与盐岩井采卤公司的斗争，是数位自贡商人职业生涯的决定性转折点。在1929年之前，罗筱元仅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为谋求生存而进行斗争的众多灶户中的一个。与李敬才的斗争为他赢得了声望，他很快就成为盐场的头面人物，这似乎也促成了他后来生意成功、发财致富。盐岩

260

<sup>①⑥</sup> 黎雷：《罗筱元旧事》，43页，载《自流井》1983年第1期。

<sup>①⑦</sup>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15页。

<sup>①⑧</sup>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3页。

<sup>①⑨</sup>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12页。

井采卤公司事件也为其他参与者带来了好处。王用之,此前一直是较小的盐业资产投资者,但不久就被选入市商会,与胡铁华有了联系,接着又击败胡铁华在执委中占有一席之地。<sup>⑭</sup> 廖树卿作为投资人似乎在1930年提升了地位,而陈戒于在重组后的商会中占据了一定位置。<sup>⑮</sup>

尽管灶户的命运得以改变,但他们很快就被迫面对这样的事实:没有一定形式的价格控制,卤水生产行将崩溃,他们自己的财富也将深受其害。1929年8月,在卤井利益相关集团的要求下,新上任的四川盐运使郭昌明同意前往自贡调查盐井情况。结束视察后,他公布了一个方案,井户、灶户都被组织进入营销合作团体,以应对市场衰落和高生产能力的冲击。

为取代盐岩井采卤公司,郭昌明授权组织一个新的“盐岩公司”。要求所有的盐井都要加入,以公司成立时的产量为基础,得到公司的份额。为了尽可能廉价地生产食盐,月产少于8000担的大灰子井和月产少于5000担的小灰子井都要停产,为此,公司每月固定付给这些股东100元以维系企业的生存。对于那些产量超过这一数额的盐井的超产部分,每1000担额外给200元。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承担汲卤支出。只有盐岩公司负责盐场生产盐卤的营销。在扣除生产成本后,除每月按标准向每眼井付款之外,任何额外的利润都要在成员间根据它们的份额进行分配。与此相应的管理盐灶煎盐活动的组织是自流井制盐公司,以罗筱元为首。只有该公司有权从各井购卤。如此一来,盐场将会势力均衡。盐政官员要求卤水价格要与食盐市场价格挂钩,但该公司决定要购买多少卤水,因此也就决定了有多少井可以继续生产。<sup>⑯</sup>

<sup>⑭</sup> 自贡市档案馆17-1-81(1932年)。

<sup>⑮</sup> 王柔德:《解放前自贡盐商的封建性》,23页,载《井盐史通讯》第10期,1983年。自贡市档案馆17-1-20和17-1-81。

<sup>⑯</sup>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2,页71b;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21页;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94页。

自贡食盐生产商在 1920 年代末所面临的问题，与同一时期其他地方的冶炼和酿造制造商在发展他们的产业时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引进新的、只是简单改进的生产技术，致使产量急速上升，这常常使价格陡降。1870 年代，美国最大石油提炼商美孚石油公司，试图创立一个卡特尔，为控制价格，加盟的石油提炼商将削减产量。这一初创的全国炼油协会失败了，主要是它没有激励机制，那些选择要利用由于自愿限产所带来价格上涨的有利条件的石油提炼商放不开手脚。小规模石油提炼商们最终达成合作，是由于向这些加入美孚石油卡特尔的提炼商提供了降价的区域铁路运费。另外，洛克菲勒及同仁在新的美孚集团中购买相当规模的、以前竞争者的资产，确保他们对成员企业的有效控制。<sup>⑬</sup>

在盐岩公司中，没有购买对手股份的情况。相反，有着对盐井进行补偿的激励，依盐井停产的不同情况进行予以偿付，这与美国农民在高产的土地上没有种植粮食获得补偿差不多。对于有着完全生产能力的盐井，因其不生产，每年支付它 600 元。对于那些还需额外投入才能进行生产的盐井，支付 600 元的一半。对于低产但有机器等设备投资，从而本可以在对卤水有更大需求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井户，每年为它的停产给予 100 元的补偿。从理论上讲，这一份额与津贴制度，将允许拥有盐井的同业者对他们的已有资源进行最高效、最具成本收益的利用。

在盐岩公司成立后不久，井户间的冲突就威胁到了它的生存。斗争的主要根源，在于判定盐井生产低效的标准。产量是建立在 1929 年冬天所进行的考察以及察看盐井自己保存的生产记录的基础之上的。二者都不能精确地反映一眼井的真实产量。因为就盐岩井本身来说没有卤水，因此在什么季节灌注，是决定产量的一个重要

<sup>⑬</sup> 阿尔弗雷德·D.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的管理革命》，320—322 页，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77 年。

因素。测算是在冬天进行的,当时自贡的水位很低,这引起了许多将他们的井判定为标准以下的井户们的不满。包括李敬才在内的另一些井户认为,盐井保存的记录不能作为判定产量的一个标准,因为为了应对低价格和高生产成本,盐井产量业已削减过。许多井户坚持更高的  
262 的给付标准以反映他们所拥有的真正的正常产量。与此同时,那些被确定停产的井户担心,如果不使用的话,他们的盐井会坍塌,设备会生锈。如果盐岩公司破产或是因需求的增长不再需要限产的话,他们将没有津贴或是可以汲卤的盐井。<sup>⑭</sup>而且,在这一新的制度下,要防止既有井又有灶的大生产商规避盐岩公司的限制煎烧自己的卤水,进而从其纵向一体化投资中获利。<sup>⑮</sup>

反对新制度的井户开始是向盐运使,接着是向位于北平的负责监管全国盐政的财政部状告盐岩公司。最后,选择性的汲卤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一种轮流生产方案,包括了许多低效的盐井在内。公司的名字改为新区盐岩井采卤公司。它的章程经盐运使批准,于1930年5月生效。<sup>⑯</sup>

## 1928年大罢工

富荣盐场的机械化,以机器取代了牛只。黄卤井、黑卤井到更高产的盐岩井的发展,减少了盐井工人的数量,这主要是因为正在产的盐井数目减少造成的。当井户、灶户极力设法削减供应而不使自己的成员破产,盐井所雇用工人的数量将继续下降。我们已计算过,在清末50多万

<sup>⑭</sup> 在类似于盐卤大过剩前所实行的包推情况下,那些不汲卤的盐井也要失去汲卤收益。见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21—22页。挑战他们定价的例子,见自贡市档案馆1-1-203。

<sup>⑮</sup> 侯策名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向四川盐务衙门起诉盐岩井公司,声称定价做法妨碍了他从自己的溱江井得到卤水。他铤办该井投资了50000元,上一年夏天维护又花去10000元。自贡市档案馆3-5-501。

<sup>⑯</sup>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22页。



人直接受雇于盐场，而1931年的劳工统计表明，各种岗位上只有215 661人。<sup>⑳</sup>《中国日报》报道，1931年自贡的失业人数超过30万。<sup>㉑</sup>然而，盐业生产主要还是依靠人力：开凿或维护井、笕、灶，操作机车，以及煎烧、装包和运输食盐。工资占据了运营成本的很大部分，是制造商决算表中的一项，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的一项。随着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工人失业人数的增加，如何应对盐场的劳工变成了挑战，等同于要挡开自己敌对的井、灶的要求。

如前所述，富荣盐场熟练工人从19世纪就组织了起来，工人为更高的工资进行了多次行动，是1928年不满总爆发的预演。1915年，三个县的箠索工人联合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这次似乎以工人的胜利告终。这些巧圣会的成员为提高工资，在1915年到1923年间至少停工两次，迫使那些向富荣盐场供应物资的工厂让步。<sup>㉒</sup>1917年，烧盐工人罢工，他们高度排他性的工人帮会是现有19世纪工人帮会中最有势力者之一，结果，这种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提高了20%。<sup>㉓</sup>

263

这些劳动纠纷，每一次最终都是通过工人的帮会与商会之间的谈判解决的。尽管工人帮会在商会没有代表，但他们常常被邀请参加解决劳

⑳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10，节7，页82a—86b。当时的失业完全是地方因素造成的。1932年之前，不论是自贡还是整个中国都没受大萧条的影响。中国，作为唯一一个货币以白银为后盾的大国，在大萧条的头些年得益于货币贬值，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外国商品，并增加对外投资。日本1931年对东北和1932年初对上海的进攻，加之英国和日本放弃银本位，终结了中国短暂的繁荣。1934年美国决定人为地高价购买白银，将中国推至更深的萧条中。

㉑ 引自张学君《辛亥革命与自贡盐业》，16页。

㉒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2—3、12页。

㉓ 同上书。这一帮会继续对于盐灶的人员雇用有着相当大的控制权力。见第五章对它早期历史的描述。根据岗笕商号1917年的一份报告，每一个从事烧盐工作的工人被要求向该会登记注册。注册费和年费使得该会成为盐场最富有的帮会之一。进入该会，平常的烧盐工人缴纳8—14串以上铜钱作会费。盐灶的坐灶缴纳20串，甚至更多。此外，每个成员每年捐两次香钱，1917年时是一年960文。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8页。根据表9.5，尽管烧盐工人是自贡工人中最具有组织性的，但他们的工资1916—1919年间仅提高了25%，而最主要商品的价格上涨了50%。

359

动纠纷的会议。1927年6月,45名凿井工人请求商会代表他们进行调解,从这一点显然可以看出,人们还是对富有成效的对话抱有希望。他们一开始就指出商品价格上涨,制造商所定的盐价近些年来也上涨,但是他们的工资则长期没有提高。工人以最恭敬的语言陈述他们的情况,说道:“央求贵会发展宽仁厚德,准祈与劳民微添工价,以度民等家中父老妻儿之生活。”<sup>⑬</sup>

在他们信件下面的批注中,商会文书承认他们价格上涨的说法是准确的,并将请愿信转交商会大会讨论。<sup>⑭</sup>然而,井商商会拒绝了工人们的要求,认为工人在该年早些时候罢过工,工资已得到充分的提高。而且,他们也认可凿井工人的说法,即盐场其他工人,包括煮盐工人和篾索工人,工资都得到了提高,以应付基本商品价格的不断涨价。<sup>⑮</sup>

凿井工人背后没有强大的组织,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感觉自己所得落后于其他工人。然而,凿井工人的罢工发展成为持续近两个月的大罢工,这只能解释为盐场条件的整体衰落。尽管食盐生产商从没有自愿地对他们的工人施以慷慨,但我们可查的所有工人行动事件,都在数星期之内在商会的主持下得到了解决。而且,自贡市档案馆和自贡市总工会所藏材料证实,早期由强势的工人组织所采取、要求提高工资的行动,一般都带来了工资普遍性的提高,以应对通货膨胀。然而这在264 1927年和1928年没有发生。富荣食盐销售在1925年和1928年急速下滑。前面已提到,面对盐卤市场的日益衰落,到1927年初,食盐生产商合并他们的资源,以维持盐价。受日益崩溃的信贷市场和军阀持续性的收税压力驱动,食盐生产商也尽力维持工资水平不变。1927年8月,包推户也参入了凿井工人的行动。到了1928年新年,人力车夫也参入了进来。

<sup>⑬</sup>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14页。

<sup>⑭</sup> 同上书,15页。

<sup>⑮</sup> 同上书,16页。

根据接触过自贡党务档案的陈然记述，这次罢工从富荣盐场最弱势的工人开始，后来大多数工人都参与进来，这归功于这一短暂时期共产党在盐场的积极活动。<sup>⑬</sup> 共产党没有提供负责人和专门的组织人员，但物价上涨、失业以及受到围攻的食盐生产商突然的不妥协态度，这些一并带来的窘境，为一场危机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参加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的。在 1928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自贡没有什么影响。根据《中央自贡地下党组织概况》记载，早期的联系只是限于党内人士短期前往自贡，包括 1924 年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26 年，共产党重庆地委派刘远翔和廖恩波前往自贡建立自流井特别支部。<sup>⑭</sup> 他们二人与工人领袖取得联系，当与井户的谈判破裂时，他们与罢工工人站在一起。然而，共产党支部似乎也经受着同样的抑制，这就是国民党右派在北伐期间，为了巩固它对于脆弱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控制，打击其他左派组织。<sup>⑮</sup> 国民党内部的蒋介石派别与四川军阀政府联系，1927 年年初对于该省共产党活动的打击，致使四川规模很小的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

是什么事件引发了这次大罢工还不清楚。我们没有 1928 年 1 月以前劳资双方谈判的材料。1 月 30 日，财神会——这是盐场卤笕工人的联合组织——的成员向商会报告，盐井工人帮会的领导与一位姓刘的人（极可能是共产党员刘远翔）见面，计划在 2 月中旬举行罢工。<sup>⑯</sup> 2 月，工人发布九项要求，包括释放被捕工人领袖；支付罢工中受伤工人的治疗

<sup>⑬</sup> 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载彭久松、陈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四川井盐史论丛》，258 页。

<sup>⑭</sup> 中共自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自贡地下党组织概况》，1 页，自贡：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1995 年。感谢李丹柯提醒我注意这一著作。

<sup>⑮</sup>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们有着打倒军阀统治中国的共同目标。对于国共合作及在 1927 年失败的全面研究，见韦慕庭《国民革命：从广东到南京，1923—1928》，载费正清、崔瑞德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尤其是 614—639 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 年。

<sup>⑯</sup> 自贡市机械电子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市机械工业志》，19—20 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二十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65 费用；支付被管理方叫停工作工人的工资、食物和治疗费用；为不同类别的工人增加特别工资；补偿所有被解雇工人因罢工的损失并重新安排工作。<sup>⑬</sup>

最初是帮会为了提高工资的罢工，到2月已表现为由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有着更广泛诉求的行动。在与这次罢工有关的文献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富荣盐业工人的一个广泛联合组织——总工会。写有“打倒白色恐怖政策”、“打倒一切资本家和大地主”、“打倒封建的大小军阀”、“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等激烈言辞的传单，都是由一个自称“少年工作团”的组织书写的，这个组织被派作纠察队员。<sup>⑭</sup> 鼓励工人们要将自己视作更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对这次运动的重要意义，共产党追溯到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sup>⑮</sup> 共产党的领导层援助盐井的老工人和人力车夫，他们是在新年前后加入罢工队伍的，以扩大罢工的支持面，罢工至少赢得了店员、当兵的及其他工人团体的同情。党通过鼓舞工人的斗志，将罢工进行下去。

这次罢工，显然令自贡食盐生产商焦虑不安。井户中有国民党重要成员张筱坡，他的请求和警告，反映出了井户对他们的工人复工的绝望，以及看到共产党在其中组织的前景所感到的恐慌。作为国民党党员，张筱坡以前去过国民党左派总部所在地武汉，亲身了解了加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工人们配合北伐的罢工风潮中的情况。2月初，他与工人见面，告诉他们：

各行工友都兴高采烈的今日罢工，明日游行，好不热闹已极。殊不知，发生清党运动。政府明令遍处驱逐共党，各行工人尽都倒霉，约计两湖杀死共党总作万千计，即是工友居多数。你们不信，试

---

<sup>⑬</sup> 同上书，20页。

<sup>⑭</sup> 同上书，21—22页。

<sup>⑮</sup> 对于五卅运动的简要讨论及该运动在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中间传播国共合作的作用，见韦慕庭《中国的国民革命，1923—1928》，21—23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

问一问工程师中湖北人，就知道了鄙人不是说谎的。

张筱坡还试图分化盐场工人，警告他们，如果在盐井停工，将造成其他工资更低的工人失业。张筱坡没有对工人好言相劝而是威逼，他代表所有的井户指出，不乏失业的人们愿意从事罢工者的工作。<sup>⑭</sup>

尽管当地军警很同情工人的困境，但他们也只能向工人发出警告，要通过商会和谈解决问题。<sup>⑮</sup>

川南警备司令关心的是，没有食盐生产就没有税收。他威胁，如果工人不复工，就将采取军事行动。<sup>⑯</sup>井、灶等业主和商会宣称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坚持认为工人们的要求超出了合理范围，要归罪于外来的煽动者，通过军事行动抓捕他们是最重要的事情。<sup>⑰</sup> 266

整个2月，工人、商会与井、灶等业主以及驻军间的声明往来不断。工人们坚持他们的要求；商会与井、灶等业主威胁要开除所有不复工的工人；而驻军则威胁，如果继续罢工就要采取军事行动。在大罢工开始差不多一个月后，商会声明，收到工人的一个匿名方案，要求谈判解决他们的要求。商会宣布无法回复一个不具名的写信人，它向工人帮会发出派代表前来商会的邀请。来自盐运使的压力也可能加速了问题的解决。<sup>⑱</sup>

到2月底，增加工资的方案出台，同时还有一补充规定，即若物价下降，工资也要下降。<sup>⑲</sup>直到3月底，所有的工人才复工。一些在罢工数月间没有工资的工人，从自己的家庭寻求帮助。有指责说共产党的活动造成了这么长时间的罢工，此后数月一直对其采取军事行动，此时共产党

<sup>⑭</sup>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23—24页。

<sup>⑮</sup> 同上书，29页。

<sup>⑯</sup> 同上书，30—31页。

<sup>⑰</sup> 同上书，32—33页。

<sup>⑱</sup> 同上书，36—37页。

<sup>⑲</sup> 同上书，40页。

遭受人员损失，工人的支持也减少了。<sup>⑭</sup>

## 抗战前夕的自贡

轮流汲卤的做法，到1937年中国东部沦陷于日军之手之前一直实行着。开始约有40眼大、小灰子井加入。每眼井的设备和产量不一样，根据每眼井所做贡献，每月进行利润分配。在很短的时间内，15眼大灰子井由于盐井内壁薄弱或是卤水咸度降低而自动关张。之后不久，小灰子井也停止了汲卤。每月固定有45000元用于支持不生产的盐井，每眼井每月得到200—500元。最后实际上只有14眼大灰子井在生产。这些井被分为两组，轮流汲卤，一次两个月。多数盐井的投资者中，有我们前面考察过的汲卤商人精英的上层人物。<sup>⑮</sup>

盐井持续性的衰退造成劳工动荡不安，这一问题一再发生。1929年一眼井的解雇纠纷引发了大坟堡工人的大罢工。与一年前的罢工不同，这次行动工人没有什么收获。川南警备司令部逮捕了21名工人代表，《国民公报》报道：<sup>⑯</sup>

刻各井虽已为武力强迫虽已复工，但罢工后离去之工人尚有多数未返井，前途未可乐观。至被捕工人代表二十一人，现尚拘禁于

<sup>⑭</sup> 罢工开始时，中国共产党自贡特别支部有40名党员，罢工结束时仅剩10人。共产党称工人变节，但也承认自己未能在工人或周围的农民中间进行足够的准备工作。中共自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自贡地下党组织概况》，7页；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42—44页。在这方面，自贡的党组织与这一时期渗透到工人中的组织、酝酿革命的其他党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

<sup>⑮</sup> 这些是双福井（颜宪阳）、煜生井（最初归王问陶所有）、多福井（颜宪阳）、裕福井（范容光租给张开铭）、裕隆井（范容光租给张开铭）、荣流井、裕海井（范容光）、富海井（范容光）、聚元井（王和甫）、汇元井（仲兴祥长房王慕陶租给侯策名）、三泰井（邹伟仁，由熊佐周包推）、江流井、庆余井、润咸井。见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23页；王怀周《大坟堡盐岩井史料》，126—130页。

<sup>⑯</sup>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123—124页。

牛屎[氏]巷朱营长营部内。闻曾经严厉[厉]拷问，有数人确系知识分子，并非工人云。现工人对被捕者，请求完全释放，不达目的不止。至于官方则主张严办，不知如何解决云。

该报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工人与井户会谈后，工人同意只要盐场条件得到改善，就可以不增加工资。但此后，当伙食价格上升、雇主的利润下降时，盐场每年都有罢工行动。

抗日战争中止了自贡经济的衰退。到1937年富荣盐场只有170眼井开工生产，许多都是间歇性汲卤，生产大约15万吨卤水，而1925年仅大坟堡的产量就超过了20.2万吨。<sup>⑮</sup>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国东部，这对于富荣食盐生产商的影响，和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太平天国对他们先辈的影响一样。到1939年7月，日本已占领了中国东部所有的主要产盐区，自贡因此成了保证中国其他地区民众不必“淡食”的地方。然而，与清朝的统治者不同——他们在19世纪的战争期间一直待在都城北京，国民党被迫撤离中国东部，将重庆作为新首都。富荣不仅成了日本占领区以外的中国地区的食盐供应地，而且也是地处附近、战时收入来源不多的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税收来源地。国家第一次成为盐场的主要投资者，其余的是从日本占领区逃逸出来的资本。为了更好地管理富荣盐场，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在1939年最后合并，成立了自贡市。<sup>⑯</sup>尽管我们所研究的许多人都参加了1937年以后自贡的复兴，但他们的故事不再是自贡商人倡导的历史的组成部分了。它现在是朝着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组成部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自贡发生并继续在它的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这至少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268

<sup>⑮</sup>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68页。

<sup>⑯</sup> 同上文，48—52页。

樵甫是世纪之交富荣盐场城市生活最杰出的历史记录者，他称当时的自贡是四川的财富地，是它的主要产品（食盐）的制造商，是每年 900 多万元税收的出产者。在自流井的黄金年代：

自八店街以上，各盐号栉比鳞次，锦绣繁花。每当夕阳西下，粉黛笙歌，洋洋盈耳。金融活动，流通现金，立可集数十百万元。行商坐贾，肩摩踵接，不亚于通商大埠。此为官运以前之自流井。<sup>①</sup>

在樵甫 1916 年写作之时，清末民初多变的盐业政治业已侵蚀掉了富荣盐场的市场。但是盐场对于西南商业和财政的重要性未见降低。自贡发展成为一座新的城市，是拜盐业所赐。遗憾的是，乾隆时期的富荣方志没有地图。在 1882 年版《四川盐法志》中的盐场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自贡的城市建筑极少。所标出的贡井仅有的建筑是该镇县丞衙门和盐政官署。在自流井，除了这两种建筑外，地图标注了该镇的方位（以另一小建筑表示），以及富荣食盐主要的转运点——邓井关的县丞衙门、盐政官署等建筑。两张地图上都有像城墙的建筑，考察后来的地图

<sup>①</sup>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2 页，成都：聚昌公司，191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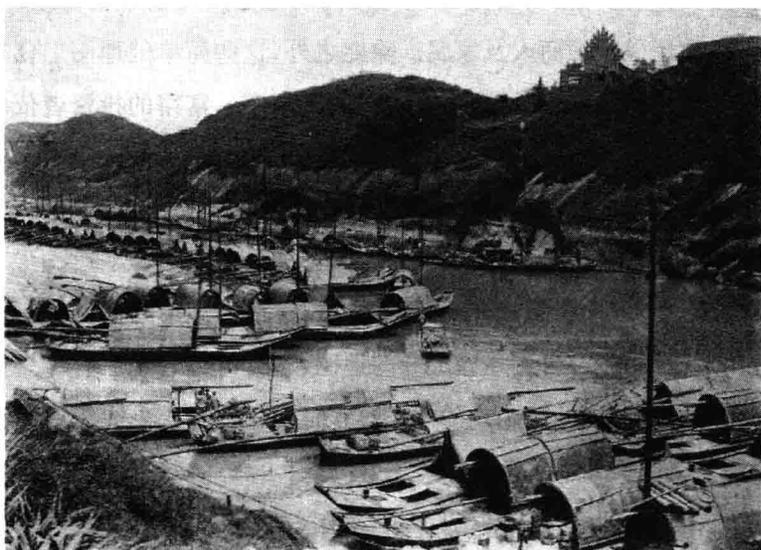
可以知道,这些是“寨”。寨是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用砖砌成的工事,在太平天国期间用以保护商人及家属。除此之外,这些简单的地图上仅有的建筑用很小的交叉线表示,这些是中国的“井”字。富裕的投资者依然在围绕县丞衙门、盐政官署的农村居住、做生意,但当时大多数食盐企业的办公场所都位于盐井,这就是应该在地图上标识,使人们对于这些成长中的盐场有所了解的全部内容。

到世纪之交,地图阅读者的需求和四川南部的地图绘制的主题已经改变。《川盐纪要》中自流井和贡井的地图,不仅可以看到占有许多街道的繁荣的商业中心(见第四章的地图 3),而且还有一些小的集市遍布盐场,每个有一条街到数条街不等。主要的城市街道名字揭示了它们与盐业的关系:八店街——该名取自帮助盐场发展的陕商八大批发商号、盐店街、陕西庙、王家塘、牛市街、井神庙;还有许多街道是以商号的名字命名,因它们的办公场所位于该街,或是用居民曾经熟悉的其他地标建筑命名。自流井和贡井位于通往邓井关的水路两岸,这也证明了商业对于它们存在的重要性(见图片 10.1)。自贡河水浅,一直是批发商的绊脚石。只要自由市场还是盐场的一个竞争利器,商人们就能克服枯水期的种种问题。政府何时能够提供更好的运输条件,降低自贡商人们的成本,成为整个盐场的一大问题。19 世纪中期,自贡商人领袖通过建设一条从富荣到自贡的马路,试图摆脱他们对于水运的依赖。事实上,樵甫指出,早在 1906 年就有人向知府提出铺设自流井到邓井关约 30 英里长的铁路。<sup>②</sup>

尽管自贡周边以及整个中国西南的交通发展有限,但自贡的影响还是扩展深入到了四川的农业腹地。四川南部的许多农业和手工业,都是

271

<sup>②</sup> 同上书,7 页。



图片 10.1 自流井沙湾盐船停泊图(约 1919 年)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正文前图版。

满足盐场需求的三种产业:盐锅的制造和销售、竹木加工和销售,以及作为畜力的牛只喂养。

## 辅助产业和行业

自贡盐业的扩张催生了许多辅助产业,它们的主顾是该地区的盐井和盐灶。辅助产业许多就坐落在自贡,其中一些对于紧临它们的供应来源地的区域经济来说意义重大。《四川盐法志》记载,除了盐锅、竹、木、牛只外,富荣盐场还需要 23 种基本的商品。在煎盐过程中使用的盐锅,由泸州与合江的工匠制造,他们亲自在盐场销售,每年卖出 5 000 多个。煤由荣县和威远输入,麻由商人从温江运来,来自泸州、资州、江津的商人每年向自贡零售商售出 500 000 石大米,邻近县提供牲口饲料、杂粮及桐油。除加工许多从外面购买的原材料外,自贡及周边地区也供应石灰、砖、木锅盖等许多自己所需的东西。到 1920 年代,500 多根钢丝绳从

上海进口以供汲卤的机车使用。<sup>③</sup>

## 盐锅的制造和销售

为食盐生产商服务的最重要的辅助产业之一，是食盐煎锅的制造。盐锅业的中心是四川东部的綦江县。<sup>④</sup> 这里以及南川县，铁矿石储藏丰富，且很容易从重庆府得到煤，从附近的贵州得到木炭，这促进了制锅业大规模发展，满足遍布四川东部和西南部的食盐生产商各种不同规格盐锅的需求。盐锅制造是沿綦江地区的重要产业，綦江在重庆东部的江口注入长江。南川县的铁矿石也运至泸州，供应沿沱江的各锅厂。<sup>⑤</sup>

与其他服务食盐生产商的产业不同，盐锅的制造和营销，多半由盐场之外的专门商人把持。井火灶上使用的锅每口约重 1 000 斤，在煎盐极高的温度下很快就会破裂。因为它们的使用期很短、成本很高，在清前期常常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后来以每年缴费的形式租佃，盐锅制造商定期予以更换。<sup>⑥</sup> 要求购买新锅的人缴回旧锅，制锅商要回收利用。炭火灶用锅不需经受井火灶锅那样的高温，它们普遍要便宜一些，用较低品质的铁制造，用破后扔掉或卖废铁。<sup>⑦</sup> 回收利用的习惯，也有助于保护制锅商在产品制造上的垄断地位。在乐山，可能也有富荣，收集破碎的盐锅或是企图在盐场自己造锅使用是非法的。<sup>⑧</sup> 1880 年代，买一

③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7，节 2，页 4b—5a，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 年。

④ 诸子言：《江津帮的形成及其在自贡盐场的经营活动》，243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1982 年。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89 页，上海：别发洋行，1922 年。

⑤ 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89 页。

⑥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10，节 6，页 80b。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161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⑦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10，节 6，页 80b。

⑧ 《乐山县志》，卷 7，井制，乐山：1934 年。

口锅需白银四五十两。<sup>⑨</sup>到1910年代,最好质量的盐锅价格已升至65两。<sup>⑩</sup>

273 到18世纪末,江津商人开始在向自贡运销盐锅上起着重要作用。许多人拥有自己的工厂,以满足盐场不断增长的需要。戴耕霄每年向自流井制造和运输700—1000口锅,据说在生意上他投入了差不多4万两。到1850年代,他的同乡加入了此生意的行列。袁家万兴锅厂在自流井设号,三代生意兴隆。清朝最末数年,江津人接手以前陕西商人经营的铁锅生意。他们的工厂一年制造约300口锅,1920年代末因富荣盐业急剧衰退而纷纷倒闭。<sup>⑪</sup>

在晚清,自贡活跃着生机勃勃的江津帮商人,这对于江津县其他商人是一种诱惑。清朝覆亡以及暂时废止引盐,这对于促成有着积极进取精神的江津人从富荣购买巴盐,然后在綦江和四川其他市场销售尤有影响,他们填补了许多旧有清朝企业贫困潦倒所留下的空白。随后,出现了一股劳动力和企业家前往自贡的新移民潮。有人估计,到1940年代末,江津商人拥有的工厂所产食盐约占自贡盐产量的三分之一。<sup>⑫</sup>身为工业家,江津企业家们也在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工厂管理方式上起着重要作用。<sup>⑬</sup>我们将会看到,自贡不仅仅对产业投资者有诱惑力,在20世纪,传统的和现代的金融机构都被吸引至盐场,其中也有江津商人的身影。

### 富荣盐场的竹、木供应商

在引进机车和金属卤筒之前,整个四川盐场使用的大部分此类设备

---

⑨ 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77页。

⑩ 《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契约第219、586件,时间分别是1917年和1918年。两份契约都将盐锅的价格按质量开列有65两、30两和15两,说明这是整个产业中相当统一的价格。

⑪ 诸子言:《江津帮的形成及其在自贡盐场的经营活动》,243—244页。诸子言是江津商人,1930和1940年代在自贡有投资。

⑫ 同上文,247页。

⑬ 刘镇国:《新兴制盐厂》,249—259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

都是用竹子和木头制造的。松木、杉木用来制造天车、地车、天地滚子，也用于廊厂中的许多建筑，包括牛棚、柜房、灶房、仓库、棹桶，还有跨越盐场数英里长的竹笕。平均每年有 2 万至 2.4 万根松木顺江而下到达自贡，而杉木的需求量更大。<sup>⑭</sup> 一眼大灰子井的天车就需杉木 200 多根，都出自四川西部、云南、贵州和湖南的边远森林。<sup>⑮</sup> 而中国中部和西部丰富的竹子有着更广的用途。建造卤笕、卤筒、凿井和打捞用的竹篾，制造篾索以及包装食盐的盐包等等，都使用竹子。在 1920 年代初，每年使用的竹子多达 10 万根。要完成以上这些专门任务至少要使用四种不同的竹子；在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湖南和湖北的山区购买这些竹子，为盐场与这些边远地区间搭建了重要联系。

这些商品的购买、加工以及出售，基本上都是在沿通向自贡的水道分布的竹厂、木厂中完成的。在四川盐业生产高峰时，自贡约有 20 家竹厂。<sup>⑯</sup> 《四川盐政史》记载，自流井有条街整个都在出售竹子。<sup>⑰</sup> 木厂集中在三个地区：自流井的豆芽湾有 14 个，上桥有 14 个；贡井的么滩子约有 20 个。这些木厂有数个属于同一个或连锁的合伙人。<sup>⑱</sup>

从森林中采购木材，是由称为山客的商人控制的。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他们似乎是购买山地并将它出租给移民或棚民，以种植速成林或其他山地产品的投资者。<sup>⑲</sup> 有材料显示，山客仅仅通过商业合约是无法控制山里物产的。边远山区缺乏政府的严密控制，这就要求山客拥有其他权势。他们大部分是当地强势人物，在 20 世纪，是些与军阀有关系的

⑭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1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6—10 辑，1982 年。马仿波的记述是建立在对自己及曾树怀、刘凌湘、黄纯武等木材商人同仁做木材生意的回忆之上。

⑮ 同上文，277、280 页。

⑯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7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1963 年。

⑰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10，节 6，页 80b。

⑱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4—275 页。

⑲ 棚民种植木材的探讨，见安妮·奥斯本《苏皖浙交界地区农业集约化的自然障碍》，美国历史协会年会论文，1985 年 12 月。

人。在往合江木材市场运输圆木的山客中间，叶沛霖是黔军旅长，至少还有四人也是军官。<sup>⑳</sup> 在竹子产区做生意的山客，常常与哥老会关系密切。<sup>㉑</sup>

合江、泸州、嘉定、邓井关及贡井的么滩子等大规模木材市场都为自贡服务。最好的天车支柱是用湖南出产的杉木制成的。在清朝，一些井户派他们的代理人直接挑选重要的建井材料。<sup>㉒</sup> 更常见的是，称为“庄客”的木材商代理人，在大的木材市场选择木材，或将木材装船，或做成木筏漂回他们在自贡的木厂，在那里制成盐井所需的各种制品。

275 竹子的加工和营销远比木材集中，自贡强势的竹商，仅出自那些能直接接触山区产品供应来源地的销售商。没有充足资本从生长地点直接采购的竹商，必须在位于泸州的主要竹子市场，购买由竹林山客运至此地的竹子。这样的竹子质地较差，出售所得利润比不上那些大竹厂。两个最大的竹厂是永生恒、天泰和。仅永生恒就控制了自贡销售竹子的一半。每一年它雇用三四人进山挑选竹子，这些人 2 月份离开盐场直接与竹林所有人谈判。在选中要砍伐的竹子做上标号，他们要在 5 月底 6 月初的端午节及时返回盐场。在夏末，他们返回山区以监督砍伐四岁龄的竹子，这一任务直到 9 月底才完成。接下来，他们视河水深度及购买数量，用船或筏，或是通过陆路在过年之前将竹子运回自贡。把握运输时机至关重要，因为太晚运来的竹子会失去过多的内在水分，而这水分在盐场建设中很有用。若上述竹子是用做板条的话，那就常常不得不扔掉，而用此所制的卤筒也不能保证不开裂。<sup>㉓</sup>

自贡木厂和竹厂不及井、灶重要，但是它们是盐场主要的雇主和重要的投资来源。永生恒雇用了 30 多个监管人员，还有至少三倍于这个

<sup>⑳</sup>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80 页。

<sup>㉑</sup>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70 页。

<sup>㉒</sup>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80—283 页。

<sup>㉓</sup>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70—71 页。竹子抵达盐场后的描述及它们的加工，见 71—72 页。

数目的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在1920年代，豆芽湾的14家木厂每个都雇用三五十人，将木头运进或运出木厂。<sup>④</sup>竹厂和木厂也临时雇人做船工、撑筏人及搬运工，将未加工的原材料从山区运到盐场。四川边界森林地区流向外面的竹子，对于周边地区的农民来说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在一些地方，竹竿从砍伐所在地的山区到达最近的水运地点，要运输30英里。<sup>⑤</sup>

开办木厂或竹厂与井或灶相比，需要的钱要少得多。几位木厂老工人回忆，清朝时，木厂创办资本从数百到三四千元不等。这些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与供应商、购买商关系良好，则利润会很高。有人估计，一个管理完善的木厂或竹厂，至少可以获得30%的利润，而出售井架所需材料赚得的利润更高达300%。<sup>⑥</sup>曾子华，原是德昌祥木厂的职员，1918年他约股集资3300元，开办聚义长木厂。经营此业的十年间，他分配红利，总数是上面数字的两倍，并可能将相当数量的钱纳入私囊。1928年股东们怀疑曾子华突然购进土地，并将所得的福来木厂给了他的兄弟曾少卿的行为，遂下令清查聚义长的账目。确实有经理人侵吞入己的证据，但该木厂的总资产仍在三万两以上。<sup>⑦</sup>

276

我们对于自贡大规模竹厂的经费情况所知甚少。《四川盐政史》只是简单评述说，竹厂的东家都是富有商人，资本达数万元。他们的管理职员薪水很高，竹厂东家和经理人所捐官衔很长，这些都证实了他们获利相当高。<sup>⑧</sup>加工和营销竹、木所赚的钱有几种出路，包括购买田地及捐

<sup>④</sup>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4页。

<sup>⑤</sup>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71页。据樵甫的记述，每年有价值数百万两的楠竹运往富荣。两个人扛一大根，一人可扛一小根。计件付酬，一根四五文钱。见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38页。

<sup>⑥</sup>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6页。

<sup>⑦</sup> 同上文，277页。

<sup>⑧</sup> 富荣木厂的高层管理人员平均每年得钱200多吊，这还不算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临时性补贴。身为永生恒管理人员的王聚金、苟坪三，一年得钱超过360吊。见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8页。

官。然而,也有材料显示,盐场的许多主要供应商成了井、灶的投资者。

王德三是最好的例证。王德三接受过木工培训,最初一些年的工作是锯木头。清朝最后十年间,全兴厂倒闭,王德三接手,将木厂从生产弄柴改造为生产木料。经过数年奋斗,他积累了足够的资金扩张生意,在盐场供应市场上竞争。1918年他赢得了一份在自贡建造一座粮仓的政府合约,利用这次所得利润,可以雇佣一个全职的木材采购人。到1923年,他的德昌祥成为盐业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在王德三对所得利润进行的投资中,有位于凉高山年收租50石的农田。这块地部分用于凿井。我们知道,他至少在永潮、广福、五福井拥有股份。永潮井是与来自张筱坡的投资资本一起凿铤的,是凉高山最高产的黑卤井之一。<sup>⑳</sup>辛亥革命后,我们看到了相反的情况。许多最富裕的盐场商人开始投资建造他们自己的竹厂和木厂。王德谦、王子衡成为长发祥竹厂的合伙人。王三畏堂开办了广益公竹厂,王和甫、李星桥、李敬修、黄敦三全都经营他们自己的木厂。<sup>㉑</sup>

除了盐锅以及大型的建筑木料和竹竿外,盐业种种专门的需求也刺激了盐场周边的小型制造业。在所生产的设备中就有竹箴索。<sup>㉒</sup>箴索业处于盐场家庭手工业与工厂式生产的中间阶段。在清朝,食盐生产商每年购买约100万斤的箴索,基本上是用作盐井的缆绳。尽管这种产品非常结实,但接触卤水并且经受利用箴索凿铤以及升降卤筒的重压,都意味着箴索必须经常更换。

有材料显示,18世纪末19世纪初,富荣盐场使用的竹卤筒大多数是当地手工作坊生产的。甚至在民国初期,专门的工匠还游走于盐井间,以修理用以提升卤水的竹子。也有其他的匠人加入,这些人的工作是在

<sup>⑳</sup>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7页。

<sup>㉑</sup> 同上文,274页。

<sup>㉒</sup> 这一讨论的主要材料是黎雷《罗筱元旧事》,108—132页,载《自流井》1983年第1期;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7页,《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4辑,1982年。



中空的竹管上开凹槽，并用麻缠绕以防止它被水破坏。<sup>⑳</sup>

至于其他的手艺，清末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手工业与工厂式生产的混合体系。例如，约有 100 家篾索厂，每家有 20—80 人，总共雇用了约三四万工人。与吸引跨省和四川移民的盐业不同，整体上看，篾索厂主要吸收当地农业中的失业人口。篾索业利润很高，但人们对它的需求变化无常。商人们使用“两层”雇用制：在工厂使用大量的农民劳动力——这些人是临时性的，而当有额外需求时，再进行必要的劳动力补充。到了 20 世纪，妇女和儿童约占上述两种方式所投入劳动力的 10%。<sup>㉑</sup>

1915 年篾索工人罢工，工厂主与盐政官员间通信往来，商讨雇主要减少传统的伙食待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工厂制度的重要。这次罢工约有 40 家企业受到影响，包括富顺、荣县、宜宾三个县的工厂。工厂主提出向中央政府递解盐税的职责以打动盐运使，指出：“无索不能推水，无水不能煎盐，无盐不能裕课，互相根据，关系匪轻。”<sup>㉒</sup>这封信显示出，工人们已组织成了一个帮会，与第五章所讨论的有着保护神的帮会很相像。巧圣会团结三县的同业工人的能力，很显然震慑住了工厂主和盐政官员，后者建议纠纷双方在当地的盐政分署坐下来，商讨他们的问题。

278

最后，盐场急需篾索导致了罢工的分裂，罢工领袖被抓。直到 1920 年代，食盐订购下降加上生产结构上的两种变化，才开始挑战篾索商人的权势。第一个是大灰子盐岩井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篾索的提升能力显示出它的局限性。第二个是引入了汲卤的蒸汽锅炉，钢丝绳立即取代了篾索。<sup>㉓</sup>

<sup>⑳</sup>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38 页。

<sup>㉑</sup>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87 页。

<sup>㉒</sup>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1—3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

<sup>㉓</sup> 自贡市档案馆 3-5-745。欧阳显荣写给川康盐务管理局的一封信。见蒲月生《自贡盐商熊佐周事略》，4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7 辑，1987 年。

## 牛只畜力与牛只副产品

清朝时自贡最大的生意之一是购买、出售牛只及牛的回收利用。估计有三万头牛同时在井、灶上劳作，推卤，送运货物，载盐短途运输。仅约有六分之一作为备用，以防牛只死亡或无法劳动。<sup>⑳</sup>最多的是普通的水牛。然而一小部分黄牛用于运输每月源源不断进出盐场的煤、大米、豆和盐。

接近 5 000 头的备用量，数目如此巨大，其中的原因不难找到。尽管有一些牛是当地饲养的，但大多数富荣盐场雇用的牛，都是从靠近四川的贵州州县和四川山区县输入的。在源地买牛后，小商贩将它们赶至隆昌县的隆市镇、富荣县的茅头铺以及自流井的上桥等地的中心牛市。到清末，这些市场每日开放，而重庆附近的大山铺是定期开市。<sup>㉑</sup>牛的买卖很分散，商贩们会将牛赶上一段距离，接着将牛卖给其他商贩，这些人也只是负责到自贡、犍为、乐山盐场的一段路程。数个重要的中途市场在清朝时很兴盛，从这种买卖中获利，尤其是江津的李市坝，它专门从事出售来自附近贵州的牛只。<sup>㉒</sup>

279 牛的正常驱使期限平均是 10 年，<sup>㉓</sup>因此每年要更换 10% 的牛。通常，还有 5% 的牛病死，因此每年约有 4 500 头卖到盐场。这一巨大的生意，为操纵牛只售卖的牛掮客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牛分为三个等级。民国初年，最强健的水牛每头是 80—100 两，其他两个等级分别是 60—70 两和 30—50 两。<sup>㉔</sup>买家与牛贩子之间的议价，完全是由专门在牛市做生意的牛行户进行的。当井户看中了一头牛后，会邀请一位牛行户，这个

<sup>⑳</sup>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08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2 辑，1981 年。

<sup>㉑</sup> 同上书，111 页。

<sup>㉒</sup> 诸子言：《江津帮的形成及其在自贡盐场的经营活动》，243 页。

<sup>㉓</sup> 有人告诉谢立山，即便是照料很好的牛最多使用五年。见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176 页。

<sup>㉔</sup> 谢立山看到，1884 年他参观盐场时，每头牛售价约四五十两。同上书。

人将在买家与卖家之间往来，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价格。买卖的利益各方从不亲自交谈。当谈拢一个合理的价格时，牛行户会在牛的后背上用红颜料写上数字，向买家作揖，并祝愿该牛“推万万年”。如果这时卖家放下牛的缰绳，而买家将它拾起，这买卖就算成交。如果没有，颜料将被擦去，牛再寻求买主。<sup>④①</sup>

牛行户的工作还不止安排买卖。他从买家那里收取一点点费用，要为此牛作担保人。如果三天后证实此牛有病，或是不吃不喝，退还牛只、中止交易就是牛行户的责任。4 500 头的买卖至少有 13 500 两的佣金，极少数有幸得到官府执照的人几乎垄断了这一生意。一些最成功的牛行户雇用他人帮助谈判，提高他们每年的成交量。一些牛行户因此很富有，他们也投资当地其他生意。<sup>④②</sup>

牛只是盐场的大生意。雇用数千人作为饲养人、医生和赶牛人。此外，在大的牛群周围发展起来数目庞大的第二产业。我们已经看到，在盐井出现了专门医治、饲养水牛的店铺。盐场周围许多不肥沃的田地种植牛吃的草料。而水牛的主要饲料胡豆则从很远的江津和四川中南部输入。<sup>④③</sup> 在盐井，收集和处理牛粪便，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手工业。牛粪被制成饼，晒干后，当作燃料出售（见图片 10. 2）。清朝时，每个值 6—10 文铜钱，是盐场附近人们喜爱的取暖和烹饪燃料。<sup>④④</sup> 盐井工人在业余时间通过加工和出售牛粪，每月可以额外挣一串钱。收集这一副产品可能已经被盐井工人垄断，因为有材料显示，一些工人出很低的价钱，雇用更穷的人为他们收集牛粪。<sup>④⑤</sup>

280

④①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10—111 页。

④② 同上文，111—113 页。例如，黄鉴庭作为牛掮客发了财，后来在大坟堡开了荣王厚钱庄。

④③ 诸子言：《江津帮的形成及其在自贡盐场的经营活动》，243 页；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90 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7—8 辑，1963 年。

④④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 3，篇 2，章 10，节 6，页 81b。

④⑤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15 页。盐井工人所雇用的收集牛粪之人，被称作牛拾客。加工后的牛粪每百斤卖 100 文，而同样数量的煤卖 300 文，木材卖 200 文。



图片 10.2 自流井双牌坊地方晒牛屎饼(约 1919 年)

资料来源:林振翰:《川盐纪要》,正文前图版。

每年死亡上千头牛,处理死尸则促生了另一种更有利可图的垄断营生。盐井需要可靠的牛皮供应,尤其是用来做卤筒底部的活塞。<sup>④⑥</sup> 为了确保这一物资供应,盐井要求,所有年老和死亡的牛都要卖给有执照的汤锅铺,这是习惯做法。他们卖牛肉和牛腱,对它们的加工也成为自贡重要的产业。皮、骨和角都以很低的价钱卖给在盐场周围建立的四个皮局。<sup>④⑦</sup> 这里,皮要用于盐业之上,也用于椅垫等。皮局所生产的胶,远销成都、重庆等地;骨头和牛角,则提供给专门生产装饰品和日用品的兴盛的手工业。<sup>④⑧</sup> 皮局自身被指定作为善堂,它们所获利润的使用,要由当地  
281 各类盐商协会的负责人集体决定。<sup>④⑨</sup> 机车汲卤的引入使得皮局合并,随着自贡商会的成立,这一盐场商人的保护伞组织接手了皮局善款的分发。<sup>⑤①</sup>

④⑥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 9,页 11,1822 年版,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年重印本。

④⑦ 胡少权:《自贡盐场济公皮局始末》,69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23 辑,1993 年。

④⑧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119—125 页。

④⑨ 胡少权:《自贡盐场济公皮局始末》,69—70 页。胡少权是以前的盐商,据他的记述,皮局相当多的利润用以救济穷人,安置无家可归者和孤儿,培训失业人员。

⑤① 例如,自贡市档案馆 17-1-241,时间是民国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抱怨说前些年来自皮局的钱拨付给警察购买新的制服,质疑为何今年至今没有拿到此项经费。

可以说，牛只不仅成为自贡与整个四川和贵州边境山区繁荣间的纽带，而且对于牛只副产品的加工以及牛只饲养，也是盐场及周边农民和匠人的主要收入来源。自贡有牛王崇拜也就毫不奇怪了。该产业的命运依赖于这些牛的强健，它们的饲养和照料费用远远超过了受雇照顾它们的人的工资。但水牛确实也令盐场不胜烦恼。山坡上到处是牛粪，冲刷家畜污染了当地的饮水，每年霍乱、痢疾流行。这些笨拙的牲口，数以千计，它们与盐井发出的天然气一道，是自贡成为易于挣钱之地的主要原因，也使它成为不堪生活的地方。

## 信贷与金融业

尽管富荣盐场促成了四川南部商业和制造业的极大发展，但它对于金融业和信贷的影响不大。如前所述，银行并没有为富荣盐场最初的建设提供财力支持。如其他地方早期的产业开发商一样，富荣的食盐开发商是通过创立复杂的股权制度、合伙制度，以及通过将以亲属为基础的财富合并在一起以筹措资本的方法，解决凿井建灶所需的大量资金的。黑卤和天然气的发现，以及后来开发盐岩要求有长期的资金支持，但富荣盐业的增长，继续是由私人投资予以解决的。银行和金融的服务对于盐场发展的重要之处，在于商业借款和汇兑。在这些领域，中国在19世纪之前已有了相当的经验。而且盐业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推动了省内银行在重庆和四川南部中心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在世纪交替之后。与此同时，纵向一体化和连锁投资、预付款项以及信贷购买等商业做法，帮助企业克服了眼前的资本短缺。

### 行业信贷

大食盐生产商所享有的优势条件，包括得到生产物资和信贷的特权。如前所述，大的纵向一体化企业，不仅能确保卤、气的供应，而且通

过开办他们自己的批发商号,也保证了自己的井、灶常常是以低息或是零利息,得到煤、油、食物、麻、牲口饲料等。批发买卖也使拥有自己食盐营销商号的大食盐生产商,保有流动资金。到19世纪下半叶,运往重庆和湖北沙市等港口的食盐销售所得,不是寄回大宗的白银,而是用来购买棉纱等物资运回自贡再次销售。<sup>⑤①</sup>一体化和多样化,就这样向大多数大食盐生产商提供了有价值的范围经济优势。

大生产商,能够从与供应竹木等生产物资的企业建立特别的关系中受益。连锁投资将生产物资的主要承办商,与他们井、灶主顾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20世纪初,大井、灶商人,像王和甫、李敬才、黄敦三都是木厂的主要投资者。<sup>⑤②</sup>一些主要竹木供应商的合伙人中,就包括了大型盐业联合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例如,永生恒木厂的主要投资者之一,是王三畏堂盐业的总掌柜潘仲三。<sup>⑤③</sup>崔汝华及女婿余述怀,最初是通过同意顾客在源昌笕(崔汝华是那里的经理)利用他们的户头以支付油或麻等,为协和盛山货酱园铺招揽生意的。<sup>⑤④</sup>

大食盐生产商和生产物资承办商,都设有专门的对外联络部门,这些部门唯一的目的是收集市场信息,与顾客和供应商建立联系。木厂雇用一些年轻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在盐场闲逛,打听有新井要凿铤的闲话。<sup>⑤⑤</sup>竹厂依赖于与已建好的井、灶的长期联系。在永生恒竹厂,王达之的一位亲朋负责与王三畏堂的业务。毛爱琴和他的兄弟处理与所有位于金花湾的盐井的交易,李辉廷是黄敦三、王德谦和李四友堂盐井的联系人。高云从,他自己是笕的投资者,保持着与同富笕的生意往来,景绍

⑤① 陈本青:《渝沙债团与王三畏堂债务始末》,6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992年。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167页;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161—162页,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62—1963年。

⑤②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4页。

⑤③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7—68页。

⑤④ 崔雨脂、颜绍渊:《贡井盐商余述怀》,17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

⑤⑤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79页。

堂处置所有来自陕西商人的井、笕的订单。<sup>⑤⑥</sup> 这些是专业推销员，在某种意义上，所提供的服务与现今的一些账务员仅稍有不同而已。中国农历三大节时，鸡、鸭、火腿、糖、茶或大烟要送给主要井、灶的掌柜和东家。盐场派来的买主，会受到热情款待。在国家对于商业活动管理缺位的情况下，讨好主顾的一些做法，常常超过了现在我们所能接受的范围。

官运商销制度建立后，盐灶受制于政府的食盐采买部门。尤其是在1920和1930年代，当盐场生产能力超过了川盐市场的法定需求时，关于特许食盐的销售价格及合约签订的商谈，对于任何生产商的成功都至关重要。一些大生产商能够得到有保障的定额，不必年年进行斗争以获得特许市场的份额。然而，中小灶商为得到剩余的份额，竞争异常激烈。对他们而言，花费大笔金钱讨好政府营销部门的官员及其下属是常见的做法。妓院在这些州县林立，这是官员、士人和商人的传统社交聚会场所，中等盐灶商人，在这里寻求摆脱联合起来的大笕的控制。到1910年代，自流井据说有两三千职业妓女，一些是近来从重庆迁移而来的，那里的生意不如这边好。<sup>⑤⑦</sup>

企业与企业间的短期信贷，弥补了这一内地工业城填金融业的不发达及货币短缺。在1880年代以前，以及20世纪短暂自由市场体制时期，典型的做法是，每年三大节时，食盐在生产上市前就与批发商签约。这样不仅能够相当精确地计算他们应生产的食盐数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预售制度也为盐灶提供了一部分生产所需的营运资本。对于签约的每一馊盐，生产商得到提前预付的交关银约1000两。<sup>⑤⑧</sup> 当官运局负责购买盐场生产的食盐时，这种做法仍然沿用，尽管大的笕户似乎在他们的交易上有优势。<sup>⑤⑨</sup>

<sup>⑤⑥</sup>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68页。

<sup>⑤⑦</sup>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87—188页。

<sup>⑤⑧</sup> 同上书，137页。

<sup>⑤⑨</sup> 提前预付的额度约相当于这些食盐官方定价的三分之二。剩余的在这些食盐交至官方仓库（以包装并向引岸运输）时付清。见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58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

284 笕户、灶户与卤水承办商间也有类似的做法。资金流动,是这些汲卤之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任何支付计划上的中断,都会令中小规模所有人没有经费支付工人工资,无力饲养他们的牛只。<sup>⑩</sup> 食盐生产商,也在从重要物资供应商那里得到的信贷中受益。为得到竹子,竹商不得不预先付款给竹林山客,而他们与井、灶交易时,井、灶也要向他们预付款。更为兴旺的盐井,比如属于王三畏堂或是陕西商人的,在农历十一月份收到供应他们的物资,在三个主要节日分期付款。<sup>⑪</sup> 延期付款对于井、灶来说是一种贷款。据罗筱元说,供应商愿意接受这种做法,是为了从井、灶负责人那里得到无息贷款,或是他们对所收到的物资多予估价。<sup>⑫</sup> 木厂在每年三大节时要清账。

如果说私人股份投资是先期资本融资的关键所在,那么行业信贷是保持生产车轮运转的润滑剂。四川市场的影响所及,尤其是它与重庆和沙市的联系,使得盐场不仅可以通过食盐销售,而且可以通过各种零售商品和生产资料销售获利,从而回笼资金。只要生意好,商人和生产商通过分期付款、短期信贷以及一系列的互惠信贷做法,能够适应食盐市场的季节性特点。然而,在1920年代中期,川盐需求锐减,导致信贷逐步萎缩。商人开始坚持货到两个月内付款,到了1930年代中期,大多数商业交易都使用现金结算。<sup>⑬</sup>

### 传统信贷机构

银行没有为富荣井、灶、笕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在清朝时,通过三种机构可以得到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当铺、票号和钱庄。盐场最早的

363 <sup>⑩</sup> 当李四友堂开始对它的吉通笕供应商不履行义务时,井户们既不能解雇工人(他们过去欠这些人太多的钱),也不能卖掉水牛,因为担心将来缺少动力。见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201页。

<sup>⑪</sup>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75页;罗筱元:《罗筱元自述》,手稿,藏于自贡市档案馆。

<sup>⑫</sup>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

<sup>⑬</sup> 可见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285—286页的账目。



资金库似乎是由跨省商人开办的当铺，这是这些商人将从出租云南、贵州的销售盐引和批发食盐中所获利润进行投资的一种方式。<sup>④</sup> 我们知道，到 18 世纪中期，有一些当铺基本上依靠本地资金或是来自附近犍为县商人的投资。许多老板，从姓名上可以确认他们是食盐运输商或是食盐生产商。李家在 18 世纪中期开办了恒福当铺，后来利用所得利润，以“成美公”为名开办了其他三家当铺。清末数家著名的当铺，扩张进入其他盐场的信贷市场。观音滩的罗家，本身是重要的拥有井基土地的家族，开办了谦益当铺，后来将生意扩展至奉节、万县。来自威远县的郭家，在荣县、富顺、乐山拥有当铺。<sup>⑤</sup> 我们缺乏清朝自贡当铺的财务账簿，难以确定它们与自贡商业借贷市场的明确关系。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财运起落与盐场同步，这显然表明了二者的密切关系。辛亥革命后，清朝老牌当铺所剩无几。直到 1920 年代初才有新的当铺出现，基本上是投资制盐业的有钱者所开办。1920 年前后共有十家新当铺开张，盐商拥有七家。<sup>⑥</sup>

到 1927、1928 年，川盐需求的下降以及盐卤大过剩的出现，致使许多在 20 年代初开张的当铺歇业。土匪横行、铜钱贬值，也是这些货币贷款机构倒闭的重要因素。然而，当铺在盐井有着股份投资，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整个食盐产业的失业和减产，一般来说会给当铺老板带来兴隆生意，但他们自己涉身盐业，因此也随着整个盐业命运的剧烈变化，患难与共。<sup>⑦</sup>

自贡钱庄的创立，也是食盐生产扩张的产物。18 世纪初，来自陕西、山西、广东、福建和贵州长途商人的资金流入，足以刺激在自流井设立一

<sup>④</sup> 纪念自流井西秦会馆建成的碑刻。

<sup>⑤</sup> 欧阳樾牟等：《自贡地方的典当业》，147 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3 辑，1983 年。

<sup>⑥</sup> 同上文，其他三家分别由一煤商、一丝绸商和一纸商所有。

<sup>⑦</sup> 《自贡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金融志》，147 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十八，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

些钱庄。<sup>⑥8</sup> 盐场的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主要在重庆的食盐销售所得。尤其在早年,商人将白银运回自贡。因为自贡的商品交易基本上用铜钱,大多数自贡的金融业务最初都是从事货币兑换。<sup>⑥9</sup> 在钱庄中,最多、最集中的资本属于陕西和山西商人,他们的普丰恒、四大亨、宝丰隆是自贡最有影响的钱庄,既从事货币兑换也从事存贷款业务。

286 盐业的发展节律也可以解释一些自贡票号的出现。四川拥有边远但利润极高的外销市场,包括麻、草药、皮子和染料,这些刺激了票号最晚在 18 世纪就出现了,有些人认为四川是中国最早开展的汇款业务的地方。<sup>⑦0</sup> 然而,自贡直到 19 世纪初盐业繁荣之时,才出现了票号,甚至在那时,它们也仅控制自贡与重庆间的部分汇款业务。川盐进入湖广市场以及外国制造的棉纱出现在汉口,这二者同时发生,给许多自贡食盐批发商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他们将棉纱运回而不是进行汇款。甚至是大的票号也出现了资金短缺,这也极大限制了它们在四川西南地区的扩张。甚至直到光绪朝(1875—1908)重庆的票号常常是货币告罄,要定期从商业较不发达的地区输入现金。<sup>⑦1</sup> 从 1877 年开始,随着官运商销制度的建立,官府在军事护送下将采买食盐的钱运至自贡,减少了汇款的需求,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朝结束和 1911 年官运制度的废除。<sup>⑦2</sup>

除货币兑换和汇款外,所有这三种信贷机构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提供营运资金的短期信贷。可以说,尽管它们在盐场生产商的资金发展中没有发挥作用,但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对于生产资金的使用至关重要。

我们对于清初制度性的经费筹措所知甚少。然而,随着官运商销制度的建立,有关金融业活动的材料丰富起来,提供了盐场金融业与商业

⑥8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50,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

⑥9 聂无放:《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的金融业》,79—80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91年。

⑦0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56—72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4年。

⑦1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69页,引用一份巴县档案馆的档案。

⑦2 聂无放:《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的金融业》,80页。

互相渗透的情况。大多数票号也从事一些棉纱、洋油及桐油生意。<sup>⑦③</sup> 对于井、灶的日常生产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钱庄以及大型盐业联合企业常常负责货币兑换和商品采购的部门——总柜房。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王三畏堂的广生同是后者的典范。它在邓井关、泸州、重庆、宜昌和沙市有分号，从事食盐运输、货币兑换及棉纱生意。它也发行钱票，远至湖北的宜昌也予认可，能够按票面价值全额兑换硬通货。<sup>⑦④</sup> 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许多大盐业家族建立了这种钱庄，包括李星桥的宝通长、李四友堂的协兴祥、黄敦三的吉庆亨。<sup>⑦⑤</sup> 与此同时，商品购买与钱庄业间的密切关系，鼓励了向井、灶供应木竹油麻煤等商品的许多人组成合伙，成立他们自己的小钱庄。许多井、灶掌柜和柜房职员也加入这些人的行列。

287

在官运商销制度下，生产成品盐的盐灶一年三次，即分别在农历五月、八月、十二月得到它们生产份额的支付款项。这笔钱用白银支付。盐灶在向井或笕支付所得的卤水外，剩余的白银存在钱庄，以每月 0.8%—1.2% 生息。当灶（或井、笕，它们与钱庄间有类似的做法）需要购买油、麻等物时，就从钱庄户头取钱。<sup>⑦⑥</sup> 经常是不经手现金，这如同商品供应商也只是让钱庄在他户头记账的做法一样。到 20 世纪，较大规模的钱庄自身经常也从事这些商品的交易，它们自己的仓库有存货，经常派人员去产区采购并运回自贡。<sup>⑦⑦</sup>

在 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代初，当盐场利润下滑时，钱庄发现，需要

<sup>⑦③</sup> 同上文。

<sup>⑦④</sup> 宋良曦：《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15 页，载《盐业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sup>⑦⑤</sup> 聂无放：《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的金融业》，81 页。

<sup>⑦⑥</sup> 同上文。

<sup>⑦⑦</sup> 宋良曦：《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16 页。20 世纪时，钱庄直接涉足商品市场，这一做法被当地银行所采用。埃文·厄兰森描述了聚兴诚银行在 20 世纪四川桐油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在中国钱庄与银行的作用类似。然而，钱庄倾向于依靠数个合伙人已缴纳的资本，而银行的业务是以出售股份和通过存款业务增加所带来的资本积累为基础的。见埃文·厄兰森《1915—1935 年的四川商业银行业：聚兴诚银行个案研究》，43—82 页，载《中国历史论文》第 6 卷，1997 年。

提前支付生产商购置商品所需的资金。这些借款的利率,日益由期货食盐的扣押权作为担保,是自贡的所有居民极为关注的问题。利率本身是每天由主要钱庄的经理在自流井正街的意园茶馆开会设定的。当地人称之为“上茶市”,该会议是在各个钱庄对它们的顾客征收利息的基础上设定钱庄利率的。影响钱庄利率的因素有:重庆票号所征收的利率,当地自贡钱庄能动用的现金,以及对于贷款需求的计算。后一点一般取决于政府购买食盐向生产商支付现金的时间。<sup>⑦</sup>

政府盐业管理和银行在资金流动中的作用,使得票号在 20 世纪初消亡,但钱庄在自贡货币兑换和短期信贷市场上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盐卤过剩之前,最兴盛时盐场有 50 家钱庄,几乎都在四川的金融中心重庆有业务。<sup>⑧</sup>然而,它们做生意的方法和内部组织结构,在民国时期多变的政治及商业环境中,显得极其脆弱。大多数规模小,依赖当地投资并在当地经营业务。甚至在 1930 年代末它们的实收资金远少于成都和重庆的同行(见表 10.1)。

288

表 10.1 钱庄的实收资金(元)(约 1939 年)

城市	平均数	中位数
自流井	11 666	10 500
成都	45 176	30 000
重庆	83 304	54 000

资料来源: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46,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

作为无限责任合伙制,钱庄被它们的股东在生意上作为抵押品。有时个人的资金注入可以提升它们的储备高达 10 万元,但是当盐场生意下滑,许多钱庄的储蓄和实收资金也都下降。张肖梅认为,上海和外国银行的钞票在本地货币兑换市场的起伏不定,为钱庄提供了投机机会,

<sup>⑦</sup> 佚名:《自流井之金融与金融业》,71页,载《四川经济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年。

<sup>⑧</sup>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45。

可以作为生存的一种手段。对公共债务的仲裁则是另一种手段。然而，到1939年，自贡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本地钱庄倒闭。<sup>⑧</sup> 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通过发行法币以及通过禁止私人拥有白银来统一货币的努力，很可能造成了许多钱庄的崩溃，因为货币兑换是它们的一项主要业务。

## 银行业

20世纪自贡建立了一些银行，但它们对于一般生产商的信贷需求没有什么贡献。即便是1920和1930年代位于重庆的分支机构，它们绝大部分的业务也是存款和运输盐税收入。清朝时，大清银行<sup>⑨</sup>和浚川源银行在自贡设有分支机构。1911年以后这两家早期的银行关张。1915年大清银行——现在以中国银行的名义重新建立，重新在自流井开设分支机构，私人开办的聚兴诚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也加入进来。同一年铁道银行、殖边银行也在自流井开设分支机构，同时也有一些小的银行，但几个月就关张了。<sup>⑩</sup> 樵甫记述，川南盐政的主要官署从泸州迁到自流井，是各银行分支机构大迁移的催化剂。一旦落户于此，这些银行间对于盐业收入汇款业务份额的竞争十分激烈。每两周盐政官员要求每家银行提交准备执行的汇款率，以及要承担的汇款规模。接着银行电告它在上海的办事处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存款，向接收中国食盐缴费作为中国偿付贷款和赔款的担保的外国银行划账。上海通知盐政官员钱已收到，接着会向自流井分支机构发出一张所划款额及汇费的支票。<sup>⑪</sup> 这对已在盐场设立办事机构的数家银行来说，是笔有利可图的生意。然而，反对效忠袁世凯势力的滇军起义，导致川南商务和通信联络中断，到1916年，盐

289

<sup>⑧</sup> 同上书，D47。

<sup>⑨</sup> 大清银行成立于1904年，借助的是国家和私人资本投资。当该银行在辛亥革命后重组为中国银行时，这一投资结构得以保留。

<sup>⑩</sup> 《自贡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金融志》，45—47页。

<sup>⑪</sup>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132页。

364

场的四家银行都关张了。

直到 1930 年代, 银行——至少是自称为银行, 与银号和钱庄不同——开始在自贡成倍增加。大多数都与国家及其代理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像中国银行、裕通银行(由军阀刘文辉于 1927 年在重庆开办, 在自贡有分支机构),<sup>⑤⑥</sup>以及川盐银行。

可以用川盐银行的历史, 来说明 20 世纪初四川金融界私人、国家以及地方军阀等各种利益集团斗争的混乱状态。川盐银行 1930 年成立, 总部设在重庆, 自流井有一分支机构。1930 年初, 军阀刘湘任命王瓚绪为四川盐运使。王瓚绪授权建立川盐银行, 表面上是为解决井、灶商的需要。银行的资金来自私人投资以及向川盐批发商所运输的每馱食盐征收的费用。<sup>⑤⑥</sup> 建立一个针对川盐生产商的投资基金, 部分是为了安抚 1930 年代初在国家管制下减产的井户、灶户。尽管有评论者认为这是一家商人的银行, 但它任命一个军人且是自流井当地人的曾子唯<sup>⑤⑦</sup>为主任, 这是该银行与军阀有密切联系的证据。川盐银行在自贡吸引业务的能力有限, 1933 年, 它在重庆的分支机构进行了重组。与此同时, 一些食盐生产商和运输商与它分道扬镳, 在自流井成立了他们自己的银行——裕商银行。<sup>⑤⑦</sup>

到 1935 年, 尽管盐场不如 1910 和 1920 年代繁荣, 但银行业的业务似乎还好。除了以前提到的那些外, 一篇发表在《四川经济月刊》的文章

⑤⑥ 倪敬先:《我对裕通银行自贡分行的回忆》, 294—299 页, 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6—10 辑, 1982 年。

⑤⑥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 D43—44; 马绍周、何兆清:《重庆川盐银行始末》, 122—156 页, 载《重庆 5 家著名银行》, 重庆工商史料第七辑,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关于川盐银行自流井分行的开业时间有些分歧, 《自贡市金融志》定为 1933 年 9 月。见《自贡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金融志》, 47 页。

⑤⑥ 马绍周、何兆清:《重庆川盐银行始末》, 124 页; 在派至自流井作为刘湘政府与富荣盐商的中间人之前, 曾子唯在湖北任旅长。他本人后来从事盐业投资。《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 文件第 10 号提到, 他因在 1930 年代初出售井盐股份而摊上了一桩诉讼官司。

⑤⑦ 佚名:《自流井之金融与金融业》, 68 页。

指出，有七家银行在自贡经营，除了裕商银行，其他的总部都设在重庆。最近成立的地方银行在全省各地都有分支机构，以帮助当地开展金融活动。除办理盐业汇款外，地方银行承担货币兑换、存贷款、本票贴现业务。其余三家银行，重庆银行、商业银行和平民银行，基本上从事汇款业务。<sup>⑳</sup>

遵照国民党政府的法令，自流井现有的七家银行组织了一个银行家的同业公会，但这些银行大多数关注于传统的汇款和货币兑换，加上自贡的大多数钱庄资金不足，使得盐场流通货币短缺，仍然无法得到长期低息银行资金。<sup>㉑</sup> 各军阀为控制银行资产的争斗，进一步削弱了银行在稳定货币上的作用，1920年代末自贡就经历了货币危机。<sup>㉒</sup> 盐场的信贷需求因此仍旧依靠钱庄，并日益依靠常常是来自沙市和重庆等更大的下游城市的区域商人所组成的更大的债团。

## 内陆产业城市

19世纪末自贡的居民，不论是本地的还是寄寓的，不论是工人还是商人，已精心培育了一种中国独一无二的产业制度。与上海、汉阳等对手城市不同，自贡从观念到实施，不折不扣是中国特色的。在服务于生产的技术和组织革新上，它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它与周边乡村农业经济的联系，造就了一个雇用上万运输工人的密集市场网络，并支持着四川森林地区兴盛的木、竹及桐油产业。在西方的产业技术引进之前，自贡是中国最大的非农工人聚集地。

自贡商人在使用合约等手段以筹集资金并组织商业关系上，开辟了新天地。在1877—1939年，富荣盐场的生产发生了重大变革，包括出现

<sup>⑳</sup> 同上书。

<sup>㉑</sup> 同上书，68—70页。重庆银行最初被授权发行钞票，然而，这些钞票在1935年年末被回收。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D44。

<sup>㉒</sup> 见第九章。

291 了大灰子井、开采盐岩和机械化汲卤。商人们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这些时机,开拓新的市场,在应对落后的通信以及由多变和日益掠夺性的政治体制所带来的种种阻碍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然而,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这种产业制度最终无法得以保持。我们已在第九章看到,到1930年代末,那些还没有放弃盐井、关闭盐灶的食盐生产商面临着很快就会吞蚀他们的挑战。尽管抗战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对此叫了暂缓执行,但到了1949年,富荣盐场的金融机构以及所有的辅助产业全部崩溃了。最终,社会主义拯救了富荣盐场,既保存了它的历史也保存了它的技能,在此基础之上,自贡奠定了它未来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



清中期自贡出现的商业活动，遵循的是经济史家熟悉的组织与投资模式。面对类似的机遇和困难，自贡商人想出的解决办法，与同一时期美国的企业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简要地从三个方面考察一下 19 世纪的富荣盐业。

对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美国纺织业的经典研究，聚焦于新技术的作用、商业组织的新方法，以及银行融资。所有这三者与我们对自贡的研究相类似。美国纺织制造业技术是从外面引进的（动力织布机），而富荣的技术突破却是内生的。富荣盐业与纽约、新泽西、新英格兰的纺织业，都有赖于它们在最初技术基础上的不断改进。正是由于这些改进，决定了这些工厂在地理位置上与现今的商业中心有着相当的距离。

二者的商业组织，都集中于最初是为了吸收商业资金的合伙制。从事食盐生产的陕西商人等资助了自贡的发展，而纺织品进出口商为美国东部纺织业的发展担负了大部分的费用。两种新兴产业对于信贷都有很高的需求。然而人们不应该认定，自贡的企业家依赖于互助，而在美国东部，制造商可以得到低息的、非个人的银行信贷。的确，在自贡如同洛厄尔\* 一

---

\* 洛厄尔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在美国以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著称。——译者

293 样,亲属关系和私人联系对于商业的发展极其重要。就自贡而言,低息的信贷问题是通过家族财产合并、家庭借款以及允许合伙人通过引入新的合伙人——上下节,来扩大他们股权的形式得以解决的。在美国,银行和信贷团体的增长似乎与随着制造商的信贷需求增加相关联。成功的纺织业制造商投资银行业,以很低的利息从这些机构得到贷款。<sup>①</sup>更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新英格兰早期银行有着亲属关系的基础。据内奥米·拉莫罗斯的研究,在新英格兰,“银行的确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不是作为经济理论上不可或缺的中间物。更确切地说,作为亲属集团的融资武器,它们筹措资金主要是为了成员的各种投资。而同时,它们为这些集团(普遍认为是前近代的组织)提供了合作的基地,使得这些集团在工业时代生存下来并长期繁荣。”<sup>②</sup>

对于早期行业新入道者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自贡也采取了常见的组织上的解决方法。大多数自贡企业是以家族企业或简单的合伙制起步的。到19世纪末,所有大规模的自贡制造商已实现了复杂、有层级组织的企业的转变,这些企业拥有对企业许多部门进行全面管理的、分立的柜房。尽管这些柜房的构成反映的还是大商家那一套,但越来越多地利用非亲属的专家充实这些管理部门,这是迈向管理专业化的重要一步。<sup>③</sup>盐场内部的劳动力分工,一些在清中期以前就已存在,也变得日益复杂。工人培训体系与在车间监督的工头的体系相配套,在上面树立的是一个既非工人也非老板的新管理层,即所谓蓝袍,相当于西方

---

① 芭芭拉·瓦特:《1840—1860年新英格兰纺织厂的产业借款》,216—221页,载《经济史研究》第21卷第2期,1961年。

② 内奥米·拉莫罗斯:《银行、亲属关系和经济发展:新英格兰的个案研究》,648—649页,载《经济史研究》第46卷第3期,1986年。拉莫罗斯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马萨诸塞和罗德岛的研究之上。

③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指出,美国早期大多数企业依靠的都是商户管理模式。直到19世纪晚期为了应付修建营运美国铁路日益复杂的工程设计和融资技巧,才过渡到真正的专业管理。见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的管理革命》,320—322页,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77年。

的白领。

这一管理上创新的推动力，来自于纵向一体化企业的创立。如前所述，到了19世纪中期，自贡规模较大的食盐生产商已经将盐业的各个方面置于一个“屋顶”之下：盐井开凿、盐灶煎盐、食盐销售，还有为牛只提供饲料、为雇工提供伙食的农业用地，再加上商号——任务是销售那些从重庆等主要的食盐市场拿回的物资，以及向井、灶供应大部分日常需求品。企业主要部门不制造和销售的那些物品，常常是从与该企业有着连锁股权关系的企业购买的，这与新英格兰纺织制造商所拥有的连锁管理职位和合伙关系没有什么不同。

纵向一体化既是进步也是市场不发达的标志，驱使制造商努力将各种投入置于垄断之下。新英格兰纺织制造商逐渐将梳棉、纺纱、织布与上色结合在一起，美孚石油是将原油的提炼与营销联合，<sup>④</sup>而自贡食盐生产商使用纵向一体化，确保供应的来源，为的是最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生产卤和气越高效，就越可能保证他们的工厂24小时开工，保证他们的食盐占有日益扩张的市场。就自贡而言，落后的交通以及农业投入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将无能力进行一体化的生产商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即便如此，食盐生产商不能包揽所有的投入，1918年箴索制造工人罢工所引发的恐慌就证明了这一点。<sup>⑤</sup>

为了帮助理解自贡在工业史上的地位，指出它与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园制度相类似也很重要。我们认为，自贡与美国工业中最先进的部分有着相似性，这种类比可能显得有些怪异。然而，不仅自贡最终命运的答案，需从它的技术、金融和管理的创新去寻找，而且必须将自贡作为工业的“单一经营”的例子加以理解。

我们已经从定性的角度，指出了自贡对于川南农业物资市场的重要

---

<sup>④</sup> 同上文，68、335—336页。

<sup>⑤</sup> 见第五章。

性。将自贡对于全省经济的重要性进行量化估算则要困难得多。<sup>⑥</sup> 我们没有清末四川非农产值的可靠数据。然而,20世纪初的数据,可以为们提供食盐在四川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托马斯·罗斯基对1933年四川省内总产值做过估算,约有50.1亿元,其中35.53亿元约合70%是四川的农业产值。<sup>⑦</sup> 由于没有四川1930年代全面的调查数据,罗斯基的估算是建立在全国数字的基础之上,并从1950年代农业与非农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比重进行回推。<sup>⑧</sup> 依据他的计算,1933年四川非农产值包括矿业,约14.57亿元。这些数字可能偏低。四川盐政体系收集的数字使得我们可以计算1933年盐场销售食盐的总值。这一数字是2 756 112 417元,比罗斯基的整个工业产值高出许多。<sup>⑨</sup> 一些农业产出作为盐业的投入被重复计算,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差异,同时毫无疑问,罗斯基未能将一些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在内也是其中的原因。总之,对这一数字进行合理校订,可以认为四川工业产值的大部分应归结为盐业。

其他关于四川工业化低水平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根据海关总税务司1933年的报告,在上一个十年间,四川在利用机器上没有什么进步。棉纺织仍旧是家庭手工业,只有一家试用织布机的纺织厂。全省只有一家机械染色厂和四家面粉厂。86家缫丝厂中,只有17家拥有现代机器。此外,四川还有数家针织厂、制革厂、蒸汽缫丝厂,一家肥皂厂以及一家碾米厂、两家水泥厂、数家衰败的火柴厂、两家现代制冰厂、

---

⑥ 富荣的营销网络延展深入邻省,但它对于川西地区的影响很小。即使如此,它在由省里所确立的盐业管理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省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和它对省内投资的影响,都说明了以省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是可行的。

⑦ 托马斯·G. 罗斯基:《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20页,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⑧ 这一方法,是假定在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工业经济鲜有持久性的改变。这一问题已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考虑到战后来自中国东部的难民大量外迁,以及1950年代初国家在西部投资的低水平,这一假定似乎有道理。

⑨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卷3,篇2,章9,节2,页59a—61b;卷3,篇2,章11,节7,页107a—109a,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

为数不多的干电池厂。<sup>⑩</sup> 这些所谓的“工厂”都是家庭手工业，散布在四川各处。因此，一直到 1930 年代，盐业一直是四川主要的制造业，自贡是四川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这对于我们分析自贡之于工业发展的贡献有什么意义呢？它说明，自贡在为自己筹集资金上极其成功，成为了一块海绵，吸收了四川稀缺、正在寻求出路的资本。许多来自山西、陕西、江苏、湖北等地的商人不是将利润汇回老家，而是投资于井和灶。来自四川各县的商人，像江津的盐锅制造商，投资服务盐场的商业，并最终也投资盐业生产。自流井和贡井的当地人，更无理由远离家乡去寻求商机。到 19 世纪末，一个强势的井帮跻身盐场的跨省各商帮群体。富荣盐场不仅成为投资资本的一个目标，而且它也成为人力资本的培训基地。许多井、灶管理人员出身于盐场以外的商人家庭，被派到自贡当学徒，有的留下来任职员，后来他们自己成了投资者。尽管没有办法考察这种人力和资金的流动是否流向别处，但毫无疑问，到 19 世纪末，富荣盐场的发展及其合伙制刺激了前所未有的人力和金钱，顺沱江南下，来到川南。

为自贡盐业繁荣供给“燃料”的不只是来自商业资金，例如由从事食盐批发贸易的陕西商人所赚得的资金。自贡制盐业利润的主要投资目标还是自贡。利润被投资在股份，而出自股份的利润，又被投资于更多的股份。大生产商起家于小生产商，像颜桂馨堂的颜家，它的原则是以井创井，即使用一眼井的利润去凿铤下一眼井，这造就了它，成为 19 世纪自贡四大家族之一。在自贡，清末最富有的大型盐业联合企业的历史记述中，没有在盐业以外投资的材料。要求有农业资产，以养活企业的雇工和水牛。成立商号以营销食盐并取得制盐所需的物资。井、灶投资于出售竹木的企业。甚至有材料表明，在世纪之交，大型盐业联合企业

296

<sup>⑩</sup> 总税务司：《十年报：1922—1931 年》第 1 卷，“北方和长江口岸”，海关统计系列第 6 号，480—482 页，上海，1933 年。

从最初是为建设川汉铁路所筹的经费中借款,以进一步增加他们从食盐获利的机会。<sup>①</sup>

投资集中于自贡盐业,这很容易理解。自贡就像沙漠中的一眼泉水。清初生灵涂炭,四川中部肥沃的红色盆地在农业上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四川整体上多山,并被中国一些最不发达的地区所包围:云南北部、贵州、湖北西部、西藏东部以及西北部干旱之地。长江,将四川与外部世界相连接,但难以逆流而上,这限制了东来的物资交易。但顺流轻松而下,利于四川出口大宗物资,如粮食、草药、农产油品和食盐。正是这一河运网络,可以将货物从重庆带至宜昌乃至更远的地方,也使得在太平天国高潮时富荣食盐突进湖广市场。

四川在晚清成为中国的粮仓,它所供应的大米,不但养活了日益增多的人口,而且也成为中国东部不再出产粮食的新兴手工业中心的主要粮食来源。自贡保有着这一仅有的工业,孤零零地位于遥远的四川南部。而且,该产业的性质也确保了至少在短期内不会产生其他新的产业。一直到 1890 年代,储量丰富的天然气似乎可以无限制地吸纳新的盐卤,人们还只是投资于开凿新井而不顾其余。而且,这一生产上的扩张对于产业向上游或下游企业的发展,没有什么影响。直至该世纪末,大多数投资于自贡这一产业的投入都来自农业。对于盐锅、钻头等工具,自贡有着源源不断的需求,这刺激了四川东部的炼铁厂。一些盐灶燃煤煎制巴盐,采煤业也随之繁荣起来。但是直刺自贡天际的天车,还有天地滚子,大多数由木料制成,坐落在乡村的柜房、仓库、橛桶和牛棚也由木料制成。卤筒和竹笕由竹子做成,提升卤筒的绳索也是如此。麻和桐油包裹着竹笕,竹制盐包盛装食盐以供出售。皮制活塞控制着卤水  
297 进出卤筒。只是到了 20 世纪,向大灰子井的转变以及引入以蒸汽为动力的机车才将自贡盐业与以非畜力为基础的工业连在一起,并用金属的

<sup>①</sup> 张端甫:《隗乐地区首屈一批的大场商——吴景让堂》,51 页,载《井盐史通讯》第 6 期,1979—1980 年。

机车、绳索和卤筒取代了天然的制品。

自贡没有提供多少向下游产业发展的机会。拥有一个以采掘和提炼为基础的产业，自贡朝这一方向发展，仅有的希望是提炼的多样化，提炼丰富卤水储藏中所包含的其他矿物资源，包括锂、钡、铯、镁、钾、铬、碘、硼、锶。<sup>⑫</sup> 我们已经看到，早在 1916 年，盐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像林振翰，已经提倡对富荣丰富的卤水资源进行替代性的工业和农业利用。然而，在第二次大战以前，这方面鲜有成就。在 20 世纪头 20 年，盐井技术和机械化汲卤的创新，吸引了自贡大部分的投资。在 1920 和 1930 年代政治和军事动荡时期，四川市场经济经常被打断，加上盐业利润不断下降，挫伤了外来的投资和盐场的科学调查。<sup>⑬</sup> 四川的交通设施以及与中国北部、东部工业和沿海出口市场的联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正因如此，在抗战前夕，这座矗立在食盐之上的城市仍旧矗立在食盐之上，无力对抗单一经营的风险，对于周边产业发展也没有什么贡献。有人估算，自贡出产了约 15 万吨卤水，这也是它所出售的全部。<sup>⑭</sup>

1937 年，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四川的经济。随着东部食盐供应地被日本占领，四川盐业再一次被要求满足广大人口的烹饪以及工业之需。无法仅依靠市场的力量以复兴这一日见衰落的产业，国民党政府重新制定了一套国家购买和分配食盐的制度。为刺激已报废的井、灶重新开工，国家也实施了一套向生产商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的方案。在很短的时间内，富荣的产量超过了此前数十年的最高水平，最多时一年约生产 26 万吨盐。<sup>⑮</sup>

⑫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18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年。

⑬ 1934 年，邓惠霖聚集投资者在凉高山开办四川建国化工厂，但第二年就停产了，直到 1940 年代才重新开张。见自贡化学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化学工业志》，1 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十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⑭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68 页。

⑮ 同上书。

日本占领中国东部,也引发了中国企业的西迁,其中包括久大盐业公司、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sup>⑮</sup> 它们每个都给自贡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设备和研究人员,使得盐场能够制造食盐的副产品,如氯化钾、硼酸、碳酸钙、碳酸镁。同时,军工和中国工业再安置的种种需求,为自贡的新化学产品开创了一个新的市场。尽管它们的科技和生产水平仍然落后于中国东部的样板企业,但到战争结束时,有 15 家当地企业也向这一领域进行了投资。<sup>⑰</sup>

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就有了机器生产和维修,在此基础之上,自贡机器工具产业在战时也繁荣起来。到 1940 年,战前的 9 家工厂发展到 15 家。根据自贡地区机器工业同业工会的注册登记,到抗战结束时,有 32 家服务于机械制造业的企业:12 家是铸造厂,20 家是修配厂。<sup>⑱</sup>

1946 年,随着战争的结束和中国东部的光复,中国东部的工业家返回东部沿海,富荣市场再次崩溃。到 1949 年,富荣仅有 979 口盐锅在煎盐,仅生产 1 920 吨盐。<sup>⑲</sup> 战后留在盐场的久大制盐公司在该年 8 月停产。至此,大多数自贡的铸造厂和修配厂都已关张。<sup>⑳</sup>

共产党治下的自贡仍然是个停滞不前的产业城市,受阻于与中国沿海经济间的落后交通,也受阻于有限的盐和盐副产品市场。共产党一掌权,自贡的私人企业,如同中国其他地方的一样,允许与新兴的国营企业共存,后者有一些是国民党发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遗存。自贡残存的久大工厂 1951 年变成公私合营企业,雇佣了许多当时自贡破产的盐业

---

<sup>⑮</sup> 唐仁粤等编:《中国盐业史》,64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九大和永利,见关文斌《管理市场、层级和网络:1917—1937 年的久大—永利公司》,商业史协会年会论文,马萨诸塞州洛厄尔,2003 年。

<sup>⑰</sup>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69 页。

<sup>⑱</sup> 自贡市机械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市机械工业志》,64 页,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二十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sup>⑲</sup>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71 页。

<sup>⑳</sup> 《自贡市盐业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盐业志》,656 页,自贡,1992 年;自贡市机械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市机械工业志》,64 页。



企业家。1954年，在国家的压力下成立了公私合营的建华制盐公司，它的“投资者”包括罗筱元、侯策名、罗华垓、熊佐周和张开铭。<sup>①</sup> 1957年建华成为了国营自贡盐业公司新成立的一厂、二厂和三厂的一部分。私人企业家身份在中国结束了。对于自贡商人来说，他们的遗产成为了他们的历史，他们建设的产业成了博物馆、档案和人们的记忆。

※※※※※※※※※※

在我们结束自贡这部分历史之前，值得看一眼今天的自贡。1939年东场和西场合并所成立的自贡市，现在是一座人口300多万、日益繁荣的大都市。竹木的天车已被高层楼群所取代，成为了自贡天际线的主要形象(见图片E.1)。自贡的生产商现在将生意做到了整个中国以及国



图片 E.1 今日自贡——汇东区的新发展

摄影：Matthew Malloy.

<sup>①</sup> 《自贡市盐业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盐业志》，658页。

299 外的市场。在互联网上用“Zigong”进行搜索,你会看到数十家正在寻求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公司的网址。

1992年,作为中国政府“开发大西北”战略的一部分,自贡定位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那时起,自贡受益于政府商务服务的再建设,建设跨老城釜溪河高科技工业园的行动,可能最为重要的是,连接自贡与成都和重庆的现代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建设。根据高新区网站介绍,2004年夏自贡有18122家工业企业,其中49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sup>②</sup>

今天自贡的工业家们可以从国内和 international 的资本市场受益,还有政府以基础建筑形式给予的支持。与前辈相比,他们活动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以及不断变化中的)法律和国际商业环境中。自贡现在有一所理工院校和60多所科研机构。技术、工程以及管理人员在国内外的许多大学和技术学校接受培训。

300 自贡的工业家们能否在当代中国这样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取得成功,决定性因素与影响他们先辈的迥然有别。但是在改革年代,自贡产业的根基仍旧存在于19世纪盐业的成就之中;在20世纪初依然兴盛的这一产业,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在国营企业与中等科研机构中保持着生机。今天,资源——卤水和天然气——依旧构成了自贡繁荣的基础。自贡的主导产业继续是食盐、食盐副产品以及在为它们服务中成长起来的机械制造业。

---

<sup>②</sup> [http://www.zggxq.com/english/brief/en\\_index.html](http://www.zggxq.com/english/brief/en_index.html)

## 参考文献

### 档案

-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北京)  
自贡市档案馆所藏档案(四川自贡)  
四川省档案馆所藏巴县档案(四川成都)

### 已出版资料

- Adshead, S. A. M.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 1900—192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阿谢德:《中国盐政的现代化:1900—1920》,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
- . *Province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iceregal Government in Sichuan, 1898—1911*. London: Curzon Press, 1984.
- 阿谢德:《清末的省与政治:1898—1911年的四川总督》,伦敦:柯曾出版社,1984年。
- . “Salt and Warlordism In Szechwan 1914—1922.” *Modern Asian Studies* 24, no. 4(1990): 729—743.
- 阿谢德:《四川的食盐与军阀:1914—1922》,载《现代亚洲研究》第24卷第4期(1990年):729—743页。
- . *Salt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阿谢德:《食盐与文明》,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2年。
- (佚名)《商会的沿革》,稿本,自贡。
- (佚名)《自流井之金融与金融业》,载《四川经济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年):67—75页。
- (佚名)《四川近百年大事提纲》,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

- Baskin, Jonathan B.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Financial Markets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600—1914: Overcoming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62(Summer 1988): 199—237.  
乔纳森·B. 巴斯金:《1600—1914年英国和美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克服不对称信息的研究》,载《商业历史评论》第62卷(1988年夏):199—237页。
- Beattie, Hillary.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cheng, Anhu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希拉里·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明清安徽桐城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
- Beatty, Bess. "Lowells of the South: Northern Influences 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orth Carolina Textile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53, no. 1 (1987): 37—62.  
贝丝·贝亚蒂:《南方的洛厄尔:北方对于十九世纪北卡罗来纳纺织业的影响》,载《南方史学刊》第53卷第1期(1987年):37—62页。
- Bell, Lynda. "From Comprador to County Magnate: Bourgeois Practice in the Wuxi County Silk Indust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anff 1987.  
林达·贝尔:《从买办到县大亨:吴锡县丝绸县的中产阶级实践》,中国地方精英与统治模式研讨会论文,班夫,1987年。
- Belsky, Richard. "Beijing Scholar-Official Native-Place Lodge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volution of Huiguan in China's Capital City."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7.  
白思奇:《北京会馆的社会和政治演进》,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 Buoye, Thomas. "Litigation, Legitimacy and Lethal Violence." In Madeleine Zelin, Jonathan Ocko, and Robert Gardella, eds,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94—11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步德茂:《诉讼、合法性和致命暴力》,载曾小萍、欧中坦、罗伯特·加德拉编《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与产权》,94—119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
- Cai, Shaoqing. "On the origin of the Gelaohui." *Modern China* 10, no. 4(1984).  
蔡少卿:《论哥老会的起源》,载《近代中国》第10卷第4期(1984年)。
- 财政部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编:《中国盐政实录》第2辑,文海出版社,1933年。
- Chandler, Alfred D.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阿尔弗雷德·D.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的管理革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77年。
- Chandler, Alfred Dupont, and Takashi Hikino.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阿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引野隆志：《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90年。
-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
- Chang, Ning Jennifer.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Business Diversification: The Case of the China Egg Produce Company in Shanghai, 1923—195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 Annual Meeting, Lowell, MA, 2003.
- 张宁：《纵向一体化与经营多样化：上海中国冰蛋业同业公会个案研究（1923—1950）》，商业史年会论文，马萨诸塞州洛厄尔，2003年。
- Chao, Kang. *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 74.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赵冈：《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哈佛东亚研究丛刊第74种，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1977年。
- 陈本青：《渝沙债团与王三畏堂债务始末》，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992年）：1—10页。
- 陈凯崇等：《辛亥革命至解放前夕自贡地方驻军情况》，《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121—131页。
- 陈然：《近代自贡盐业工人状况及其斗争》，载彭久松、陈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自贡井盐史论丛》，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 陈然：《论自贡盐业工人一九二八年春季大罢工》，载彭久松、陈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自贡井盐史论丛》，257—274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 陈然：《自流井的崛起及其发展》，载《盐业史研究》1987年第1期：137—146页。
- 陈文安：《川盐济楚始末》，载《井盐史通讯》1981年第8期：44—48页。
- Chiang, Tao-chang. “The Salt Industry of China, 1644—1911: 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5.
- 姜道章：《清代盐业的历史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夏威夷大学，1975年。
- Coble, Parks M.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 94.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帕克斯·M.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哈佛东亚研究丛刊之94，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1980年。
- Cochran, Sherm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高家龙:《遇到中国网络:在华的西方、日本和中国企业,1880—1937》,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

Cohen, Myron. “Commodity Cre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orporations, Shares and Contracts in One Rural Community.” In David Nugent, ed. *Locating Capitalism in Time and Space: Global Restructuring, Politics and Ident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孔迈隆:《帝制中国晚期的日用品生产:一个乡村中的公司、股份和契约》,载戴维·纽金特编《确定资本主义的时间和空间:全球的重建、政治与身份》,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年。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简明牛津词典》,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Crawford, Wallace. “The Salt Industry of Tzeliutsing.”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 4(1926): 4: 81-90, 169-175, 224-229; 5(1927): 20-26.

华莱士·克劳福德:《自流井的盐业》,载《中国科学和艺术学刊》第4卷(1926年):81—90页,169—175页,224—229页;第5卷(1927年):20—26页。

Cronon, William.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Norton, 1991.

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纽约:诺顿出版社,1991年。

崔雨脂、颜绍渊:《贡井盐商余述怀》,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84年):169—184页。

戴执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专刊2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Davis, Lance E. “The New England Textile Mills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Study of Industrial Borrowing 184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 no. 1 (1960): 1-30.

兰斯·E·戴维斯:《新英格兰纺织厂和资本市场:1840—1860年产业借款研究》,载《经济史学刊》第20卷第1期(1960年):1—30页。

De Roover, Raymond. *Money, Banking and Credit in Mediaeval Bruges: Italian Merchant Bankers, Lombards and Money-changers*. Cambridg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48.

雷蒙德·德罗佛:《中世纪布鲁日的货币、银行业与信贷: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伦巴第族人和货币兑换商》,剑桥:美国中世纪研究院,1948年。

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Dillon, Michael. “Transport and Marke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ingdezhen Porcelain Industr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5, no. 3(1992).

迈克尔·狄龙:《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业发展过程中的运输与营销》,载《东方经

- 济与社会史学刊》第 35 卷第 3 期(1992 年)。
- 丁宝楨等纂修:《四川盐法志》,光绪八年(1882)。
- Eastman, Lloyd E.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 年。
- .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 年。
- Elman, Benjamin A.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艾尔曼:《明清科举文化史》,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 年。
- 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伊懋可:《中国历史的模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 年。
- Eng, Robert.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Silk Production and Exports, 1861—1932*.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6.
- 罗伯特·恩格:《中国的经济资本主义:丝绸生产与出口,1861—1932》,伯克莱:中国研究中心,1986 年。
- Entenmann, Robert. "Sichuan and Qing Migration Policy." *Ch'ing-shih wen-t'i* 4, no. 4(1980): 35—54.
- 鄢华阳:《四川与清朝的移民政策》,载《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4 期(1980 年):35—54 页。
- .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Sichuan, 1644—1796."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 鄢华阳:《移民四川(1644—1796)》,博士学位论文,哈佛大学,1982 年。
- Erlanson, Evan. "Commercial Banking in Sichuan, 1915—1935: The Case of the Young Brothers Banking Corporation."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 6(1997): 43—82.
- 埃文·厄兰森:《1915—1935 年的四川商业银行业:聚兴诚银行个案研究》,载《中国历史论文》第 6 卷(1997 年):43—82 页。
- Esherick, Joseph.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周锡瑞:《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 年。
- Esherick, Joseph and Mary Backus Rank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Studies on China, no. 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0.
- 周锡瑞、冉玫烁:《中国地方精英与统治模式》,中国研究丛书之11,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
- Fairbank, John King,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 费正清、默尔·戈德曼《中国新史》,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贝尔纳普出版社,1992年。
- 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 Fang, Zhuofen; Tiewen Hu; Rui Jian; Xing Fang. "The porcelain industry of Jingdezhen" [early and middle Qing period]. In Dixin Xu and Chengming Wu, eds. *Chinese Capitalism, 1522—1840*, 308 - 32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方卓芬、胡铁文、简锐、方行:《景德镇的制瓷业(清朝前中期)》,载许涤新、吴承明编《中国的资本主义(1522—1840)》,308—326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0年。
- Faure, David. "The Lineage as Business Company: Patronage versus Law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sin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1989.
- 科大卫:《作为商业企业的宗族:中国商业发展的赞助与法律》,第二届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89年。
- Feuerwerker, Albert.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费维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
- Feuerwerker, Albert, Denis Crispin Twitch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费维恺、崔瑞德、费正清:《剑桥晚清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
- Freedman, Maurice.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8.
- 莫里斯·弗里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伦敦:阿斯隆出版社,1958年。
- Fu, Lei, Zhixiang Liu, and Auyeung Pak. *A Study of Zigong Salt Mine Accounts in China*. Available from <http://www.deakin.edu.au/wcah/papers/Fu.pdf>
- 傅雷(音)等:《自贡盐矿帐册研究》。
- 《富顺县志》,乾隆四十二年(1777)本,光绪重刊本。
- 《富顺县志》,同治十一年(1872)本。
- 高明安:《五通桥盐场的封建陋规》,载《五通桥盐业史料选辑》第二辑(油印本),



- 1965年。
- Gardella, Robert Paul. "Squaring Accounts: Commercial Bookkeeping Methods and Capitalist Rationalism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 no. 2(1992): 317—339.
- 罗伯特·保罗·加德拉:《结账:清末民初的商业记账方法和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载《亚洲研究杂志》第51卷第2期(1992年):317—339页。
- Gardella, Robert Paul. *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 175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罗伯特·保罗·加德拉:《采山:福建和中国的茶叶贸易,1757—1937》,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
- Golas, Peter. "Early Qing Guilds."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彼得·戈拉斯:《清初的行会》,载施坚雅编《帝制晚期中国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
- Goodman, Bryna.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布赖纳·古德曼:《家乡、城市和民族:上海的区域网络和身份(1853—1937)》,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
- Gras, N. S. B.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9.
- N·S·B·格拉斯:《经济史导论》,纽约:奥古斯塔斯·M·凯莱出版社,1969年。
- “国立”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共32辑),第15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年。
-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台北:国风出版社,道光六年(1826)本,1963年重印。
- Hershatter, Gail.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盖尔·赫尔沙特:《1900—1949年的天津工人》,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
- Ho, Ping-ti.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954): 130—168.
- 何炳棣:《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研究》,载《哈佛亚洲研究》第17卷(1954年):130—168页。
- .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

- 霍柏森:《重庆海关 1891 年调查报告》,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1962 年)。
- Honig, Emily.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韩启澜:《姐妹与陌生人:1919—1949 年上海棉纺厂中的妇女》,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 年。
- Hosie, Alexander. *Szechuan, its Products,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22.
- 谢立山:《四川:物产、工业和资源》,上海:别发洋行,1922 年。
- Hu, Charles. *Th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Land-use of Szechuan Bas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6.
- 查尔斯·胡:《农业和林地:四川盆地的土地利用》,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6 年。
- 胡少权、罗筱元:《清季自贡地方五书院》,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辑(1984 年):185—194 页。
- 胡少权:《自贡盐场济公皮局始末》,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23 辑(1993 年):69—70 页。
- 胡少权:《贡井胡元和的兴起与衰落》,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2 辑(1981 年),49—79 页。
- 黄纯武等:《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竹业》,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1963 年)。
- 黄健:《自贡盐场帮会浅析》,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自贡,1990 年。
- Huang, Philip C. *Civil Justice in China,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 年。
- .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no. 2 (2002): 501—538.
-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 18 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第 61 卷第 2 期(2002 年):501—538 页。
- 黄植青、聂无放:《自贡盐场发展片断》,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6—10 辑(1982 年),251—257 页。
-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Shanghai, China. *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 Vol. 1—Northern and Yangzi Ports, *Maritime Customs, Statistical Series number 6*. Shanghai, 1933.
- 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922—1931 年》,第 1 卷“北方和长江口岸”,《海关统计系列》第 6 号,上海,1933 年。

- 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64年)。
- 姜相臣、罗筱元:《自贡盐场的牛》,《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
- Kapp, Robert A. *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罗伯特·A·卡普:《四川和中华民国:省区军事行动与中央权力,1911—1938》,纽黑文:耶鲁大学,1973年。
- . “Themes in the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Southwest China.” *Pacific Affairs* 51, no. 3(1978).  
 罗伯特·卡普:《二十世纪中国西南历史的主题》,载《太平洋事务》第51卷第3期(1978年)。
- Kirby, William C. “China Unincorporated: Company Law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 no. 1(1995).  
 柯伟林:《中国的非股份制:二十世纪中国的公司法与商业企业》,载《亚洲研究杂志》第54卷第1期(1995年)。
- Köll, Elizabeth. *From Cotton Mill to Business Enterprise: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Enterprises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伊丽沙白·薛尔:《从纺织厂到商业企业:近代中国区域性企业的出现》,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
- Kurlansky, Mark. *Salt: A World History*. New York: Walker, 2002.  
 马克·科兰斯基:《盐:一部世界史》,纽约:沃克出版社,2002年。
- Kwan, Man Bun. *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关文斌:《天津盐商:帝制晚期中国的国家形成与市民社会》,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1年。
- . “Managing Market, Hierarchy and Network: The Jiuda-Yongli Group, 1917—1937.”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 Annual Meeting, Lowell, MA 2003.  
 关文斌:《管理市场、层级和网络:1917—1937年的久大—永利公司》,商业史年会论文,马萨诸塞州洛厄尔,2003年。
- 赖明钦等:《盐岩井发展概况》,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3—52页。
- Lamoreaux, Naomi. “Banks, Kin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w England Cas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no. 3(1986).  
 内奥米·拉莫罗斯:《银行、亲属关系和经济发展:新英格兰的个案研究》,载《经济史杂志》卷46第3期(1986年)。
- . “Information Problems and Banks' Specialization in Short-Term Commercial Lending: New Eng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Peter Temin, ed. *Inside*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61 - 195.

内奥米·拉莫罗斯:《信息问题和银行短期商业贷款的专门化: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载彼得·特明编《商业企业内部:信息利用的历史考察》,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161—195页。

Lamoreaux, Naomi R., Daniel M. G. Raff, and Peter Temin. "Beyond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of American Business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8, no. 2(April 2003): 404 - 432.

内奥米·拉莫罗斯、丹尼尔·M. G. 拉夫、彼得·特明:《超越市场和层级:迈向美国商业史的一个新综合》,载《美国历史评论》第108卷第2期(2003年4月):404—432页。

Landes, David 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戴维·S. 兰第斯:《摆脱束缚的普罗米修斯:西欧自1750年迄今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

Langlois, Richard. "The Vanishing H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2, no. 2(2003): 351 - 385.

理查德·朗格卢瓦:《消失不见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变迁的动力》,载《工业与公司变迁》第12卷第2期(2003年):351—385页。

Lee, En-han. *China's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 1904—1911: A Study of the Chinese Railway-Rights Recovery Movement*.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7.

李恩涵:《中国寻求铁路自治(1904—1911):中国铁路收回国有运动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77年。

《乐山县志》,1934年。

Lewis, Carlton. "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in Late Ch'ing China." In Jean Chesneaux,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97 - 11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卡尔顿·刘易斯:《晚清的哥老会》,载谢诺编《中国民众运动和秘密社会(1840—1950)》,97—112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

李筠庭:《清末以来的汲卤箴索制造业》,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64年):423—446页。

黎雷:《罗筏元旧事》,载《自流井》1983年第1期。

Li, Lillian. *The Chinese Silk Trad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李明珠:《中国丝绸贸易》,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

李凌霄等纂:《南溪县志》,1937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重印。

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龙安书院,光绪十八年(1892年)版。

- . “Ziliujing ji, An Account of the Salt Industry at Ziliujing.” *ISIS* 39(1948).
- 李榕:《自流井记》(英译),载 *ISIS* 第 39 卷(1948 年)。
- 李永成修:《富顺县志》,1931 年。
- 李子琳等:《自流井李四友堂由发轫到衰亡》,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1962—1963 年)。
- Lieberthal, Kenne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Studies on Modern China.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1.
- 李侃如:《对于近代中国的观察》,近代中国研究丛书,纽约州阿芒克:夏普出版社,1991 年。
- 《李家年谱》,清初抄本。
- 林地焕:《四川盐政的改革(1895—1920)》,“国立”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3 年。
- 林建宇:《辛亥自贡地方商人与政府》,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21 辑(1991 年)。
- 林建宇:《盐业资产阶级与自贡地方议事会——馆藏民初历史档案浅析》,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自贡,1990 年。
- 林元雄、宋良曦、钟长永:《中国井盐科技史》,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年。
- 林悦葱:《自贡地方议事会的回忆》,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1982 年):167—173 页。
- 林悦葱等:《辛亥革命在自贡》,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2 辑(1981 年):1—11 页。
- 林泽渊:《我所知道的自贡井、灶大关》,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1990 年):第 108—111 页。
- 林振翰:《川盐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年。
- 凌耀伦:《清代自贡井盐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14 辑(1982 年)。
- Liu, Ta-chung, and Kung-jia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1933—195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 年。
- 刘贞安纂:《云阳县志》,1935 年。
- 刘镇国:《新兴制盐厂》,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1982 年):249—259 页。
- 吕实强:《近代四川人口密度与人口压力的分析》,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5 期(1977 年):423—446 页。
- 鲁子健:《川盐济楚与四川盐业发展》,载《社会科学研究》1984 年第 2 期。
- 鲁子健:《清代四川的盐榷与盐泉》,载《盐业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56—64 页。
- 罗成基:《陕商在自贡盐厂的起落》,载彭泽益、王仁远、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编《自贡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
- 罗从修:《贡井盐场的井、灶大关》,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1990 年):121—123 页。
- 罗筱元:《富荣官运局的弊害》,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辑(1984 年)。

罗筱元：《井富马路的开始修建》，手稿，1964年。

罗筱元《罗筱元自述》，手稿，自贡市档案馆藏。

罗筱元：《张筱坡对自贡盐场的影响》，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81年）：178—192页。

罗筱元：《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1963年）。

罗筱元、姜相臣：《自贡盐场的枳商》，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135—145页。

马仿波：《自贡盐场的木材商业》，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271—286页。

马绍周、何兆青：《重庆川盐银行始末》，载《重庆5家著名银行》（重庆工商史料第七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马宗瑶、聂成勋：《自流井大坟堡岩盐体开发状态及开采历史解析》，载《井盐史通讯》1983年第1期。

曼因（笔名）：《自流井》，成都，1944年。

Metzger, Thomas A. "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Ch'ing State in the Field of Commerce: The Liang-huai Salt Monopoly 1740—1840." In W. E.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墨子刻：《清政权在商业领域的组织能力：两淮食盐专卖（1740—1840）》，载 W. E. 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9—45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

Mokyr, Joe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no. 2(1974): 365—391.

乔尔·莫基尔：《十九世纪上半叶低地国家的工业革命：一项比较研究》，载《经济史学刊》第34卷第2期（1974年）：365—391页。

森纪子：《清代四川的盐业资本》，载《明清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

Naquin, Susa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韩书瑞：《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

Needham, Joseph, and Jung-pang Lo. "The Salt Industry" [draft chapter fo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Manuscript, 1972.

李约瑟、罗荣邦：《盐业》（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所写的初稿），未刊稿，1972年。

倪敬先：《我对裕通银行自贡分行的回忆》，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6—10辑（1982年）：294—299页。

聂无放：《清末以来自贡盐场的金融业》，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91年）：

79—90页。

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土地与交易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0年。

小野和子:《明清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

Osborne, Anne. "Natural Barriers to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the Anhui-Zhejiang-Jiangsu Border Reg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December 1985.

安妮·奥斯本:《苏皖浙交界地区农业集约化的自然障碍》,美国历史协会年会论文,1985年12月。

欧阳馥牟等:《自贡地方的典当业》,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146—155页。

Parsons, James B. "The Culmination of a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 Chang Hsienchung in Szechuan, 1644—164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1957).

詹姆士·B·帕森斯:《中国农民反叛的巅峰: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载《亚洲研究杂志》第16卷(1957年)。

彭久松、陈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四川井盐史论丛》,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彭泽益:《清代四川井盐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27—45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1840—1949)》,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彭泽益、王仁远、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编:《自贡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彭泽益编:《自贡市志——会志资料长编》,自贡:自贡市工商业联合会,1989年。

Perry, Elizabeth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劳工政治》,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

Pollard, Sidney. "Fixed Capital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no. 3(1964): 299—314.

悉尼·波拉德:《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固定资本》,载《经济史学刊》第24卷第3期(1964年):299—314页。

Pomeranz, Kenneth.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rl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no. 2(2002): 539—590.

彭慕兰:《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载《亚洲研究杂志》,第61卷第2期(2002年):539—590页。

Potter, Jack.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杰克·波特:《资本主义和中国农民:一个香港村庄的社会和经济变迁》,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

- Pressnell, L. S. *Country Banking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6.
- L·S·普雷斯内尔:《工业革命中的地方银行业》,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6年。
- Price, Jacob. "Economic Function and the Growth of American Port Town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8(1974): 123-184.
- 雅各布·普赖斯:《美国港口城镇的经济功能和成长》,载《美国历史观察》第8卷(1974年):123—184页。
- 蒲月生:《自贡瓦斯井、灶的大关》,载《自贡文史资料选编》第20辑(1990年):119—121页。
- 蒲月生:《自贡盐商罗华垓》,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74—90页。
- 蒲月生:《自贡盐商熊佐舟事略》,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7年):1—20页。
- 樵甫:《自流井(第一集)》,成都:聚昌公司,1916年。
- 冉光荣、张学君:《明清四川井盐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 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关于清代富荣盐场井盐企业的初步分析》,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0年第5辑。
- 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和明清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Rawski, Evelyn. "Property Rights in Land in Ming and Ch'ing China." Manuscript, 1985.
- 罗友枝:《明清时期的土地产权》,未刊稿,1985年。
- Rawski, Thomas G.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托马斯·G·罗斯基:《战前中国的经济成长》,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
- Reynolds, Dougla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道格拉斯·雷诺兹:《1898—1912年的中国:新政与日本》,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
- Richardson, Philip.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c. 1800—1950*. New Studi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菲利普·理查森:《1800—195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变迁》,经济与社会史新研究系列,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
- Rosenberg, Nath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 no. 4(1963): 414-443.
- 内森·罗林贝格:《1840—1910年机械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载《经济史学刊》第23卷第4期(1963年):414—443页。



- .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内森·罗林贝格:《技术和美国经济成长》,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72年。
- .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内森·罗林贝格:《技术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
- Rowe, William.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
- 《三台县志》,1937年版。
- Schmookler, Jacob. *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雅各布·施莫克尔:《发明与经济成长》,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
- Sheridan, James E.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詹姆士·E·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传》,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
- 舒文成等:《自流井烧盐工人的行会组织——炎帝宫》,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2期(1981年):第35—48页。
- 《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北京:财政部盐务署,1902年。
-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志编纂委员会:《自流井区志》,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 Skinner, G. William.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1964).  
施坚雅:《中国乡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4卷第1期(1964年)。
- .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施坚雅:《帝制晚期中国的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
- . "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 *Late Imperial China* 7, no. 2(1986): 1-79.  
施坚雅:《十九世纪的四川人口:对残缺不全资料的解读》,载《帝制晚期中国》第7卷第2期(1986年):1—79页。
- Smith, George David, and Richard Sylla.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 Markets."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 2, no. 2(1993).  
乔治·戴维·史密斯、理查德·西拉:《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论美国资本市场历史》,载《金融市场、制度与工具》第2卷第2期(1993年)。
- Smith, Paul. "Commerce, Agriculture, and Core Formation in the Upper Yangtze, 2 A. D. to 1948."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patial and Temporal

- Trends and Cycl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980—1980, Bellagio, Italy 1984.
- 保罗·史密斯:《长江上游的商业、农业和核心区的形成:公元2—1948年》, 980—1980年中国经济史时空趋势与周期研讨会论文,意大利贝拉蕉,1984年。
- Sokoloff, Kenneth L. “Inventive Activity in Early Industrial America: Evidence from Patent Records, 1790—1846.”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no. 4 (1988): 813—850.
- 肯尼思·L·索科洛夫:《美国工业革命初的发明创造:来自1790—1846年的专利记录的证据》,载《经济史学刊》第48卷第4期(1988年):813—850页。
- 宋朝澜:《我所了解的罗筏元》,载《自流井》1984年第4期。
- 宋良曦:《试论清代四川盐商的发轫》,载《井盐史通讯》1984年第1期。
- 宋良曦:《四川军阀对自贡盐商的劫掠》,载《四川井盐史论丛》,314—331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宋良曦:《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载《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13—22页。
- 宋尚泽:《从辛亥至解放四川行盐九易旗帜》,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1993年)。
- Strand, David. *Rickshaw Beij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全大伟:《北京人力车》,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
- 唐光沛:《明正德年间四川大宁灶夫领导的起义》,载《四川井盐史论丛》,191—215页,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 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1910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重印本。
- 唐仁粤、郭正忠、丁长清、中国盐业总公司编:《中国盐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 Temin, Peter. *Inside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repo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彼得·特明:《走进商业企业:信息利用的历史考察》,经济研究全国委员会研讨会报告,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
- Thompson, Roger R. *China's Local Councils in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1898—1911*.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罗杰·R·汤普森:《1898—1911年中国立宪运动时期的地方谘议局》,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1995年。
- 田茂德:《票号在自贡的一些活动》,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84年):56—72页。
- Tsai, Kellee.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 蔡欣怡:《后街银行业: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2年。
- Tufano, Peter. "Business Failure, Judicial Intervention,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Restructuring U. S. Railroad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1, no. 1(1997): 1-40.
- 彼得·塔法诺:《商业失败、司法干预和财务创新:十九世纪美国铁路的重组》,载《商业历史评论》第71卷第1期(1997年):1-40页。
- Twitchett, Dennis. "The Fan Clan's Charitable Estate, 1050—1760." In David S. Nivison and Arthur F. Wright, eds.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崔瑞德:《1050—1760年的范氏义庄》,载倪德卫、芮沃寿编《行政中的儒家》,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年。
- Vatter, Barbara. "Industrial Borrowing by the New England Textile Mills, 1840—1860;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1, no. 2(1961).
- 芭芭拉·瓦特:《1840—1860年新英格兰纺织厂的产业借款》,载《经济史学刊》第21卷第2期(1961年)。
- Vogel, Hans Ulrich. "The Great Well of China." *Scientific American*(June 1993): 116-121.
- 傅汉思:《中国伟大的井》,载《科学美国人》(1993年6月):116—121页。
- von Rosthorn, Arthur. "The Salt Administration of Ssuch'u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Branch, New Series* 27(1892—1893): 1-32.
- 罗士恒:《四川的盐政》,载《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报》,新系列,第27卷(1892—1893年):1—32页。
- 王笛:《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90—106页。
- 王怀周:《大坟堡盐岩井史料》,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123—137页。
- 王怀周:《自贡井场大关及其职能》,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90年):112—119页。
-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自贡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 王柔德:《解放前自贡盐商的封建性》,载《井盐史通讯》,1983年第10期。
- 王柔德、钟朗华:《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晚年事略》,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5年):70—113页。
- 王守基:《盐法议略》,北京,1877年。
- Wang, Yeh-chien.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王业键:《清朝的田赋(1750—1911年)》,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
- 魏远猷纂:《大宁县志》,光绪十二年(1886)版。

- 温瑞柏:《盐井记》,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台北:国风出版社。道光二十六年(1826)版。
- Wilbur, C. Mart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From Canton to Nanking, 1923—1928.” In John K.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527—720.
- 韦慕庭:《1923—1928年的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载费正清、崔瑞德编《剑桥中华民国史》527—720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
- .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韦慕庭:《中国的国民革命(1923—1928)》,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
- Williamson, Oliver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 奥利佛·E·威廉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和市场签约》,纽约:自由出版社,1985年。
- .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June 1991): 269—296.
- 奥利佛·E·威廉森:《比较经济组织:离散结构替代方案的分析》,载《管理科学季刊》第36卷(1991年6月):269—296页。
- Wright, Tim. *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1895—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提姆·赖特:《中国经济与社会中的煤炭开采,1895—1937》,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
- 吴鼎立:《自流井风物名实说》,同治十年(1871)版。
- 吴铎:《川盐官运之始末》,收入《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
- 吴天颖:《因利聚人,因人成邑——从盐都自流井看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及其特点》,未刊稿。
- 吴炜编:《四川盐政史》,四川盐政室印辑处印行,1932年。
- 许涤新、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 Xue, Yunsheng. *Duli cunyi* [Concentration on doubtful matters while perusing the substututes]. Robert Irick, ed. Research aids series; no. 8. Taipei: Chengwen chubanshe, 1970.
- 薛允升:《读例存疑》,载罗伯特·艾瑞克编《研究辅助系列》,第8种,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道光二年(1822)版,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重印。
- 严如煜:《论川盐》,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道光六年(1826年)版,台北:国风出版社。

- 颜献琪、颜文舫、颜左：《颜桂馨堂与自流井》，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3期：64—74页。
- 杨德坤纂：《奉节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版。
- 杨笃行：《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洗盐概述》，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137—154页。
- 杨筱舫：《自贡盐岩的发现》，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154—162页。
-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袁伯龄：《封建把头对盐业运输工会的压榨》，载《井盐史通讯》1977年第2期：59—62页。
- Zelin, Madeleine. *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arly Ch'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
- . “Obstacle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ining Industry in Late Imperial Sichu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 York, 1985.
- 曾小萍：《经济发展的障碍：帝制晚期四川的采掘业》，美国历史协会年会论文，纽约，1985年。
- . “The Rights of Tenants in Mid-Qing Sichuan: A Study of Land-Related Lawsuits in Baxi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 no. 3 (1986): 499—526.
- 曾小萍：《清中期四川佃农的权利：巴县土地诉讼研究》，载《亚洲研究杂志》第45卷第3期（1986年）：499—526页。
-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urong Well-Salt Elite.” In Joseph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曾小萍：《富荣井盐精英的崛起与衰落》，载周锡瑞、冉玫烁：《中国地方精英与统治模式》，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
- .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Qing Period: Some Thoughts on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Opium War.” In Kenneth Lieberthal, et al., eds.,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 曾小萍：《清代中国经济的结构：鸦片战争150周年的思考》，载李侃如等编《对于近代中国的认识》，纽约州阿芒克：夏普出版社。
- . “Merchant Dispute Medi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Zigong, Sichuan.” In Philip Huang and Katherine Bernhardt, 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曾小萍：《二十世纪四川自贡的商人纠纷调节》，载黄宗智、白凯编《清代和民国

- 时期的民法》，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
- . “Managing Multiple Ownership at the Furong Saltyard.” In Madeleine Zelin, Jonathan Ocko and Robert Gardella, eds. *Contract and Property Rights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曾小萍：《富荣盐场多重所有权的管理》，载曾小萍、欧中坦、罗伯特·加德拉编《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
- . “A Critique of Rights of Property in Pre-War China.” In Madeleine Zelin, Johnathan Ocko, and Robert Gardella, eds. *Contract and Property Rights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曾小萍：《对战前中国产权的评价》，载曾小萍、欧中坦、罗伯特·加德拉编《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
- .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 Reclamation and Hidden Land during the Yongzheng Reign.” Manuscript.
- 曾小萍：《雍正朝政府关于开垦与隐地的政策》，未刊稿。
- 张德地：《四川盐课疏》，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道光二十六年（1826）版，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年重印。
- 张端甫：《键乐地区首屈一批的大场商——吴景让堂》，载《井盐史通讯》1979—1980年第6期。
- 张树植：《自流井土地利用之调查》，载萧铮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38年。
- 张习辑：《四川盐务报告书》，1912年。
- Zhang, Xiaobo. “Merchant Associational Activ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Tianji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04—1928.” Ph. D.,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 张晓波：《二十世纪初中国商会的积极活动：1904—1928年的天津商务总会》，博士学位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95年。
- 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年。
- 张学君：《清代川南地区的盐工帮会活动》，载四川史学会编《四川省史学会史学论文集》第241—25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 张学君：《辛亥革命与自贡盐业》，载《井盐史通讯》1983年第11期。
- 张毅甫：《恩流视兑水经过》，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91—95页。
- 赵熙纂：《民国荣县志》，1929年。
- 钟长永：《富荣盐场的机车汲卤》，载《井盐史通讯》1981年第1期：38—43页。
- 钟崇敏、朱寿仁、李权：《自贡之盐业》，经济调查丛刊之二，重庆：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1942年。
- 中共自贡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自贡地下党组织概况》，自贡：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1995年。
- 周启圣：《对〈自贡盐场蒸气机车汲卤概述〉一文的探讨》，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

- 6—10辑(1982年):264—268页。
- 诸子言:《江津帮的形成及其在自贡盐场的经营活动》,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年):242—248页。
-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盐业诉讼档案专题选编(一)自流井王三畏堂与渝沙债团债务纠纷案》,《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1—2期:64—76页,73—80页。
- 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总工会编:《自贡盐业工人斗争史档案资料选编(191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自贡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熊佐舟传》,未刊稿。
- 自贡市机械电子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市机械工业志》,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二十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自贡市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金融志》,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十八,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 自贡化学工业管理局编:《自贡化学工业志》,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十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自贡市轻工业管理局、自贡市工业合作联社编:《自贡市轻工业志》,自贡市地方志丛书之二十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自贡市盐业志》编纂委员会编:《自贡市盐业志》,自贡,1992年
- 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自贡市政协文史办:《自贡盐业资本家侯策名》,载《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9年):49—57页。

# 索引\*

## A

- accounting methods 记账方法, 52—53, 317 页注 6
- Adshead, S. A. M. 阿谢德, 3, 225, 232, 242, 304 页注 13, 338 页注 43
- agricultural sector 农业部门: 与畜力, 105, 328 页注 108; 与防御性商业策略, 104—105, 327 页注 106; 与一体化, 97 页; 土地出售, 62 页, 319 页注 59; 与明清投资结构, 27—30, 309 页注 16, 310 页注 28、注 31; 与家族堂, 199; 与自贡对于工业发展的贡献, 296—297
- ancillary industries 辅助产业, 271—281; 与信贷, 282; 木/竹, 180—181, 273—278, 282, 296—297, 316 页注 25; 盐锅制造, 272—273, 360 页注 10
- animal power 畜力: 与农业部门, 105, 328 页注 108, 与黑卤井, 18; 与人班车对比, 96, 129, 130; 与岩盐井, 164; 与蒸汽动力对比, 173, 175, 182, 342 页注 52。也见 buffalo industry 水牛业
- apprenticeship 学徒, xix, 90

## B

- bamboo industry 竹业, 见 lumber/bamboo industries 木/竹业
- banfangche*(human labor) 班房, 96, 129, 130, 326 页注 80
- banking 银行业, 288—290, 363 页注 81
- baojia* 保甲, 55, 318 页注 32
- baotui(contract pumping) 包推, 174—176, 343 页注 64

---

\* 索引中的页码是译文正文及注释的边码; 为了阅读方便, 已将全书的尾注改为脚注, 但注号顺序保持不变。——译者



- Baoxinglong company 宝兴隆号, 338 注 46
- ba salt 巴盐, 21, 31, 144, 336 页注 46
- batou 把头, 131, 144, 336 页注 11
- Belsky, Richard 白思奇, 39
- bian'an (border market) 边岸, 6, 21, 148, 245, 305 页注 26
- Big Four Courties (*sidachaochen*) 四大朝臣, 88
- black-brine wells 黑卤井: 与早期凿井合伙制, 36; 与晚清投资结构, 30, 36, 38; 与利润分配, 69; 与盐岩井, 162, 168; 与产盐合伙制, 316 页注 5; 产盐技术 16, 17, 18; 与大灰子井, 181, 344 页注 87
- borehole (*zhuotong*) 卓筒井, 4, 15, 27
- Boxer Rebellion 义和团运动, 188, 225, 338 页注 43
- brine glut 卤水过剩 (1929 年代—1930 年代), 256—262, 357 页注 113, 358 页注 124, 注 125
- brine pipes 卤筧, 105—113; 建造 106—107, 328 页注 110、注 112、注 113; 管理, 112—113; 与新商业精英, 210—212; 所有权, 96, 107—112, 328—329 页注 118、注 119、注 121—123、注 126、注 131; 与大灰子井, 182
- brine pumping 汲卤, 17—18
- brine-share rentals 卤水股份租佃, 63—65, 319—320 页注 66、注 71—73
- Buddhism 佛教, 220, 351 注 124
- buffalo industry 水牛业, 278—281, 361 页注 39, 362 页注 40; 与农业部门, 105 页; 与生畜出售, 279, 362 注 42; 牛推户, 95, 236 注 78、注 79; 疾病, 173, 342 注 51; 与一体化, 99, 105, 处理过程, 279—280, 362—363 页注 45; 与药铺, 327 页注 87; 与组织分裂, 94—95, 326 页注 75、注 78、注 79; 与蒸汽动力, 182; 皮局, 280—281; 362 页注 49, 50。也见 animal power 畜力
- business organization 商业组织: 与资本积累 113—115, 与防御性策略, 104—105, 327 页注 104、注 106; 与家族堂, 84—87, 88, 323—324 页注 37。也见 brine pipes 卤筧; integration 一体化; management 管理; organizational fragment 组织分裂

## C

- Cai Puquan 蔡普权, 68
- Caishen hui 财神会, 264
- Cai Shaoqing 蔡少卿, 351 页注 125
- Cai Yulong 蔡玉龙, 259
- capital accumulation 资本积累, 113—115。也见 credit 信贷; investment structures 投资结构; late Qing investment structures 晚清投资结构
- capital improvements/maintenance 资本提升/维持: 与卤水股份租佃, 64—65; 319—320 页注 72、注 73; 与承首人, 41; 与早期凿井合伙制, 33—34; 与利润分配, 320 页注 92

cartelization 组成企业联盟(卡特尔化):与新商业精英,185;205,221,347 页注 55;与军阀/国民军事时期卤水过剩,258—262,357 页注 113,358 页注 124。也见 trade associations 同业公会

cash reserves 现金储备,104,327 页注 104

Catholic 天主教,220

Chamber of Commerce 商会,252—256;预算,252,357 页注 95;与组成企业联盟,260;成立,223—224;与劳工组织/斗争,263,265—266;成员,252,356 页注 92,357 页注 96;与新商业精英,255—256;组织结构,252,357 页注 94;与王和甫,206,253—254,357 页注 96;与军阀政治,243,245,251,355 注 54,357 页注 102;与自贡商会精英衰落,204,255,347 注 53

Chandler, Alfred Dupont 阿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 xviii, xix., 114, 302 页注 9, 329 页注 126, 364 页注 3

*changgui* 厂规,72

Chen Benqing 陈本青,197

Chen Chengwu 陈成武,241

*chengshouren* 承首人,39—41,42,313 页注 90、注 94、注 97,314 页注 99;与食盐生产合伙制,53,317 页注 20;与上下节转让,45,48

Chen Huiting 陈辉廷,82

Chen Jieyu 陈戒于,259,260

Chen Fangtao 陈仿陶,213

Chen Ran 陈然,264,336 页注 68

Chen Xiangtao 陈湘涛,227,228

Chen Zhongxuan 陈仲宣,257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264

Chongqing-shashi credit group 渝沙债团,84;与组成企业联盟,258—259;与商会,254;与罗筱元,218,219,221;与王三畏堂,97,191—192,193,194—195,197—198,200—201,345 页注 22

Chu Yasan 褚雅三,179,342 页注 56

clientelism 依附主义,202,225

coal industry 煤炭业:与官运商办,159;与晚清投资结构,28—31,310 页注 37、注 38;与食盐生产技术,19,21,307 页注 71;与军阀政治,247—248,356 页注 76

Coase 科斯, xviii

Cochran, Sherman 高家龙,324 页注 37

commodi 股份商品化, xvii—xviii, 59

日用品资金筹措 commodity financing, 286—287, 363 页注 77

communications 沟通,93—94,326 页注 72

Comminists Party 共产党,264,265,359 页注 36、注 147

company law 公司法(1904),51,54—55,192

- company law 公司法(1929), 55
- concentration of investment 投资集中, 295—296
- 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生产集中, 157, 158—159, 338 页注 43
- Confucian education 儒家教育, 207, 348 页注 67
- copper-silver ration 银钱比价, 155, 337 页注 38
- Crowford, Wallace 华莱士·克劳福德, 18, 20
- credit 信贷 xvii, 281—290, 292—293, 302 页注 4; 抵押, 198, 3476 页注 36; 日用品资金筹措, 286—287, 363 页注 77; 与官运商办, 283; 与一体化, 97, 282—283; 与晚清投资结构, 25—26, 309 页注 14、注 15; 与银行, 288—290, 363 页注 81; 与当铺, 78, 284—285, 322 页注 16, 363 页注 66; 与票号, 26, 78, 99, 213, 249, 285—286, 350 页注 95; 与轮流信贷会, 220, 334—335 页注 57, 352 页注 126; 与食盐生产合伙重构, 55—56; 行业信贷, 282—284, 362—363 页注 59, 60; 与王和甫, 204—205, 347 页注 53、注 54; 与军阀时期盐政, 233; 与军阀政治, 248—251, 356 页注 84; 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 192—195, 196—197, 345 注 22, 362 注 60。也见 native banks(*qianzhuang*)钱庄
- credit groups (zhaituan) 债团, 56, 也见 Chongqing-shashi credit group 见渝沙债团
- Cui Ruhua 崔汝华, 282
- Cui Yuzhi 崔雨脂, 58
- cultural resources 文化资源, xiv
- customary law 习惯法, 43, 51, 72

## D

- Dachang pipe 大昌笕, 113
- Dadeheng remittance bank 大德恒票号, 198—199
- daguan management 大关, 53—54, 56, 57, 65, 73
- Dala hui (Large Lamp Society) 大蜡会, 113
- Dashenghou company 大生厚号, 100
- Dashengmei company 大生美号, 100, 327 页注 95
- Dasheng pipe 达生笕, 108, 109, 112—113, 182, 189, 211, 328 页注 112
- Datong pipe 大通笕, 211, 218, 220
- Da Zhenghai well 大正海井, 167
- debt 债, 见 credit 信贷
- defensive business strategies 防御性商业策略, 104—105, 327 页注 104、注 106
- Deng Bingxuan 邓炳宣, 164
- Deng Hongru 邓鸿儒, 172
- Deng Huilin 邓惠霖, 365 页注 13
- Deng Keyu 邓可玉, 134—135, 137
- Deng Tuo 邓拓, 127

Deng Xiaoke 邓孝可, 230, 231, 233

Ding Baozhen 丁宝桢: 与官运商办 2, 148—149, 150, 153; 关于劳动力, 119

Dingtongchang company 定通长号, 188

*dipi huo* 地皮火, 67, 320 页注 82

*diquan* 底钱, 41, 314 注 103

dominant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主流现代化叙述, xv, 84, 113—114, 169, 185, 340 页注 30

Dong Jingying 董镜莹, 172

Du Dingshan 杜鼎珊, 188—189

## E

early Qing salt administration 清初盐政, xiv, 5—10; 与边岸, 6, 305 注 26; 实行, 7—8; 9—10, 305 注 29; 与人口增长, 8, 305 页注 30; 与生产力提高, 8—9, 305 页注 31; 与改配, 9, 305 页注 34; 盐引制度确立, 6—7, 304—305 注 25、注 29; 与走私, 7, 9—10, 305 页注 29、注 40

early well-drilling patnership 早期凿井合伙制 31—38; 解散, 53, 317 注 20; 开凿延迟, 37, 312 页注 75, 313 注 76; 进班, 33, 311 页注 50、注 52、注 53; 与地主权利, 33—35, 47, 311 页注 56, 312 页注 60; 限期租佃协议, 35—36, 312 页注 66、注 67、注 68、注 72; 与管理, 35, 312 页注 64、注 65; 永久租佃, 36; 与股份分配, 31—32; 与微水/微火, 32—33, 311 页注 45

Eight Big Pipes 八大笕, 106

Elder Brother Society 哥老会, 220, 274, 351—352 页注 125

Elvin, Mark 伊懋可, 301 页注 2

employment conditions 雇用条件, 126—131, 333 页注 33—35, 334 页注 38、注 51、注 54、注 55

Enliu pipe 恩流笕, 210—212, 328 页注 112

Equal Benefit group 均益团体, 259

Erlanson, Evan 埃文·厄兰森, 363 页注 77

*Essentials of Sicuan Salt*《川盐纪要》, 230

## F

familism 家庭主义, 见 lineage trusts 家族堂

Fang Bin 方斌, 244

Fan Rongguan 范容光: 与卤笕, 182; 与商会, 257 页注 96; 与蒸汽动力, 172, 173, 342 页注 56、注 60; 与军阀政治, 244; 与大灰子井, 178, 179; 与熊佐周, 215

Feng Shusen 冯树森, 217

Feng Yuxiang 冯玉祥, 241

feudalism 封建主义, 185

- firm, theory of 公司理论, xx
- foreign trade 外贸, 169, 180
- Foyuancheng company 佛缘成号, 180
- fragmentation 分裂, 见 organizational fragmentation 组织分裂
- Fuchang company 福昌号, 173
- Fuchangsheng company 福昌升号, 99
- Fuchu company 复楚号, 214
- Fulinyi company 福临怡号, 83, 102
- Furong saltyard 富荣盐场, 崛起, 11, 21—23, 24, 307—308 页注 80、注 85, 308 页注 2、注 3
- Fuxi River 釜溪河, 13

## G

- gaipei* 改配, 9, 22, 144
- Gaojingshe trust 高经畬堂, 45
- Gao Yuncong 高云从, 182, 282
- gas wells 气井, xix, 18—21, 与富荣盐场的崛起, 23; 与晚期投资结构, 30; 生产力, 307 页注 6; 与利润分配, 70—71, 321 页注 95、注 97; 租佃, 65—68, 194, 319 页注 71, 320 页注 74、注 77—80、注 82; 与盐岩井, 164—165; 食盐生产合伙制, 38, 51, 316 页注 6; 与食盐生产技术, 18—21, 22—23, 307 页注 72; 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 193
- general strike of 1928, 1928 年总罢工, 262—266, 359 页注 147
- General Workers Association (*Zhonggonghui*) 总工会, 265
- government policies 政府政策, 见 salt administration 盐政
-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348 页注 55, 359 页注 127
- guahong* 挂红, 62
- Guangshengtong company 广生同号, 82, 98, 192—193, 286
- Guangyuan well 广源井, 162
- Guanyuan reform 官运商销 141, 147—160; 包括地区, 149, 337 页注 24; 与卤窠, 112; 与日用品资金筹措, 287; 与信贷, 283; 与湖广市场, 147, 156—157; 对食盐生产商影响, 157—160, 338 页注 43、注 46、注 50、注 52; 实行, 151—152; 与一体化, 98, 98—99, 147, 159, 338 页注 50; 抵制, 2, 157; 与辛亥革命, 225; 与销售量, 155—157; 与走私, 147, 148, 150, 151; 与余引, 155, 156; 与税收, 152—155, 337 页注 33、注 36、注 38, 与积引, 148—150, 155; 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 186—187
- guiding* 归丁, 9, 144
- Guo Changming 郭昌明, 260
- Guomindang 国民党, 见 National government 国民政府

## H

- Haisheng-Taisheng well 海生—泰生井, 47
- Han dynasty 汉朝, 3
- Han Youren 韩友仁, 172
- Hengfengyu company 恒丰豫号, 217
- high throughput production 高生产能力, xviii—xix
- Hongyuan well 洪源井, 323 页注 23
- Hoise Alexander 谢立山, 156—157, 308 页注 2、注 3, 338 页注 40, 361 页注 39, 362 页注 40
- Hou Ceming 侯策名, 202, 212, 215; 背景, 213—214; 与商会, 255, 256, 357 页注 96; 与建华制盐公司, 298; 与家族堂, 214, 220; 与政治, 221; 与王和甫, 204, 214
- Hou-Xiong-Luo-Luo group 侯熊罗罗集团 212—222; 侯策名背景, 213—214; 合资, 215—216, 350 页注 103, 351 页注 104; 与家族堂, 219—220; 罗华垓背景, 218—219, 罗筱元背景, 216—218, 351 页注 110; 与政治, 220—222; 熊佐周背景, 214—216, 350 页注 97
- Huang, Philip 黄宗智, 301—302 页注 2
- Huang Chunwu 黄纯武, 179
- Huang Dunsan 黄敦三, 99, 215, 277, 286, 350 页注 98
- Huang Fuji 黄福基, 172
- Huang Tinggui 黄廷桂, 6
- Huang Yushu 黄玉书, 40, 44, 226
- Huang Zhiqing 黄植青, 77, 178—179, 188, 32—323 页注 23
- Huang Zidong 黄子东, 218
- hua salt* 花盐, 20—21, 23
- Huaxing company 华兴公司, 171
- Huguang market 湖广市场: 与官运商销, 147, 156—157; 与一体化, 103; 与太平天国后的重建, 142—147, 336 页注 6、注 11; 与陕西商人, 8; 与太平天国运动, 82; 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 188, 192—193, 344—345 注 5
- hui 会, 132
- huiguan 会馆, 39
- hui*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会(轮流信贷会), 220, 334—335 页注 57, 352 页注 126
- Hu Liwei 胡礼纬, 76
- human labor 人力, 见 *banfangche* 班房车
- Hu Mianzhai 胡勉斋, 83
- Hu Ruwei 胡汝修, 85, 207
- Hu Shaozhang 胡绍章, 328—329 页注 118
- Hu Shenyi trust 胡慎怡堂: 卤筴, 109 页; 与沟通, 326 页注 72; 衰败, 190—191;

防御性商业策略,104,327 页注 104;一体化,100—102,327 页注 104;管理,85,88,91,92,93,325 页注 57;与新商业精英,213—214;起源,76,77;与太平天国,82—83;与大灰子井,344 页注 87

Hu Tiehua 胡铁华:与卤窠,109,182;与组成企业联盟,259;与商会,254,255,257 页注 96;与侯策名,214,220;与政治精英,207,348 页注 70;与王和甫,205,206,348 页注 61;与军阀政治,245

Hu Yinshi 胡英士,68

Hu Yuanhai 胡元海,76,77

## I

immigration 移民,117—119,273,331 页注 10、注 12

Imperial Bank 大清银行,288,363 页注 81

incorporation 合并,54—55

industrial engineering 机械工业,173,179—180,298,342 页注 56,343 页注 77

inflation 通货膨胀:与晚清投资结构,36—37,312 页注 75,313 页注 76;与食盐生产合伙制,60,64;与军阀/国民政府时期卤水过剩,256—257;与军阀政治,250

institutional lenders 出借机构,见 credit 信贷

integration 一体化,xvii—xix,xx,96—103,293—294;与畜力,99,105,327 页注 87,328 页注 108;与资本积累,114;与信贷,97,282—283;与官运商销,98,98—99,147,159,338 页注 50;胡慎怡堂,100—102,327 页注 104;与家族堂,87;李四友堂,100,327 页注 84、注 92、注 95;与新商业精英,203;与利润率,102,103;与食盐生产合伙制,73;与蒸汽动力,173,342 页注 56;王三畏堂,96—100;327 页注 89;颜桂馨堂,102,327 页注 101;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 xx,185,196

investment structures 投资结构:与食盐股的重要性,62,319 页注 61;与国民政府赋税政策,29,310 页注 27;与盐岩井,165—166;与蒸汽动力,172—177,342 页注 60,343 页注 64。也见 late Qing investment structures 晚清投资结构

## J

*jia* (household) property structure 家庭财产结构,25,200

*jiangong* 见功,15—16,33,311 注 50、注 52、注 53

Jiang Zihe 江子鹤,191,325 页注 57

Jianhua Salt Manufacturing Company 建华制盐公司,298

Jing Shaotang 景绍堂,282

Ji Ruiqing 吉润卿,71,315 页注 1

Jirongxiang company 集蓉祥号,190

Jitong pipe 吉通窠,211

Juyichang company 聚义长号,83

## K

*kaizhong* system 开中法, 4—5

Kapp, Robert 罗伯特·卡普, 351—352 注 125

Kinship networks 亲属网络, xvii, 314 页注 112, 319 页注 63。也见 lineage trusts 家族堂

Köll, Elizabeth 伊丽沙白·薛尔, 324 页注 37

Kurlansky, Mark 马克·科兰斯基, 340 页注 31

## L

labor force 劳动力, 116—139; 辅助产业, 275, 361 页注 25; 班房, 96, 129, 130, 326 页注 80; 雇用条件, 126—131, 333 页注 33—35, 334 页注 38、注 51、注 54、注 55; 与移民, 117—119, 273, 295, 331 页注 10、注 12; 无产阶级化, 120, 122—123, 332 页注 22、注 24、注 25; 规模, 119—120, 121—122, 331—332 页注 20; 专业分工, 123—126, 332—333 页注 28; 与蒸汽动力, 183, 344 页注 92; 失业, 262, 358 注 127。也见 labor organization/unrest 劳工组织/斗争

labor organization/unrest 劳工组织/斗争 131—138; 与辅助产业, 277—278; 与组成企业联盟, 258; 与共产党, 264, 265, 359 页注 136、注 147; 大蜡会, 132—133, 335 页注 60; 会, 132, 334—335 页注 57; 与陕西商人, 79, 137, 322 页注 22; 军阀/国民政府时期, 262—266, 267, 359 页注 47; 炎帝会, 132, 134—138, 263, 335 页注 67, 335 页注 64—66, 336 页注 68, 358—359 页注 130

Lai Mingqin 赖明钦, 167, 172, 215, 257, 306 页注 56, 342 注 55, 343 页注 68

Lamoreaux, Naomi 内奥米·拉莫罗斯, xvii, xx, 293

land 土地, 见 agricultural sector 农业部门

landowners 地主: 与卤笕, 108—109; 与早期租佃契约, 27—30, 310 页注 28、注 31。也见 early well-drilling partnerships 早期凿井合伙制

Langlois, Richard 理查德·朗格卢瓦, xvi, xix, xx

late Qing investment structures 晚清投资结构, 24—49; 与承首人, 39—41, 42, 45, 48, 313 页注 90、注 94、注 97, 314 页注 99; 与信贷, 25—26, 309 页注 14、注 15; 与底钱, 41, 314 页注 103; 争议, 48; 与建设偿付, 41—42, 314 页注 104、注 105; 与土地租佃, 27—30, 309 页注 16, 310 页注 28、注 31; 限期租佃协议, 35—36; 与聚拢资源, 38—39; 与陕西商人, 13, 25, 308—309 页注 8、注 11; 与股份租赁契约, 30—31, 310 页注 37、注 38; 与股份出售, 42, 314 页注 111、注 112。也见 early well-drilling partnerships 早期凿井合伙制; salt-production partnerships 食盐生产合伙制; *shangxiajie* transfers 上下节转让

legal issues 法律问题, xviii, 188, 201—202

Lei Xiaosong 雷小松, 85

Liao Zekuan 廖泽宽, 229

Liang Zhuangjing trust 梁传经堂, 322 页注 13



- Liao Enbo 廖恩波, 264
- Liao Rongzhai 廖荣斋, 201
- Liao Shuqing 廖树卿, 259, 260
- Li Bozhai 李伯斋, 162—163, 165, 338 页注 2
- Li Deqian 李德潜, 190
- Li Deshan 李德山, 338 页注 52
- Li Dewen 李德文, 189, 190, 245
- Li Guoyu 李果育, 75
- Li Hongzhang 李鸿章, 146
- Li Huiting 李辉廷, 282
- Li Ji'an 李集庵, 327 页注 101
- Li Jingcai 李敬才: 背景, 207—208; 与组成企业联盟, 205, 221, 259, 261; 与商会, 254, 255, 357 页注 96; 与同业公会, 258; 与王和甫, 206, 与王三畏堂, 194; 与大灰子井, 178, 178; 与熊佐周, 215; 与自贡临时地方议事会, 229
- Li Jingxiu 李敬修, 277, 282
- Lijin taxes* 厘金: 与富荣盐场的崛起, 308 页注 86; 与官运商销, 153; 与湖广市场, 142—143, 146, 336 页注 6; 太平天国后重建, 140—141, 142—143; 抵抗, 1, 226; 与太平天国运动, 1, 303 页注 1, 308 页注 86; 与军阀时期盐政, 231
- Li Menglin 李梦麟, 211
- limited-tenure agreements 限期租佃协议, 35—36, 312 注 66、注 67、注 68、注 72
- Lin Dihuan 林地焕, 146
- Lin Jianyu 林建宇, 228
- lineage trusts 家族堂, 38—39, 323—324 页注 37; 与卤笕, 109—110, 239 页注 123; 与资本积累, 114; 和一体化, 87; 与管理, 84—85, 87—94, 324 页注 46、注 47, 325 页注 57—60、注 62, 326 页注 66; 与新商业精英, 202—203, 206—208, 219—220; 与产权, 199—202, 346—347 页注 45、注 46; 与股份出售, 62; 家族堂结构, 85—87。也见 Zigong merchant elite 自贡商人精英; Zigong merchant elite decline 自贡商人精英衰落
- Lin Yaolun 林耀伦, 181, 332 页注 20
- Linjia well 林家井, 316 页注 4
- Lin Yuecong 林悦葱, 227
- Lin zhenhan 林振翰, 230, 297, 305 页注 40
- Liqun Bank 利群钱庄, 218, 315 页注 40
- Li Rong 李榕, 15, 24—25, 119—120, 129, 307 页注 72, 316 页注 5, 324 页注 47
- Li Shancheng 李善成, 245
- Li Sicheng 李思诚, 189
- Li Siyou trust 李四友堂: 卤笕, 112—113 页, 182, 211, 与商会, 253; 日用品资金筹措, 286; 衰败, 85, 186, 187—189, 198—199, 344—345 页注 5、注 7, 346 页注 37、注

38,363 页注 60;防御性商业策略,104,105;官运商销,160,186,338 页注 52;一体化,100,327 页注 84、注 92、注 95;劳动力,123;管理,84,91,92,93,325 页注 60,326 页注 66;与陕西商人,79,80—81;与太平天国,82;与军阀政治,244;与大灰子井,344 页注 87;与张筱坡,209,349 页注 84

Li Taoshu trust 李陶淑堂,187,189,207

Liu Huanzhai 刘焕斋,99

Liu Jingxian 刘景贤,229

Liu Runqing 刘润卿,259

Liu Wenjui 刘文辉,210,242,248,254

Liu Xiang 刘湘,208,210,242,289

Liu Xingcun 刘杏村,241

Liu Yuanxiang 刘远翔,264

Liu Zikang 刘子康,323 页注 23

livestock 家畜,见 animal power 畜力

Li Weiji 李维基,81

Li Wumei trust 李五美堂,45—46

Li Xiang'an 李祥庵,82,100

Li Xingqiao 李星桥:与辅助产业,277,282;与日用品资金筹措,286;与军阀政治,244;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187—188,189。211,346 页注 37

Li Xubai 李续白,68

Li Xueqiao 李雪樵,67—68

Li Yuhua 李玉华,57—58

Li Yunqiao 李云桥,67—68

Li Yunxiang 李云湘,179,255

Li Yunzhia 李允之,182,210

Li Zihui 李子惠,173

Li Zizhang 李子章,57—58

Lo Jung-pang 罗荣邦,328 页注 113

Longtai well 龙太井,316 页注 4

luck 运气,80

lumber/bamboo industries 木/竹产业,180—181,273—278,282,296—297,361 页注 25

Luo Chengji 罗成基,79,308—309 页注 11,361 页注 15

Luo Huagai 罗华垓:背景,218—219;与商会,255;与侯策名,214;与建华制盐公司,298;与政治,221;与王和甫,204,218—219;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200

Luo Xiaoyuan 罗筱元:背景,216—218;关于卤笕,219 页注 123、注 131;与组成企业联盟,259—260;关于信贷,284,347 页注 54;关于官运商销,158—159;与侯策名,214;与侯熊罗罗集团,212;与投资策略,202;与建华制盐公司,298;关于劳动力,

334 页注 55;与劳工组织/斗争,157;关于李敬才,349 页注 78;与管理,91,92,325 页注 57;与钱庄,218,351 页注 116;与政治,221;与保留利润用于投资策略,77;与王和甫,204;与王三畏堂,217,218,219—220,325 页注 57,351 页注 110;关于大仄子井,343 页注 68;关于张筱坡,209;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190,192,200  
Lü Wenzhong 吕汶中,133

## M

mainenance 保持,见 capital improvements/maintenance 资本提升/保持  
management 管理,xix—xx,293,364 页注 3;与卤筓,112—113;与卤水股份租佃,65;与沟通,93—93,326 页注 72;与大关,53—54,56,57,65,73;与早期凿井合伙制,35,312 页注 64、注 65;以灶统井,58—60;重要性,302 页注 9;与一体化,xix—xx;与家族堂,84—85,87—94,324 页注 46、注 47,325 注 57—60、注 62,326 页注 66;与新商业精英,219,351 注 120;与食盐生产合伙契约,52,53—54;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324 页注 46  
Mao Aiqin 毛爱琴,282  
Mao Zhiyuan trust 毛志远堂,45  
market contraction 市场紧缩:与组成企业联盟,205,347 页注 55;与军阀政治,245—247  
market expansion 市场扩张,xvi—xvii;“济楚”市场,142—145,336 页注 6、注 11;与太平天国,xv,xix,23,24,115;与抗日战争,267—268  
mechanized pumping 机推,见 stream power 蒸汽动力  
Mehcant's Association 商民协会,221  
militarist rule 军人统治,见 warlord politics 军阀政治  
Ming dynasty 明朝,4—5,304 页注 16、注 17  
Morgan, J, P 摩根,48

## N

Nationalist government 国民政府:与商会,252,254—256;与共产党,264,359 页注 136;与劳工组织/斗争,264,265;与新商业精英,210,221,352 注 129;赋税政策,29,310 页注 27;与军阀政治,242;与抗日战争,267—268  
Native banks(*qianzhuang*)钱庄,285;与日用品资金筹措,286,287,363 页注 77;衰败,287—288;与晚清投资结构,26,309 页注 14、注 15;与新商业精英,213,214,218,350 页注 97,351 页注 116;与陕西商人,78;与军阀政治,248;与自贡商人精英的衰落,195  
natural gas 天然气,见 gas wells 气井  
Needham, Joseph 李约瑟,328 注 113  
new business elites 新商业精英,xx,184—185,202—222;与卤筓,210—212;与佛教,220,352 页注 124;与组成企业联盟,185,205,221,347 页注 55;与商会,255—

256;与家族堂,202—203,206—208,219—220;与管理,219,351 页注 120;与钱庄,213,214,218,350 页注 97,351 页注 116;与政治精英,207—208,348 页注 67;与政治,220—222,352 页注 128;与票号,213,350 页注 95;与轮流信贷会,220,352 页注 126;王和甫,203—206;与军阀政治,206,208,209—210,220,222,348 页注 64,350 页注 86;张筱坡,208—210。也见 Hou-Xiong-Luo-Luo group 侯熊罗罗集团

Nie Wufang 聂无放,322—323 页注 23

Ni Jingxian 倪敬先,220,221,255

Niu Jicheng 牛集成,164,178,259

## O

oil industry 石油工业,96,261,329 页注 26

Ordinance Concerning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1941)《中华民国公司条例》(1914),192

组织分裂,50—51,59,73,88,94—96;与水牛业,94—95,326 页注 75、注 78、注 79;与生产力,51,316 页注 4—6;与人班车,96,326 页注 80

Ouyang Xianrong 欧阳显荣,1709—172,173—174,340 页注 34、注 36,341 页注 38

## P

paizi 牌子,159

Pan Xiaoyi 潘孝移,217

Pan Zhongsan 潘仲三,88,282

pawnshops 当铺,78,284—285,322 页注 16,363 页注 66

peasant economy 农民经济,301—302 注 2

political context 政治环境,xiv—xv

politics 政治,223—268;与商会,252;与新商业精英,220—222,352 注 128;政治精英,207—208,348 页注 67。也见 Nationalist government 国民政府;warlord politics 军阀政治

Pollard, Sidney 悉尼·波拉德,302 页注 4

Pomeranz, Kenneth 彭慕兰,301—302 页注 2

Population growth 人口增长:与清初盐政,8,305 页注 30;幅度,117,330 页注 3;与移民,117—119,330 页注 10、注 12

Post-Taiping reconstruction 太平天国后重建,xiv,140—147;与湖广市场,142—147,336 页注 6、注 11;与厘金,140—141,142—143。也见 Guanyun reforms 官运商销

producer goods 生产商物品,见 ancillary industries 辅助产业

productives 生产力:与股份出售,60—61;与黑卤井,17,36,316 页注 5;与卤水股份租佃,64—65;与清初盐政,8—9,305 页注 31;与富荣盐场的崛起,22,307—308

页注 85;与气租佃,68;与气井,307 页注 72,316 页注 6;见功,15—16,33,311 页注 50、注 52、注 53;与组织分裂,51,316 页注 4—6;与盐岩井,167,316 页注 5;与蒸汽动力,169—170,173,342 页注 55;与军阀/国民政府时期卤水过剩,256  
 profit sharing 利润分配,68—72,320 页注 92、注 94,321 页注 95、注 97  
 proletarianization 无产阶级化,120,122—123,332 页注 22、注 24、注 25  
 property rights 产权,25,199—202,346—347 页注 45、注 46  
 prostitution 妓院,283

## Q

Qiancheng company 谦诚公司,178  
 Qianfengtai company 乾丰泰号,187  
 Qianxiangfu company 钱福湘号,215—216  
 Qian Shaolong 钱少隆,5  
 Qian Xinhao 谦信号,213  
 Qiao Fu 樵甫,关于官运商销,153,155;关于劳动力规模,120,331 页注 20;关的银行,288;关于利润分配,70,71;关于蒸汽动力,175;;关于军阀政治,237,240—242;关于自贡作为工业城市,269  
 Qin dynasty 秦朝,4  
 Qingyun pipe 卿云笕,182,189  
 Quanfu pipe 全福笕,182

## R

Raff Daniel M. G. 丹尼尔·M. G. 拉夫,xx  
 Railway Protection Movement 保路运动,209,225,226  
 Ran Guangrong 冉光荣,120,143,306,313 页注 94  
 Rawski, Evelyn 罗友枝,318 页注 55  
 Rawski, Thomas 托马斯·罗斯基,294—295  
 religion 宗教:与劳工组织/斗争,132,134;与新商业精英,22,352 页注 124;与凿井,15—16  
 remittance banks(*piaohao*) 票号,26,99,285—286;与新商业精英,213,350 页注 95;与陕西商人,78;与军阀政治,249;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197  
*renbanche* 人班车,见 *banfangche* 班房车  
 repairs 修理,见 capital improvements/maintenance 资本提升/维持  
 Republican period 民国时期,见新商业精英;自贡商人精英衰落  
 retained earnings investment strategy(*yijingchuangjing*) 以井创井,77  
 Revolution of 1911 辛亥革命,224,225—229;与新商业精英,205,206,209,349 页注 80;荣县革命,226,352 页注 6;与自贡商人精英,225—226,352 页注 5;与自贡临时地方议事会,224

Richardson, Philip 菲利普·理查森, 301 页注 2

Rockefeller, John, D. 约翰·D. 洛克菲勒, 261

Rock Salt Agency(Yanyanjing banshucu) 盐岩井办事处, 205, 257—258

Rock Salt Company(Yanyan gongsi) 盐岩公司, 260—262, 358 页注 124、注 135

Rock Salt Well Brine Extraction Company 盐岩井采卤公司, 258—260

rock-salt wells 盐岩井: 发现, 162—168, 338 页注 2, 339 页注 22、注 27, 340 页注 29; 与一体化, 97—98; 与投资结构, 165—166; 与晚清投资结构, 36, 37, 312 页注 72; 与新商业精英, 203; 与利润分配, 72; 与食盐生产合伙制, 316 页注 5; 与蒸汽动力, 169, 340 页注 29; 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 xx, 193, 196

Rong County revolutions 荣县革命, 226, 352 页注 6

Rosenberg, Nathan 内森·罗林贝格, 177, 341 页注 44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s 轮流信贷会, 220, 252 页注 126

rotational pumping 轮流汲卤, 262, 266—267, 360 页注 148

## S

saline rock 盐岩, 见 rock-salt wells 盐岩井

salt administration 盐政, xviii, 1—3; 与煤炭业, 310 页注 27; 与信贷, 198; 与气租佃, 320 页注 80; 与一体化, 103; 开中法, 4—5; 与土地出售, 319 页注 59; 与银行, 288—289; 清以前, 3—5, 303—304 页注 9、注 13、注 16、注 17; 与辛亥革命, 225, 226—227; 与自贡临时地方议事会, 228—229。也见 early Qing salt administration 清初盐政; Guanyun reforms 官运商销; salt certificate system 盐引制度; warlord period salt administration 军阀时期盐政

*Salt and Iron Debate*《盐铁论》, 3

Salt Bank of Sichuan 川盐银行, 289

salt certificate system 盐引制度: 与卤窰, 112, 329 页注 131; 与资本积累, 113; 与富荣盐场的崛起, 22, 307 页注 80; 与一体化, 98—99, 327 页注 84; 清以前的发展, 4, 304 页注 12; 重建, 6—7, 304—305 页注 25、注 29; 与走私, 4, 8, 304 页注 12, 305 页注 29; 与运输, 13; 积引, 148—150, 155; 与自贡商人精英发展, 12—13

salt evaporators guild 烧盐工人帮会, 见 Yandi hui 炎帝会

salt gabelle 盐课, 见 Guanyun reforms 官运商销; salt certificate system 盐引制度

Salt Inspectorate 盐务稽核所, 231—232, 354 页注 31、注 32

salt-production partnerships 食盐生产合伙制, 38, 50—73, 292—293; 记账方法, 52—53, 317 页注 16; 卤水股份租佃, 63—65, 319 页注 66、注 71, 320 页注 72、注 73; 和承首人, 53, 317 页注 20; 契约, 51—53, 317 页注 11; 大关管理, 53—54, 56, 57, 65, 73; 以灶统井, 58—60; 气租佃, 65—68, 194, 319 页注 71, 320 页注 74、注 77、注 80、注 82; 和一体化, 73; 与组织分裂, 50—51, 59, 73, 316 页注 4—6; 利润分配, 68—72, 320 页注 92、注 94, 321 页注 95、注 97; 重构, 54—58, 318 页注 36; 与股份出售, 60—63, 318—319 页注 52、注 55、注 63、注 64, 井、灶合并运行, 51, 315—316 页注 3; 盐井租

佃,60

salt-production technology 食盐生产技术, xx, 14—21; 替代利用建议, 230, 297; 汲卤, 17—18; 与煤炭业, 19, 21, 307 页注 71; 气井, 18—21, 22—23, 307 页注 72; 与高生产能力, xviii—xix; 相互依存, 177, 341 页注 44, 盐岩层的发现, 162—168; 338 页注 2, 339 页注 22; 凿井, 14—17, 24—25。也见 steam power 蒸汽动力; wide-diameter wells 大灰子井

salt wholesale companies 食盐批发商号: 与卤窠, 112; 与分裂, 94; 与官运商销, 149; 与一体化, 96, 98—99, 100, 327 页注 84; 与军阀时期盐政, 233

secret societies 秘密社会, 131, 148, 220, 352 页注 123

shaanxi merchants 陕西商人: 与官运商销, 158, 338 页注 46; 与劳工组织/斗争, 79, 137, 322 页注 22; 与晚清投资结构, 12, 25, 308—309 页注 8、注 11; 与当铺, 78, 322 页注 16; 与食盐生产合伙制, 55, 318 页注 36; 与太平天国运动, 81, 83—84, 148; 与自贡商人精英, 78—84, 322—323 注 22、注 23、注 26—28

Shuanghongyuan partnership 双洪源合伙, 55—56, 318 页注 36

shangxiajie transfers 上下节转让, 42—48, 314 页注 116, 314—315 页注 117; 与股份再分配, 44—48, 315 页注 121、注 128; 与股份出售, 63

share commoditization 股份商品化, xvii—xviii, 59

shareholding companies 股份公司, xvii—xviii

share rent contracts 股份租佃契约, 30—31, 310 页注 33、注 38

share sales 股份出售: 与晚期投资结构, 42, 314 页注 111、注 112; 与食盐生产合伙制, 60—63, 318—319 页注 52、注 55、注 63、注 64

Shen Baozhen 沈葆楨, 147

shiye 师爷, 90

Shuanjing well 双福井, 100, 327 页注 92

Shu Wencheng 舒文成, 335 页注 64

Sino-Japan War 中日战争, 153, 176, 180, 183, 202

Skinner, G. William 施坚雅, 117, 305 页注 30, 352 页注 25

Smith, George David 乔治·戴维·史密斯, 114

Smith, Paul 保罗·史密斯, 117, 305 页注 30

smuggling 走私: 与清初盐政 7, 9—10, 305 页注 29、注 40; 与官运商销, 147, 148, 150, 151; 和湖广市场, 143, 146, 336 页注 6; 与盐引制度, 4, 8, 304 页注 13, 305 页注 29; 与军阀时期盐政, 230

Song chaolan 宋潮澜, 351 页注 116

Song dynasty 宋朝, 4

Song Laoba 宋老八, 133

Song Shangze 宋尚泽, 354 页注 33

specialization 专业分工, 123—126, 332—333 页注 28

state capitalism 国家资本主义, 268, 291, 298

steam power 蒸汽动力, 168—177, 341 页注 45; 与事故, 173, 342 页注 53; 与畜力对比, 173, 175, 182, 342 页注 52; 与主流现代化叙述, 169; 与一体化, 173, 342 页注 56; 与投资结构, 172—177, 342 页注 60, 343 页注 64; 与劳动力, 183, 344 页注 92; 与木/竹产业, 278; 与新商业精英, 203, 207, 210, 215, 217; 欧阳显荣实施项目, 170—172, 173—174, 340 页注 34、注 36, 341 页注 38; 与生产力, 169—170, 173, 342 页注 55; 与盐岩井, 169, 340 页注 29; 与技术相互依存, 341 页注 44; 与军阀/国民政府时期卤水过剩, 257; 与西方技术, 169, 340 页注 31; 与大灰子井, 177—183; 与自贡商人精英衰落, xx, 193, 196

steel cable imports 钢丝绳进口, 178, 180, 343 页注 71

strike 罢工, 见 labor organization/unrest 劳工组织/斗争

Sui dynasty 隋朝, 4

surplus certificates 余引, 155, 156

Su Yi 苏镒, 338 页注 46

Sylla, Richard 理查德·西拉, 114

## T

Taiping Rebellion 太平天国运动: 与资本积累, 115; 与富荣盐场的崛起, 23, 308 页注 86; 与官销商运, 148; 与移民, 117, 119; 与一体化, 98; 与厘金, 1, 303 页注 1, 308 页注 86; 与市场扩张, xv, xix, 23, 24, 115; 与陕西商人, 81, 83—84, 148; 与自贡商人精英, 81—83, 206

tang 堂, 见 lineage trusts 家族堂

Tang dynasty 唐朝, 4

Tang Jiong 唐炯, 144

taxation 赋税: 与官运商销, 152—155, 337 页注 33、注 36、注 38; 与一体化, 103; 与利润分配, 71; 军阀时期定额, 234—237, 354 页注 46。也见 *lijin* taxes 厘金; salt administration 盐政; salt certificate system 盐引制度; warlord period salt administration 军阀时期盐政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技术相互依存, 177, 341 页注 44

technology 技术, 见 salt-production technology 食盐生产技术

Temin, Peter 彼得·特明, xx

Three Feudatories war 三藩之乱, 5, 321 页注 6

Tianlong well 天龙井, 71, 321 页注 97

Tian Maode 田茂德, 309 页注 15

Tiantaihe bamboo yard 天泰和竹厂, 275

Tianyi well 天一井, 80

Tongli company 同利公司, 201—202

Tongxin pipe 同新笕, 182, 214, 217, 220

trade association 同业公会: 与商会, 254—255; 与新商业精英, 221; 与军阀/民国



政府时期卤水过剩,257—258。也见 cartelization 组成企业联盟  
 trade credit 行业信贷,282—284,362—363 页注 59、注 60  
 trasportation 运输:局限,13—14;与蒸汽动力,169;与军阀时期盐政,233;与军阀政治,245,246—247,249;与自贡作为工业城市,270—271。也见 brine pipes 卤笕  
 Tufano, Peter 彼得·塔法诺,48

## U

unemployment 失业,262,358 页注 127

## V

vertical intagration 纵向一体化,见 integration 一体化  
 Vogel, Hans Ulrich 傅汉思,303 页注 9  
 von Rosthorn, Arthur 罗士恒,336 页注 6、注 11

## W

Wages/salaries 工资/薪水,91—92,125,127,129,333 页注 33、注 34,358—359  
 页注 130

Wang bitian 王笔田,85

Wang Chengzhi 王成之,109

Wang Dahong 王大洪,179

Wang Dazhi 王达之,92—93,97,108

Wang Defu 王德敷,193

Wang Deqian 王德谦,245

Wang desan 王德三,276

Wang Enpu 王恩浦,227

Wang Faqin 王伐琴,193

Wang Gengyu 王赓余,216—217

Wang Hefu 王和甫,203—206;与辅助产业,277,282;与卤笕,182;与组成企业联盟,259;与商会,206,253—254,257 页注 96;与信贷,204—205,347 页注 53、注 54;去世,206,208,348 页注 64;与侯策名,204,214;和罗华垓,204,218—219;与盐岩井,165,166,339 页注 22;与蒸汽动力,172,342 页注 60;与技术进步,173,179;与同业公会,257,258;与军阀政治,245;与大灰子井,178;与熊佐周,215;与自贡商业精英衰落,194;与自贡临时地方议事会,227,228,353 页注 14

Wang Huaizhou 王怀周,357 页注 113

Wang Huitang 王惠堂,97

Wang Jieping 王介平,204

Wang Jiliang 王绩良,259

Wang Jixing 王吉星,213

Wang Langyun 王朗云:背景,75;与官运商销,2;与一体化,97;与厘金,1;与家族祠堂,85,86;与管理,88;与陕西商人,79—80;与太平天国运动,82

Wang Mutao 王慕陶,259

Wang Rudong 王如东,193—194,217

Wang Sanwei trust 王三畏堂:与辅助产业,276—277,282;卤筧,108,109,113,211;资本积累,115;与商会,253,254;与日用品资金筹措,286;与儒家教育,348 页注 67;衰败,85,161—162,191—195,197—198,200—201,345 页注 14、注 17、注 29、注 22,346 页注 38;防御性商业策略,104,105,328 页注 108;与早期凿井合伙制,36;一体化,96—100,327 页注 89;劳动力,123;与罗筱元,217,218,219—220,325 页注 57,351 页注 110;管理,85—87,88,91,92,325 页注 60;起源,75;与陕西商人,79—80;与上下节转让,45;与和阀政治,244;与大灰子井,344 页注 87

Wang Shouwei 王守为,200,217—218,219

Wang Taozou 王逃走,244

Wang Tiesheng 王铁生,227

Wang Weigang 王维钢,244—245

Wang Wenkui 王文奎,245

Wang Wenqin 王文琴,193,200,227,228

Wang Wentao 王问陶,178

Wang Xiangrong 王相荣,99

Wang Xingru 王兴儒,357 页注 96

Wang Xunjiu 王浔九,219

Wang Yecong 王野从,217

Wang Yeh-chien 王业键,303 页注 9

Wang Yongzhi 王用之,259,260

Wang Yuqi 王余杞,161

Wang Zanxu 王瓚绪,206,208,221,289

Wang Ziheng 王子衡,164,244,276

Wang Zishan 王子善,245

Wang Zixiang 王子湘,172,173

Wang Zuogan 王作甘,193,200,227,244,257 页注 96

Warlord/Nationlist period 军阀/民国政府时期, xiv, xxi; 卤水过剩, 256—262, 357 页注 113, 358 页注 124、注 125; 与投资结构, 44, 314—315 页注 117; 劳工组织/斗争, 262—266, 267, 359 页注 147; 轮流汲卤, 262, 266—267, 360 页注 148。也见 Nationalist government 国民政府; warlord period salt administration 军阀时期盐政; warlord politics 军阀政治

warlord period salt administration 军阀时期盐政, 228—237, 353 页注 25; 与盐务稽核所, 231—232, 354 页注 31、注 32; 赋税定额, 234—237, 354 页注 46; 与军阀政治, 230, 234, 242; 晏安澜营销计划, 232—233, 354 页注 33; 与自贡临时地方议事会,

228—230

warlord politics 军阀政治, 224—225, 237—251; 与组成企业联盟, 205; 与商会, 242—243, 245, 251, 254, 355 页注 54, 357 页注 102; 与信贷, 248—251, 356 页注 84; 加倍课税, 247—248; 与盘剥, 242—245, 355 页注 54; 与市场紧缩, 245—247; 驻军详况, 238—239; 与银行, 289; 与新商业精英, 206, 208, 209—210, 220, 222, 348 页注 64, 350 页注 86; 樵甫的论述, 237, 240—242; 与盐政, 230, 234, 242; 与同业公会, 258。也见 warlord period salt administration 军阀时期盐政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抗日战争(1937—1945): 与大萧条, 358 页注 127; 与市场扩张, 267—268; 与运输, 14; 与自贡对工业发展的贡献, 297—298, 365 页注 8

water buffalo 水牛, 见 animal power 畜力

*weishui/weihuo* 微水/微火, 32—33, 41, 311 页注 45

well drilling technology 凿井技术, 14—17, 24—25

well group 井帮, 84

wells 井, 见 black-brine wells 黑卤井; borehole (zhuotong) wells 卓筒井; rock-salt wells 盐岩井

Wen Duanbai 温瑞柏 124

Wenge 文格, 147

White Lotus movements 白莲教运动, 225

Wide-diameter wells 大灰子井, 177—183; 发展, 177—178, 343 页注 68、注 69、注 74; 效果, 179—183, 343 页注 77, 344 页注 87、注 92; 对此的投资者, 178—179; 与木/竹产业, 278; 与新商业精英, 207, 210, 215; 与钢丝绳进口, 178, 180, 343 页注 71; 与技术相互依存, 177, 341 页注 44

Williamson, Oliver E. 奥利佛·E·威廉森, xviii

Wright, Tim 提姆·赖特, xv, 332 页注 24

Wuchang Uprising 武昌起义, 224

Wu Jingrang trust 吴景让堂, 87, 90

Wu Maochang 吴茂常, 179—180

Wu Sangui 吴三桂, 75, 321 页注 6

Wu Tang 吴棠, 146

Wu Zonghan 吴宗汉, 257

## X

Xinhe County 新和县, 229

Xiande 宪德, 6, 8—9

Xiao Zhihe 肖致和, 322 页注 13

Xiecheng company 协成公司, 172, 173

Xie Huanzhang 谢焕章, 218

- Xiexinglong company 协兴隆号, 92, 100  
Xiong Kewu 熊克武, 234  
Xiong Sihe trust 熊四和堂, 215  
Xiong Silun 熊思伦, 133  
Xiong Wanquan 熊万全, 215, 350 页注 97  
Xiong Zuozhou 熊佐周: 背景, 215—216, 350 页注 97; 与商会, 255, 257 页注 96; 与建华制盐公司, 298; 与政治, 221; 与蒸汽动力, 172; 与钢丝绳进口, 343 页注 71; 与大灰子井, 178; 与仲兴祥号, 204

## Y

- Yan Anlan 晏安澜, 208, 232—233, 354 页注 33  
Yan Boshi 颜伯师, 259  
Yan Changxun 颜昌训, 76  
Yan Changying 颜昌英, 14—15, 76, 77, 327 页注 101  
Yandi hui 炎帝会, 132, 134—138, 263, 335 页注 67, 335 页注 64—67, 336 页注 68, 358—359 页注 130  
Yang Duxing 杨笃行, 172, 178, 180, 343 页注 68  
Yang Guixing trust 颜桂馨堂: 衰败, 187, 189, 324 页注 46; 防御性商业策略, 327 页注 106; 一体化, 102, 327 页注 101; 起源, 76, 77; 与上下节转让, 47; 与凿井, 14—15  
Yang Xiaofang 杨筱舫, 259  
Yan jihou 颜积厚, 47  
Yan Ruyi 严如煜, 117, 331 页注 12  
Yan Xianyang 颜宪阳, 190, 205, 255, 257  
Yan Xinshe 颜心畲, 173, 178, 180, 205, 215, 255, 257  
Yan Yongxing 颜永兴, 80  
Ye Peiling 叶沛霖, 274  
*yindi* 引地, 见 salt certificate system 盐引制度  
Yongxianghe company 永和祥号, 201—202  
Yongshengehngbamboo yard 永生恒竹厂, 275, 828  
Yongxing well 永兴井, 76, 77  
Yuanchang pipe 元昌筧, 204, 211  
Yuanchangxin pipe 源昌新筧, 182  
Yuan dynasty 元朝, 11, 303 页注 9  
Yuan Hrle trust 袁和乐堂, 87  
Yuan Shikai 袁世凯, 231  
Yuanxin pipe 源新筧, 182 214  
Yu Shuhuai 余述怀, 219—220, 256, 282, 329 页注 118  
Yutong pipe 裕通筧, 109

## Z

- Zehou well 泽后井, 177—178, 211
- Zeng Guofan 曾国藩, 145—146
- Zeng Hanzhang 曾翰章, 217
- Zeng Shaobo 曾邵伯, 217—218
- Zeng Yuqing 曾雨青, 171—172
- Zeng Zihua 曾子华, 276
- Zeng Ziwei 曾子唯, 289, 364 页注 86
- Zhang, Five Pockmark 张五麻子, 82, 325 注 62
- Zhang Fu'an 张富安, 258
- Zhang Jingzhong 张静中, 58
- Zhang Jiucheng 张九成, 245
- Zhang Kaiming 张开铭, 298
- Zheng Lesan 张乐三, 40
- Zhang Peicun 张培村, 170—171
- Zhang Sanhe 张三和, 322 页注 13
- Zhang Shaofu 张少甫, 179
- Zhang Xi 张习, 226
- Zhang Xiaomei 张肖梅, 247
- Zhang Xiaopo 张筱坡, 208—212; 与信贷, 347 页注 54; 与劳工组织/斗争, 265; 与木/竹产业, 276; 与辛亥革命, 226; 与同业公会, 258; 与军阀政治, 209—210, 350 页注 86; 与大灰子井, 177—178, 210; 与自贡商业精英衰落, 200, 209—209, 349 页注 84; 与自贡临时地方议事会, 227, 228
- Zhang Xuejun 张学君, 120, 135, 143, 313 注 94, 326 页注 80
- Zhang Zhifang 张志芳, 259, 349 页注 78
- Zhao Xi 赵熙, 207, 208
- Zhengxiong well 正雄井, 217
- Zhong Changyong 钟长永, 341 页注 38, 342 页注 56
- Zhong Xingxiang 仲兴祥, 172, 173, 203
- Zhongxingxiang company 仲兴祥号; 与商会, 253—254, 347 页注 53; 衰败, 204—205, 347 页注 53; 与侯熊罗罗集团, 214, 218; 和一体化, 99, 203—204; 与蒸汽动力, 172—173。也见 Wang Hefu 王和甫
- Zhong Xinzhi 钟信之, 171
- Zhonghengshun company 周恒顺公司, 178, 180
- Zhou Shengshu 周声澍, 147
- Zhou Zhongxuan 周仲宣, 172
- Zhu Shanxiang 朱善祥, 245
- Zhu Ziyang 诸子言, 255

Zigong a industrial city 自贡作为工业城市, 269—271, 290—291; 地图, 270—271; 现代地位, 298—300。也见 ancillary industries 辅助产业; credit 信贷

Zigong merchant elite 自贡商人精英, 75—84; 背景, 75—76; 与商业组织, 74; 投资资略, 77—78, 322 页注 13、注 15; 与运气, 80; 与利润分配, 68—69; 与辛亥革命, 225—226, 352 页注 5; 与盐引制度, 12—13; 与陕西商人, 778—84, 322—323 页注 22、注 23、注 26—28; 规模, 75, 321 页注 1; 故事, 1—2, 81—82; 与太平天国运动, 81—83, 206; 与自贡临时地方议事会, 227—278。也见 lineage trusts 家族堂; Zigong merchant elite decline 自贡商人精英衰落

Zigong merchant elite decline 自贡商人精英衰落, xx, 184—202; 与卤筵, 212; 与商会, 204, 255, 347 页注 53; 与信贷, 192—199, 196—17, 345—346 页注 22, 362 页注 60; 与封建主义, 185; 与官运商销, 186—187; 与湖广市场, 188, 192—193, 344—345 页注 5; 胡慎怡堂, 190—191; 李四友堂, 85, 186, 187—189, 198—199, 344—345 页注 5、注 7, 346 页注 378、注 38, 362 页注 60; 与新商业精英, 213—214; 与产权, 199—202; 王三畏堂, 85, 161—162, 191—195, 197—198, 200—201, 345 页注 14、注 17、注 19、注 22, 346 页注 38; 与张筱坡, 200, 208—209, 349 页注 84

Zigong provisional Local Assembly 自贡地方临时议事会, 224, 227—230, 353 页注 13、流 14、注 19

Zigong's contribution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自贡对工业发展的贡献, 294—300, 364 页注 6, 365 页注 8、注 13

Ziliujing Salt Manufacturing company 自流井制盐公司, 260

## 译后记

1984年曾小萍教授出版了《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一书，这是一部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著作，要打破的是西方人所固有的中国人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落后、停滞的刻板印象，探讨了十八世纪以雍正期为中心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充分展现了雍正财政改革的活力。

20多年后的2005年，曾小萍教授出版了本书《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探讨的是晚清直到抗日战争前夕自贡的盐业史、商业史。在某种意义上，这依然是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著作。但与上一部不同的是，本书的视野不再是中国历史的前后比较，而是拥有更为宏阔的中西对比的关怀。本书的焦点之一是，独立于或极少受到西方影响的自贡商人是如何利用本土资源进行创业、融资、经营、发展的。自贡商人所走的路，与差不多同时代的美国企业、公司的道路，换言之就是主流叙述的公司、商业现代化之路既有不同，又有相似之处，而自贡商人所取得的成就与西方的同行相比毫不逊色。曾小萍教授的这部书在美国的商业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对于西方学者而言，这是另类叙事，为研究公司、商业现代化道路打开了又一扇窗户。学术界给予了这本书很

高的荣誉,以表彰它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和商业活动的本土资源所做出的出色研究,包括 2006 年度社会科学史协会阿兰·沙林奖(Allan Sharlin Memorial Prize of 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2006 年度美国历史研究协会费正清奖(Fairbank Prize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2007 年度国际亚洲研究协会人文著作奖(Humanities Book Priz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Asian Studies)。如今这部书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不知读者会有怎样的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作为译者,我要感谢曾小萍教授对于我的信任与翻译上的协助。我还要特别感谢盐业史专家、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宋良曦先生,我与宋先生并不认识,贸然打电话讨教,宋先生很热情,审读了部分译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并帮助查找了一些文献。另外,自贡市档案馆的同志代查了数条档案原文,在此我一并表示谢意。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先生、责任编辑张晓薇女士为本译著的出版付出了许多辛劳,我铭感于心。译文文责由我自负,还请读者不吝指教。

董建中

2013 年 11 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 凤凰文库书目

##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 《走进马克思》 孙伯鍈 张一兵 主编
-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张一兵 著
-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 任平 著
-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 张一兵 著
- 《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 胡大平 著
- 《国外毛泽东学研究》 尚庆飞 著
- 《重释历史唯物主义》 段忠桥 著
- 《资本主义理解史》(6卷) 张一兵 主编
- 《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 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张亮 著
- 《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 谢永康 著
-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景源 主编
-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李景源 吴元梁 主编
- 《科学发展观:现代性与哲学视域》 姜建成 著
- 《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周穗明 王玫 等著
-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 张文喜 著
- 《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 孙伟平 著
- 《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阐释》 唐正东 著
-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哲学阐释》 欧阳英 著
- 《正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 王广 著
-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英]斯图亚特·西姆 著 吕增奎 陈红 译
-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治与介入》 [英]保罗·鲍曼 著 黄晓武 译
- 《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 王浩斌 著
- 《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 陈新夏 著
-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 [荷]马歇尔·范·林登 著  
周穗明 译 翁寒松 校
- 《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 刘森林 著

## 二、政治学前沿系列

-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 孔繁斌 著
- 《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 王海洲 著
-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 译
-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 [英]斯蒂芬·卢克斯 著 彭斌 译
-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译
- 《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毛兴贵 等译
- 《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 [意]诺贝托·博比奥 著 陈高华 译
- 《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 [美]布鲁斯·阿克曼 等著 应奇 编
-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英]T. H. 马歇尔 等著 郭忠华 刘训练 编
- 《当代社会契约论》 [美]约翰·罗尔斯 等著 包利民 编

- 《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 [英]G. A. 柯亨 等著 吕增奎 编
- 《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 [英]欧若拉·奥尼尔 等著 徐向东 编
- 《宪政与民主》 [英]约瑟夫·拉兹 等著 佟德志 编
-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苏宝俊 译
- 《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 [美]赫尔曼·M. 施瓦茨 著 徐佳 译
- 《税收政治学:一种比较的视角》 [美]盖伊·彼得斯 著 郭为桂 黄宁莺 译
- 《控制国家:从古雅典至今的宪政史》 [美]斯科特·戈登 著 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 译
- 《社会正义原则》 [英]戴维·米勒 著 应奇 译
-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澳]安德鲁·文森特 著 袁久红 译
- 《新社会主义》 [加拿大]艾伦·伍德 著 尚庆飞 译
- 《政治的回归》 [英]尚塔尔·墨菲 著 王恒 臧佩洪 译
- 《自由多元主义》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庞金友 译
- 《政治哲学导论》 [英]亚当·斯威夫特 著 余江涛 译
-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王萍 傅广生 周春鹏 译
-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英]约翰·格雷 著 顾爱彬 李瑞华 译
- 《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 [英]乔治·克劳德 著 应奇 译
-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美]迈克尔·哈特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著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 《反对自由主义》 [美]约翰·凯克斯 著 应奇 译
- 《政治思想导读》 [英]彼得·斯特克 大卫·韦戈尔 著 舒小昀 李霞 赵勇 译
- 《现代欧洲的战与社变迁:大转型再探》 [英]桑德拉·哈尔珀琳 著 唐皇凤 武小凯 译
- 《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约翰·西蒙斯 著 郭为桂 李艳丽 译
- 《政治经济学理论》 [美]詹姆斯·卡波拉索 戴维·莱文 著 刘骥 等译
- 《民主国家的自主性》 [英]埃里克·A. 诺德林格 著 孙荣飞 等译
-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英]乔·米格德尔 著 张长东 译
- 《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 [美]彼得·霍尔 著 刘骥 刘娟凤 叶静 译
- 《社会契约论》 [英]迈克尔·莱斯诺夫 著 刘训练 等译
- 《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 [澳]菲利普·佩蒂特 著 刘训练 译
- 《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冯克利 译
- 《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张国清 译
- 《社会正义论》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译
-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美]汉娜·阿伦特 著 孙传钊 译
- 《作为公道的正义》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允春喜 译
- 《古今自由主义》 [美]列奥·施特劳斯 著 马志娟 译
- 《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乔治·格罗斯科 著 毛兴贵 译
-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 [美]罗伯特·A. 达尔 著 范春辉 等译
- 《论伦理精神》 张康之 著
- 《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 [英]科斯塔斯·杜兹纳 著 辛亨复 译
- 《阐释和社会批判》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郭忠华 编
- 《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 应奇 主编
- 《拉克劳与墨菲:激进主义想象》 [美]安娜·M. 史密斯 著 付琼 译
-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张亮 编
-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英]迈克尔·肯尼 著 李永新 陈剑 译

- 《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 [美]珍妮弗·皮茨 著 金毅 许鸿艳 译
- 《论战争》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 《现代性的谱系》 张凤阳 著
-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 阎小波 著
- 《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 [美]塞瑞娜·潘琳 著 张云龙 译
-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著 郭为桂 林娜 译
- 《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 [美]乔尔·S.米格代尔 著 李杨 郭一聪 译 张长东 校
- 《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 张亮 熊婴 编

### 三、纯粹哲学系列

- 《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叶秀山西方哲学论集(1998—2002)》 叶秀山 著
- 《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 黄裕生 著
- 《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 谢地坤 著
- 《从胡塞尔到德里达》 尚杰 著
- 《海德格尔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引论》 宋继杰 著
- 《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 赵广明 著
- 《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 黄裕生 著
- 《理念与神: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及其神学意义》 赵广明 著
- 《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 王恒 著
- 《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 黄文前 著
- 《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 SEIN》 李文堂 著
- 《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 尚杰 著
- 《胡塞尔直观概念的起源:以意向性为线索的早期文本研究》 陈志远 著
- 《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 方向红 著
- 《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罗蒂哲学研究》 陈亚军 著
-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 刘永谋 著
- 《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 叶秀山 著
- 《学与思的轮回:叶秀山2003—2007年最新论文集》 叶秀山 著
- 《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 户晓辉 著
- 《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 倪梁康 著
- 《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 王齐 著
- 《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 黄裕生 著
- 《道路之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 张柯 著
- 《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 叶秀山 著
- 《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 张荣 著
- 《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王树人 著

### 四、宗教研究系列

-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研究》(上下卷) 杜继文 著
- 《中国佛教通史》(15卷) 赖永海 主编
- 《中国禅宗通史》 杜继文 魏道儒 著
- 《佛教史》 杜继文 主编

- 《道教史》 卿希泰 唐大潮 著
- 《基督教史》 王美秀 段琦 等著
- 《伊斯兰教史》 金宜久 主编
- 《中国律宗通史》 王建光 著
- 《中国唯识宗通史》 杨维中 著
- 《中国净土宗通史》 陈扬炯 著
- 《中国天台宗通史》 潘桂明 吴忠伟 著
- 《中国三论宗通史》 董群 著
- 《中国华严宗通史》 魏道儒 著
-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3卷) 潘桂明 著
- 《禅与老庄》 徐小跃 著
- 《中国佛性论》 赖永海 著
-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洪修平 著
- 《基督教思想史》 [美]胡斯都·L. 冈察雷斯 著 陈泽民 孙汉书 司徒桐 莫如喜 陆俊杰 译
- 《圣经历史哲学》(上下卷) 赵敦华 著
-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洪修平 著
- 《如来藏与中国佛教》 杨维中 著

## 五、人文与社会系列

-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 [美]威廉·贝纳特 彼得·科茨 著 包茂红 译
-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刘北成 刘小鸥 译
-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等译
- 《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 [美]A. 麦金太尔 著 宋继杰 译
-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美]R. M. 昂格尔 著 吴玉章 周汉华 译
-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 [英]约翰·凯里 著 吴庆宏 译
-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韩震 等译
- 《社会行动的结构》 [美]塔尔科特·帕森斯 著 张明德 夏遇南 彭刚 译
- 《文化的解释》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 《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1)》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霍伟岸 叶颖 译
- 《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2)》 [美]埃里克·沃格林 著 陈周旺 译
- 《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 [美]理查德·塔克 著 罗炯 等译
-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 [英]基思·托马斯 著 宋丽丽 译
- 《男性气概》 [美]哈维·C. 曼斯菲尔德 著 刘玮 译
- 《黑格尔》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著 张国清 朱进东 译
-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美]罗伯特·K. 默顿 著 唐少杰 齐心 等译
- 《个体的社会》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翟三江 陆兴华 译
- 《象征交换与死亡》 [法]让·波德里亚 著 车槿山 译
- 《实践感》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蒋梓骅 译
-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 [美]利奥·施特劳斯 著 申彤 译
-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褚松燕 译
- 《传统的发明》 [英]E. 霍布斯鲍姆 T. 兰格 著 顾杭 庞冠群 译
-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美]海登·怀特 著 陈新 译

- 《卢梭问题》 [德]恩斯特·卡西勒著 王春华译  
《自足语文学:为语义最简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辩护》 [挪威]赫尔曼·开普兰  
 [美]厄尼·利珀尔著 周允程译  
《历史主义的兴起》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 陆月宏译  
《权威的概念》 [法]亚历山大·科耶夫著 姜志辉译

## 六、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英]王斯福著 赵旭东译  
《王弼〈老子注〉研究》 [德]瓦格纳著 杨立华译  
《章学诚思想与生平研究》 [美]倪德卫著 杨立华译  
《中国与达尔文》 [美]詹姆斯·里夫著 钟永强译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美]韩书瑞著 陈仲丹译  
《中华帝国后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黄卫总著 张蕴爽译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词中的园林与玩好》 [美]王晓山著 文韬译  
《六朝精神史研究》 [日]吉川忠夫著 王启发译  
《中国社会史》 [法]谢和耐著 黄建华 黄迅余译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彭慕兰著 史建云译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日]佐藤慎一著 刘岳兵译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美]王国斌著 李伯重 连玲玲译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日]岛田虔次著 甘万萍译  
《为权力祈祷》 [加拿大]卜正民著 张华译  
《洪业:清朝开国史》 [美]魏斐德著 陈苏镇 薄小莹译  
《儒教与道教》 [德]马克斯·韦伯著 洪天富译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美]德里克著 翁贺凯译  
《中华帝国的法律》 [美]D. 布朗等著 朱勇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 [美]杜赞奇著 王福明译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著 唐晓峰译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美]史华兹著 程钢译 刘东校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明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 [日]滨下武志著 高淑娟 孙彬译  
《中国美学问题》 [美]苏源熙著 卞东坡译 张强强 朱霞欢校  
《翻译的传说:构建中国新女性形象》 胡缨著 龙瑜成 彭珊珊译  
《〈诗经〉原意研究》 [日]家井真著 陆越译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美]高彦颐著 苗延威译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美]杜赞奇著 王宪明 高继美  
 李海燕 李点译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美]韩森著 鲁西奇译  
《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 [荷]安国凤著 纪志刚 郑诚 郑方磊译  
《毁灭的种子:二战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 [美]易劳逸著 王建朗 王贤知 贾维译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美]李丹著 张天虹 张胜波译  
《18世纪的中国社会》 [美]韩书瑞 罗有枝著 陈仲丹译  
《开放的帝国:1600年的中国历史》 [美]韩森著 梁侃 邹劲风译  
《中国人的幸福观》 [德]鲍吾刚著 严蓓雯 韩雪临 伍德祖译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 [日]中岛乐章著 郭万平 高飞译

- 《朱熹的思维世界》 [美]田浩 著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建构》 杨美慧 著 赵旭东 孙珉 译 张跃宏 校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 [美]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 著 姜智芹 译  
《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 [日]松浦章 著 董科 译  
《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 [日]顾琳 著 王玉茹 张玮 李进霞 译  
《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 [日]松浦章 著 郑洁西 译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科大卫 著 卜永坚 译  
《中国善书研究》 [日]酒井忠夫 著 刘岳兵 何莺莺 孙雪梅 译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 [日]城山智子 著 孟凡礼 尚国敏 译  
《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 [美]马立博 著 王玉茹 译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 [美]卢苇菁 著 秦立彦 译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 [美]韩书瑞 著 刘平 唐雁超 译  
《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 [美]易明 著 姜智芹 译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美]林郁沁 著 陈湘静 译  
《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 [美]戴维·艾伦·佩兹 著 姜智芹 译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 [日]增田涉 著 周启乾 译  
《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饉的文化反应》 [美]艾志端 著 曹曦 译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美]巴菲尔德 著 袁剑 译  
《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 [德]狄德满 著 崔华杰 译  
《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 [美]季家珍 著 杨可 译  
《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 [美]艾米莉·洪尼格 著 韩慈 译  
《银钱: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林满红 著 詹庆华 林满红 译  
《寻求中国民主》 [澳]冯兆基 著 刘悦斌 徐皓 著  
《中国乡村的基督教:1860—1900 江西省的冲突与适应》 [美]史维东 著 吴薇 译  
《认知变异:反思人类心智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英]G. E. R. 劳埃德 著 池志培 译  
《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 [美]韩瑞 著 袁剑 译  
《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 [澳]雷金庆 著 [澳]刘婷 译  
《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 伍跃 著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 [日]富谷至 著 刘恒武 孔李波 译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美]张骊 著 袁长庚 译  
《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 游鉴明 胡纓 季家珍 主编  
《跨太平洋位移: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民族志、翻译和文本间旅行》 黄运特 著 陈倩 译

## 七、历史研究系列

- 《中国近代通史》(10卷) 张海鹏 主编  
《极端的年代》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凡 等 译  
《漫长的20世纪》 [意]杰奥瓦尼·阿瑞基 著 姚乃强 译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钱乘旦 陈晓律 著  
《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 钱乘旦 主编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6卷) 杨栋梁 主编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 卢勋 杨保隆 等著  
《明治维新》 [英]威廉·G. 比斯利 著 张光 汤金旭 译

《在垂死皇帝的王国:世纪末的日本》 [美]诺玛·菲尔德 著 曾霞 译

《戊戌政变的台前幕后》 马勇 著

《战后东北亚主要国家间领土纠纷与国际关系研究》 李凡 著

## 八、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世纪末的维也纳》 [美]卡尔·休斯克 著 李锋 译

《莎士比亚的政治》 [美]阿兰·布鲁姆 哈瑞·雅法 著 潘望 译

《邪恶》 [英]玛丽·米奇利 著 陆月宏 译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 21 世纪的庸人主义》 [英]弗兰克·富里迪 著 戴从容 译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美]丹尼尔·贝尔 著 严蓓雯 译

《流动的恐惧》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谷蕾 杨超 等译

《流动的生活》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徐朝友 译

《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谷蕾 武媛媛 译

《未来的形而上学》 [美]爱莲心 著 余日昌 译

《感受与形式》 [美]苏珊·朗格 著 高艳萍 译

《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一种批判的历史》 [美]道格拉斯·多德 著 熊婴 译 刘思云 校

## 九、教育理论研究系列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美]梅雷迪斯·D.高尔等 著 许庆豫等 译

《教育基础》 [美]阿伦·奥恩斯坦 著 杨树兵等 译

《教育伦理学》 贾馥茗 著

《认知心理学》 [美]罗伯特·L.索尔索 著 何华等 译

《现代心理学史》 [美]杜安·P.舒尔茨 著 叶浩生等 译

《学校法学》 [美]米歇尔·W.拉莫特 著 许庆豫等 译

## 十、艺术理论研究系列

《另类准则:直面 20 世纪艺术》 [美]列奥·施坦伯格 著 沈语冰 刘凡 谷光曙 译

《弗莱艺术批评文选》 [英]罗杰·弗莱 著 沈语冰 译

《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 年以后的视觉艺术》 [美]简·罗伯森 克雷格·迈克丹尼尔 著 匡  
骁 译

《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 [美]迈克尔·弗雷德 著 张晓剑 沈语冰 译

《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 [英]T. J. 克拉克 著 沈语冰 诸葛沂 译

《自我与图像》 [英]艾美利亚·琼斯 著 刘凡 谷光曙 译

《艺术社会学》 [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 著 章浩 沈杨 译

## 十一、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系列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制度变革与结构转型》 肖耿 著

《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的作用》 [英]傅晓岚 编 蔡悦等 译

《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之路》 《比较》研究室 编

从19世纪初的急速扩张到1930年代后期中日战争前夕的衰落，自贡的食盐生产是中国最大规模也是仅有的内生大型产业之一。曾小萍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引人入胜的一章，为研究不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而塑造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力量和制度，提供了新的认识。她的书挑战了人们长期以来的固有认识，即社会结构、国家榨取、银行的缺位以及对于商业的文化偏见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发展。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曾小萍的著作提供了对于中国重要的一种工业成长的全面研究，并在世界工业发展的更大范围内对中国商业史重新定位。

《自贡商人》是部极具魅力的史学研究作品。将清末民初地方所藏的一些企业档案进行全面彻底的研究，且与对19世纪及20世纪中国的食盐开采业的法律、技术、政治和社会的一切方面进行精熟的分析相结合，曾小萍的著作乃是中国经济史方面的开山之作。中国近代经济转型感兴趣的人都应该阅读本书。

——魏斐德

这是商业史研究的一个范本，该领域的每个人都应该阅读，不论他或她研究的是哪个国家。本书既有深入的研究又有对理论的把握。

——内奥米·拉莫罗奥斯 (Naomi Lamoreaux)

曾小萍出色的研究重新塑造了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文化的理解。

——欧中坦 (Jonathan Ocko)

本书是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商业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它翔实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中国商业是如何运作的。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上架建议：中国历史

ISBN 978-7-214-13295-6



9 787214 132956 >

定价：48.00元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序言

中国历史上的自贡

自贡与企业史

资料

致谢

## 第一章 盐政与盐业技术

川盐与帝制晚期国家

富荣盐场的地理位置

清初富荣盐场的盐业生产技术

富荣盐场的崛起

## 第二章 晚清富荣的投资结构

清初的凿井契约

井基和矿基的简单租佃

富荣土地与资本的结合

盐井合伙制的发展

## 第三章 分裂：一种商业策略

盐井生产中的合伙制

生产资料的分配与再分配

卤、气利益相关者分享利润

结论

## 第四章 清代富荣的组织与企业家

盐业上发财致富

大盐业帝国的经营

分裂与纵向一体化

卤窠

组织创新与资本积累

## 第五章 城市劳动力的增长

移民与工业化

盐业劳动力的规模

现代自由劳力的增长

劳力的专业分工与技术的专门化

雇用条件

劳工组织与劳工斗争

结论

## 第六章 官运商销

“济楚”市场

争夺湖广市场

官运商销改革

官运商销对富荣食盐生产商的冲击

## 第七章 技术和组织的变革，1894—1930年

李伯斋与盐岩层的发现

蒸汽机车的引入

生产关系的重组

大灰子井与盐井生产力的提高

富荣盐场机推大灰子井的影响

## 第八章 富荣盐场守卫的变换

老牌盐场精英的衰落

新盐业精英的崛起

## 第九章 政治、赋税与市场：20世纪初自贡的命运

1911年与自贡自治

军阀时期的盐政

军阀统治与自贡盐业命运

自贡商会

产业战与盐场的衰落

1928年大罢工

抗战前夕的自贡

## 第十章 自贡：产业中心还是手工业“飞地”？

辅助产业和行业

信贷与金融业

内陆产业城市

结语：富荣盐场与中国工业发展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附录

封底